

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法西斯新论

- 朱庭光 主编
- 重庆出版社出版



FAXISI

XINLUN



主 编 简 介

主编：朱庭光，男，浙江宁波人，1924年5月生。1938年10月参加新四军。1952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副处长。1960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副处长。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先后任副所长、所长、顾问。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顾问，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顾问。《巴黎公社史》、《外国历史名人传》（8卷本）、《外国历史大事集》（10卷本）、《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著作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副主编。

目 录

序论	朱庭光(1)
第一章 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兴起	陈祥超(1)
第一节 法西斯运动产生的历史条件	(2)
有浓厚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	(2)
严重的经济危机.....	(5)
迅猛发展的革命危机.....	(7)
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	(11)
第二节 早期法西斯运动及其失败	(12)
昙花一现的革命干涉行动法西斯.....	(13)
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和它的纲领.....	(14)
站到左翼方面未获成功.....	(17)
第三节 法西斯运动与统治阶级的结合	(21)
转向右翼的新纲领.....	(22)
博取统治阶级的信任.....	(23)
镇压工农革命运动的别动队.....	(25)
合谋制造白色恐怖.....	(27)
法西斯运动的大发展.....	(30)
第四节 法西斯党夺取全国政权	(32)
法西斯党的第三个纲领.....	(32)
准备夺权的先行步骤.....	(33)

秘密进行组阁谈判·····	(36)
向罗马进军·····	(39)
墨索里尼受命组阁·····	(41)
第二章 意大利法西斯极权统治的确立 ·····	陈祥超(44)
第一节 巩固刚建立的法西斯政权 ·····	(44)
争取统治阶级的全面支持·····	(45)
加强对党政大权和法西斯武装的控制·····	(51)
兼并民族主义协会·····	(53)
扫除实现极权统治的主要障碍·····	(56)
第二节 马泰奥蒂危机 ·····	(58)
装扮门面的举动·····	(59)
恐怖威胁下的选举·····	(62)
议会会场上的斗争·····	(64)
法西斯政权摇摇欲坠·····	(66)
法西斯的反攻倒算·····	(71)
第三节 全面建立法西斯极权体制 ·····	(75)
实行一党专政·····	(75)
极权制的主要立法·····	(78)
墨索里尼集大权于一身·····	(83)
第四节 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构成 ·····	(86)
法西斯一词的由来·····	(88)
主要理论观点·····	(91)
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渊源·····	(96)
第三章 德国纳粹党的纲领和派别 ·····	(102)
第一节 二十五点纲领的主导倾向 ·····	郑寅达、李巨廉(102)
纳粹党及其纲领产生的背景·····	(103)

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	(108)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要求	(110)
必然的归宿	(113)
第二节 纳粹党内两个派别的形成	邱文(116)
希特勒诈取纳粹党领袖地位	(116)
希特勒派及其策略转变	(120)
施特拉瑟激进派分庭抗礼	(127)
施特拉瑟派对希特勒派的指责	(133)
第三节 纳粹党内两个派别的较量及其结局	邱文(138)
从汉诺威会议到班堡会议	(139)
清除奥托·施特拉瑟及其支持者	(140)
迫使格·施特拉瑟退党	(144)
第四章 德国纳粹党同主要社会阶层的关系及其性质	(149)
第一节 纳粹党与中下层民众	郑寅达、李巨廉(150)
两个转折点	(151)
为了争取选票	(154)
短暂的“蜜月”	(156)
扼杀“第二次革命”	(158)
第二节 同垄断资产阶级的关系	郑寅达、李巨廉、邱文(159)
从巴伐利亚走向全德	(160)
重要的突破	(163)
急需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165)
垄断资本集团的抉择	(167)
纳粹党执政后新的结合	(170)
第三节 同容克军国主义势力的关系	郑寅达、李巨廉(172)

互有戒心和芥蒂	(172)
希特勒争取国防军和容克地主的努力	(176)
国防军上层态度的分化	(178)
争取无保留支持的最后一步	(181)
第四节 对纳粹党性质演变的探讨	邱文(184)
从阶级斗争的实际考察	(186)
具体分析早期纳粹党的历史演变	(190)
纳粹党性质的根本转折	(194)
第五章 德国法西斯政权的建立	(199)
第一节 魏玛共和国后期的政治危机	肖辉英(200)
魏玛政局的转折	(200)
过渡性的总统制内阁	(205)
纳粹党与权势集团的结盟	(209)
第二节 希特勒纳粹党执政	邱文(214)
对希特勒组阁的限制	(215)
纳粹党控制国会多数	(219)
强行通过授权法	(221)
第三节 全面确立法西斯极权体制	邱文(224)
废除议会制和联邦制	(225)
对社会生活严密控制的极权恐怖统治	(231)
确立统制经济	(235)
夺权斗争的最后步骤	(237)
第六章 纳粹意识形态	(240)
第一节 纳粹主义的来源	秦声德(240)
纳粹主义的“思想家”	(241)
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思潮	(243)

德国历史上的极端民族主义	(247)
新保守主义和假社会主义	(249)
泛德协会及其操纵组织的影响	(253)
第二节 核心思想及理论基础	
..... 秦声德、宋仲璜、邸文	(260)
把德意志民族主义推向极端	(260)
种族主义	(266)
“生存空间”论	(271)
“领袖原则”指导的极权主义	(274)
社会达尔文主义	(277)
第三节 纳粹主义与尼采哲学	邸文、秦声德(279)
尼采的政治哲学	(279)
尼采思想对希特勒的影响	(282)
第三帝国对尼采的颂扬	(288)
所谓尼采的非纳粹化	(291)
第七章 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化	(296)
第一节 民间法西斯运动	侯振彤(297)
日本帝国的危机	(297)
中间阶层的特点	(304)
从传统右翼到法西斯主义	(307)
北一辉的法西斯纲领	(314)
其他民间法西斯派别	(322)
第二节 军队法西斯运动	徐勇、孙仁宗(329)
巴登巴登密约为起点	(329)
准备总体战和“国家改造”运动	(331)
一夕会的作用	(335)
皇道派和统制派的对立	(338)

第三节 军部法西斯化和政权法西斯化	徐勇(341)
军部政治发展的基本前提	(342)
军部政治化的历程	(347)
扼杀政党政治	(355)
军部法西斯化的完成	(359)
法西斯政权的确立	(363)
第四节 近代天皇制向法西斯体制的演变	孙仁宗(366)
近代天皇制的两重性	(367)
结构性的体制变动	(373)
高度国防国家即法西斯体制	(384)
第八章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态	孙仁宗(389)
第一节 评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	(390)
“复古——革新”论	(391)
“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和“战时体制”说	(395)
“否定论”的历史比较	(399)
第二节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点	(402)
以军部为核心力量	(403)
先外后内，自上而下	(408)
极权统治与政治权力的一定分散	(418)
借助天皇制意识形态	(424)
第三节 日本法西斯主义基本形态的概括	(430)
军部法西斯主义提法的缺陷	(430)
天皇制法西斯主义	(431)
其他三种提法	(433)
第九章 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巴西的法西斯运动	(436)
第一节 法国法西斯运动的失败	周以光(436)

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团体	(437)
“二·六”事件及其后果	(452)
法西斯运动的失败和人民阵线的建立	(456)
反法西斯力量联合的基础	(461)
第二节 西班牙法西斯运动	游长江(473)
模仿墨索里尼的德里维拉独裁	(473)
法西斯长枪党的纲领	(476)
推翻共和国的法西斯叛乱	(481)
佛朗哥叛乱所造成的灾难	(487)
第三节 葡萄牙的法西斯总体国家	张翠薇(488)
脱胎于军人独裁政权	(489)
建立总体国家	(491)
总体国家的结构及其统治手段	(494)
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及对外关系	(499)
第四节 巴西的整体主义行动与瓦加斯政权	金计初(502)
整体主义行动党及其渊源	(502)
统治集团的法西斯倾向	(506)
政府与整体主义党的勾结	(508)
粉碎整体主义党的叛乱	(511)
转而向法西斯轴心国宣战	(513)

附录:

早期纳粹党和纳粹运动的性质	周希奋(517)
战后各国的新法西斯主义	邱文(535)
德意日法西斯运动重要人物简况	
.....	邱文、陈祥超、吕永和(548)
关于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参考书目	
.....	邱文、陈祥超、吕永和(577)

第一章

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兴起

法西斯运动是本世纪初叶首先产生于意大利的一股反动政治势力。它刚刚出现时，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而实际的行动却是与社会党相抗衡，曾经令人迷惑不解。这股力量微弱的政治势力，既未得到群众的支持，也未受到反动保守势力的青睐。甚至到法西斯政权建立时，包括意大利社会党在内的各派进步势力和多数政治领导人仍然对它缺乏足够的认识。一直到法西斯极权独裁统治在意大利全面确立，人们才初步认清了它的公开恐怖专政的本质。

在意大利，对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原因众说纷纭。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产物”，是“各传统领导阶级为阻止劳动阶级掌权而采取的暴力行动”。^①以克罗齐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派认为，法西斯主义是给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带来灾难的“道德弊病”，它的出现是一种“偶然”，是一个历史

^① 伦佐·德·费利切，《法西斯主义的解释》，第60页；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葛兰西》，佛罗伦萨1955年版，第100页。

“插曲”。^①以戈贝蒂为代表的激进学派不同意自由派的观点，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合乎逻辑的产物”。^②

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力量，与大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阶级结成联盟，以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它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早期法西斯运动，在短暂的时间内，曾经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中小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为反对一部分旧的领导阶级而进行的一种政治斗争”。^③它向统治阶级靠拢，为它们镇压革命运动效力。垄断资本和地主贵族同它结合，是国内与国际政治气候诸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

第一节 法西斯运动产生的历史条件

法西斯主义之所以首先产生于意大利，与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和阶级斗争的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浓厚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在意大利早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长期外族统治下的分裂割据状态严重妨碍了意大利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直到1870年国家统一，意大利仍是一个农业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国民收入的大部分来自农业。实现统一后，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以采矿业为例，1861—1865年，铁矿石平均年产120,400吨，而1876—1880年增加到225,430吨，同期锌矿砂的年

^{①②} 圭多·夸扎：《法西斯主义：意大利人的认识研究》，载《历史编纂与法西斯主义》，米兰1985年版，第7—8页。

^③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法西斯主义的教训》，罗马1974年版，第17页。

产量从305吨增至62,250吨；硫磺从173,225吨增加到315,500吨；煤(不含泥煤)从37,760吨增至126,500吨。1885年钢产量3,382吨，1889年为157,899吨；铁产量从1861—1865年的年产30,000吨增加到1889年的181,623吨。^①

19世纪末，意大利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自80年代初开始，意大利的运输、纺织、机器、有色冶金、建筑、化学、电力和食品等行业的股份公司相继建立起来。到1890年，这类公司的名义资本总和为19.546亿里拉；1900年增加到22.12亿里拉，^②约占国民收入的15%以上。随着资本的集中，电力工业的爱迪生公司、运输业的意大利南方铁道公司和意大利地中海铁道公司、采矿与钢铁业的蒙特卡提尼公司以及化工与电器业的皮雷利公司等几个大垄断公司先后建立起来。但是从总体上看，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很不充分的。工业产值才占国民收入的32%^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意大利是一个封建势力及其影响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经济发展迟缓，与许多历史和社会经济条件分不开。其中最主要的是，封建贵族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均拥有雄厚的实力。正是这一原因，意大利于1870年实现统一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的。它所确立的是大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和大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统一运动所应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君主的权力得到加强。地主阶级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势力不但未予触动，反而受到保护。这就制约了意大利统一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工业不发达的意大利中部，特别是南部的广大地区，封建经济仍然占据优势地位。全国1600万公顷可耕地中的1000万公顷

① 焦尔焦·坎代洛罗：《意大利现代史》，米兰1986年版，第6卷，第223页至第255页。

② 乔瓦尼·格里利：《大资本与天主教右派》，佛罗伦萨1950年版，第37页。

③ 赵克毅、辛益：《意大利统一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页。

被4万个大地主所占有。这种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迫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变成雇农或佃农，将其收成的一半以上交纳地租。土地关系的落后性限制了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19世纪末，意大利全国的劳动力人口为1540万，其中460万是自耕农，400万是农业工人。其余的人大部分从事手工艺和家庭手工业。^①加上市场、原料与资本不足，严重地阻碍了工业的发展。

意大利的经济大大落后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纺织工业是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1900年，美、英、德拥有纱锭分别为1940万、4550万和800万，而意大利仅有210万锭。到1908年，意大利纺织业的发展速度虽然超过上述三国，但仍然远远落后于它们。此时美、英、德的纱锭分别为2750.4万、5280万和988.2万，而意大利只有430万锭。^②从国家的财富来说，意大利也远不能与上述一些国家相比。据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旧译国家主义党)1914年出版的小册子说，“当时法国的财富是3000亿里拉，英国是3500亿里拉，德国是4000亿里拉时，意大利仅有800亿里拉。”^③

经济上的落后成为垄断资本、地主贵族以及军政权势人物极力主张向外扩张的借口。他们利用群众中存在的民族主义和怀念古罗马的情绪制造向外扩张的舆论，强调意大利的落后和贫穷是因为过去意大利没有实现统一；由于它的领土狭小与贫脊。它“没有铁，没有煤，也就是没有现代化大工业所需要的一切。”相反，“其它国家富有，决不是因为他们的干的比我们多，而是因为

① 法比奥·莱维、翁贝托·莱夫拉和尼古拉·特兰法利亚，《意大利史》，佛罗伦萨1978年版第1卷，第88页。

② 数字资料来自格里利：《大资本与天主教右派》，第144页。

③ 阿尔弗雷多·罗科：《阿尔弗雷多·罗科政治论文及演说集》，罗马1938年版，第1卷第70页。

他们要么像法国，天赋富饶，要么像英国以武力去侵占别国富饶的领土”。^①现在意大利“也已统一”，有权“采取各种方式，包括用武力向外扩张”，^②“寻求我们的生存空间”。^③

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几乎历届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府都疯狂地推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④1887年和1895年两次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的战争，1889年侵占索马里和1911年挑起意土战争，都是各种权势集团广泛一致的要求。对外战争使意大利侵占了索马里和利比亚的部分领土，但它的扩张目的并未达到。在1896年著名的阿杜瓦战役中，意大利侵略军几乎全军覆没。意大利被迫签订《亚的斯亚贝巴条约》，承认埃塞俄比亚的独立与主权。意大利统治阶级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发誓要“报仇”，要建立意大利大帝国，总希望有一种力量能实现它的这一愿望。

严重的经济危机

意大利的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依靠国家军事订货，攫取高额利润，得到迅速发展。1915年至1918年新的投资额大量增加。1915年为78,616,000里拉，1916年为231,763,000里拉，1917年为1,331,993,000里拉，1918年为3,035,453,000里拉。^⑤1913年，意大利拥有3000到4000名工人的大工厂仅150家；^⑥到1919年1月，这样的大企业大约有3912家，拥有资本100亿里拉，主要分布在冶金(20亿里拉)、交通运输(18.71亿里拉)、水电(12.07亿里拉)、化工(6.89亿里拉)和纺织(6.46亿里拉)。^⑦

①②③ 罗科，《阿尔弗雷多·罗科政治论文及演说集》，第1卷，第71—72页和第22页。

④ 陶里亚蒂，《葛兰西》，第116页。

⑤ 格里利，《大资本与天主教右派》，第362页。

⑥ 赵克毅、辛益，《意大利统一史》，第301页。

⑦ 恩佐·桑塔莱利《法西斯主义史》，罗马1967年版，第1卷，第169页。

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强大起来，又出现一批大垄断资本集团和金融寡头。以生产军火的昂萨尔多集团^①为例，1914年战争爆发时，它的固定资产仅4200万里拉；战争后期，资本总额已达5.88亿里拉。工人从4000人猛增至5.6万人。生产机枪和飞机、军舰发动机为主的菲亚特公司的同期工人从4000增加到40500人。战争期间金融资本渗透到各个部门，出现了以意大利商业银行、意大利贴现银行、意大利信贷银行和罗马银行为中心的金融财团。商业银行，资本为2.73亿里拉，是一个与冶金、航运和电力工业关系极为密切、实力很强的金融机构。贴现银行，资本为1.68亿里拉，战争期间靠英法资本支持日益扩大，它控制着靠战争定货而发展起来的冶金和食品机械工业。信贷银行，资本1.2亿里拉，主要控制与保护贸易主义有关的工业。罗马银行，资本1亿里拉，主要靠昂萨尔多公司支撑。这些新兴的垄断集团具有更为强烈的帝国主义扩张欲望。

意大利在战争期间财物上所遭到的损失远远少于法国，但是战后意大利所遇到的经济困难却比法国要严重得多。主要表现在工业转产方面。战争打乱了意大利的经济结构，工业生产的发展被战争引向歧路。进口大幅度增加，而出口几乎为零，失去国外市场。由于设备陈旧落后和缺乏原料，生产成本很高。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意大利都无法与欧美资本主义大国相抗衡，它指望增加殖民地来解决困难。但在战后各战胜国分赃时意大利未能获得更多的殖民地，因而垄断资产阶级极为不满，迫切要求有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能够有力地为维护其利益效劳。

长达四年余的一次大战使得国力本来就十分孱弱的意大利陷入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之中。这个国民总收入一年仅200亿里拉

^① 该公司从1914年至1918年共生产大炮1万门，飞机3800架，海军舰艇95艘和1000万发炮弹。

的国家，在此期间的战费支出高达650亿金里拉（相当于1459.36亿里拉）。其中有200亿外债，350亿内债。^①内债总额由1910年的140.89亿里拉上升到1920年的950.17亿里拉。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借贷巨额债务仍不足以应付战争的需要，要靠大量发行纸币来维持。1915年6月30日全国货币流通额为38.56亿里拉，1917年6月30日为58.15亿里拉，1917年12月30日增加到84.25亿里拉，1918年上升到117.50亿里拉。^②1922—1923财政年度，公债又增加452.95亿里拉。^③这是战后意大利金融混乱、财政崩溃和物价飞腾的重要原因。

随着战争工业的转产，有大批中小企业破产倒闭。^④失业者的队伍日益庞大，1921年3月达到200多万。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1918年底至1920年底的两年中共发行新货币79.81亿里拉，使货币流通额达到197.31亿里拉。^⑤1919年工人的实际工资比1913年降低50%。^⑥工人阶级生活贫困。1919年的口粮供应还不到最低需要的25%，粮价昂贵到了人们无法忍受的程度。在都灵、米兰等城市，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反物价上涨的斗争，决定降价50%。埃米利亚—罗马尼亚、马尔凯和托斯卡纳等几个大区，许多城镇的工人纷纷建立“粮食苏维埃”。

迅猛发展的革命危机

经济危机引起革命危机。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和意大利广大工人压力的推动下，意大利社会党中央领导机构于1918年12月9日至11日举行会议，通过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

① 焦尔焦·阿门多拉：《法西斯主义与工人运动》，罗马1975年版，第7—8页。

②③④ 格里利：《大资本与天主教右派》，第358页。

⑤ 费德里科·卡鲍德：《当代意大利（1918—1948）》，都灵1961年版，第29页。

⑥ 阿门多拉：《法西斯主义与工人运动》，第8页。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奋斗目标的决议。^①此后不久，意大利工会举行代表大会，提出的斗争纲领要求8小时工作制，确定并保证最低工资，节假日工资照付和男女同工同酬。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社会党领导工人阶级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1919年，全国各地举行罢工1871次，参加者达55.4万人次。以7月电车工人大罢工影响最大，工人们在电车上挂满小红旗，贴着赞扬苏维埃俄国的标语。罢工造成城镇停水停电，交通瘫痪。

1920年1月20日，社会党在佛罗伦萨举行全国会议。社会党多数派(最高纲领派)提出，把1919年群众运动的革命势头引导到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在社会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的声势更加浩大。这一年全国举行罢工2070次，参加者达231.4万人次。^②政府已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1920年春季，工人运动达到高潮。以葛兰西为首的意大利社会党新秩序派，对工人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和客观困难作了全面估计，提出夺取政权先从工厂开始，建立工厂委员会。他们把工厂委员会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权形式和推动无产阶级争取革命胜利的动力。经过具体细微的准备，3月22日，都灵菲亚特汽车制造厂的工人率先举行“指针罢工”(Sciopero dell Lancette)”，要求厂方同意工人在厂内实行自治，建立工人政权。3月24日，冶金工人举行大罢工，参加争取建立工厂委员会的斗争。罢工很快蔓延到整个皮埃蒙特地区。厂方断然拒绝工人的要求，于4月29日宣布封闭工厂。这次斗争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后，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斗争采取了新方式、新手段。4、5月份，维亚雷焦、比萨、里窝那、皮昂比诺、萨尔察纳和拉斯佩亚等地均先后举行工农暴

^① 格里利：《大资本与天主教右派》，第344页。

^② 安杰洛·塔斯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夺取政权》，佛罗伦萨1976年版，第131页。

动。这成为8月底、9月初60万工人占领工厂运动的前奏。

意大利冶金职工联合会自1920年5月24日开始同各冶金厂厂主就签订劳动合同问题举行谈判。厂主们依恃政府与各种反动势力的支持，在谈判中采取强硬态度，声言“战后厂主已一再做出让步，现在不能再让了，是摆脱你们冶金工人的时候了。”^①冶金工会束手无策，准备放弃为迫使厂主签订合同而举行可能延续数月的新罢工。然而工业危机日趋严重，失业者日益增多。冶金工人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他们坚决要求把罢工进行到底，不获胜利决不罢休。在广大工人的推动下，冶金工会决定采取新的留厂罢工的形式。

消息传出，米兰的阿尔法·罗米欧工厂的厂主一面贴出告示，宣布清厂关门；另一面联合其他工厂主实行同盟歇业，企图破坏工人的留厂罢工。冶金工会领导人获悉，命令该厂工人占领工厂。他们认为，占领工厂将引起政府干预，这样，不仅可以签订合同，而且将使社会党领导人因而参加政府。8月31日，米兰的280家冶金工厂都已控制在工人手中。

到9月2日，占领工厂的运动扩展到意大利各地。总共有60万人参加占领各自所在工厂的运动。工人们把厂主、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赶出工厂，组建护厂赤卫队保护工厂，推选工厂委员会领导生产。后因原料供应不上，生产被迫停止，工资发不出来。占领工厂的热情逐日下降。部分工人因厌倦整天呆在厂里而回家。工厂委员会下令护厂赤卫队阻止工人离厂，造成工会领导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但是，工人罢工斗争没有停止。1921年为1134次，参加者72.4万人次。1922年575次，参加者44.8万人次。^②

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农村也沸腾起来。农民运动从自发的抗租、抗税斗争发展成以退伍军人为主体的占地运动。

^① 塔斯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夺取政权》，第124页。

^② 塔斯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夺取政权》，第131页。

一次大战结束后，意大利政府发布命令，要1896年至1916年入伍的90万现役军人在1919年11月22日以前全部退役。这些被称为“战场上的一代人”或“堑壕派人物”的退伍军人，尤其是敢死队员和突击队员，在战后的动乱局势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可以成为任何党派操纵的庞大力量。他们多数来自农村，绝大多数又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入伍时政府许诺退役后分给土地。当这些人满怀即将获得土地的喜悦心情从前线回到家乡时，既得不到土地，也找不到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一切同他们的想法大不一样。他们发现支持他们打仗的后方并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而是充斥着形形色色剥削者、投机倒把者和逃避兵役者的肮脏之地。更使他们不能容忍的是，从一战开始就反对意大利参战的社会党把他们这些开往前线的士兵也作为战争的罪人而粗暴对待和歧视。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之余，把一切不满、仇恨都集中到拒绝给他们土地的不支持给他们土地的社会党身上。他们联合起来，以要求兑现战前许诺为名，展开了占地运动。

与罗马毗连的拉齐奥大区40个村镇的农民，最早在退伍军人的带动下揭竿而起，占领大地主未耕种的土地。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各地，尤其是埃米利亚、帕达纳地区以及南方和岛屿地区。到1920年4月15日，全国有上百万农民和退伍军人参加占地斗争，占领了191户贵族和大地主的217万公顷土地。^①有的地区在占领土地同时，烧毁草垛，破坏庄稼，屠杀牲畜，赶走地主，夺取村镇政权。农民运动大有造反的趋势。

从总体上说，战后初期意大利工农革命运动迅猛高涨，出现了社会危机。为了进一步推进革命运动，主张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最高纲领的社会党最高纲领派于1920年1月提出，“存在着建立苏维埃的必要性”。^②3月，伦巴第大

^①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1卷，第611页。

^② 塔斯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夺取政权》，第122页。

区的南部和威尼斯朱利亚、埃米利亚、罗马尼阿、托斯卡纳、拉齐奥和普利亚等大区的一些城乡先后发生了工农自发占领工厂和耕地的事件。建立苏维埃的呼声甚高。都灵和佛罗伦萨等城市当时已有“共产主义城市”之称。^①乌迪内被称之为“布尔什维克的堡垒”。^②在意大利议会1920年初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议员们欢迎国王出席会议的掌声刚落，社会党的议员们就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和“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随后，他们唱着《红旗颂》离开会场。^③

面对革命运动大有夺取政权的趋势，统治阶级十分恐慌。为了阻止占领工厂和土地运动的发展，维护反动统治，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分别于1920年3月7日和8月18日在米兰建立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和农业总联合会。众议院内组成全国经济联盟。它们要求组成一个“能够确保社会秩序的强有力的政府”。^④

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

在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由巴黎和会而引起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遍及各个阶层。

1915年4月，意大利所以背弃德、奥、意三国同盟，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受了1915年4月26日签订的伦敦密约的诱惑。在这个条约中，英、法、俄三国密许，战争胜利后意大利将得到与奥地利接壤的南蒂罗尔和濒临亚得利亚海的特兰提诺、格里齐亚、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以及萨塞诺、瓦罗那和达尔马提亚的多数岛屿，承认意大利对多德卡内索和利比亚的主权。条约还规定，将来英法等国瓜分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时，意大利得要求获取相当的报酬等等。

^{①②} 塔斯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夺取政权》，第145页、176页。

^{③④} 维尼乔·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米兰1974年版，第74、307页。

然而，在1919年1月18日开始的巴黎和会上，英法等国背弃伦敦条约，拒绝履行满足意大利领土要求的许诺。这一情况传到意大利，引起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慨与不满。他们感到意大利被英、法所欺骗。墨索里尼提出“要复仇”。^①有相当数量的人公开主张向外扩张，让邓南遮出兵去夺取伦敦条约所许诺的土地，人人大骂政府无能。打倒政府的呼声响遍意大利全国。

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正是在这样一种混乱的和充满矛盾的气氛中诞生。它最初是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它使用了“‘法西斯’这个早期形式的真正劳工运动的名称”。^②墨索里尼企图借助工人阶级的支持，在1919年底的全国大选中获得胜利，进入内阁。

第二节 早期法西斯运动及其失败

意大利法西斯运动从它产生到上台执政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14年10月5日第一个法西斯组织“国际行动革命法西斯”（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的前身）建立到1920年5月，是它的孕育和早期活动阶段，其性质属于小资产阶级运动。自1920年5月24日“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21年11月7日改名“国家法西斯党”，是它改变政治立场，以暴力恐怖行动对付工农革命运动的阶段。法西斯运动与地主贵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成为统治阶级借以稳定政权、强化统治、压制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此后，步入第三阶段，夺取国家政权，作为统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全国范围确立法西斯极权统治。

^① 贝尼托·墨索里尼：《我的生平》，米兰1983年版，第150页。

^② 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93页。

让我们首先对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的孕育时期，更准确地说，对它直接的渊源，简要追溯其历史发展，然后对它的早期活动及性质概括地作些叙述和分析。

昙花一现的革命干涉行动法西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意大利的一批工团主义者和民族主义分子为推动政府参战，于1914年10月5日在米兰建立第一个法西斯组织——国际行动革命法西斯，发表了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实际上是鼓吹意大利站在英法一边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宣言，反映了参加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要求。^①

同年10月24日墨索里尼离开社会党后，参加了国际行动革命法西斯。1915年1月，将其更名为革命干涉行动法西斯。墨索里尼于1914年11月创办的《意大利人民报》以《告意大利劳动者宣言》的形式重新发表了上述宣言，号召广大工农群众，“阻止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军国主义分子通过战争实现其帝国主义野心”，为了“防止意大利明天被奴役”，“坚决地走上战场”。

宣言全面谴责德国与奥地利政府的侵略行径，指出，“今天的战争是一场大悲剧，如果我们袖手旁观，那就等于背叛革命事业，背叛我们的社会主义原则，无颜再以文明和自由的名义为民请命”。

宣言宣布，法西斯的任务是站在欧洲代表着自由与和平事业的欧洲国家一边，即站在革命的摇篮——法国、政治自由的堡垒——英国和仗义疏财的比利时一边，“反对德国的野蛮行径、专制主义、军阀主义和封建主义”，是“迫使政府停止忍辱和退让。”希望人们“做好参战的准备”。

^① 宣言全文见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1卷，都灵1965年版，第679页——681页。

宣言所包含的内容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促使法西斯组织建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旨在鼓动深受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的广大小资产阶级分子向政府施加压力，推动政府参战。实际上，宣言反映了当时在小资产阶级中、特别是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希望通过战争使意大利跻身于强国之列的愿望。因此，革命干涉行动法西斯建立后仅两个月，成员就发展到9000人。当意大利政府于1915年5月24日正式对奥宣战、墨索里尼与其它领导人于同年8月入伍以后，革命干涉行动法西斯虽未正式宣布解散，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严格说来，无论国际行动革命法西斯，还是革命干涉行动法西斯，都不能算是现代法西斯运动的真正组成部分。但它们之间多多少少有些亲缘关系，成为国家法西斯党的前身。由于政局发展的需要，重新打出法西斯的旗号，赋予它以新的含意。因而对于后来兴起的法西斯运动，不妨说具有一定的孕育作用。

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和它的纲领

一次大战结束后，墨索里尼与退伍军人协会领导人韦基、工团主义领导人比昂基等7人商定重建法西斯组织。

1919年3月23日，他们在米兰的圣·塞波尔克罗广场的工商俱乐部举行了“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的成立大会。与会者共120人，其中有退伍军人、工人、学生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会议通过三个政治声明^①，

宣布“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时刻准备对各军事组织所提出的精神与物质要求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它既反对其它国家推行的损害意大利利益的帝国主义政策”，也“反对意大利推行损害

^① 三个声明全文见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45页。

别国人民的帝国主义政策”，要求“收复和归并位于阿尔卑斯山和亚得里亚海一带的阜姆与达尔马提亚”。

在会上散发的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的纲领^①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它的主张与宗旨。

在政治方面，它主张“实行普选”、“给妇女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要求“取消参议院”，“三年内召开国民会议”，以便“确定国家的宪法形式”。提出“设立劳动、工业、运输、社会卫生和通讯等全国技术委员会”，各委员会均“由职业或技术团体选举产生”，“拥有立法权”。

在经济方面，纲领提出若干反资本和反教会的措施。它主张“对资本课以累进性特别重税”，实质上“就是没收其部分财富”；要求审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有战争供货合同，“没收战争利润的85%”，“把所有的军火工厂都收归国有”；还要求“没收宗教团体的全部财产，取消一切主教薪俸”，理由是“它给国家造成沉重负担，而且是一种少数人的特权”。

关于社会问题，纲领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从法律上“确定最低工资标准”，“修改有关残废者和老年人的劳动保险法法案，把享受劳保的年龄从现在的65岁降到55岁。”主张“把工厂或公共事业机构的管理权交给无产阶级的组织”，“工人代表参加企业的技术管理。”纲领还指出，无产阶级的组织承担上述任务“在道德上和技术上都是当之无愧的”。

关于军事问题，纲领提出“建立国家民兵”，经过短期训练后担负专门的防御任务。

1919年6月6日，这个纲领在《意大利人民报》正式公布时，作了补充修改。除上述各项均予保留外，增加了一些内容，主要是：

^① 纲领原文见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1卷，第744—745页。

(1) 主张“强迫地主耕种土地，违者予以制裁，把未耕种的土地全部交给农民合作社。对自前线归来者予以特殊照顾，在建造佃农房舍方面，国家有义务给予必要的资助。”

(2) 提出“国家有义务使学校首先具有并保持坚定的培养民族意识的性质”和“严格的非宗教性质”，以便“陶冶学生保卫祖国的精神”。纲领还要求“通过在预算中拨出必要的基金，切实而全面地实施义务教育法”。

1919年11月，法西斯中央委员会在为参加意大利第25届议会选举而提出的竞选纲领中，根据国内的政治局势和巴黎和会在意大利全国引起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重申上述声明和纲领中的某些内容。对外提出“无条件兼并毗邻的阜姆和把达尔马提亚的意大利城市划归意大利”；对内提出“召开立宪会议，讨论和解决国家体制问题”，主张“彻底改革财政制度”，“没收战争期间的额外收入；课征遗产税，用以有效地安置战争中的伤残者、士兵及他们的家属；没收教会的财产，将其交给由当地农民管理的救济机构。”^①。

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发表的政治声明和纲领的主要内容表明，它所追求的是实行某些激进的社会改革，满足民族主义的要求，希望有一个能维护城乡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这个政权不只是反对教权，而且抑制大资本的发展，消灭地主经济。由此可见，法西斯运动在其刚刚产生时，并没有显示出是一个反动的运动，它倒是在某些方面提出了比较激进的政治要求。在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建立不久即开始研究法西斯现象的匈牙利共产党人朱利奥·阿奎拉认为，纲领中的“许诺和主张捍卫了‘国家的安全’，‘全民’的利益，特别是中产阶级和具有民族思想与感情的正直劳动者的利益。”^② 这种说法虽然值得商榷，但它肯定战斗的意大利

^① 转引自桑塔莱利，《法西斯主义史》第1卷，罗马1973年版，第150页。

^② 转引自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4—5页。

法西斯的纲领，主要符合中产阶级即城乡广大小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利益，则是不错的。

纲领和声明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某些要求，但它并不要求根本改变所有制，亦未涉及政权问题，而是仅仅限于主张在现存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范围之内实行改良，满足各阶层人民最为关切的实际问题。它当然也不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墨索里尼本人在1919年3月23日的讲话中说过，“这个纲领反对列宁主义。”^①

站到左翼方面未获成功

早期法西斯运动在行动上是对意大利地主资产阶级政府或多或少持批判态度的一种力量。它的行动主要放在赢得退伍军人、工农群众及其它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信赖与支持，作为它的社会基础。它积极寻求同其它小资产阶级政治团体和工会组织建立联系，接过它们的某些主张与口号，参加它们发动的全国范围反对意大利在巴黎和会上采取放弃主义立场、要求把阜姆等地划归意大利的运动。它甚至还同情、支持工人举行的罢工和反对生活费用上涨的斗争。

战后初期，墨索里尼的行动主旨就是争取退伍军人作为他的依靠力量，重新博得工人、特别是青年社会党人对他的好感与拥护，进而把战前建立的“革命干涉行动法西斯”发展成为一个能与社会党相抗衡的政治运动。他采取了以下一些步骤：

首先，自1918年底开始，他所控制的《意大利人民报》极力迎合退伍军人，颂扬他们的“功绩”，鼓吹“要给自战壕里归来者以工作”，“给特等残废军人的特等抚恤金”，“大大改善自前线归来

^① 意大利警察总监1919年6月4日就墨索里尼与战斗的法西斯向内阁首相办公室的报告。载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1卷，第725—737页。

的士兵的经济条件”^①等等。他积极支持旨在建立退伍军人组织的各项倡议，以取悦于退伍军人，提高自己在他们当中的声望。

其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把退伍军人和敢死队员协会的主要领导人韦基、梅拉维利亚、德西等人拉入法西斯运动，共同建立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

再次，是联合主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未来主义政治党、意大利社会主义联盟和共和党等左翼党派，筹备召开“干涉主义立宪会议”，讨论国家体制问题和实行社会改革问题。

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于1919年3月23日建立后，主要活动是扩大在退伍军人、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中的影响。它把由社会党改良派领导的劳动同盟和小资产阶级的未来主义政治党纲领的主要内容吸收到1919年6月6日正式公布的法西斯党第一个纲领中去，以致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的纲领与上述几党的纲领并无多大区别。^②

为了争取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战斗的法西斯站在“领土收复主义的立场”，联合反动文人邓南遮和民族主义协会，多次在罗马、米兰等地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与游行。这些活动谴责巴黎和会，反对“放弃主义”，要求兑现伦敦条约对意大利的领土许诺，把达尔马提亚等划归意大利，阜姆并入意大利，向意大利政府和意大利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施加压力。《意大利人民报》自7月底

①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1卷，第467，473页。

② 未来主义的政治纲领的要点是：实行普选，给妇女以选举权；土地进一步社会化，增加合作社和分土地给自战壕里归来者；没收未耕种和耕种不善的土地；河流与矿山实行国有化；实行累进性重税制；（人民）有罢工、集会、结社和新闻自由；发展经济，发展文明与教育，实行8小时工作制；实行社会救济、社会帮助和领取养老金制；没收超额战争利润的三分之二等。意大利劳动同盟纲领的要点是：没收地主及其家属未直接耕种的土地，永久佃给农民耕种，优先照顾退伍军人和在战场上被打死者的家属；没收地主及其家属未居住的房屋；没收工业企业的利润，在国家、地方机构、领导机关、个人和股东之间重新进行分配；对高于定额的遗产予以没收，交给国家和地方当局；银行实行国有化；对净收入和遗产征收累进性特别重税等。

至9月初大量刊登了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要求收复阜姆与达尔马提亚的新闻报导，指责政府无能和主张向外扩张的文章。这对扩大法西斯在全国的影响起了一定作用。

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在初期，总的说来，对工人罢工和占领工厂的斗争采取支持或同情的态度。1919年1月底，米兰铸造工人为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和确定最低工资标准举行大罢工。法西斯组织通过《意大利人民报》刊登文章予以支持。2月下旬，达尔米内的佛朗奇——格莱格里尼工厂工人，在意大利劳工联盟的领导下通过决议，要求实行“8小时劳动日”，“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实行支付工资的英国式星期六”和“承认工会的代表资格”等。^①厂方断然拒绝工人要求，威胁说，如不放弃这些要求，将“停产关厂”。全厂工人于3月16日占领工厂。次日，意大利政府从邻近的贝加莫城调去1500名军人，把工人统统赶出工厂。对于这次事件，除贝加莫的报纸作了简单报导外，国内最有影响的几家报纸多数未登消息。唯一用了大量版面连续几天刊登上述消息的报纸是法西斯的《意大利人民报》。它着重宣传这次事件的特殊性质。在这次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墨索里尼还在3月20日到达尔米内向工人发表演说，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称赞他们的罢工“开拓了新的前景”。^②

1919年5月1日，战斗的法西斯中央委员会散发传单向工人表示祝贺，高度评价工人为战争胜利所做出的贡献，称赞“你们工人阶级的胜利是你们勤劳的和战斗的双臂的胜利。”^③

同年6、7月，意大利工人阶级在全国掀起一次规模空前的反对生活费用上涨和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法西斯运动也参加了

^①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1卷，第503页。

^② 转引自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1卷，第504页。

^③ 意大利王国警察总监1919年6月4日就墨索里尼与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问题向王国政府首相办公室所做的报告，转引自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1卷，第725—737页。

这次斗争。6月9日，《意大利人民报》刊登《法西斯为反对食品涨价而斗争的措施》，提出几条阻止物价上涨和改善基本必需品供应的建议。7月5日，墨索里尼撰文宣布，“法西斯全力支持意大利各省为反对饥饿而举行起义的人民”。^①

1920年3月24日，都灵冶金工人举行大罢工，反对政府公布的“法定时”，即夏令时工作制，要求厂主承认工人建立的工厂委员会。墨索里尼称赞这次运动是“意大利人民反对其统治者的第一次大革命”。他表示给以无条件的支持，于4月6日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署名文章。^②

战斗的法西斯在行动上表示同情和支持工人运动，但是，它并没有赢得工人及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支持。1919年11月大选，法西斯运动的候选人无一人当选。在米兰地区参加竞选的墨索里尼得票最多，也只有1064票。竞选失败使法西斯分子失去信心。绝大多数人相继抛弃这个运动。到1919年12月31日，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只剩下870人。^③

法西斯运动惨败，首先是因为它从建立之日起就公开提出反对社会党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这与深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广大群众的愿望是相违背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左翼阵营中陷于孤立的境地。

其次，法西斯运动迄止大选还未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势力。1919年8月它号称有17000人，^④其中大部分是集体成员，是各地的未来主义政治党和退伍军人协会的基层组织集体参加的。政治上的虚弱使得它的纲领不过是一纸空文，吸引不了群众。

第三，作为左翼运动，它无法与社会党相抗衡。在1919年11

① 1919年7月5日《意大利人民日报》。

② 转引自塔斯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夺取政权》，第116—117页。

③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1卷，第510页。

④ 塔斯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夺取政权》，第57页。

月大选中，社会党获得选票1834792张，占总票数的32.3%；它在议会中的席位从50席猛增至156席，占众议员总数的30.7%。^①

第四，在争取农民的问题上，法西斯运动也无力与1919年1月18日建立的意大利人民党竞争。这个在梵蒂冈支持下建立的党，由于它的12点纲领反映了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的利益与要求，发展十分迅速。到1919年6月14日在波洛尼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基层支部已达850个，党员55895人。^② 在1919年大选中，得票仅次于社会党，为1167354张，占总票数的20.5%。在议会中拥有100个席位，占众议员总数的19.7%，^③ 是议会的第二大党。

最后，法西斯纲领中的反对大资本和反教会等措施，以及墨索里尼本人社会主义者的经历使垄断资本、封建残余势力和军政权势集团存在一定的戒心，没有给它以支持。

很清楚，无论是向左的方面发展，还是指靠右的方面的支持，法西斯运动都无法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运动按照原样继续存在下去。墨索里尼欲求东山再起，必须另起炉灶。他终于选择了后者。

第三节 法西斯运动与统治阶级的结合

1920年5月24日，战斗的法西斯在米兰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选出党的领导机构，确定新的行动宗旨。此后，法西斯运动根本改变了政治方向，转而为谋求赢得统治阶级的信任和

①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71页。

② 坎伐洛罗：《现代意大利史》第9卷，米兰1984年版，第258—269页。

③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71页。

支持，不惜以打手的姿态武力镇压群众运动，维护和稳定本国资产阶级、地主贵族的联合统治。

转向右翼的新纲领

法西斯运动1920年5月米兰代表大会，通过了《法西斯纲领的基本要点》。^①它所涉及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军事等方面的主张都表现出法西斯运动向右转的趋向。把这个新的纲领要点同1919年纲领作一比较，便可略见一斑。

在政治方面，1919年纲领的有关条文在新纲领的基本要点中只保留要求建立全国技术委员会一条，其余各项均弃如敝屣。相反，写入两条标志法西斯运动性质变化的新内容：一条是表示，法西斯运动对现政权的和解，明确宣布不反对现政权，说它“对目前的（国家）制度不抱任何成见”，“在战斗的法西斯看来，政权问题应当服从于民族当前的现实及民族历史的形成”；另一条申明法西斯运动的行动总方针是：“保卫最近的这次民族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笔者），突出宣传获得的胜利；抵制和反对政客或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堕落”。

关于社会问题，把1919年纲领的要求“工人代表参加企业的技术管理”，改为“工人代表仅限于在人事方面参加工厂的管理”。至于1919年纲领中所提出的“确定最低工资标准”，修改劳动保险法法案等项要求，新纲领基本要点只字未提，却增加了美化资产阶级的条文。称之为“劳动的资产阶级”，说什么“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从工业到农业，从科学到自由职业），劳动的资产阶级已成为发展进步和实现关系到民族命运伟大胜利的宝贵的和不可缺少的因素”。它还公开宣称，“在……工人斗争面前，它（战斗的

^① 全文载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1卷，第742—743页。

意大利法西斯)有义务持坚决反对态度”。

在经济方面，把1919年纲领提出的审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有战争供货合同，“没收战争利润的85%”，改为“没收非生产性的战争利润”，“支持那些能确保最高生产率……的形式”。新纲领要点没有再提“把所有的军火工厂都收归国有”，也不再要求把地主“未耕种的土地全部交给农业合作社”。这一切都是法西斯运动有意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靠生产军火等工业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以及地主贵族表明其新的政治态度。

博取统治阶级的信任

法西斯运动转向反动，自1920年5月以后在行动上也逐渐表现出来。

1920年，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标志之一是社会党控制了全国三分之一省、市的行政领导权。战后意大利内阁的频繁更迭，^①表明统治阶级软弱无力，不能有效地控制局势。它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吸引群众、压制革命力量的政治组织及其领袖人物来稳定局势，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法西斯运动仇视社会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就成为统治阶级镇压革命运动所需要的比较理想的帮凶。

统治阶级与法西斯运动之间的结合，存在着一定的“障碍”。这就是早期法西斯运动“反资本”和“反封建”的政治主张，以及墨索里尼曾经是社会党领导人的经历。惯于审时度势的墨索里尼懂得，要取得统治阶级的信任，必须采取主动。1920年6月15日，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法西斯上台执政，意大利共组成六届内阁，都是短命的。1919年6月23日尼蒂接替奥兰多担任首相；1920年5月12日尼蒂政府辞职，21日尼蒂受命再次组阁；6月10日尼蒂下台，乔里蒂于6月15日组成新政府；1921年7月4日社会党改良派领导人博诺米接替乔里蒂组成新政府；1922年2月16日博诺米内阁总辞职，26日法克塔组成新政府；10月28日法克塔辞职，并组成看守内阁。

乔里蒂接替尼蒂担任王国首相，发表了一个以镇压革命运动为根本宗旨的施政声明。6月25日，墨索里尼即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声称乔里蒂的声明“与法西斯(新)纲领的基本要点完全一致，几乎一字不差”。^①这一番话，反映了新选出的法西斯领导集团极力迎合统治阶级，迫不及待地表明自己愿意投靠政府，为维护、稳定垄断资本和地主贵族联合统治效力。

战斗的法西斯在这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反对革命运动的行动。7月20日，一伙法西斯暴徒袭击了社会党众议员莫迪利亚尼和德拉·塞塔。同一天，还捣毁了《前进报》罗马总部。8月1日，法西斯分子在米莱西莫攻击了社会党的一个团体，打死两人，打伤4人。

1920年9月1日，60万工人占领了工厂。法西斯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会议发表了一个把战后意大利经济危机的责任嫁祸于工人阶级的声明，声称“意大利经济危机的原因有二：一是统治者无能……二是工人的罢工狂”。^②所谓“统治者无能”，实际上是迎合垄断资产阶级指责政府镇压工人运动不力。在法西斯领导人看来，正是这个原因才出现“工人的罢工狂”。墨索里尼于1920年10月17日跑到米兰行政长官鲁西尼奥利的办公室，向他保证，“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下定决心，将使用包括更加猛烈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去反对将意大利毁灭的各极端党派的暴行”和“反对工会组织的骚动”。^③

法西斯运动及其领导人的上述姿态使得统治阶级对它改变政治态度深信不疑。乔里蒂政府随即对法西斯运动采取两项措施：

一、据葛兰西揭露，乔里蒂内阁的战争大臣博诺米于1920年10月20日签署一个文件，命令把“正在办理退役的军官(大约6万

^① 见1920年6月25日《意大利人民报》。

^② 声明全文转引自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192—193页。

^③ 转引自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1卷，第634页。

人)派往较为重要的城市去,其任务是参加将由他们领导和为其配备干部的‘战斗的法西斯’,国家保留他们(这些退役军官)五分之四的薪水”。^①

二、乔里蒂让法西斯运动加入由各保守党派组成的以他为首的“国家集团”,参加竞选。

乔里蒂采取这两项措施,也是考虑到,1919年9月邓南遮率领义勇军占领阜姆并建立临时政府后,墨索里尼曾跑去向邓南遮表示祝贺,二人商定共同“向罗马进军”。1920年10月初,邓南遮制订了向罗马进军的计划。乔里蒂担心法西斯分子与阜姆采取联合行动,极力想笼络墨索里尼,让他背弃向邓南遮做出的共同行动的保证,以挫败邓南遮的“进军”计划。

另一原因是,社会党虽然在占领工厂运动失败后受到一些挫折,但它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仍有很大影响。它在1920年秋后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在25个省和2162个市获得绝对多数,^②控制了这些地方的行政领导权。统治阶级对此惊恐不安,制订了一个以捣毁社会党支部、人民之家、工会、农会和社会党执政的地方政府为目标的“惩罚性讨伐”计划。为了掩人耳目,它暗中向法西斯行动队提供武器装备,让它参加“讨伐”行动。

镇压工农革命运动的别动队

战斗的法西斯,正是在统治阶级处于危急时刻投靠政府,与资产阶级、地主贵族相结合,建立以反对社会党为首要目标的法律法西斯行动队。这种行动队采用残酷的手段疯狂地破坏工农革命组织,殴打、杀害社会党和工会领导人。它公开参与军警对群众运动的镇压,被统治阶级奉为制止革命运动的“复仇天使”。

^① 转引自塔斯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夺取政权》,第161页。

^② 当时意大利全国共有69个省和8059个市。

在农村，墨索里尼效法一次大战前地主阶级组建反动武装的行径，1920年夏季，在革命运动高涨的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和艾米利亚等地区，网罗那些犯有前科或被判刑者、向前线退伍归来的地主子弟和穷困潦倒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组成法西斯武装行动队。^①从1921年起，在城市也正式建立了武装行动队。无论是农村或城市，这伙亡命徒采用“蓖麻油加大棒”的手段，集中力量打击和反对社会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

1920年农村法西斯运动兴起后，各地的地主分子积极与其勾结，为它进行反革命活动提供资金，供应武器与卡车。作为交换条件，法西斯组织同意一次大战期间在军队担任军官、战后退役回乡的地主子弟充当法西斯行动队队长。法西斯运动采取极其残酷同时又是非常狡猾的手段进行反革命活动。法西斯暴徒往往在地主带领下闯入社会党领导人家中，逼迫他们辞去省长、市长、镇长或村长职务，然后或是砸烂室内所有东西，烧毁房屋，甚至把全家人当场打死；或是将人捆绑装上卡车拉到别处，扒光衣服，施行令人发指的酷刑。^②

法西斯领导人一面提出“给农民以土地”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表示支持退伍军人和农民的占地运动；一面劝说地主拿出几千公顷贫脊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然后，发表演说和文章，称赞地主把薄田交由法西斯组织分给农民是革命行动，^③法西斯分子自我宣扬，说什么是“法西斯使数以百计的家庭得以全年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④同时挑拨农民与社会党的关系，攻击社会党

^① 朱塞佩·德·法尔科：《法西斯主义——阶级的部队》，波洛尼亚1921年版，第17页。

^② 参见社会党众议员加科莫·马泰奥蒂1921年3月10日在议会的讲话，载意大利《社会批判》1921年第7期。

^③ 1921年4月4日墨索里尼在费拉拉讲话，称赞当地地主拿出3000公顷土地分给农民是革命行动。转引自塔斯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夺取政权》，第212页注释70。

^④ 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与土地》，载1921年2月19日《意大利人民报》。

不仅没有为农民谋得任何福利，“甚至还阻止你们（农民）成为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当时担任法西斯运动农村负责人的加埃塔诺·波尔韦雷利1921年1月27日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刊登的文章中对此供认不讳。他说，法西斯“注重为种田人获取土地的目的在于打击它的政治对手”，“是对抗社会——共产主义的宣传”。^①

墨索里尼1921年在与农村法西斯领导人争夺领导权时，曾攻击农村法西斯运动代表着“意大利某些最凶恶最卑鄙的阶级的私利”。^②成为莫大讽刺的是，恰恰是农村法西斯运动率先大规模实行暴力恐怖手段，在统治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心目中造成强烈的印象，从而扩大了法西斯运动的影响，推动它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全国性的强大的政治运动。

也正是农村法西斯运动大发展的时候，以垄断资产阶级和封建王室为主体的统治阶级开始转而支持法西斯运动。

合谋制造白色恐怖

1920年11月，波洛尼亚举行地方选举，社会党以18170票对国家集团的7985票获胜。11月21日，新当选的社会党政府举行就职仪式。数百名法西斯分子冲入会场，造成10人死亡，48人受伤。随后，这伙暴徒袭击了波洛尼亚市工会和社会党市党部。

很显然，这次行动是法西斯分子与当局配合进行的，而且蓄谋已久。在波洛尼亚选举结果揭晓后，法西斯分子就曾扬言将“阻止社会党政府行使职权”。^③在社会党人组成的市政委员会宣誓就职前夕，法西斯分子张贴传单，要求“妇女和所有热爱和平与安定

① 转引自塔斯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夺取政权》，第212页。

② 史密斯：《墨索里尼》，第80页。

③ 转引自塔斯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夺取政权》，第163页。

的人星期日(即11月21日)都要呆在家里”，届时“使波洛尼亚的大街上只有法西斯主义者和布尔什维主义者”，双方将进行“战斗”。^①当局对法西斯分子将采取行动早有所闻，并未予以制止。事发后，当局出动宪兵和警察，并未到出事现场，也没有逮捕一名法西斯肇事者。

波洛尼亚事件后，法西斯行动队作为统治阶级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首先在靠近阜姆的威尼斯朱利亚区、社会主义势力最强大的埃米利亚和托斯卡纳地区，借口“整顿秩序”，明目张胆地进行疯狂的反革命活动。法西斯行动队队员每当冲进市镇政府、工会、农会、合作社和人民之家，先是把室内家俱、书籍和其它陈设统统扔到街上，倒上汽油烧毁。对屋子里的人轻则毒打一顿，重则当场杀害。”^②

法西斯暴行的残酷性还表现在它对革命运动高涨的城镇平民百姓的烧杀抢掠上。1921年5月1日，法西斯暴徒袭击欧奇奥贝洛城，将城内工人阶级机构全部破坏，打死平民数十人；被非刑拷打致伤者多达4000至5000人。有1000多户民宅被抢掠一空，300多所住房被烧毁。^③

向罗马进军时的法西斯四巨头之一的伊塔洛·巴尔博在回忆录中说，“那是可怕的一夜。我们所到之处无不有冲天的烟柱和火光。法西斯分子在整个罗马尼阿平原上进行疯狂报复，直到丘陵地区。发生的事件不计其数。没有任何人进行公开抵抗，领导人也都逃跑了。各协会、社会党支部和合作社都空无一人”。^④

法西斯运动如此猖獗的主要原因是它受到王国政府的青睐与

① 转引自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82页。

② 马泰奥蒂1921年3月10日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载意大利《社会批判》1921年第7期。

③ 马泰奥蒂：《波莱西内的白色恐怖》，载意大利《社会批判》1921年第11期。

④ 转引自拉法埃洛·乌博尔迪：《佩尔蒂尼公民——全体意大利人的总统》，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庇护，得到军警与宪兵的纵容和支持。它们合谋制造了白色恐怖。

1921年初，一名法西斯行动队队长在致共产党一家报纸的信中就说，法西斯分子之所以敢于采取行动，是因为“陆军的军官与我们站在一起，他们向我们提供武器和弹药……我们在与你们发生冲突前，先让警察缴你们的械”。^①佛罗伦萨法西斯武装行动队的主要负责人翁贝托·班凯里于1922年所写的备忘录中写道，“坦白地说，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发展和拥有部分的活动自由，是因为它在意大利宪兵和其它武装部队的官员及军官中找到了意大利进行革命的精神与理想”。^②这里所说的“找到了”“革命的精神与理想”，正是说明了法西斯已与统治阶级朋比为奸，沆瀣一气。

大量的事实证明，1920年底至1921年初，意大利统治阶级已经公开把法西斯行动队作为军警与宪兵的辅助力量来使用。1921年3月1日法西斯行动队参与镇压穆吉亚市的工人大罢工，就是先从空军航空学校借来一架飞机进行侦察后才采取行动的。3月4日，法西斯暴徒攻击锡耶纳市的人民之家，遭到工人群众的沉重打击。该市宪兵司令部得知消息，即派人将罢工区包围。军方又派去200人，用机枪与大炮屠杀罢工者^③。法西斯行动队于3月1日、4月12日和17日、5月2日和6月28日在捣毁卢卡、阿雷佐、普拉托、比萨和格罗塞托的市工会时，也都是在军队与宪兵的支援下进行的。^④

据不完全统计，仅1921年1至6月份，法西斯行动队在意大利全国采取的规模较大的暴力行动就有726起，共破坏、捣毁社会

① 阿·拉布里奥，《两种政治——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那不勒斯1924年版，第181—182页。

② 翁贝托·班凯里，《一位法西斯主义者的备忘录》，佛罗伦萨1922年版，第14页。

③ 焦尔焦·阿尔贝托·基乌尔科，《法西斯革命史》第3卷，第110—113页。

④ 布鲁诺·佛罗里尼，《法西斯行动主义》，佛罗伦萨1933年版，第200页。

党和共产党的支部与俱乐部141个，文化团体100个，劳工联合会119个，各类合作社107个，农民联合会83个，以及其它工人阶级组织176个。^①到1922年的下半年，法西斯行动队基本上已把威尼斯朱利亚区和威尼托区以及除克雷莫纳、帕尔马和罗马尼阿以外的整个波河流域、托斯卡纳区、翁布里亚和普里亚区的社会党市、镇、村政府和社会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全部捣毁。这些地区多数已控制在法西斯手中。

法西斯运动的大发展

在统治阶级扶持与资助下，法西斯运动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已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左右意大利政局的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1920年农村法西斯主义兴起后，法西斯运动把蓖麻油和大棒作为它的主要行动手段，这对长期接受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教育的青年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纷纷参加法西斯组织，热衷于焚烧社会党、工会组织的驻地，向受害者身上浇蓖麻油，发泄不满情绪。有些人参加法西斯组织的目的是要以暴力手段在家乡攫取权力和财富。

1921年法西斯运动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从一个微不足道的运动一跃而为拥有武装的全国第一大党。^②据法西斯党中央组织秘书处和意大利内政部提供的资料，1919年11月大选后，全国的法西斯支部仅存31个，成员不足千人。1920年底，支部88个，成员20615人。1921年3月达到80476人，5月底猛增至187098人。到1922年5月31日，已更名为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的党员人数为

^① 塔斯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夺取政权》，第180—181页。

^② 第二大党是意大利社会党，到1922年5月31日止，共有党员216327人。

322310人。^①

1921年11月7日，国家法西斯党在罗马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法西斯秘书处负责人帕塞拉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党员社会成份的调查报告。帕塞拉调查了151644名法西斯分子的社会成份，其中农民占24.3%；工人占15.4%；学生占13%；地主占12%；职员占9.8%；工商业资本家占12%；自由职业者占6.6%；官吏占4.8%；教员占1.1%；海员占1%^②。总的说来，城乡小资产阶级占50%以上，是它主要的社会基础。有相当一部分地主、资本家和官吏加入法西斯党，占其总数的28.8%强。在被调查者中，退伍军人占87182人，约占被调查总数的57.5%。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和阶层。许多人在入伍前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法西斯运动已扩展成一个全国性的运动。法西斯组织遍布全国各地，特别是农村地区，改变了1919年只限于意大利北部城市的状况。据意大利内政部公布的统计资料，1921年12月31日国家法西斯党共有基层支部1333个，党员218453人。具体分布是：北部，基层支部817个，党员135349人；中部，基层支部266个，党员26846人；南部，基层支部67个，党员42576人；岛屿地区，支部67个，党员13682人^③。

法西斯运动的迅猛发展，以及它对城乡广大地区市政机构的控制，使得墨索里尼等法西斯运动领导人头脑发胀，他们的政治野心急剧膨胀起来。他们开始不安于在统治阶级营垒里仅仅充当一个次要角色。他们跃跃欲试，一心谋求成为意大利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① 参见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1卷，第510、511、607页；第2卷第5、10、11页。

② 参见桑塔莱利，《法西斯主义史》第1卷，第262页；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7页。

③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67页。

第四节 法西斯党夺取全国政权

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1921年11月7日在罗马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意大利法西斯运动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法西斯运动从依靠统治阶级转向夺取全国政权，使它自己成为统治阶级的首要部分，从而改变意大利的政治体制，建立法西斯帝国。

法西斯党的第三个纲领

法西斯罗马代表大会决定把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更名国家法西斯党，以古罗马的“棒束”标志为党徽，选举墨索里尼为党的“领袖”。法西斯党的领导成员有很大变化。发起建立法西斯运动的老领导人，95%以上被排挤出领导集团。新的领导成员中很多是那些两三年前曾把法西斯运动视为颠覆组织，而现在急于要在意大利建立恐怖极权统治的地主、资本家和封建贵族分子^①。

这次大会通过的新纲领表明，国家法西斯党要摒弃传统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要恢复罗马帝国的霸业，建立一个对内实行极权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法西斯政权。纲领强调“恢复民族国家的声誉”，“要热情捍卫和宣传民族的传统、民族的感情和民族的意志”。^②它提出，意大利“要实现自己历史上的和地理上的完全统一”，“行使地中海拉丁文明之堡垒的职能”，“重视地中海和海外的意大利殖民地”。^③

^①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1卷，第505—506页。

^{②③} 见《国家法西斯党纲领》，载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131—137页。

法西斯党的新纲领主张把国家经济纳入有利于垄断资本发展的轨道。它强调国家“要绝对摒弃国有化、社会化、市政化”，“放弃对电报邮政业务的垄断，以便以私人事业补充，甚至代替国营服务”，把“电话和铁路”“交私人企业”经营等等。为了维护这些行业的垄断资本家的利益，纲领还提出，“禁止服务业罢工。”^①

准备夺权的先行步骤

法西斯党的罗马代表大会以后，墨索里尼开始了准备夺取全国政权的实际活动：首先是将法西斯党各级组织全部军事化，实行全党皆兵，作好战斗准备；其次是加紧恐怖活动，大规模夺取地方政权；再次是将矛头直接指向王国政府，制造事端，施加压力，为全面夺权试探反应，并创造条件。国家法西斯党建立当月，党的书记处即下令党的支部与当地的法西斯行动队合并，组成法西斯武装战斗队。明确规定，自1921年12月15日起，法西斯分子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参加战斗队。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解除了与其争夺领导权的对手马尔西克的行动队司令职务，任命巴尔博、德·博诺和德·韦基三人组成法西斯军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法西斯战斗队。总指挥部下设地区指挥部，以下依次为军团、联队、战斗队。组织严密，强调纪律性。规定“法西斯分子只听从法西斯领导机构和法西斯领导人，也即法西斯的领导机构和各省党部主任的命令”，“绝对禁止未经领导人批准擅自采取任何行动”。^②这使墨索里尼得以把法西斯分

^① 见《国家法西斯党纲领》，载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131—137页。

^② 1922年8月2日法西斯党中央致各省法西斯省委的秘密通知，载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168页。

子在全国各地采取的恐怖行动都纳入他直接控制的范围之内。

军事准备基本就绪之后，为试探政府的态度，墨索里尼下令强化恐怖活动，批准采取大规模夺取市和区政权的军事行动。

3月3日，阜姆的法西斯联队奉命向市府大楼发起攻击。临时政府被迫投降，政府首脑扎奈利在交出权力后被逐出阜姆。法西斯分子朱拉蒂就任临时总督。这一事件发生后，新组成的法克塔内阁因无力干预，未置可否。墨索里尼决心继续夺取各级地方政权。

5月份，法西斯全面展开夺权活动。墨索里尼下令占领几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5月12日，5.5万名武装法西斯分子开进费拉拉市和附近地区的乡镇政权。5月30日，法西斯党总书记比昂基指挥埃米利亚全区的法西斯分子占领波洛尼亚市。^①

此后，由于担心军警的干预和各派政治势力的反对，墨索里尼一度暂停夺权活动，以静观各方面反应。在未遭到反对的情况下，7月初重新恢复夺权活动。这次来势凶猛，仅7月12日至18日的7天中，法西斯分子就先后占领社会党控制的克雷莫纳、诺瓦拉、里米尼、塞斯特里波南泰、维泰尔博、安德利亚和拉文纳。夺权活动遍及全国各地，8月3日一度占领米兰市府大楼。

意大利政府对法西斯战斗队接连夺取地方政权的真实意图有所觉察。据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说，“意大利王国首相法克塔早就获悉墨索里尼在准备发动政变，但是内阁始终没能就制止这一事件的发生而应采取的措施取得一致意见”。^②这表明王国政府的虚弱，它无力维护法律和秩序。资产阶级议会制在意大利已难以继。有鉴于此，墨索里尼在罗马代表大会后扬言“在意大利使资本主义繁荣兴旺的最好办法，是抛弃民主制，实行独裁统治，因为这是战胜社会主义和使政府恢复有效的行使权力所不可缺少

^① 格里里，《大资本与天主教右派》，第503—504页。

^② 史密斯，《墨索里尼》，第85和第82页。

的”。^①这是法西斯展开广泛夺权行动的真正目的。

自1922年年中开始，法西斯公开与王国政府相抗衡，宣布要夺取国家政权。6月25日，墨索里尼在一篇文章中宣称，“法西斯起义是不可避免的”，^②随后，他喋喋不休地宣称，“马上要夺取政权”，很快即“向罗马进军”。^③

7月底，劳动同盟决定于8月1日举行总罢工，以抗议法西斯的暴行。法西斯党中央书记处得知这一消息，借机挑衅，制造事端。7月31日，它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期在48小时之内把罢工镇压下去，否则法西斯将采取行动“制止罢工”。通牒威胁说，当国家有能力维护其尊严时，我们就支持国家，但是当它没有这个能力时，按照事物的法则，我们就要替它行事”。^④法西斯党在给各省法西斯领导机构的通知中杀气腾腾地说，“在上述48小时过后，如果罢工还不停止，法西斯分子就要向各自所在的省府发动进攻，并予以占领”。^⑤由于法西斯的破坏，总罢工于8月5日遭到失败。

这件事在表面上看来，法西斯是向政府施加压力，强迫其镇压工人运动。实质上，它是在直接向王国中央政府挑战，投石问路。这次事件使法西斯领导集团感到，向政府继续施加压力不会冒太大风险。它决定把代替政府镇压与奥地利接壤的上阿迪杰出现的亲奥地利的分裂主义倾向，作为向罗马进军的序曲。法西斯行动队分别于10月1日和5日占领博尔扎诺和特伦托，赶走省长与市长，宣布保证上阿迪杰意大利化的措施。罗马政府力不从心，对法西斯的行动无可奈何，只得予以同意和批准。这无形中加快了法西斯夺取国家大权的步伐。

① 史密斯，《墨索里尼》，第85和第82页

②③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312和第313页。

④⑤ 转引自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167页。

秘密进行组阁谈判

法西斯行动队以恢复社会秩序为名，从社会党手中大规模夺取地方政权后，意大利全国的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政府基本失去对局势的控制。这时，自由党内纷争不息，代表地主贵族利益的一派与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一派互不相让。但各派也都无力独自恢复国家秩序，争先恐后地拉拢墨索里尼，指望通过让他入阁，稳定政局，谋求自身的发展。墨索里尼趁机同他们举行秘密接触与会谈，达成了一些秘密交易。^①

墨索里尼先同一直得到民族主义集团和南方地主阶级支持的前首相萨兰德拉就入阁问题举行会晤。萨兰德拉在其《政治回忆录》中提到此事。他说，他希望通过墨索里尼的至交卡皮塔尼侯爵同墨索里尼“达成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的全面协议”。^②墨索里尼初时对他有所许诺，最后由于萨兰德拉未答应墨索里尼出任首相，未做成具体交易。

墨索里尼还同前首相奥兰多进行组阁接触。奥兰多因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而招致全国不满，深知自己难以重新上台。为不使其党内对手得势，他于7月29日向国王提出由墨索里尼组阁，此项建议当即遭到国王的拒绝。

墨索里尼急于要争取的还是前首相尼蒂和乔里蒂。尼蒂是一次大战期间在意大利发展起来的金融资本的代理人。本人就是一个大银行家，是意大利四大银行之一贴现银行的创办人。为了同法西斯党建立联合政府，尼蒂拟订了一个计划，于1922年8月15

① 阿门多拉：《法西斯主义与工人运动》，第4页。

② 转引自保罗·阿拉特里：《法西斯主义起源》，罗马1962年版，第162页和第151页。

日在托斯卡纳同墨索里尼和邓南遮举行过秘密谈判。10月14日，三人达成建立联合内阁的协议。除他们三人外，内阁中还包括菲亚特公司董事长阿涅利和意大利垄断资本组织——工业家联合会主席、皮雷利公司董事长皮雷利。大资产阶级的喉舌——米兰《晚邮报》社长阿尔贝蒂尼事后透露说，“1922年8月，墨索里尼的代表阿尔多·芬奇阁下来到我家，并通知我说，即将发动政变，通过政变解散议会，把大选推迟一、二年，政权交给一个以加里布埃莱·邓南遮为首的、包括墨索里尼和一些有经验的政治家、实业家在内的领导机构。他暗示我说，乔万尼、阿涅利、阿尔贝托·皮雷利和甚至——令人难以置信的——尼蒂均可担任大臣。”^①尼蒂的计划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和法西斯势力的增强未能实现。

墨索里尼重视乔里蒂，是因为在他看来，乔里蒂是唯一可能阻止法西斯上台执政的人。这位自1892年至1921年先后担任五次首相、执政10余年的老政客，在意大利政界颇有影响。他起初坚决反对法西斯分子入阁。1920年曾准备“派遣军队镇压阜姆叛乱。”^②墨索里尼为争取他的支持，一面颂扬他的政绩，一面私下传话，要这位80岁高龄的政客再度出任首相。这一策略确实有效。乔里蒂当即利用其影响极力要把法西斯党拉入内阁。他的态度得到大资本家奥利维蒂^③和皮雷利的支持。^④

法西斯向罗马进军前夕，连王国首相法克塔，内阁中几位影响较大的阁员，以及米兰、佛罗伦萨等大城市的领导人，也都在同法西斯领导集团进行接触，向它提供有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政治意向的情报，以取悦法西斯党。法克塔甚至希望他本人是解

① 阿拉特里，《法西斯主义起源》第162和151页。

② 史密斯，《墨索里尼》，第87页。

③ 奥利维蒂，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秘书长，奥利维蒂公司董事长。

④ 史密斯，《墨索里尼》，第88页。

决政府危机的最大受益者。①

然而，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增强，墨索里尼利用执政党内主要领导人之间的意见不一，要价越来越高。起初他只希望本人进入内阁，其后提出要两人入阁，后来公开要求六个大臣的职位②。10月16日，墨索里尼在米兰举行的法西斯领导人的会议上说：“乔里蒂认为可以给我们两个部，而我们要求的则是六个部，要么就一个也不要”，③24日在那不勒斯法西斯大会上，墨索里尼在讲话中公开要求首相职位，他说，“法西斯主义者不想为几个可怜的大臣职位而放弃我们那令人敬畏的理想的长子权，不想从奴隶的门走向权力。④

墨索里尼态度如此强硬，并不是因为法西斯力量已真正强大到足以用武力推翻政权。实际情况正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焦尔焦·阿门多拉所说，当时“只要军队干预，进军罗马的法西斯队伍便可轻而易举地被瓦解。因为他们不仅武器的质量差，而且缺乏装备与给养。”⑤许多事实证明，墨索里尼并非依靠法西斯党的强大执政，而是被统治集团通过秘密交易推上台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第一届墨索里尼内阁的经济副大臣罗科透露，10月26日和27日他见到前首相萨兰德拉和奥兰多时，他们都对他说，他们“要采取一切办法支持墨索里尼政府上台。”据罗科得到的可靠消息，法克塔内阁中的三分之一阁员持同样态度。⑥

①⑤ 阿门多拉：《法西斯主义与工人运动》，第4页。

② 墨索里尼要求得到的六个部是：外交部、国防部、海军部、劳工部、公共工程部和航空局。

③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170页。

④ 参见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171—173页。

⑥ 罗科：《阿尔弗雷多·罗科政治论文及演说集》第2卷，第744页。

向罗马进军

1922年10月16日，墨索里尼召集法西斯领导集团在米兰举行会议，并约请邓南遮参加。会议专门讨论向罗马进军的问题。据法西斯巨头巴尔博当时所作记录，与会者首先听取墨索里尼对国民军和议会情况的分析。他提名巴尔博、德·博诺、德·韦基和比昂基组成“向罗马进军”的“四人领导小组”，亦即通常所说的“法西斯四巨头”。墨索里尼并提出，法西斯领导机构立即停止工作，由四人领导小组行使领导权。在谈到向罗马进军期间各地如何配合时，墨索里尼指出，皮埃蒙特地区主要攻击都灵，伦巴第区攻击米兰，皮亚琴察至里米尼一带攻击的重点是帕尔马。要在安科纳、奥尔特和契维塔韦基亚三地组建三个法西斯军团，分别由法拉、博诺和切凯里尼指挥。由于事前得知与会者多数人不同意立即采取行动，墨索里尼先发制人地指出，“我相信，大家会就各项问题取得一致。不过，我可事先告诉诸位，即便不能达成一致，我也要发动进攻”。

尽管如此，与会者仍对“进军”的适宜性表示了怀疑。韦基“要求把进军的时间再推迟40天”，因为“法西斯军事机构正在进行调整，力量较弱，运转速度慢”。博诺也同意推迟。他说，他正在做争取军队的工作，“假如能再有一段时间就可以做好这次工作”。他强调，“进军”的“领导机构尚未健全”。法拉也支持“韦基的再等一等的意见”，他说，他不了解手下指挥官的情况。巴尔博则表示对“进军”的“后勤保障感到担心”。

墨索里尼不顾大家的反对，强迫与会者通过向罗马进军的决议。他已掌握各派政治势力和权势人物的态度，担心夜长梦多失去组阁的机会。

10月20日和21日，法西斯四人领导小组在佛罗伦萨举行了两

次会议，拟定一个向罗马进军的五点计划，^①

(1) 进行总动员以占领全国各大城市的公共建筑物；

(2) 法西斯分子在桑塔·马里奈拉、佩鲁贾、蒂沃里、蒙泰罗东多和沃尔图诺集中待发；

(3) 向法克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其交出国家的全部权力；

(4) 进驻罗马，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各部，如果失败，法西斯民兵撤向意大利中部地区，因为中部的翁布里亚地区拥有强大的后备力量；

(5) 在中部的某个城市建立法西斯政府，迅速调集帕达纳地区的法西斯分子，重新向罗马发起进攻，直至取得胜利，占领罗马为止。

10月27日，总部设在佩鲁贾的法西斯四人领导小组发布向罗马进军的布告，^②命令法西斯行动队自“即日起全体动员”“向罗马发起强烈攻击”。布告呼吁军队不要干预法西斯的“进军”，申明法西斯进军的目的“只是要赋予国家一种纪律，给发展国家经济、增加国家福利的各种力量以支持”。

27日夜间，由3万名法西斯行动队员组成的“进军”队伍分三路向罗马进发。许多人根本没有武器。队伍松松垮垮，倒像是一伙败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在墨索里尼受命组阁前，他们并未能接近罗马。只是在10月31日，也即国王委任墨索里尼组成新政府的第二天，罗马军区司令普里埃塞将军接到准许他们向罗马开进的命令之后，这些队伍才到达罗马。

在大队人马开往罗马同时，各地法西斯分子一哄而起，占领各自所在省市的公共建筑物。许多地方的行政长官主动把权力交

^① 巴尔博记录和佛罗伦萨会议制订的“进军”计划分别载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170和171页。

^② 《法西斯四人领导小组布告》(1922年10月27日)，载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173—174页。

给法西斯行动队。①自由党和人民党等党派的一些地方组织纷纷致电罗马，要求它们的中央领导机构“不失时机地帮助墨索里尼组成政府和同意参加这个政府”。②

消息震动京城。法克塔于28日凌晨五时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大臣们“一致同意法克塔建议国王动用军队”。普里埃塞将军向大臣们保证，他“将在几个小时内粉碎这次威胁性的叛乱”。③他命令罗马地区的2.8万国民军进入戒备状态。

国王维托利奥·埃马努埃莱三世起初同意实行戒严，“批准动用军队实施军事管制”。④国王还授权萨兰德拉接替法克塔组阁。消息传出，许多法西斯分子，其中包括一些法西斯高级领导人纷纷宣布效忠国王。在米兰的墨索里尼得知这些消息，十分惊慌，准备逃往瑞士。⑤

墨索里尼受命组阁

正在此时，形势急转直下。法西斯四人领导小组发出进军布告当天，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秘书长奥利维蒂专程前往米兰会见墨索里尼。此后，米兰的大工业集团、金融集团和贵族集团决定让萨兰德拉放弃组阁。⑥它们认为，“组成墨索里尼政府是解决使国家处于瘫痪状况的唯一办法，也是结束暴力和法西斯非法活动的一种手段”。⑦王室中颇具影响的人物，达奥斯塔公爵、德·卡斯塔尼侯爵和贡扎加亲王等均持此种态度。尤其是达奥斯塔公爵

① 桑塔莱利，《法西斯主义史》第1卷，第318页。

② 阿门多拉，《法西斯主义与工人运动》，第4页。

③④ 史密斯，《墨索里尼》，第91—92页。

⑤ 阿门多拉，《法西斯主义与工人运动》，第5页。

⑥ 桑塔莱利，《法西斯主义史》第1卷，第320页。

⑦ 阿门多拉，《法西斯主义与工人运动》，第3页。

公开表示，如果国王反对法西斯上台，他将采取行动 谋取王位。^①

由于上述压力，国王埃马努埃莱三世没有签署戒严令。他于10月29日决定授权墨索里尼组成新政府。29日下午，国王首席副官齐塔迪尼将军奉命给墨索里尼打电话，要他立即去罗马组阁。墨索里尼要求把电话内容用电报方式通知他。在他的一再坚持下，齐塔迪尼发去下述电报：

“米兰 墨索里尼阁下：

国王陛下请您立即前来罗马，因为他想要任命您组成内阁。

顺致

敬礼

齐塔迪尼将军(签名)”^②

墨索里尼于当晚乘火车从米兰前往罗马。30日上午，他按常规礼仪进宫谒见国王。唯一与传统宫廷礼节不同的一点是，他身着黑衫，而不是穿长礼服，戴礼帽。他在见到国王时说：“请陛下宽恕我不得不穿着黑衫来见您，因为我刚刚参加了一场迫不得已进行的，幸好是没流血的战斗。我给陛下带来了维托里奥·威尼托的意大利，^③带来了无往而不胜的意大利。我是陛下忠实的奴仆”。^④

10月3日，墨索里尼组成政府。他深知，法西斯立足未稳，在议会中仅有35个席位，力量很弱。为了笼络人心，让各阶层和党派都能接受他的政府，他在同日发布的关于法西斯分子解除动员的命令中宣布，法西斯“不求绝对优势”，“为了全国的和平，也

① 阿拉特里：《法西斯主义起源》，第85页。

② 墨索里尼：《我的生平》，第138页。

③ 维托里奥·威尼托(Vittorio Veneto)系地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军于1917年10月24日在卡波雷托(Caporetto)遭到出人意料的惨败。意大利人感到蒙受奇耻大辱。1918年10月，意军在维托里奥·威尼托击败奥地利，结束战争。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报》上撰文鼓吹维托里奥·威尼托战役的胜利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④ 乌博尔迪：《佩尔蒂尼公民——全体意大利人的总统》，第39页。

吸收其他党派有志于民族事业的人士”参加政府。^①这说明，墨索里尼当时“也不打算马上组成清一色的法西斯内阁”，而是“建立议会制合作内阁”。^②

墨索里尼内阁共14人，其中包括右翼自由党(2人)、民主党(2人)、人民党(2人)、民族主义协会(1人)、社会民主党(1人)和将军(2人)。^③他甚至还曾邀请社会党领导人博齐和巴尔代西参加内阁，^④因资产阶级反对作罢。在内阁中，法西斯分子占4人，像法西斯四巨头那样的人物一个也未在政府中任职。

墨索里尼政府组成当天，进军罗马的法西斯分子来到王宫前的人民广场，接受墨索里尼和国王的检阅。法西斯党终于上台执政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严格说来，这次组成的是一个过渡性的政府。它还没有实行政治体制的根本改变，还不是建立在极权制基础上的全面的法西斯独裁政权。如上所述，法西斯党这一胜利并不是仅仅依靠它自身的力量，依靠它可能向罗马进军的暴力行动而赢得的。在面临发生内战的决定性时刻，是包括垄断资本、王室贵族、地主阶级在内的统治阶级中的权势人物以及意大利军队，支持了法西斯党，愿意同法西斯党结成联盟，是他们对法西斯党作出让步和妥协，承认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党将在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权中处于显要地位，才出现由国王授权墨索里尼组阁的戏剧性转变。但在此刻，法西斯党在政权中还没有真正取得压倒一切的地位，墨索里尼不得不暂时组成一个“议会制合作内阁”。在意大利，完全确立法西斯的极权统治还要经历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

①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178页。

② 陶里亚蒂：《法西斯主义的教训》，第29页。

③ 墨索里尼：《我的生平》，第143页。

④ 陶里亚蒂：《法西斯主义的教训》，第29页。

第二章

意大利法西斯极权统治的确立

墨索里尼执政初期，国家法西斯党在内阁尚未牢固确立优势地位，法西斯政权尚未取得统治阶级各个权势集团以及各阶层的充分信任和广泛支持。这个政权正处于在议会制躯壳下孕育法西斯极权统治的过渡时期。它的面貌暂时显现一种“企图建立非极权的法西斯政权”^①的状态。摆在墨索里尼面前的迫切问题，就是迅速稳定局势，巩固政权，尽快结束过渡状态，推进并建立法西斯极权统治。为此，他采取各种手段强化对国家的控制。当遭到议会和各阶层人民的抵制和反抗时，他一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马泰奥蒂事件，随即在意大利确立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极权制的政权。

第一节 巩固刚建立的法西斯政权

墨索里尼很清楚，他之所以能够执政并非仅仅由于向罗马进

^① 陶里亚蒂：《法西斯主义的教训》，第22页。

军，更重要的是在幕前幕后与统治阶级上层权势人物进行一系列交易的结果。他还不能依靠法西斯党自身的力量来统治这个国家。特别是社会党还控制着全国四分之一的市镇政权，社会党和得到农民支持的人民党在议会中占据着43.2%的议席。^①这对法西斯政权构成巨大的威胁。墨索里尼立即采取各种办法增强法西斯党的实力，改变议会内外的力量对比，巩固自己的地位。

争取统治阶级的全面支持

墨索里尼巩固法西斯政权的首要环节，就是与以垄断资产阶级和封建王室为主体的统治阶级各种权势集团确立密切合作关系。他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表白法西斯党的友善态度，迎合他们的要求，以求赢得各种权势集团的信任，争取他们的全面支持。墨索里尼首先注意到改善同垄断资产阶级的关系。

在取得政权前，法西斯党同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的联系很少。大资本家虽然对法西斯分子破坏工人阶级组织、残害社会党领导人的暴行表示赞赏，但对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的“社会主义”纲领和墨索里尼本人仍然存有戒心。从总体上说，在向罗马进军前，垄断资产阶级未曾给予法西斯党有份量的支持，更没有把墨索里尼作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

法西斯政权建立后，双方都希望了解对方的态度。尤其是墨索里尼，急于寻找强有力的支持者。1922年11月1日，由他主持的首次内阁会议，把统治阶级极为关心的新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殖民地问题作为中心议题。会议决定，“把公用事业重新交给私人企业”，取消对工业的一切控制，^②并宣布“不得把股票记名法强加给

①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100页。

② 陶里亚蒂：《葛兰西》，第102页。

持票人”^①等等。

消息传出，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于11月3日公开发表声明“对(法西斯)新政府表示热烈欢迎”。^②11月6日，十几位意大利实业界的头面人物前往首相府会见墨索里尼，当面向他表示祝贺与支持。墨索里尼同他们进行长时间交谈，并一起照了像。

有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墨索里尼于11月16日在众议院强迫议会批准给予他为期一年的紧急情况处置权，以实行必要的法律改革。经过辩论，除共产党和社会党议员外，其他党派的议员均投票赞成给予他这一权力。当这个议案拿到由391名议员组成的参议院讨论时，绝大多数参议员认为，是墨索里尼“把意大利从社会主义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③，因而赞成授予他“全权”，只有26人投票反对。

墨索里尼在参众两院取得紧急情况处置权后，于1922年底和1923年初先后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垄断资本的重大经济措施。

1922年底，政府宣布开始“新经济进程”，要求“大力压缩政府的经费开支，使大量资金得以用于工业投资”。它取消战争期间和战后历届政府对大工业的一切约束，其中包括：解散修改战时公约委员会，废除股票记名法和降低直接税等等。财政部宣布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对经济方面处于困境的大公司，政府将施行“急救”手术，并立即给予濒临破产的两大垄断集团——伊尔瓦(ILVa)和昂萨尔多公司——以大笔贷款，帮助它们恢复在冶金工业领域的投资。二是国家宣布里拉贬值，以增加商品的出口额。这项措施对各大公司尤其是对电力、化工、机械和人造纤维公司

①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769页。

② 丹尼斯·麦克·史密斯：《1861—1969年意大利史》，巴里1972年版，第559页

③ 史密斯：《墨索里尼》，第100页。

极为有利。^①

1923年初，法西斯政府宣布取消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获利润征收的特别税；取消省市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征收的附加税；取消对租金的限制；废除遗产税。4月底以前，还先后宣布把电话业由国营交给私人资本经营，取消国家对人身保险业的垄断，并废除《累进税法》。仅最后一项，每年可使垄断资本增加利润2亿多里拉。

法西斯政府以各种名目和方式向大资本家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摆脱战后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由国家拿出40亿里拉巨资向石油公司投资或购买其股票。为使昂萨尔多公司和意大利贴现银行免于破产，国家出资与其合资建立安萨尔多·科涅公司。法西斯政府还专门创建一所国家信贷银行，实施这方面的“急救”手术，用于股份投资的资金约为20亿里拉。^②

不言而喻，法西斯政权的这些举动增加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它的信任感。墨索里尼本人与大资本家的交往日趋密切，后者成为法西斯政权的靠山。马泰奥蒂危机时期，他们帮助它摆脱了覆灭的命运。

墨索里尼同时致力于改善与意大利王室及其追随者高级将领和其他封建势力的关系。

以往墨索里尼曾以反对君主制而著称。在为向罗马进军进行准备期间，他派遣德·博诺等人四处游说，在现役与退役军官中寻求支持。1922年8月中旬，德·博诺向他报告说，不仅王国高级将领，即使退伍军人协会的头头也都表示忠于国王。这种情况使墨索里尼感到不安。他深知，只要军队干预，法西斯就无成功之可能。于是，他一反常态于8月24日发表文章，第一次公开表

^① 法比奥·莱维，翁贝托·莱夫拉和尼古拉·特兰法利亚，《意大利史》，第3卷，佛罗伦萨1978年版，第1429页。

^② 莱维等著，《意大利史》第3卷，第1429页。

示，“法西斯主义不反对君主制”。此后，他连续发表安抚王室与军队的演说和文章。9月20日，他在乌迪内的讲话中再次表示，法西斯不反对萨伏依王朝。10月14日，他在《意大利人民报》上撰文，保证“法西斯分子不同军队打仗”。^①10月24日，在那不勒斯举行的有4万人参加的法西斯群众大会上，他说，“意大利生活的统一要坚决依靠萨伏依王朝”。^②

墨索里尼受命组阁后，他首先邀请国王的心腹，在军队中声望颇高的阿尔芒多·迪亚兹元帅和保罗·托恩·德雷维尔海军上将分别担任战争大臣和海军大臣的要职。二人开始拒绝接受。直至墨索里尼保证他们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将拥有充分权力之后，他们才接受上述职务。这就等于法西斯政权得到了军队的首肯和支持。墨索里尼于10月31日以法西斯最高指挥部的名义发布公告，郑重宣布“法西斯分子与军队以对国家和国王的热爱组成一支统一的军队”。^③

为向国王表示感激和效忠，墨索里尼刚上台组阁就对封建势力采取趋奉政策。内阁的首次会议着重讨论了王室极其关心的殖民地问题。会议决定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采取进一步更加强有力的行动”，^④镇压利比亚人民的抗意革命运动。内阁会议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封建残余势力的措施。1923年1月7日，宣布取消对地租的限制。1月11日，下令废除占领荒地合法化的法令，停止实施《农业改革法》。政府还颁布了土地所有者按净收成10%纳税，直接自耕农按毛收成10%纳税的法令，以及保证地主有自由取消农业契约的法令。^⑤所有这一切，在王室和地主阶级看来，都有利于巩固萨伏依王朝的统治，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国王把墨索里尼视为王权的恢复者与捍卫者，增加了对它的信任，

①②③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313页，第172和第177页。

④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769页。

⑤ 陶里亚蒂：《葛兰西》，第102页。

授予他为期一年的独裁权，以恢复国家秩序。

法西斯主义与封建势力结合，是法西斯政权得到巩固和墨索里尼得以在意大利确立独裁统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墨索里尼急于争取的另一股势力就是罗马教廷。

墨索里尼不仅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曾经是个坚决的反教权主义者。1908年，他在奥内利亚任中学法语教员时，校方要求该校全体师生都必须在床头悬挂圣母像，早晚两次祈祷，饭前饭后在胸前划“十”字。不管是教员还是学生，违者一律逐出学校。墨索里尼拒不遵守校方规定，丢掉了饭碗。他在这一年3月8日致意大利社会党最高纲领派领导人塞拉蒂的信中详细谈及此事。他说，他宁肯被解雇，也不放弃自己的理想。^①直至向罗马进军前，墨索里尼没有放弃其反教权的立场。因此，法西斯政权建立后，罗马教廷对它采取了强硬态度。

如果说在夺取政权时还可以暂时不考虑教廷的态度，那么，在巩固法西斯政权时，就不能缺少这个与意大利封建地主阶级融为一体的庞大的宗教势力的支持。据1921年的统计资料，在意大利，95%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全国仅神甫就有近11万。教皇是人们崇拜的偶像。教皇支持谁，谁便能成功，否则就要失败。1919年1月，在教皇授意与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意大利人民党，当年就在众议员选举中获得100个议席。这也使墨索里尼感到，法西斯政权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得到教廷的认可与支持。

墨索里尼为表明其放弃反教权立场，于1922年11月12日写信给法西斯国库大臣、天主教徒塔格拉，指示他说，“由于上层以及经济、民族和国际方面的原因，你要竭尽全力帮助（教皇的）罗马银行”。^②尽管如此，教皇庇护十一世仍在其12月23日发布的教宗通谕中暗示要对法西斯政府采取严厉态度。墨索里尼急于缓和

①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1卷，第668页。

②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496页。

并改善与教廷的关系，他于1923年1月18日接见了以科隆博为首的意大利天主教行动会代表团。他接受他们的要求，即法西斯政府同意在学校恢复宗教教育课和休假瞻礼日制度；保证采取有力措施取缔各种形式的赌博；给予宗教团体及神职人员以有效保护，使其免遭暴力侵害。^① 1月19日，墨索里尼在参议员圣图奇的家中同梵蒂冈国务卿加斯帕里红衣主教举行了秘密会晤。两人首先就教廷极为关心的罗马银行面临破产问题进行了谈判，达成了法西斯予以支持的协议。接着，双方讨论了罗马问题，^② 同意就此问题继续进行接触。

在这之后，许多事情说明，梵蒂冈改变了对法西斯政权的态度。

其一是，6月29日，30名天主教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新秩序”，理由是“法西斯主义公开承认和尊重作为各健康政治集团之基础的宗教与社会准则。而且它主张反对过时的民主与宗派意识。它的纪律原则和在国内的等级制度原则与一向为教会所维护的宗教和社会学说是一致的”；^③

其二是，为讨好墨索里尼，教廷施加压力，强迫对法西斯政府持强硬态度的意大利人民党总书记斯图尔佐于7月10日辞职；

其三是，梵蒂冈国务卿加斯帕里10月2日写信给意大利天主教行动会会长，再三强调，该组织不得进行政治活动。这等于是命令意大利全体教徒对法西斯政权要俯首帖耳，不得采取反抗行动。

19天后，即10月21日，庇护十一世接见青年教徒时说，“由于人权得到了尊重，所以你们应当自觉地去履行你们不仅是作为公民，而且也是作为忠实地遵守上帝法规的天主教徒应履行的义务”。^④ 教皇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公开表示支持法西斯政权。

①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185页。

② 罗马原为教皇占领。1870年，萨伏依王朝将罗马并入意大利王国，教皇的世俗权力被剥夺，被迫退居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从此遗留一个罗马问题。

③④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185、194页。

加强对党政大权和法西斯武装的控制

墨索里尼要巩固法西斯政权，关键在于巩固他自身在法西斯党内的领导地位，削弱他的可能对手的权力。他极力设法从组织上控制法西斯党和内阁，并直接指挥法西斯军事组织。

墨索里尼执政第二天，即10月31日，为使所有的人，特别是议员们看到，他能够控制法西斯战斗队，而且只有他能够在意大利恢复往日的平静与秩序，连续下了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宣布法西斯行动队立即“解除动员”，命令进军罗马的战斗队队员返回原地或遣散回家，“恢复昔日的工作”，因为“意大利现在需要的是人人安居乐业，创造更多的财富”。第二道命令，宣布解散法西斯四人领导小组，命令他们“把权力交还党的领导机构”。显然，这两道命令的目的就是要剥夺法西斯党内可能与其争权者的军事领导权。

墨索里尼深深懂得，控制一支武装就等于牢固地控制着政权；也深知其他党派武装的存在对法西斯政权的危险性。他采取了解散国民军以外的所有武装、建立法西斯民兵的双管齐下策略。

1923年1月5日，他逼迫内阁同意解散包括法西斯战斗队在内的所有党派武装，借以取缔社会党的赤卫军和民族主义协会的蓝衫队，削弱他在党内对手的实力，还解散了由4万人组成的皇家卫队。

1月14日，他向国王提出，建立国家安全志愿民兵（*Milizia Volontaria per la Sicurezza Nazionale*，简称为MVSN），经过短期训练，担负专门的防御任务。墨索里尼在向国王申述组建这支武装的理由时说，“危险尚未消除，必须捍卫黑衫队的胜利，因此我决定建立国家安全志愿民兵”。^①实际上，其目的在于把法

^① 墨索里尼，《我的生平》，第151页。

西斯战斗队改编成由他亲自控制的“御林军”。他逼迫国王批准，既可避免这一举动引起非议，又可给这支武装以合法地位，由国家供养。国王内心并不同意，鉴于各种反动势力对墨索里尼的支持，只得亲手将一把直接对准自己的刀交给墨索里尼，批准他建立这支武装。

国家安全志愿民兵建立后，不是为了维护法制和秩序，主要是作为墨索里尼用来控制法西斯党和对付反对派而进行恫吓与暗杀的工具。墨索里尼1928年曾对美国驻罗马大使说，他把法西斯战斗队改编成国家安全志愿民兵，“不仅使法西斯政权具有威力，而且也使它掌握着一支庞大的后备力量”。^①

1923年1月11日，墨索里尼设立一个“超越和凌驾于原有政治机构之上”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法西斯大委员会”，他自任主席。“这个特殊的政治实体”^②由29人组成，其成员包括：法西斯党领导机构成员，准备派往各大行政区或准备任命其担任专门任务的法西斯主义政治委员，法西斯大臣、副大臣、警察总监，铁路专员，首相府新闻办公室主任以及法西斯工会领导人，法西斯合作运动和法西斯民兵领导人。委员由墨索里尼选定任命。所有委员都是他的亲信。那些在他看来有不轨之嫌或是在党内能与其分庭抗礼者均被排除在第一届法西斯大委员会之外。

关于法西斯大委员会的任务，墨索里尼在1928年的一次答记者问时说，“它所肩负的困难而微妙的任务是把法西斯革命的各项工 作变成合法的行动，审查(内阁)将向议会提出的各项法案和报告，监督政府的活动”。^③墨索里尼称之为“法西斯主义工具”^④的这个特殊政治实体的主要任务，是破坏老的立宪体制，建立新的法西斯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难怪他说，建立这个机构是他掌权后的“主要目标之一”。^⑤

①② 墨索里尼，《我的生平》，第151页。

③④⑤ 墨索里尼，《我的生平》，第151页和第153页。

兼并民族主义协会

墨索里尼有一桩隐忧，对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很不放心。他在获得向罗马进军取胜消息的当晚，连续两次派人给邓南遮送信。当政仅一个多月，他就同民族主义协会领导人谈判解散其武装。墨索里尼把能否控制民族主义协会看成是法西斯政权巩固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下决心要把民族主义协会并入法西斯党。

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是1910年12月正式成立的。其成员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保皇派、军国主义分子和深受民族沙文主义毒害的人。从191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就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反民主的和殖民扩张的性质。意大利1911年侵占利比亚，1915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对1919年凡尔赛和会的不满，使得民族主义情绪在全国，尤其是在青年学生、退伍军人和知识分子当中更加激昂。民族主义协会领导人科拉迪尼和费德尔佐尼等人利用这些机会使民族主义势力得到空前发展。

民族主义协会还趁法西斯准备向罗马进军引起的政局混乱，在封建残余势力较为强大的南方广大地区积极扩展自己的力量。南方各省成为民族主义协会牢固控制的地区。它极力主张用武力去夺取1915年伦敦条约所许诺的全部领土。法西斯政权建立后，它还积极准备于1922年11月在达尔马提亚发动政变，实现扩张野心。^①民族主义协会领导人的向外扩张和维护君主制的主张深深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民族主义协会又有当时在意大利各阶层中颇有号召力的邓南遮的支持。这些都使墨索里尼深为不满。

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 1863-1936)，意大利诗人，散文家，狂热宣扬民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推

^①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502页。

动意大利参战，他穿梭往返于意大利各大城市，时而发表鼓吹参战的演说，时而组织青年民族主义分子游行示威，要求参战。1915年5月意大利对奥宣战，邓南遮投笔从戎。1919年6月，因对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软弱表现不满，解甲从政。8月30日，他表示，决心把阜姆纳入意大利的版图。9月11日率领由1200名军人和民族主义协会会员组成的义勇军成功地发动了名为向隆基进军(隆基为地名)的政变。次日，他宣布阜姆城并入意大利。这一行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再次掀起一股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9月12日，邓南遮与参加占领阜姆的墨索里尼讨论并初步拟定了联合向罗马进军的计划。^①

阜姆事件后，邓南遮名噪一时，追随者剧增。1922年8月至10月，统治阶级曾两度提出委任邓南遮组阁。后因法西斯党发动向罗马进军，改任墨索里尼为首相。法西斯政权建立后，墨索里尼一再向邓南遮作出姿态，邓南遮既不表示支持，也未表示反对。墨索里尼因而担心邓南遮会再次联合民族主义协会把他赶下台。

在上述情况下，解决与民族主义协会的关系成为墨索里尼的当务之急。他采取两项怀柔措施，一是邀请民族主义协会领导人费德尔佐尼、罗科和西齐里亚尼等人在第一届墨索里尼内阁中担任大臣或副大臣的职务；二是向他们表示他支持民族主义协会的维护君主制的主张。两党在大多数问题上的观点与立场实际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关于君主制的问题。当墨索里尼表示放弃其反君主制的立场后，民族主义协会即表示愿意就改善关系举行谈判。

1922年11月29日，两党派出代表就改善关系进行初步接触。

^① 彼德罗·费代莱，《UTET大百科全书》(Pietro Fedele, Grande Dizionario Enciclopedico UTET)，都灵1970年版，《邓南遮》辞条。

会谈后发表的声明说，为了粉碎“对手”在法西斯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支“民族力量之间制造对立”的阴谋企图，双方就共同参与的问题交换了情报和进行了磋商。^① 由于民族主义协会的代表在会谈中要求法西斯党对君主制公开表态，以及两党建立联合会，遭到法西斯党拒绝，谈判中断。

12月下旬，有关国王将批准解散各党派武装和建立国家安全志愿民兵的消息传出，费德尔佐尼等人认为，民族主义协会失去蓝衫队就等于失去了支柱。费德尔佐尼于12月24日写信给墨索里尼，表明民族主义协会对他的忠诚，并提出了两党实现合并的适宜性。^②

1923年元旦，墨索里尼接见了民族主义协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双方就合并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见后没过多久，墨索里尼即宣布，法西斯大委员会将举行会议，讨论和解决与民族主义协会的关系问题。同时，墨索里尼命令法西斯各地区委员会，要他们坚决避免那些由于言行不慎引起局势恶化的事件发生。

法西斯大委员会于1月13日举行会议，通过墨索里尼确定的参加两党混合委员会的名单和法西斯“真诚赞同”君主制的动议。

同日，以科拉迪尼为首的民族主义协会代表和法西斯党代表组成的混合委员会开始工作。双方通过初步声明，明确承认“法西斯主义是战后最重要的民族力量”，说战后的“革命”是“地道的法西斯主义性质”。^③ 法西斯代表为彻底消除民族主义协会的危险，坚决要求在南方各省对民族主义协会的力量进行全面调查。谈判再度搁浅。

法西斯大委员会为不使谈判完全中断，于2月中旬表示，法西斯党对民族主义协会的某些要求可予以考虑。随后，谈判重新

①②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503—504页。

③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505页。

恢复。在第一次混合委员会会议期间，科拉迪尼提出，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应作为研究民族主义学说和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的机构予以保留，并且要求获得三分之一法西斯党领导职位和三分之一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应由民族主义协会的领导人担任。这些要求均遭墨索里尼断然拒绝。当时民族主义协会的蓝衫队已宣布解散，科拉迪尼和费德尔佐尼不得不同意与法西斯党合并。2月26日，双方代表签署两党合并的协议。自此，民族主义协会会员集体加入法西斯党。这是墨索里尼一个重大胜利，对法西斯政权的巩固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扫除实现极权统治的主要障碍

向罗马进军后，墨索里尼仅用了半年时间，通过上述步骤使法西斯党同其他政党的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于是，他企图以强硬手段兼并其他政党，强迫议会通过新选举法，取得议会多数，走向极权独裁统治。

墨索里尼选择的第一目标是天主教的意大利人民党。他打算先瓦解这个党，将该党的大部分成员吸收到法西斯党里。^①他的这个阴谋被意大利人民党左派识破。1923年元旦，他们在其机关报《意大利的明天》创刊号上发表新年献词，建议人民党召开一次新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政局和结束与法西斯主义合作的问题。

同年4月12日，意大利人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都灵举行。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包括：

- (1) 重申意大利人民党的纲领和该党的独立自主性。
- (2) 同意参加墨索里尼政府，但对它应持批评的支持态度。
- (3) 努力捍卫比例选举制，提醒全党在大选中要保持人民党

^①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488页。

的完全自主性，坚决不与其他政党合作，也决不进行妥协。^①

这项决议给了墨索里尼当头一棒。在他看来，这不仅使他兼并其他政党的计划落空，而且有可能使他修改选举法的打算夭折。他自1923年3月开始，指使法西斯民兵在全国各地破坏人民党的机构，残害其领导人。在内阁中，他力图通过人民党阁员向该党领导施加压力，迫使其做出让步。墨索里尼的图谋未能得逞，将人民党于4月23日排挤出内阁。^②

墨索里尼仍然认为，实行恐怖统治是巩固政权的最有效手段。他的办法是借故逮捕政治上的反对派。他于1923年1月开始把屠刀指向意大利共产党。在短短的几周内，以“阴谋反对国家”罪逮捕共产党总书记博尔迪加和几乎所有的中央委员。此外，还逮捕72名地方党委书记和41名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的书记。据法西斯政府的消息说，1至4月份有2000名共产党员被捕，而实际上是5000名。^③另外，通过法西斯民兵进行恫吓和暗杀，迫使各反对党屈服。他鼓励这伙亡命徒在全国范围内肆无忌惮地进行暗杀，袭击反对党领导人，破坏、烧毁反对派的机构。连他暂时仍需要其支持的自由党也未能幸免。甚至前首相尼蒂在罗马的别墅也遭到袭击，门窗被砸，家俱与灯具被毁。尼蒂本人在场也无可奈何。^④法西斯执政后的头12个月内，报纸平均每天报导5起暴力事件，有不少左派政治家被杀。^⑤各党对此忍无可忍，包括自由党在内，纷纷向墨索里尼提出强烈抗议。墨索里尼不是置若罔闻，就是敷衍了事。通常是他在公开场合表示将制止这类事件发生，私下却说他“感到难过的是，行动队没有杀更多的人”。^⑥反对派束手无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行动打击法西斯的嚣张气

①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487页。

②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190页和第191页。

③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190页和第191页。

④⑤ 史密斯，《墨索里尼》，第108页和第106页。

焰。

墨索里尼利用反对派的软弱，于1923年7月15日、16日强迫议会通过新闻法和新选举法。新闻法规定，全国所有报纸都要受到政府严密监视，违者予以查封。这实际上是墨索里尼要在意大利实行法西斯极权独裁统治的新信号。新选举法规定，凡某一党所得选票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便可在议会中占有三分之二的议席，可以垄断议会，组织内阁；其余三分之一的议席，由其他各党依照比例代表制原则进行分配。这个法案预先保证了法西斯党得以确立对议会的全面控制，是向着极权统治又跨进一大步。

墨索里尼认为，有了这两项立法，他便可以放手大干一场了。

第二节 马泰奥蒂危机

1924年4月，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在全国大选中依靠恐怖手段和舞弊行为，获得众议院的绝对多数议席。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众议员马泰奥蒂挺身而出，严厉谴责法西斯党在选举中的种种暴行。墨索里尼立即指使法西斯特别行动队于1924年6月10日将其杀害。这一罪恶行径遭到全国各阶级、阶层，甚至众多法西斯分子的反对。意大利民主派的大约150名议员，自称“阿文廷派”，集体退出议会，企图迫使国王解除墨索里尼的首相职务。墨索里尼一时陷入严重困境。这一事件，历时半年多，史称“马泰奥蒂危机”。由于阿文廷派行动迟疑不决，内部争论不休，失去有利时机。结果墨索里尼不仅没有下台，反而提前在意大利全面确立了法西斯的极权独裁统治。

装扮门面的举动

法西斯党上台执政后，墨索里尼致力于组成新国家机构，稳定社会环境；采取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加速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初，他极力避免资产阶级激怒工人阶级。陶里亚蒂指出，在当时，只要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挑衅，工人运动就会重新掀起高潮。新建的法西斯政权就有被推翻的可能。^①也许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墨索里尼采取各种办法避免激化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意大利自1922年底至1924年初处于一个相对稳定时期，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工人罢工大大减少。1922年全国举行罢工的次数从1921年的1134次减至552次，参加者从72.4万人次减少到43万人次。到1923年，罢工仅200次，参加者66102人次。^②法西斯政权建立之前的罢工主要是政治性的罢工，而1923年的罢工多为要求增加工资的一般性罢工。

局势稳定对于巩固法西斯政权极为重要。它确保了意大利工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以工业增长率为例，1922年至1925年，平均每年增长6.4%，其中制造业1925年比1922年增长了53.7%。一向被视为政局稳定晴雨计的投资额，从1922年的39亿里拉增加到1925年的113亿里拉，增加幅度高达289.74%。^③财政状况亦有很大改善。1921—1922财政年度，国民收入为154.44亿里拉，支出336.12亿里拉，赤字181.68亿里拉；1923—1924财政年度，收入172.65亿里拉，支出192.64亿里拉，赤字减少到19.89亿里拉；1925—1926财政年度，收入增加到202.01亿里拉，支出为

^① 陶里亚蒂，《法西斯主义的教训》，第31页。

^② 塔斯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夺取政权》，第131页；坎代洛罗，《意大利现代史》第3卷，第54页。

^③ 莱维主编，《意大利史》第3卷，第1430页。

201.07亿里拉。意大利的国家财政收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首次有了9400万里拉的盈余，^①虽然数目不多，但影响较大。

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使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政权赢得了统治阶级的好感和各方面人士的支持。前首相萨兰德拉在承1924年大选前的一次讲话中称赞墨索里尼“是自由传统合法的继人，是唯一能恢复国家真正和平的人”。^②意大利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尽管不赞成法西斯主义，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他们当中出现的一股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渴望意大利跻身于强国之列，以及对战后社会秩序长期处于混乱状况的不满和对工人运动的蔑视，使得他们对法西斯政权采取了赞赏态度。据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焦尔焦·阿门多拉说，他们甚至把法西斯对无产阶级采取的暴力行动都说成是“对颠覆性危险”做出的“理所当然的反应”，说这“表达了民族感情”。^③他们为法西斯歌功颂德，简直把它说成是救世主。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在1924年4月大选后的一次答记者问时还说，“法西斯运动适应了人们的真诚需要，做了很多好事”，人们“不期待，而且也不希望法西斯主义突如其来的倒台”，“希望不要失去法西斯主义”，“不要重新回到法西斯以前的那种软弱和无能的状态”。^④

各方面对法西斯的支持与颂扬，使墨索里尼觉得全面确立法西斯极权独裁统治的时机业已成熟。但为装扮门面，他决定举行大选，企图通过全面控制议会实现其野心。在他看来，经过议会符合统治阶级的传统和愿望，既可继续得到他们的支持，又可避免反对党的意大利共产党、社会党、统一社会党、^⑤人民党、共

① 坎代洛罗，《意大利现代史》第9卷，第48页。

②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210页。

③ 阿门多拉，《法西斯主义与工人运动》，第230页。

④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653页。

⑤ 意大利社会党派系较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致分为三派，即以屠拉梯为首的改良派，意大利总工会和冶金工会等均控制在该派手中；以塞拉蒂为首的最高级

和党、撒丁行动党和以乔瓦尼·阿门多拉为首的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宪法反对派，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试探气球，墨索里尼于1923年7月向议会提交一份法西斯新选举法草案要求批准。7月16日，总共有535名议员组成，其中只有35名法西斯议员的众议院通过了新选举法。随后，参议院也于同年11月13日批准该法。

新选举法的通过大大增强了墨索里尼在大选中取胜的信心。他于1924年1月28日宣布举行大选，并任命法西斯新选举法起草人、首相办公室主任阿切尔博、法西斯党第一任总书记比昂基、内政副大臣芬齐、法西斯党第三任总书记琼塔和法西斯四人领导小组成员、首相新闻办公室主任罗西组成所谓的多数派选举委员会。2月13日，五人委员会向墨索里尼提交一份由356名候选人组成的“国家候选人”名单。其中有203人是法西斯党党员。其余的153名非法西斯候选人都是法西斯党的坚定支持者，或旧政权的权势人物。其中自由党人占109名，民主党人占20名。前首相乔里蒂、奥兰多和萨兰德拉等人也都在“国家候选人”之列。^①墨索里尼让这些人作为候选人，目的在于给这次大选增添民主色彩。

在墨索里尼宣布于1924年4月6日举行全国大选后，以葛兰西为代表的意大利共产党曾建议各反对党组成统一阵线，在这次大选中采取联合行动，号召选民抵制投票，使法西斯党所获选票达不到新选举法规定的选票总数的25%。这一建议遭到当时力量最强，而且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意大利人民党、社会党及其领导的意大利总工会的拒绝。他们坚持参加大选，自以为在这次大选中仍有取胜的可能。

领派，控制着党的领导权；以博尔迪加为首的抵制派。1921年1月21日，抵制派退出社会党，建立意大利共产党。此后社会党大致分为最高纲领派，统一最高纲领派，集中派，统一中间派和第三国际派。1922年10月1日，社会党举行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集中派和统一中间派退出，建立统一社会党。

^①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227—230页。

恐怖威胁下的选举

竞选开始后，墨索里尼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权和法西斯民兵去阻止、破坏反对党参加竞选。他指使法西斯民兵在那些议会仍控制在非法西斯党人手中的省市制造事端，然后，他以这些地区社会秩序混乱为借口，解散了5省200个市的议会和地方政府。^①由他指派法西斯分子负责这些省市的大选工作。他还以莫须有的罪名勒令反对党的报纸停刊，纵容法西斯暴徒用武力袭击反对党候选人。

3月11日，法西斯党总书记琼塔在致法西斯党伦巴第区委和皮埃蒙特区委的通知中说，“据法西斯党中央领导机构的一致意见和内阁首相、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的指示”，对反对党和法西斯党内反对派的候选人，“既不能允许他们举行群众大会，也不能让他们出席会议。他们在任何地方出现，都应遭到全体法西斯主义者的猛烈攻击”。^②通知发出后的第二天，琼塔指派法西斯分子杜来尼和沃尔皮在米兰车站袭击了法西斯党原中央委员、伦巴第大区负责人、党内反对派领导人福尔尼。

3月23日，墨索里尼亲自出面在罗马全国市长会议上发表讲话，公开要求反对派屈服。他威胁说，“如果反对派想要法西斯主义、政府以及法西斯党和法西斯民兵减少压力，那就必须乖乖地接受既成事实”，否则，“为了捍卫(法西斯的)革命，我们将采取过去未曾采取的行动”。他说，“先生们，现在需要你们明确表示，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要法西斯主义，还是反对法西斯主义。不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就是反对我们。意大利的政治斗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简单”。^③墨索里尼的威胁，对破坏各反对党之间的

^① 阿尔贝托·焦万尼尼：《阿文廷的拒绝》，波洛尼亚1966年版，第461页。

^{②③}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213—214页。第215页。

联合，争取老的权势人物同法西斯合作，确实起到一些作用。原本不同意参加“国家候选人”名单的乔里蒂表示不与墨索里尼竞选而要同他一起与社会党人竞选。

1924年4月6日举行选举。法西斯主义者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得到179.1万张选票，这相当于新选举法规定的总票数的25%。尽管从当时情况看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困难，但笃信暴力的墨索里尼仍然决定凭借恐怖手段来确保其在选举中取胜。

大选当天，国家法西斯党发布公告，说它将采取最严厉的手段和最广泛的行动来对付一切反对党，特别是统一社会党和意大利人民党的颠覆性活动。选举时，武装法西斯暴徒控制各选举站，使反对党参与监督大选的代表无法开展工作；对于任何敢于就位监督投票和选举结果的人，都予以暴力威胁。一般选民，则强迫三人编为一组集体投票。未投法西斯候选人票者，次日即给予制裁，或剥夺其工作，或进行人身迫害。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党员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一经查出，即以暴力阻止投票，没收他们的选举证，让其他法西斯分子冒名投票。在广大农村地区，由法西斯分子代替文盲填写选票。在许多地方还伪造选举结果。^①

法西斯党借助上述这套办法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法西斯党指定的国家候选人获得选票4,653,488张，占投票总数的65%。按照新选举法的规定，在议会中占据2/3的席位，即374席。其中275人是法西斯党党员，99人是法西斯党的坚决拥护者。其余的61席由其他12个党派按得票多少分配。统一社会党获得24席，社会党最高纲领派22席，共产党19席，共和党7席，人民党39席，立宪反对派14席，撒丁行动党2席。^②

大选结束后，为防止意共和社会党联合其他反对党抗议法西斯党在选举中的营私舞弊与暴行，墨索里尼于4月9日下令捣毁

^① 保罗·阿拉特里：《意大利的反法西斯主义》，罗马1973年版，第281—294页。

^②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215—126、218页

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总部。他还根据法西斯党中央行政书记马里奈利的建议,新建一个以杜米尼为头子的法西斯特别行动队。这个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反对党称之为“法西斯契卡(ceka Fascista)”的秘密组织,其任务是采取有效行动“教训”那些与墨索里尼作对的议员和“惩罚他的最危险的对手”。①

议会会场上的斗争

5月24日,新议会举行首次会议。议会大厦周围的隐蔽处均藏有武装特别行动队分子,伺机袭击和殴打反对派议员。会场的几个入口由武装法西斯分子把守。会议尚未开始,恐怖气氛就笼罩着整个会场。会议过程中法西斯议员不时扰乱会场。反对派议员的发言经常被打断,讲稿被抢走。法西斯议员还大打出手。法西斯众议员马基揪住正在发言的社会党议员马菲的胡子,把他从讲坛上拉了下来。法西斯众议员卡帕尼操起一把椅子向反对派议员砸去。②

5月30日,马泰奥蒂在议会发言。会场秩序更加混乱不堪,气氛更加紧张。马泰奥蒂不顾法西斯的威胁,无情地揭露了在全国各地发生的侵犯选举自由的卑鄙行径。他列举了投票过程中的非法行为。他说,在100名统一社会党人候选人中,有60人不能在自己的选区内自由行动。马泰奥蒂的讲话刺到了法西斯议员的痛处,因而不断受到干扰。下面摘录几段他的发言及被打断的情况,③可以看出斗争的激烈和法西斯穷凶极恶的面目。

马泰奥蒂(以下简称“马”),“……这次选举是无效的。首先,所有官方报纸都转载的、法西斯演讲者们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又反

①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218页。

② 蒂塔·马迪亚:《意大利议会的恐怖史》,米兰1942年版,第667页。

③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234—244页。

复重申了的政治声明明确说，选举都是相对的，政府并不感到非服从选举结果不可，而且政府还要不惜一切代价以武力保住权力，即使……”（被来自法西斯议员座席的吵闹声所打断；墨索里尼起身活动）。

一名法西斯议员喊：“对，对，我们是打了仗！”（法西斯议员席响起掌声）。

马：“你们的掌声正说明我说的是有根据的。正是你们证明了意大利没有任何选举人可以自由地表达意见……”（被法西斯议员的吵闹声打断；骚动；抗议声）。

（法西斯议员）梅拉维利亚：“有800万意大利人投了票！”

马：“没有任何人是自由的，因为每个公民都知道，如果他敢于对（法西斯）多数党投反对票，政府就有力量取消他的投票和投票的结果”（被法西斯议员的哄闹声所打断，一片嘈杂声）

梅拉维利亚：“这不是事实，是你杜撰的”。

（法西斯暴力主义领导人）法里纳奇：“到最后，我们就会当真做出我们没干过的事情”！

马：“那是你们的老本行了！”……

马：“在认为不能自由表达意志的选民广泛弃权之后，选举证就被一些法西斯分子拿去，他们换个名字又到选举站去投票，有人甚至投一、二十次票，有20来岁的青年人拿着60多岁老人的选举证去投票。”（下面议论声）

（法西斯议员）托雷：“够了，该结束了！（骚乱，议论）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难道我们必须忍受对我们的侮辱吗？”（骚乱，一些法西斯议员挤到放讲坛的半圆圈里）

议长：“议员阁下们，我请你们镇静，请从半圆圈里走出去！”

托雷：“（对马泰奥蒂）你需要的是监禁，而不是议会！”（议论，骚乱）

一名法西斯议员大喊：“少数党不是得了200万张选票吗？”

法里纳奇：“你们可以发动革命嘛！”

梅拉维利亚：“这可是200万英雄啊！”

马：“为了加强政府的统治，还建有一支民兵……”（法西斯议员的座位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民兵万岁”的呼喊声）

一名法西斯议员喊：“民兵让你们坐立不安！”

马：“……是有武装的民兵……”（被法西斯议员的嘈杂声打断，会场长时间骚动）

议长：“安静！马泰奥蒂阁下，请您结束吧！”

马：“敢于到选举站投票的人，特别是在许多农村乡镇，在选举站就要受到负责监票者的拜访。如果选举委员会开箱检查一下选票，便可发现，许多选票上的字迹同出一人之手，还有一些选票则被涂改，甚至被篡改……我们社会党人投票均遭暴力阻止……（左派掌声），（其他地方骚动）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由于在你们吵吵闹闹的情况下我无法继续讲下去和你们都十分清楚的其他原因，……（骚动）我们要求取消这次选举”。

马泰奥蒂的讲话使墨索里尼十分恐惧。会后他指示法西斯特别行动队，进一步加强恐怖行动，他提出“对象马泰奥蒂这样的挑衅者只能用手枪干掉他”。^①

法西斯政权摇摇欲坠

1924年6月10日下午，5名武装法西斯特别行动队员袭击并杀害了意大利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贾科莫·马泰奥蒂，将其尸体埋在距罗马大约23公里的里亚诺市郊。事发后，各种倾向的报纸，甚至亲法西斯的报纸，迅速掀起一个在意大利历史上声势空前的

^① 史密斯：《墨索里尼》，第129页。

运动，揭露法西斯领导人和政府与这次事件的关系，谴责法西斯罪行。法西斯政权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法西斯的暴行犯了众怒，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各地纷纷举行抗议示威。参加者除工农群众外，还有反对党的领导人和其他社会名流。他们一致要求惩办凶手。前王国外交副大臣、驻法大使斯福尔扎向意大利社会党众议员屠拉梯、穆拉蒂和特莱维斯等人建议“占领奇基宫，^①逮捕(马泰奥蒂事件的)主使者墨索里尼”。^②

对法西斯政权最大的威胁是各反对党和社会团体采取的反法西斯行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向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总工会建议，三方联合行动，“宣布全国总罢工，以便从政治舞台上消除法西斯的威胁”。^③意共还向各反对党呼吁，共同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反议会阵线”，与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进行斗争，推翻法西斯政权。

最使墨索里尼感到不安的是在工农群众中有着牢固基础的意大利统一社会党和意大利人民党之间的反法西斯联合行动。7月1日，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屠拉梯在答记者问时说，两党可能在不损害本党性质的情况下，采取一致行动，推翻法西斯政府。^④随后，意大利人民党总书记加斯贝利发表讲话，证实两党存在着这种合作的可能性。他说：“有可能建立一个人民党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取代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⑤

意大利人民党创始人、该党前总书记斯图尔佐神甫在获悉两党领导人进行磋商的消息后，在党的机关报《人民报》上发表题为《意大利人的精神团结》的文章，赞同两党合作。后来由于教皇庇护十一世的干预和反对，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但对整个政局产生

① 奇基宫系意大利外交部所在地。

② 桑塔莱利，《法西斯主义史》第1卷，第371页。

③ 阿拉特里，《意大利的反法西斯主义》第1卷，第299—300页。

④⑤ 坎代洛罗，《现代意大利史》第9卷，第86页。

了深刻影响。

意大利政治家阿门多拉在法西斯党执政后曾建立一个“宪法反对派”。马泰奥蒂事件一发生，他即着手建立由民主党和自由党内反法西斯分子组成的、以推翻墨索里尼政府为目标的全国民主与自由力量联盟。它起草了纲领，公布了成立宣言。在宣言上签名的人，除阿门多拉外，还有35名对意大利政局颇有影响的政治家、记者和知识分子。这一派尽管人数不多，对法西斯政权的威慑力却不小。也许正是这方面的原因，墨索里尼曾多次指示，要袭击和杀害该派领导人。

在人民群众和各派反法西斯情绪的推动下，反对党议员在议会内部展开了反法西斯斗争。6月11日，反对派的议员要求政府澄清与马泰奥蒂失踪的关系。6月18日，大约150名非法西斯议员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法西斯暴行。他们自称“阿文廷派”，^① 决定不再参加议会的工作。阿文廷派在集体退出议会的声明中说：“我们反对派的代表一致认为，在杀害马泰奥蒂同事的凶恶事件使我们更加不安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参加议会的工作。因此，反对派的代表一致决定，各自集团不参加议会，待政府采取行动后，我们再作进一步考虑”。^②

6月27日，阿文廷议员在议会大厦举行全体会议。与会者听取了屠拉梯所作的关于马泰奥蒂纪念会的情况报告，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取缔一切属于政党的民兵，毫不留情地镇压一切非法活动，否则他们就不返回议会。^③ 实际上，阿文廷议员采取这一步骤的真正目的，是想逼迫国王干预马泰奥蒂被

① 阿文廷(Aventino)，古罗马城西南的小山名，是当时反对贵族权力的平民避难的地方。马泰奥蒂事件发生后，反对派以此命名，表示他们要以当年平民反对贵族压迫的精神，把墨索里尼赶下台。

②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627页。

③ 坎代洛罗，《现代意大利史》第9卷，第77页。

杀一事。他们寄希望于国王免去墨索里尼的首相职务，或是通过国王取得军队的支持，组成一个超党派政府，或军人政府。

军人中的不满分子在马泰奥蒂事件中也采取行动。退伍军人与军人联合建立一个自由意大利组织，出版《自由意大利报》，进行反法西斯活动。

在新闻舆论的挞伐和社会各阶层反法西斯怒潮猛烈冲击下，法西斯政权大有摇摇欲坠之势。意大利前总统佩尔蒂尼事后说道：“在我们常去的咖啡馆里，人们已经摘下了法西斯的党徽。……切萨雷·罗西后来在巴黎对我们说，马泰奥蒂被杀后，他去了奇基宫，抓住墨索里尼的肩膀厉声斥责他：“你真卑鄙！”而墨索里尼只是喃喃自语：“我们一切都完了”。^① 6月12日墨索里尼在议会中说，“如果（国王）陛下今天召见我，命令我辞职，我一定听命，并表示欢迎和服从”。^②

墨索里尼采取了丢车保帅的策略。他下令将杀害马泰奥蒂的凶手杜米尼等5名罪犯和主使人、法西斯党中央行政书记马里奈里缉拿归案；授意4名法西斯大臣：德·斯特法尼、真蒂莱、费德尔佐尼和奥维利奥提出辞职；解除芬齐的内政副大臣、德·博诺的警察总监和民兵司令的职务。为抑制人们的愤怒情绪，墨索里尼还把地方行动队的极端主义领导人法里纳奇排挤出法西斯党领导集团，解除了他的行动队司令的职务。墨索里尼把他的心腹、法西斯四人领导小组成员、首相新闻办公室主任切萨雷·罗西也抛了出来，将其开除出党，宣布逮捕。罗西对自己被当作替罪羊的角色十分气愤。他在尚未被捕前于1924年6月14日起草一份备忘录，揭露了大选前后发生的几起重大暴力事件，其中包括绑架，杀害马泰奥蒂的真相。他列举事实证明，一切暴行“都是领袖直

^① 乌博尔迪，《佩尔蒂尼公民——全体意大利人的总统》，第45页。

^② 丹·麦·史密斯，《1861—1969意大利史》，第570页。

接授意的，或是经他同意，或是同他合谋进行的”；罗西本人“只不过是首相……在当今的牺牲品”，是“指望拿我的脑袋换取反法西斯党派息怒”。^①

杀害马泰奥蒂真相和罗西备忘录内容的披露使法西斯党内本来已经存在的意见分歧、政治敌对、利益冲突、地区偏见和对墨索里尼的不信任感大大加深，发展成为威胁法西斯政权的主要因素。

在马泰奥蒂事件中遭到墨索里尼压制的极端主义派怀疑墨索里尼继续“革命”的意志，担心得到他支持和重用的以费德尔佐尼与罗科为首的民族法西斯主义派取得成功会消灭行动队和极端主义派。该派以原法西斯行动队司令法里纳奇、内政副大臣格兰迪和原法西斯四人领导小组成员巴尔博等人为首，在各自的权力领地，向墨索里尼施加压力。这些地方首领在其所控制地区的威望远远超过墨索里尼。他们的主要拥护者是法西斯党和行动队的基层干部，多数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敢死队员、国民卫队队长和中下级军官。他们满脑子幻想，早就期待着夺取政权，认为通过向罗马进军取得的政权应当属于他们，轮到他们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号施令了。然而，法西斯政权建立后，他们的愿望未能实现，心中怀有不满。在马泰奥蒂事件发生后，他们因受到排挤与打击，决心以自己的领地为基地与墨索里尼相抗衡。这对法西斯政权是个很大威胁。

法西斯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对法西斯政权所采取的扶持工业集中化，使小业主破产，增收地租与小农捐税，废除1920年政府颁布的占领荒地法等措施，怀有怨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因对法西斯暴力政策不满纷纷退党，有些地方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据前首相乔里蒂说，“有些地区，具体地说就是皮埃蒙特和西西里地

①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266—272页。

区，实际上法西斯主义已不复存在”。^① 国家法西斯党的党员人数从1923年底的782,979人减少到1924年底的642,246人。^② 这无疑为反法西斯力量推翻法西斯政权提供了有利条件。墨索里尼后来承认，当时只要有几个果敢的人，就能轻而易举地动员起公众舆论，借以举行起义，摧毁法西斯主义。^③

墨索里尼政府没有倒台，原因之一是由于反对派没有能够继道义上的抗议之后，采取政治的和军事的行动去推翻法西斯政府。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国王自己觉醒，并免去墨索里尼的首相职务上。甚至当国王于6月17日公开包庇墨索里尼时，他们还在等待国王的干预。当然，法西斯政权没有垮台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它得到了包括王室在内的统治阶级的全面支持。

法西斯的反攻倒算

在法西斯政权面临严重危机之时，墨索里尼急需得到统治阶级权势集团的支持，将反法西斯运动平息下去。他与垄断资本、封建王室、军队高级将领和梵蒂冈神职人员联结在一起，实行全面的反攻倒算。

6月17日，埃马努埃莱三世访问西班牙归来当天，墨索里尼进宫会见国王。他向国王表明法西斯党对萨伏依王朝的忠诚，法西斯党已决定法西斯民兵要宣誓忠于国王。他本人今后也要按国王的意图行事。他探问国王对马泰奥蒂事件的态度。埃马努埃莱表示无意干预此事，只是暗示让其亲信、前民族主义协会领导人费德尔佐尼接任内政大臣一职。墨索里尼当即同意。国王随后发表谈话，为墨索里尼开脱罪责，说他“不认为墨索里尼直接参与了

^{①③} 史密斯：《墨索里尼》，第142、132页。

^②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407页。

杀害马泰奥蒂的活动”。^① 国王的态度对法西斯政权摆脱覆灭命运起了重要作用。

6月24日，罗马教廷通过其机关报《罗马观察家报》指责各反对党的反法西斯行动，声称“少数派要推翻政府和重新选举的企图是不能实现的”。^② 教皇庇护十一世和国务卿加斯帕里亲自出面干预意大利天主教界的反法西斯行动。他们授意《天主教文明》发表题为《天主教徒在当前意大利政党斗争中的地位》一文，反对意大利人民党与社会党合作取代法西斯政府。^③ 教皇在一次向大学生讲话时说，这种合作是虚假的，“是毫无准备的危险想法”。^④ 根据墨索里尼的要求，教皇还强迫反法西斯主义者斯图尔佐流亡英国。

6月26日，其成员主要来自封建贵族、政客、垄断资本和法西斯骨干分子的参议院，以225票赞成，21票反对和6票弃权通过了对法西斯政府的信任案。法西斯政权转危为安。墨索里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次极为重要的投票我敢说是决定性的，在困难的时刻，在充满政治与道义风暴的时候，参议院几乎全体一致站在政府一边，这给了国王以启示”。^⑤

封建王室和天主教势力之所以包庇和支持墨索里尼是彼此间的需要。他们都害怕革命，担心在意大利重新出现革命运动的高潮，都感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将已出现的左倾趋向压制下去。

墨索里尼在得到王室和教廷的支持后，为恢复实力地位作了相应部署。

6月30日，墨索里尼改组内阁，大量起用右翼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委任前民族主义协会领导人费德尔佐尼、斯卡

①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670页。

②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317页。

③④ 坎代洛罗，《现代意大利史》第9卷，第86页。

⑤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786页。

莱亚、杰恩蒂里分别担任内政大臣、殖民大臣、司法副大臣的职务，委任右翼自由党人卡萨蒂和萨罗基担任教育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委任忠于教皇的人民党人纳瓦担任经济大臣。新的内阁组成表明，墨索里尼把保皇的民族主义势力、代表南方地主阶级利益的自由党萨兰德拉派和梵蒂冈作为他的重要合作者。

7月8日，新内阁决定实施1923年7月12日颁布的严格限制新闻自由的法令，并授予地方行政长官查封反法西斯报刊的权力。

7月11日和22日，墨索里尼主持召开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决定对反对派进行反击。墨索里尼在22日会上说，第一阶段已经“胜利”结束，在这期间，“国家法西斯党虽然遭到骚乱的突然打击，但它顽强地顶住了”。当前的任务是，立即转入反击。^①

8月1日，法西斯政府宣布禁止反对派集会。8月2日至7日，墨索里尼在罗马主持召开法西斯党全国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宣布，要向反对派使用武力。他要求法西斯分子“做好一切准备”，“准备战斗”。^②会议任命了由15人组成的宪法修改委员会，为实行极权制统治作法律准备。

墨索里尼在法西斯党内进行清洗，把数百名反对他的法西斯分子投入监狱。^③正在此时，马泰奥蒂的尸体于8月16日被找到，再次引起群众的义愤。这一次，墨索里尼已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并不那么紧张。但垄断资产阶级极为恐慌，担心工人革命运动重新兴起。垄断资本的组织——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于8月底在米兰总部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政局问题。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决定由联合会主席本尼、秘书长奥利维蒂和皮雷利与孔蒂4人组

①② 桑塔莱利，《法西斯主义史》第1卷，第376页。

③ 墨索里尼1925年1月30日在众议院的演说，载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293页。

成代表团，于9月9日秘密会见墨索里尼，向他递交一份备忘录，提出恢复信任，实现国家局势的正常化；要求避免对工人阶级采取压制政策，要法西斯政府确保劳动自由和组织自由等等。实质上是在向墨索里尼献策。^①有关这次会见的消息于9月底在报上披露，引起全国轰动，猜测纷繁。尽管法西斯政府和工业家联合会都否认会见的特殊意义，但垄断资产阶级的这一行动是在一些亲法西斯势力相继疏远法西斯政权时采取的。这本身就是它与法西斯势力结盟的象征。会见是双方的共同需要，是垄断资产阶级与法西斯势力进一步结合走向极权统治的前奏。

嗣后，墨索里尼重新纵容和支持极端法西斯主义派大搞暴力行动。该派对挽救墨索里尼政权和建立法西斯极权独裁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1924年秋季，以法里纳奇和巴尔博为首的法西斯行动队在埃米利亚、罗马尼亚和托斯卡纳等地活跃起来。他们一面威胁“要第二次向罗马进军”，一面呼吁墨索里尼支持“第二次浪潮”。所谓“第二次浪潮”，就是对因马泰奥蒂被杀害而引起的反法西斯运动“采取特别措施和镇压手段”，“继续进行和圆满完成法西斯革命”。^②这一呼吁首先得到法西斯民兵负责人里奇的支持。里奇在法西斯民兵的一次集会上强烈要求墨索里尼响应极端派的呼吁，他说，他忠于墨索里尼，“条件是，政府的政策要转向公开实行独裁”。^③其实，墨索里尼也正在为实行独裁统治进行准备，所以他很快接受极端派的呼吁，把法里纳奇和巴尔博从佛罗伦萨等地重新请回罗马，分别委以法西斯党总书记和法西斯民兵司令的要职。

极端派分子于9月12日以其工会主席卡萨利尼在罗马的电车上被一名工人暗杀为借口，向阿文廷派采取报复行动。9月13日，

^① 坎代洛罗，《现代意大利史》第9卷，第85页。

^{②③} 桑塔莱利，《法西斯主义史》第1卷，第381、383页。

法里纳奇在《新克雷莫纳》发表文章，声称“要对制造法西斯主义者被杀罪行负道义责任的那些人——阿门多拉、阿尔贝蒂尼、唐·斯图尔佐、韦托雷、屠拉梯、冈萨雷斯、钱卡和杀人凶手进行反击”。“不单单是查抄敌人的报纸，而是要予以镇压和结束阿文廷闹剧，如果用扫帚打扫不彻底，就动用机枪”。^①

10月29日，墨索里尼在新克雷莫纳市发表讲话，攻击反对派，指示内政大臣费德尔佐尼查封反对派的报纸。各省市反对党领导机构的住地和包括上述所提到的那些著名反对派领导人的住宅先后遭到法西斯暴徒的袭击。阿文廷派对法西斯党的反扑缺乏准备，基本上是束手无策，陷入分裂。共产党议员为在议会与法西斯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于1924年11月12日返回议会。其他阿文廷议员也先后回到议会。这种情况更加鼓励和助长了墨索里尼的反动气焰。

第三节 全面建立法西斯极权体制

1924年底，墨索里尼接受法西斯极端派的要求，清除阿文廷派，并于1925年内在意大利实行一党专政。在随后的几年里，到1928年，墨索里尼全面建立了法西斯极权体制。

实行一党专政

在墨索里尼的纵容与支持下，法西斯极端派的势力日益扩大，控制了罗马尼阿和托斯卡纳大区的广大地区。他们以佛罗伦萨为中心，在周围几个大区进行大规模恐怖活动。这一地区意大利共

^①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676页。

产党和社会党领导的工农反法西斯斗争处于越来越困难的境地。

1924年12月，极端派势力一度在法西斯党内起着主导作用。他们要求墨索里尼对阿文廷反对派采取有力行动。极端派要挟说，如果不按照他们的意见办，他们将自己采取行动。墨索里尼经过犹豫，很快下了决心。他意识到，如果不采纳极端派的意见，他就有被废黜的危险。墨索里尼1924年11月22日在众议院讲话中说，意大利正处在调整阶段，“彻底调整完毕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①

12月间，以阿·塔拉贝拉和恩·加尔贝亚蒂为首的50多名法西斯民兵队长，担心墨索里尼变卦，在佛罗伦萨举行会议。与会者决定，一旦墨索里尼中途生变，他们就“依靠自己的力量举行起义”。^②会后，他们于12月31日派代表团去罗马会见墨索里尼，敦促他立即采取行动。同一天，托斯卡纳的数千名法西斯武装行动队队员在佛罗伦萨集结，扬言要“第二次向罗马进军”，同阿文廷反法西斯势力进行决战。这一行动是配合代表团，对墨索里尼施加压力。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使用武力迫使阿文廷派投降，让议会服从法西斯统治。^③

1925年1月2日，墨索里尼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了针对阿文廷派的讲话。他说，“内阁对由不负责任的分子所造成的局势以及这种局势对经济和金融所产生的影响，看法是一致的”。内阁会议一致决定，授权他“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的道德与物质利益”。^④

1月3日，墨索里尼在议会发表讲话，^⑤这标志着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一次重大转折——法西斯党彻底抛弃议会民主制，加紧

① 讲话全文载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292—293页。

②③④ 桑塔莱利：《法西斯主义史》第1卷，第382、第383页。

⑤ 墨索里尼1月3日在意大利众议院的讲话，全文载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291—295页。

全面确立极权制。墨索里尼公开向阿文廷派挑衅。他说，“先生们，我要在这里向议会，向意大利人民宣布：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政治的、道义的和历史的责任，统统由我一个人来负……如果说法西斯是一个犯罪组织，我就是这个犯罪组织的首领”。他断然拒绝马泰奥蒂事件后阿文廷派对法西斯的谴责，反诬“阿文廷在共和的背景下煽动叛乱”，“已造成恶果”，“给全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墨索里尼杀气腾腾地威胁说，“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最终粉碎阿文廷的叛乱；解决的唯一办法是“使用武力”，“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任何其他解决办法，今后也不会有”。他宣称，“在我发表讲话后的48小时之内，全国各地的局势将会得到澄清”。

墨索里尼在这次讲话中暗示说，“你们知道，在同我们历来对之感谢的旅伴所走过长长的一段路之后，有必要停下来看一看，同这些伙伴所走的路在将来是否还可以继续一起走下去”。这意味着墨索里尼已决定不再与其他党组成联合政府，预示着他要意大利建立一党专政的极权政府。

墨索里尼讲话当天晚上，法西斯内政大臣费德尔佐尼受权命令全国各地的法西斯行政长官给反对派以严厉打击。法西斯白色恐怖笼罩整个意大利。1月6日费德尔佐尼向内阁报告说，三天来有95个被怀疑的团体和俱乐部被查封，150个公共团体、25个“颠覆性”组织和120个“自由意大利”小组被解散；111名重要的“危险分子”被逮捕，655户被抄家。他还说，各地行政长官“毫不犹豫地”使用给予他们的权力。^①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在1月5日逼迫自由党人卡萨蒂和萨洛基辞去大臣职务。他甚至把法西斯大臣中对他有所离心的德·斯特法尼和奥维利奥逐出内阁，代之以被他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立法者的罗科，^②及自己的心腹朱里亚蒂和费代莱。紧接着，墨索

^①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726页。

^② 墨索里尼为《阿尔弗雷多·罗科政治论文及演说集》撰写的序。

里尼于同年4月4日，5月8日、14日和7月10日连续四次改组内阁，把政府里的非法西斯大臣统统逐出内阁。

墨索里尼1925年1月3日讲话及其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表明，通过向罗马进军建立法西斯政权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开始了确立法西斯极权统治的新阶段。墨索里尼在他的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1925年的历史……我用这样几句话就足以概括它：我们建立了一个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政权。我们真正改变了国家的经济、政治、行政管理和道德面貌。自(1925年)1月3日起开始了法西斯革命的第三个时期，①立法时期”。②当时担任众议院议长的民族法西斯主义派领导人罗科说得更为清楚。他说：“(1925年)1月3日是个决定性的时刻，因为，自1922年10月28日到1925年1月3日，意大利并不是控制在法西斯主义一党的手中，相反，国家是法西斯党同其他党派共同管理的”，“直到1925年1月3日联合政府中的一切残余分子被清除出去之后，法西斯主义才得以单独统治这个国家”。③

极权制的主要立法

1925和1926两年，法西斯政府实施墨索里尼制订的使国家全面法西斯化的计划，挟持国王与议会颁布一系列确立极权统治的法律。1925年1月14日颁布法西斯的新选举法。该法规定一个选区只选一名议员，便于法西斯党候选人当选，组成一个清一色法西斯议员的众议院。

① 第一个时期指1922年10月向罗马进军以前，也即夺取政权的时期，1922年10月30日墨索里尼组成内阁至1925年1月3日为第二个时期，之后为第三个时期。

②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第790页。

③ 罗科，《阿尔弗雷多·罗科政治论文与演说集》第3卷，第773页。

5月16日颁布《反秘密团体法》，宣布取消集会与结社自由，借此取缔了军队高级将领、参众两院绝大多数非法西斯议员和部分法西斯议员参加的、在政治上颇有影响、其活动方式极其秘密的共济会。

6月20日颁布法西斯《新闻法》。墨索里尼企图凭借该法取消言论自由，“取缔颠覆性报刊”，严禁新闻报导批评政府。

11月26日颁布《国家防御措施》，也即通常所说的“特别法”。该法共8条。主要内容是：取缔一切从事反政府活动的党派、团体和组织；增设流放的刑罚，用以对付那些从事或旨在从事用暴力颠覆国内社会、经济和国家秩序的人；制裁偷越国境者，对于越境者可以开枪射击；在各法西斯民兵兵团指挥部设立政治调查机构；对所有采取危害国王、王后、王储和政府首相生命、尊严或人身自由者处以死刑；对挑起反对政府的叛乱和鼓动内战者处于死刑；对煽动谋杀者处以5至30年徒刑；对在国外进行有害于国家利益者处以5至10年徒刑。^①

12月24日颁布《政府首脑及阁员职责与特权法》（以下简称《特权法》）。该法共分十条。主要内容包括：政府首相改称政府首脑；政府首脑不再由众议院投票通过，而是由国王任免；政府首脑不再对议会负责，只对国王负责；国王任命政府首脑的命令须由政府首脑联署，国王罢免政府首脑的命令须由继任政府首脑联署；内阁的组成范围、阁员的人选及其职责均由政府首脑决定；阁员只对国王和政府首脑负责；政府首脑为国务会议主席，未得到政府首脑的同意，任何提案均不能提交参众两院讨论；政府首脑有权在必要时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各项法律的实施由政府首脑负责；任何人犯有危害政府首脑生命、尊严或人身自由者处以死刑；任何在讲话或行动方面反对政府首脑者处以半年至两年

^① 罗科：《阿尔弗雷多·罗科政治论文与演说集》第3卷第845—861页。

半徒刑。^①

1926年颁布的法律，主要有：1月31日第100号法，宣布扩大政府制订法规的权力。2月4日第237号法，宣布废除市议会选出的市长，代之以领袖任命的行政长官，取消一切地方自治。

4月3日《行政长官职权法》，规定各省市行政长官有权解散本省市的政党和团体，只要他认为这些政党和团体的行为危害了国家利益。这为法西斯政权取缔一切政党和非法西斯的工人阶级组织设置了法律依据。墨索里尼非常重视这个法律，他在1927年1月5日的一则通知中重申：“我庄严地宣布，各省（市）行政长官是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②实际上，这些行政长官是墨索里尼本人的代表，他们按照他的意志在当地采取行动。同日颁布的第563号法，宣布禁止罢工，并承认法西斯工会为唯一合法工会，只有它有权同资方签订集体劳动合同。

11月6日颁布的1848号法重新把警察作为法西斯镇压机器的主要工具，接替声名狼藉的法西斯民兵。该法宣布，给警察配置新的装备，警察有自行处置权。

上述法律的制订与公布，基本上奠定了法西斯极权统治的法规体系。其中1925年11月26日颁布的《国家防御措施》（特别法），同年12月24日颁布的《政府首脑及阁员职责与特权法》，加上1928年12月9日颁布的《法西斯大委员会权力法》是墨索里尼实行极权统治最主要的所谓法律依据。《特权法》的颁布确立了墨索里尼独裁者的地位。用他自己1927年5月26日在议会的讲话说，在法西斯政府内，所有阁员和各部大臣、副大臣均与军队的士兵一样，一切行动都应遵从领袖的命令。“我告知他们止则止，动则动。在法西斯统治下，不应再有昔日所用之方法，唯有实行军队之纪

① 罗科：《阿尔弗雷多·罗科政治论文与演说集》第3卷，第919—929页。

② 莱维等著：《意大利史》第3卷，第1406页。

律。^①

随着《特别法》和《特权法》的颁布，法西斯政权于1927年建立秘密警察组织，也即臭名昭著的“奥夫拉”。^②它是由新任警察头子阿·博基尼以新建警察和特别监察署的名义组建起来的。奥夫拉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是找到并破坏了意大利共产党总部。它逮捕了包括葛兰西、罗维达、斯特奇马罗、特拉奇尼、里博尔迪、马菲和阿尔佐尼等意共中央领导人，他们分别被判处20年以上的徒刑。

墨索里尼还于1927年1月4日设立国家防御特别法庭，专门负责有关特别法所涉及的案件。该法庭不由法官组成，而是由同等数量的军人和法西斯领导人组成。在诉讼程序方面仿效战时军事法庭。该法庭审判那些所谓“谋杀国家领导人者”，它的判决是不能申诉的终审判决。特别法庭拥有追溯既往的权力，也就是说它对过去已判的罪觉得量刑偏轻可以重判。^③

法西斯政权在全国范围搜捕反法西斯运动领导人。1927年，特别法庭宣判57批，提起公诉者255人，判刑者219人；1928年，宣判157批，提起公诉者多达914人，判刑者636人；1929年，特别法庭审理43起，提起公诉者210人，判刑者159人。受审和判刑者不是反对党领导人，就是著名的反法西斯教授、专家和学者，例如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屠拉梯、前首相尼蒂、王国参议员斯福尔扎伯爵和社会党改良派领导人、众议员特雷维斯等人。他们被流放到位于西西里北岸附近的乌斯蒂卡岛和利帕里岛，以及位于那不勒斯西北的蓬扎岛和文托泰内岛。有的被流放国外。1926年11月30日官方的斯特凡尼通讯社奉命宣布，有522人被流放。

① 转引自肖文哲：《法西斯意大利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19页。

② 奥夫拉(Ovra)系意大利法西斯秘密警察组织的简称，正式名称是监视反法西斯罪行机构(Organò di Vigilanza dei reati Antifascisti)。

③ 莱维等著：《意大利史》第3卷，第1406页。

法西斯暴行遭到强烈反对。自1926年4月至10月，墨索里尼三次遇刺。第一次是英国妇女维奥莱特·吉布森用手枪击中了他的鼻尖；第二次是吉诺·卢切蒂向他乘坐的汽车扔了一枚手榴弹，但是汽车开过后才爆炸；第三次是一名15岁的少年安泰奥·赞博尼用手枪向他开了一枪，子弹只擦破胸前的外衣。几次未遂行刺招致墨索里尼的报复。他一方面打击和迫害那些反对法西斯政权或对官方各种说法持怀疑态度的反对派领导人、报纸和记者，捣毁报社和印厂，命令宪兵向示威者开枪；另一方面宣称，“国人渐渐地觉得法西斯与国家的活力，是一而二，二而一。用不着其他各党各派的存在”。^①自此，议会如同政府一样，由国家法西斯党一党独霸。

1926年11月9日，众议院以322票对10票通过了法西斯党的两任总书记奥·图拉蒂和罗·法里纳奇（前者于1926年3月30日接替后者）的联合提案，把123名反对派议员统统赶出议会。该提案说，鉴于1924年6月选出的众议员对政府首脑和议会采取明确而公开的分裂活动，认为，他们已不能履行宪法第49条所明确规定的众议员的职责，所以众议院宣布，这些众议员已丧失议员资格。^②从此，他们不是保持沉默，就是移居外国。尤其是那些老年政治家多半流亡国外。国内的反法西斯斗争转入地下。

1928年12月9日颁布的《法西斯大委员会权力法》，通过法律形式把法西斯大委员会变成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该法主要包括下述内容：

(1) 法西斯大委员会有权向国王提出政府首脑和各部大臣的人选；其成员仍是1923年1月11日大委员会建立时所确立的范围，仍由领袖任命。

① 转引自刘文岛：《意大利史地》，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47页。

② 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290页。

(2) 政府首脑与法西斯大委员会主席应由一人担任；

(3) 法西斯大委员会有权参与各项立法活动；有权为大选提出唯一的候选人名单；有权颁布各种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法令；

(4) 法西斯大委员会有权参与决定王位继承人。^①

这项法律是把国王架空，将法西斯大委员会凌驾于议会之上，成为统揽国家权力的最高机构，而且规定由墨索里尼控制。如果说，在这之前颁布的各项法律使国家法西斯党以一党专政统治意大利，那么，这个法西斯大委员会权力法是从法律上确保墨索里尼独自主宰国家。这一法律的颁布，标志着意大利全面确立法西斯的极权体制。

墨索里尼集大权于一身

1925年实行法西斯一党专政之后，墨索里尼有计划、有步骤地攫取权力，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以确立和巩固他的主宰者的地位。

马泰奥蒂事件发生后，墨索里尼于1924年6月17日放弃了他所兼任的内政大臣一职，只兼任外交大臣一职。他逐步扩大对内阁各部的控制权。1925年4月，他向议会提出修改国防计划，兼任陆军大臣。同年5月和8月两次改组内阁，他兼任海军大臣和空军大臣，独揽军权，并于1926年10月亲任法西斯民兵总司令。然而，墨索里尼并未以此为满足，1926年7月建立职团部，他又兼任大臣，借以直接控制所有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和经济活动领域。1926年11月，他以全面实施《政府首脑及阁员职责与特权法》为名，从费德尔佐尼手中夺回内政大臣一职。这主要是内政部主管

^① 罗科：《阿尔弗雷多·罗科政治论文与演说集》第3卷，第943—954页。

全国警政及地方政府，权力很大，是一个推行极权独裁统治不可缺少的机构。他要自己直接掌握。1928年12月兼任殖民大臣，次年4月兼任公共工程大臣。至此，作为政府首脑的墨索里尼一身兼任内政、外交、陆军、海军、空军、职团、殖民和公共工程8个部的大臣。这8个部占内阁总共13个部的将近2/3，均属要害部门。剩下5个部是：司法部、国民经济部、财政部、教育部和交通部。大臣均由墨索里尼亲信担任。

墨索里尼为达到集所有大权于一身的目标，强化法西斯纪律，强调“对上要服从命令，对命令看似铁一般”，^①凡有离心倾向或他疑心有此倾向者都予以严惩。同时，内阁各部均设一名副大臣。对于5名大臣和所有的副大臣，不管有多大的才能，也不管是否他的亲信，均采取经常调换职务或撤职的办法。不让任何一位大臣或副大臣在某一部门任职时间过长，形成与之相抗衡的政治势力。以内政部为例，1925年1月至1929年11月的5年间，副大臣5次易人，大致是一年一任。

总的看来，至1926年底，墨索里尼已巩固了他的作为主宰者的地位。1927年1月5日，他以内政大臣的身份致全国行政长官的一份通知中明确表示，他要“实行个人独裁”，消灭各种形式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②

墨索里尼指使其亲信与内阁大臣、副大臣在全国和全党大树他的领袖权威，要求他们把他作为“超人”来宣传。此举不仅出于虚荣的考虑，也是作为一种权力手段。新任法西斯党总书记图拉蒂和职团部副大臣博塔伊秉承墨索里尼的旨意，采取各种办法把墨索里尼神化。宣传领袖崇拜。他们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全国高大建筑物上和在市区的要道路口悬挂墨索里尼大幅

^① 转引自陈柏青，《欧洲各国及日本之青年训练》，正中书局1937年第3版，第50页。

^②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3卷，第297—298页。

画像和建造塑像；勒令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在办公室、教室张挂墨索里尼半身像。同时，开动宣传机器不遗余力地宣传“墨索里尼永远正确”，是一位“英明”和“无所不知”的领袖。“历史上无人能同这个特殊的人相比”。^①小学生从入学第一天起就接受对领袖要绝对服从和绝对信任的教育。1926年国家颁布法律，把所有各种年龄的青少年都编入半军事性组织，向他们灌输好战思想，接受对墨索里尼的绝对忠诚的教育。“领袖主义”逐渐成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最新特征。

对国家法西斯党，墨索里尼进行了大清洗，把它变成自己绝对牢固控制的、用以实现个人愿望的工具。1926年法西斯党开始清党。3月30日，解除在马泰奥蒂危机时期以武力威胁而上台的法里纳奇的法西斯党总书记职务，代之以对墨索里尼忠心耿耿的图拉蒂。后者接任总书记后，立即着手制订国家法西斯党的新党章。这个新党章于同年10月8日经法西斯大委员会批准，它宣布废除法西斯各级领导人的选举制，改为领袖任命制；确定领袖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规定法西斯党党员要宣誓效忠领袖和忠于法西斯精神。^②

同年11月，图拉蒂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清党运动，把对法西斯统治怀有异议或与墨索里尼争权的极端派分子清除出党。据图拉蒂1927年11月8日向法西斯大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在清党的头一年里，有大约2000名“大小领导人”和3万名普通党员被开除出党，有的判了刑。据费利切搜集到的资料估计，在图拉蒂任法西斯党总书记的3年中，被开除出党者约5.5万至6万人，占1925年底法西斯党党员总数599,988人的10%左右。

在清党过程中，同时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号召人们加入法西斯党。它的党员人数急剧增加：1926年底猛增至937,997人；1927

^① 史密斯：《墨索里尼》，第202页。

^② 坎伐洛罗：《现代意大利史》第9卷，第141页。

年底上升到1,034,988人。在以后的两年中，虽然新党员人数仍在不断增加，但由于自发退党者约为10至11万人，所以到1929年底，党员总数仍为1,051,708人。^①党员的成分发生了明显变化，许多1921—1922年入党的老的极端派分子被开除出党；党员中工农比例减少，职员，特别是各级政府官员的比例增加。^②

经过清党运动，尽管法西斯党内仍然存在着派系斗争，但它一直牢固地控制在墨索里尼手中。意大利史学家焦尔焦·坎伐洛罗指出：“（法西斯）党事实上已变成领袖实现其愿望的工具，而不是对（法西斯）政权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调停和监督的机构”。^③

到1929年底、1930年初，随着经济危机的出现，全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法西斯党内从上到下的离心倾向和不满情绪也大大增强。形势逼迫墨索里尼作出让步。1929年9月9日，他突然改组内阁，宣布把自己兼任的8个大臣职位中的7个交给亲信担任。他本人除担任政府首脑外，只兼任内政大臣一职。正象陶里亚蒂说的那样，无论如何，“法西斯主义不可能再放弃极权主义的道路，极权主义已经变成它的一种需要”。^④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有所变化。“1926年、1927年和1928年的极权主义不是1931年时的极权主义。这种变化是由于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化和意大利的经济危机引起的”。^⑤

第四节 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构成

法西斯主义最初产生于意大利。然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① 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3卷，第187—188页。

②③ 坎伐洛罗，《现代意大利史》第9卷，第142页。

④⑤ 陶里亚蒂，《法西斯主义的教训》，第36页。

束，在意大利正式组成法西斯政党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它并没有提出比较系统的政治、理论观点，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确定的思想形态。法西斯主义不是先有一种学说，一种政治信仰，吸引着人们；它起初是被法西斯主义者当作一种进步的标记，一种夺取权力的手段，用来争取群众，扩大影响的。它接受当时各种思潮的影响，鼓吹一些纯粹着眼于利害得失而随时可以变换的政治要求和口号。直到1921年11月法西斯党罗马代表大会之后，它的政治、思想观点才逐步系统化。

法西斯政权建立前，法西斯党前后有过三个纲领。1919年6月经过修改而正式公布的战斗的法西斯的第一个纲领，基本上是吸取以至抄袭左翼的一般民主要求以及某些激进的反资本、反封建、反教会的社会经济要求。这些激进的主张，在1920年5月的第二个纲领中已被删除，换上了“对目前的(国家)制度不抱任何成见”的改变政治方向的表白。它一面宣称，“抵制和反对政客式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堕落”，一面给资产阶级戴上桂冠，说什么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劳动的资产阶级已成为发展进步和实现关系到民族命运伟大胜利的宝贵的和不可缺少的因素。”1921年11月改名国家法西斯党时通过的第三个纲领，突出了极端民族主义倾向，表示要重振古罗马帝国的霸业。它强调所谓意大利“要实现自己历史上的完全统一”，“行使地中海拉丁文明之堡垒的职能”，“重视地中海和海外的意大利殖民地”，而在经济领域，则要“绝对摒弃国有化、社会化、市政化”。

墨索里尼为30年代出版的《意大利百科全书》第一版亲自写过一篇《法西斯主义》的特长辞条。尽管卖弄词藻，谬论百出，它总算是这位法西斯主义的鼻祖自己对法西斯主义所作的系统概括，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赋予法西斯主义以一种理论的形态。墨索里尼自己也承认，“法西斯主义不受预先在写字台上制订出来的学说的支配；它产生于行动的需要，而且本身就是一种行动。”

墨索里尼在《法西斯主义》这个辞条中概述了法西斯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产生，涉及法西斯主义的道德观、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以及对人类前途和发展的看法。他宣称，“法西斯主义坚决否定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或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基础的那种学说”，“给予整个民主主义思想总体以严重的打击”，“对自由主义学说，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①他大言不惭地说，“如果说19世纪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时代”，那么，“可以认为，20世纪是一个权力的世纪，一个右派的世纪，一个法西斯世纪”。

我们现在简要地回顾法西斯这个词的由来以及法西斯主义的主要观点和渊源。

法西斯一词的由来

“法西斯”这个词从它出现到1922年法西斯政权在意大利建立，其含意几经演变。

法西斯最初来自拉丁文“Fasces”。古罗马时期，国家大权掌握在独裁官、执政官和大法官手中。他们的权势很大，出游总是分别由24名、12名和6名扈从跟随。这些扈从每个人都举着一个中间插着一柄突出斧头的棒束^②，名曰法西斯。它是象征有权对违背其意志者处以鞭笞或死刑的特殊标志。

墨索里尼最初倡导法西斯运动，并非取自拉丁文“Fasces”，而是取意大利文“Fascio”。后者的意思是“协会”或“联盟”。上世纪末，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新兴的意大利工人阶级开始组织起

^① 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辞条摘译，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10期。

^② “棒束”在古罗马时期名曰“法西斯”，其形状是一捆削得整整齐齐、粗细和长短均相同的圆棍，中间插一把板斧，外用红绳紧系。

来。有的地方建立的工人组织就以法西斯(Fascio)命名。有的定名为工人法西斯。^①

1884年，意大利爆发经济危机。为渡过难关，政府决定增加捐税，中断同法国的贸易关系，这造成靠向法国出口硫磺和农产品为生的西西里岛的硫磺矿矿工和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困。他们自发地举行示威，抗议政府采取上述措施。1890年，博斯科、维洛、蒙塔尔托和巴尔巴托^②等人把自发的工农运动联合起来，建立西西里劳动者法西斯。它提出了一个反映工农要求的提高工资、取消苛捐杂税和改善劳动条件的革命性的纲领，对工人、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分子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到1893年底，会员达30万人。有些地区参加劳动者法西斯的人数之多令人震惊。如科尔莱奥内市只有17000居民，而加入法西斯组织的多达6000人；皮亚纳仅有居民9000人，加入法西斯组织者就有3500人。^③许多法西斯基层组织把社会党的红旗作为自己的标志。不久，西西里劳动者法西斯遭政府镇压而被迫解散。它在意大利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那以后，法西斯成了革命的代名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0月5日，力主参战的米兰工会领导人戴齐奥·巴奇、工团主义领导人米凯莱·比昂基和切萨雷·罗西等10人在米兰建立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④性质的法西斯组织——国际行动革命法西斯。1915年1月1日，墨索里尼加入这个组织，将其更名为革命干涉行动法西斯。当时墨索里尼刚刚脱离社会党，他本人仍然以社会党左派领导人自居。他很容易容

① 工人法西斯(Fascio Operaio)可译为工人协会。它是1889—1891年屠拉梯建立社会主义联盟之前，在米兰等地建立的工人阶级组织。详见坎代洛罗，《意大利近代史》第6卷，第376—377页。

② 这几个人都是社会党党员。

③ 格莱利，《大资本与天主教右派》，第113页。

④ 引自国际行动革命法西斯1914年10月5日宣言，全文见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1卷，第679—681页。

易会仿效西西里劳动者法西斯的做法。1915年8月墨索里尼应征入伍，这个革命干涉行动法西斯就自行消失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墨索里尼于1919年3月23日在米兰建立新的组织，仍以法西斯命名，称为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他仍想以法西斯的革命含意争取工农群众，重新获得社会党广大党员的支持。^①

在1919年11月大选中，战斗的法西斯遭到惨败。墨索里尼“放弃了社会主义的调子”，开始与地主和资产阶级结合，在城乡广泛进行暴力恐怖活动。这时，法西斯一词的含意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暴力恐怖的同义语。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议会正式宣布，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为敌。^②他做起重新恢复古罗马帝国霸业的迷梦，把法西斯一词的由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墨索里尼认为，“棒束”标志既用来向法西斯分子灌输古罗马帝国的好战精神，又可以此说明法西斯是一个生死与共的整体，强调“一致”与“纪律”，凡是有不一致或违犯纪律者，立即绳以斧钺。墨索里尼利用战后在意大利广泛出现的强烈怀念古罗马的情绪，强化他在法西斯运动内部的权力，为日后对外侵略扩张和实行极权独裁统治寻求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

1921年11月7日，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在罗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更名为国家法西斯党，将“棒束”定为党徽。^③作为一种国际范围的历史现象，法西斯与暴力恐怖、极权统治和侵略战争联结在一起。德、日、意法西斯的首领成为第二次世界

① 彼得罗·费代莱主编：《UTLET大百科全书》《墨索里尼》辞条。

② 1921年6月21日墨索里尼在议会的第一篇演说，载维·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123—126页。

③ 1926年12月，法西斯政权颁布一项法令，规定将“棒束”作为国徽图案的一部分。

大战的罪魁祸首。法西斯主义也就成了遗臭万年的罪恶的同义词。

主要理论观点

如前所述，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的法西斯主义，是伴随法西斯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它为“行动的需要”披上思想的、理论的外衣，因而不能不是东拼西凑的若干概念的集合体，没有一个严谨的科学的体系。大体说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方面最主要的表现，是极端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和职团主义。

关于极端民族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出自墨索里尼的手笔。他写道：“古罗马的传统是一种力量的概念。在法西斯主义的学说中帝国不但是领土的或军事的或贸易的表现，而且是精神的或道德的表现。”“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帝国的倾向，即各民族扩张的倾向，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而其反面，或守在家里，则是一种没落的标志。新兴的或复兴的民族是帝国主义者，正在死亡的民族是放弃自己利益的民族。”^①很显然，这是公然声言扩张有理，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极其露骨的谬论。

在意大利，这种狂热要求侵略扩张的极端民族主义由来已久。它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深刻原因。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1861年意大利王国建立，意大利长期陷入四分五裂、内争不息的局面，一直是强邻逐鹿的战场。这种任人欺凌、国家贫弱的状况，引起各个阶层都程度不同地滋生着对昔日罗马盛世的怀念，出现了“大罗马主义”的思想。当意大利致力发展资本主义，特别是当现代化大工业兴起的时候，世界已几乎被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意大利本国资源的贫乏和国内市场的狭窄，使

^① 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百科全书》辞条。

意大利资产阶级，尤其是垄断资本强烈要求对外扩张，争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占有殖民地及势力范围。实际上，自意大利于1870年实现统一，它的民族主义思潮已经逐步包含着泛意大利运动、军国主义情绪和对战争的渴望。民族主义者历来都把东非和北非作为意大利所要攫取的地盘。1887年和1895年，意大利曾两次派兵入侵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结果都遭失败。在1896年著名的阿杜瓦战役中，意军死伤6500人，被俘2500人。意大利被迫于同年10月在亚的斯亚贝巴签订和约，承认阿比西尼亚的独立和主权。一批民族沙文主义者趁机掀起民族主义狂热，建立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①大肆宣传战争，并推动政府于1911年发动了侵略利比亚的意土战争。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墨索里尼的世界观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意大利全国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再次出现民族主义浪潮，对英法背弃伦敦密约的许诺，拒绝满足意大利领土要求，表示强烈不满。有相当一批政治家和社会名流主张修改凡尔赛条约。墨索里尼把修改条约的主张推向极端，作为争取和动员民众的重要手段。他发誓要建立一个囊括红海、地中海和巴尔干的法西斯大帝国。在法西斯政权建立后，墨索里尼一再号召青年人要保持“罗马子孙的好战精神”，^②恢复意大利“古代的光辉业绩”。^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把全国上下从三岁幼儿至古稀耆老都纳入一个严密的组织网。^④

^① 旧译“国家主义党”，法西斯政权建立后于1923年2月26日并入国家法西斯党。

^② 转引自阿里格·佩塔科：《倍受欢迎的军装》，载1980年4月19日的米兰《晚邮画报》。

^③ 转引自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176页。

^④ 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规定：3至5岁的幼儿入“幼稚园(Asilo)”；6至8岁的儿童入“狼子团(Figli della Lupa，相传罗马建国者罗慕拉斯王曾由一母狼哺乳而生存)”；8至14岁的少年入“巴利拉”(Ballila，相传巴利拉是热那亚的13、14岁儿童，当奥地利进攻热那亚，形势十分严峻时，他正在敌方炮队附近玩耍，用泥沙迷住炮手的眼睛，调转炮口向敌阵连发数炮，炸死奥军总司令，敌军大乱，意军乘机进攻取得

作为法西斯统治体制最本质的特征，极权主义这个概念，是墨索里尼在夺取政权后发展了国家至上的观点，于1925年首次提出的。后来他写道：“法西斯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就是关于国家的性质、任务和目的的观念。对于法西斯主义来说，国家是绝对的。个人和集团只有置身于国家之中才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在法西斯主义者看来，一切都存在于国家之中，在国家之外不存在任何有人性或精神的东西，更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主义是极权主义”。^①所以极权主义首先是一种国家观，鼓吹国家高于一切，否认在国家之外存在着个人和集团的利益。

墨索里尼强调，“法西斯国家是独一无二的，是一个独出心裁的创作”。“整个民族参加相应组织的一切政治、经济、精神力量，都能在国家内进行活动。”他说，“在国家之外既没有个人，也没有集团(政党、团体、工会、阶级)。因此，法西斯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顽固地坚持阶级斗争的历史运动，不愿使各阶级在同一种经济和道德现实中调和起来的国家统一。”^②用国家法西斯党的第一个纲领中的话来说，“国家是至高无上的，就连教会也不能并且不应损害或削弱这种至高无上性”。^③由此可见，墨索里尼的极权主义就是宣扬国家是超阶级的、无所不包的，它拥有无限制的绝对权力，无论是个人或集团(按墨索里尼的解释包括政党、团体、工会、阶级)都必须服从于这种绝对权力，遵照这种绝对权力的意志而行动。他的这种思想在法西斯党第一个纲领中已经有所表露，而在执政后系统化。

胜利)，14至18岁的青年入法西斯“先锋队(Avanguardista)”，18至21岁的青年入“法西斯青年团(Giovane Fascista)”，21岁以上的人加入法西斯党，凡不加入者不予分配工作。

① 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辞条。

② 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辞条。

③ 1921年11月7日通过的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纲领》，全文见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131—137页。

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国家”，照他自己说，“是一种权势和绝对权力的意志”。这种国家意志，照他的实际思想，是指法西斯政府首脑的个人意志。所以他推行极权主义就必须同时推行领袖原则，强调服从和纪律。国家法西斯党的党章明确规定，“国家法西斯党是一个执行领袖命令、为法西斯国家服务的志愿民兵组织”，每一个法西斯党员都要“宣誓执行领袖的命令”，为此要“不惜流血牺牲”。^①领袖原则，在全国范围，是突出墨索里尼个人，集党、政、军大权于墨索里尼一身，使他居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在各地区和各个部门，同样实行这项原则。法西斯党党章规定，区域性组织或小组，各由领袖一人独断专行。^②

法西斯党还在“国家至上”的幌子下，宣扬职团主义，^③提出建立所谓超阶级的职团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劳资和平相处，由一个具有君主和主宰者特征的“领袖”领导，取消阶级和阶级斗争，“向祖国领土以外去扩张”。^④

职团制渊源于民族主义和工团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全国出现民族主义的浪潮，又有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者急剧增加，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更加贫困。法西斯领导集团据此提出意大利要改变国弱民穷的状况，增强国力，就必须以“能力斗争”代替“阶级斗争”。^⑤也就是说，同一行业的劳资双方要“团结一致”提高生产能力，共同与其它行业的劳资双方进行“能力斗争”，而不是在本行业的劳资双方之间进行“阶级斗争”。“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整个生产是统一的，生产的目的是统一的”，^⑥因此，

①② 1938年通过的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党章(1943年进行修改)，全文载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4卷，第826—837页。

③ 职团主义，一译“组合主义”。

④ 罗科《阿尔弗雷多·罗科政治论文与演说集》第1卷，第22页。

⑤ 山口正太郎：《意大利社会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05页。

⑥ 法西斯《劳动宪章》(Carta del Lavoro)，全文载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3卷，第542—547页。

意大利应举国一致与外国进行斗争。这被称为职团主义。法西斯主义者也称它是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职团分纵横两个系统。纵的系统是指劳动者与雇主按行业建立劳动者职团联合会和雇主职团联合会，在全国形成劳资两个体系。横的系统指劳动者和雇主按工业、农业、商业、运输业、金融业、艺术与自由职业以及海洋与航空业各自组成全国性劳资联合职团协会。它们在全国职团委员会^①的领导下，控制各行业的职团组织与职业介绍，确定各行业的劳动条件，解决劳资纠纷。这些各式各样纵的横的具有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凑在一起，就构成所谓的职团国家。其实，这是法西斯用职团制的办法对国家实行法西斯极权制统治，严密控制各阶层人民。对此，法西斯理论家、曾任内阁职团大臣的朱·博塔伊在其所著《职团国家》一书中也直言不讳。他说，“人们若以行业组合的国家，只做劳资的合作，这就小看它了。实则除使劳资合作之外，它更能使往日攻击国家的圣笛卡（即工团主义），转而共同拥护国家主权至上”。^②

职团主义的外壳是“消灭”资本主义，推动劳资合作，实行利益分配制。这对于几百年来习惯于妥协和回避现实的意大利劳动者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实质上，职团主义是法西斯政权用来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职团制既未改变财富的分配，也没有消灭阶级和阶级冲突。墨索里尼除了用以吸引和欺骗工农群众外，还有一个特定的目的，那就是利用群众力量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来与大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平衡；又以此维护国家政权和垄断资本对全国经济生活的支配，以确保领袖，也即墨索里尼本人在意大利实行极权独裁统治。

1932年以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也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鼓

^① 自1926年7月起，法西斯内阁中设职团部，最初由墨索里尼自任该部大臣。

^② 转引自刘文岛著《意大利史地》，第193页。

吹意大利人是高贵人种，纯粹的雅利安人的嫡系。法西斯大委员会于1938年10月6日发表开展排犹运动的《种族声明》，“禁止男女意大利人同其他非雅利安种族的人”、甚至“包括雅利安人种在内的外国人结婚”。法西斯主义者妄图以此来保持意大利人的所谓‘优等民族’的“纯粹”性，证明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求生存空间”，拥有向外进行扩张的权力。^①

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渊源

法西斯主义的来源可以说是多渠道的。它不仅受到古罗马帝国对内专制独裁、对外侵略掠夺的思想影响，而且受到马基雅维利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索勒尔(Sorell)的暴力主义和费希特的大日尔曼主义等影响。其中尤以新黑格尔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影响最大，可视为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黑格尔主义在意大利颇为流行。这同当时政治形势有着自然的联系。意大利王国统一后，后起的意大利资产阶级苦于缺少殖民地、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急于寻求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以便从精神上武装起来，从事奴役独立民族和夺取霸权的战争。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的垄断资产阶级一方面对巴黎和会的分赃不满，另一方面为避免资产阶级政权的覆灭，迫切需要强化国家机器，需要这种哲学，借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支持其准备和进行侵略战争的政策。法西斯主义兴起后，即依靠新黑格尔主义，力图从理论上来论证自己的思想。

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要代表者是B·克罗齐和G·真蒂莱。他们在资本主义全面危机日益深化的情况下，用“国家至上”的理论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辩护，也为法西斯主义首先在意大利

^① 罗科：《阿尔弗雷多·罗科政治论文与演说集》第1卷，第22页。

兴起作了一定的舆论准备。

克罗齐的社会伦理思想，特别是他的“整体”哲学，为法西斯所利用，成为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的来源之一。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论就来自克罗齐的整体哲学和他推崇的国家学说。克罗齐把资产阶级国家绝对化，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意志、有道德、有人格的精神实体，个人唯有在国家之中，将“小我”与作为公意的“大我”统一起来，自觉地服从国家，才能在道德上实现“自我”，达到“真我”，并获得真正的人格。在他看来，人要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就必须把自己投身于国家之中，做国家这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服从国家的需要，否则个人就根本不存在。”^①这种观点，在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贝·斯温塔等人就曾吸收黑格尔思想中关于“伦理”国家的观念而提出过。他与克罗齐所说国家是个“有机整体”，国家是个人“真我”的观点是一致的，其目的就在于把资产阶级国家神圣化，要人们忠诚于它，并为它牺牲一切。

显而易见，克罗齐整体哲学的理论在这里直接通向了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的“个人是国家的一部分，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否则个人就根本不存在”；^②个人要通过“牺牲自己的特殊利益，甚至献出生命，来获得全面体现其人的价值的精神生活^③”的观点，显然是同克罗齐的观点一脉相承，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宣扬国家至上而完全否定个人的权益。法西斯主义提出的“民族是个至高无上的道德范畴，也即民族是个包括无数代人、而个人则不可能永存于其中的有机整体”；^④“个人的独自的价值和与其他个人所共有的价值，应当在其所隶属的民族的范围之内得到鼓励、发展和保护”^⑤的说法（在法西斯主义者看来，民族亦即国家），也与克

① 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正中书局1948年，第104页。

② 史密斯：《墨索里尼》，第243页。

③ 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辞条。

④⑤ 1921年11月7日罗马代表大会通过的《国家法西斯党纲领》，载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第131—137页。

罗齐的观点有着直接的联系。也许正是这些原因，直至1924年，许多法西斯分子都称颂克罗齐是法西斯运动的“先驱”。^①

法西斯上台执政前后，克罗齐曾从理论上为其暴力行动进行过辩护。他声称“法西斯运动表达了民族感情”，说它“对颠覆性危险做出的尽管是暴力的、却是理所当然的反应”。^② 克罗齐鼓吹新黑格尔主义，尽管他本人无意为法西斯主义开路，实际上却为法西斯主义所利用。对于法西斯政权，克罗齐作为参议员直至1924年马泰奥蒂事件时都投票支持墨索里尼政府，但没有与它合流。他先后拒绝了墨索里尼向他发出的担任教育大臣和科学院院长的邀请，并于1925年倡导发表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给了法西斯政权以很大打击。

乔瓦尼·真蒂莱(Giovanni Gentile)的情况与克罗齐不同。他是墨索里尼第一届内阁的教育大臣、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和法西斯教育家。法西斯主义的许多理论都与他有关。有人说他是法西斯主义的“先行者”，甚至还说，“在政治的法西斯主义之前，已有一个知识的法西斯主义，唤起了青年的精英”，^③ 以此来形容真蒂莱对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之大。

真蒂莱对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主要在于他鼓吹黑格尔的精神主义，把黑格尔的国家崇拜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把“绝对精神论”转化为法西斯主义的“主宰者论”，也即“绝对精神”的主宰者。真蒂莱把“超经验的我”看成是他的哲学的最高原则。他认为，“超经验的我”“产生一切”、“规定一切”，它的体现就是一位杰出领袖人物的意志，这位领袖人物集中表现了国家与民族的普遍精神。他受命于天，绝对正确和永远正确。^④ 在这位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面前，每个人的义务就只能是：“信任、服从

①② 阿门多拉：《法西斯主义与工人运动》，罗马1975年版，第230页。

③ 转引自刘文岛：《意大利史地》，第167页。

④ 彼得罗·费代莱主编：《UTET大百科全书》，都灵1970年版，《真蒂莱》辞条。

和战争”。^①这就是真蒂莱的“领袖主宰论”，也即法西斯的“领袖原则”。这一理论宣扬墨索里尼是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主宰者，成为所有公民都必须服从“领袖”的理论依据。

真蒂莱竭力为墨索里尼开脱，支持其“关于战争和帝国的扩张具有恢复实力作用”的观点。他认为，“残暴是意大利人的性格特征，也是法西斯主义在拯救(国家的)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②他用那套赋予国家元首以神圣的、无比强大威力的理论为墨索里尼效力，说墨索里尼“是天才的领袖。因此，他的命令必须服从”。^③为墨索里尼独揽权力于一身帮了大忙。

法西斯主义的另一重要来源是马基雅维利主义。

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是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极力主张在意大利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强调君主必须拥有无限权力，成为“一个领袖、一个理想统帅的象征”。^④只有如此，才能内使臣民服从，外御强敌入侵。他宣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权术政治，提出只要有助于个人的统治，君主必须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如何去采取“违背真理、违背博爱、违背人道、违背宗教”^⑤的残暴、奸诈、伪善、谎言和背信弃义等手段。马基雅维利认为，一个聪明的君主要想维持其独裁统治，就要“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只顾“国家”，不恤人言；^⑥要以“尽数铲除”的恐怖主义手段去铲平贵族、肥民、瘦民、贱民各阶级。在行动中，“既有狮子的凶猛，又有狐狸的狡猾”，^⑦才能使所有人害怕和尊敬，才能成为主宰者。这就是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它与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和领袖原则有着渊源联系，为墨索里尼所效法。

①②③ 史密斯：《墨索里尼》，第203、230页。

④ 转引自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

⑤ 昆廷·斯金那：《马基雅维利》，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⑥⑦ 费代莱主编：《UTET大百科全书》，《马基雅维利》辞条。

墨索里尼对马基雅维利很敬佩，称赞他是意大利“最伟大的思想家”，手中“握有一把能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钥匙”。^①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对墨索里尼的世界观有着很大影响。墨索里尼认为“人性深不可测，无利他主义或理想主义可言”、“人都是极端自私的”^②等观点，均与马基雅维利是一致的。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民兵，进行暴力行动，将反对党“尽数铲除”等手段，都可以说渊源于马基雅维利主义。

马基雅维利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还表现在唯灵论的宗教观方面。马基雅维利虽然经常说，“国家高于教会”，但他把宗教看成是一个补充理想缺乏的机器。他认为，当民众缺乏理性不能了解法律的时候，“总是归顺于天”。说穿了，就是说，信教的民众易于统治。法西斯主义接受这种唯灵论，宣布“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宗教观”。^③其目的在于要求人们通过牺牲自己甚至生命，来实现他作为人的价值所具有的纯精神存在，获取“毫无阻力地主宰人心的权力”；^④也就是所谓“人是通过其与最高教义和一种客观意志的内在联系来认识的”，而“这种客观意志超越个别的人，使他上升为宗教社会自觉的一员”。^⑤这从形式上似乎在宣扬“宗教神圣”，实际上仍然是要归结到“国家至上”的极权统治。

法西斯主义接受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唯灵论还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意大利是个具有一千多年宗教史的国家，全国85%以上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墨索里尼为吸引群众和支持者，于1920年公开宣布放弃反教权主义的主张。唯灵论的宗教观念是人们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实利主义作出的理想主义反应的具体体现，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欧洲到处流行宗教性的神秘愿望这一现象的反映。宗教，或者说人们对某种虚无飘渺之物的追求成为摆

① 史密斯：《墨索里尼》，第180页。

② 史密斯：《墨索里尼》，第180页。

③④⑤ 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辞条。

脱充满失望的生活，解决日益加深的危机的唯一灵丹妙药。法西斯主义提倡牺牲个人，要求个人融合在整体之中，也就是要求放弃个性，这是所有宗教的共同要求。

当然，法西斯主义也意识到，不能把它的政治学说与唯灵论混为一谈，不能把生活的中心完全置于人类之外。唯灵论也需要与行动主义统一起来。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实用主义。

第三章

德国纳粹党的纲领和派别

在关于德国法西斯的研究中，国内外史学界相当重视对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纳粹党或民社党)性质问题的探讨，长时间以来存在着很不相同的看法。近年中国学者认为，判定纳粹党的性质，既要考察该党与各阶级、阶层和权势集团之间的关系，又要考察纳粹党本身的状况，特别是该党内部派别斗争的演变。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将会深入一步，也更加全面。当然，对这个问题仍然存在着论争。

第一节 二十五点纲领的主导倾向

二十五点纲领是早期纳粹党政治主张的集中表现。它汇集了戈特弗里德·弗德尔、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希特勒、迪特里希·埃卡特、安东·德雷克斯勒等人的不同主张^①，于1919年底

^① 托马思·奇尔德斯，《纳粹投票人，1919~1933年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1919~1933)，北卡罗里纳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由大学讲师、该党理论家弗德尔和党主席德雷克斯勒执笔起草，后经希特勒修改而问世。1925年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曾经宣称，这个纲领是“不可变更”的，它将是“未来国家的基础”。长时间内，在纳粹党的党内斗争中，斗争双方都极力以维护这个纲领作为斗争的手段，都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修改纲领作为斗争的目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它的权威性。

在我们对纳粹党的二十五点纲领进行剖析时，首先必须揭示它产生的背景。

纳粹党及其纲领产生的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战争本身又进一步激化了这些矛盾。大战后期和战争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反资本主义的浪潮。其主流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体表现在俄国十月革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然而，在主流之外还有各种支流，其中包括小资产阶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封建复辟运动的衍生物“封建的社会主义”思潮，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尝试。

事实上，民族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反资本主义倾向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正是在一次大战临近结束时，即纳粹党问世以前，已在中欧德意志人居住区兴起。1918年4月间，奥匈帝国境内原已存在的德意志工人党(1904年建立)，在鼓吹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瓦尔特·里尔和鲁道夫·容格的主持下恢复活动，并改名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Deutsch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以卐字作为标识。1919年，容格出版了《民族社会主义，它的成长和它的目的》一书，试图创立民族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①奥匈帝国瓦解后，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分成奥地利和波希米亚两个分支，分别由里尔和容格领导。它们为了协调和统一各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联合成立了一个国际局，并极力敦促德国的类似组织参加活动。②

一次大战对德国社会的影响尤为深刻。由于德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起步较晚，大量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存在，加上处于战败的条件，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暴露得更为充分。具有浓厚军国主义传统的德国，本来军人一向在社会上拥有较高的地位，但一次大战后被迫裁军，大量退伍军人从昔日的光荣圈中跌落下来，在经济凋蔽就业困难的情况下成了无业流民。他们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凡尔赛条约的严厉制裁和惩罚措施，使德国民众原有的民族自负心理和一部分德意志人的种族主义情绪，恶性地膨胀起来，孕育出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乃至疯狂向外扩张的心理。凡此种对现状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要求，都推动众多的德国人投身政治活动，纷纷从各自不同阶层的利益和政治理想出发，试图改变现存社会。于是，借着魏玛共和国初期政局动荡不安和具有一定结社自由的机会，各种政治团体和党派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纳粹党的前身德意志工人党就是其中的一个。

德意志工人党(Deutsche Arbeiterpartei)的创建人是慕尼黑机车厂机工安东·德雷克斯勒。1918年3月，他以本厂同事为主要成员，成立了一个名为独立工人委员会的团体。这个三、四十人的组织，要求把犹太人和外国人排除出德国，并建立一个超阶级的社会以拯救工人群众。③同年秋，德雷克斯勒同报社记者

① 马克斯·凯利：《纳粹分子与工人，民族社会主义者向德国工人呼吁，1919—1939》，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页。

②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北京出版社中译本1986年版，第50页。

③ 罗伯特·威斯特里希：《纳粹德国名人录》纽约1982年版，第57页。

卡尔·哈勒一起组建了政治工人集团(Politische Arbeiterzirkel),由哈勒担任主席。这个人数受到严格控制的半秘密性社团,虽然频繁聚会讨论时局,但大多是由哈勒作长篇发言后其他人议论一番,形式单调而又流于空谈。^①德雷克斯勒感到这种活动方式最终会一事无成,遂要求以该集团的政治观点为基础,正式组建一个政党,以便吸引更多的成员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斗争。崇尚半密谋性活动方式的哈勒反对这一主张。多数成员支持德雷克斯勒的意见。于是1919年1月,独立工人委员会和政治工人集团合并,在种族主义社团图勒协会^②的活动中心成立了德意志工人党^③。随后又组成了由两名主席(哈勒和德雷克斯勒)、两名书记和两名司库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德意志工人党没有正式的纲领,^④但德雷克斯勒在几次讲话中宣布过它的目标和方针,主要内容如下:

“德意志工人党是一个由一切脑力和体力劳动的民族同志(Volksgenossen)组成的社会主义组织,它只能由德意志领袖人物领导,他们置一切私利目标于不顾,把民族需要作为最高纲领使命。”

“德意志工人党希望德意志工人成为贵族。熟练工人及本地工人有权成为中等阶层成员。……只要大资本不对工人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使工人能过一种体面的生活,它必须作为面包与工作的施与者受到保护。”

① 迪特里希·奥朗:《纳粹党史》第1卷,1919—1933年,美国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12页。

② 图勒协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莱比锡出现的日耳曼图勒教派的分支。图勒教派属于美化战争的种族主义社团,崇拜西北日耳曼人的战神和死神伏丁。1918年夏天,鲁道夫·冯·赛鲍腾道夫男爵在慕尼黑建立图勒协会,宗旨是:“为反对国际主义和犹太人而斗争”,吸收“三代纯血统”的德意志人,建立一个德意志国家。会员约有200多名。

③ 约翰·托兰:《阿道夫·希特勒》,纽约1976年版,第86页。

④ 奥朗:《纳粹党史》,第11页。

“德意志工人党认为，德意志经济生活的社会化意味着德意志国民经济的崩溃……所以不该称作社会化，而应称作由德意志工人参加分红。”

“德意志工人党全力反对高利贷者和乘机抬高物价者。”“熟练工人不应感到自己是无产者，而应是中等阶层具有相同地位的国家公民……提高手工业者的地位，应该以大资本为代价，扩大和巩固中等阶层。”^①

此外，还鼓吹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学说，反对犹太人，结束阶级斗争等等。^②

十分明显，在德雷克斯勒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正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的要求和民族主义的倾向，而且前者尤为强烈。

1919年9月，怀有政治野心的希特勒加入德意志工人党，立即推动该党就党的名称、党纲和组织结构等方面作一番改造。1920年2月24日，在德国慕尼黑宫廷啤酒馆宴会厅一个近二千人的集会上，由希特勒宣布了德意志工人党的二十五点纲领，同时宣布将党名改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在原党名前加上“民族社会主义”一词，无疑同前述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波希米亚的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努力有关。德雷克斯勒在组建德意志工人党时就曾提议在党名中加上这个词，被多数党员否决。此时希特勒支持了德雷克斯勒的意见。在党名中，德国的与其他两国的党都用了“Nationalsozialistische”(民族社会主义)一词。但在实际宣传中，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党，强调它们所信奉的是“nationaler Sozialismus”，德国的党强调的是“Nationalsozialismus”。对此，德国党机关报

^① 魏纳·马瑟尔，《反对共和国的暴动——纳粹党早期史》，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乌尔泰因·萨赫布赫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151页。

^② 威斯特里希，《纳粹德国名人录》，第57页；托兰，《阿道夫·希特勒》第86页。

《人民观察家报》1923年曾发表文章，说明两者之间的差异：nationaler Sozialismus实际上意味着强调“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是该报使用的概念，从其内容看主要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而Nationalsozialismus则强调两个概念不可分割，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制度。^①

按照这种解释，德国党的民族社会主义意指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和犹太人的世界，一个据说是德国特有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即德意志社会或民族社会或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②这种倾向于更加强民族主义的解释，在希特勒那里就变得更加直截了当。1922年7月28日，希特勒在一次演说中说道：“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民族利益之上的理想；任何人只要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东西高于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③

显然，希特勒所解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民族主义加极权主义，而且只是“民族主义”的从属和补充。但是，以施特拉瑟兄弟为代表的另一些党员，却强调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要求（即所谓“社会主义”）的一面。1920年10月，奥托·施特拉瑟曾对希特勒说：“民族社会主义是由两个词汇组成的，其重点是‘社会主义’一词。……根据德语的语法，组合词的第一个词是第二个词——主要概念的修饰词。”^④

总之，纳粹党的二十五点纲领，正是在一次大战结束前后，

① 凯利：《纳粹分子与工人，民族社会主义者向德国工人呼吁，1919—1939》，第40、41页。

② 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7年版，第88页。

③ 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60页。

④ 诺曼·H·贝恩斯编：《阿道夫·希特勒讲演集》第1卷，牛津大学1942年版，第16页。

在资本主义制度处于动荡和危机之中，从德国社会中下层泛起的民族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倾向的背景下产生的。它虽然是一个粗陋地拼凑了各种不同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的大杂烩，但其极端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要求，却是十分明显的。我们将在下面对此作进一步的剖析。

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

纳粹党二十五点纲领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内容，包含着两层含意，其一为建立大德意志“民族国家”；其二为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实行对外扩张。反映这种民族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的条款，主要有：

第一点：“我们要求一切德意志人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大德意志帝国”。

第二点：“我们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和圣·日耳曼和约”。^①

第三点：“我们要求得到领土和土地(殖民地)来养活我国人民和迁移我国过剩的人口”。^②

这就是说，纳粹党不仅要求摧毁凡尔赛体系，而且要兼并处于当时德国管辖以外的所有日耳曼人聚居的地区，并且公然鼓吹取得所谓“生存空间”的扩张野心。

纳粹党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前者植根于后者，后者作为前者的一种思想支柱，构成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凡尔赛和约》即《巴黎和约》，全称《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1919年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英法美日意等国与战败国德国在巴黎西南凡尔赛宫签订。《圣·日耳曼和约》，全称《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奥地利和约》，1919年9月10日英法美等战胜国与战败国奥地利在巴黎附近圣日耳曼宫签订。这两个条约是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构成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最主要的安排。

② 路易斯·尤·斯尼德编：《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文献史》，纽约1981年版，第22—25页。

分。在二十五点纲领中与此有关的条款有：

第四点：“只有本民族同志才能成为公民。不分职业如何，凡是具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本民族同志”。

第六点：“只有公民才享有决定国家领导和法律的权利”。

第八点：“我们要求迫使1914年3月2日以来迁入德国的非德意志人立即离开帝国”。

第二十四点：“……反对国内外犹太人的唯物主义精神”。

它明确主张只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德国公民，而非日耳曼血统的德国人不仅不能“享有决定国家领导和法律的权利”，而且无权住在德国。很显然，这些条文正是为推行反犹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张目。

二十五点纲领中的第二十五点，“要求建立帝国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央政治国会及其一切机构拥有绝对权威”。强调确立“中央集权”和“绝对权威”，是为反对民主主义和实行极权主义的一种滥觞。在德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种反民主的极权主义要求，也是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对于一向崇尚权威、崇尚国家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来说，确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往往被他们视为振兴德意志民族以及实现他们的社会改革要求的希望。至于对德国统治阶级来说，极权主义不仅适应他们对付一次大战后出现的革命高潮的需要，而且也符合他们追求德国重返争霸世界舞台的民族主义的需要。

极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然而，它的具体的思想观点和政治要求，往往同时对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下层民众产生强烈的影响。就此而论，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并非资产阶级所专有。

德意志民族从公元10世纪起曾多次侵占和掠夺其它民族，形成了某种民族自负和民族优越感。但是，从公元11世纪起，德意志国家的政治分裂化过程加速发展，至16世纪上半叶已是邦国林

立。此后不久，俄罗斯人在东方建立了强大的沙俄帝国，英国和法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国力日盛；分裂的德意志民族处于强邻之间。这两种历史因素的结合，一方面导致在反拿破仑一世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形成一股统一德意志民族的强烈要求，随后发展成为一种泛德意志运动；另一方面则导致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的某种畸型的发展，形成一种所谓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其中自负、忿懣和恐惧渗杂在一起。

俾斯麦在统一德国的过程中，借助了这种德意志的民族沙文主义，同时又使它膨胀起来。19世纪末的德国，宣扬雅利安种族优越的意识形态层见叠出，以沙文主义为实质的“爱国主义”教育普遍推行。德国各阶层民众都深受影响。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追求欧洲和世界霸权的容克资产阶级把德意志的民族沙文主义推到顶峰。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不仅把威廉德国争霸世界的迷梦打得粉碎，而且使德意志民族套上凡尔赛条约的沉重枷锁。变化的剧烈超过了德国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尤其是以小资产阶级为核心的广大中下层民众，把一切贫困、匮乏、破产和失业等等各种失望与痛苦，都统统归结为“民族”的失败，因而民族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情绪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当然，追求对外扩张的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军国主义势力是这股社会思潮的中坚，而且争夺原料来源、销售市场和殖民地的经济动因，比之上述意识感情方面的动因更为持久和理性化。但这并不排除其他社会阶层在一段时间里更为狂热。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要求

二十五点纲领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要求，具有强烈的反垄断资本和反大地主的色彩，同时要求保存私有制，属于较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它体现在以下一些条款：

第十一点：“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打碎利息奴役制”。

第十二点：“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财的非法所得”。

第十三点：“我们要求对所有(到目前为止)已经组合起来的企业(托拉斯)实行国有化”。

第十四点：“我们要求参加大企业的分红”。

第十六点：“我们要求建立和维护一个健康的中产阶级，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公司充公，廉价租赁给小工商者，要求在国家和各邦区收购货物时特别照顾一切小工商者”。

第十七点：“我们要求实现一种适合我国需要的土地改革，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地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倒把”。

第十八点：“要求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商处以死刑”。

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较英法等国为迟，行会制度废除较晚，在轻工业等经济领域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小企业。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写道：“在德国，16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①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趋势，大垄断企业在经济生活中愈益占据有利地位，小企业在它们排挤下相形见绌。到1907年，雇佣50名工人以上的大企业尽管只占企业总数的0.9%，但占有的蒸汽动力和电力却达到3/4，而雇佣5名工人以下的小企业占企业总数91%，占有的蒸汽动力和电力却只有7%。^②

正因为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步晚而来势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排挤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大垄断企业排挤小企业的进程，比其他国家更为剧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府加强对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9页。

② 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页。

济生活的干预，垄断组织获得巨额利润，大量中小企业破产。特别是1916年12月《兴登堡纲领》颁布后，全国2000家织布工厂中，即有1900家被封闭。^①工人农民也因物价飞涨而承受战争的沉重负担。

战后在凡尔赛条约打击下，德国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从1920年4月到1924年3月，政府的2/3支出是通过滥发钞票和急剧增加债务来解决的。^②德国的批发价格指数从1920年1月至1922年7月（即排除鲁尔危机的影响）上涨了8倍。广大资金少、根基浅的中小企业在通货膨胀的打击下纷纷破产。

曾经作为德国“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本来就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它们具有强烈的爬上大资产阶级地位的愿望，但资本主义竞争的实际生活却经常把它们的大部分成员抛入无产阶级的行列。尤其是其中那些同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切关联的部分，如旧式手工业者和独立小农，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正日益失去其作为现代社会一个独立部分而存在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凡尔赛条约的压榨与束缚，更加剧了这一进程。

这些强烈追求出人头地、而实际连昔日“独立”地位也无法保住的小资产阶级民众，既强烈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又害怕废除私有制，难以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们用以取代现存制度的理想，只是一种带有封建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自耕农式的社会主义。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追求，同强烈的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相结合，就变成了一种追求没有阶级，没有犹太人的“德意志社会”或“民族社会”。二十五点纲领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要求，正是这种追求的政纲化表现。

^① 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2册，第132页

^② 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4年版，第20页。

必然的归宿

有一种观点认为，纳粹党二十五点纲领中反垄断资本的内容乃是欺骗和拉拢群众的手段。欺骗当然是有的，尤其是随着希特勒同垄断资本集团勾结的发展，二十五点纲领中的反资本主义内容就越来越成为骗取下层民众支持的空头支票。但是，如果仅仅以欺骗来解释一切，这当然是最省力不过的办法，但却是过于简单化了。恩格斯说得好：“……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①

其实，对于希特勒来说，在二十五点纲领中列入反垄断资本的内容，并非他本来的意愿。他在加入纳粹党前身德意志工人党之前，早已形成根深蒂固的民族沙文主义、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反共偏见。希特勒对纳粹党纲领的“贡献”，就是添加了民族沙文主义的条款。他曾回顾说，“当德国工人党尚系一不著名之小团体时，多数同志似乎不重视对外政策问题”。“如果这一小的团体要扩张活动范围，取得大团体之重要地位，极须注意对外政策”。^②因此，他在修改二十五点纲领时增加了民族主义色彩的内容，并突出“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要求，列为纲领的第一点。^③只是迫于党内的普遍情绪，希特勒未敢将德雷克斯勒和弗德尔起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条款贸然删除，但一有机会就试图修改或重新解释。1920年8月，希特勒在一次私下谈话时宣称党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1页。

^② A·希特勒，《我之奋斗》，国立编译馆1943年版，第301页。

^③ 康拉德·海登《德国国社党史》，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30、32、40页。

纲领决定得“过分仓促”，他认为产生财富的“工业资本”不应该予以打击。唯有犹太人的、国际的和来自国债的资本应予打倒。^① 1922年7月28日，他在演说中又把党名中的“社会主义”引向“民族主义”。

二十五点纲领的起草者德雷克斯勒也具有反犹思想和民族沙文主义情绪，但更主要的是追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致力于把“熟练的和定居的工人”从无产者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中产者，并认为“公务人员，小市民和工人中有几十万人由于不满他们原来的政党而变成政治上的无家可归者，从他们之中应产生一个‘全国中产者联合会’”。^②

二十五点纲领的另一个起草者弗德尔是“粉碎利息奴役制度”理论的积极鼓吹者。这一理论在反对国际垄断资本的同时也反对国内垄断资本。弗德尔在起草二十五点纲领期间曾发表演说，猛烈攻击国内的工业和金融资本家。他1924年当选国会议员，继续鼓吹没收不能赢利的大地产和犹太人的财产，要求冻结利率。1930年10月纳粹党向国会提出要求限制银行利率、无偿征用银行和股票交易所巨头（包括东方犹太人）财产的议案，就是他同施特拉瑟兄弟共同起草的。

对德雷克斯勒、弗德尔以及后来的施特拉瑟兄弟等人所反映和代表的那一派来说，二十五点纲领中的种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条款，是他们确确实实的追求，虽然这种追求就其社会性质来说是一种反动的空想。事实上，纳粹党内两个派别——希特勒派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之间的斗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同这一点有密切关系。我们在下面的章节中，将详细叙述这一斗争的进程。

总起来说，二十五点纲领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内容，符合德国垄

① 康拉德·海登《德国国社党史》，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30、32、40页。

② 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第38页；罗威斯特里希：《纳粹德国名人录》，第57页。

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要求。这为日后纳粹党投靠垄断资产阶级、成为其利益代表者确立了前提。其社会改革的要求，虽然使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感到怀疑和不满，但并未构成真正的威胁。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后德国出现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的形势下，这种反动而又混乱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具有抵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

在根本上，小资产阶级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其最终的政治归宿，不是投靠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便是转向无产阶级。纳粹党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和反共倾向，以及希特勒在其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使它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投向大资产阶级的方向。

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在监狱里口授《我的奋斗》一书，完全抛弃了二十五点纲领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要求，将自己原有的种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独裁主义和反共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和深刻化，试图在适当时机取代党纲。在1925—1926年党内斗争中，希特勒面临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的压力，出于策略考虑，曾宣布二十五点纲领永久不变。但不久他的地位巩固之后，又重新解释党纲，实际上否定了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要求；同时明确地向垄断资本家说明不得不从事反资本主义宣传的苦衷。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纳粹党扩大了“社会主义”宣传，赢得了大量的成员和选票，同时加紧同垄断资本和国防军拉关系，终于被统治阶级捧上了总理的位置。执政后，纳粹党很快将党纲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条款抛到九霄云外，同垄断资本更加紧密地结合，成为垄断资本和其他反动阶级实际利益的代表者。

第二节 纳粹党内两个派别的形成

纳粹党从它的前身德意志工人党时起始，党内就存在着不同思想政治倾向的歧异，后来形成以希特勒为首的主流派（也称慕尼黑派）和以施特拉瑟兄弟为首的激进派（也称北方派）。围绕对待二十五点纲领的不同态度，两派之间的纷争相当激烈。其结果以希特勒摧毁施特拉瑟兄弟的激进派而告终。这两派的矛盾和斗争过程，也反映了纳粹党性质的演变。

希特勒诈取纳粹党领袖地位

如前所述，德意志工人党的创建人安东·德雷克斯勒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曾在1918年1月发表《无产者国际的失效和兄弟团结思想的失败》一文，臆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于民族问题未能在理论上给以满意的回答。^①1919年1月5日，他在图勒协会鼓励下成立德意志工人党，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浓厚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倾向的熟练工人政治组织。这个党的改名为纳粹党和希特勒诈取领袖地位，是它的性质演变的开始。

1919年6、7月间，希特勒参加德国国防军慕尼黑第四分指挥部举办的宣教人员培训班。这个培训班每期约10天。希特勒学了两期，结识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其中就有图勒协会骨干分子戈特弗里德·弗德尔（1883—1941）。他们曾打算建立一个新党——社会革命党。同年9月，希特勒被第四分指挥部新闻宣教处处长卡

^① 格奥尔格·弗兰茨-维林：《希特勒运动。起源。1919—1922》，汉堡/柏林1962年版，第63页。转引自胡其鼎《希特勒》，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尔·迈尔上尉派往参加德意志工人党的集会，原意是为军方调查该党的政治倾向。具有政治野心而又擅于煽动人心的希特勒，很快成了德意志工人党的党员和该党委员会委员。他多次主持集会，进行演讲，吸引了不少听众。当时的德意志工人党全国主席哈勒，习惯于帝国时期秘密结社的活动方式，对希特勒这种大事张扬的做法感到不满，辞去主席职位。德雷克斯勒继任主席。希特勒担任党的宣传部长，开始取得实际领导地位。他参与制定《二十五点纲领》，并在1920年2月24日群众集会上宣布，同时将党名改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希特勒决心利用优势地位，按照自己的观点和目标来改造纳粹党。1920年4月1日，他由军队退役，在梯尔施街41号租了一套房子，开始全力以赴地从事党务活动。德雷克斯勒仍然在铁路上当钳工，对掌管党务力不从心。

希特勒意识到党的一种鲜明的标志和风格，对于煽动和吸引群众所具有的价值，便在纳粹党更名不久设计了党旗和党的标志。党旗以黑、白、红三种颜色为底色，上面有一个卐字标志。几个世纪以来，卐字在不同的文化范畴中一直是日轮的象征，成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民族主义团体的标志和符号。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解释说：“黑色代表为战争失败而悲伤，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思想，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的斗争使命。”^①他所设计的党旗、卐字标志，1924年发放的褐色衫，以及采用口呼“万岁”的抬臂礼，目的在于使党员产生一种“庄严的使命感”，对外界具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鼓动小资产阶级民众聚集在纳粹党的旗帜下！

为了便于宣传鼓动，希特勒力图建立纳粹党的舆论工具。当时，图勒协会的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原名《慕尼黑观察家报》），

^①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美国波士顿1943年版，第496—457页。

因管理不善，濒临破产。经罗姆、里特尔、冯·埃普将军、埃卡特等人筹资和捐助，希特勒在1920年12月买下这家报纸，沿用《人民观察家报》之名，任命迪特里希·埃卡特为第一任主编。这样，纳粹党便有了自己的机关报。

1921年，纳粹党已明显地离开了哈勒和德雷克斯勒原来的想法。独断专行的希特勒力图把纳粹党变成追随他的帮派，对党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发号施令，引起众人的愤恨和不满。同年7月，终于在党的领导层爆发了一场孕育已久的冲突。

当时在北德，有一个规模大于纳粹党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工人党。1920年，两党在萨尔茨堡举行的德语区民族社会主义各党国际会议上，曾商定以美因河为界划定各自的工作区，后又谈判过合并事宜。希特勒坚持要对方解散，其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纳粹党，致使谈判中断。1921年6月，希特勒前往柏林，寻求泛德协会的资助，加强同保守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右翼分子的联系。德雷克斯勒和党的其他委员乘希特勒不在慕尼黑之机，试图夺回党的领导权。他们首先主动恢复与德意志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谈判，同时打算同南德有相同思想的民族社会主义党结成联盟，借以束缚希特勒的手足。

希特勒发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立即返回慕尼黑，采取突然袭击方式，予以反击。他利用自己在纳粹党内已取得的优势，于7月11日声明退党。3天后他又提出重进委员会的条件：“要求当党的唯一领袖，拥有独裁权力，取消委员会，停止同其他团体结盟”。^①当委员会次日答复，准备授予他“独裁权限”，欢迎其重新入党接任德雷克斯勒让给的第一主席职务时，希特勒却坚持不要“让予”，而以个人名义召开特别大会举行选举相要挟。

纳粹党的其他委员认为这些要求太无道理，在德雷克斯勒领

^①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63页。

导下起草了一份抨击这个未来独裁者罪状的声明，印成小册子散发。其中写道：“权力欲和个人野心使阿道夫·希特勒先生在柏林逗留6周之后回到他的岗位上来，而他的柏林之行的其他目的至今没有透露。他以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借他背后暧昧不明的人之手，在我们队伍中制造分裂与不和，从而增进犹太人和他们朋友的利益。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他的目的完全是利用民族社会主义党作为跳板，来实现他自己的不道德的目的，并篡夺领导权，以便利用这个绝好时机，迫使党走上另外一条轨道。”^①希特勒马上反击，指控小册子的起草人对他诽谤中伤，迫使对手们让步，接受他的和解条件。

1921年7月29日，在纳粹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希特勒以绝对优势当选为党的主席，并拥有独裁权力。党的委员会被取消。失败受辱的德雷克斯勒虽仍任名誉主席，但不久就销声匿迹。当晚，希特勒即被其支持者称作“元首”。8月4日，埃卡特在《人民观察家报》正式发表文章，公开称颂希特勒为“元首”。希特勒随即在纳粹党内确立所谓领袖原则，独揽党内一切大权，拥有对党的整个机构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党徒必须对元首无条件效忠；党的各级领导人不经党员选举，而由上级领导直接任命。

由此可见，纳粹党内一开始就存在着纷争。希特勒入党不过22个月，便凭借权术诈取纳粹党主席的职位，排挤原德意志工人党领导人和工人党员，确立所谓领袖原则，也就逐步改变着纳粹党的性质。结合党的名称改变，党员队伍、领导成员和骨干状况的变化，《二十五点纲领》的制定等综合的因素，此时人们已很难再将冠以工人党之名的纳粹党看作是工人政党了。

^① 希特勒接见G·沃德·普赖斯的谈话，发表于1938年9月19日《每日邮报》。

希特勒派及其策略转变

希特勒夺取纳粹党领导权的过程中，有一些人聚集在他的周围，形成纳粹党内的右派。当他成为纳粹党领袖之后，这一派也就成了主流派，因其成员大多来自慕尼黑而被称作慕尼黑派。其核心人物有：

迪特里希·埃卡特(1868—1923)，原图勒协会成员，主编协会掌握的周报《标准德语》。其父是巴伐利亚国王的法律顾问，经常以诗人、剧作家的身份出入于上层社会。1920年与希特勒相识，对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谬论十分赞赏，成为其挚友和导师。他介绍希特勒与慕尼黑市民阶层的头面人物相识，走访极右组织泛德协会和退伍军人组织钢盔团等，还帮助希特勒纠正讲演中的语法和表情。他对年轻的希特勒影响很大。后因酗酒过度身亡。希特勒称他是一位“慈父般的朋友”，“其功绩无与伦比。”^①

恩斯特·罗姆(1887—1934)，慕尼黑驻军首脑埃普上校的参谋部政治顾问，继迈尔上尉之后与希特勒联系的军官。在战争中曾两次负重伤，升为上尉军官。他怀着对十一月革命的憎恨，加入镇压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队伍，企图一俟时机成熟就进军“红色柏林”。罗姆与一些右翼准军事组织有密切联系，负责联络地方武装，打算把巴伐利亚变成民族主义势力的堡垒。罗姆早在希特勒参加国防军培训班期间就与之结识。他把希特勒带到军官和政客圈子里周旋，介绍同僚加入纳粹党。罗姆靠着这种关系和自己在招募与训练纳粹党准军事组织方面的才能，成为纳粹党内

^① 恩斯特·诺尔特：《法西斯主义及其时代》，慕尼黑—苏黎士皮帕尔出版社1984年第6版，第404页。

少数几个跟希特勒以“你”相称的人之一。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1893—1946年)，生于爱沙尼亚首府塔林的德意志人。其父是一位富商。早年曾在莫斯科学过建筑学，1918年12月流亡慕尼黑，与埃卡特相识，参加图勒协会。他经常在埃卡特主编的周报和其它报刊上发表反犹、反共文章，宣扬应当用“种族斗争”理论开导工人，把工人的“阶级斗争欲”引导到反对犹太人和其它民族的斗争上去。^①他曾将19世纪末沙皇密探在巴黎伪造的一份煽动反犹反共的文件《犹太复仇智者会议记要》^②译成德文，刊登在1919年10月17日《慕尼黑观察家报》上。该记要伪称，自纪元交替以来，“世界犹太人”要进行系统的合作，“以牺牲世界各国人民为代价，企图实现犹太人的世界统治。”^③希特勒读后欣喜若狂，把它视为反犹主义重要依据之一。罗森贝格被认为是唤起希特勒对俄国以及德国在东方扩大“生存空间”兴趣的人。他曾介绍希特勒同一批反布尔什维克和反犹的俄国流亡者发生联系，其中有1918年德国任命的乌克兰地方长官斯科罗帕德斯基将军。他在1919年底加入纳粹党，成为党的理论权威。1923年担任纳粹党《人民观察家报》主编。希特勒称他是新种族主义世界观的先知者。他鼓吹的反动人种和文化观，编成《二十世纪的

① 罗森贝格：《文章与讲演》第1卷(1917—1921年)，慕尼黑1943年版，第106页，

② 《犹太复仇智者会议记要》，原文为die Prokokolle dler》Weisen Von Zion《，也有译为《锡安山智者会议记要》。20世纪初，有关该记要来源的传说有5、6种。其中有：1807年拿破仑一世为改革犹太法院在最高级会议上提出的书面目标；1890年俄国犹太人用希伯来语写的会议记录；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一次犹太复仇主义大会上的会议秘密记录；1901年犹太人在法国举行秘密会谈的记录。但是，当1934年—1935年在审理指控以色列行政区联盟和以色列文化行政区反对反犹太分子特奥多尔·费舍尔和西尔沃·施奈尔时，法庭断定，这份所谓共同签署的会议记录，是俄国政治警察在巴黎的办公室里精心伪造的，旨在作为沙皇政府反对俄国自由力量的把柄。

③ 亚力山大·施泰因：《阿道夫·希特勒—‘耶路撒冷锡安山智者’的学生》，卡尔斯巴德1936年版，第13页。

神话》一书出版。

鲁道夫·赫斯(1896—1987)，出口商的儿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度同希特勒在同一团队服役。战后到慕尼黑大学学习历史、国民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参加过图勒协会的战斗同盟发动的反革命暴乱。1920年加入纳粹党。在慕尼黑大学，曾写过《领导德国重新恢复昔日光荣地位的人必须是何许人》的论文，认为这样一个人必须是一个独裁者，具有铁腕手段，应该来自于大众之中，但又超群拔俗，像一切伟人一样，在流血面前毫不畏惧，必要时甚至不惜践踏自己的友人。赫斯把希特勒看作他理想中的领袖，并介绍希特勒接触到前将军、慕尼黑大学教授卡尔·霍斯霍弗的地缘政治学说。赫斯起初当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并主管党务，后来成了“元首代表”。

赫尔曼·埃赛(1900—)，上巴伐利亚人，其父任铁路局长。1918年战争临近结束时中学毕业，自愿参战。从前线返回慕尼黑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后退党，随施瓦本自由兵团镇压慕尼黑苏维埃。参加过国防军慕尼黑第四分指挥部举办的宣教人员培训班。1920年初加入德意志工人党，后主编《人民观察家报》，以编造诽谤犹太人的故事称著，公然主张作者可以撒谎以骗取读者相信。

埃赛是纳粹党内第二号讲演人，讲演时情绪激昂，下流粗俗。他极力宣扬“一位天才的元首，能对群众产生一种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威力！”“如果党无条件地服从希特勒，那么，‘纳粹运动’就能存在和发展！”^①在纳粹党内斗争关键时刻，埃赛帮助希特勒独揽党内大权，使“元首”职位从“理论变成了政治现实”。^②

赫尔曼·威廉·戈林(1893—1945年)，生于巴伐利亚，其父

^{①②} 魏纳·马瑟尔：《反对共和国的暴动——纳粹党早期史》，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乌尔施泰因·萨赫布赫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202页。

是德属西南非洲总领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里希特霍芬战斗机大队最后一任上尉队长。战后成为瑞典斯文斯克航空公司飞行员，兼任德国海尼肯降落伞公司在瑞典的经销代表。1921年进入慕尼黑大学攻读政治学，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1922年秋，戈林初次听到希特勒的讲演，认为希特勒是一个有坚定明确目标的人和“德国的救世主”。几天后，他来到纳粹党总部加入该党，1923年任冲锋队领导人。

在希特勒周围还有一批流氓无产者，其中有希特勒当兵时的军士长、后来成为纳粹出版商的马克斯·阿曼；热衷于滋事斗殴的前屠夫和业余摔跤手马里希·格拉夫，嗜酒如命的马贩子克里斯蒂安·韦伯，他们两人成了希特勒的贴身保镖；还有粗俗鄙陋、后来成为希特勒宫廷摄影师的霍夫曼等。希特勒就是主要依靠这些人物，在纳粹党内组织并扩展自己的派系。

希特勒还特别重视建立忠于自己的武装力量。1921年8月，他接受罗姆的建议，在原来的纳粹党纠察队组织中推行百人制编制，称为体育队。同年10月5日改名为冲锋队（简称SA），招募退伍军人和青年，其中不乏亡命之徒，作为纳粹党保护自己和冲击政治对手集会的工具。至1921年底，冲锋队已达6000人。希特勒说过：“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报名参加冲锋队，他们甘愿服从元首并有精神准备在必要时去死！”^①1923年，冲锋队里的旧军官同希特勒之间，因对待鲁尔危机的不同态度而发生矛盾。希特勒遂示意集合一批“老战士”，组成他的私人卫队，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以防不测。这就是党卫队的雏形。

希特勒的主张也就是希特勒派的政治主张，其核心是极端民族主义。在初期，特别热衷于反对凡尔赛和约，宣扬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进行狂热的反犹、反共和反对共和制的煽动。他们

^① 海登：《民族社会主义史》，伦敦1934年版，第73页。

对于二十五点纲领中的所谓社会主义要求，不是随心所欲地解释，就是弃置一旁。

希特勒派特别注重联络各种政界右翼势力、民族主义社团和企业界人士。1922年5月29日，经泛德协会的邀请，希特勒赴柏林到民族俱乐部讲演。柏林民族俱乐部拥有会员1800人，有政界要人、大企业家、银行家、容克地主、军官、记者等，系民族主义的活动中心。希特勒这次柏林之行，是他首次在柏林政界露面，并开始在全国范围谋求企业界的支持。

1923年9月，希特勒参与了德国死硬保守派—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NVP)和一批极右派团体发起的反对结束鲁尔斗争的抗议运动。当时希特勒确信，要推翻共和国、夺取政权，只有付诸暴力才有可能。于是他参加了巴伐利亚军政独裁者、极右派民族分裂分子冯·卡尔策划的祖国大同盟联合工作团，旨在“向柏林进军”，推翻共和国。不过双方虽然在推翻共和国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但所追逐的目标却存在分歧。巴伐利亚右翼当局妄图建立一个脱离德国、依靠法国的多瑙河联邦。希特勒则要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一个独裁的民族政权。

1923年10月29日，艾伯特总统下令军队以武力镇压任何叛乱。巴伐利亚当局见势不利，急忙收斂。希特勒感到自己在这次“向柏林进军”计划中，只当了一个起鼓动作用的角色，担心会被随意抛弃，遂妄图搞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夺权行动。他于11月9日发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宣布成立临时德意志民族政府。但希特勒错误估计了形势，巴伐利亚当局未与他合作，暴动失败。希特勒被投入兰茨贝格监狱。希特勒派的主要成员，有的在暴动中当场被捕，有的被围后投降(如罗姆)，有的潜逃(戈林负伤被人救出后逃往奥地利，赫斯逃走后又回来自首)。纳粹党遭到一次严重失败，被禁止活动。

希特勒被囚禁期间，设法用铅笔写了一张便条：“亲爱的罗森

贝格，从现在起你将领导运动”。^①希特勒之所以对罗森贝格委以重任，是因为此人作为他的代表对他在纳粹党内的地位不会构成危险。在狱外的罗森贝格接受委托之后集合残部，改名大德意志共同团体，继续进行活动。鉴于1924年德国出现了政治、经济稳定的形势，罗森贝格认为必须走合法道路以求发展，提出参加议会竞选作为权宜之计。这一主张受到埃赛等人极力反对。以布特曼和格拉泽两位博士为首的一批大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党员，赞成走议会道路。大德意志共同团体与其他一些民族主义组织成以鲁登道夫将军为首的民族集团。1924年5月，民族集团以及格奥尔格·施特拉瑟为首的大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都参加了德国国会举行的选举，在国会472个议席中获得32席，鲁登道夫、施特拉瑟、弗立克、弗德尔等人都当选为国会议员。在此之前，民族集团还在4月间参加了巴伐利亚邦选举，在邦议会128席中获得23席。

希特勒起初并不同意参加竞选，他一直抨击“一切议会活动对运动的独立都是毫无价值和危险的”，“1919年—1923年，除了政变，我没有想过别的事情”。^②但到1924年初，德国国内形势日趋稳定，经济恢复发展，身陷囹圄的希特勒也感到德国出现了“一种意料不到的迅速巩固的国内形势”。他总结了未遂政变的教训，认为必须使纳粹党适应德国变化了的局势，决定改变策略，由暴力夺权过渡到合法夺权，即充分利用魏玛宪法提供的一切合法条件，去夺取政权。1924年9月，希特勒对前来探视的纳粹党骨干分子卢台克说：“我恢复活动以后，必须采取新的方针。我们将不再企图通过武装政变取得政权，而是要捏着鼻子进入国会，同天主教

^①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页。

^② 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117页；贝恩斯编：《阿道夫·希特勒讲演集》第1卷，第154页。

议员和马克思主义者议员打交道，哪怕在选票上超过他们比在动武上压倒他们所花的时间更长，至少结果能够得到他们自己宪法所允许的保证。任何合法事情的过程总是缓慢的……迟早我们会得到多数选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国！”^①

希特勒在狱中写了《我的奋斗》。他在1924年7月声明放弃对狱外党务的领导，决心著书两卷，以阐明纳粹运动，描绘出运动发展的远景。第1卷由艾米尔·莫里斯记录，经伯恩哈德·施丹佛尔神父修改，于1925年7月18日在慕尼黑出版。同年夏天，在赫斯与戈培尔参与下，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完成了第2卷。1927年，希特勒向马克斯·阿曼口述他的《第二本书》，当时没有发表，直到二次大战后的1961年才正式出版而为人所知。在这些书中，希特勒描绘并解释了他的真正的政治纲领，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奋斗目标。概括起来说，主要有如下5点：①废除凡尔赛条约和圣·日耳曼条约，重振德意志的强国地位；②鼓吹种族论，宣扬德意志人是优等种族，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劣等种族，德意志人应该成为统治世界的主宰者；③建立联合一切德意志人的大德意志帝国，对内实行元首独裁统治，反对马克思主义和议会民主制，对外进行侵略扩张；④鼓吹向东方——俄国及其藩国扩张，为德意志人夺取新的“生存空间”；⑤强调夺取“生存空间”的唯一手段是战争，提出联合英国和意大利，反对法国，侵占东欧和俄国，进而向海外扩张，与美国争霸世界。《我的奋斗》后来成了纳粹党人的圣经。

1924年12月20日，希特勒服刑不满9个月便从监狱提前释放。1925年1月4日，希特勒会晤巴伐利亚总理、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领导人海因里希·赫尔德博士，极力表示要与当局和解。希特勒承认：政变是一个错误；他的目的之一是协助政府反对马克思

^① 卢台克：《我所认识的希特勒》，伦敦1938年版，第217、218页。

主义。赫尔德随即取消了对纳粹党及其报纸的禁令。2月27日，纳粹党在举行暴动的慕尼黑啤酒馆集会，有4000多名党员到会。希特勒宣布将重建纳粹党，采取新的合法方针，仍由他“单独领导运动”。

希特勒出狱后改变暴力夺权方针和重建纳粹党，并不单纯是一种夺权策略的改变，从更深的层次考察，反映了纳粹党性质的进一步演变。它标志着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内主流派，抛弃主要依靠小资产阶级下层势力的立场，开始积极投向大资产阶级。事实证明，正是在此以后，希特勒把主要精力转向寻求同垄断资产阶级的勾结。希特勒这种背弃小资产阶级利益和向垄断资本靠拢的作法，受到纳粹党内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强烈反对，因此引发了一场党内两个派别的尖锐斗争。

施特拉瑟激进派分庭抗礼

纳粹党内施特拉瑟派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由于希特勒派战胜了这一派别，希特勒成了纳粹党和第三帝国的元首与独裁者，因此长期以来，许多史学家在研究和著述中，往往把纳粹党史描绘成一部希特勒的传记史，而对于施特拉瑟派很少涉及，或加以忽视。事实上，施特拉瑟派在纳粹运动和纳粹党夺取政权之前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施特拉瑟激进派是1924年希特勒在监狱期间形成的，主要基础在德国北部，也被称作北方派。这一派认真对待二十五点纲领中的反对大资本的社会改革要求。它的主要领导人是施特拉瑟兄弟。

施特拉瑟兄弟的父亲彼得·施特拉瑟是温特海姆初级法院一位评议员，对亚当·斯密、阿道夫·瓦格纳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说颇感兴趣，工作之余撰写了《纪元交替前后‘新’

制度》一书，把民族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摆脱危机的途径。他这种寻求社会公正和改善小资产者生活条件“新途径”的思想，对奥托·施特拉瑟和格雷戈尔·施特拉瑟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奥托·施特拉瑟生于1892年，在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学。一次大战期间在巴伐利亚第四步兵一炮兵团服役，升至中尉。战后，他同数百万前线复员的下级官兵一样，处于各种思想影响的漩涡之中，并于1919年12月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任《前进报》编辑。后因反对社会民主党政府同国防军勾结，在1920年4月退党。同年10月12日，他作为荷兰和瑞士新闻报社记者，参加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哈勒代表大会。奥托相信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主义革命，认为这种为社会主义进行的斗争应该是德国革命的榜样，并希望德国在外交方面同俄国接近。但他在帮助毛勒·万·登·布鲁克撰写《第三帝国》一书时，受到后者和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宣扬的保守民族主义的影响。

奥托·施特拉瑟经常给哥哥格雷戈尔·施特拉瑟起草讲稿和文件，以格雷戈尔的名义发表，其名声远不及哥哥的大。实际上激进派的思想 and 主张主要出自于他。德国1923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对小资产阶级打击沉重。奥托从对各种政治思潮和社会现实的体察中，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思想——激进民族社会主义观念。他认为，“为了拯救德国，必须借助一种革新的、以基督教和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共同观念，把农民、工人和士兵联合起来，在保守革命的旗帜下进行斗争”。除“民族社会主义思想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思想能够革新国家”。^①

奥托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部分，应该认真对待和强调其中的社会主义部分。这特别表现在1920年10月他初次见到希

^① 佩·莫雷诺：《左派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安施塔特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特勒时，同后者进行的一场激烈争论。希特勒向奥托·施特拉瑟介绍纳粹党的原则，声称：“掀起一股复仇思潮，鼓动民众，旨在打赢下一次战争”。奥托则谨慎地谈到，革新德国结构只能通过一种社会改革来完成。格·施特拉瑟支持他弟弟的观点，但试图把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统一起来。他说：“我们举起右手抓住民族主义，其不幸则与资本主义结盟；我们举起左手抓住社会主义，其不幸是同国际主义联合”。奥托·施特拉瑟以开玩笑的方式问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是由两个词汇组成的，其重点是‘社会主义’一词。希特勒先生，您称您的纲领民族社会主义是一个统一词汇吗？根据德文的语法，组合词的第一个词是第二个词——主要概念的修饰词”。^①希特勒对此避而不答。

格雷戈尔·施特拉瑟生于1877年。中学毕业后在慕尼黑大学和埃尔朗根大学攻读药理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兵，1919年7月退役，后在兰茨胡特当药剂师。格雷戈尔是位出色的组织家和演说家。他赞成其弟奥托变革社会的激进思想，同时也受当时盛行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主张建立一种防卫部队，重建德国军备。他担任一个准军事团体民族思想士兵协会地方分会主席。1919年底—1920年初，格·施特拉瑟第一次同希特勒接触。尽管相互有很多不同见解，但他崇拜希特勒的政治领导才能，因而带领其组织参加了纳粹党，建立了该党的第一个大区，成为下巴伐利亚纳粹党的领导人。

希特勒被关押期间，纳粹党遭禁止而解体，在原有基础上改头换面地形成两个主要集团：大德意志共同团体和大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后者由巴伐利亚一部分纳粹党人成立的民族联盟同1922年冯·格雷弗在北德建立的德意志人民自由党联合组成，以格·施特拉瑟为首。他频繁奔波于德国北部，进行游说和

^① 莫雷诺：《左派民族社会主义》，第16页。

宣传，在这一地区影响很大。如前所述，1924年5月德国国会选举中，大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同以鲁登道夫为首的民族集团，共获32个议席。格·施特拉瑟当选为国会议员。

希特勒获释不久，在南德以慕尼黑为中心恢复了原有的势力，同时分裂北德的大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1925年2月12日，格·施特拉瑟离开该组织领导岗位，拒绝希特勒在2月24日纳粹党重建大会上打出他的招牌。希特勒认识到，如果要把纳粹运动真正扩大到全国，必须在北方，在普鲁士，首先在工人阶级的堡垒柏林获得一个立足之地，他非常了解格·施特拉瑟的组织才能和在北方的影响，而他本人则被政府禁止到北德演说。为了避免分裂，保持纳粹党在北德的势力，希特勒被迫同意格·施特拉瑟继续在北德从事活动，准许那里的民族社会主义组织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格·施特拉瑟立即在北方从事建立和扩大纳粹党地方组织的工作，声称纳粹党的目标是实现“民族的社会主义”。^①他清楚地认识到，在北德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二十五点纲领中提出的笼统要求，既不能争取中、小资产阶级，也不能在工人中扎根，很难推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因此，他请求奥托·施特拉瑟帮助他制定一种革新的民族社会主义纲领。

1925年9月10—11日，在威斯特伐伦地区哈根召开北德纳粹党大会，格·施特拉瑟在大会上宣布成立纳粹党西北部工作联合会。不久，公布了奥托·施特拉瑟起草的纲领草案，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的含意进行了解释，对二十五点纲领进行了补充，声明对私有财产进行限制，提出了纳粹党尚未充分陈述的经济要求。

在农业方面，纲领草案规定，土地形式上属于民族财产，变

^① 约阿希姆·佩措尔德：《希特勒的蛊惑术》，柏林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8页。

全部农民地产为不能出售的“世袭采邑”，限制私有财产，进行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土地，成立合作社。对于二十五点纲领第17点提出的土地改革，具体规定“1000莫根（25500公亩）以上的大庄园分成50——200莫根（1275——5100公亩）的农民庄园。原庄园上的德籍农业工人每人获得2莫根（51公亩）封地”。^①

工业方面，纲领草案提出，努力使大企业国有化，将无生存能力的企业转交民众共同体监督，工人应参与企业行政管理和财产占有。对于二十五点纲领第17点中“要求参加大企业分红”，明确规定一切重要工业部门应改为股份公司。企业主仅保留49%的股份，51%的股份归民众所有。在民众所占有的股份中，10%归企业职工，30%为国家财产，由教区和行政区分配剩余股份。在非重要工业部门，企业主可保留股份51%。^②

工商企业方面，纲领草案除赞成二十五点纲领中第16点“要求将大百货公司充公”之外，还倡议建立中世纪行会模式的强制手工业者协会和工厂联合会，保护工商企业不受大资本企业竞争威胁。对于较小的企业，工人、国家和行政区无权提出占有要求。^③

外交方面，纲领草案主张推行独立政策。重申废除凡尔赛和约和圣·日耳曼和约，要求重新恢复1914年帝国边界，并包括奥地利、苏台德区以及南蒂罗尔。德意志欧洲中心国应在苏联和德国盟国支持之下，在反对西方国家的解放战争中诞生。^④这与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叫嚣的极端民族主义有很大不同。

文化方面，纲领草案主张，实行将行政和经济范围改革完善起来的文化纲领，由一种以宗教为基础的“民族理想主义”取代唯

①②③ 约·佩措尔德：《希特勒的蛊惑术》，第239、240页。莫根(Morgen)，德国昔日田亩面积之一种。1莫根约合25.5公亩。文章中的公亩数，是根据书中数字计算的。

④ 莫雷诺：《左派民族社会主义》，第23页。

物主义哲学价值体系。

在组织原则方面，与希特勒派推行的“领袖原则”不同，纲领草案主张推行独立的民主原则。大区 and 地区一级高级领导人，经协商选举，由格·施特拉瑟任命。地方支部一级领导，由所在岗位可信赖人选举，经大区区长商议产生。

在国家体制观念方面，纲领草案重视加强国家权力，主张社会和经济问题通过国家调节解决。由一位任期6年的总统为首的等级制国家取代议会制国家。为保障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实施，根据新的制度选举第一任总统，应实行一种“民族专政”统治。^①

施特拉瑟派还创办自己的新闻机构，在北德传播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解释。1926年奥托·施特拉瑟主编机关报《民族社会主义信札》(半月刊)，发行量1000份，供北德纳粹党大区区长们阅读。不久，又购买一家陷于困境的出版社，改名战斗出版社，每日出版5种纳粹主义报刊。其中奥托·施特拉瑟主编的《柏林工人报》(周报)，发行量达3000—5000份；《萨克森观察家报》发行量50000份；还有一种理论周刊《巨掌》，印刷量达25000份；《民族社会主义报》是北德发行量最大、最著名的民族社会主义报纸。^②对施特拉瑟派来说，战斗出版社出版的刊物与慕尼黑派埃耶尔出版社出版的刊物，构成一种明显的均势。

格·施特拉瑟在北方到处奔走，发表演说，指派区领导人，建立了党的9个大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汉堡、黑森、麦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哥廷根、鲁纳堡、汉诺威、柏林等。^③其活动范围由德国北部开始向西部和东部扩展，在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和工业地区莱茵兰，奠定了政治、组织基础。

^① 约·佩措尔德：《希特勒的蛊惑术》，第240页。

^② 莫雷诺：《左派民族社会主义》，第25、26页。

^③ 康拉德·海登认为是7个大区，实际上是9个大区。

施特拉瑟派就其性质来说，并不是西方一些史学家所认为的“左派”和“革命派”，也不是苏联一些史学家所认为的假左派，^①而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该派强调的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要求，同二十五点纲领中的有关条文一样，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

德国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恩斯特·雷温特洛夫伯爵，曾心领神会地对施特拉瑟派广泛宣传的社会主义作了如下的解释。他说：“社会主义化……并不是意味着‘社会化’，即剥夺财产……，而是相反，尽可能增加中、小私人企业财产，确保企业主的所有权，根据全体人民的利益，由国家进行监督”。^②其实，施特拉瑟心目中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国家。正如其纲领中所声称的，“是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是一种通过各等级和委员会、职业参事会组成的整体制度”，一种有产者的“民众共同体”，“全体成员拥有平等的机会，而所谓平等的机会并不等于有形的财产之拥有”。^③这些方面反映了小资产阶级要求同大资产者均衡财富，加强同大资本竞争的能力，以及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的强烈愿望。康拉德·海登指出：“施特拉瑟团体的理论之表现新时代的希望，实高明于希特勒的一切演讲。这个地方可以确实表现出党的思想前锋之所在”。^④

施特拉瑟派对希特勒派的指责

施特拉瑟派认为，希特勒派过份注重党纲的民族主义，而无

① 佩·拉希施米尔：《法西斯主义起源》，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② 约·佩措尔德：《希特勒的蛊惑术》，第269页。

③ 康拉德·海登：《德国国社党史》，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309页；佩·莫雷诺：《左派民族社会主义》，第23页。

④ 康·海登：《德国国社党史》，第358页。

视“社会主义”条文。该派从其纲领出发，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在夺取政权的途径、结盟策略等方面同希特勒派产生了严重分歧，对其进行了猛烈攻击。

该派揭露希特勒派背离二十五点纲领的民族社会主义精神和维护私有制原则。1930年，洛塔尔·黑尔舍等大区区长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内外政策方面纳粹党及其领导人应该真诚地根据党的二十五点纲领精神，为我们的解放努力奋斗！但是，近来纳粹党出于‘战术原因’，采取了同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严格对立的立场。今天，纳粹党的领导人忠于部分宪法……维护现存制度……以此反对一场来临的德国革命”。“阿道夫·希特勒曾经说过，资本不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它必须是国家的仆从！……但是数月之前，慕尼黑党的领导机关突然声明：它拒绝剥夺任何财产，原则上赞成私有制”。^①

在夺权途径方面，该派拒绝希特勒提出的通过议会合法夺权，主张进行德国革命。奥托·施特拉瑟在1929年底写的《直入国家》一文中批驳说，“如果主张合法夺权，将使纳粹党面临转入资产阶级保守阵营的危险”，“不会成为德国人民渴望进行革新的政党”。“只有民族社会主义，才能完全、彻底地改变”现存制度。“只有通过德国革命，而不通过合法夺权才能完成”。^②

在联盟策略问题上，施特拉瑟派反对希特勒与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合作，反对同垄断资产阶级接近和结盟，主张同德国共产党和工人接近，支持工人罢工运动，赞成同德国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党派联系。

1929年，该派反对希特勒参与胡根贝格发起的民族主义党派极右势力反杨格计划行动，尤其反对希特勒派关于纳粹党参加萨克森和图林根联合政府的主张。1929年5月10日，萨克森邦举行

^{①②} 莫雷诺，《左派民族社会主义》，第47、29页。

选举。希特勒原本只想利用这一时机，考察纳粹党在地方一级同右翼资产阶级党派结盟的能力。出乎意料的是，这次选举结果使本来只有2名邦议员的纳粹党取得了5个议席，居然成为萨克森邦政府中举足轻重的力量。^①希特勒力求参加由民族主义右翼党派联合的政府。施特拉瑟派掌管的《萨克森观察家报》以激烈的语言，谴责希特勒“背叛了运动的革命思想”。^②

由大区区长万·米克领导的萨克森纳粹党的施特拉瑟派，试图不同资产阶级联合，而支持由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纳粹党组成联合政府。^③由于这一抵制活动，希特勒派参加萨克森邦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企图并未得逞。施特拉瑟派的代表同德国共产党代表协商，希望由纳粹党同德国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德共拒绝施特拉瑟派的建议，并在报纸上公布了这一消息。希特勒利用施特拉瑟派这一举动，对该派进行了猛烈攻击。

1929年12月8日，在图林根邦选举中，纳粹党取得成功，所获选票由原4.6%上升到11%，在53个议席中占6个席位。^④纳粹党人弗立克博士出任邦内政部长这一重要职务。施特拉瑟派则指斥这是“一种反叛行为在发生作用，必须消灭这一反叛”。^⑤该派成员、斯图加特市希特勒青年组织领导人，1930年7月18日在《施瓦本进攻报》发表文章抨击：“无数反动的资产阶级人物入党，同胡根贝格结盟，对党纲的第17点进行了无耻、怯懦的补充。图林根和萨克森邦的联盟政策，揭示了纳粹党公开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和不革命的性质”。^⑥

施特拉瑟派认为，纳粹党“应该欢迎一切动摇政府权力的行为，不管它是荷尔斯泰因农民抛的炸弹也好，或是共产党工人的罢工也好”^⑦。奥托·施特拉瑟甚至表示：“一种立即进行的革命准备，

①②③④⑤⑥ 莫雷诺，《左派民族社会主义》，第28、29、41页。

⑦ 海登，《德国国社党史》，第301页。

只能从左的方面得到支持，左派势力对于德国革命的胜利是必不可少的”。^① 1926年1月，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国会中提出一项提案，要求对无偿剥夺国王—诸侯王公财产和将财产归还共和国举行公民投票。这一提案不仅得到与贵族敌对的左派公众舆论的赞同，也得到中等阶层和广大民众的拥护。1926年1月24日，施特拉瑟派领导人在汉诺威召开党的会议，参加者一致支持剥夺诸侯财产的提案草案，赞成同工人党派采取一致行动。施特拉瑟派领导人认为，在劳工发生纠纷时，应该支持工会。因为每一次罢工都会给魏玛体制以打击，有利于反对魏玛共和制的斗争。^② 1930年4月，当五金工人号召工人举行大罢工时，奥托·施特拉瑟运用其新闻宣传机构，大力宣传支持工人罢工。萨克森纳粹党明显地采取了支持罢工者的立场。

在农民问题上，施特拉瑟派一反希特勒长期没有理睬的态度。奥托·施特拉瑟强调：“城市人口是自由革命的发动机，而农民阶层在建设新的社会制度中起决定作用”。^③ 他认为，吸收这些遭受重利盘剥与沉重赋税压迫的农民群众对纳粹党非常有利。自1925年开始，该派便在重要的农村地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等地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1927年在该区建立无数小据点和首批冲锋队。1928年以后，施特拉瑟派把注意力放在农村发展党员和扩大影响方面，将农民纳入其夺权战略。同年1—5月，连续举行250次集会，该派领导人施特拉瑟、库伯、弗里科等出席集会和发表演说。^④

1929年12月，施特拉瑟派制定《农民19点革命纲领》，这比希特勒指令农业政策专家瓦尔特·达雷1930年3月6日起草一份农民纲领的时间要早。自1930年1月起，该纲领在纳粹党地方组织

① 莫雷诺：《左派民族社会主义》，第30页。

②③④ 莫雷诺：《左派民族社会主义》，第30、135、123页。

中广泛宣传。纲领的基本原则是通过小农进行经济建设，开垦荒地，分配大地产，恢复农民经济，重建农民文化。

1929年以后，施特拉瑟派利用经济危机后果进行系统宣传，组织了1000多次集会，为1930年9月国会选举进行准备。由于施特拉瑟派所宣传的民族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要求，符合小资产阶级民众的切身利益，多少表达了他们要求社会变革的愿望，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连希特勒本人也不否认，施特拉瑟派的社会煽动产生了作用，这种手段特别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对于影响群众来说是合适的。1930年9月14日，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胜利，获票率成倍增长，从1928年的2.6%上升到18.3%，国会席位也从原来12席猛然增至107席。纳粹党从国会中位居第九的小党，一跃而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1932年夏天，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的票数达到高峰，由原640万票增至1370万票，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①

总之，施特拉瑟派所做的大量实际工作，为纳粹党在地方一级扩大影响和争取选票打下了政治和组织基础。通过对选举结果详细分析表明，在争取民众问题上，施特拉瑟派所起的作用超过希特勒派；尽管希特勒派利用民族主义口号争取民众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纳粹党在选举中取得最显著成就的地方，不是在希特勒派活动的德国南部和其他地区，而是在施特拉瑟派活动的德国北部、西部和中部的乡村和城镇，在农民和小资产者选民中最为明显。在工人运动中心—柏林，希特勒派的干将戈培尔取得的选举结果最差。甚至在纳粹党的诞生地，希特勒派的势力中心巴伐利亚，纳粹党所获选票数也低于在全国所获选票的平均数。在工业地区和工业城市，同样大大低于全国选票平均数。但是，在施特拉瑟派活动的地区，例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纳粹党1932年

^① 佩措尔德：《希特勒的蛊惑术》，第289页。

7月的选票数超过50%，甚至在少数2000人的选举区达到63.8%，在格斯特村几乎达到80%。①在东汉诺威、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里克尼茨、波美拉尼亚等选举区，也几乎达到50%。②纳粹党主要影响的地区推移到了德国北部。

第三节 纳粹党内两个派别的较量及其结局

施特拉瑟激进派的成就和影响，严重地威胁着希特勒作为纳粹党领袖的地位。在希特勒心目中，该派的主张完全是异端邪说，是他同垄断资产阶级勾结和“合法”夺权的重大障碍。希特勒十分清楚，1927年加入纳粹党的鲁尔地区工业家基尔道夫，恰恰是因为反对施特拉瑟派的路线而于1928年退出纳粹党的。③以胡根贝格为首的资产阶级右翼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民主党，在北德和柏林极力攻击施特拉瑟派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企图推行暴力式的社会主义”。④1929年9月，胡根贝格同希特勒讨论联合行动时公开要求希特勒排除施特拉瑟派的社会主义。1930年4月，德国重工业家协会主席向希特勒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纳粹党立即抛弃施特拉瑟派，否则不再给该党津贴。该通牒威胁说，或者由纳粹党及其报刊，特别是《萨克森观察家报》表示反对罢工，或者德国

① 莫雷诺：《左派民族社会主义》，第124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德国史》，德意志斯图加特安施塔特出版社1971年版，第528页。

② 佩措尔德：《希特勒的蛊惑术》，第289页。

③ 1930年鲁尔区工业家基尔道夫写道：“我1927年公开承认纳粹党，在我看来，不仅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在当时的领导人领导下，完全失去了作用……但是第二年，我不得不退出纳粹党，原因是鲁尔区纳粹党的代表在这个地区选择了一种我必须反对的方针，尽管我对阿道夫·希特勒抱有诚挚的友谊和给予高度的评价。”佩措尔德：《希特勒的蛊惑术》，柏林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9页。

④ 布罗沙特：《民族社会主义》，斯图加特安施塔特出版社，第52页。

重工业家协会全部停止对纳粹党的资助”。^①在工业、金融集团代表人物不断施加压力之下，希特勒决定对施特拉瑟激进派采取行动。

纳粹党内两派的斗争，主要表现为三次大的较量。

从汉诺威会议到班堡会议

纳粹党内两派的第一次严重较量，是从1925年的汉诺威会议到1926年的班堡会议。

1925年11月20日，施特拉瑟兄弟在汉诺威召开了一次北德纳粹党大区一级领导人会议，出席会议者25人。施特拉瑟派试图把希特勒排斥出党的奠基人和名誉主席的地位，削弱以至取代他对党的控制，并将党的重心由南方移到北方。希特勒指派弗德尔代表他出席。会议之初，戈培尔根本不让弗德尔参加，并破口大骂：“我们这里根本不需要奸细”。在会议期间，南美因兹区领导人罗伯特·莱伊表示支持希特勒的观点，遭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有人甚至要求“把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纳粹党！”声称：“民族社会主义者是自由和民主的人。他们没有自以为一贯绝对正确的人”。^②最后，除莱伊和弗德尔之外，会议绝大多数参加者通过了施特拉瑟兄弟的纲领，决定用它代替1920年2月通过的二十五点纲领。会议还通过了赞成剥夺王公贵族财产的提案。这次会议是施特拉瑟派公开对抗希特勒的第一次尝试，并暂时取得了胜利。

希特勒在纳粹党内的独裁权力面临着公开的挑战和反叛。他立即抓住施特拉瑟派领导人汉诺威会议通过支持剥夺王公贵族财

^① 莫雷诺：《左派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安施塔特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

^② 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上册，第127页。

产提案一事，发起反击。1926年2月4日在南德班堡召开南、北德全党领导人大会。希特勒蓄意将会议时间避开星期日，并选择班堡为会议地点，让本派居于优势的图林根、萨克森、巴伐利亚等地区党的领导人均能到会。相反，北德大区区长们因不能离开工作和旅费昂贵无法到会，只能派两名代表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和戈培尔出席。希特勒还指使本派的许多基层领导人参加会议，以保证自己获得足够多数。

班堡会议期间，双方主角就他们的分歧进行了一天多辩论，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王公财产的公民投票、以合法手段进行活动的政策与策略、外交、工人阶级作用以及党的组织等十多个问题。希特勒利用自己在纳粹党内的领袖地位和掌握会议多数，对格·施特拉瑟施加高压手段，强行通过了反对剥夺王公贵族财产的提案。但在其他问题上，后者坚持己见，顶住了希特勒的压力，使北方派得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而继续存在下去。

清除奥托·施特拉瑟及其支持者

班堡会议之后，纳粹党内的两派斗争进入第二个回合的较量。希特勒利用他在班堡会议争得的主动权，开始从下述几个方面分化、削弱和打击北方派的势力。

第一，采取拉拢和分化策略。

戈培尔原本是北方派一名重要成员，1922年加入纳粹党，任格·施特拉瑟的秘书兼《纳粹党通讯》主编。曾有人提议将这个危险的宣传家开除出党。然而希特勒估量了戈培尔的价值，决定争取戈培尔，突破北方派行动一致的防线。1926年3月，希特勒邀请戈培尔前往慕尼黑，在贝格勒劳勒酒店举行的一次集会上，称戈培尔是纳粹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戈培尔参加了4月13日一次群众集会，听了希特勒的演说之后，被“这位伟大人物的政治天才”

所征服，便投靠希特勒。不久，希特勒派他到重要的柏林大区当区长，以此剥夺格·施特拉瑟对首都党组织的控制权。接着，戈培尔同莱伊一起找北方派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个别谈话，旨在挑起北德大区区长们的反叛，然而并未收效。

为了争取格·施特拉瑟，希特勒绞尽脑汁。1926年5月23日，希特勒接见格·施特拉瑟，建议他放弃药店，到慕尼黑党总部任职，遭到格·施特拉瑟的拒绝。1927年，希特勒再次向他试探，允诺提供党的宣传部长之职，仍遭拒绝。1928年1月初，希特勒又一次允诺为他提供党的组织部长之职。格·施特拉瑟错误地认为，希特勒是受了周围人士的蒙骗，如果到希特勒身边工作，有希望争取他放弃那种“尚未固定、保守的亲资本主义政策”，^①因此接受了希特勒的条件，到慕尼黑任职。

第二，实行党内集中权力的行政改革。

希特勒在争取格·施特拉瑟之前，曾于1926年5月决定通过一项内部行政改革，限制格·施特拉瑟的职权，以便约束其行动和决定自由，加强自己对北方地区的控制。希特勒根据“领袖原则”，规定全国各地行政管理均由设在慕尼黑的党中央领导。北德各大区区长不再由格·施特拉瑟任命，而由希特勒任命。对希特勒的政治领导权，只能由全国党员大会提出异议，谁要对抗慕尼黑的决定，便是自动退党。在地方一级，建立忠于希特勒的“调查——调解委员会”，在北方各大区起着捍卫希特勒教令的作用。1928年之后，希特勒以忠于自己的信徒取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的人，先后撤换了西里西亚（罗西卡特）、波美拉尼亚（瓦伦）和萨克森（冯·米克）等大区的区长。

第三，宣布二十五点纲领不得更改。

希特勒认为，在汉诺威会议上施特拉瑟派提出的纲领草案，

^① 莫雷诺：《左派民族社会主义》，第26页。

是对自己的领导权公开挑战，而且妨害他争取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实现夺权的目的。为了打击施特拉瑟派以这个纲领取代二十五点纲领的企图，他在1926年5月22日公开声明，《二十五点纲领》不能更改，不能通过一种新的纲领进行修改和补充。^①这就等于公开否认了施特拉瑟派的理论纲领。

希特勒通过上述措施，初步控制了施特拉瑟派的势头。格·施特拉瑟于1928年屈从于希特勒，迁往慕尼黑。奥托·施特拉瑟继续留在柏林，坚持独立的激进路线，积极宣传自己的观点。这时的施特拉瑟派已成为由奥托·施特拉瑟为首的激进派。

1930年4月，萨克森工会宣布罢工。奥托·施特拉瑟在他控制的报纸，尤其是《萨克森观察家报》上发表文章，全力支持这次罢工。同年5、6月份，奥托·施特拉瑟同希特勒发生了激烈的论战。5月21日，他当面责问希特勒：“您同我一样确信，我们进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革命，难道不是一场全面的革命吗？”希特勒喊道：“这纯粹是马克思主义！这恰恰是布尔什维主义！”奥托·施特拉瑟追问：“让我们推测一下，假如您明天上台，您如何对待克虏伯呢？您会让这种企业不加触动地存在吗？”希特勒答道：“自然是这样的！您把我当成疯子吗？难道我会使德国的大工业破产吗？”奥托·施特拉瑟力图从希特勒的回答中抓住他“背叛民族社会主义精神”的证据，揭露希特勒“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说：“您生气的真正原因，是出于维护党的合法夺权原则，维护您与资产阶级右翼政党新的合作利益，企图扼杀您所拒绝、而由我们宣传的革命的社会主义！”^②希特勒被这一番话弄得怒气冲冲，狼狈不堪，从此决心消除奥托·施特拉瑟及其支持者。

在此之前，希特勒在党内制造了一种反对施特拉瑟派的声势。1930年3—5月，在希特勒的指示和赞许下，戈培尔先后在

^{①②} 莫雷诺：《左派民族社会主义》，第25、33—34页。

柏林《进攻报》上发表4篇文章，指责奥托·施特拉瑟不懂得革命……“只在书桌旁拼凑革命理论，不考虑现实可能性”。他还说，奥托·施特拉瑟的“革命举动”，是“膨胀的激进主义精神病患者，手持匕首，在大街上疾走的行动”，败坏了纳粹党“好的革命名声”。戈培尔号召反对这种“背叛”，“开除所有追随者，结束这种路线”。^①希特勒软硬兼施，在进行攻击的同时，以许诺议员之职和金钱拉拢收买。1930年5月，希特勒对奥托·施特拉瑟说：“我准备购买您的出版社（战斗出版社）。给格雷戈尔、您和亨克尔每人6万马克。此外，亨克尔和您出任国会议员”。^②由于在国会中担任纳粹党议员，必须服从纳粹党国会党团内部的纪律，等于直接依附希特勒，奥托·施特拉瑟拒绝了 this 建议。希特勒则威胁说：“如果您不同意我的条件，我将采取一切手段对付您！”^③5月22日，希特勒又同奥托·施特拉瑟、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和汉斯·亨克尔谈话。后二人在谈话中没有公开支持希特勒，但也不准备支持奥托·施特拉瑟。奥托·施特拉瑟和他的追随者陷入困难境地。

希特勒原来担心，党内公开分裂会使受施特拉瑟派社会主义词句影响的党内外小资产者跑开，因而把最后摊牌的时间，推迟到1930年萨克森邦议会选举之后。6月22日晚，纳粹党在萨克森邦选举中取得胜利，获得比1929年5月12日选举增长好多倍的选票。^④于是，希特勒决定公开清洗奥托·施特拉瑟反对派。

6月23日，希特勒向戈培尔发出一道紧急指示，责令清除奥托·施特拉瑟及其支持者出党，其中写道：“我请您对党进行无所顾忌的清洗……我已指示全国调查委员会，全力支持您完成这一任务……整个运动的所有组织，整个元首参谋部，整个冲锋队和

①、②、③，莫雷诺：《左派民族社会主义》，第31、32页。

④ M·莫雷诺：《左派民族社会主义》，第36页。

党卫军，党的全体代表都支持您，反对6、7个职业好争讼者和文痞”。^① 6月30日，希特勒又写信给戈培尔，授权他进行清党。当天，戈培尔召开柏林大区全体党员代表大会，宣读希特勒写的这封信，开始了对奥托·施特拉瑟及其追随者的大规模清洗运动。会议进行了几天，主要被清洗者有《纳粹党通讯》主编、党内俄国问题专家、战斗出版社编辑欧根·莫萨科夫斯基，《萨克森观察家报》主编里夏特·沙帕克，一些激进派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弗里茨·赫尔曼、阿尔弗雷德·拉埃什克，以及里希特兹尔德地方组织和柏林大区一些党员。

7月3日，奥托·施特拉瑟向希特勒发出一份决裂式的最后通牒，写道：“昨天，戈培尔先生以错误的借口，禁止我的几位同事发言，并将我的许多同事开除出党。如果在24小时之内不撤回这些措施，我将视之为与党及其朋友们的决裂。”^② 希特勒未予理采。7月4日，奥托·施特拉瑟联合26位北方派领导人发表退党声明，并呼吁“社会主义者离开纳粹党！”

奥托·施特拉瑟被排除出纳粹党之后，很快组建了革命民族社会主义者战斗同盟（后简称“黑色阵线”），继续与希特勒相对抗，反对纳粹党及后来建立的第三帝国，成为反对纳粹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纳粹保安机构的搜捕与迫害，该组织在德国和奥地利进行的斗争只持续到1935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至1938年，随后转移到南、北美洲。^③

迫使格·施特拉瑟退党

希特勒派与施特拉瑟派的第三次也是最后的较量，是迫使格·施特拉瑟退党，从而导致施特拉瑟派的瓦解。

^①、^②、^③ 莫雷诺：《左派民族社会主义》，第37、40、10—11页。

奥托·施特拉瑟及其支持者被清除出纳粹党之后，纳粹党的一般党员，冲锋队中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的核心人物，把格·施特拉瑟看成是“社会主义意志”的“最后保障”。^①格·施特拉瑟担任纳粹党的组织部长，在党内地位仅次于希特勒，在下层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纳粹党内不少人甚至认为他很可能取代希特勒。不过，纳粹党自1929年以后所取得的成就，使格·施特拉瑟对夺取政权途径的观点有所改变。他认为，党应该保持“社会主义原则”，但通过同保守势力结盟比起共产党式的不肯定的革命“更为可靠”。^②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对以他弟弟奥托·施特拉瑟为首的战斗同盟提出的实现“德国革命突破”的任务，没有表示明确支持。希特勒尽管反对格·施特拉瑟的观点，但深知他在群众中的影响。为了继续争取党内外小资产阶级群众，希特勒不得不允许以格·施特拉瑟、雷温特洛夫伯爵、瑟维林·霍尔特曼、施灵厄领导的社会主义者统一阵线组织继续存在。

1930年10月14日，格·施特拉瑟发动纳粹党国会议员在国会提出一项法案，要求把利率限制在4%，无偿征用“银行和股票交易所”以及所有东方犹太人的全部财产，将大银行收归国有。^③1932年5月10日，他在国会声明：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一个民族对一个剥夺劳动权利和不愿意恢复正常交往国家的抗议……目前事态发展的重要之处，是我们的人民充满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情绪……这种反资本主义的感情是一个证据，证明我们处于伟大变革——自由主义以及新经济思想和新国家概念产生的——前夜”。^④受到格·施特拉瑟影响的纳粹党企业支部，赞成立即采取社会主义行动。

1932年11月6日，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失去200万张选票，议

①、②、莫雷诺：《左派民族社会主义》，第160、45页。

③、④ 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上册，第165、210页。

席由230席下降到190席。^①与纳粹党任何其他领导人比较，格·施特拉瑟对这一挫折的感触更深。一方面，纳粹党内激进分子因幻想破灭而倾向于共产党的趋势给他强烈的触动；另一方面，希特勒在秘密组阁谈判中顽固地“要求一切大权”和牺牲党纲的行动又使他十分反感。他认为，要使纳粹党免于瓦解的唯一途径是作出妥协以便立即执政，甚至可以作联合政府中的伙伴，使党得以影响政府的政策，至少可以贯彻党纲的一部分精神。^②

1932年12月3日，施莱歇尔出任总理。为了获得群众支持，稳定政局，他希望同纳粹党的格·施特拉瑟派，同雷帕尔特领导的一个工会阵线以及其他政党联合，重新在国会中获得多数。施莱歇尔背着希特勒，同格·施特拉瑟连续谈判，提议他出任内阁副总理。与此同时，在普鲁士邦，纳粹党和中央党正在商谈组成联合政府，格·施特拉瑟被提名出任邦总理，而戈培尔和戈林未被列入内阁部长名单。^③这样一来，格·施特拉瑟便被希特勒、戈培尔和戈林等人视为实现个人野心的最大威胁。

1932年12月7日，格·施特拉瑟同希特勒商谈组阁问题时，希特勒严厉斥责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背叛。格·施特拉瑟对此予以坚决反驳，并指责希特勒牺牲党的纲领和要求在政府中掌握全权的计划是“很可耻的”。他当夜写的一封致希特勒的公开信宣称“不再赞成党所采取的政治方针”，即希特勒的方针。他指责：“希特勒之实际上的行为与他在宣传中所标榜的思想完全不符……纳粹党陷入了绝望的政治路径。这必将导致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而陷德国于万劫不复的地步”。^④

① 波罗夫斯基：《阿道夫·希特勒》，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② 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上册，第234页。

③ 莫雷诺：《左派民族社会主义》第158、159页；《大独裁者希特勒》上册，第234页。

④ 海登：《德国国社党史》，第453页。

希特勒对格·施特拉瑟公开决裂的行动十分震惊，曾到戈培尔家里，沮丧地说：“如果党一旦垮台，我就将在3分钟之内用手枪了此残生”！^①但是，在这关键时刻，格·施特拉瑟却错误地采取了退却的行动。第二天，即12月8日，他辞去纳粹党内一切职务，带着家属跑到意大利“疗养”去了。希特勒趁机反击。格·施特拉瑟在党内为数众多的追随者纷纷转到希特勒的一边。施特拉瑟派因而归于瓦解。

施特拉瑟派在党内斗争中失败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下述几点：

首先，在帝国主义时代，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敌对阵营的激烈斗争中，他们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其发展结果，归根到底或者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或者追随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企图走独立的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这既为客观形势所不许可，也是由于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妥协、软弱的特性，无力坚持独立的斗争。这些弱点在格·施特拉瑟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始终缺乏公然向希特勒挑战的顽强精神。当他的弟弟奥托·施特拉瑟因反抗希特勒而被清除出党时，他屈从于希特勒。当后来他同希特勒的斗争进入关键时刻，他又轻易地退却出走。

其次，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排挤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垄断企业排挤小企业，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日益起着重要作用的时期，施特拉瑟派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并不代表未来。它反映的是前资本主义时期旧式手工业者、独立小农和小商人这一类小生产者落后的生产方式和要求，只能是一种脱离实际的乌托邦式空想。虽然在当时的德国，该派反对大资本和废除地租等小资产阶级激进要求，具有某种进步意义。但该派并非要发动一场

^① 波罗夫斯基：《阿道夫·希特勒》，第76页。

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进行革命性的变革，而仅仅是企图进行一些符合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革。因此，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他们既得不到广大工人阶级的有力支持，又遭到大资产阶级的反对，加上内部的分散性和软弱性，就很难形成实现其要求的强大社会力量。

最后，施特拉瑟派虽然在政治上、思想上形成了党内明显的一派，但在组织上十分松散，并没有建设一支受过训练和具有政治远见的干部队伍，也低估了希特勒主流派的力量和作用。当投靠大资产阶级的希特勒派精心策划进行反击时，施特拉瑟派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稳定队伍，争取大多数，进行切实有效的斗争，而是茫然失措，坐等溃败。因此，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第四章

德国纳粹党同主要社会 阶层的关系及其性质

德国纳粹党从成立初期只拥有几十名成员的小党，经十余年经营发展成国会第一大党，进而在德国执政，离不开国内各主要社会阶层的支持。在其支持者中，最重要的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下层民众，统治阶级中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国防军。前者充当了它的社会基础。后者作为当时统治德国的支柱，既为纳粹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条件，又在关键时刻扶植它上台执政。它们在纳粹党夺取政权过程中都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利益上矛盾和冲突，有些矛盾甚至是难以调和的。探讨纳粹党同这些社会阶层关系的演变，不仅对于纳粹党的性质，而且对于整个研究纳粹主义、纳粹运动（其核心是纳粹党）以及纳粹政权，都有着重要意义。

1933年1月希特勒刚就任德国总理时，还未确立法西斯的极权独裁统治，纳粹党的实质也未完全暴露。在以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积极卷入由1929年经济危机开始的政治动荡的德国各社会阶

层，都从不同的角度渴望满足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它们之间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进一步展开。纳粹党同它们之间的关系演变也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希特勒1934年6月清洗冲锋队，以及8月就任总统(兼总理)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标志着德国法西斯极权独裁统治的最终确立，也使20年代以来纳粹党同各社会阶层关系的演变暂告一个段落，转入另一个发展阶段。故而本章将探讨这个问题的时间下限，定在1934年6-8月，而不是1933年1月。

第一节 纳粹党与中下层民众

纳粹党同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下层民众的关系，历来是我国史学界分歧较大而又较难说清楚的问题。其实，如果摆脱从概念出发和以阶级范畴编排历史的框框，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畴内，对错综复杂的具体矛盾运动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是有可能得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的。马克思说得好，“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①

关于纳粹党党员社会成份的资料，很多西方出版的书籍中都作了介绍，其中迈克尔·凯特尔撰写的《纳粹党：1919-1945年党员和领导人的社会简况》中，提供的数据比较完整(但它的分类标准不尽科学，例如把大学生归入“上层阶级”一档)。该书提供的资料表明，20年代纳粹党人的社会成份绝大部分是以小资产者为主体的中下层民众。1920年—1921年，慕尼黑地区的纳粹党员中，工人占28.6%，工厂主、企业经理和上层官吏占3.4%，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低级职员和公务员、大学生等占67.9%。(其中比例较高的为小商人，占19.2%；低级职员占11.8%；大学生占10.4

(1)《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7页。

%；低级公务员占9.9%)从全国范围来说，1923年秋全部党员中，工人占35.5%，工厂主等占5.5%，小资产阶级分子占59%。即使在大区领袖(Gauleiter)一级的纳粹党干部中，1925-1928年，工厂主和上层官吏等也只占27.8%，小资产阶级分子却占66.7%，工人占5.5%。^①

当然，判断一个政党属于什么性质，主要不是根据党员和支持者的社会成份，而应分析它的政纲和实际行动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分析它的领导集团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受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所支配。但是，党员的社会成份对决定一个政党的性质不是没有影响的，特别是当这些人没有放弃自己的阶级要求，并把其所属的党看作是自身利益代表者的时候。

在上一章，我们已经分析了早期纳粹党，包括它的前身德国工人党的领导核心，论述了作为早期纳粹党政治主张集中体现的二十五点纲领的主导倾向及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指出了纳粹党领导成员从一开始就对二十五点纲领持有不同的态度，并在其后逐步发展成为纳粹党内的两个派别，产生尖锐激烈的斗争。这些说明：希特勒在纳粹党内领导地位的逐步确立，希特勒派夺取政权途径和策略的改变，它对德国各主要社会阶层态度的变化，以及它同党内反对派的斗争等等，同纳粹党的性质演变过程是密切关连的。

两个转折点

1921年7月，希特勒强使纳粹党确立“领袖原则”，自任党的“元首”。由于他持有狂热的民族沙文主义和反共思想，遂为纳粹党的性质转变奠定了基础，尽管此时领袖原则还未能彻底贯彻，希

^①迈克尔·凯特尔：《纳粹党：1919—1945年党员和领导人的社会简况》，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243、256页。

特勒思想中对如何处理同垄断资产阶级的关系尚不明确。

1923年11月“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在狱中总结政变失败的教训，决定在扩大群众基础的同时，全力争取权势集团的支持，走合法斗争的道路。德国的权势集团就是垄断资产阶级、军官团和容克贵族。这一决定可以说是希特勒背叛小资产阶级的关键性一步，也是纳粹党性质演变的第一个转折点。

希特勒在出狱前以及出狱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尚未能完全控制纳粹党。尽管德雷克斯勒已隐退，弗德尔的影响大为减弱，但希特勒在狱期间担任纳粹党实际领导人之一的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和奥托·施特拉瑟，以更有力的态势成为希特勒的竞争对手。施特拉瑟兄弟的政治主张没有越出小资产阶级的范畴。

1932年10月11日，格·施特拉瑟曾向美国《纽约晚邮报》记者表示：“我们承认私有财产。我们承认个人主动性……我们反对商业国营。……我们掌权后将不会有激烈的变革。”^①同年5月10日，他还在国会发言中要求德国“同黄金、世界经济、唯物主义这些恶魔断绝关系，同输出统计和银行利率的思想习惯断绝关系”。^②他甚至将自己追求的社会制度称为“国家封建主义”。^③

但是，施特拉瑟一派强烈主张坚持并扩大党纲中的“社会主义”要求，强调将大工业、银行和大地产收归国有，使工人有权参与企业行政管理和财产占有；农民重新分配土地，获得“世袭采邑”；外交上同苏联和反帝的东方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联合，共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国际联盟的奴役^④。施特拉瑟兄弟在政治上并非共产党的同盟军，而是如他们所表白的那样，企图追求资本主

^①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7年版，第664页。

^② 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210页。

^③ 威斯特里希：《纳粹德国名人录》，第302页。

^④ 同上书，第302-304页；并参见路易斯·L. 斯尼德：《第三帝国百科全书》，纽约1976年版，第335-336页。

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①。1925年11月，他俩曾抵制希特勒的意见，支持德国共产党提出的就无偿没收前王公贵族财产给劳动人民的问题进行公民投票的建议。30年代初又反对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等保守政党联合，反对希特勒同胡根贝格、巴本、沙赫特等旧势力的代表人物勾搭。^②

如前一章所述，1925年11月在汉诺威召开的北德纳粹党大区领袖会议，是党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力图扭转党的发展方向的一次尝试，并取得了短期的胜利。汉诺威会议与会25人中，除莱伊和弗德尔支持希特勒外，其他人都要求施特拉瑟兄弟起草新的纲领，以取代二十五点纲领。有人甚至提议将希特勒开除出党。

希特勒巧妙地利用施特拉瑟派内部围绕新纲领的意见分歧，于1926年2月4日(工作日)在远离施特拉瑟派根据地的南德班堡召开纳粹党全德领袖会议。在大部分北德大区领袖没有与会的情况下，希特勒占据了绝对优势，巩固了自己的领袖地位，否决了施特拉瑟派的纲领。班堡会议是纳粹党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希特勒压倒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使纳粹党最终走上同垄断资产阶级勾结并成为垄断资产阶级实际利益代表者的道路。

1926年5月，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宣布二十五点纲领永久不变，并垄断对党纲的解释权，以防止其向“左”偏移。1928年4月，希特勒以纳粹党的名义发表声明，重新解释党纲第十七条，强调纳粹党维护私有财产，“土地改革”主要针对犹太人的投机公司，“无代价没收”必须限于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

班堡会议以后，施特拉瑟派的影响还继续存在。他们在北德

① 该理论认为利害相关的社会组织是以社会成员的相互依存为基础的。

② 罗·威斯特里希：《纳粹德国名人录》，第302页。

地区拥有《民族社会主义通讯》、《柏林工人报》、《萨克森观察家报》等报刊和足以同埃耶尔出版社相对应的战斗出版社。格·施特拉瑟担任了纳粹全国组织领袖(1932年)，一度成为地位仅次于希特勒的纳粹党内第二号人物。但是，由于希特勒强化了党的“领袖原则”，以及施特拉瑟兄弟缺乏从事党内斗争的经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纳粹党的路线。

为了争取选票

资料表明，1926-1928年纳粹党的宣传重点主要放在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方面。同样，统计数字表明，这段时期纳粹党对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吸引力不是很大。党员人数从1926年3月的32,373人缓慢增加到1928年底的96,918人。新入党者大多为极端民族主义者。① 所得选票反而有所减少，从1924年12月的90.73万票(占总票数3%)降至1928年5月的81.01万票(占总票数2.6%)。②

1928年选举失利后施特拉瑟兄弟加强对希特勒的批评。奥托·施特拉瑟在《民族社会主义通讯》上呼吁，若不加强“社会主义”宣传，纳粹党将走入死胡同。希特勒也需要中下层民众的选票，没有这些选票，他就没有资本同权势集团进行政治交易。

1929年秋爆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极大地冲击了德国中下层民众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史学界过去在分析这一情况时，主要是强调其为纳粹党用煽动性社会宣传争取群众提供了机会。实际上，它同时是甚至更主要是迫使纳粹党扩大希特勒本已

① 迈·凯特尔：《纳粹党：1919-1945年党员和领导人的社会简况》，第263页。

② 科·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第762-763页。

日渐抛弃的“社会主义”宣传。

在经济大危机的冲击下，受尽饥饿、贫困、破产、失业痛苦的德国广大中下层民众，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和获得国家的保护。魏玛联盟或魏玛大联盟各政党（前者包括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和民主党，后者还包括人民党和民族人民党），奉行的是维持现状的传统政策，自然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右翼君主势力虽然主张“改变现状”，但他们的目标是复辟霍亨索伦王朝。这种向后看的主张对于中下层群众是没有吸引力的。^①唯一能同纳粹党争夺群众的是德国共产党，但当时德共提出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消灭私有制等等“左”的主张，宣传有些脱离实际，未能更多地争取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

纳粹党在经济危机期间，加强攻击魏玛共和国，许诺种种“社会改革”方面的要求。它有意识地显示其力量与权威，举行各种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从而使民众得到这样的印象：选择纳粹党将能改变现状，得到强有力的国家保护。它保存私有制的主张，也迎合了小资产阶级民众作为私有者的心理。纳粹党的宣传注重感情煽动、群体心理效应以及运用先进的宣传手段。这样，它争得了广大小资产阶级民众以及相当一部分工人的投票支持。

经济危机期间，纳粹党加强煽动性的社会宣传，使党内热衷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要求的人，再次活跃起来。当这些活动不影响到同权势集团的勾结时，希特勒就把它们作为欺骗性宣传的重要部分而加以利用。一旦影响到同权势集团的勾结，希特勒就坚决加以制止。如1930年6月迫使奥托·施特拉瑟退党，同年10月强迫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和弗德尔等撤回向国会提出的要求限制银行利率、无偿征用银行和交易所巨头财产的议案。1932年12月迫使格雷戈尔·施特拉瑟辞去党内职务等等。

^① 维利巴尔德·古切、约阿希姆·佩措尔德：《霍亨索伦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载于民主德国《历史杂志》1981年第10期。

短暂的“蜜月”

纳粹党执政后，被煽动起来参加纳粹运动的广大中下层群众，也因“胜利”以及接二连三的火炬游行等群众性行动，鼓起了一股狂热的情绪。他们一方面以为纳粹党真的要按其所宣传的去实行“社会主义”了；另一方面则以小资产阶级社会下层特有的那种“捞一把”的强烈欲望，要求纳粹党采取行动，给予他们参加“纳粹革命”所要得到的报偿。

纳粹党内反映小资产阶级利益和情绪的一派，纷纷提出相应的建议。弗德尔要求实施二十五点纲领中的经济条款及其关于国有化、分红制、取消不劳而获的收入和“废除利息奴役制”等要求。纳粹农民领袖达雷建议大幅度降低农民债务的资本价值，把利率降低到2%。工商业中产阶层战斗同盟领导人奥托·瓦格纳要求控制垄断资本家组织德国工业全国公司，并接管大百货公司、统一价格商店和消费合作社。^①

以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失业工人为主体的冲锋队，在反犹太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口号下掀起了抵制大商号、交易所和消费合作社的运动。其各级领导人则大肆攫取地方政府官员职位。到1933年底，普鲁士邦的市、镇长中只有14.3%留任，其余都成了冲锋队的“战利品”。几乎所有普鲁士大城市的警察局长都由冲锋队领袖担任。冲锋队的特派员还掌管了部分行政部门，控制了市政府、新闻教育单位和市民大会。^②

在这股浪潮的冲击下，刚刚上台执政的希特勒，为了保证其政权的群众基础，尽量在宣传上对中下层民众采取安抚政策。

^① 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276页。

^② 海因茨·赫因，《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63页。

1933年5月，希特勒和纳粹劳动阵线头目莱伊先后向工人发表讲话，表示要保护工人免遭资本主义剥削，扩大工人的权利。^①但涉及中下层民众同垄断资本之间利益分配的实际问题上，特别是当两者不能兼顾时，希特勒基本上维护了后者的利益。^②

垄断资本家占据了全国经济决策机构德国经济总会和经济控制机构全德经济院的领导职务，继续掌管着国家的经济决策权。1933年5月和7月，戈林和赫斯分别发布命令，禁止工商业中产阶级战斗同盟和党员对经济事务或大工商企业采取任何干预行动。同年8月，战斗同盟被迫解散，成千上万的小资本公司转变为大业主和大股东领导的公司。卡特尔制度得到发展，企业的合并使无数小企业倒闭。^③

工人工资在企业利润中的比重逐渐下降：1925—1929年间工人收入的比例由66.2%提高到68.2%，而财产和企业收入则由33.8%下降到31.5%；相反，在第三帝国时期，1933年至1939年间工人收入的比例由68%下降到63.5%，而财产和企业收入的比例则由32%上升到了36.5%。^④1933年2月4日颁布《保护德国国民的总统法令》，禁止工人在重要企业罢工。1934年1月20日颁布《国民劳动秩序法》，规定工人是工厂主的法定下属，必须绝对遵从其指挥，并宣布取消先前能参与调整工资和劳动时间的工厂委员会。^⑤1933年7月，希特勒甚至要求“纳粹革命”告一段落，转入对“千百万人进行教育”的新阶段。

① 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268、269页。

② 参见于尔根·库钦斯基：《德国，法西斯统治下经济和劳工状况》，纽约1968年版，第35—41页。

③④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54—455、457页。

⑤ 《德国历史文献，1933—1935年》，柏林1977年版，第67号文件。

扼杀“第二次革命”

没有得到满足的小资产阶级中下层民众的情绪，集中反映在1933年夏秋起纳粹党内出现的要求实行“第二次革命”（即继“民族革命”之后的“社会革命”）的口号上。^①这个口号是罗姆提出的。他在1933年4月18日的信中写道：“人民中间个个都在谈论一定要进行的第二次革命。这是说一次革命没有完。现在我们要同反动派算帐了。革命绝不能停下来。”^②这时已经拥有200万人的冲锋队，成了要求实现这一口号的中坚力量。中下层民众的支持曾经是希特勒上台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冲锋队更是他攫取政权的重要工具。积极鼓吹“第二次革命”的冲锋队参谋长罗姆被认为是希特勒的“亲密战友”。不到万不得已，希特勒是不会下决心清洗冲锋队的。

实际上，希特勒也曾采取措施试图缓和这一冲突。1933年12月1日，政府颁布一项确保党和国家团结法，任命罗姆为国家内阁阁员。1934年初，希特勒给罗姆写了一封从头到尾使用“你”这个亲密称呼的信件，颂扬冲锋队在确保“纳粹革命”胜利和纳粹国家及人民的生存方面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年2月，内阁通过《关于国家运动战士供应法》，规定在国家运动的政治斗争中患病和受伤的纳粹党员或冲锋队员，像一次大战中受伤的人员一样，将得到国家的抚恤金或补助金。^③从总体上说，希特勒试图在不损害同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进一步合作的前提下，平息冲锋队

^① 参见奥蒂斯·米切尔，《希特勒征服德国：纳粹独裁制度的建立（1931—1934）》，费城1983年版，第226—227页。

^② 戈培尔，《凯撒霍夫》，转引自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册，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292页。

^③ 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283页。

的不满。

如果说，在纳粹党执政前，希特勒能够一方面秘密勾结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和政治上层权势人物，另一方面以煽动性社会宣传骗取广大中下层群众的支持的话，那么现在他就再也无法同时沿着两条相互矛盾的政治轨道运行了。最后的摊牌势所难免。当由冲锋队（这时已扩展到250万人）反映出来的纳粹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势力，同垄断资产阶级及国防军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时，或者说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不能再容忍纳粹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呼声时，希特勒便公开站到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一边，于1934年6月30日清洗冲锋队，压制了第二次革命的要求。

就在这一天，希特勒在慕尼黑和柏林以及其他地方，同时逮捕并未经审讯即枪杀了冲锋队参谋长罗姆、西里西亚冲锋队长海因斯、柏林冲锋队队长恩斯特等冲锋队领袖和骨干分子61人。^①从1929年开始的纳粹党同德国中下层民众的蜜月时期遂告结束。

第二节 同垄断资产阶级的关系

纳粹党之所以能在30年代初上台执掌政权，虽然同它在经济危机的历史条件下，靠煽动性的社会宣传取得相当广泛的中下层群众支持有关，但关键还在于获得德国统治集团的支持，其中尤其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主要成员来自社会下层，纲领上写着“反对大资本”条款的纳粹党同垄断资产阶级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考察这个过程，对于我们认识纳粹党的性质，认识它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演变，它得以在1933年

^① 这是希特勒1934年7月13日在德国国会宣布的数字。德国流亡者在巴黎出版的《清洗白皮书》讲有401人被杀。1957年在慕尼黑审判时提出的数字是1000多人，参见《第三帝国的兴亡》，第317、318页。

上台执政及其所推行的政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巴伐利亚走向全德

在啤酒馆暴动以前，纳粹党同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联系甚少。1921年，希特勒曾在汉堡民族俱乐部向资本家作过一次报告，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只吸引了个别中小企业主。通过这些企业主，希特勒结识了鲁登道夫、鲁尔地区大资本家胡戈·施廷内斯和钢铁巨头弗里茨·蒂森。后者曾于1923年向纳粹党捐赠10万马克。^①

由于垄断资本家对纳粹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要求心存疑虑，希特勒又把群众性的暴力活动作为夺取政权的主要手段，因而，从总体上说，这段时期纳粹党同资产阶级的交往主要限于巴伐利亚地区的部分中小企业主和商人。他们并不是把希特勒作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而是把他作为某种下层黑社会集团的头子，给予若干金钱资助，用以对付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决定走合法斗争的道路。他出狱后，一方面重整纳粹党，加强控制，压制和排斥那些当真追求纲领中“社会主义”条款的人。另一方面加紧同垄断资本家拉关系。

1924- -1929年是纳粹党为同垄断资产阶级确立广泛联系打下基础的时期。希特勒通过各种途径，频繁同大资本家们接触，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解释纳粹党的纲领，打消他们的疑虑。

1926年2月，希特勒第二次在汉堡民族俱乐部向资本家发表秘密演说。这个组织全称汉堡1919年民族俱乐部，是一个当地社会和经济界头面人物的联合会。创始人银行家马克斯·冯·申克

^① 埃伯哈特·茨肖恩：《谁扶植希特勒上台：德国工业界在摧毁魏玛共和国事件中的作用》，科隆1978年版，第15页。

尔，系北德银行和贴现公司首脑。前总理古诺曾任该俱乐部主任。1926年初，该俱乐部成员约有400—500人。

1926年夏，希特勒周游鲁尔和莱茵地区，在各种非公开场合同工业家聚会。6月18日，希特勒在埃森第一次向鲁尔和莱茵地区40名经济界领导人，做了题为《德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报告。同年12月1—3日，希特勒在柯尼希斯温特和埃森，向鲁尔区重工业家做了题为《民族基础之上的民族复兴》的报告。1927年4月27日，希特勒又应鲁尔区经济界领导人要求，在埃森作了第三次报告，题为《领导与群众》，参加者约200余人。

此后，希特勒同工业界领导人物频繁交往。1927年10月26日，他会晤鲁尔区14名经济界领导人。同年6月4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同重工业巨头、煤矿大王埃米尔·基尔道夫所作的长达四个半小时的谈话，可以说是这段时间内希特勒与大资本家政治性聚会中最重要、最典型的一次。事后，基尔道夫要求希特勒把他的政见整理成小册子，定名《重新崛起之路》，在资本家中广为散发。随后在1927年12月5日，希特勒把这次谈话的内容以《重新崛起之路》同样的题目，在埃森克虏伯大厅，向来自埃森、波鸿、斯尔森、基尔逊、杜伊斯堡和整个鲁尔工业区的600多名工业家发表了演说。

从《重新崛起之路》小册子以及其他几次演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希特勒向垄断资本家们阐明的纳粹党的真正纲领。他鼓吹“生存空间”论，声称每个民族都需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定的空间，只有当它参加普遍存在的生存斗争并把这种斗争当作民族繁衍的前提时才称得上是健康的。他强调德国政治的崇高任务在于使这个天然的帝国得到天然的满足，而据他说德国依靠本国的土地已无法养活全体人民；德意志民族是优秀的民族，但近几十年来民族水准正在不断下降。他宣称纳粹运动要以民族主义思潮去代替目前占统治地位的国际主义思潮，要用个人绝对权威去代替以民主方

式推行的对群众的崇拜，要用宣传反抗和斗争去代替和平主义的污染，以拯救德意志民族。他还声明，纳粹党不是议会政党，其目的是推翻魏玛共和国，但纳粹党不是要改变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而是“维护私有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建立一个强有力国家，扩充军备，发动战争，实现德国的扩张目标。^①他特别强调争取群众的重要性，宣称纳粹党具有争取群众的特殊能力，能够发动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消灭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将“广大群众引入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怀抱”。

希特勒意识到，纳粹党二十五点纲领中有关反对大资本和社会改革的条文，是大工业家和大农业主不能接受的，将成为他取得统治集团支持的障碍。因而希特勒在1927年前后同重工业家多次会晤中反复表白，纳粹党的反资本主义只是反对“贪婪的犹太资本”，绝不反对“创造性的雅利安人资本”；并解释纳粹党纲领之所以提出反对大资本的要求只是出于宣传上争取民众的需要，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约束力；“反资本主义”非但对大资本家和大农业主无害，而且有利于将群众引入反犹主义轨道。^②他还向大资本家进一步解释说，民族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仅限于向民众提供衣食娱乐的社会政策，并不触动私人财产，与经济和政治决策无关；国家通过采取福利政策，把工人争取到民族主义方面，建立起一个克服一切阶级对立的“民众共同体”，为工业家带来更大利润。^③

为了避免引起大资本家的惊恐，希特勒本人在公开的群众集会上，很少采用“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口号，主要是进行民

① 库尔特·戈斯魏勒：《1925—1928年希特勒与资本家》，见库尔特·戈斯魏勒著：《法西斯主义论文集》，柏林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71，489—490页。

② 希特勒：《重新崛起之路》，见H·A·特尔纳《德国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哥廷根万登霍克—鲁帕雷希特出版社，1980年第2版，第 页。

③ 戈斯魏勒：《法西斯主义论文集》，第484页。

族主义的煽动。在他的演说中，尽管充斥着反马克思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对魏玛共和国的攻击，但是特别明显的是宣扬民族主义，反对凡尔赛条约，强调国家权威的民族扩张主义。为了迷惑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希特勒对“社会主义”进行民族主义的解释，声称二者的意思是一致的，使“社会主义”从属于“民族主义”。1926年6月17日，希特勒在鲁尔区群众集会上讲话时指出：“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是……他的国民在一切生活领域中，为生存斗争制造所需武器的人……但是，社会主义者也从事同样的事业。谁想成为社会主义者，谁就必须为他的人民服务，在各民族生存的残酷斗争中，能够使民族自我保存……。如果出于这种认识，将二者合成一个新的概念，那么作为唯一的可能是将广大群众的社会力量同天才人物的民族思想融合为一。”

与此同时，希特勒十分明瞭“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宣传在争取群众、赢得选票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并不限制纳粹党其他领导人进行这方面宣传。他认为，获得群众选票是他合法夺权的门票，是同垄断资本家讨价还价和提高身价的砝码。

重要的突破

1926—1927年，希特勒同鲁尔重工业家接近的行动，开始引起对方的重视。1927年3月30日，赫斯就希特勒向鲁尔工业家们发表演说所写的报导中指出：希特勒基本上赢得了听众。他描述说，最初，会场的气氛“相当冷漠，人们持保留态度，部分人面带讥笑……后来，听众的态度渐渐变了，明显地表露出内心的斗争，最后响起一阵掌声。而这些先生们是不轻易鼓掌的。”赫斯认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希特勒已不再是“一名陌生的异国人”，而是“一位政治领导人”；他们已经认识到希特勒及其运动的作用和可信赖性；并发现在为“德国帝国主义”交易所活动的众多其他竞争

者中，希特勒可以充当影响群众的煽动者。他们相信纳粹党能起到对群众发挥影响并保证一种尽可能广泛的群众基础的作用。

这一时期，纳粹党在同垄断资产阶级的关系上取得的主要进展，在于希特勒把自己的影响从主要在下层打入到企业界和政界的上层，从主要局限于南德巴伐利亚地区扩展到整个德国。如果说希特勒在啤酒馆暴动以前，已经向像蒂森和斯廷内斯这样的鲁尔巨头搭上关系并获得过某种资助的话，那么现在他已把这种带有个别性质的、不稳固的联系与资助关系，发展为同企业界经常的联系和获得定期资助的关系。其中有两个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是前面已经提到的鲁尔煤矿大王、当时掌管鲁尔基金（德国重工业界的政治贿赂基金）的基尔道夫；另一个是化学托拉斯头子、当时同美国柯达公司合作的德国最大的照相明胶奥丁化学股份公司财主威廉·凯普勒。^①这两个人在后来扶植希特勒上台时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但是，纳粹党当时仍不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主要资助对象和主要政治代表。从全国范围来说，工业界的政治基金大部分仍旧是给了德国民族人民党、民主党和人民党。^②

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当然渴望对外扩张和对内加强垄断统治，渴望以强大的武力支持重新走上争霸欧洲和世界的帝国主义角逐舞台。但是20年代，从道威斯计划实施之后，德国获得了美英的大量“输血”，重新繁荣了经济，政局比较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仍然需要一个对外能以“和平”外交同协约国实行某种合作、对内能以“民主”政治调和各阶级关系的魏玛共和政权。因此，以推翻魏玛共和政权为目标、鼓吹暴力扩张、独裁统治和民族沙文主义的纳粹党，自然尚不能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特别青

^① 茨肖恩：《谁扶植希特勒上台：德国工业界在摧毁魏玛共和国事件中的作用》，第16页，并参见约翰彼得·霍斯特·格里尔：《巴登的纳粹运动，1920—1945年》，北卡罗里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157页。

^② 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166页。

睐。何况对于这个成员主要来自社会下层、纲领上又写有某种反大资本的社会要求的党，他们仍有种种疑虑。

不过总的说来，这一时期仍然是纳粹党同垄断资产阶级关系发生战略性转变的时期，没有这一时期所打下的基础，就不可能有下一时期垄断资产阶级把纳粹党捧上台的发展。

急需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德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整个工业生产降低40.6%，其中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生产指数分别退回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水平。国家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锐减至13.63亿马克。而1931年到期必须偿还的贷款高达64亿马克，信贷体系濒于总崩溃边缘。由于德国在凡尔赛体系中被剥夺了全部殖民地，英镑集团、美元集团、金本位集团等区域性经济和货币集团又堵住了德国经济向外渗透的缝隙，它的外贸量一落千丈。1929年—1935年，出口总额降低69.1%，进口总额降低70.8%。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刻化和持久化。危机期间，民众要求变革的愿望日益强烈，社会政治经济秩序激烈动荡。垄断资产阶级急需寻找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对外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夺取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对内控制深怀不满情绪的下层民众，稳定社会秩序。纳粹党遂开始受到更多的青睐，特别是它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跃升第二大党之后。

1930年11月27日，蒂森在德国工业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公开呼吁发挥纳粹党的领导作用。这标志着德国大资产阶级开始把希特勒作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提出来。不久，基尔道夫利用自己在矿山联盟中的地位，作出了一项决定，规定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所属企业，自1931年1月1日起，每售出一吨煤，就提取5芬尼资助纳粹党。在他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

资本家开始投向纳粹党，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弗利克联合公司的奥托·施泰因布林克、温特斯哈尔股份公司的奥古斯特·罗斯特克、国家银行行长沙赫特、德国金融界著名报纸柏林《交易所报》主编瓦尔特·丰克，形成了以鲁尔区重工业巨头为核心的“纳粹工业集团”。1931年6—7月，部分资本家和政治团体呈文总统办公室，要求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但没受到重视。^①同年秋，凯普勒联合愿意帮助纳粹党夺取政权的资本家组建“凯普勒集团”，从经济和政治上策划扶助纳粹党上台执政。^②

在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对扶植纳粹党上台一事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当纳粹工业集团积极资助和策划希特勒攫取总理宝座之时，以加工工业部门和输出工业部门为主的垄断集团，仍与纳粹党保持距离。其代表人物包括IG-法本化学公司经理卡尔·杜伊斯堡、西门子电气公司财主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大输出商和制铁工业家奥托·沃尔夫、克虏伯康采恩巨头古斯塔夫·克虏伯、通用电气公司理事会成员赫尔曼·比歇尔。他们由于一次大战后所处的地位比较有利，同国际资本有着广泛的联系，经济大危机期间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较少受到威胁，所以仍希望维持国际关系现状，通过国家干预的手段来疏导国内危机，政治上仍支持魏玛政府，反对让纳粹党执掌国政。

当然，即使这些垄断集团，也不是对纳粹党完全不加理睬。同是进出口、电力、化学工业中的IG-法本康采恩，就同纳粹党人建立了一种并不明显的微妙的联系。法本公司理事会主席、1925年兼任德国工业全国协会主席的卡尔·杜伊斯堡指示在各党派中寻找代理人时要求，除同国会和政府中各大党派保持联系以外，也不忽视同尚不著名、尚待考察的党派秘密联系，观察它们的适

^① 茨肖恩：《谁扶植希特勒上台：德国工业界在摧毁魏玛共和国事件中的作用》，第21页。

^② 路易斯·L·斯尼德：《希特勒第三帝国文献史》，第193页。

用性，旨在必要时能够施加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领导人格·施特拉瑟、莱伊、罗姆和赫斯等人，分别同法本化学公司的重要人物威廉·科普勒、银行家库尔特·冯·施罗德、海因利希·戈廷瑙、魏尔纳·但茨等人保持个人接触，并不断得到该公司金钱资助。

垄断资本集团的抉择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事实表明，运用资产阶级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已不足以应付这场危机。运用国家权力实行大规模干预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改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之适应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成为势所必行的趋势。但是，魏玛政府中缺乏这种明智人物。

1930年7月起，布吕宁政府依靠总统紧急权力实行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议会的牵制。然而，他恪守陈旧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是一个自我净化的过程，国家应该通过通货紧缩去“推动一个衰退的螺旋形下降”，以促使经济再次回升。他甚至希望用德国的经济崩溃景象来逼迫原战胜国取消赔款。布吕宁政府的紧缩经济政策，减少了社会的有效需求，深化了危机；而其停留在口头上的一些许诺，如降低物价，实行一定的社会改革，接管某些破产庄园的地产分配给无地农民，既不能安抚民众，又引起资本家和容克地主的反对，最终在政治阴谋中倒台。

1932年6月1日，中央党右翼领导人巴本，以资本家“右翼凯恩斯主义”集团为后台，组成政府。该集团包括IG法本化学公司的杜伊斯堡和H·施米茨、莱茵褐煤矿山及煤砖生产股份公司资本家保罗·西尔费贝格、上沃尔森希望之窝股份公司资本家卡尔·哈尼尔、通用电器公司董事瓦尔特·法伦霍斯特、古斯塔夫·西门

子、银行家罗伯特·普费尔德门格斯等人物。①

巴本政府前期基本上仍沿用传统的经济政策。他所实行的“干预”经济措施，只不过是增加捐税、削减社会保险和颁布法令允许资本家将法定工资削减一半，实行有利于大地主利益的农业定额分配制，其结果不仅进一步压缩了社会的有效需求，而且以其公开维护资本家和地主利益的色彩丧失了群众基础。同时，巴本在政治上顽固坚持反对议会民主的立场，鼓吹实行独裁统治，②遭到包括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基督教工会和原布吕宁政府阁员在内的各种政治集团的反对。

1932年8月起，巴本政府放弃通货紧缩政策，开始推行新的财经政策，试图通过分配国家任务和削减企业税收刺激私人经济，间接解决劳工就业问题，并规定实行“进口限定制”以保护国内市场。这一政策首先得利的是资本家，而且是由一个以公开维护资本家利益为色彩的右翼政府来推行，自然引起了工人的强烈反对。罢工运动进一步高涨。另一方面，巴本的“进口限定制”，又使许多同进出口贸易有利益关系的资本包括克虏伯等不满，其统治基础遂进一步缩小。

1932年12月，施莱歇尔将军取代巴本组成政府，他既是部分国防军高级将领的代表，象征着国防军对政治的干预，同时也代表了被称为“左翼凯恩斯主义”集团的资本家的政治要求。这些资本家包括克虏伯、O·沃尔夫、奥特·伦根丹茨、克吕希纳工厂股份公司资本家汉斯·克雷默尔、德国电器工业联盟成员汉斯·冯·劳默尔、法兰克福—美因茨金属贸易公司资本家里夏德·默通等。③

① 茨肖恩：《谁扶植希特勒上台：德国工业界在摧毁魏玛共和国事件中的作用》，第39页。

② 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第153—154页。

③ 茨肖恩：《谁扶植希特勒上台：德国工业界在摧毁魏玛共和国事件中的作用》，第47，34—35页。

具有强烈政治野心和善于搞阴谋活动的施莱歇尔，推行了不同于前任的政策。他为了获得国会多数的支持，力图建立“横向阵线”，即横贯所有政党派别的阵线，以便阻止纳粹党独掌国政。^①他力图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政治上同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全德工会联合会和基督教工会合作，甚至想让格雷戈尔·施特拉瑟担任副总理以削弱希特勒的实力和影响；经济上采纳亨特雷克的方案，声称既不赞成资本主义，也不拥护社会主义，把“创造就业”作为主要奋斗目标。^②施莱歇尔政府执政期间，下令不增加新的税收并控制物价，取消巴本内阁削减工资和救济金的规定，废除农业定额分配制，在东部实行补贴无地农民定居的庞大计划，同时决定耗资5亿马克，发行特别期票，用以增设劳动就业岗位；外交上准备同苏联谈判，延长1926年德苏条约，并扩大两国贸易关系。

这个出身军官团的施莱歇尔，不仅在政界经营时间不长而根基尚浅，即使在军界也以资历欠深和喜弄权术而缺乏有力支持。他既未能为自己在政治上层和垄断资本集团中建立稳固基础，也未能以其某些社会政策拉拢到工人和下层的广泛支持。相反，其干预经济的措施引起垄断资本集团中“巴本派系”的恐惧，认为其政策具有一种“布尔什维克的危险”。西门子甚至表示：与一种布尔什维克的危险相比，希特勒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这就给希特勒提供了进一步争取垄断资本集团的可乘之机。

1930年9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惊人成就之后，在与垄断资本关系方面出现了质的变化，由原来的秘密接触转为公开结盟。首先是1931年10月11—12日，纳粹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钢盔团和泛德协会等组织的领导人，同重工业家、大银行家和大贵族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哈尔茨堡阵线。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向

^① 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第194页。

^② 茨肖恩：《谁扶植希特勒上台：德国工业界在摧毁魏玛共和国事件中的作用》，第34—35页。

魏玛共和国发起总攻击，谋求在德国建立公开的恐怖专政。希特勒同垄断资本开始公开结盟的标志是1932年1月27日杜塞尔多夫城集会。这为他日后上台执政奠定了基础。不过，当时垄断资本各派别对希特勒上台的方式、时间仍然存在分歧，希特勒的合法夺权未能立即实现。

1932年7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1378万张选票，占总投票人数的37.4%，取得230个议席，成为德国国会第一大党。施莱歇尔政府统治基础薄弱，它无法确立一个能够迅速摆脱经济政治危机、维持社会稳定的局面。这就迫使德国统治阶级各种权势集团重新进行抉择。形势越来越对纳粹党有利。1932年12月6日，一批德国大资本家联名上书总统兴登堡，要求“委任民族运动中最大集团的领袖负责领导一个由具备实际能力和个人才干的人士组成总统制内阁”。这就表明，德国统治阶级的权势集团决心任用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作为他们主要的代理人。

1932年7月曾当着蒂森的面拒绝付给纳粹党任何竞选费用的杜伊斯堡，同年年底同意向纳粹党资助10万马克。^①支持巴本的资本家集团迅速向纳粹工业集团靠拢。两大集团经过协商讨论，并促使巴本和希特勒举行多次会谈后达成妥协。“左翼凯恩斯主义”集团中大部分资本家在关键时刻抛弃了施莱歇尔。资产阶级内部的力量重新分化和组合，终于把希特勒扶上了台。

纳粹党执政后新的结合

长久以来，史学界一直把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总理，作为德国法西斯政权建立的标志。其实，这时希特勒还未能确立

^① 茨肖恩：《谁扶植希特勒上台：德国工业界在摧毁魏玛共和国事件中的作用》，第50页。

纳粹党的极权独裁统治。作为德国两大统治支柱的垄断资本集团和国防军，对于希特勒和纳粹党尚有相当的保留。希特勒十分清楚，要维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地位，就必须更进一步获取垄断资本集团、容克地主和国防军的支持。

希特勒一上台执政就大力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把经济管理大权直接交给垄断资本家。1933年7月，成立德国经济总会，由蒂森、伏格勒、西门子等十二名垄断资本家和五名纳粹党人组成，负责指导国家经济政策和制定经济法令。1934年春，又成立部门经济国家调节机构“工业最高集团”和区域经济国家调节机构“邦经济厅”，任命大资本家担任主要职位，负责各部门、各地区的分配订货和原料等。^①

同时，颁布《国民劳动秩序法》，规定企业主是企业的法定领袖，为企业工人的全权最高上司。^② 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同国家机构日益直接融合起来。

在政治上，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掀起反共高潮，镇压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满足垄断资产阶级稳定秩序、巩固资本主义统治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利用纳粹党拥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善于煽动群众的优势，解散议会，重新选举（用戈培尔的话来说叫做“直接诉诸人民”），然后通过《授权法》，排除议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牵制。

在这个过程中，相当一批大资本家加入纳粹党，一批纳粹党头目借助于国家权力而成为新富豪（其中最典型的是戈林），而原有一批资产阶级传统的政治代理人，则纷纷被排挤出政治舞台，或是改换门庭成了纳粹党人。纳粹党成了唯一存在的资产阶级政党，希特勒成了再无竞争对手的垄断资本利益的政治代理人。因

① 诺曼·理希：《希特勒的战争目标》第1卷，伦敦1973年版，第60—63页。

② 《德国历史文献，1933—1935年》，第67号文件。

此，当1934年6月希特勒以清洗冲锋队的行动最后划清了他同小资产阶级下层民众的关系后，德国的垄断资本集团就毫不犹疑地把独裁大权交予他。尽管后来这个集团中的某些人（如沙赫特、蒂森等）同希特勒发生分歧以至分道扬镳，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来说，没有发生过变化。

第三节 同容克军国主义势力的关系

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容克军国主义势力在德国政治生活中，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巨大作用。当时德国容克军国主义势力的主要体现者是国防军，另一个体现是总统兴登堡——一个深受军官团尊崇的、传统贵族军官世家出身的老将军。可以说，如果没有国防军的支持和兴登堡总统的同意，希特勒即使有了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也难以在1933年登上总理的宝座。纳粹党同以国防军为代表的容克军国主义势力的关系，正如它同垄断资产阶级的关系一样，也是有一个相当长的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考察这个过程，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互有戒心和芥蒂

纳粹党同国防军，应当说早就有着不解之缘。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前下士希特勒以国防军驻慕尼黑部队一位调查员的身份，被派到后来发展为纳粹党的政治小团体德意志工人党进行调查和控制。纳粹党的部分党员和大部分冲锋队队员原来是当地驻军成员或退役军人。该党在建立初期受到巴伐利亚国防军的大力庇护。巴伐利亚国防军曾宣布脱离柏林国防军的领

导，试图伙同其他极端右翼势力进行削弱和推翻共和国的活动，其中就包括纳粹党。

1923年鲁尔危机期间，希特勒煽动反对魏玛共和国，宣扬“真正的敌人不在鲁尔，而在柏林！”1月底，他召集冲锋队员5000多人在慕尼黑举行示威，反对柏林中央政府。巴伐利亚邦当局认为此举有讨伐政府发起暴动之嫌，立即下令禁止，并取缔纳粹党举行的12场集会，禁止希特勒发表演说。驻巴伐利亚国防军司令洛索夫将军得知后，立即接见希特勒。当希特勒表示不拟举行集会后，罗姆奉命通知邦政府，说洛索夫将军认为希特勒及其政党举行的大会是无害的。在巴伐利亚驻军出面干预之后，冲锋队举行了示威游行。事实上，如果没有巴伐利亚国防军的保护，希特勒投身政治生涯的最初阶段以及纳粹党初期发展阶段，本来会遇到重重困难的。

德国国防军虽然标榜不参与政治，但一贯是德国政治上一支反动的保守力量。掌握国防军的军官团，50%出身于贵族军官世家，28%出身于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家庭，约20%出身于地主、商人和工厂主家庭。在共和国时期，军官团中的贵族成份比例虽有所下降，仍占22—24%，在将军一级中占50%。^①他们通常站在代表传统、保守和正统的势力一边，对于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出现的魏玛共和国持否定态度。但是，面对当时高涨的左派革命力量，国防军高级领导人主张“维护德国的统一”，“避免内战”，“为国家服务”，维护陆军“在德国政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有限度地参与政治”。1918年11月10日，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艾伯特与最高统帅部格雷纳将军之间达成一项秘密军事协议，双方“从维护国家、民族和民主的利益出发”赞同由德国军队承担起“保卫国家的责任”。军队由此站到正在形成的共和国一边，开始了共和国与

^① 德特莱弗·巴尔德：《德国军官。20世纪德国军官团社会、教育史》，慕尼黑1982年版，注释12。

军队之间一种“强制性的并非稳固的合作”。^①但是，军官团中的普遍情绪，仍然认为民主制的国家结构不符合德国的传统，表现出与共和国不妥协的态度。

国防军和纳粹党在目标方面实际上是一致的：对内击退工人运动和修改魏玛宪法，对外打碎凡尔赛条约的枷锁，扩大国防军，结束“无国防力量”的状态，建立德国在欧洲和世界的霸权地位。^②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和1926年国防部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明显地表达了这种一致性。但双方之间也存在着歧异。纳粹党在二十五点纲领中要求取消“雇佣军”，建立人民军。根据纳粹党的观点，国防军将作为一个巨大的军官培训机构（军官及下级军官储备库）得到承认。希特勒同国防军领导人在走向专政的道路上看法也不相同。纳粹党领导人认为国防军高级领导人“站在共和国一边”，经常对其进行抨击。国防军的高级领导人则常常把纳粹党的偏激行动视为进行“捣乱和阴谋活动”，尤其对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宣传反感，认为这“会引起内战，最终导向布尔什维主义”。纳粹党的成员大多出身低下，举止粗鲁，亦使国防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其蔑视。^③

1923年11月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国防军并未予以支持，而是承担起“维护社会安宁和共和国宪法不可侵犯的责任”，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国防部长奥托·格斯勒因纳粹党党报《人民观察家报》攻击政府而下令取缔。驻巴伐利亚第4师师长冯·洛索

① 莱因哈德·库恩尔：《魏玛共和国》，联邦德国罗沃尔特1985年版，第57页；汉斯·阿道夫·雅考普森：《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军人、国家和社会》，见：布拉赫、冯克、雅考普森：《1918—1933年魏玛共和国》，波恩联邦政治教育中心1987年版，第349页；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德国的专政》，克彭豪尔魏赤出版社1969年第6版，第259页。

② 库恩尔，同注①，第59—60页。

③ 赫尔穆特·鲍克主编：《坠入第三帝国》，莱比锡——耶拿——柏林乌兰尼亚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88页。

夫起初对希特勒的游说反应冷淡。陆军首脑汉斯·冯·泽克特从柏林发出电报：命令巴伐利亚陆军镇压啤酒馆暴动。当洛索夫跟随巴伐利亚民政首脑古斯塔夫·冯·卡尔拒绝执行国防部命令时，国防部立即解除了洛索夫的职务。^①由于陆军站在柏林政府一边，希特勒“向柏林进军”的企图化为泡影。

此后，纳粹党同国防军的关系一直不佳，不过，希特勒知道，纳粹党要取得政权，迟早必须得到国防军的支持。因此，在1924年法庭对他审判时，他在最后发言中设法不得罪和不指责国防军。他重提过去曾提出过的与陆军联盟的意向，说德国机构中最强大和最具永久性的机构——陆军——没有卷进这一事件。“……我听说，开枪的是警察，不禁感到高兴，因为玷污清白历史的不是国防军，国防军一如既往，白璧无瑕。总有一天，国防军不分官兵，都将站在我们一边。”^②

尽管希特勒非常希望得到国防军的支持，但是从控制冲锋队的需要出发，在1928年12月提出禁止冲锋队同陆军发生联系。其理由是：陆军为现今的国家服务，而“这个国家不懂得我们的荣誉观念，试图使我国人民的不幸永存下去”。^③国防部予以反击，下令不准陆军招募纳粹党员，或雇佣他们在军火库和补给站工作，“因为该党给自己确立的目标就是推翻立宪制的德意志国家”。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国防军和冲锋队曾在东部边境地区有过密切的合作。那是因为国防军感到东部地区兵力不足，不能有效地抵御波兰可能发动的进攻，希望利用各种政党的防卫组织，以增强实力，保卫边境安全。^④事实上，除纳粹党的冲锋队之外，民族主义防卫联盟的其他成员，民族人民党的防卫组织钢盔团、

①② 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88—97、107页。

③ 雅考普森：《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军人、国家和社会》，第363—364页。

④ 理查德·贝塞尔：《政治暴乱与纳粹主义崛起，1925—1934年东部德国的冲锋队员》，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7—68页。

德国青年社团，以及社会民主党的防卫组织国旗队等，都曾在东部地区同国防军合作过。^①

在总体上，整个20年代，除巴伐利亚驻军的少数军官同情和庇护纳粹党之外，掌握国防军的军官团的权势人物，一直把纳粹党视为一群喜欢闹事的社会下层势力、政治上捉摸不定的野心家以至街头流氓，既看不起，也不放心。

希特勒争取国防军和容克地主的努力

1930年秋，纳粹党争取国防军的努力出现了转机。

希特勒从1929年起便开始有计划地对国防军加强宣传活动。这一年3月，他在《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论述纳粹主义与军队的文章，标榜纳粹党是唯一能“协助国防军维护民族利益的政党”，表示愿意与陆军联合。文章还虚张声势恫吓说，由于陆军对纳粹党这样的民族主义运动采取敌视态度，它便背叛了自己的传统；一旦马克思主义取得成功，将是“陆军的末日”，到了那时，如果不听从，“他们的妻儿将被囚禁……。你们就会被一脚踢开，也许站在墙前就刑”^②。《人民观察家报》随即印发了专供陆军阅读的特刊。

1930年，德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政局动荡，中央党的布吕宁内阁不能取得国会多数的支持，只能依靠总统的“授权”执政。德国开始了短暂的总统内阁时期。兴登堡总统和陆军在国家政治权势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希特勒也进一步加紧了争取国防军的努力。此时乌尔姆卫戍部队的中尉施林格、卢丁和温特等人，因在当地和汉诺威、柏林等地军内从事纳粹宣传并发展纳

^① 理查德·贝塞尔：《政治暴乱与纳粹主义崛起，1925—1934年东部德国的冲锋队员》，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7—68页。

^② 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88—97页。

粹势力而被捕，随后被提交莱比锡最高法院进行审判。希特勒趁机在9月23日开庭审理时亲自出庭作证，以笼络军方。他就冲锋队问题向陆军再次保证：陆军拥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将维护陆军的完整；成立冲锋队是为了在进行宣传活动时保护纳粹党，决无任何军事性质和取代陆军之意；纳粹党将使用合法手段获得政权。他宣布“玩弄革命主意”的奥托·施特拉瑟已被开除出纳粹党，并声明：“在我们执政以后，以目前的国防军为基础，一支伟大的德国人民的军队将会兴起”。^①

希特勒向法庭所做的不反对国防军的明确保证，使一些陆军高级将领感到宽慰。参谋部军官阿尔弗雷·约德尔、乌尔姆第五炮兵团团长路德维希·贝克等一部分军官公开站到拥护纳粹党的行列。1930年9月国会选举揭晓后，纳粹党成为国会第二大党，贝克曾在本团队庆祝纳粹党的胜利。在这类军官的影响下，波茨坦骑兵团和西里西亚第三炮团等也开始倾向于纳粹党。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德国军官由原有34000人，减少到4000人。因此，从少尉升为上尉需要14年，再升为少校还需要10年。^②对于大部分青年军官来说，在军队内很少有升迁的机会。他们除了对希特勒的保证感到宽慰之外，希特勒关于扩军备战的许诺也使他们看到晋升的希望。当时的国防部长格罗纳将军已经不安地意识到，军官团中的许多成员已更加同情纳粹党。

纳粹党在1929—1932年间也加强了争取容克地主的工作。希特勒非常清楚，合法夺权的唯一可能性是通过总统任命、授权而实现。这必须得到兴登堡总统周围的容克朋友和顾问们的赞同。希特勒多次向容克地主发表演说，表明纳粹党对他们的态度。1931年1月14日，他同欧根堡——海尔特菲尔德公爵进行了一次

^① 1930年9月26日《法兰克福日报》

^② 雅可布森：《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军人、国家和社会》，第355页。

谈话，尽力解答容克地主期待澄清的问题，解除容克地主的疑虑。他明确表示，绝不没收或剥夺大地产，将继续执行对易北河东部容克地主“东方援助”政策，重视同大地主合作，准备同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政党德意志人民党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以便保证执行亲善容克地主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欧根堡——海尔特菲尔德公爵将这份谈话记录附加他的信，在容克地主中间广为散发。1931年1月21日，希特勒还出席了冯·阿尔尼姆——波伊岭堡伯爵组织的一次有15名容克地主参加的小型私人集会。他在会上做了报告。这一切对纳粹党争取容克地主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1932年2月25日，阿尔尼姆伯爵写信给兴登堡总统，表示支持希特勒出任总理，并阐述了希特勒和纳粹运动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在经济危机期间，纳粹分子、尤其是冲锋队员街头闹事的行径，1932年希特勒同军人心目中的偶像兴登堡竞选总统，仍阻碍了国防军同纳粹党的进一步合作。高级军官们对前下士希特勒时或表现的傲慢无礼仍然感到愤慨。国防部长兼内政部长威廉·格罗纳和陆军首脑库特·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继续蔑视和厌恶纳粹党。1932年格罗纳还下令镇压武装纳粹分子的暴行。同年4月14日，格罗纳发布了解散冲锋队、党卫军及其一切附属组织的命令。其中写道：“这些组织建立了一支私人军队，其存在构成国中之国，是在老百姓中引起动乱的持久根源……维护有组织的军队完全是国家的事情。对这种党派组织的容忍……必然导致冲突，导致类似的内战状况”。^①

国防军上层态度的分化

随着经济危机和政局动荡加剧，国防军上层对纳粹党的态度

^① 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198页；罗伯特·J. 奥尼尔：《德国陆军与纳粹党，1933—1939年》，纽约1966年版，第6页。

进一步发生了分化。

1930年—1932年，库特·施莱歇尔将军实际上成为陆军在政界有权威的发言人，继格罗纳之后出任国防部长。此人曾是总参谋部少校军官和最高统帅部内政处处长，在共和国时期是国防部“观察内政活动不可多得的专家”。^① 他成为军事和政治首脑人物兴登堡、格罗纳、泽克特和艾伯特等人不可缺少的助手。施莱歇尔多次声明，要利用纳粹运动“为国家服务”，^② 并准备接受希特勒和纳粹党参加联合政府。

1931年，施莱歇尔开始寻找打破政治僵局的办法，着手消除陆军和纳粹党之间的宿怨。1月，他废止陆军不得雇佣纳粹党人在军火库和补给站工作的禁令，废止不准纳粹党人参加陆军的禁令。希特勒作为报答，重申他遵守合法手段的政策，在2月20日下令禁止冲锋队参加街头殴斗。

1932年，施莱歇尔多次同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其他领导人会谈，旨在“束缚”纳粹运动，把纳粹运动纳入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轨道。同年5月，纳粹党与施莱歇尔勾结，将布吕宁赶下台。巴本在许诺取消格罗纳对冲锋队禁令的条件下，继任总理。善弄权术而又觊觎总理职位的施莱歇尔，很快转而反对巴本。同时，他也反对纳粹党单独执政，加强了同反对授权纳粹党的陆军总司令哈默施泰因等人的联系。1932年12月，施莱歇尔把巴本赶下台，当了总理。巴本转而同纳粹党勾结，共同对付施莱歇尔。哈默施泰因等人认为，巴本执政会引起内乱，导致波兰向德国发动“预防性进攻”，因而在1933年1月下旬几次向兴登堡总统陈述意见，重点是反对再次任命巴本为总理。^③

国防军中以第一军区(东普鲁士)司令勃洛姆贝格及其参谋长

①、② 鲍克：《坠入第三帝国》，第73页。

③ 奥尼尔：《德国陆军与纳粹党，1933—1939年》，第8页。

莱希瑙为代表的一派，极为主张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勃洛姆贝格在1927—1929年曾任军队管理局局长，后来调到总参谋部，他主张对法国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焦土战争”，为此与格罗纳和施莱歇尔发生分歧，被赶出总参谋部。他于30年代初兼任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的德国代表团团长，在军内拥有一定的地位。勃洛姆贝格早就通过南德的一位亲戚同希特勒相识。他的参谋长莱希瑙通过纳粹党的大区区长艾里希·考赫和纳粹党的牧师路德维希·米勒，同纳粹党领导层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勃洛姆贝格和莱希瑙认为：“解决国防军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只能由一种唯一的力量——纳粹运动来加以实现”。“纳粹运动是国防军实现扩军备战的巨大发动机”。^①

1932年7月以后，纳粹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大部分将军都对希特勒愈来愈信任。许多高级军官转到卐字旗帜之下。1933年1月下旬，勃洛姆贝格和莱希瑙受召同兴登堡总统商议组阁问题。勃洛姆贝格以国防军不足以同冲锋队和党卫队相抗衡为理由，要求任命以希特勒为总理的民族阵线政府。

1933年1月29日上午，兴登堡总统任命勃洛姆贝格为国防部长。这一措施客观上加强了希特勒和军内亲纳粹派的地位。同日晚，怀有政治野心的施莱歇尔伙同哈默施泰因向希特勒和戈培尔提议，逮捕正在向兴登堡总统施加影响的巴本、奥斯卡·冯·兴登堡和国务秘书梅斯纳（即“兴登堡集团”成员）。纳粹党却立即向兴登堡总统通报了这一消息，^②致使施莱歇尔和哈默施泰因的作用进一步下降。

德国国防军和政界上层人物内部的种种争权夺利和互相倾轧，给了希特勒同各种权势集团进行夺权交易的可乘之机。正是

① 鲍克：《坠入第三帝国》，第92页。

② 奥尼尔：《德国陆军与纳粹党，1933—1939年》，第10页。

在种形势之下，希特勒获得兴登堡总统委任组阁。希特勒完全清楚国防军在1933年1月30日法西斯上台执政中起的作用。他后来在同年9月23日的一次演讲中说：“在今天，我们也要特别想到我们的军队。我们大家深切地知道，假如在我们革命的日子里军队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那么，无论如何我们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了！”^①

争取无保留支持的最后一步

由于德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掌握国防军的军官团同垄断资本集团及其政党有所不同，它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和权力、相对比较稳定的社会集团。因此，希特勒执政后，对待国防军非常重视，也比较谨慎。

希特勒就任总理后的第二天，便亲自到柏林各兵营向国防军部队做关于“新德国”的演讲。1933年2月3日，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在柏林贝德勒大街14号陆军领导人大厦召集集团军和军区司令聚会。希特勒向高级将领做了两个小时的秘密讲话。他大谈恢复义务兵役制，扩大国防军，鼓吹对外夺取德国的生存空间，强调“国防军是国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保证尊重其“非政治性和超党派性”的独立地位，不同冲锋队混合。^②他说：“请诸位理解我的目标，并给予政治相助！”^③

希特勒的演说，满足了国防军将领自1918年战败以来始终追求的“复兴”的愿望。与会高级将领完全明白了“这位精力充沛的总理不是一位空谈家，而是一位决心进行扩军备战和进行战争的实

① 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杜塞尔多夫德罗斯出版社1954年版第247页。

② 《德国历史文献》1933—1935年，第4号文件。

③ 鲍尔：《坠入第三帝国》第93页。

干家”。海军首脑埃里希·雷德尔将军表示：“至今，还没有一位总理对国防军表示如此热心！”欧根·奥特将军说：“向东方夺取生存空间的计划，使我当时认为这是一项决定性宣言！”^①1933年2月6日，《人民观察家报》以《国防军同新首相并肩前进！》的醒目标题，报道了希特勒接见国防军高级将领的这次聚会，称之为国防军历史上一次不同寻常的重要事件。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不插手国防军的内部事务。譬如，不插手军官晋升事务，不干预军事计划的制定和军事法庭的审判；通常不加阅读就签署军事副官呈交的文件；经常采纳军官们的建议；听取有关军事演习的汇报时，往往保持沉默，不表示反对意见等等。^②

勃洛姆贝格虽然坚持保持国防军的独立地位，不允许纳粹党直接插手军内事务，也不准许军官们加入纳粹党，但是，在这一前提之下，采取了同纳粹党全面合作的态度，^③以致获得了“希特勒青年团员克韦克斯”（一部电影的片名）和“橡皮狮子”的绰号。

陆军首脑哈默施泰因经常受到希特勒、勃洛姆贝格的排挤和打击，处境急剧恶化。他向兴登堡总统求援，遭到勃洛姆贝格阻拦。后者和希特勒还在不同的场合劝说兴登堡总统任命莱希瑙接替哈默施泰因。兴登堡怀恨于1933年1月29日哈默施泰因要求逮捕巴本等人的建议，但对有“纳粹党的将军”之称的莱希瑙也甚为不满，遂于1934年2月任命弗立契接替哈默施泰因之职。

弗立契一直对纳粹党持保留态度，并因此受到盖世太保的暗中监视。他同希特勒和勃洛姆贝格的私人关系也很差。陆军参谋长贝克曾支持纳粹党上台执政，此时同弗立契渐趋一致。这样，国

① 鲍尔：《坠入第三帝国》第94页。

② 马修·库伯：《德国陆军，1933—1945年》，伦敦1978年版，第9页。

③ 威廉·戴斯特：《武装部队和德国的重整军备》，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32页。

防军高级将领内部围绕对纳粹政权的态度，形成了勃洛姆贝格——莱希瑙和弗立契——贝克两股力量。由于勃洛姆贝格位居国防部长，在军内占了上风，而且，海军首脑雷德尔为实施其海军扩军计划，对希特勒采取合作态度。因此，从总体上说，国防军是支持纳粹政权并同其合作的，影响并可以破坏这一合作的潜在威胁物是冲锋队实力和欲望的急剧膨胀。

冲锋队既羡慕国防军的声望和地位，又不满其政治上对纳粹“革命”的保留态度。罗姆在个人政治野心的驱使下，希望以冲锋队取代国防军的位置。1933年3月，双方围绕青年组织的管理权问题展开纳粹党执政以后的第一次争斗。全国各青年组织的主管机构全国青年培训监事会原来隶属于内政部，罗姆要求将它置于冲锋队的控制之下。国防军则力主其改属钢盔团头目弗朗茨·色尔特为部长的劳动部。后在希特勒插手之下双方作了让步。国防军同意解散全国青年培训监事会，另建独立的培训办公室，由冲锋队地区总队长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执掌。罗姆则同意冲锋队、党卫队的军事事务受国防军管理。

同年8月，冲突再起。罗姆提出以冲锋队为基础组建新的人民军，把国防军降到掌管士兵培训事务的地位。1934年2月，罗姆的要求再次加码，在内阁会议上提议成立新的政府部，领导国防军、冲锋队、党卫队、钢盔团、退伍军人等所有武装组织，并要求由他任部长。

在这场冲突中，勃洛姆贝格受自身政治倾向的制约，并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以加强自己在军内的地位，力图同希特勒保持良好关系。他指令军人必须向穿着制报的纳粹党员行军礼，下令军人一律佩带饰有卐标志的军鹰徽，规定任用军官必须受纳粹的种族限制，发表题为《军队和民族社会主义》的指令，向纳粹党表示效忠。但是，在维护国防军作为德国主要甚至唯一武装力量的地位上，勃洛姆贝格未作丝毫让步。

如前所述，希特勒在一段时间里，试图调和双方的冲突和矛盾。但希特勒很清楚，无论是对内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确立独裁大权，还是对外扩张侵略和夺取霸权，都必须取得国防军的全力支持。因此，在关键问题上，希特勒的态度是明确的，即国防军必须是国家唯一的武器持有者，冲锋队的军事任务只能限于协助守卫边界和主管青年军训事务。当罗姆不肯就范时，希特勒终于在1934年6月底清洗了冲锋队，处决罗姆等人。

清洗冲锋队是希特勒获取国防军无保留支持的关键性的一步。1934年7月1日，勃洛姆贝格和兴登堡分别发表讲话，赞扬希特勒的行动。^①同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在国防军支持下顺利地担任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同日，在勃洛姆贝格主持下，国防军全体官兵重新宣誓，誓词由莱希瑙起草，规定国防军官兵效忠于希特勒个人而不是国家和宪法。

纳粹党的法西斯极权独裁统治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个代表垄断资本利益和容克军国主义势力的最反动、最沙文主义和最具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公开恐怖专政。它把德意志民族引向了灾难的深渊，也给欧洲和世界带来了空前的浩劫。

第四节 对纳粹党性质演变的探讨

关于早期纳粹党和纳粹运动的性质，近年我国的研究者提出了某些不同看法。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研究深化的过程中，感到有必要对我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的传统观点，予以适当的补充和完善。当然，它与西方史学界盛行的某些说法大相径庭。

西方一些史学家以纳粹党的成员及其群众基础主要是小资产

^① 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册，第301页。

者或者称之为“中等阶层”为理由，提出纳粹党是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中等阶层理论”说。这种观点虽然揭示了纳粹党和纳粹运动主要的社会基础，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纳粹党与垄断资本、容克地主和权势集团结盟并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的本质方面，很难解释权势集团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让希特勒的纳粹党上台执政。

在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学家们以往的研究中，大多侧重于从二十五点纲领，以及该党与垄断资产阶级和军政权势集团的关系分析，认为纳粹党的民族社会主义，其“社会主义”纯属欺骗。该党从一开始便是受垄断资本扶植和操纵的工具，一个资产阶级反动政党。这种观点虽然从根本上揭示了纳粹党的阶级性质，但是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纳粹党的纲领和宣传中会存在大量不利于大资本的要求和实行某些社会改革的政治主张；如果仅仅是欺骗，又为什么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垄断资本、容克地主以及权势集团对纳粹党心存疑虑，视为一种异己势力，而事实上在早期并没有给予多少值得一提的经济和政治支持。

正确识别和判定早期纳粹党的性质，应该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在这里，所谓实践的观点，是指要从德国政治形势演变的全局出发，考察纳粹党在当时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处于什么地位，起着什么实际作用。所谓历史的观点，就是指要准确地按照历史的本来线索，分析纳粹党的孕育、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其行动究竟符合哪些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

为了判定纳粹党的性质，人们剖析它的纲领，揭示其指导思想，或者计算它的队伍的构成，收集它与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史料，无疑都是必要的，有益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限”。他还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①

^① 马克思：《给威·白拉克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页。

这个道理，用来衡量纳粹党也还是适用的。研究者们应该重视对它的纲领的具体分析，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考察它的实际活动。如果离开纳粹党早期这个特定阶段，忽略它在当时德国政治生活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从阶级斗争的实际，从总体上去认识和鉴别，那就很容易各执一端，有所偏颇。

从阶级斗争的实际考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战后初期的德国，是一个遭受民族屈辱，肩负沉重赔偿，面临内外危机的德国。它经济凋敝，社会动荡，各阶层民众抑郁愤懑和惶惑不安。革命运动高涨，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非常激烈。既有来自左的方面发动的革命和起义，也有来自右的方面举行的武装暴动和割据，在整个社会上存在着社会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两种强大的社会政治思潮的尖锐对抗。

经过反复较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暂时处于僵持局面。无产阶级的左翼，由斯巴达克同盟发展起来的德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在十一月革命的整个时期内一次又一次举行起义，但都遭到打击和失败。它的另一翼，也是拥有多数、实力较强的一翼，在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的率领下与资产阶级和国防军达成妥协，在排除极右派的情况下建立了魏玛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共和国比之霍亨索伦王室的帝制统治，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它降生于腥风血雨之中，基础不稳，不时受到来自左的和极右的两个方面的反对和攻击。随着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实施和1923年鲁尔危机的到来，各阶层人们的不满重新加剧，经济濒临崩溃，地方分裂主义势力日益猖獗，中央政府的地位岌岌可危。在此期间，在德国各地，出现了一大批形形色色名目繁多的社团、党派以至准军事组织，钢盔团、自由军团、黑色国防军、民族社团、慕尼黑黑祖国联合协会、巴伐利亚农民协会、反布尔什维主义同盟

等组织各自在其特定范围内活动，谋求扩张势力，在全国或各邦的政治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

这就是1918年到1924年4月开始实施道威斯计划以前德国的一幅粗略缩影，同时也正是纳粹党和纳粹运动产生、发展的早期阶段所处的历史环境。那么，纳粹党处于什么地位呢？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时的纳粹党，不过是巴伐利亚邦众多政党和组织中的一个地方性的小党派。就全德范围而言，它还不是一支那怕是稍有影响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它的一切甚至没有被纳入垄断资本、容克地主和权势集团头面人物的视野。在巴伐利亚，经过几年的努力，纳粹党在啤酒馆暴动前夕发展到5万余人。即使如此，与其说它是一股为地方权势集团控制和利用的政治势力，还不如说，它在人们心目中到像是下层黑社会中的一个帮派，被奉行分裂主义的右派军事长官作为打手而利用。

当时，慕尼黑有“49个大小政党，12—13个妄想成为俾斯麦式的人物，许多妄想成为拿破仑式的人物”。^①希特勒要想在激烈竞争中使纳粹党崭露头角，并使自己为人瞩目，使尽了浑身解数。归纳起来，早期纳粹党的政治实践，主要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经常性地组织群众集会，宣扬它的政治观点和要求，尤其是进行极端民族主义煽动，唤起听众的民族狂热，这是纳粹党的一大特色。

1919年11月——1920年11月，纳粹党举行了48场集会，其中希特勒出场演说31次，与会听众达60000多人次。此后，纳粹党举行集会更加频繁，经常一周1次。1922年11月，纳粹党一夜之间举行11场集会，希特勒连续发表演说。他演说的题目有：“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与凡尔赛”、“拆帝国墙脚的家伙与法国佬”、“为什么我们反

^① 佩·约·拉希施米尔：《法西斯主义的起源》，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对犹太人？”“德国的重新崩溃和重新崛起”、“未来或沉沦”，等等。

就希特勒注重进行极端民族主义煽动这一点，并不能用作认为它是属于资产阶级政党之列的例证。民族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在当时德国各阶层民众中间具有广泛的影响，“波及人民群众的广大阶层”，“席卷整个德国”。^①它不仅是在资产阶级中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侵蚀，尤以小资产阶级分子最为狂热。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极端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武库中的重要武器，又是德国统治阶级内外政策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在社会广泛阶层中的滋长和蔓延，正是统治阶级长期宣扬和极力灌输的结果。然而这不等于说，凡是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甚至极端民族主义的分子和组织就必然是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社团、党派。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属于上层建筑的较高层次。它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然而常常不是同阶级的划分和阶级斗争中的政治分野直接结合在一起，构成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基本属性或标志。

第二、发展党员，扩大联系，努力壮大纳粹党的队伍，争取各阶层人士和社团的资助或支持。

由于“凡尔赛条约的影响，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紧密结合”，^②德国广大民众强烈要求改变社会现实状况。纳粹党抓住这一时机，积极发展党员，其方式多种多样。老纳粹党员通过在酒吧间同人聊天，或参加集会后由听众集体登记，均可随时随地将人拉入党内。1920年党员由64人增加到3000人，1922年初达到6000人，1923年11月达到55287人。^③

① 格·舒尔茨：《民族社会主义的崛起。德国的危机与革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1975年版，第37页。

② 戈斯魏勒：《法西斯主义论文集》，柏林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8页。

③ 米夏埃尔·H·卡特尔：《民族社会主义夺权进程中纳粹党的社会变化》，见沃尔夫冈·施德尔主编：《法西斯主义社会运动》，汉堡霍夫曼和卡姆帕出版社1976年版，第25页。

自1923年开始，纳粹党努力接近中、小企业家和商人以及巴伐利亚工业家联合会。他们开始对该党给予少量资助。^①

如同对于二十五点纲领各有各的解释那样，以希特勒为首的一派所积极设法建立联系的人物和组织，与德雷克斯勒与随后的格奥尔格·施特拉瑟及其追随者所要建立联系的人物和组织，显然是很不相同的。前者侧重于靠拢右派势力、反动军人、企业家，后者主要倾向于以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主体的同一类型的党派组织。当希特勒攫取纳粹党的主席职务之后，后一种情况有所改变，但是并未消失。

第三，也是纳粹党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实践，就是发动啤酒馆暴动。

当时纳粹党追求的最核心的目标是以暴动形式夺取政治权力。它的野心是要掌握全国政权。而夺取巴伐利亚的统治权力正是其先行步骤，一次实际的尝试。这样做的结果，它不仅根本谈不上为垄断资本、容克地主和权势集团效劳，而且是把自己置于它们的对立面。

从总的来看，德国统治阶级这时最迫切需要的是稳定“内外局势”，克服鲁尔危机，“巩固魏玛共和国”，为争霸欧洲和争霸世界积聚实力。^②魏玛共和国第二任国防部长奥托·格斯勒将军曾经声明：“军队和国家保持一致”，对“巴伐利亚出现的任何反叛”“决心进行武力镇压”。^③巴伐利亚军政头目这时最需要的是实现分裂，脱离中央政权而自行其是，建立一个依靠法国、包括奥地利和莱茵区在内的多瑙河联邦。希特勒的纳粹党却反其道而

① 波罗夫斯基：《阿道夫·希特勒》，第39页。

② 德特莱福·J·K·帕伊克特：《魏玛共和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苏尔卡姆帕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

③ 恩斯特·鲁道夫·胡伯尔：《1789年以来德国宪法史》第4卷，斯图加特1981年版，第630页。

行之，对二者都要反对和打击。这是损害、破坏他们的利益，而绝不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只能表明它具有强烈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冒险性。

如果从实践来衡量和鉴别，那么早期纳粹党的性质问题应该还是比较清楚的。

具体分析早期纳粹党的历史演变

为了更全面地把握早期纳粹党的性质，有必要回顾它的孕育、改名和发展的历史变迁过程，对其作出具体的分析。

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谈到，纳粹党的前身是1919年1月成立的德意志工人党。它的成员最初只有以哈勒和德雷克斯勒为首的二、三十名工人。他们的信念属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范畴，同时又是反犹的。哈勒和德雷克斯勒强调，“党是工人和下层中产阶级的党，它既是激进的和反资本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①

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应该承认德意志工人党在其刚建立之时，是一个具有浓厚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工人政党。这需要破除一种陈旧的观点，似乎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或者采用工人党、劳动党等其他名称的这一类型的党，才能算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现在，我们都已承认，在历史上，信奉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有些自称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这一类型的政党，也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为此，也不能排除在上述两种类型的工人政党之外，还有其他的工人政党。每一个阶级包含着若干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利益集团，当然也就会产生不同的党派来分别代表各个不同阶层、集团的要求和利益。甚至也

^① 佩措尔德：《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煽动》，第105页。

可以有不同的政党各自或共同代表同一阶层、集团的要求和利益，因为即使是同一阶层、集团的人们也会有不同的利害和信仰。这里所说的是由它的阶级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工人政党的客观阶级属性，并不涉及到它的指导思想是否正确，它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是否先进。

纳粹党是以德意志工人党为母体脱胎变化而来。1920年2月宣布改变党的名称和二十五点纲领，不仅仅是简单地更换一个党名，同时也意味着它的阶级性质发生了一次变化，成为小资产阶级政党。

纳粹党是在原名之前增加了一个“民族社会主义”限定词，一方面表明它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区别，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时也加强了小资产阶级民族社会主义的倾向。“不言而喻党的易名增加了党的自我标榜的虚伪性。”^①

比起原来德意志工人党的方针，二十五点纲领保留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想”的条文，同时突出了极端民族主义，并突出了政治性的目标和要求。这反映了它的党员构成和领导核心的变化，党的指导思想的变化。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一批退役军人和知识分子逐渐在纳粹党内取得优势，推行他们的观点和政治主张。

由于对纲领的解释和斗争目标的侧重点不同，在纳粹党内出现了两种政治倾向。这表现为哈勒与德雷克斯勒对希特勒的不满与争论。希特勒入党不久，哈勒看出，“希特勒过份抬高自己而无视党的存在”，试图制止他的热情。但此时希特勒在党内已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1919年12月，他起草了一份排斥党主席哈勒的计划。26天之后，哈勒于1920年1月5日被迫退党。1921年7月中旬，德雷克斯勒等领导人同希特勒之间爆发一场公开冲突，抨

^① 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59页。

击希特勒具有“权利欲和个人野心”。^①希特勒玩弄权术，攫取了党的主席之职。

这两次争论为后来的两派斗争开了先例。以希特勒为首的一批人形成纳粹党内的右派，一心夺取党的领导权力。另一批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的力量，由于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及其追随者入党，也得到相当的加强，对右派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从思想政治倾向的阶级背景来看，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在不同程度上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共有；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倾向则在不同程度上为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群众所共有。这两种倾向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并存于纳粹党内，但二者终究是格格不入，相互排斥。两种倾向必然要有一种居于优势，抑制以至压倒另一种倾向。就这样，载负两种倾向的天平不时摆动，终于向希特勒为首的一派倾斜，逐步地由他们确立了主导地位。但是，当持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右派力量还不足以压倒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时候，纳粹党的性质的第二次重大变化，即从一个小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向资产阶级反动政党过渡的历史过程就还没有完结。

不仅纳粹党内两种不同倾向间的力量对比有一个历史的变迁过程，希特勒本人的思想，他对纳粹党的控制程度，同样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1908——1913年在维也纳流浪期间，希特勒基本上“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一种人生哲学”，日后“一切行动的牢固基础”。1913年这位24岁的青年人离开奥地利去德国时，内心充满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激烈热情，对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刻骨仇恨，并且确信上帝选择了雅利安人，特别是日耳曼人，做主宰种

^① 佩措尔德：《阿道夫·希特勒。法西斯内阁正在组成》，见包克：《坠入第三帝国》，第80页。

族”。^①1919年9月，当希特勒被慕尼黑军方派往调查了解德意志工人党的状况时，他的世界观和若干最基本的观点已牢固确立。但是，他的思想同样有一个集中化、系统化的过程。希特勒是经过几年政治实践的磨练，同各界人物的交往，尤其是得到他的启蒙者和智囊的慕尼黑大学历史教授冯·米勒，经济学讲师戈特弗里德·弗德尔以及埃卡特、罗森贝格、赫斯等人的启发和协助，又经过啤酒馆暴动失败的沉重打击，才作为一个历史的反面人物而成熟起来。在兰茨贝格监狱铁窗后面，希特勒有了充分的时间，回顾自己的过去，成功与失败，回顾德国的过去发生的革命与动乱，并把思想条理化、系统化和纲领化。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发展了以往的观点。他不仅要使战败的混乱不堪的德国赢得在太阳底下比以前更加伟大的地位，而且要建立一个以日耳曼人种为基础的“新式”国家，确立他自己作为元首的绝对独裁权力。他还提出对外扩张侵略的“生存空间”论，鼓吹夺取“生存空间”是新帝国恢复其世界大国地位和夺取世界霸权的途径。实际上，《我的奋斗》才是希特勒的纳粹党的真正纲领。它的出版已是1925——1926年间的事了。

同样，希特勒对纳粹党的控制，也并不是一朝诈得主席职位，强行确立“领袖原则”，立即可以令行禁止，驾驭自如。希特勒排斥原来的领导人，抑制异己势力，确立新的领导核心和自己的绝对权威，都需要时间，经历一个那怕是较为短暂的过程。

纳粹党组织的严密程度，是希特勒掌握绝对权力后逐步加强的。整个说来，早期的纳粹党还刚刚组建不久，较为松散，正处在致力于迅速扩大队伍的时期，其组织、管理军事化的程度远没有达到后来那样严格的水平。

^①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25页。

纳粹党性质的根本转折

一种历史现象，当它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就必然出现阶段的划分。这种划分是历史运动的客观存在。为了界定它的时限，由人们选择某一具有关键作用或转折意义的具体事件，作为划分的标志。

早期纳粹党的时限，可以划在1920年2月改名到1924年底，即它在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被打散，尚未正式重建之前。其中，1921年7月希特勒担任纳粹党的主席，确立“领袖原则”，可以被看作继发表《二十五点纲领》和党更名之后，它的性质发生的第二次重大变化。希特勒掌握最高权力，意味着他有可能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强加于纳粹党。纳粹党遂演变为小资产阶级右翼政党。

纳粹党从一个小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向资产阶级反动政党的转化，其决定性的转折发生在1924年底希特勒出狱之后。啤酒馆暴动的失败及狱外的纳粹党人参与国会竞选的合法活动获得成功，都对希特勒在狱中清理思想、总结教训起着很大的影响。他一出狱就迫不及待地做了几件事：

第一，正式采纳罗森贝格等一些纳粹党人的建议，确定纳粹党从暴力夺权改变为合法夺权的方针，并且自己跑去向巴伐利亚邦总理赫尔德认错，表示愿意“和解”，采取“合作”的态度。

第二，1925年2月27日宣布重建纳粹党，力图把它置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恢复自己在党内作为元首的独裁地位。

第三，在赫斯、罗森贝格等人的帮助下，整理出版他在狱中写成的《我的奋斗》，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追求和信念，突出了那些容易引起垄断资本、容克地主和权势集团思想共鸣的主张和要求，以冲淡二十五点纲领给他们造成的疑虑。

第四，开始有计划地接近垄断资本、容克地主和权势集团的

头面人物，与他们长谈，在其集会上演讲，宣扬那些使他们感兴趣的观点，表白纳粹党将无损于他们的利益，急切地表述与他们建立交往和争取合作的姿态，“消除资产阶级对纳粹党持有的某些保留看法”。^①

希特勒采取这些步骤，标志着他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策略上全面地主动地改变了纳粹党在当时德国阶级斗争舞台上的地位。它从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对抗之间相对独立的立场，现政权的反对者角色，靠向垄断资本、容克地主和权势集团等现存统治阶级一边，表示它愿意作为一个可以信赖的合作者和合法的竞争者。

希特勒的这些步骤激化了纳粹党内的矛盾，引起在他服刑期间发展壮大起来的以施特拉瑟兄弟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严重不安与强烈不满。二者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策略手段上的分歧，而是意味着纳粹党内代表小资产阶级要求的势力反对希特勒将纳粹党拉向右转，背叛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也就是有关党的性质问题的严重斗争，发生了施特拉瑟激进派起草新的纲领草案以取代二十五点纲领的事件，甚至发展到企图撤换希特勒。斗争带有对抗性。形势造成对希特勒足以致命的威胁。

经过1926年班堡会议，表面上双方暂时达成妥协，实际上是希特勒派在这一场较量中取得一次决定性胜利。希特勒以暂时给予施特拉瑟激进派在北德某些活动余地为代价，换取了他自己在纳粹党全党统治地位的巩固。这样，希特勒终于克服抵抗，确立了慕尼黑派在党内的优势和对他的崇拜，实现了纳粹党方向的根本转折。但是，施特拉瑟派在纳粹党内的势力仍然很大，时或对希特勒进行公开挑战，构成对慕尼黑派的严重威胁。

1929年严重经济危机的到来，是纳粹党发展演变的加速剂。

^①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19页。

纳粹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30年它已开始成为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党。希特勒需要赢得垄断资本、容克地主和权势集团的信任，打开通向执掌政权的大门，恰恰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对纳粹党持有戒心。他们不放心的主要是施特拉瑟激进派坚持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要求，被认为是要搞“社会主义”，从而有形无形地向希特勒施加压力，迫使他及早解决这个问题。

施特拉瑟激进派反对希特勒改变纳粹党性质的斗争从未停息，他们的力量在北德各地取得了进展。当着严重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施特拉瑟派的“社会主义”宣传更能打动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心弦，为纳粹党在三次国会选举中的惊人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一时刻，这种“社会主义”倾向更加被垄断资本、容克地主和权势集团视为“洪水猛兽”，成为希特勒与他们接近以至结盟的最大障碍。

希特勒赖以向统治阶级鼓吹并进行讨价还价的主要政治资本，就是纳粹党发动和领导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纳粹运动，得到庞大数量的群众支持。这是其他任何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所没有的，而这一点在严重经济政治危机侵扰的时刻对稳定局势至为重要。但是，希特勒所以能够成功地发展纳粹运动，又在相当程度上与施特拉瑟激进派的活动密切相关。希特勒既要清除成为他同统治阶级结盟严重障碍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又要保留他赖以与统治阶级结盟的主要政治资本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影响下的群众。因此他煞费苦心，采取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终于在1930年和1932年先后清除了施特拉瑟兄弟，瓦解了小资产阶级激进派。

1930年7月，在垄断资本施加压力和支持之下，希特勒将奥托·施特拉瑟及其支持者清除出党，标志着纳粹党完成了由小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向资产阶级反动政党性质的转变。奥托·施特拉瑟被公认为纳粹党内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库和政治灵魂。他对希特勒投靠大资产阶级和勾结统治权势集团，予以无情的揭露

和猛烈攻击。他及其追随者的被清除出党，表明纳粹党确立了与现存统治阶级结盟的基本前提。

希特勒清除奥托·施特拉瑟和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造成了德国政治权力分配关系的重大变化。希特勒和纳粹党开始成为德国政局中举足轻重的要素，而希特勒也在部分资本家心目中成为可供选择的总理候选人。193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经济政策联合会向总统兴登堡呈文，要求由希特勒的纳粹党组阁。1932年1月28日，恩·珀恩斯根，弗·蒂森和阿·费格勒尔同希特勒、戈林和罗姆商谈关于成立由希特勒主持的政府问题。然而此时，多数的大资本家和容克军国主义权势人物，对于希特勒在党内的地位是否稳固，对于尚有很大影响的格·施特拉瑟是否有可能取代希特勒，仍存在着疑虑。因此，1932年11月7日，希特勒借格·施特拉瑟商谈单独参加施莱歇尔内阁之机，扣以“反叛”罪名迫使格·施特拉瑟退党。这就把最后的障碍扫除了。

纳粹党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反动政党，在清除格·施特拉瑟之后，终于取得垄断资本和容克军国主义权势集团的决定性支持，被推上台执政。这也可以看作是纳粹党性质演变过程的最终完成。但是，施特拉瑟派被清除之后，纳粹党内反映小资产阶级要求的呼声并未完全平息。希特勒清除反映小资产阶级要求的代表者的余波，一直要持续到1934年清洗冲锋队事件。

总括起来看，可以说纳粹党性质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如下的历史过程：1919年1月——1920年2月，纳粹党前身德意志工人党，是一个右翼工人政党；1920年2月——1924年底，纳粹党演变成为小资产阶级右翼政党；1925年——1930年7月，纳粹党由小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向资产阶级反动政党演变，其中决定性的转折发生在1925年2月希特勒重建纳粹党至1926年2月，班堡会议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纲领被否决的这一年；1930年8月——1933年1月，纳粹党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政党与原有统治阶级的权势集

团结盟，接管政权。当然，正如一切历史事物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任何标志一样，这种阶段的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但它们毕竟有利于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复杂的历史问题。

第五章

德国法西斯政权的建立

魏玛共和国后期持续的政治危机，为纳粹党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德国统治阶级的权势集团在经过三届总统制内阁未能摆脱危机稳定局势的情况下，面对纳粹党咄咄逼人的声势，终于作出了与其结盟的抉择。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政府总理，标志着德国法西斯统治时期的开端。从以希特勒纳粹党居于主导地位的法西斯化的联合政府，到纳粹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政权的全面确立，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魏玛议会制被完全废止和法西斯极权制系统建立的演变过程。希特勒凭借政府总理的合法地位，利用魏玛议会制遗留的合法形式，交替使用暴力恐怖与和平立法两种手段，继续夺取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到立法，从政治到经济、军事以至思想文化的一切权力，直至获得国家最高权力。1934年8月，希特勒以国家元首和政府总理的双重身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宣告了纳粹党夺权过程的终结。

第一节 魏玛共和国后期的政治危机

希特勒纳粹党在1930年以后的几年里迅猛发展，一跃成为德国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并夺取了国家政权。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1930年后，魏玛共和国伴随经济危机而来的严重政治危机，是纳粹党得以崛起的重要条件之一。

魏玛政局的转折

魏玛共和国的建立，无疑是德国历史上的一种进步。由于这个共和国是一次大战失败的形势下建立的，它既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冲击和影响，也受到来自协约国的巨大压力。它是工人阶级的一翼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导人同资产阶级和军方权势集团达成妥协的产物。各个政党组织、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和冲突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魏玛共和国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实际上，它从一开始就处于慢性政治危机之中。它的历届政府都是短命的。政府危机接连不断发生，内阁犹如急速旋转的木马游戏在频频更迭。从1919到1928年的9年里，共经历了15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时间不到7个月。历届政府都无力解决当时德国面临的迫切问题，只有靠政府走马灯式的更迭才得以暂时缓解一些矛盾。

1929—1933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德国各种政治力量都顽强地出来表现自己，使这个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垄断资产阶级在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它们力图通过政府将经济危机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1929年12月，垄断资产阶级的反

动组织帝国工业同盟公布了《是振兴还是走下坡路》的备忘录，作为它们解决经济危机的纲领。它要求卡特尔自由化，将垄断资本家联合起来，以便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决定社会政策。它主张，“把德国经济从一切非经济东西束缚下解放出来，采取适当措施控制一切不利生产的因素”。^①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家联合向政府要求“提高消费税，实行人头税，降低商业税和基金财产税”，政治上要求“削弱民主措施，国会要自我控制”^②，要镇压工人的反抗斗争。

1930年春，国会中的资产阶级政党一致同意接受有利于垄断财团的杨格计划。它不能容忍社会民主党作为贯彻垄断资产阶级意图的障碍，继续留在政府内，就联合起来反对米勒政府。3月27日通过了杨格计划^③社会民主党最后一任总理于1930年3月28日辞职。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民主党、人民党和民族人民党五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就此垮台。此后，德国实行所谓总统内阁体制。

总统制内阁是指总统运用魏玛宪法第48条授予的权力，任命一个未获议会多数承认的总理，以所谓“紧急法令”进行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会的约束。魏玛宪法第48条规定：“如果在德国境内公共治安和秩序遭到严重扰乱或破坏的话”，总统可以“为恢复公共治安和秩序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必要时还得运用武力进行干涉”，并宣布基本权利暂时失效。^④

大联合政府的垮台，标志着魏玛共和国政局发生了重大转折，部分地改变了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统治形式。它由工

^{①②} 鲁格：《德国1917—1933》，德意志科学出版社，柏林1978年版，第345页。

^③ 1929年2月协约国德国赔偿委员会巴黎会议上，美国代表杨格提出并经会议通过的第一个世界大战战胜国关于德国赔偿的计划。

^④ 曼弗里德·冯克：《没落中的共和国》，布里吉特·贝特霍尔德、埃尔温·克内曼和格哈特·舒尔茨选编：《魏玛共和国史料集》，柏林人民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31页。

人中的一翼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制的躯壳内联合执政，转向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暂时依靠总统制内阁的形式维持其联合专政。议会制共和国依然存在，但是，资产阶级传统政党的力量 and 影响遭到削弱，权势集团的份量和作用更为增强。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9—1930年的11年中，是魏玛国民议会和历届国会选举中获得选票最多的第一大党。其中1919年1月19日国民议会选举中获选票1150万张，占投票人数的37.9%。^①在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选举中，它仍是获得选票最多的一个党。然而选票下降为857万张，占总投票数24.5%。它的领导人艾伯特、谢德曼、鲍尔和米勒先后担任过魏玛共和国的总统和联合政府的总理。社会民主党员在议会和政府中一度占有优势地位，但它“并未掌握统治德国的垄断权，”^②它对德国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他们所领导的政府在某些问题上执行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人民群众越来越对它感到失望。大联合政府垮台后，它已无法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

中央党是历届国会选举中获得选票最多的资产阶级政党。在1920年6月6日国会选举中它获得选票501万张，占总选举票数的17.8%。1930年9月国会选举，它所获选票绝对数略有增加，在总选票中的比例则下降为14.8%。它的主要成员是垄断资本家和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基督教工会工人中影响较大。这个党的领导者善于同左、右翼妥协，政治上强烈要求恢复德国以前在世界上的威望。后来它向右转，主要代表威斯特伐利亚工业家、南德大地主和教士的利益。

德国民主党主要成员是资本家、银行家、职员及知识分子。政治上主张共和主义，要求保护私有财产，主要代表中等工商业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② 《德意志总汇报》，1930年4月20日，见维·洛赫：《德国史》，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译本，第455页。

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利益。1919年国民议会选举中获564万张选票，占总选票的18.5%。但从1920年后每况愈下，1930年仅仅获得3.8%的选票。

德国人民党，党内分两派，一派强调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另一派倾向于自由主义，强调建立议会法治国家。进入政府后，企图在工人阶级、民族主义者和纳粹党之间搞平衡。它主要代表工业家、大商业及加工工业主的利益。1930年以后，人民党向右转，要求恢复帝国，反对魏玛宪法。历届国会选举，在资产阶级政党中居第三位。1920年获13.9%的选票，1930年获4.5%的选票。

德国民族人民党是由一切非自由主义者右翼力量——德国保守主义者、垄断资产阶级的宣传机构泛德协会的代表人物、右翼民族主义者和反犹者聚集组成，“它比德国人民党更坚决地反对魏玛政治体制”^①，主张保守党要效忠于君主专制政体和普鲁士式的王权政体。它主要代表大地主、易北河地区的贵族和重工业集团的利益，在资产阶级和右翼力量中有较大影响，1925年进入政府。在1919年选举中获10.3%的选票，1924年上升为20.5%，1930年所获选票仅次于中央党。

大联合政府垮台后，魏玛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濒临瘫痪状态。早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之前，在如何对待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问题上，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中就有两派，一派在魏玛共和国刚一建立就主张消灭它；另一派则主张通过议会方式争取群众，壮大力量后再推翻它。一个了解垄断资产阶级内幕的人曾说过：“一次大战后德国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制度的问题取决于以下事实，即居领导地位、支配经济的资产阶级担负起了行使政权的重任，但它显得人数太少。如果它不是单纯靠武力来巩固这种统治，那它就需要把不属于本阶层，但又必不可少地为本阶层

^① 舒尔策：《德国1917—1933》，第80页。

劳动的人民群众拉到自己一边来……议会就是从事这种联系的好办法。”^①面对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政治、经济问题，德国资产阶级实际上已不可能指望有名无实的议会来争取群众了。

人们对国家的政治危机议论纷纷，普遍认为，德国的议会民主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中央党领导人之一E·博尔茨于1930年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表示：“我早就看透，议会不可能解决重要的内部政治问题，如果能有10年的专制独裁该多好！但愿如此！”^②自由主义者恩斯特·米勒批评当时的魏玛国家是“自称的人民国家”，“掌权的党派和它们的领导人无比的麻木”，他们是国家的“巨大危险”，“窒息了人们对战争的政治警觉”。^③法学家卡尔·施密特曾在《政治神学·论权威学说》一书中宣传反对议会、拥护个人专权的思想。他写道：“权威证明，为了创造权力，并不需用权力”，“谁对非常状态作出决定，谁就是权威”。^④“议会主义已是过了时的形式，这种形式已失去道义和思想的基础”。^⑤他认为，在非常状态下，就需要一个有权威的总统实行专政。这些思想和言论无疑进一步损伤了议会民主制的威信，为独裁专政作了舆论准备。

事实上，自大联合政府垮台后，议会的作用日趋减少。经议会通过的法律，1930年有98条，1931年有34条，1932年只有3条。国会开会的次数是，1930年94次，1931年41次，1932年13次。^⑥多数情况下靠总统发布紧急条例维持局面。参加执政的党已没有能力左右政局的发展。

① 《德意志总汇报》，1963年，4月14日。

② 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第23页。

③ 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第31、32页。

④⑤ 阿尔特格尔特·布拉赫：《论政权的崩溃和夺取政权》，慕尼黑1983年版，第43、40页。

⑥ 《抵抗斗争与流亡时期的德国工人运动》，1980年，波恩。

过渡性的总统制内阁

自1930年3月开始实行总统制内阁，中央党的布吕宁、巴本以及无党派军人施莱歇尔先后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布吕宁执政时间比较长，后两人分别为170天和37天。这两年多的时间，是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沉重冲击着魏玛共和国整个社会生活的时期，也是魏玛共和国由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转向法西斯政权的过渡时期。

经济上，布吕宁政府采取对垄断资本输血，向劳动人民转嫁经济危机的政策。他以维持对国民经济有重要作用的企业和生产部门为由，给垄断组织和容克地主大量提供贷款和补助金。从危机开始到1930年底，布吕宁政府给予工商界和航运界大企业20亿马克贷款和保证金，向银行发放10亿马克贷款，向蒂森、伏格勒钢铁公司提供8000万马克的津贴，并高价购买该公司的股票。这些大企业和公司用布吕宁政府发给的保证金和救济金吞并了破产的中小企业价值几十亿马克的财产。政府还通过国家订货和强制推行卡特尔化措施来扶助垄断组织。1931年，布吕宁以救济遭受困难的农业为由，拨款40亿马克“援助”东部地区。这笔贷款绝大部分被地主和富农占有，只有少部分给了中农和贫农。计占地20公顷以上的农户获得95.8%，占地5—20公顷的农户获得3.84%，占地5公顷以下的农户仅获0.08%。危机期间，布吕宁政府向垄断组织和容克地主提供的贷款和救济金共超过100亿马克。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增税、减薪、紧缩社会福利开支等措施，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布吕宁上台伊始，就增加了啤酒税、零售税、人头税、烟草税，还有危机税、单身税、就业税等，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的收入1929年到1932年总共损失300亿马克。危机期间德国工资和薪金总额

减少50%。政府还减少了给残废者、退休者、寡妇和孤儿的救济金，以及失业者的补助金。巴本任总理后，进一步采取降低工资、增加税收的措施。

政治上，布吕宁和巴本政府不仅代表垄断资本和容克地主的利益，而且为确立法西斯统治创造了条件。布吕宁、巴本等人实际上已开始抛弃议会民主制，完全依恃总统颁布的“紧急条例”行使权力。据统计，1930至1932年，总统在不经国会多数批准条件下，颁布具有法律性质的紧急条例达115次，其中1930年5次，1931年44次，1932年66次。布吕宁1930年7月曾解散国会，后多次推迟开会，损害议会的合法权利。有人曾说过“布吕宁虽然不是法西斯，但是，他是共和国的敌人，他致力于建立一个独裁统治专制政权”。^①布吕宁还曾设想建立由总统摄政的君主政体，实质是要复辟霍亨索伦王朝。

原中央党右翼领导人巴本1932年6月1日就任总理，组织了一个贵族兼军阀无党派右翼政府，公开表示他的政府执行的是“坚决反议会制的方针”。^②还声称必须结束“议会民主的混乱管理”，“清除所谓的革命成就”。^③巴本这种赤裸裸的反议会制的言论遭到各党派和工会的反对。

布吕宁、巴本等人在处理同其他政党的关系上，采取了打击、孤立和削弱左翼进步势力；利用、拉拢、勾结极端右翼反动势力的策略。在魏玛共和国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不断加剧的时候，德国共产党的力量 and 影响有明显增长。在危机的前一年，1928年国会选举中，德国共产党获得326万张选票，占投票人数的10.6%；1930年为459万张，占13.1%；1932年7月获529.7万张选票，占14.3%；同年11月的选举中获598万张选票，占16.9%。

^① 《德国现代史1918—1945》，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页。

^②、^③ 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第153、154页。

魏玛共和国后期，各个政党中只有德国共产党获得的选票是直线上升的。

面对日益壮大的德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央党是恐惧的。布吕宁曾设想在排除德国共产党的情况下修改宪法。巴本则采取公开的反共政策。他声称，对布尔什维主义必须“最终加以制止”，“无神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腐蚀必须停止”。在这方面，巴本同希特勒纳粹党的宣传是一致的。

中央党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是长期联合执政的伙伴。布吕宁、巴本上台后，对在国会选举中节节失利的社会民主党采取了排挤、削弱乃至打击的态度。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被排除中央政府之外，但它在魏玛共和国最大的邦普鲁士^①仍处于执政党地位。巴本公然违反魏玛宪法，以普鲁士局势发展不能令人满意，公共秩序和安全已得不到保证为借口，取缔社会民主党普鲁士合法政府，由兴登堡任命他为驻普鲁士总督。巴本接管邦政权，任命中央党的埃森市长弗朗茨·布拉赫特为他的副手兼普鲁士内政部长。

中央党采取又控制、又利用、又勾结的政策，同纳粹党进行政治交易。不论是布吕宁还是巴本，慑于纳粹党力量的迅速发展，企图借助纳粹党的力量 and 影响，遏制德共和社会民主党，扩大自己的影响。布吕宁和巴本都认为，上策是拉希特勒参加内阁，以为这样既可满足希特勒的权力欲，又可控制纳粹党，减少其肆虐行径。布吕宁于1930年10月会见希特勒，希望希特勒入阁，因希特勒要价太高，布吕宁的打算破灭了。

巴本自1925年以来就要求强化总统的权力，成立不受党派约束的权威政府，改变选举法，限制左翼党派的影响。他任总理后声明，“现在这个时刻要求的是同真正的德国人进行合作”。他还

^① 普鲁士约占全德面积的三分之二。

表示，希特勒一旦取得兴登堡的信任，他很愿意把自己的职位让给希特勒^①。这是巴本企图先发制人，让希特勒对事态负责，使其无计可施，为自己的“宪法改革”服务。他很自信地说，“两个月内我们就把希特勒挤到墙角，让他尖叫”。^②

在普鲁士，中央党同纳粹分子就组织普鲁士联合政府进行谈判。对中央党同纳粹党这种互相勾结和利用的做法，甚至巴本的顾问容格也认为像这样肮脏的政治交易是世所罕见的^③。

在对外关系方面，布吕宁政府面临的中心问题是解决向协约国赔款问题。杨格计划规定，德国赔款总数为1139亿马克，在57年内付清，平均每年赔款25亿马克。布吕宁以经济危机为契机，借口德国无力支付，拒绝继续赔款，进而要求全面取消赔款，以便从经济灾难中寻求撕毁凡尔赛和约的途径。为此布吕宁希望创造一种“德国贫困景象”，“德国的日子还必须更糟糕些，街上还要有更多的失业者，政治激进主义的阴森景象还必须尽可能广泛和可怕地笼罩在这个国家之上”^④。蒂森在鲁尔工业区也说过：“现在我需要危机！只有危机来了，工人的工资和赔款问题才能一笔勾销。”^⑤布吕宁政府和垄断集团的目的要通过至少是虚假的德国财政崩溃，迫使德国的债主采取救援行动。布吕宁于1931年6月6日声称：“我们能够让我们国民忍受的贫困已经达到极限……政府意识到，遭受极度威胁的国家经济和财政状况已刻不容缓地要求免除德国无法负担的赔款义务”。^⑥在德国强烈要求下，美英法等国开始同意德国延期偿付，后在1932年的洛桑会议上同意德国缴付最后一笔40亿马克赔款，其他赔款一笔勾销。实际上德国并没

①③ 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第174、176页。

② 赫尔塔·格雷宾：《民族社会主义。原因与本质》，慕尼黑，1959年版，第65页。

④⑤ 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第121、123页。

⑥ 鲁格：《魏玛共和国的经济》，柏林1983年版，第172页。

有偿付这笔赔款。

如上所述，自从1930年实行总统制内阁以后，在内政与外交方面采取了有利于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利益的措施。但不管是布吕宁还是巴本，都无法缓解魏玛共和国的危机，从总的方面看是激化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垄断资本的矛盾，促进了统治阶级内部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从而加深了危机。这种状况对纳粹党的发展与夺取政权是有利的。

纳粹党与权势集团的结盟

纳粹党真正的大发展，它在德国政治舞台上开始产生重大影响，是在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短短几年中。这几年，纳粹党员人数成倍增长。1929年底17万多人，1930年5月24万多人，1933年1月达85万多人。在国会选举中，纳粹党1928年获81万张选票，占总投票人数的2.6%；1930年为640多万张，占18.3%，1932年7月猛增到1378万张，占37.4%。纳粹党在国会中的议席，1928年只有12人，1930年上升为107人，1932年7月增为230人。

纳粹党在政治危机之际，通过国会选举争取群众，特别争取大批失业者，以削弱其他政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它迎合中下层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作了种种蛊惑人心的允诺和煽动，拢络人心，扩大影响。1930年10月，纳粹党国会党团在国会中提出，“由于战争、革命、通货膨胀、通货紧缩而增殖的财产都应为了德国人的福利而加以无偿没收”。希特勒向工人宣称，“要把德国工人的解放扩充到分享红利，分享所有领导权”。^①为了争取农民，纳粹党于1930年公布了一个农业纲领，称农民“是德国未来的代表”，是“民族振兴的源泉”。^②纳粹党还在德国建立了数千个宣传学校，

^{①②} 多马鲁斯：《希特勒演说与声明1932—1945》，第302页、305页。

培养大批宣传干部，把他们派往北德农村，为1930年秋的竞选作准备。

从纳粹党人的社会结构看，纳粹党员中工人、农民的比重，1930年是39.5%，1933年达45%。纳粹党极力用“社会主义”口号争取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1930年7月，施特拉瑟派的重要成员雷温勒在《民族社会主义通讯》上写道：“争取到一个工人，远比一打达官贵人加入纳粹党的声明更有无法估量的价值。”1931年，纳粹党图林根邦内政和国民教育部长威廉·弗利克说过：“如果我们占有权力，那么我们第一个要争取的对象是工人群众。”^① 为了宣传上的需要，纳粹党的领导人说，“不得不采用内心深感痛苦的社会主义的工人语言”。^②

纳粹党极力争取工人和农民，其目的之一是为削弱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影响和力量。它清楚地看到，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它攫取政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尤其是德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中揭露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在经济危机之后公布了《德国人民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纲领》、《扶助农民纲领》，大大鼓舞了工人与农民反对经济危机和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德国共产党的力量在魏玛共和国后期得到相当发展，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1932年11月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失掉200万张选票，由占总选票的37.2%下降为33.3%，在国会中的议席由230个下降为196个；而共产党的选票增加了68万张，议席增加了11个，同社会民主党议席加在一起共有221个。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联合政府垮台后的国会选举，实际上主要是纳粹党与共产党争取群众的斗争。

纳粹党在取得国会选举胜利的形势下，夺权的势头咄咄逼人。纳粹党大区领导人赫尔穆特·布吕克纳在布勒斯劳群众集会

^{①②} 佩措尔德：《纳粹党史1920—1945》，科伦1981年版，第139、144页。

上说：“我们现在不再考虑选票了，下一步该考虑拳头了。”^①

纳粹党极力攻击议会民主，以谋求资产阶级政党中的右翼势力和垄断资本、容克地主的支持。1931年5月，希特勒同莱比锡《最新消息报》主编谈话时直言不讳：“我所要求的是权威与个人尊严……我是民主的死敌，我也不是妇女选举权的朋友。我是普遍的秘密的选举权的反对者。如果这种愚蠢的举动已成事实，那我们就显示出煽动、蛊惑的优势。”^②

在1932年选举的宣传煽动中，纳粹党提出，“如不消灭现存的社会制度，我们的民族就会毁灭。”“希特勒给人们以最后的希望……希特勒是所有希望德意志有前途的人的火焰般的信号。”^③希特勒曾说过：“共和制度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这种制度最终被消灭的时刻到了。”^④“一分钟也不能安静地等待了”，“现在该是把他们赶下台的时刻了”。^⑤戈培尔也声称：“我们运用民主的方法仅仅是为了夺取政权。”^⑥

纳粹党攻击议会民主的做法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从国会选举来看，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显著下降。与危机前1928年国会选举相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民党、民主党等党派在1930年共失去523.1万张选票，1932年7月失去806.8万张选票。原来支持这些党的选民相当大一部分改投的纳粹党的票，还有些人投了共产党的票。

纳粹党反对议会民主制，正中垄断资本和容克地主的下怀。垄断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早就不满魏玛宪法所确定的议会民主，认为这种制度不能拯救德国，而是“摧毁了祖国”，“使国家堕落

① 《纳粹党史1920—1945》，第114、115页。

②⑤ 佩措尔德：《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第346、325页。

③⑥ 瓦·霍费尔：《民族社会主义文献1933——1945》，袖珍书籍出版社，1982年，第24、27页。

④ 《希特勒的演说与声明》，第115——116页。

成为一个利益集团”，^①现在急需的是强有力的权威的领导者。1931年10月，民族人民党、纳粹党、钢盔团、泛德协会与工业界反动组织、容克地主代表等共同组织哈尔茨堡阵线。这个组织为纳粹党同垄断资本的联系铺平了道路。“理智的大联合派已不掌握国会多数！”，“要求建立一个忠于法律的国家的愿望化为乌有”。^②

胡根贝格领导的民族人民党日益靠拢纳粹党。从1929年起，该党领导人劝说企业家每年资助纳粹党和他们自己200万马克竞选基金。人民党越来越靠拢民族人民党。拥护议会民主制的党派如中央党已成为国会中的少数派，多数派是反对议会民主制的。1932年，中央党也提出，如果纳粹党的希特勒不坚持独裁专政，就支持他当总理。

垄断资本和各种权势集团在关键时刻对纳粹党政治上的支持，对希特勒上台执政起了决定性作用。垄断资本中有代表性的力量早就要求，在现存资产阶级党派中创造一个统一的、保守的党派，去瓦解资产阶级党派的议会政体。^③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业集团要求建立巴本—希特勒政府。鲁尔工业家集团1932年夏天就讨论希特勒是否派人进入政府。化学工业代表威廉·凯普勒同年秋写信给施略德时说：“我坚信，包含纳粹党但排除希特勒的政府仅有一半说服力。当然我将无条件地促成希特勒为首的内阁，我无法想象，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如果没有墨索里尼这个人物掌握政府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④

军界权势集团站在保守力量一边，支持巴本、胡根贝格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军官团的领导人瓦·冯·拉希瑙，哈默

① 格雷宾：《民族社会主义。原因与本质》，第25页。

② 阿·温克勒：《通向灾难之路。魏玛共和国1930—1933年的工人和工人运动》柏林，波恩，1987年，第208页。

③ 佩措尔德：《纳粹党史1920—1945》，第101页。

④ 佩措尔德：《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第388页。

施泰因和施莱歇尔都希望尽快让纳粹党入阁。泽克特将军早在1930年12月就公开表明，拥护纳粹党进入政府。^①

1932年7月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虽然获胜，但终因未取得绝对多数，未能掌权，便开始同中央党秘密联系，企图在国会中获得多数支持，推翻巴本政府。希特勒不听兴登堡总统劝说，要求独揽大权，不同巴本合作。总统下令解散国会，11月6日再次举行国会选举。11月选举中纳粹党遭到失败。这时，垄断资本家蒂森、沙赫特、克虏伯等人看到纳粹党完全经由合法途径出掌政权的困难。一批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代表人物于12月6日联名上书兴登堡总统，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中央党的领导人之一卡斯向总统要求建立一个“民族集中政府”。另一领导人欧根·博尔茨也认为，希特勒的观点同他们的观点“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致的”。^②民族人民党的胡根贝格公开站在中央党一边，支持希特勒纳粹党上台。

在最后决定过程中，巴本、希特勒、施莱歇尔和总统府要人之间进行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希特勒支持施莱歇尔反对巴本政府，旨在由纳粹党执政，坚持他自任总理。巴本则向总统建议发动一次军事政变，废除魏玛宪法，建立独裁统治。施莱歇尔反对巴本的建议，力图由他自己主政，同时认为没有纳粹党恐怖组织帮助，无法镇压政治性罢工。他既想利用纳粹党的力量，又极力要把纳粹运动纳入自己可以控制的轨道。1932年11月17日巴本去职。12月23日兴登堡总统任命施莱歇尔为总理。施莱歇尔为了争得国会中的多数，采取分化纳粹党的策略，拉拢纳粹党内的施特拉瑟派以及民族人民党的胡根贝格和基督教工会主席施特瓦尔德。希特勒发现此举，反对施莱歇尔的计划。巴本对施莱歇尔耿

^① 鲁格：《德国1917—1933》，第382页。

^② 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第177页。

耿于怀，暗中同希特勒秘密会谈，企图推翻施莱歇尔，再次打进总统府，组成巴本—希特勒政府。

在动荡的政局下，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权势集团主张把施莱歇尔赶下台，早日建立独裁政权。于是，1933年1月22日，兴登堡让其子奥斯卡、国务秘书梅斯纳和巴本同希特勒、戈林商谈组织政府。1月25日，民族人民党国会党团公开声明支持希特勒组阁。1月28日施莱歇尔辞职。总统顾问巴本、奥斯卡和梅斯纳向兴登堡建议委以希特勒总理之职。兴登堡提出了希特勒组阁的条件。29日上午，巴本会见希特勒，后者表示接受条件，同意组阁。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代表德国垄断资本、容克地主和军界势力的兴登堡用梅斯纳的话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如果不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将会导致悲剧。巴本—胡根贝格内阁是没有能力抵挡纳粹运动所掀起的轩然大波的”。^①这一任命，宣告了德国原有统治阶级的权势集团终于作出了与纳粹党人正式结盟的最后抉择，在德国历史上写下最不幸的一页。

第二节 希特勒纳粹党执政

希特勒就任总理，意味着他攫取了德国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权力，纳粹党从在野党变成主要的执政党，德国政权被纳粹党推上法西斯化的道路。与此同时，以兴登堡为首的德国统治阶级权势集团还在对希特勒处处设防，在内阁中大力扶植以巴本为首的保守派，指望他们有效地发挥牵制作用，防止希特勒独揽大权，进而迫使其就范。因此，在希特勒受命组阁之初，二者之间仍然进行着限制与反限制、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希特勒很快就突破

^① 《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第257页。

了对他的种种限制和束缚，向着在德国全面建立法西斯极权统治的目标推进。

对希特勒组阁的限制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受命组阁，既不是通过暴力夺取政权，也不完全是通过国会选举获得多数席位上台执政，而是由总统兴登堡援引魏玛宪法第48条，任命其为总理，接管政府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希特勒内阁同布吕宁、巴本和施莱歇尔内阁一样，也是一个总统制内阁。所不同的是希特勒甚至比他们受到更多的限制。

在希特勒受命组建的内阁中，由总统决定内阁多数人选，直接掌管国防和外交大权。希特勒只能决定除自己之外的两名纳粹党人人选。根据双方约定，总统不单独接见希特勒，只有在副总理陪同和在场的情况下，方可听取希特勒关于工作的请示和汇报。^①与布吕宁、巴本总统制内阁不同，希特勒从未从总统那里获得随时颁布“紧急法令”、维持统治的权力。兴登堡要求希特勒内阁必须获得国会多数的认可。如果纳粹党和内阁联合伙伴取得国会多数支持，那么，总统就准许希特勒和纳粹党执政。否则，希特勒内阁将重蹈前几届内阁的覆辙，由总统颁布紧急法令加以解散。

在希特勒内阁中，纳粹党同资产阶级右翼党团——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前总理巴本为首的保守势力代表人物共享权力，组成联合内阁，称为“民族团结”政府。由11人组成内阁，纳粹党除希特勒外，还有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不管部长赫尔曼·戈林。

^① 马丁·布洛沙特：《希特勒国家》，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德国史》第1卷，德意志安施塔特·斯图加特出版社1971年版，第555页。

以巴本为首的保守派人士在内阁中占8人。巴本任副总理兼普鲁士邦总督。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主席胡根贝格任经济部长、农业粮食部长，兼普鲁士经济、农业部长，身兼4职，一时享有经济“独裁者”的声誉。除司法部长弗兰茨·居特纳之外，其余5人——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牛赖特男爵，财政部长卢茨·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贝格将军，交通邮电部长保罗·埃尔茨·冯·吕本纳赫男爵，劳工部长弗兰茨·色尔特均为前巴本“贵族兼军阀”内阁成员。^①

在各部相当于副部长的国务秘书中，纳粹党只有1人，由瓦尔特·冯克任国务秘书兼新闻首席代表；德意志民族人民党2人；其余国务秘书均为上届巴本内阁中的人马。

在保守势力代表人物看来，1月30日希特勒内阁是他们较为满意的理想形式。他们既排斥了民主派和进步势力，又能利用纳粹党拥有的群众基础为自己服务，稳定政局，渡过危机；同时，又能在内阁中分享权力，使纳粹党遵循他们的轨道，防止其越轨行动。联邦德国历史学家戈勒·曼指出：由于总统的支持，居于内阁多数地位的保守派“似乎形成了一种阻止可能出现的纳粹主义一意孤行的障碍”，^②达到了对希特勒制约和限制的目的，使纳粹党能够为总统制内阁服务。

尽管如此，希特勒在做了一些暂时性的让步以后，满足了他原来坚持的要求，初步达到了合法夺权的目标。纳粹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了主要执政党。希特勒合法地掌握了国家最高行政权力。弗立克出任内政部长和戈林出任不管部长，直接掌管了全国和最大的邦普鲁士的司法机构及警察部队。纳粹党握有实权，是希特勒改变权力格局，进而独揽大权的决定性前提。

^① 布洛沙特：《希特勒国家》，第555页。

^② 戈勒·曼：《19—20世纪德意志史》，菲舍尔出版社1982年第16特刊版，第555页。

希特勒上台之际，魏玛议会民主制虽然处于解体阶段，但是其权力机构依然存在。在形式上，德国仍然是一个总统半独裁制的议会共和国。希特勒内阁还要受到解体阶段的魏玛共和国宪法及其机构的影响，承认有其延续性。1919年7月通过的魏玛宪法不仅尚未失效，而且是希特勒执政的依据。希特勒不得不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贯彻自己的权力和意志。

魏玛宪法规定，国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由普遍、平等选举产生的各党派的议员组成；联邦议院由各邦政府代表组成，有权对国会提出的法律进行抗辩；内阁是国会的执行机构，由在国会拥有多数的党派按选举结果的比例组成；总统是共和国的代表和国家元首，掌有很大权力，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最高法院是国家最高司法机构，确保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国家秩序，司法和法官保持独立。^①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严重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执政，虽然与宪法规定的权限有所不同，但是国会和国家元首仍然拥有对希特勒和纳粹党是否继续执政的某种决定权。希特勒也不可能一下子清除残存的议会民主制形式，“不可能一夜之间确立新的政权”。^②

魏玛宪法第109—165条还详细地规定了公民享有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资产阶级民主权利。^③这意味着民主和进步力量有可能利用宪法中规定的这些权利，进行反对希特勒政府的斗争。资产阶级各党派也有可能在此时纳粹党违反宪法规定时，通过宪法程序表示反对。

同时，魏玛共和国实行联邦制，中央与地方分权，各邦权力

① 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史部分，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2—158页。

② 沃尔夫冈·鲁格：《希特勒、魏玛共和国及攫权》科隆帕尔—鲁根施泰因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③ 汉斯·包尔特：《魏玛宪法》联邦教育中心波恩1987年版，第51—54页。

很大。根据宪法第74条，代表各邦利益的联邦议院拥有对国会立法决议的否决权。宪法第68条规定，国会和中央政府拥有外交、军事和财政大权。各邦拥有自己的宪法、政府和议会，掌握警察、教育等权力。希特勒组阁之后，联邦制继续存在，联邦议院仍有权力。在18个邦一级政府中，纳粹党只在安哈尔特、布劳恩施瑞克、麦克伦堡、奥尔登堡、图林根5个较小的邦内执政或参政。^①希特勒要实现中央集权也需要一个过程。

以上事实表明，希特勒出任总理还只是德国确立法西斯专政的开端，要在德国全面建立法西斯的独裁统治还要经历一个演变的过程。

希特勒当然不会甘心忍受保守势力对其权力的限制和束缚。他所要追求的目标是彻底废除魏玛议会民主制，全面建立法西斯独裁制的政权。早在1924年他就宣称要“取缔政党”，“解散国会”，“以独裁制取代议会民主制！”^②1932年1月他明确表示：“法西斯主义要求全部权力，绝不同其他势力、保守派政党和派别长久地分享权力”。^③

希特勒在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中，利用1932年7—8月后德国渡过经济危机低谷、工业生产出现回升的有利条件，以主动进攻的姿态，有计划、有步骤地夺取全权。其首要步骤便是取得国会多数议席。

① 君特·普鲁姆：《1933—1934年接管和巩固政权》，维尔茨堡普罗埃茨·弗莱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8页。

② 莱恩哈德·库恩尔编：《德国法西斯主义文献资料集》西德保尔—鲁根斯坦因出版社1978年版，第109页。

③ 沃尔夫冈·鲁格：《魏玛的终结》，柏林狄茨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页。

纳粹党控制国会多数

希特勒要巩固其执政地位，首先必须获得国会多数议员对其出任总理的认可。然后，打破魏玛宪法的约束，通过一项根本改变国家体制，使自己可以不受限制地行使权力的法律，以“合法”的程序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这就是所谓的授权法。

魏玛共和国宪法第76条规定，制订任何一项改变宪法的法令，须经国会 $\frac{2}{3}$ 多数通过。^①当时，执政的纳粹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国会议员只占议员总数的41.9%。^②为此，希特勒决心解散国会，重新进行国会选举。

1933年1月30日上午，内阁宣誓就职之前，希特勒突然向内阁主要成员提出解散国会和重新选举的要求，遭到胡根贝格的反对。当天下午，希特勒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戈林重提这一要求，又遭到胡根贝格强烈拒绝。胡根贝格担心纳粹党可能在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摆脱内阁保守派伙伴们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牵制。巴本建议暂时维持现状。

第二天举行第二次内阁会议，希特勒紧逼内阁成员表态。巴本模棱两可。胡根贝格陷于孤立，只得让步。内阁其他非纳粹党成员从自身利益出发，认为只有通过国会重新选举，才能保证联合内阁获得多数承认，因此表示赞成。希特勒以“庄严的保证”安抚他们说，不管选举结果如何，内阁组成绝对不变。^③接着，他建

^① 汉斯·冯斯克著：《德意志宪法史。从北德联盟至今》，柏林学术会议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② 这届国会有583个席位。纳粹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共占247个席位。其中纳粹党占全部席位的33.1%，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占8.8%。

^③ 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汉堡1983年版，第270—271页。

议内阁向总统提议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

2月1日，兴登堡总统表示赞同这一提议，并正式签字，规定3月5日重新举行国会选举。希特勒出任总理不到两天，便摆脱政治对手的阻挠，通过了解散国会、重新选举的要求。这就表明，内阁中保守派想要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进行限制，依恃国会破坏其行动的计划是根本行不通的。

为了取得国会选举中的优势，希特勒制造法西斯恐怖，把矛头指向德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1933年2月1日，希特勒在政府文告中宣布：“德国复兴的首要前提，是清除被共产党破坏的危险”，“根除马克思主义”。^①2月4日颁布的《新闻紧急法令》宣称，凡批评政府者，均受惩罚。2月23日，冲锋队占领、封闭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红旗报》编辑部和印刷厂。2月27日，法西斯分子制造了嫁祸于德国共产党的国会纵火案。^②

2月28日，以“反击共产党人危害国家的暴力行动”为名，由总统兴登堡签署了《保护国民和国家法令》。^③这一法令取消了魏玛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人身、言论等民主自由权利，确认法西斯的恐怖、迫害、拘捕制度。随即掀起了大规模迫害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会会员以及一切民主、进步人士和政治反对派的浪潮。几天之内，仅普鲁士被捕人数即达10万多人。^④

① 佩措尔德：《1933—1934年法西斯政权的蛊惑与巩固》见《历史教学和国民政治学》，民主德国人民与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25期，第55页。

② 1933年2月27日，纳粹分子焚烧国会大厦。次日，普鲁士邦总理发表公告，诬陷纵火事件是德国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的信号，希特勒政府以此为口实，大肆镇压共产党，逮捕共产党人。9月至次年12月，纳粹当局在莱比锡举行审判。被捕的保加利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进行了英勇斗争，揭露法西斯阴谋。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法庭不得不宣告季米特洛夫无罪。1980年12月30日，西柏林法院为同案判处死刑的范·德·卢贝平反昭雪。

③ 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第251页。这一法令是希特勒第三帝国进行恐怖统治的法律基础。

④ 布洛沙特：《希特勒国家》，第568页。

希特勒纳粹党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利用大企业主提供的300万马克巨额竞选基金，^① 针对当时德国社会状况和民族心理特征进行蛊惑宣传。他们极力攻击议会民主制，宣扬阶级调和。法西斯分子宣称，德国是“劳动者的德国”，纳粹党将“提供工作和面包”，铲除失业现象。除共产党人、犹太人和一切反政府者外，所有德国人均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具有共同命运的德国人”通过共同的努力，患难与共，做出牺牲，一个美好、和平的“民族社会主义民众共同体”将在德国出现！^②

尽管纳粹党为在国会重新选举中获得多数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3月5日的选举结果，纳粹党仍然未能如愿以偿。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共获选票1200万张，占总票数30.6%。各传统资产阶级政党获选票1000万张，占25.5%；其中民族人民党获313万张，占8%。纳粹党只获得1720万张选票，占43.9%。纳粹党仍然需要依靠其内阁联合伙伴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选票才得以支撑。两党所得票数合计达到51.9%，仅获得微弱多数。然而，这被认为是民众多数支持希特勒内阁及其政策。希特勒内阁由此获得国会承认，并继续执政。^③ 但是，这离通过《授权法》所需要的 $\frac{2}{3}$ 多数票还相差很远。

强行通过授权法

国会选举之后，希特勒立即在3月5日内阁会议上提出授权

① 此项基金由纳粹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在竞选中共同使用。见佩措尔德/魏斯伯克：《卅字与骷髅头》，德意志科学出版社1981年柏林版，第213页。

② 佩措尔德：《1933—1934年法西斯政权的蛊惑和巩固》，第58页。

③ 艾伯哈德·阿莱弗：《第三帝国》汉诺威法克尔特莱格出版社，1970年第18版，第22页。

法草案，要求新的国会通过授予希特勒政府为时4年全权的法令。他要强使内阁一致赞同，以内阁名义向国会提出这一要求。巴本和胡根贝格不愿意将全部权力交给希特勒一人，对这一法案表示异议。巴本提议，为防止因为通过授权法而出现擅自改变宪法的现象，国会应改名为国民大会，并“制定一部国家新基本法”。戈林拒绝说：“绝不考虑这一建议！”^①

在3月15日内阁会议上，胡根贝格要求增加总统对政府颁布法令的参与权和监督权。总统府国务秘书梅斯纳博士早已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纳粹党方面，他反对这一建议说：“总统没有必要进行参与”，总统本人“也没有要求这样做！”^②

巴本和胡根贝格关于限制授权法的意见被拒绝之后，内阁中的非纳粹党部长们认为，通过授权法会加强内阁的权力，没有人再提出反对意见。在3月20日上午内阁会议上，授权法草案便未加任何修改而通过。希特勒以内阁名义向国会提出这一要求。

为了在国会中取得绝对优势，希特勒针对不同党派采取了不同对策。他公然违反宪法，宣布当选的81名共产党议员资格无效。这样，已当选的647名议员剩下566人，288名纳粹党议员在国会中所占比列可超过50%。戈林又利用他掌管警察大权，对若干名社会民主党议员进行“保护性拘留”，削弱该党在国会中的影响。^③

此时，纳粹党仍然需要再得到40票支持，才能取得 $\frac{2}{3}$ 的多数。因此，争取资产阶级最大政党中央党的支持成为关键。中央党获430万张选票，在新国会中占有74个席位。他们的态度对能否通过授权法起着重要作用。3月7日，希特勒宣布在近期将同中

^① 埃里希·马梯阿斯、鲁道夫·莫尔瑟：《1933年政党的终结》，杜塞尔多夫德洛斯特出版社1960年版，第589页。

^② 海尔穆特·海波尔：《魏玛共和国》，德意志安施塔特·斯图加特出版社1971年版，第756页。

^③ 马梯阿斯、莫尔瑟：《1933年政党的终结》第588页。

央党领导人进行谈判。3月20日，希特勒避开反对授权法的中央党领导人布吕宁，同该党其他领导人卡斯主教、施特格厄尔和哈克尔斯伯格举行会谈。卡斯主教急切地提出“应该尽快回到宪法规定的基础上来”。^①希特勒许诺教会的权利不会削弱，它们同国家的关系不会改变，国会和联邦议院的存在不受威胁，总统的地位和权力依然不变。同时声称，所有投票赞成授权法的政党联合组成一个工作委员会——“精英小国会”。政府根据授权法颁布任何法令时，事先均要听取“小国会”的意见。^②戈林同时对中央党领导人威胁说：“如果不赞成授权法，将把中央党官员从所有机构全部清除！”通过欺骗、拉拢和恫吓手段，希特勒获得了中央党领导人的支持。他们表示，中央党议员将在国会表决授权法案时投赞成票。

3月23日，新国会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开会，讨论通过授权法。会场内外一片恐怖。党卫军士兵封锁整个会场。全副武装的冲锋队在会场里巡视。“谁胆敢反对授权法，就立即逮捕法办”的恐吓声不绝于耳。^③希特勒走上讲台，宣布所谓政纲，要求国会通过授权法，给予政府行使主权的地位。在出席会议的535名议员中，只有社会民主党94名议员全部投反对票。授权法在国会中正式通过。3月24日，兴登堡总统签署授权法，该法令正式生效。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欢呼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议会制在新德国面前投降了！伟大的创举开始了！第三帝国的日子来到了！”^④

授权法正式名称是《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共分五条：

① 马梯阿斯、莫尔瑟：《1933年政党的终结》，第358页。

② 这个小国会只在1933年4月初开过一次会议，未起任何作用。在3月24日授权法生效当天，希特勒在内阁声明，他不想让这个小国会对政府的决定发生任何影响，小国会应于何时召开由内阁单独决定。

③ 马梯阿斯、莫尔瑟：《1933年政党的终结》，第167、356页。

④ 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第300页。

第一条，“国家法律除由宪法规定的程序之外，也得由德国政府制定”。这是将国会立法权转交希特勒政府，使国会形同虚设。第二条，“德国政府制定的国家法律得与宪法有所出入……”。这使政府的权力扩大到可以改变宪法，完全摆脱国会和总统监督，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第三条，“德国政府制定的国家法律由内阁总理发布。”这将总统颁布法令的权力转交总理，立法权与行政权集中于总理，加强了希特勒的地位。第四条，“德国和外国订立关于国家立法事件的条约，不必得到立法机关的同意。德国政府有权发布必要的命令，以实行此等条约。”这使政府颁布法令的有效性扩大到同外国签订条约。第五条，“本法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于1937年4月1日失效；倘现届德国政府被另一政府所代替，本法令即失去效力”。^①这是将法令的有效期同希特勒政府的存在连接在一起。

授权法实际上取代了魏玛宪法，成为第三帝国的宪法。它的通过，无异等于魏玛议会民主制中议会这一最主要机构与表现形式的消亡。它是希特勒纳粹党从开始执政到全面确立法西斯极权统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希特勒正是利用授权法赋予的权力，颁布一系列法令，在“合法”的形式下为所欲为，全面建立起法西斯的极权独裁统治。

第三节 全面确立法西斯极权体制

在德国全面确立法西斯极权体制，希特勒纳粹党采取的主要形式是法西斯主义“一体化”。通过所谓“一体化”彻底铲除魏玛时

^① 因戈·冯·冈希、乌维·布罗德森编：《纳粹国家法令》帕德波森——慕尼黑——维也纳菲迪南德·舒宁希出版社，第2修订版，第21—22页。授权法在1937、1941和1943年曾3次延期。

期遗留的各种政治组织及其影响，将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置于纳粹党和纳粹政权的严密控制之下。

废除议会制和联邦制

授权法通过之后，希特勒于1933年7月声称：“现在，我们必须将民主制的最后残余消灭干净！”^①多党制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主要支柱。希特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取缔了各工人政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实现纳粹党的一党专政。

希特勒首先是取缔工人阶级政党及其工会组织，以德国共产党为第一个开刀的对象。国会纵火案之后，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处于被禁止状态。希特勒出于策略考虑，并未立即正式宣布取缔共产党。他担心这样做会把共产党的选民推到社会民主党一边，增加后者的选票，对纳粹党在国会通过授权法不利。1933年3月31日，希特勒援引授权法颁布《第一号邦一体化法令》，宣布“邦、省和地方代表机构中的共产党议员席位无效”。这意味着正式取缔德国共产党。5月26日，纳粹政府发布《关于没收德国共产党财产法令》，确认没收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财产的合法性。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面对法西斯嚣张的气焰，继续推行静观顺从政策。为避免纳粹政府制造口实，社会民主党于3月20日宣布脱离第二国际。4月27日，新选出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构规定，党在“合法可能”的范围内活动。然而，戈林在5月10日指派警察占领社会民主党办公大楼，没收其报社财产。社会民主党大部分领导人被迫陆续流亡国外，在布拉格设立新的中央机构。6月22日，纳粹党领导人、内政部长弗立克以社会民主党“敌视民族和国家”为由，在全国宣布禁止社会民主党活动，并发布政府法令，

^① 约翰·托兰：《从乞丐到元首》上册，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412页。

从国会、邦议会、市议会和各省市政府机关清除社会民主党人，没收该党全部财产。该党领导人保罗·洛伯和一些国会议员遭到逮捕。

摧毁工会和建立德国劳工阵线，是纳粹党企图控制工人阶级，消除工人阶级政党影响的重要步骤。4月21日，纳粹党政治组织部领导人莱伊签发了一份对工会实行一体化的详细指令，规定“1933年5月2日，星期二上午10时，各地同时进行取缔自由工会的行动”，“特别要取缔全德工会联合会和全德自由职员联合会”，要求“调动冲锋队或党卫军占领工会机构并拘留有问题的人。”^①为欺骗和麻痹工人群众，法西斯分子在行动之前施展了阴谋诡计。5月1日，希特勒在群众大会召开之前接见工人代表，假惺惺地表示要“尊重劳动，尊重工人”。第二天，冲锋队便占领全国各地工会机构，逮捕工会领导人，勒令工会组织解散。5月10日，纳粹党建立了法西斯组织德国劳工阵线，强制一切在职人员参加，以“民族主义思想监督和影响工人。”^②

取缔工人政党与群众组织之后，纳粹党把矛头转向资产阶级政党。

1933年6月中旬以后，纳粹党越来越露骨地要求解散中央党。法西斯分子以逮捕中央党党员等手段打击该党。7月5日，中央党被迫发表自行解散的声明。不久，该党领导人布吕宁流亡国外，其他领导人或加入纳粹党，或宣布成为无党派人士。这样，在德国历史上，天主教政党第一次消失了。

胡根贝格领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是希特勒联合政府中的盟友。没有该党的支持，希特勒不可能迅速组成政府并获得国会的通过。尽管如此，它同样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1933年4月底以

①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主要战犯审讯》，第42卷，纽伦堡版，第66—67页。

② 戈勒·曼：《19—20世纪德意志史》，第825页。

后，纳粹党对它的攻击日益猛烈，并暗杀其国会党团主席欧伯夫林博士，胁迫该党越来越多的党员加入纳粹党。5月3日，胡根贝格将该党改名德意志民族阵线，也无济于事。6月21日，警察和冲锋队占领该党许多城市的办事处。6月29日，胡根贝格被迫退出政府。同一天，希特勒强迫该党领导人温特菲尔德、弗莱塔格、洛灵霍温和鲍恩斯根签署了德意志民族阵线自行解散的决议。

德意志民主党和德意志人民党由于纳粹党在议会选举中夺取其中的小资产者的选票，本已陷入困境。希特勒迅速推行一体化，加速了它们的瓦解。6月28日，德意志民主党的国会领导人在并不情愿的情况下，发表一项宣布该党“自行解散”的三行字声明。德意志人民党早已背离了施特莱斯曼的路线，充当纳粹党的小伙伴角色，7月4日宣告解散。

巴伐利亚人民党是天主教中央党的姊妹党。该党许多领导人和干部因纳粹党在慕尼黑夺权和对巴伐利亚实行一体化而被“保护性拘留”。巴伐利亚新当权者以该党不断进行揭露纳粹党的宣传为借口，指控该党领导人“进行非党派活动”，企图破坏政府法令。^①6月22日至25日，巴伐利亚冲锋队制造了一场反对该党及其机构的暴行，逮捕了许多教士。在巴伐利亚人民党最后一名领导人克瓦特—伊斯尼伯爵退出巴伐利亚内阁之后，该党于7月4日宣布解散。

7月14日，希特勒宣布一项法令：“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唯一的政党”。^②任何个人或团体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任何建立新党的活动都将受到惩罚。这样，在国会放弃立法权之后，

^① 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攫取政权的阶段》，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乌尔施泰因出版社1962年版，第285页。

^② 联邦德国教育中心编：《民族社会主义》，见《政治教育通讯》1983年第125、126、127期合订本，第25页。

希特勒凭借授权法，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迫使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全部在政治舞台上消失，纳粹党成为德国唯一合法存在的政党。

1933年10月14日，希特勒解散3月5日选举的有名无实的国会。11月12日，由纳粹党直接控制，以“人民表决”的滑稽闹剧选举了一个几乎清一色的纳粹党人国会。这个国会纯粹是一个摆设，偶尔充当希特勒大声咆哮的传声筒。

在此之前，各邦议会早已被纳粹党人所把持。1933年3月31日，希特勒颁布一道法令，解散各邦原有代议机构，规定邦议会、市议会、市区和乡镇议会一律按3月5日国会选举票数比例重新组成。这样，各级议会从上至下，实际上都由纳粹党人组成。不久，便自行解体。

废除联邦制，实行高度中央集权，是希特勒纳粹政府集中权力的重要方面。

授权法通过一周，希特勒便抛弃通过授权法前做出的不触及各邦权力的许诺，宣称要剥夺各邦自主权，“实现一场统一帝国的壮举！”^①希特勒解散坚持自治权的邦政府，重新组织由希特勒一手控制的纳粹党人新的邦政府。授权法通过之前两星期，1933年3月9日，冯·埃普将军奉希特勒和内政部长弗立克之命，在少数冲锋队员协助下，将巴伐利亚邦政府赶下台，成立了纳粹党人邦政府。随后一周，希特勒派代表接管了普鲁士以外的各邦政府。自戈林担任普鲁士邦内政部长以来，纳粹党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这个邦的权力。4月7日，希特勒颁布《各邦与国家一体化第二号法令》，^②任命纳粹党高级人士和大区区长担任18个邦的邦长。邦长“必须”执行“内阁总理制定的总政策”。他们有权组织或

^① 克劳斯·黑尔德勃兰特：《第三帝国》，慕尼黑—维也纳R·奥尔登堡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② 1933年3月31日《各邦与国家一体化第1号法令》，规定取消各邦议会。

废除地方政府，任命或撤换各邦官员和法官。从大城市直至乡镇，纳粹党人完全占据了各级政权机构。在各邦丧失自治权之后，代表各邦利益的第二制宪机构——联邦议院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1934年2月14日，希特勒正式发布法令，取消联邦议院。^①

希特勒极力排斥内阁联合伙伴，变联合内阁为纳粹党的一党内阁，独揽政府大权。授权法通过之后，纳粹党在内阁中处于压倒优势，以巴本和胡根贝格为首的保守派成员的活动余地越来越小，其影响大为削弱。兴登堡总统把国会纵火案、3月5日国会选举和对各邦一体化，均看作纳粹党取得的成就，自动放弃对希特勒的限制。兴登堡在4月份表示，巴本不必继续陪同希特勒晋见总统；原先那种做法，希特勒会感到这是对他的不信任，而总统本人也不想伤害他。^②

希特勒排斥内阁中的联合伙伴，办法之一是增加纳粹党人部长。1933年3月14日，设立人民教育宣传部，任命戈培尔为部长。3月16日，希特勒的忠实信徒沙赫特博士取代路德博士任中央银行总裁。各政党被取缔后，内阁联合的基础消失，联合内阁也无需存在。6月29日，希特勒强迫胡根贝格辞职，任命库尔特·施密特博士为经济部长；纳粹党农业专家瓦尔特·达雷为农业部长。鲁道夫·赫斯作为“元首代表”经常参加内阁会议，不久出任不管部长。巴本于4月7日失去普鲁士邦总理职务，由戈林接替。巴本勉强被留在内阁中，次年，希特勒免去巴本徒有虚名的副总理职务，任命他为驻奥地利大使。劳动部长色尔特为保全自

^① 魏玛宪法规定，通过一道法案，如果联邦议院反对，需要国会 $\frac{2}{3}$ 多数票赞成。1933年3月中旬，希特勒政府派遣特派员接管各邦权力，联邦制的基础已被消除，联邦议院丧失实际权力。

^② 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攫取政权的阶段》，第287页。

己的地位，于1933年4月27日加入纳粹党。其他非纳粹党人部长则毫无反抗地转到纳粹党一边，成为“业务专家”。至1933年夏，希特勒完全控制了内阁。它既独立于国会之外，也不受总统和政治盟友的制约。巴本和胡根贝格当初设计的限制希特勒的计划完全落空。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内阁完全贯彻元首原则，元首决定一切”。^①

希特勒在集中权力的同时，还大力清洗官吏队伍。1933年4月7日，颁布《恢复职业官吏法》，授予政府全权，可任意罢免一切不受欢迎的官吏。希特勒不仅清除大批“非雅利安人”，特别是犹太官员，而且罢免对法西斯政权持某些保留态度的人，由纳粹党的“老同志”及“专家们”取而代之。1933年7月24日，希特勒的代表赫斯在《人民观察家报》发表通告，为160万纳粹党党员安排工作。一部分安排在各行政机构，一部分安排在国防军、警察、辅助警察部门以及工会等团体中。优先安排1930年以前入党的老党员。还为40—60万冲锋队员和党卫军人员，以及纳粹党的各组织成员安排工作。^②纳粹党地方领导人，冲锋队及党卫军指挥官，均当了各邦部长、地方政府长官，或担任国家、行政及警察机构中的其他官职。

1934年1月30日纳粹党执政一周年之际，希特勒颁布了一项彻底改变宪法的《帝国重建法》，从法律上确认中央集权制度。它明确规定：“废除各邦议会，各邦主权移交中央，各邦政府隶属于中央政府，各邦邦长隶属于帝国内政部长管辖……在帝国内政部长、其他部长与各邦邦长和邦政府意见不一时，应由元首裁决”。^③随后，内政部长弗立克通过电台向全国宣称：“几千年的梦

^① 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民族社会主义夺权及帝国政府与罗马教皇签定的协定》，维斯巴登1956年版，第395页。

^② 弗力茨·施泰因伯格：《执政的法西斯主义》，格尔施滕伯格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105页。

^③ 克劳斯·里尔德勃兰特、《第三帝国》，第604—605页。

想实现了。德国不再是一个软弱的联邦国家。它现在成了一个强大的民族统一国家”。^①希特勒利用授权法，完成了俾斯麦、威廉二世和魏玛共和国未敢尝试的事情，废除了德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邦的自治权力，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

对社会生活严密控制的极权恐怖统治

希特勒对司法部门实行一体化，取消其独立地位，首先实行人事变更，强制法官对纳粹党宣誓效忠。1933年3月，在各邦高级法院设立特别法庭，它有权对刑事罪进行判决，它的终审级是1934年7月建立的取代魏玛时期最高法院的人民法庭。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声称：“元首是真正的法官，法律来自元首的权威”，把希特勒吹捧为最高法官。^②这样，“在第三帝国，不受限制的、随时可能变化的领袖意志作为‘最高法律’，取代作为最高法律单位和法律组织的国家。”希特勒作为最高领袖，可以随时通过非常法令和特别措施，独断专行。国家变成仅仅执行领袖命令的工具，领袖本人居于国家之上，不受任何国家法律准则的约束。^③

希特勒一上台执政，便打着反对所谓共产党颠覆活动的幌子，取消了一切民主与自由，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镇压和恐怖活动。

纳粹党有意识地将德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1933年2月22日，戈林命令，从冲锋队、党卫军和钢盔团挑选人员组成一支“辅助警察部队”。3月30日，他宣布警察枪杀工人无罪，授予警察杀害反希特勒人士的无限全权。这些警察中绝大部分人手持卐字旗。不久，党卫军领导人希姆莱将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整个警察

① 克劳斯·里尔德勃兰特：《第三帝国》，第604—605页。

② 佩措尔德/魏斯伯克：《卐字与骷髅头》，第70页。

③ 埃尔德曼：《德意志史。世界大战时期》上册，第424页。

系统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在合法外衣掩盖下，严厉惩罚对政府及其措施的任何批评，查禁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及资产阶级的进步刊物，大肆逮捕、迫害反法西斯人士和民主进步人士。1933年3月和4月，出现第一次逮捕浪潮。据法西斯当局公布的数字，普鲁士被“保护拘留者”达25000人，其中不包括柏林被捕者人数。杜塞尔多夫市达3818人。^①1933年7月、12月和1934年4月，先后掀起几次逮捕浪潮。被捕者大都是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民主人士。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也被秘密逮捕。在很短的时间内，德国成了一个毫无法制、由警察控制的恐怖国家。

纳粹党还有计划地将德国变成一个集中营国家。1933年2月中旬，德国各地都建立了集中营。每个冲锋队都私设集中营，形成一个严密的迫害革命者和民主人士的恐怖网络。62—70%的被捕者被关进集中营，遭到严刑拷打，或残害致死。在战争期间，约有1800万欧洲人被关进集中营，其中1100万人遭处决。特别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有59个，其中有达豪、巴德、杜尔海姆和戈尔迪茨集中营。^②它们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罕见罪行。

纳粹党人以残酷的迫害以及直接谋杀等恐怖手段，极力把人民群众和革命、民主人士的反抗镇压下去。与此同时，他们对德国的文化、教育、宗教以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严密控制。1933年5—6月，希特勒多次宣布：“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完成”，“只有新德意志民族受到教育后才胜利告成！”^③所谓“教育”，就是强迫人们接受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实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

^① 海因茨·库恩里希：《1933—1945年集中营国家》，柏林狄茨出版社1980年版，第216页。

^② 库恩里希：《1933—1945年集中营国家》，第31页。

^③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290页。

信仰”的要求。

1933年5月10日，在戈培尔指挥下，德国所有的大学城举行“焚书日”。马克思、恩格斯和卢森堡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海涅、高尔基等进步文学家、科学家的大量著作被付之一炬。许多著名诗人、作家、画家、音乐家和哲学家惨遭迫害。世界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弗立茨·哈伯尔等1000多名学者、教授被迫停止在德国的教学和研究，被驱逐出国。纳粹党人以某人具有反法西斯思想为理由，为他们摧残文化的行为进行辩护。9月22日，德国设立了由戈培尔指导的德国文化协会，对报刊、电台、电影、出版等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法西斯控制。

在教育领域，学校被变成法西斯战争的训练场地。从小学到大学，教课书充斥着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内容。学生中断了正常学业，军事训练和公役劳动成了主课。他们被引导不再去进行思考与学习，只知盲从与卖命。希特勒决心把德国青年培养成“全世界望而生畏”，能够执行法西斯计划的人。

在宗教方面，为了使“基督教和纳粹党的世界观溶为一体”，1933年7月20日希特勒政府和梵蒂冈缔结协定，宣称保证天主教自由和准许其教会拥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但是，协议墨迹未干，希特勒便于7月25日颁布教会净化法令，宣布解散天主教青年联盟。同年7月底，在希特勒亲自干予和警察的恫吓下，希特勒的新教会事务顾问米勒当选为全国教会主教，加强对教会的控制。随后几年，数以千计的天主教教士、修女和教徒遭到逮捕和迫害。天主教出版物被禁止发行，甚至忏悔室也遭到秘密警察的破坏。

在对社会生活严密控制方面，还应提到纳粹党人关于“民众共同体”的蛊惑宣传。这是与恐怖、镇压并用的一种怀柔政策，是纳粹党巩固统治的重要措施。

希特勒关于“民众共同体”的观念与“1914年的理想”——“战

壕共同体”相联系，主张将它扩大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去。^①据希特勒和纳粹党人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对内，民众共同体把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一切政治反对者排斥在外，他们属于被镇压的对象。同样，也将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等其他种族的人排斥在外，他们属于“劣等种族”。对外，民众共同体只承认本民族，即只承认德国，而无视其他民族和国家。在承认德国现实社会存在私有制和不同经济利益集团的前提下，纳粹党将通过一种持久的教育过程，达到取消现存传统、等级地位优越感和各种偏见，实现不分阶级、不分等级、不分职业、不分性别的一律平等。大家作为一个整体和民众共同体中的成员，共同为希特勒纳粹党的内外政策服务。

在领袖原则的基础上，纳粹党成立了各行各业的民众组织。其中有：德国劳工阵线、希特勒青年团、冠以纳粹名称的妇女联合会、大学生联合会、大学教师协会、医生协会、律师协会、教师协会、人民福利会、战争受伤者救济会、技术协会、以及公务员联合会、机动车驾驶团，等等。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把从事各种职业、具有各种身份的每一个人都组织到相应的团体中，对他们进行关于民众共同体思想和纳粹主义世界观教育，同时也组织一些业余文化活动，以笼络人们。

纳粹党关于民众共同体的宣传，在渴望平等的各阶层民众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共鸣，一些人在精神上获得了一种“平等”的满足。“无条件地、高高兴兴地”“为纳粹主义运动和阿道夫·希特勒总理服务。”^②其实，鼓吹所谓民众共同体，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旨在抹杀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统治阶级与广大民众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宣扬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利益的一致性，通过实行一定

^① 莱纳尔·齐特尔曼：《希特勒。一位革命者的自我理解》，汉堡——纽约伯克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② 托兰：《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一生》上册，第453页。

程度的社会福利措施，使德国各阶层民众顺从其极权统治。

确立统制经济

纳粹党打着“不断重建德国经济生活”的旗号，对工业、手工业和商业以及农业实行一体化，进行法西斯主义极权控制。由于各部门的作用及与纳粹党的关系有所不同，各部门一体化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大工业在纳粹国家的军备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纳粹党对大工业协会只是变动少数领导人，由纳粹党人参与监督，并确保垄断资本家的经济决策权。1933年4月3日，纳粹党选派一人参加全国工业家协会领导机构。协会仅仅做了实行领袖原则的许诺，便保住了原有的权力。

纳粹党政府对待中等阶层经营的工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态度，与对垄断资本经营的大工业截然不同，而是采取限制政策。1932年底，纳粹党成立中等阶层工商业战斗同盟。希特勒执政之后，战斗同盟合并了许多代表中等阶层利益的组织。同盟领导人楞特尔及其同事接管新成立的全德商业协会和全德手工业协会，并占领德国工业——商业商会。1933年6月22日，楞特尔当选为唯一的会长。战斗同盟成员迫切要求纳粹党实现大选时做出的许诺。因此，楞特尔下令接管大百货公司、统一价格商店和消费合作社，成立了准备接管大银行与商会的委员会。中等阶层的这些要求，并不符合希特勒亲善大垄断资本的政策。垄断资本也强烈要求制止战斗同盟的上述行为。1933年8月7日，由莱伊解散战斗同盟，解除楞特尔等人的政府职务。一些成员遭到逮捕。

在农业方面，纳粹党实现了对农业组织的一体化，建立了强制性的国家组织农民协会。其领导人均由大地主和富农充当。农民的各项民主权利被剥夺。纳粹党提出的目标是建立“依靠自身

力量”，保证粮食自给的战时农业。国家对农民的种植和产量指标实行强制性限制，按指派的种植额课税，禁止自由销售农产品和私自屠宰牲畜等。1933年4月4日，纳粹党全国农业指导政治部主任达雷同基督教农民协会、其他农民协会代表人物以及全国农业同盟（代表大农业主利益）领导人聚会，决定建立全国农业领导人联盟，作为全德农业等级代表机构。这个机构由达雷主持，由此实现了纳粹党对农业各组织的绝对控制。

1933年9月，希特勒公布关于帝国粮食产品状况法和农庄继承法。前一法令规定，今后经济部门的卡特尔负责处理食品的生产 and 分配，国家对生产、加工、运输、储备、批发和零售均加控制。后一法令规定，凡占有7.5—12.5公顷土地的农户为“继承农户”，土地由长子继承，不得抵押，不得分家，不得转让。然而，这一切法令均不适用于容克和大地主。他们由于国家的高额农业保护关税政策而获得不断增长的巨额利润。

纳粹党执政后总的政策是扩充军备，建立“自立”、“自给自足”的战时经济，以便扩展“生存空间”。这是纳粹党领导集团和德国经济界领导人的共同要求，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德国经济界相结合。

1933年7月15日，希特勒成立德国经济总会，作为德国最高经济决策机构。在17名成员中，有纳粹党人5名，大企业、大银行和大商业界的代表12名。梯森、博施、伏格勒、施略德、莱恩哈德和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等著名的垄断资本家都是他的成员。1934年11月，经济总会与纳粹部长们共同制定《德国经济有机建设法律》，规定全国设立工业、商业、银行、保险事业、动力经济和手工业6个经济组，下设44个经济组，350个专业组，640个专业小组，强制全国所有的大小企业必须参加。^①同时成立一个

^①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

帝国经济商会。根据领袖原则，垄断资本家被任命为各级机构的领导人。他们担任关键性的国家职务，以企业家和国家官员的双重身份出现。另一方面，许多纳粹党领导人加入到垄断资本家的行列，他们同样以国家官员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出现。这样，德国经济从纵、横两个方面紧密交织在一起，隶属于纳粹国家，控制在垄断资本家手中。国家从宏观角度强烈地干预经济：控制消费和劳动市场、监督投资，批准所有重要部门的成立和扩大企业，规定固定的最高工资和零售价格，管理进口和国内生产的原料等。垄断资本家拥有“经济自治管理责任权”，允许其在国家对经济的统制之下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冒险性”，为军备工业和战争服务。

夺权斗争的最后步骤

希特勒实施全面确立极权制的一体化政策，大大增强了他的地位和权力。他在纳粹党夺权斗争中的最后一个目标，就是觊觎着国家最高权力。

授权法通过之后，兴登堡总统的地位已大为削弱。但是，总统始终握有指挥国防军的最高权力和解除总理职务的权力。他还得到各种权势集团的广泛支持，并且在国防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只要兴登堡在世，希特勒的地位及其权力总是要受到一定的制约，而且存在着有可能被剥夺权力的精神威胁。希特勒“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期待着85岁的总统去世之后，一人独揽一切大权”。^①

但是，总统继承权决不会轻易地从天而降。围绕这个问题，一方面，副总理巴本正同希特勒“作战”；另一方面希特勒尚未获得军方的赞同和认可。对希特勒来说，如何处理冲锋队向国防军争权的要求，如何消除冲锋队中关于“第二次革命”的情绪和行动，成

^① 费希特：《希特勒传》，第533页。

为能否继任总统的关键。

巴本自1933年春季以来便要引退。作为副总理，他仍然得到总统的信任。1934年夏，纳粹党内冲锋队同希特勒分歧的激化，给了他重整旗鼓的机会，6月17日，巴本向马尔堡大学学生发表演说，强调“应该结束运动”，制止“第二次革命”与“社会化”的宣传。巴本对希特勒提出警告，要求他必须在冲锋队“反对反革命”的宣传浪潮尚未发展为政治行动之前，加快整肃冲锋队的步伐。他同时声称，准备在下一次内阁会议上与希特勒摊牌，迫使希特勒“镇压”二次革命伙伴们搞的“恐怖无政府主义”。如果希特勒拒绝，巴本将同内阁中的保守派部长——外交部长牛赖特和财政部长克罗西克一起辞职。兴登堡将会解除希特勒的职务，将政权交给军队。

1934年6月21日，希特勒飞往纽台克晋见生病的总统。在场的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明确指出，要么希特勒政府缓和紧张状态，要么总统宣布戒严令，并把权力交给军方。勃洛姆贝格的警告，反映了国防军将领关于“镇压”罗姆和冲锋队的要求。

此时此刻，希特勒完全意识到，不仅继任总统问题，而且包括整个纳粹党政权的前途，均面临着危机。在军方和保守势力的压力下，在纳粹党内戈林、希姆莱和戈培尔的策划下，希特勒下了清洗冲锋队的决心。结果发生了我们在上一章提到的1934年6月30日血洗冲锋队事件。希特勒消除了纳粹党内与他争权的对手罗姆，也铲除了党内和冲锋队内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以此换取了国防军、大企业家和大地主对他继任总统职务的支持。

1934年7月底，希特勒获悉兴登堡的健康迅速恶化，便于7月31日根据授予总理制定法律的权力，秘密拟定了一项接替总统职务的继承人法令。这一法令在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前几小时正式公布，名曰《国家元首法》。其中规定：“德国总统职务与总理职务合并为一。因此，帝国总统原有职权移交帝国总理和元首

阿道夫·希特勒。”^①希特勒作为帝国元首兼总理，拥有国防军的最高统帅权。当天，国防军不是向宪法和总统，而是指名道姓地向希特勒个人宣誓效忠。誓词曰：“我在上帝面前做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帝国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名勇敢的军人，我保证在任何时候，誓死遵守誓言！”^②同样，帝国部长和官吏也向希特勒宣誓效忠。

1934年8月19日，在纳粹党的操纵下，德国举行公民投票，以“批准”希特勒接任兴登堡的国家元首职务兼任政府总理。投票前夕，奥斯卡·冯·兴登堡被唆使在电台发表鼓动性讲话：“我父亲本人把阿道夫·希特勒视为他作为德国元首的直接继承人。我现在根据我父亲的意愿，呼吁德国全体男女同胞投票赞成把我父亲的职务移交给元首兼国家总理。”^③在公民投票那天，4550万选民中3800多万人投赞成票，占89.93%；425万人投票反对，另有87万人撕毁了他们的选票。^④1934年8月20日，希特勒在一份呼吁书中声明：“我们夺取德国政权的运动结束了！”“今天，德意志帝国上至国家权力顶峰，下至地方行政机构，其领导权全部掌握在纳粹党手中！”^⑤

就这样，最终结束了纳粹党夺取德国国家权力的斗争。希特勒成为一个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法西斯大独裁者。

① 奥古斯特·尼赤克：《德国人为什么支持希特勒？》见《法兰克福杂志》1983年第1期，第78页。

② 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上册，第306页；

③ 托兰：《从乞丐到元首》上册，第500页。

④ 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上册，第307页。

⑤ 巴特尔：《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德国》第28页。

第六章

纳粹意识形态

作为法西斯主义具体形态之一的纳粹主义，总的来说，是帝国主义全面危机期间，适应德国新老统治集团的需要，用以对抗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并为摒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制造舆论而煽起的一种极其反动的社会政治思潮。1926年，希特勒在向垄断资本家发表演说时，曾将种族理论、天才个人和生存斗争列为纳粹党的三条所谓“伟大基本原则”。^①这倒也差不多说出了纳粹主义的主要构成。按照我们的概括，纳粹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植根于种族理论的，鼓吹侵略扩张和种族灭绝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宣扬民族至上，领袖绝对权力，对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实行全面严格控制的极权主义。

第一节 纳粹主义的来源

1936年1月26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声称，“一个新的世界已

^① 《重新崛起之路》，德国现代史丛刊。

开始建立，……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执政，不仅是由一个新政府接管政权，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观取得胜利。”^①希特勒所吹嘘的新的世界观，其实既贫乏、肤浅，又荒谬、反动。但它影响很广，危害极大，所以仍有必要对它的主要内容及其来源进行剖析。

纳粹主义的“思想家”

纳粹主义的代表作，即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的演讲稿《重新崛起之路》、^②罗森贝格的《20世纪的神话》，以及纳粹党的二十五点纲领。这些构成了德国法西斯主义世界观和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被奉为第三帝国圣经的《我的奋斗》一书，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20世纪的神话》印行数百万册。这两本书还是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民族政治教育学校教学和考试用的基础课本。纳粹主义的这些著述内容庞杂，东拉西扯，包括对人类历史的伪造，对世界现状的歪曲，对纳粹运动目标的阐述，对所谓“未来帝国”的描绘。它们的谬论，将在本章有关的论述中分别予以评介。

纳粹主义的主要创立者，除了希特勒本人，还有所谓纳粹党的世界观权威，1937年德国民族奖金获得者罗森贝格。他是纳粹党领导人中唯一受过系统理论教育的人，对于奠定纳粹意识形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被希特勒誉为“纳粹运动最深刻的头脑”，“纳粹的教父”。他在《20世纪的神话》中，从种族理论出发，几乎完全改写了世界历史，极端荒谬地杜撰了一幅法西斯幻想的世界

① 雅可布森：《民族社会主义外交政策，1933—1938》，阿尔弗莱德梅茨勒出版社，法兰克福（美因河畔）·柏林，1968年版，第152页。

② 希特勒的《第二本书》是战后才发表的，在第三帝国时期还鲜为人知。

历史图象：世界历史中只有一种高贵的北方民族雅利安人^①，以及文化发展依附于前者的许多低值种族人。这种碧眼金发的雅利安人，从北方多次如同巨大波浪式地发散，涌向世界各地，创造了世界历史。连希腊罗马文化都要归功于北方民族。希腊光明之神阿波罗的金发，雅典娜的兰眼睛，即可为证。全世界都是日耳曼人为主的西方民族的殖民地，自古以来即已如此。此外，科学、文化和一切进步发展都被说成源出日耳曼人的创造性。人类历史被描绘为雅利安—日耳曼人与小亚—犹太人之间种族斗争的历史。^②罗森贝格对他如此伪造世界历史非常得意，认为过去无论谁的书都没有这本书说得这么清楚，既然日耳曼人过去如此光荣，未来就应主宰世界。

纳粹党早期的所谓理论家弗德尔，在他的《打破金钱利息奴役制度的宣言》中，表面上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实际上反对犹太民族，认为只有打破犹太人发明的“金钱利息奴役制度”，才是拯救受苦的人类使之康复的唯一手段。他说，犹太人的资本是寄生性的，雅利安人的资本是生产性的。对于每个德国人来说，克虏伯的名字与“我国工业发展的高峰”连在一起；克虏伯的企业“对于我们数十万的民族同志，意味着面包和工作；对于我们民族，意味着保卫和武器。”^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赞扬弗德尔是纳粹的一个伟大的奠基的理论家，将一切问题解释得那么正确。在别人眼里，弗德尔叙述得牵强附会，在希特勒看来，却都雄辩有力。而且据他说，他在第一次听了弗德尔的演说之后，脑海中立即浮上念头：现在“通向建立一个新党最主要的前提已经找到。”

① 雅利安人，原指操印欧语系中印度、伊朗语族语言的人；纳粹用语中的雅利安人，指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有时单指日耳曼人一支。

② 罗森贝格：《20世纪的神话》，第1章；佩措尔德：《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科学出版社，柏林1982年版第206—211页。

③ 佩措尔德：《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第74—75页、第170—171页。

早期纳粹党的另一个思想家埃卡特，1924年发表了他的最后一文《从摩西到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阿道夫·希特勒与我之对话》，此文亦是纳粹运动的教材。文中将共产主义解释为犹太人的产物，其来源可以追溯到犹太教鼻祖旧约经典的订律考摩西。埃卡特还于1920年著文，断言列宁为犹太人，称“犹太人的救世主列宁。”^①虽然纳粹在公开场合没有直接引用这种凭空捏造，但一直将所谓犹太人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他们本人扯在一起。

还有一个赫斯，参与了希特勒《我的奋斗》书稿的整理。就是这么一批人，用种种耸人听闻的谬论，炮制了大拼盘式的纳粹主义的主要版本。

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思潮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企图将书中的一切说成似乎是自己创造的结果。尽管如此，他后来也曾不由自主地承认，纳粹纲领中的和他自己所说的许多东西，并不是他的独创，而是兼收并蓄德国历史上种种反动思潮加以拼凑而成的。1938年2月24日，希特勒在纳粹党的一次“老战士”集会上明确说过，“我们纲领中写的许多东西，在此之前已经存在很久了。”^②

那么，纳粹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何在呢？总起来看，可以认为来自三个方面：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思潮；德国历史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普鲁士—德意志的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假社会主义。

各种帝国主义思潮散布的谬论，构成了纳粹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使统治阶级—资

^① 佩措尔德，《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第74—75页，第170—171页

^② 狄·艾希荷尔茨，库·戈斯魏勒，《法西斯研究，立场—问题—论战》，柏林1980年版，第261页。

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世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尽管它们具有阶级的局限，在1848年后影响日趋减弱，但在世界历史上发挥过极其进步的作用。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各个领域，资产阶级思想发生了普遍的反动。符合帝国主义需要的各种反动思潮应运而生，这些维护强权政治、宣扬侵略战争的各种帝国主义的思潮，成为居于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思潮的最极端的表现，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进步传统的完全反动。难怪1933年4月1日戈培尔在广播演说中直截了当地宣布：“1789年将从历史上被抹掉。”^①

帝国主义时代到来之际，在欧洲，种族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地缘政治学、新马尔萨斯主义，尼采的政治学说以及社会帝国主义等等反动思潮风行一时。它们互相渗透，互为补充，一个接一个地结成了环环相扣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整体，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利益服务。在这数十年中，这些形形色色、好战的、反人道的反动思潮，在思想上为法西斯主义作了充分的积累和准备。特别是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强者权利”的所谓“规律”来论证的种族理论，被希特勒看成解释世界历史的钥匙。

关于纳粹主义的种族理论，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门讨论，这里先说一说种族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胡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1855—1927)的主要观点，及其对纳粹党人的影响。胡·张伯伦原来是英国人，后加入德国籍，是瓦格纳的女婿。他企图将种族理论作为一种世界观，一种规律，来考察和解释世界历史。

^① 卡·迪·布拉赫尔，《德国的专政，民族社会主义的出现，结构和后果》，基彭豪埃尔—维茨出版社，科隆1980年版，第8页。

1899年，张伯伦的代表作《19世纪的基础》一书出版。他歪曲歌德“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生命之金树常绿”这一名言的原意，妄图反对迄今为止的一切科学概念，代之以自己的“新思想”，对欧洲历史进行“新”解释。他说，代替这种观念的是一个简单而明白的认识，“我们今日之全部文明和文化，都是某一种人——日耳曼人的造物”。^①张伯伦种族理论的主题是大日耳曼主义，反犹太人成为他的种族理论另一对应的主题。张伯伦认为，与日耳曼人相反，犹太人在人类历史上起着反作用，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是人类的敌人。对他来说，欧洲历史就是日耳曼人与非日耳曼人斗争的历史。日耳曼人是最有创造性的优秀民族，生来就是要统治世界的，因此，日耳曼出身的凯撒，有权要求“阳光下的地盘”。此书1914年以前销售10万册，形成一种实际的政治影响，张伯伦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直接先驱。纳粹的头号理论家罗森贝格，在张伯伦去世之前就已称誉他为“纳粹主义的先知”^②。

张伯伦本人晚年对正在崛起的纳粹党领袖希特勒寄予极大期望。1923年10月7日，他致信给希特勒说：“德国在它最危难的时刻诞生了一个希特勒，这就证明了它的生气勃勃”。^③1924年希特勒在狱中，张伯伦还从拜罗伊特特地致函向他祝贺生日，称颂他是一位“伟大的单纯的人”。信的结尾说：“上帝既已将他（指希特勒）赐予我们，也就能为德意志祖国而长久赐福予他。”^④

奥托·阿蒙(1842—1916)，德国人体测定学家，社会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将遗传、选择、变异，“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等结合起来，提出了一整套有关社会秩序和社会进化的“学说”。他在《社会秩序及其自然基础》一书中，

① 佩措尔德：《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第20页。

②、④ 布拉赫尔：《德国的专政，民族社会主义的出现，结构和后果》，第16、139页。

③ 佩措尔德：《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第21页。

提出所谓优秀种族具有某些身体特征。他相信人类种族集团的遗传特征，如头的大小、鼻子的长短是与生存斗争的能力相联系的。^①他把富有者列入“高等人种”，而把劳动人民列入“低等人种”，为剥削压迫提供生物学论据，并极力宣传德意志民族优于其他民族，以及雅利安人（所谓“长头人”）统治世界。奥托·阿蒙因此成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直接先驱者之一。

地缘政治学使纳粹的“东进政策”获得了伪科学的解释。地缘政治学亦称地理政治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关于国际政治现象制约于地理的理论。它“从事研究一个国家内和各国之间在空间关系方面的生活环境”，强调空间是它的特色，为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提供各种地理依据。瑞典的约·鲁·切连（1864—1922）提出了“地缘政治”这一名词，他所倡导的保守的国家学说，在德国影响很深。德国地理学家弗·拉采尔（1844—1904）首次提出“生存空间”的概念。他认为国家就如一个生物的物种，这个物种的主要生存规律就是地域扩张，一个国家总要根据其适当的能力扩大或缩小其范围。

对于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有不可忽视影响的卡尔·豪斯贺费尔（1867—1945）是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推广者。他的主要观点都来自切连和拉采尔。他认为，有的弱小国家人口过少，领土多余，没有权利独立生存；而有的国家对生存空间拥有自然权利，可以不顾那些无力开发自己领土的所有者的权利。以强凌弱，以多凌寡是自然的。他深受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尔的影响，后者曾说，“统治东欧的人控制心脏地带；统治心脏地带的人控制世界岛；统治世界岛的人控制世界。”豪斯贺费尔早就对瑞典、芬兰和波罗的海诸国怀有可侵略的观点，又曾闪烁其词地表示过假定某个强国可能对俄国采取极端行动。他在希特勒被监禁时期经

^① 布拉赫尔：《德国的专政，民族社会主义的出现，结构和后果》，第13页。

常前去探望，传说他几乎等于口授了《我的奋斗》论外交政策的第16章。1924年豪斯贺费尔创办《地理政治学杂志》，这个杂志后来成为德国法西斯主义宣传中心之一。1933年在慕尼黑成立地理政治学研究所，豪斯贺费尔担任所长。他一生写作和编辑过20本左右的书籍，其中《德意志民族及其生存空间》一书是为纳粹青年阅读的初级课本。他所领导的地理政治学研究所雇用了上千人，为纳粹提供准备征服的国家的图表、地图、统计数字和各种情报。豪斯贺费尔在德国纳粹垮台后自杀身死。

德国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哲学也成为培育法西斯主义的温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以至今日在西方世界一直享有盛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其政治哲学是反动的，它与纳粹主义思想有着亲缘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将在本章另一节予以讨论。除此之外，新马尔萨斯主义表述了肆无忌惮的侵略意图，社会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对外掠夺将造成本国人民的富裕等等，后来都构成纳粹思想的内容。

上述帝国主义的诸种反动思潮虽然不只在德国流行，但在德国表现得最为突出。它们在德国合流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的口号：要求“生存空间”！这正是纳粹主义要求对外扩张的最重要的口号。

德国历史上的极端民族主义

在德国历史上，极端民族主义在19世纪初已露端倪。至19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的种族理论兴起之后，逐渐形成了一股以种族理论为核心的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其中，保尔·安东·德·拉加德(1827—1891，保尔·安东·伯蒂歇尔的笔名)，尤利乌斯·朗贝恩(1851—1907)等人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法西斯主义的产生。

格丁根的东方学教授，圣经学者拉加德，第一次最清楚地表述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生存空间”的政策。他的两卷本《德意志文集》(1878—1981)得到广泛的传播。拉加德如同种族理论的代表人物胡·张伯伦一样，崇拜日耳曼人的沃丁神^①，要求保持“真正德意志人的纯洁”，清除一切“外国的”文化，罗马法，启蒙主义，英国的国会制，法国的民主平等。他提出对内要培育一种新的德意志贵族，建立所谓高贵的“精英”统治，建立摆脱犹太影响的纯粹的基督教。对外要求实行民族的帝国主义政策，应将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以及巴尔干、黑海一带的民族并入德国，将德国的乞丐和农民移居至黑海和小亚细亚，同时对俄国进行战争，并将俄国一直赶到中亚细亚。^②拉加德的《关于德国政策的当前任务》(1853)的报告，后来被纳粹看作纲领性文件。埃卡特所著《从摩西到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阿道夫·希特勒与我之对话》这一粗劣作品，就继承了拉加德所表述的反犹太人的基本思想。^③希特勒炮制《我的奋斗》一书时，也将拉加德的思想作为源泉之一。^④

稍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的作家尤·朗贝恩，以匿名发表了《教育者伦勃朗》^⑤一书(1890)。此书极为畅销，两年内达37版。1918年后影响很大，至1943年已达90版。它在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感情和传播非理性主义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被认为几乎包括了法西斯主义以前民族主义的全部思想实质。此书迎合帝国

① 沃丁神——北欧神话中诸神之长，是智慧之神、战神、死神、农业之神，具有坚强的斗争意志，无所不能。系一戴帽执杖独目之神，或者漫游，或者骑在八条腿的骏马上，由两只乌鸦Hugin和Munin以及两只狼Geri和Freki陪同。沃丁神后来为纳粹党人崇拜，被尊为日耳曼民族的灵魂和力量的源泉。

②、③ 佩措尔德：《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第13—17、170页。

④ 布拉赫尔：《德国的专政，民族社会主义的出现，结构和后果》，第139、32—33页。

⑤ 指荷兰名画家伦勃朗(1606—1669)。

主义需要，将种族思想解释为一切事物的主要因素，认为民族即血统的力量高于一切，先天高于后天，以种族为基础的“精英国家”，高于民主的、平等的“大杂烩”。他赞美画家伦勃朗是德意志民族心灵深处的教育者，要求以新的德意志精神生活来教育青年一代，保护德国的国粹，反对所谓美国化的现代发展，反对社会民主党和马克思主义。

19世纪90年代，德国第一次出现了所谓“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这个名称。以英国社会帝国主义为榜样的德国基督教社会运动，其代表人物传教士弗里德利希·瑙曼和保尔·高瑞在他们的演说和文章中首次提出这一名称。虽然基督教社会运动并不是纳粹的前身，但“民族的、社会主义的运动”这个提法，以及运动要求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世界帝国，在这个帝国内不再有社会问题、工人问题，人们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实现^①，等等，为后来的法西斯主义提供了宣传的重要方向，也为德国法西斯主义提供了名称：民族社会主义。

新保守主义和假社会主义

以施本格勒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是纳粹主义兴起的直接背景之一，被认为是法西斯的直接先驱和同路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其特点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传统，更加强烈地反对十月革命和当时全欧的社会主义运动高潮，主张用强权政治，侵略扩张、假社会主义等手段来解决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

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1880—1936)，因发表《西方的没落》(1918—1922)一书而名噪一时，成为拥有众多读者的著名历史哲学家。他自认为是被误解的尼采哲学的真正继承者。他反对19世纪流行的历史进化观念，而把各个文化的生命周期作为历史研究

的对象。他抛弃历史中的科学性，把一切归结为直觉和体验，将历史非理性化，彻底否认社会和历史进程的进步概念，否认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和规律性，把文化视为“一切世界历史的原始现象”。^①他公开宣称：“人是一种猛兽”；“野蛮的凯撒主义”将是西方社会未来的统治形式，^②在西方文化的黄昏中“迎来了凯撒时代”。施本格勒直接为法西斯主义伪造世界历史，制造种族理论的历史神话和恐怖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阿尔图尔·缪勒·范·登·布鲁克，深受意大利法西斯代表人物恩·柯拉第尼的影响，1919年写作了《年轻民族的权利》，为德国提出了纲领性的扩张要求。1923年他的《第三帝国》一书，虽然未能全部概括后来希特勒帝国的现实，却为它提供了表现的形式。

汉斯·格林(1875—1959)，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没有空间的民族》(两卷集小说)，成为表达“生存空间”的煽动宣传作品，其书名成了纳粹主义的口头禅。

纳粹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在德国也有较长久的历史渊源，所谓“普鲁士精神”象征着民族的、社会主义的使命的神话。

在德国历史上，在某些时期，普鲁士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保守的或反动的思想家所吹嘘的“普鲁士精神”，却是给普鲁士历史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反动的军国主义，专制的强权政治，虚幻的霍亨索伦“社会王国”等穿上色彩斑斓的美丽外衣，使之变成动人神话，以欺骗人民大众。

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赞美普鲁士作为“欧洲的支柱”，“以服务欧洲的幸福为最高目的的国家”^③；称赞弗里德利希二世——

①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5页。

② 布拉赫尔：《德国的专政，民族社会主义的出现、结构和后果》，第30、156页。

③ 《1789年后德国历史上的普鲁士》(文集)，科学出版社，柏林1983年版，第306页。

这个给德国人民留下军国主义、强权政治的最沉重历史负担的国王，“强烈推进民族感情”，“他的政策成为德意志历史的转折点。”^①他们对本质为封建法规的《1794年普鲁士国家公法》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德国立法史上最伟大的编纂法典”，“普鲁士启蒙运动最重要的纪念碑之一”，^②从而将封建专制军事国家普鲁士冒充为“法制国家”。同时，他们还将普鲁士废除农奴制(1807)和始于俾斯麦的社会保险政策(1883, 1884, 1887)加以夸大和歪曲，把霍亨索伦王朝打扮成代表农民和工人利益的“社会王国”。威廉一世、俾斯麦、威廉二世似乎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斐·拉萨尔因俾斯麦答应普选权和一度拨款在西里西亚建立一个“工人合作社”而决心举起了“社会王国”的旗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以古斯塔夫·施莫勒(1838—1917)为代表的讲坛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者于1872年最初建立的组织称为社会政策协会，是一个国民经济学家的小团体，他们主张在现有的国家范围内进行社会改革。施莫勒倡导以普鲁士思想传统为依据的国家社会主义。阿道夫·瓦格纳(1835—1917)代表基督教新教国家社会主义。卢约·布伦坦诺(1844—1931)赞成英国模式的自由主义的合作社组织。由弗·瑙曼为代表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也在此时积极参与活动，一时间，假社会主义的神话甚嚣尘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挽救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出现了宣扬假社会主义的两个变种：其一，由爱德华·施塔特勒博士为代表，主张争取群众；其二，由施本格勒为代表，更加看重所谓“精英”。

施塔特勒曾参加过工会活动，一次大战中被俘虏，后积极参与

①、② 《1789年后德国历史上的普鲁士》，第311、313页。

了在莫斯科的反革命活动和帝国主义干涉活动。回到德国以后，他站在极端的反共产主义立场上，提倡伪装的“社会主义”运动，有意识地盗用工人阶级的口号，并力图利用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将运动引向大资产阶级需要的方向。施塔特勒的活动引起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注意，并得到他们大量的资助，特别是胡戈·施廷内斯的支持。1919年他为此建立了特别基金。施塔特勒曾建议暗杀斯巴达克团的领导人，他说：“如果在我们方面暂时还没有领袖的话，那末，至少敌对的一方也不应有领袖”。^①

施塔特勒于1919年末，发表了《普鲁士精神和社会主义》一书，宣称“古老的普鲁士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是一回事，是同样的东西”。相反，马克思主义却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丝毫共同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者”反对霍索亨伦王朝的1918年11月革命，是“德国历史上最没有意义的事件”。^②他说：“由国家组织生产和流通，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仆人，以及具有最鲜明特征的、不宽容的、权威的形态”，这就是他在普鲁士国家那里看到的“社会主义”观念最好的实现。^③这本书出版之后，施本格勒晋升为皇室哲学家（尽管这时皇朝已被推翻），并与已退位的威廉二世、“皇太子”，“皇后”等保持私人交往。

施本格勒的近期目标要求复辟霍索亨伦王朝，建立一种保守的——法西斯主义专政，并使工人从“马克思主义的幻想中解放出来”；统治阶级要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盟，实行普鲁士意义上的“民主化”。他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与卡普暴动^④相类似。他指责卡普因为不懂得将普鲁士精神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导致了暴动的

^① 佩措尔德：《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第81页；《1789年后德国历史上的普鲁士》，第280页。

^{②③} 《1789年后德国历史上的普鲁士》，第276—277页。

^④ 1920年3月13—17日，德国极右派反动势力发动暴动，旨在重建君主政体。领导人沃尔夫冈·卡普（1858—1922）是东普鲁士行政长官、泛德意志协会和祖国党创始人之一。暴动失败后，卡普逃往瑞典。

失败。施本格勒看重“精英”，主张接纳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普鲁士贵族加入并领导这种假社会主义运动。他的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的图象中，军官团^①占有权威的和崇高的地位，并选出普鲁士贵族，“鲁尔的工业巨头，汉堡的大商人”作为领导人物。对于施本格勒的这种“社会主义”理论，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也开始发生兴趣并加以重视。1920年国防部长汉斯·封·劳默尔在一次政治演说中引用了《普鲁士精神和社会主义》里面的一段话。1922年2月，施本格勒应邀在埃森举行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经济界大会上作报告。他表示希望德国经济领袖首先应将内部搞好，作为前提，去实现对外政策、在东方俄国完全可以成为德国的殖民地，等等。此后，施本格勒成为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顾问，与一些政界、经济界人士过从甚密。参与他们的许多活动。

普鲁士精神，特别是施本格勒所宣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普鲁士精神，直接给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料。正如卢卡奇正确指出的那样：这样一来，施本格勒“就已经把希特勒主义蛊惑群众的社会谬论的基本思想预先安排下来了”。^②

泛德协会及其操纵组织的影响

德国法西斯主义组织的产生，并不是一开始就以纳粹党的完整的形态出现，而是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孕育、酝酿在一些具有法西斯萌芽状态的组织影响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组织在外观上看来是彼此独立的，但都受到帝国主义思潮的影响，多数又与帝国主义的组织泛德协会等有密切的关系。

^① 普鲁士军官团，最早由国王弗里德利希·威廉一世(1713—1740)建立，享有种种特权，象征着普鲁士的军事、政治领导集团。军官退伍后，担任政府文职。军官团在很大程度上垄断着普鲁士国家的权力。

^②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第423页。

1891年建立的泛德意志协会，实际上是当时德国所有沙文主义组织的领导机构，是德国帝国主义的总的宣传机构，起着德国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总参谋部的作用。泛德协会的政治纲领旨在进行领土侵略和殖民地扩张。它主张团结世界各地德意志人，实行所谓大德意志的“泛日耳曼”侵略政策，为德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辩护。协会成员庞杂，多系统治集团及上层社会中人。参与建立协会的主要人物，除了德帝国主义殖民运动发起人和典型代表卡尔·彼得斯^①以外，有被称为“泛德意志协会之父”的阿尔弗莱德·胡根贝格^②（1865—1951），克虏伯公司总经理，以及后来成为希特勒最有影响的支持者和资助者。

自1912年起，保守历史学家特莱奇克的学生、反犹主义者海因里希·克拉斯担任泛德协会主席。他以匿名丹尼尔·弗里曼发表《假如我是皇帝》（1912）一书，为德帝国主义内外政策指出方向。书中提出。国内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不断获胜，外交上没有取得成就，争夺殖民地不力，德意志帝国的权威有丧失的危险。为此，克拉斯呼吁，在国内建立由皇帝独揽大权的专政，取消普选，取消国会参与决定权，驱逐工人领袖，消灭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肃清犹太人影响；对外，不隐瞒德国可以发动战争和在欧洲扩张，进攻的主要目标是东南欧，反对与俄国交好。他赤裸裸地宣称：“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我们推行的外交政策，就是侵略的政策”，“我们需要土地”。^③一次大战刚一爆发，克拉斯即提出要求，认为比利时原属德国，现仍应归属德国；战胜法国，兼并马斯河和索姆河以北地区；消除英国的世界霸权；俄国应失去彼得大帝以来取得的西方土地，把东方变为德国的土地；在非洲建立德国

^① 《欧洲史》第5卷，普罗皮莱恩出版社，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1980年第3版，第251页。

^② 福尔克·里特伯格著，《1933年共和国怎样失败于专政》，1983年版，第101页。

^③ 佩措尔德：《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第42页。

的殖民地，在世界各地建立德国海军基地等等。

克拉斯提出的内外政策的方向和内容，表述了德帝国主义的利益和要求，直接构成后来希特勒法西斯党内外政策的方向和主要内容。希特勒本人承认，他就是克拉斯最忠实的学生，是在泛德意志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1920年12月，希特勒带着慕尼黑警察局长恩斯特·珀纳尔的推荐信，到柏林拜见克拉斯。他对后者极为崇拜，见面时吻克拉斯的手，说他曾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读了克拉斯化名艾因哈德写的德国历史著作，而且在读了《假如我是皇帝》一书之后获得了政治信仰，因为书中已包含了关于德意志民族的一切重要的和必需的东西。^①起初，希特勒等纳粹领导人常常出席泛德协会的大会。1920年10月以后，因害怕群众怀疑他们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才改为私下接触和接受财政的资助。

由于泛德协会具有所谓“精英”性质，一次大战前没有大量吸收会员。1913年只有约2万会员。大战期间也只有3—4万会员。为扩大影响，争取群众支持统治阶级，泛德协会开始关心、支持所谓“民族的社会主义”的运动。

此前，1904年在北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建立的德意志工人党，由泛德协会的“国防基金”资助成立。这个党建立的直接导因是反对捷克的和其他斯拉夫族的非熟练工人，维护德意志工人的优越地位。党内成份复杂，有工人，破产的小资产者，手工业者。其成员及拥护者较早地自称为“民族社会主义者”^②它的突出人物之一，工人弗兰茨·斯泰因曾在埃格尔组织过一次民族工人代表会议（1899）。那次会议提出的纲领，叫做《25点纲领》。20年后，希特勒沿用了这个纲领的名称。纲领的内容是，要求工人和其他“民族同志”一样享有平等权利，保护熟练工人，对大企业、矿山、铁路实行国有化。^③德意志工人党1913年的纲领，由瓦尔特·里尔博士

^{①②} 布拉赫：《德国的专政，民族社会主义的出现，结构和后果》第55、56页。

和铁路工程师鲁道夫·容格拟定，开始形成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将民族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了详尽的对比论述，攻击资本主义，反对社会民主党，反对其他民族和犹太人等观点已经形成，并以反对异族的民族斗争代替阶级斗争。1918年8月，该党再一次拟定新纲领，宣布自己是一切阶级集合的政党，正式改名“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声明“工人”一词已不复为阶级的标志，而是一切劳动者的光荣称号。纳粹党《25点纲领》的第一条，要求建立大德意志帝国，也与此党1913年纲领的第一条完全一致。此党的领导人之一容格在1919年发表了他的理论著作《民族社会主义，它的成长和它的目的》，其中包含的不少内容后来直接纳入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和纲领之中。如提出反对一切异族的影响，捷克人和犹太人被称为“半人”，具有“高贵价值的德意志人应有统治的要求”，^①等等。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时就与这个党有接触，1920—1921年间，希特勒、德雷克斯勒与容格·里尔等人分别在林茨、捷克斯洛伐克、慕尼黑、维也纳等地多次进行实际接触和交换意见。^②这个党作为德国法西斯党组织上的渊源之一，是可以肯定的。

德意志民族日耳曼社团于1912年2月在德国建立。加入这个反犹社团者必须有“纯粹的日耳曼血统”，“致力于击退犹太人的有害影响”，并有固定的经济地位。泛德意志协会的一些人也参加了此社团。另一个与此类似的组织，叫维尔宗恩社团^③。这两个组织实际上已是纳粹运动的萌芽，带有武装战斗组织的性质，采用带钩的十字和SS字母为标志，使用“万岁和胜利”作为致敬口号^④，是后来纳粹标志、口号的来源。

^{①②} 布拉赫：《德国的专政，民族社会主义的出现，结构和后果》，第58、59—102页。

^③ 维尔宗恩，古代北方的一个源出于沃丁神的英雄家族的姓氏。

^④ 佩措尔德：《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第62—63页。

日耳曼社团的巴伐利亚分会——图勒社团，直接参与了纳粹党的前身德意志工人党的创立。由鲁道夫·冯·泽波腾多夫(系一伪装成高等贵族的冒险家和骗子)领导的图勒社团，租用慕尼黑一家旅馆的房间，作为反对左翼工运的所谓民族——社会主义俱乐部。他与后来德意志工人党的创立者哈勒和德雷克斯勒都有联系。图勒社团中聚集了一些极右的反动民族主义分子，其中如罗森贝格、弗德尔、埃卡特、汉·弗兰克以及伯·斯特普弗勒(此人帮助希特勒撰写《我的奋斗》)，都是纳粹党的奠基人或早期领导骨干。泽波腾多夫1918年夏买得的反犹报纸《慕尼黑观察家报》，宣传和普及泛德协会的观点。1920年底成为纳粹党的机关报，改名《人民观察家报》。后来，泽波腾多夫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希特勒到来之前》(1933)，强调图勒社团在纳粹运动诞生时期的作用，而与不承认先行者作用的希特勒相矛盾。1933年后，泽波腾多夫不知去向。有的研究者认为，可能因为他作为纳粹党早期活动的不受欢迎的见证人而被消除。^①

1916年，世界大战中出现了“帝国主义的和平”倾向。泛德协会即提出“和平”口号，操纵建立了争取德国和平的独立委员会。^②为争取工人的支持，打算成立专门的工人委员会，结果1916年夏(有的书记载为1917年夏)在不来梅成立了争取德意志和平自由工人委员会，作为建立各地工人委员会的起点。领导人威廉·瓦尔与克虏伯的大轮船公司和军部均有关系，并与泛德协会操纵的争取德国和平独立委员会密切合作。^③瓦尔企图通过一种社会帝国主义宣传，反资本主义(协约国的)煽动来吸引工人。1918年3月，德雷克斯勒仿效不来梅委员会，在慕尼黑建立了争取良好和平自由工人委员会，此后即如前面所述演变为德意志工人党。

① 布拉赫：《德国的专政，民族社会主义的出现，结构和后果》，第86、87页。

② 库尔特·戈斯魏勒：《法西斯主义论文集》，第441页。

③ 布拉赫：《德国的专政，民族社会主义的出现，结构和后果》，第441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泛德协会支持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德意志祖国党于1917年9月建立。它声称要团结一切“祖国力量”，加强胜利信心，将战争进行到底。其后台是军国主义者，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的权势集团，海军上将蒂尔皮茨任主席。东普鲁士容克视作心腹的泛德协会的头面人物，自1912年为德意志银行监察委员的沃·卡普任第二主席。这个党的领导机构中专门设立一个工人部，企图对工人进行所谓“民族政治的启蒙教育”，将他们吸引到“民族”范围中来。活动结果完全失败。这样，就使卡普等人认识到应该建立一个外观上独立的民族的工人党，为帝国主义争取群众。1917年11月，柏林钾盐辛迪加的职员威廉·格勒尔特向卡普提出建立一个职工党的计划，当即得到卡普和祖国党领导人的完全支持。^①德意志职工党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创建由统治阶级控制的外观独立的所谓“民族主义新工运”，来消除和代替原有的社会主义工运的影响，直接将工人群众引入帝国主义期望的轨道。德意志职工党的活动内容，许多都来自祖国党，已开始进行“反资本主义”的宣传和反犹太人的煽动。由于格勒尔特能力很差，只懂得号召工人一步一步追求飞黄腾达，结果仍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两年多后该党就不复存在。尽管如此，在建立法西斯类型政党的道路上，祖国党得到后台的支持而产生，提出了民族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宣传的口号，提供了一个新的政党的组织模式，对德国统治阶级有所启发，并直接推动了法西斯类型的政党的出现。

综上所述，德国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核心与主体，是在直接继承各种帝国主义反动思潮的基础上形成的。无论从标题和内容看，罗森贝格的《20世纪的神话》都是胡·张伯伦《19世纪的基础》的续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就是克拉斯《假如我是皇帝》一书的直接继续

^① 布拉赫：《德国的专政，民族社会主义的出现，结构和后果》，第442页。

和发展。纳粹思想与帝国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纳粹思想的“质”，就是帝国主义的性质，这点再清楚不过了。由于领导集团文化水平低，纳粹的思想内容显得贫乏、肤浅，它并没有形成具有新“质”的思想，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实际上只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变种”而已！

但是，人们决不能低估这个变种。恰恰相反，纳粹思想由于具有新的特征，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性，使一般帝国主义思潮望尘莫及。德国法西斯主义思想的特征，在于它的煽惑性、极端性和政治上的实践性。它以“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号掩盖真相，煽惑群众；把宣扬暴政和战争的帝国主义思想推到最极端的程度；并将这些思想在“第三帝国”的内外政策中付诸政治的实践。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可以说是帝国主义思想空前的淋漓尽致的表现。

1919年以前，法西斯运动在组织上处于萌发阶段，那些作为法西斯萌芽状态的组织，或直接或由帝国主义支持、操纵而成立，或至少是在帝国主义思潮，特别是种族理论的影响下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者用“民族主义”口号来拉拢群众，“保卫祖国”的沙文主义狂热喧嚣一时，其中反犹成为帝国主义宣传的重要特征。随着帝国主义危机的不断加深，仅仅使用“民族主义”口号已不够用。鉴于社会主义在德国工人中有很深的传统，特别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成为强大的历史潮流。因此，培育、关心、支持一种新的所谓“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并将这种运动纳入帝国主义需要的轨道，以新的方式来实现旧的目的，已成为德帝国主义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致力的目标。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出现了不少这种类型的组织。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演变，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终于产生了德国纳粹党类型的法西斯党。

第二节 核心思想及理论基础

纳粹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纳粹党和第三帝国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根本指导思想。它植根于种族理论，以夺取“生存空间”为中心口号，而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纳粹党的极权主义，以实行领袖原则，建立绝对责任和绝对权威无条件结合的制度，为其着重点。

把德意志民族主义推向极端

极端民族主义是纳粹意识形态最根本的思想倾向。希特勒在解释民族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时，就把它的所谓“社会主义”归结为民族主义。尽管我们在本书前面的章节已不止一次地说到纳粹党的极端民族主义渊源于德意志民族主义，仍然感到有必要再对它作些回顾和分析。

民族主义的概念在历史上是与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相联系在一起。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内涵，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在德国法西斯以前，德意志民族主义以1871年德国统一为分界，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1871年以前，德国资产阶级正处于上升时期，虽然那时的民族主义已经表现某种扩张主义倾向，但它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克服德意志分裂状态，反对外国侵略，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1907年，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出版了《世界公民观念与民族国家》一书，详述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发展及其特点，调强文化是构成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基础，在德意志统一过程中起

了催化剂的重要作用。他说：“德意志的发展是独特的，它与法国和西欧绝大多数民族不同，有着另一种渊源。例如，法国的民族意识归结于1789年法国革命的民族自决和主权思想。与之相反，德国从来都没有一部共同的政治历史。德意志民族意识更多地从一种共同的文化和伦理遗产中产生，通过德意志文化的独特的和变化的因素形成”^①。

17世纪，当西欧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实现民族统一、形成近代民族国家时，德意志还是邦国林立，松散地聚集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在国际市场上无力与英、法等国竞争。德意志人具有一种沉重的自卑感。自18世纪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德意志人民中引起了一种强烈的彼此亲近的感情，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许多学者和哲学家不再像从前那样使用拉丁文和法文著书立说，莱辛和赫德尔等人打破了对法国的模仿，为创立本民族文学、哲学和民族教育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789年法国革命引起的震动，加速了文化民族主义趋势的发展，激发了德意志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拿破仑侵略欧洲，占领德意志99%的土地。德意志惨遭法军的蹂躏。在反对法军侵略的斗争中，德意志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最先痛切地感到，必须有某种政治统一，由文化民族主义发展为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格奥尔格·赫韦格在《召唤》等作品中，号召德意志人克服分裂状态，实现“一条心，一个民族，一个国徽”。^②费希特、格雷斯、施勒格尔、克劳塞维茨等人也极力激发和宣扬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当时，德意志人均发挥其爱国精神，誓为“祖国”而奋斗。一时，“祖国”二字成了德意志人朝夕欢呼和奋起斗争的用语。

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使德意志民族主义熊熊火焰燃遍整个

^①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世界公民观念与民族国家》，见汉斯·海尔茨费尔德主编：《弗·迈内克著作》第4卷，慕尼黑1962年版，第9、12页。

^② 科佩尔·S·平森著：《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02页。

德国。德意志社会、经济和思想的变化，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德意志统一问题提到了历史日程。在这个时期，德意志民族主义真正体现者是上层资产阶级和民族自由党人。新闻记者、知识界人士均为德意志民族主义和亲普鲁士反奥地利的情绪推波助澜。他们宣扬：“……实现德意志人统一渴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普鲁士是“德意志太阳系的太阳”，当代的伟大统一任务“只有普鲁士才能实现”。^①

此时也开始滋生了扩张主义的情绪和倾向。有一些泛德意志主义者主张把中欧、东欧和低地国家的德语民族统一为一个国家。这一愿望原来出现在反对拿破仑一世的解放战争(1813~1815)中，经过早期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鼓吹之后，出现了把奥地利帝国的德意志人划入德国而成为大德意志国的主张。还有一些人主张把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包括进去。

德意志的统一并不是在19世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立宪主义的基础上实现，而是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麦领导下，由德意志民族主义与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大帝遗留的强权政治相结合的结果。俾斯麦在统一德国时，曾大力煽动和利用民族主义，从而在内部加强凝聚力和自己的地位，对外显示武力。对俾斯麦来说，德意志民族主义即意味着通过由普鲁士组织一个政治国家，把所有德意志人联合起来。

德意志实现统一之后，德国的经济迅猛发展。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已经发展为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世界强国。在新兴的德国帝国主义与老牌帝国主义英、法争雄世界的斗争中，德意志民族主义发展为一种富于进攻性和好战性的民族扩张主义。

在威廉帝国时代，德意志帝国越来越强烈地要求获得所谓“阳光下的地盘”和世界强国地位。1888年威廉二世继承帝位。他怀着

^①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第163页。

成为“世界主宰者”的野心，声称向“世界帝国”全速前进。在帝国政府的支持与资助之下，德国的一批文人学者、团体协会和报刊杂志，大肆鼓吹民族扩张主义谬论，为德国帝国主义准备和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制造舆论。

政治学家阿·黑特纳声称：“德国……不能靠世界诸强国剩给它的面包屑过日子。德国本身必须成为世界强国，必须享有平等权利而跻身于其他强国之列”。^①《新德意志》杂志发行人、自由保守党人阿·格拉博夫斯基以寥寥数语道出了德国反动金融资本代表人物称霸世界的野心：“今天，没有什么比征服世界的德意志更加迫切地吸引全体德国人民的了。这样才能把我们从不大自觉的世界强国上升为显然自觉的世界强国，即帝国主义强国”。^②弗·伯恩哈迪将军宣称：既然地球上差不多所有地方都已殖民化，新土地就只有靠牺牲已占有这些土地的人来获得，也就是说，通过征服来获得。因此，战争与征服是产生于需要的法则。^③

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文人学者的煽动之下，在反法战争胜利和德意志统一后形成的一种民族自豪感和民族狂热的基础上，德国人民心里激起了一股强烈的民族扩张主义的狂热。德国人自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具有“超越群伦的品格”，能“以武力执世界之牛耳”。因此，“德国，德国，高于一切”，或“德国，德国，统治世界”的歌词和口号，成为德国人的常用的狂言。^④

德意志帝国是军人和官僚的普鲁士国家与通过贸易和工业而强大起来的上层资产阶级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德国资产阶级不是联合民主力量反对封建势力自下而上地建立国家，而是在对抗民

① 阿尔弗雷德·里特纳：《我们世界政策的目标》，见《德意志战争》，第64期，第29页。

② 阿道夫·格拉博夫斯基：《德意志的信念》，见《关于战争问题》，载《新德意志》第6期，1914年12月22日版。

③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 第420页。

④ 姜委辛编，《现代德国政治外交史》，中华书局印行1935年，第2页。

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情况下从封建势力手中“感恩戴德”地接受这个政权的，所以统治这个帝国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德国工人阶级一直受到残酷的剥削与镇压。但是这个国家的工人运动一度蓬勃发展，社会民主党曾成为国会中的最大政党之一，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利用了内涵专制主义、保守主义、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这四种因素构成的新民族主义，对外扩张，夺取殖民地。同老牌帝国主义争逐大国地位，争霸欧洲，以至发动世界大战。对内则制造和加剧种族仇视，特别是反犹主义，用以转移国内阶级斗争的方向，分裂和破坏工人阶级的运动。统治阶级利用居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间阶层广泛存在的民族情绪，反对民主和社会主义，以巩固和加强他们的统治地位。所以，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一直是被近代德国统治者视为他们巩固统治权力最有效的工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在大多数城镇里，构成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下层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工业和商业的集中过程建立了越来越大的企业；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运动的蓬勃兴起和他们要求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到处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这个阶级害怕丧失自己的地位和安全，感到自己受到了新来的居民和移民的威胁。特别在中欧地区还受到新兴的或不大受欢迎的民族威胁，诸如法国大革命后获得解放的犹太人在政治、经济领域里的兴起，其他诸如新教徒、捷克人、波兰人的上升也引起这个阶级的恐惧。“他们对这些真正的或想象的威胁的反应并未产生‘法西斯主义’，但在1914年以前的世界遭到大动乱的破坏后，这种反应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发展却创造了前提。”^①他们大都具有激烈的民族主义，强烈反对犹太人，把

^① [英]F·L·卡斯頓《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犹太人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灾难的替罪羊。他们还形成政治运动，竭力在中产阶级及下层人民中引起共鸣，并投合下层社会的意愿，力图使他们脱离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但是在大战前，他们的影响仅限于范围较小的少数人，被剥夺了继承权和心怀不满的人，在大战后，这些运动大大发展起来，都在力图为自己发展群众基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由于列强强加于德国人民头上的屈辱性的凡尔赛和约，被迫丧权辱国。德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情不自禁地会发出“德国，德国，低于一切”的感叹，萌发民族复仇心理和愤懑情绪。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包括纳粹党在内，林立于全国各地。另一方面，战争引起革命，被压迫被剥削的德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纷纷起义，汇成推翻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十一月革命洪流。社会主义的呼声震荡全国。这就形成了战后德国相互角逐十分激烈的两大政治潮流：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

1920年，野心勃勃的法西斯首领希特勒等人打出了把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揉合在一起的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这面旗子。他们迎合德国人被屈辱的民族感情，利用普遍存在的民族复仇心理，把德意志民族主义推向极端，宣扬民族复仇主义和民族侵略主义。他们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基本要求是：取消凡尔赛和约，将一切德意志人团结在一个大德意志帝国之内，取得国际上的平等权利（实际指牺牲其他民族的进行掠夺、侵略和扩张的权利）；用一切强权政治的手段夺取“生存空间”，以实现本民族的“复兴”，称霸欧洲和成为世界强国。

1923年4月13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声明：凡尔赛和约“要使2,000万德国人走向死亡，要葬送德意志民族。我们的运动自创始之日起，便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取消和约；二、联合所有的

德意志人，三、要求获得土地，以养活我们的民族。^①1926年底，希特勒在给鲁尔区的工业家作的报告中明确表示，纳粹运动一定要“夺取广阔的土地”，“为德国经济界开拓新的销售市场”。^②1930年11月13日，他进一步叫嚣：“一个民族的奋斗目标就是统治世界”，^③这些话，把纳粹党人极端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实行侵略扩张，夺取世界霸权，讲得再明白不过了。

在这些话里，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终于不见了。对希特勒来说，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概念基本上是一回事，完全可以合成为一个概念。1927年6月24日，他解释说：“最高的民族主义实质上等于最高的民族福利；最高的社会主义等于对民族、祖国的深沉的爱；因此，两者都意味着认真履行共同的种族义务。”^④无怪乎联邦德国历史学家塞·哈夫纳在评论民族社会主义实质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希特勒正是在“他那种以完全可以肯定的大德意志民族为特点的民族主义”上加上了“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最多不过是后加的配料而已”。^⑤

种 族 主 义

纳粹党的极端民族主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与种族主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种族主义理论是纳粹极端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和精神支柱，极端民族主义则是种族主义理论在政治上的具体体现。

种族与民族本来是不同的范畴的概念。种族是指在肤色、毛发

① P·A·施泰因尼格尔编，《纽伦堡审判》，柏林吕滕与勒宁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页。

② 佩措尔德，《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第252页。

③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希特勒评述》，慕尼黑1978年版，第101页

④ 图尔纳尔，《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格廷根1980年版，第57页。

⑤ 弗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页。

等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类自然群体，属于生物学和体质人类学范畴。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纳粹党人那里，二者往往不加区分，时常混合使用。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都是他们用来宣扬纳粹思想、进行侵略扩张、实行种族灭绝的政治上和理论上的依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特别在德国、奥地利以及德意志人聚居地区，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的现象已经广为流传，广大阶层受其思想毒害很深。由于这些思想与“原先以宗教为依据、后来以种族为依据的反犹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①

在德国的犹太人约有五十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历来受到歧视和迫害。成为“所有犹太人中最不幸的”。恩格斯于1884年曾批判过当时用雅利安民族的特性煽起的沙文主义。他写道：“德意志人，尤其在当时，是一个天资高的雅利安部落，并且正处在充满生命力的发展中。但是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②

纳粹的反动种族理论的来源，除了本章前一节提到的胡·张伯伦之外，主要来自种族理论的创始者之一德·戈宾诺（1816—1882）。这是一个法国人，他的理论最初是作为贵族反对市民阶级的反革命武器。他坚决弃绝法国革命，否定人权、平等、民主的思想，认为贵族是高等种族，第三等级是低贱种族。^③按照戈宾诺的观点，种族优劣是社会兴衰、文化高低的决定因素。白种

① 弗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6页。

③ 高等种族或高级种族、优等种族，低贱种族或低级种族、劣等种族。

人，特别是雅利安人是高级种族。其中日耳曼人最高贵；而日耳曼贵族又保留了更多的种族纯洁性，是一切高度文明的创造者。黄种人，黑种人，以及白种人中的斯拉夫人等等都是低级种族；野蛮民族，低级种族只能永远是野蛮的、低级的。

戈宾诺特别重视德国。他认为，德国贵族与法兰克——日耳曼^①的所谓高贵的种族出身有关。戈宾诺的代表作四卷本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于1853年出版，书中就标明是献给那位撕毁宪法、遭到格丁根七君子强烈抗议的汉诺威国王的^②。此书于19世纪末译为德语，在德国引起极大反响。戈宾诺被称为种族理论的“经典作家”，《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一书也就成了种族主义的“圣经”。胡·张伯伦正是继承和发展了戈宾诺的这套谬论。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就已写道，雅利安人，即当代的日耳曼人，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种族，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人种。只要他们继续无情地维持其主人的态度，不久的将来，必然成为“世界的盟主”，“必为万国所拥护”。^③1927年，他又在《重新崛起之路》的讲话中说：一个民族的伟大和意义的首要前提，就是种族性，民族社会主义将民族性和种族本身视为最高价值。他本人对德意志民族的优秀性深信不疑，并认为，两千年来的德国史就是一部世界史。希特勒的基本思想就是，德国，这个创造世界的雅利安种族的核心，不仅要求民族原有疆界的完整，而且要超越“种族核心”地带，以强力扩大“生存空间”，向东反对“低值

① 古代法兰西民族，主要由高卢人和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的一支）以及南方其他各族人融合形成，法兰克人成为统治者。

② 格丁根七君子：1837年10月，汉诺威新国王宣布废除1833年宪法，实行专制统治。格丁根大学7位著名的有进步思想的教授公开发表宣言，率先反抗国王的专横行为，得到全德国人民的支持，被称为“格丁根七君子”，他们是：历史学家弗·克·达尔曼，格·哥·格文努斯，物理学家威·韦伯，国家法学者威·艾·阿尔勃莱希特，现代闪米特语言学奠基人海·艾瓦尔德，德国语言学家、文学家、格林童话编写者雅·格林和·格林兄弟。

③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44—146、177页。

种族”的斯拉夫人，在内部反对被宣布为“头号世界之敌”的犹太人。当德国在世界上占优势的时候，人类的发展就将到达鼎盛时期。

纳粹党的种族理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认为世界历史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种族斗争的历史；日耳曼人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犹太人则是世界的破坏者。罗森贝格在《二十世纪的神话》一书中，集中论述了“种族与种族灵魂”，并列为该书的第一章。他说：“历史和人类未来的命运，都不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是血统对血统、种族对种族……的斗争”。世界上不存在平等的种族，而是只有一种高贵的北方种族和许多其他劣等种族。雅利安人肩负着世界历史的使命。“世界历史的意义”在于，雅利安人“从北方起向全世界掀起多次巨大的波澜”，决定“世界的精神面貌”。1935年，罗森贝格在纳粹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种族学说为“民族社会主义”认识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最重要的基础”。

第二，德意志人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种族——日耳曼人的种族核心，是最勇敢最勤劳的强者。希特勒把人类分为文明的建设者、文明的接受者、文明的破坏者三类，指出只有雅利安人和德意志人才有资格作为第一类人。他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成果，几乎完全都是雅利安人创造的产物。只有雅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造者”。“雅利安人过去是高等民族，我们（德意志人）是雅利安人的后代，是高等人类，因此，我们统治世界！“应该主宰世界！”^①

第三、声称犹太人是劣等种族，应该驱逐或灭绝。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犹太人是人类文明的破坏者，是劣等种族和糟粕。犹太主义是一种精神上的瘟疫，因此应该被淘汰和灭

^① 桑德沃斯，《希特勒与尼采》，哥廷根1969年版，第62页。

绝。纳粹党人认为，一切祸害的根源在于犹太人发明的“利息奴役制度”。犹太人的“交易所的财政经济”是掠夺性的资本，雅利安人的资本则是生产性的、创造价值的资本。犹太人还应单独为1918年德国战败及其后果负责。

第四、推行种族“培育”与“淘汰”，保持种族的“纯度”与“优质”，以便进行征服和扩张，奴役异类民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中，反复强调种族价值，声称民族的纯种力量是最重要的前提，德意志民族应该精心培育本民族的种族价值，选择和保存最“优秀”分子，把他们提高到统治地位。希特勒明确声称：“我们要精选一个新的统治阶层，这个阶层不知温和为何物。这个阶层将认识到自己属于优良种族，因而有权统治别人。这个阶层将能毫不动摇地夺得并坚守它的统治权”。^①在进行种族“培植”的同时，还要“淘汰”不受欢迎的人和怯懦、低能、遗传病患者等“无生命价值者”；“淘汰”斯拉夫人、吉普赛人等非本种族的人。后来党卫军把保护和繁殖民族主体以及“淘汰”任务视为己任。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犯下了灭绝犹太人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滔天罪行。

最后，犹太人种下的祸根中最坏的，就是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国家，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不仅应反对，而且应从德国政治、社会生活中清除出去，并加以消灭。

无论是希特勒和纳粹党其他领导人滔滔不绝的演说中，还是全国上下新闻媒介的纳粹宣传中，上述这些观点是喋喋不休地灌输给人们。简直是到了极为荒谬的地步。举例来说。

罗森贝格在《二十世纪的神话》一书中，硬说列宁为卡尔梅克^②——鞑靼人血统，马克思主义是典型的犹太思想。希特勒

① 《纽伦堡审讯集》，第二卷，柏林吕登与伦宁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

② 卡尔梅克人系蒙古人的一支。

则疯狂叫嚷要杀灭犹太人和工人运动领导人。他说，在一次大战前就应将工人领袖“投入监狱”，对他们起诉并“为了民族将他们干掉”；如果在“战争开始和战争期间，将这些希伯莱族的破坏者一次12000或15000人用毒瓦斯制服和及时消灭”，那将是必要的和获救的办法。^①

在欧洲历史上一贯被统治者当成替罪羊和避雷针的犹太人，当纳粹还处在摇篮的时期，就被纳粹的“思想家”荒诞地歪曲为一切罪恶的渊藪和资本主义弊端的根源，因此，犹太人在纳粹暴政下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绝非偶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果真在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焚尸炉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导演了一场六百万欧洲犹太人人头落地的大悲剧。

“生存空间”论

纳粹党的极端民族主义，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基本要求，就是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这种扩张有理、侵略有理的“生存空间”论，成为纳粹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纳粹的“生存空间”论与种族理论是紧密联系的。在纳粹党人看来，上帝选择了雅利安人，特别是日耳曼——德意志人做主宰种族，因此，为德国人夺取“生存空间”是责无旁贷的。希特勒认为，德国应该舍弃一切世界工业和世界商业方面的企图，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转向取得足够的“生存空间”，为德国民族指出最近100年的生存道路。^②他说：“只有在这个地球上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敢于团结我国人民及其力量走上这条能够引导我国人民从目前有限的生存空间走向新土地的道路……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

^① 《我的奋斗》，第772页。参看佩措尔德：《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第172页。

^② 雅可布森：《民族社会主义外交政策，1933——1938》，第3页。

与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把后者不仅视为强权政治的基础,并且也视为粮食的来源……我们必须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目标……为我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①“保证德国的生存空间是我们的最高原则”。^②1928年鲁道夫·赫斯——所谓“领袖”思想最忠实的宣扬者——说,“生存空间”政策是纳粹运动“最深刻的任务”,“而其他一切只能看成达到这一目的的准备和手段”。^③

所谓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就是争夺世界霸权。希特勒纳粹党人对此也毫不隐讳。1928年,他在奥尔登堡的演讲中说:“我们应得的统治世界的份额,必须由我们争夺得到。在各民族的生存中,自由势力的竞争仍在起作用,最终最出色的民族将统治地球。我们不知道,这将是那一个民族。但是,我们能够使我们的民族不被排除出这场斗争行列(热烈鼓掌)”。^④按希特勒的意见,如果“世界上一个强国,即种族最优秀者,获得了绝对的、无争议的霸权,”那末,世界和平的思想才有实现的可能。^⑤

希特勒需要的“生存空间”是在不断扩大的,起初,纳粹党的目标是建立大德意志帝国,要把所有日耳曼人居住的地方都划归这个国家。1922年希特勒在一次演讲中说:纳粹的最终目的是“创造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⑥希特勒还说过,边界的桩柱应打在“最后一个德意志人的村落”之旁。^⑦

随后,希特勒就提出了向东方夺取“生存空间”的要求。他说:“如果我们今天在欧洲谈到新的土地的话,我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俄国以及属于它的边缘国家”。^⑧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如

① 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册,第121页。

② 《希特勒的演说与声明》,第1185页。

③、④、⑤ 雅可布森:《民族社会主义外交政策,1933——1938》,第3、6页。

⑥、⑦ 雅可布森:《民族社会主义外交政策,1933——1938》第2、7页。

⑧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68页。

果“勤劳的德国农民耕种着东部无尽的土地”，将能够“养活整个一个大洲。”^①而且从根本上说，希特勒认为，国界既由“人们创设，也由人们更改”，因此，目前地球上现存的领土划分并不具有“永恒的价值”。^②

在《第二本书》里，希特勒又进一步要求必须为德国“夺取双倍土地，才能充分结束德国领土的饥荒”。他指望德国再取得50万平方公里土地，以便向“数百万德国农民提供家园，在情况紧急时就可以有数百万士兵来充实德国人民的力量”。

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显然不可能用和平手段。1919年11月，希特勒就宣称：“德国的不幸必须通过德国的铁来粉碎。20年代，他已想象“一个未来的欧洲”，“在一个革命的德国（指反革命的法西斯德国——笔者）的领导下，以暴力强制形成大陆的新秩序”。至30年代，他毫不怀疑要以武装夺取土地，要锻造“这种剑”，并坚决拒绝目标仅仅在修改凡尔赛条约的小规模战争，要进行那种他“在上帝和后代面前”都能证明其目的合理的战争，取得许许多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流血之后得到和平。^③用罗森贝格的话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世界争斗仍然作为这样的世界战争而继续进行，最崇高的使命，就是凭借北方民族的力量源泉之助以获胜。”^④

希特勒除了承认武力之外，并不承认其他任何权利。他准备用暴力和战争解决“生存空间”问题，据说原因在于“没有一国人民根据更高的愿望和更高的权利，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让出占有即使只有1平方米的土地”。^⑤但是，大自然并没有为任何民族或种族保留这片土地的未来占有权；相反，这片土地是为有力量占有它的人民而存在的。“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取

①、② 雅可布森：《民族社会主义外交政策，1933——1938》，第2，7页。

③、④ 雅可布森：《民族社会主义外交政策，1933——1938》，第12，6页。

⑤ 雅可布森：《民族社会主义外交政策，1933——1938》，第369页。

得”。要“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①他极力鼓吹战争，说什么：“在永恒的战争中，人类将变得伟大——在永恒的和平中，人类将会毁灭！”^②

希特勒就是这样杀气腾腾地要用战争夺取生存空间。他一上台执政，立即扩军备战，废除凡尔赛和约，进行一系列侵略扩张行动，直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浩劫。早在1916年，印度诗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泰尔戈就指出，西方民族主义的核心，就是冲突和征服精神，它像捕食的野兽那样，总得有它的牺牲品，而且为增加取得牺牲的地盘而互相斗争，这种斗争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③但是，战争的进程并不以希特勒称霸世界的野心为转移，却以希特勒德国的惨败而告终。

“领袖原则”指导的极权主义

纳粹主义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确立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对于纳粹国家，纳粹党人是把第三帝国当作德国全部历史上梦寐以求的千年帝国的实现；而对它的统治形式和政治体制没有多少兴趣予以具体的解释。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思想“权威”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攻击魏玛共和国及其议会民主制，反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宣扬领袖原则和绝对权威。

希特勒对魏玛共和国以至整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咒骂魏玛议会民主制“已成为德国民族的祸根”。他声称，“今日西方的民主主义，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前躯。惟有根本肃清德国现行之全部制度，始有挽救之道”。^④他们当然更加反对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民主。希特勒指责马克思主义违背了所谓“天然

^{①②} 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册，第121页。

^③ 泰戈尔：《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页《出版说明》。

^④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284、37、345页。

的贵族原则”，以众多无价值的群众，取代了“强权与势力的永恒原则”。^① 还说什么他们追求荒谬的民主精神，用多数去反对个人的力量和天才，事实上多数才是真正的软弱和愚蠢。”^②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推崇威廉的第二帝国的君主制度是一种适宜的统治形式，因为它可以赋予稳定，并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在这种制度下，首先，军队作为凯撒帝国^③ 最伟大的价值因素，意味着“德意志民族的最高学府”，在抵制“犹太人的民主思想”方面起着基本的平衡物的作用；其次，帝国的无与伦比的官僚群体，也懂得抵制国会民主的影响，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权威。^④

希特勒在向鲁尔区的大资本家们讲演时特别解释说，纳粹运动不是议会政党，不期待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可以用多数投票来决定^⑤。纳粹党人也不讳言，他们进入魏玛国会，仅仅为了利用民主制作为一种合法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1928年4月，戈培尔在《“我们打算在国会中做什么？”》一文中说道：“我们进入国会，是为了在民主武器库中用它所具有的武装为我们自己服务。我们将要成为国会议员，以使用魏玛民主的支柱去瓦解魏玛民主。如果民主那么愚蠢，竟为了这种给人帮倒忙的差使给我们发免费车票和津贴，那是它自己的事，……我们是作为敌人而来的！如狼冲入了羊群，我们就是这样来到了。现在你们不再只在你们自己人中间了”！^⑥ 这把纳粹党对待议会民主制的态度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戈

①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69页，佩措尔德：《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第172页。

② 希特勒：《重新崛起之路》，第37页。

③ 即皇帝帝国。

④ 《我的奋斗》第307—309页。佩措尔德：《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第183页。

⑤ 《重新崛起之路》，第42—43页。

⑥ 布拉赫：《德国的专政，民族社会主义的出现，结构和后果》，第154，154页。

培尔还明确提出，“无论如何，要结束国会主义！”，建立一种几乎毫无掩饰的专政。他设想“独裁者首相有权终身任命一个元老院——上院，再由上院从它那方面(1)选举首相！”^①纳粹的极权主义是以“领袖”和“领袖原则”为指导的。^②希特勒德国在建立之初即被称为“领袖国家”，“极权国家”或“领袖极权国家”。所谓领袖原则不仅指最高领袖的个人独裁，也指居于各种领导地位的所谓精英们可以按领袖原则“在权力所及的一切领域行事。领袖原则是一种所谓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无条件结合的根本制度。“每个领袖对下必须有权威，对上必须负责任。”希特勒说，“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的制度，只能由负责的人作决定……必须要由一个人单独来做出决定……只有他才有权威，才有指挥权力……这一原则是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结合，它将会逐渐培养出一批在今天这种不负责任的议会制度时代中根本不能想象的领袖人才。”^③

从国家体制来看，希特勒不是担任某一个有限的、可确定权限划分的职务，而是政治和社会生活一切领域内民族的唯一代表。他认为他个人就体现了整个民族的统一，他就是作为民族本身来说话和行动的^④。反对派和批评意见，各种集团、不同利益和不同思想均不允许存在。“领袖的意志，以及他以任何方式表达的意图，……都可以取消法律和修改至今为止通行的法律。”^⑤按纳粹的民族至高无上的思想，领袖在上面体现了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实现了一切反动国家的无上权力的梦想。

纳粹党为了贯彻领袖原则，一方面是神化领袖，对希特勒进行狂热的歌功颂德；另一方面是为这种树立绝对权威的做法制造

① 布拉赫，《德国的专政，民族社会主义的出现，结构和后果》，第159页。

② 旧译为“元首”、“元首原则”。

③ 《我的奋斗》，第449、450页。转引自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30页。

④⑤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229页，佩措尔德，《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第74—75，77页。

“理论”上的依据，鼓吹所谓“天才个人”，“精英”统治。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极力主张从日耳曼民族中选择固有的精英人物，使他们逐渐取得统治地位。^①他还说：“人民统治的真义是指一个民族应被它的最有能力的个人，那些生来适于统治的人所统治和率领……民主实际上将摧毁一个民族的真正价值……”。^②纳粹党正是依靠这么一批所谓“生来适于统治”人的“精英”，占据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领袖地位，来推行其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

社会达尔文主义

德国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由于纳粹思想以实用为目的，拼凑的内容和混乱的表述，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哲学意味和理论性质，因此，很难确切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纳粹意识形态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极端民族主义、种族理论、生存空间论、极权主义，等等，都是以一种伪科学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将人类社会比拟为动物界，将人等同于野兽，宣扬“生存斗争”、“弱肉强食”，“强者权利”，赤裸裸地为剥削、压迫、侵略和战争辩护和张目的兽性哲学。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本是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一次伟大变革。可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其理论歪曲并运用于人类社会，提出“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强者权利”等作为人类生存、国家民族生存的总规律，为剥削、压迫和侵略战争辩护，这些完全迎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英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家黑·斯宾塞(1820—1903)是庸俗进化论的典型代表，他用庸俗进化论解释社会现象，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斯宾塞几乎把达尔文的全套

^①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84页。

^② 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9页。

术语和思想加以推广，将进化论导入人类社会，完全混淆了生物与社会两种性质不同的事物，认为人类社会就像动物机体一样服从生物学规律，因而资本主义关系似乎带有“自然的”、“永恒的”性质。同时，还得出存在着生物学上的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的种族主义论断。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路德维希·古姆普洛维奇(1828—1909)在《种族斗争》(1883及1909)一书中，将种族理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起来，将人类降低为一般动物。人类历史被描述为“各种族争取生存的斗争”和侵略、征服、融合的圆圈。

社会达尔文主义后期代表人物路德维希·沃尔特曼(1871—1907)是古姆普洛维奇的学生和戈宾诺的崇拜者。1902年，他创办并主编了《政治人种学评论》，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展到一种极端的程度，广泛宣传身材高大的金发超人——日耳曼民族具有神圣使命。他力图证明全部欧洲文明都是日耳曼精神的产物，有效地在德国促进了民族狂热，并在西方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些观点，以及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说过的奥·阿蒙所谓优异种族具有某些身体特征等谬论，都直接被纳粹意识形态所接受。沃尔特曼还提出种族的“纯化”概念，被希特勒和罗森贝格认为十分重要。

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还反对以教育为主要手段，使人类得到平等的、人道的发展的思想，提出要“有计划地培育最好的种族，避免血统的混杂”等谬论^①。上述种种观点与德国法西斯主义关于所谓日耳曼人的体征，以及第三帝国惨无人性的“育种”政策和“灭绝”政策直接相连。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希特勒的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置于他最钟爱的种族理论之先。^②希特勒坚信，世界不过是

^{①②} 雅可布森：《民族社会主义外交政策，1933—1938》，第12、6页。

一个强者统治的丛林，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世界。人类的生活是一种人与人之间，集团、民族、种族之间的不间断的、永无止境的、永恒的基本斗争。“谁若停息，谁就生锈”^①，因此，要以一切手段贯彻“生存斗争”。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此写道，“只有天生的弱者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凡是想生存的，必须奋斗；不想奋斗的，就不配生存在这个永恒的斗争的世界里。即使残酷，却是客观现实。”^②这就是希特勒作为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忠实信徒的真实写照。

第三节 纳粹主义与尼采哲学

各国学术界对纳粹主义与尼采思想的关系争论很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学者认为：“尼采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驱”。^③这种观点曾在西方学术界颇有影响。自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否认或抹杀二者关系的倾向。^④近年来在我国学术界也有所反映。

尼采的政治哲学

弗里德利希·尼采(1844—1900)，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乃至今日一直在西方世界居于首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曾经以

① 布拉赫，舒尔茨·绍尔：《民族社会主义夺取政权》，乌尔斯泰因出版公司，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1974年版，第87页。

② 希特勒：《我的奋斗》，国立编译馆译，1943年版，第319页。

③ 汪子嵩、张世英、任华等编著：《欧洲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K. A. 莫基切夫主编《政治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86页。

④ 戈奥尔格·奔索：《论尼采与非纳粹化问题》见联邦德国《现代史季刊》1986年第34期第1册，第108页。

他独特的鲜明风格进行了激烈的美学反叛，反对近代文明的唯物质倾向和精神空虚平庸，真诚热烈地、如饥似渴地探索人生的意义，追求生命的充盈。他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以他的天才和智慧开拓着这一广袤而深邃心理的世界，从而吸引和激动着无数人的心灵，经久不衰。

可是，尼采哲学驳杂不纯，其中消极甚至危险的因素明显可见。特别是尼采的政治哲学，与其说是保守的，勿宁说是反动的。它与德国法西斯主义思想确有亲缘关系。这是尼采本身极大的矛盾与深刻的悲剧。涉及政治领域时，尼采，那个真诚的人已杳无踪影，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傲慢而跋扈的“贵族”（所谓尼采的波兰贵族血统并无依据）。尽管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等命题植根于极端的个人主义，但最终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

尼采敏感到近代文明的衰落，但他把希望寄托在“高贵者”，“超人”的身上。反对平等，反对精神上的和权利上的平等，是尼采一贯的思想。在他看来，种族是不平等的，等级是不平等的，人也是不平等的。尼采虽然没有强调“雅利安人的优越性”，但他从伦理角度“考察”了统治种族与奴隶种族的问题，而且也曾谈到“接受和坚持德国人是高等强人的伟大传统”。^①尼采还认为，“一种较高的文化只能在那里产生，那里有两个不同的社会等级：劳动者等级和有闲者等级即能享受、真正悠闲的有才能者等级，或者用更强烈的表述：强迫劳动等级，自由劳动等级”。^②在他看来，有上等人，也有下等人，“人是非动物和超动物，上等人是非人和超人”^③。其中含意不仅仅指精神的完满与否，事实上包含着阶级与等级的含义。他在《道德的系谱》中也特别强调道德的肯定因素和上流社会，否定因素和下层社会是完全相同的。^④

^{①④} 参看卢卡奇：《理性的毁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8、346页。尼采全集，第16卷，第180页。

^{②、③} 佩措尔德：《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第9、10页。

尼采的历史哲学的立场是偏爱奴隶制的。他认为，任何真正的文明都需要奴隶制。“如果说希腊人是被他们的奴隶制毁灭的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将由于没有奴隶制而灭亡是更正确的了”。^①这段话再清楚不过的说明了尼采的立场。对于民主政治、革命和社会主义，尼采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认为民主是贱民的。民主政治是国家的崩溃，民主会使乌合的兽类变成主人。他说：“错误决不在于权利不平等，而在于主张权利平等”。对俾斯麦实行的极有限的民主伪装，他也进行攻击，认为赋予了工人阶级各种政治权利，充当了将工人“提拔为主人的傻瓜”，因为“我们要奴隶”。^②他在《道德的谱系》中写道：“让我们顺从这样的事实吧：人民——或者说奴隶、暴民、畜群，或者无论你怎么管他们都行，已经取得了胜利，……主人已被废除。一般人的道德已经胜利，……整个人类的这种中毒过程似乎是不可阻挡的”。^③

尼采特别惧怕革命，仇恨社会主义。他在《反基督教徒》中问道：“在今天这些暴徒中，我最恨谁呢？社会主义暴徒……”^④ 面临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威胁，出路何在？尼采的希望何在？在这里，尼采极其敏感地预言了一个即将到来的帝国主义时代。他宣称：“人类儿童时代的政治已经结束了，未来世纪将是为了统治整个地球而斗争的世纪，伟大的强权政治的时代”。^⑤这个时代应由他所谓的“上等人”，少数天才人物，“超人”来主宰。他认为威廉二世具备了某种“超人”品质。1888年10月末，他在给他妹妹的信中写道：“使我感到很高兴的是我们的新凯撒已经理解了权力意志的原则”，他认为这类命定的统治者，“超人”及其他精英应成为地球的统治者。

同时，尼采把非理性主义绝对化，把“恶”浪漫主义化。他颂

①②③④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第284、294、293页。

⑤ 佩措尔德：《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第33—34页。

扬兽性和野蛮，美化战争的意义——作为生活的更新者，已经达到极其疯狂的地步。他说：“这个时代的战争是地球上的人们从未看到过的斗争。地球上的伟大政治只是从我才开始，”^①“我劝告你们不要工作，要去作战。我劝告你们不要和平，而要胜利，……只有战争才能将一切事业变得神圣。战争与勇气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大大超过慈悲”^②这里，尼采已将强权和战争作为斗争的最高法则。难怪后来纳粹党人那样竭力推崇和狂热崇拜尼采，承认他是纳粹主义的“真正的祖宗”之一了。^③

尼采思想对希特勒的影响

在纳粹主义形成过程中，希特勒和纳粹思想家们吸收和利用了尼采的一些重要思想。这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希特勒鼓吹的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受到尼采宣扬的德意志人优越论的影响。尼采在1883—1885年发表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无头无手足之偶像》等作品中，提出德意志民族是肩负统治其他种族历史使命的“高贵”民族。他认为，日耳曼文化的特征是通过与基督教论战形成的。但是在中世纪同基督教进行的斗争中，日耳曼文化却被埋没了。他由此提出“重新评价一切价值”，以德意志文化取代基督文化，进而发展成一种世界文化。^④

希特勒所说的日耳曼人，是指尼采所说的德意志人。只是希特勒赤裸裸地宣扬日耳曼种族优越论，而尼采则迂回曲折地宣扬德意志民族优越论，他是从反对基督教和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

①、② 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46页。

③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第650页。

④ 《尼采全集》第5卷，莱比锡1905年版，第163、271页；戈奥尔格·奔索：《论尼采与非纳粹化问题》，第108页。

欧洲近代文化的角度提出的。尼采反对基督教，并非像一些人所说是主张无神论，而是打倒基督教这一“偶像”，树立起德意志文化新的“偶像”。有人认为纳粹主义中的种族主义与尼采无关的论调，并不符合事实。

希特勒的生存斗争思想，也与尼采提出的“权力的意志”有关。“权力的意志”这一概念有双重含意，即“强力的意志”和“权力的意志”这一点常被人有意或无意地加以忽视。最初，尼采认为“权力的意志”即为追求生存的“强力的意志”。他写道：在自然界中，“大大小小的竞争到处都是为了争优越，争生存和扩张，争强力，遵循着求强力的意志”。^①后来，尼采明显地指出，这一概念即为追求权力、要求统治的“权力的意志。”他说，生活中“各种有机功能，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根本意志、权力意志，……权力意志分化为追求食物的意志，追求财产的意志，追求工具的意志，追求奴仆（听命者）和主人的意志；这是以肉体为例的……坚强的意志指挥软弱的意志。”^②19世纪80年代之后，尼采把“权力的意志”解释为世界一切文化、科学、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的渊源，提出以“权力的意志”代替道德观念，主张暴力和残酷。由此可见，既要了解“权力意志”的双重意思，又要了解它的最终含义。如果只把“权力的意志”单纯解释为“强力的意志”，而忽视强权政治的一面，并以此否认它与纳粹主义有关，不仅片面，而且站不住脚。

希特勒宣扬生存空间与战争的谬论，鼓吹“一个健康的民族为了获得生存地盘，必然产生对土地生存空间的要求，推行掠夺土地的政策。夺取生存空间的斗争，只有通过战争手段来进行。”^③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受到尼采颂扬战争的启发。尼采从帝国主义开始

① 《尼采全集》第5卷，第285页；第1卷，第623页。

② 汪子嵩、张世英、任华等编著，《欧洲哲学史简编》，第202页。

③ 《希特勒的第二本书》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德意志出版社1961年版，第102、128页。

形成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明显倾向中，从殖民地政策和已经开始出现的帝国主义世界政策中认为，世界终将形成一个整体。在世界范围之内，20世纪必然发生一场争夺世界统治的战争，将会提出“谁将成为地球主人”的时代问题。^①尼采认为战争是存在的本质，是培养权力意志的必要手段。他大声呼喊：“我劝告你们不要工作，要去作战。我劝告你们不要和平，而要胜利……只有战争才使一切事业变得神圣。战争与勇气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大大超过慈悲。”^②

尼采宣扬的“超人”思想和领袖观点，对希特勒特别具有吸引力。“超人”这一概念也同样有双重意思。尼采最初从反对基督教对人的个性压制与摧残出发，提出“超人”是一种完美充盈的健全的个体，是与“现代人”、“善人”、基督教和其他虚无主义者相反的类型。^③尼采后来又对“超人”进行过多次解释，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指出“超人”是争霸世界的强权人物。他说：“超人”负有特殊使命，应该学会作为人类历史的最高目标，作为一种“世界精神”，从善意出发，准备牺牲无数的人。“高一等人……对群众的宣战”是必要的。^④他还说，历史的意义在于“超人”的诞生，建立一种完全崭新的特殊人——“超人”在世界范围的统治。^⑤“超人及其周围的精英人物，应该成为地球的主人。”尼采宣扬的“超人”哲学，是资产阶级反动的“英雄”史观。如果只把“超人”解释为一种健全的个体而抹杀他带有政治色彩的一面，并以此抹杀他与纳粹主义有关，也是片面的。

尼采声称：“民主是对伟人和上流社会不信任的表现”，这“是

① 《尼采全集》第7卷，第156页。

② 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

③ 《尼采全集》第2卷，第430页。

④ 《尼采全集》第16卷，第279页。

⑤ 艾希霍尔茨、戈斯德勒主编，《法西斯主义研究》，第289页。

使乌合的兽类变为主人的一种手段”。^①他由此提出，必须根除议会民主制和法律平等，取消“人权”和“一般道德”，主张暴力、独裁。尼采反对民主的词句，经常被法西斯分子直接引用。希特勒和尼采反对议会民主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认为议会民主制过于软弱，因此，竭力主张以大资产阶级独裁专制取代议会民主制。

上述比较表明，纳粹主义同尼采的思想在主要问题上内容极为相似。尼采的主要思想在希特勒混乱的头脑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希特勒因袭了尼采作品中不少对己有利的思想。这些东西成为纳粹主义拼凑形成过程中一个组成部分。希特勒不仅把尼采的主要思想，而且还把尼采气焰万丈、不可一世的过份夸张的癖好，甚至他的措词，都据为己有。“地球的主人”是《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中常见的用语。希特勒最后认为自己就是尼采预言的“超人”。

希特勒为什么要吸收尼采的一些重要思想？

从社会经济基础来说，纳粹主义和尼采的思想均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德国垄断资本对外侵略、重新瓜分世界和发动战争的要求。这一点反映了二者阶级本质的一致性，是纳粹主义吸收尼采思想的先决条件。

尼采的哲学产生于19世纪70—80年代。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转向垄断资本，即帝国主义时代。德国容克资产阶级特别富有侵略性，痛感自己的殖民地太少，^②极力宣扬对“生存空间”的要求，决心诉诸武力，进行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形成中的垄断资产阶级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在思想意识方面发生了冲突。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

^① K. A. 莫基切夫编：《政治学说史》，第853页。

^② 德国当时总共只有面积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470万的殖民地。见斯·费·奥杜也夫著：《尼采学说的反动本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2—53页。

为了与封建专制进行斗争，提出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进步理论思想。但是在时代转折的情况下，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进步思想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变化。新兴的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急切地需要一种抛弃一切进步思想观念和适应帝国主义时代需要的新的理论思想。

尼采通过对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研究，洞察了时代的转折，以其特殊敏感的嗅觉，预感到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本的迫切要求。他无情地嘲笑和尖锐地批评了以往的哲学，提出了不同凡响的哲学思想：打破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传统的价值观念——仁慈、正义、人道，提出重新评价一切价值，由德意志文化填补出现的价值真空。^① 这为帝国主义时代德国垄断资产阶级适应新的形势提供了思想精神依据，为正在形成的德国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称霸世界提供了理论前提。尼采成了新兴的垄断资产阶级最早和最杰出的理论家之一。

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和极端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思想。因此，它必然会广泛地吸收德国历史上和同一时期一切与之类似的反动思想。如前所述，尼采在自己的著作中直接表达了新兴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意图。尼采的主要思想中确实存在着类似希特勒的观点或对希特勒有用的成份，例如，反对民主、反对马克思主义、宣扬德意志民族优越论和鼓吹战争等观点。这些方面，不仅有世界观上的共同性，而且有为帝国主义作辩护的方法上的一致性，因此，完全适合希特勒的口味和需要。希特勒执政后，由他亲自发行和由罗森贝格主编的法西斯机关刊物《民族社会主义月刊》创刊号载文明确地声明：“民族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尼采哲学的共同点在于二者的世界观相同。尼采在自由主义时代所提倡的确定不移的英雄新道德，正是

^① 戈奥尔格·奔索：《论尼采与非纳粹化问题》，第58页。

我们的东西”。^①

希特勒通过何种渠道接受了尼采的思想影响？这是尚待研究的一个问题。

尼采的思想自1889年丹麦学者乔治·勃兰克斯和瑞典学者奥托·汉森首先解释并宣扬之后，德国年轻一代的学者艾·冯·哈尔特曼、勒·施泰因等人相继对它进行了解释和研究，经德国最好战的泛德协会的宣传而迅速传播开来，瞬间风靡德国和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尼采的思想被德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广泛地宣传和利用，为它发动世界战争进行辩护。

墨索里尼读过尼采的著作，写过许多有关尼采的文章。他对尼采极其崇拜，20岁便声称是尼采的“最忠实的学生”。^②希特勒是否像墨索里尼一样直接读过尼采的著作？目前尚不能作出具体的回答。一般来说，希特勒和纳粹思想家们确实明明是吸收了其他人的思想，后来却声称是自己的思想，并不特别强调其思想来源，^③因此对于探讨这一问题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可以肯定，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期间，在慕尼黑定居期间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广泛涉猎社会上流行的有关反犹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各类小册子和报刊杂志时，也阅读过直接或间接宣扬尼采思想各类刊物。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证实说：“我在维也纳定居时，热心注意德国的一切时事，不论是涉及政治问题或文化问题。我一方面勤奋地阅读《世界报》、《新自由报》、《维也纳日报》和《德意志民族报》等报刊，同时也以数‘赫勒’购买宣传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小册子。”^④此外，希特勒也从20年代结识的

① 勃伦蒂涅尔，《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批判》，上海潮锋出版社1938年版，第10页。

② 艾希霍尔茨、戈斯魏勒主编，《法西斯主义研究》，第294页。

③ 培·约·拉希施米尔，《法西斯主义的起源》，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页。

④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8、19、21页。“赫勒”德文是Groschen，昔日银币之一种，价值12芬尼。

埃卡特、赫斯以及所谓的哲学家罗森贝格那里了解了一些有关尼采的思想。总之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尼采的思想确实引起了希特勒的关注，使他从中受到某些启发。

第三帝国对尼采的颂扬

第三帝国建立前后，纳粹思想家们为了替纳粹主义寻找理论支柱，给它披上一层“神圣”的灵光，便开始了对19世纪一些思想家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对尼采及其思想的解释和研究。尼采的学说成了法西斯帝国精神和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当时，凡是在第三帝国生活过的人，无不感到尼采对第三帝国产生的影响。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执政不久，便任命罗森贝格为纳粹党精神与世界观培训部元首代表。在罗森贝格亲自主持之下，纳粹党的一些思想家加强了对尼采思想的研究，努力证明尼采是纳粹主义先驱者和预言家之一。“千载帝国”——第三帝国标志着尼采意愿实现的开端。有关尼采的专著、小册子、注释文本和画册像洪水一般，在书报市场上泛滥。

在此期间，阿尔弗莱德·鲍伊姆勒和罗森贝格的秘书亨利希·海尔特勒对尼采思想的解释，成为第三帝国评价尼采的纲领和准则。他们从如下几点解释和利用尼采的思想：

(1) 赞扬尼采反对基督教和重现德意志的精神。1931年鲍伊姆勒出版了《尼采，哲学家和政治家》一书，解释尼采的哲学具有一种英雄现实主义和日耳曼主义的风格，认为尼采提出了一种北方导致战争的价值观。他强调说，尼采对德国人的批评，旨在反对罗马——基督教精神对他们的影响。这种批评最终有助于达到这种目的，重新使德意志人成熟起来，完成我们种族“昔日的使命：成为欧洲的领袖！”^①

^① 阿尔弗莱德·鲍伊姆勒：《尼采——哲学家和政治家》，莱比锡1931年版，第182页。

(2) 推崇“权力的意志”。鲍伊姆勒认为，尼采提出的“权力的意志”这一基本原则，是一种永不停止地进行斗争和战争的“生活”观念。尼采所说的……非理性相对平静的生存状态，是指永无休止的历史长河中现实观念被否定的结束。他从反对“意志哲学”……转向反对道德和责任感。^①

(3) 解释“超人”为希特勒法西斯分子。鲍伊姆勒把尼采解释为政治家。他认为，尼采从一种“日耳曼”精神出发，反对基督教，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民主和社会主义，反对他所处的时代文化与国家，反对“西方的教养”，反对当时的俾斯麦帝国的德国人。鲍伊姆勒解释说，尼采的遗言“愿欧洲……不久造就一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只能是指希特勒。^②

(4) 曲解尼采反对基督教的精神为反犹太主义。海尔特勒在1937年出版的《尼采与民族社会主义》一书中，赞扬尼采对基督教充满的仇恨和由此产生的反自由主义、反民主思想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攻击。^③他强调说，尼采的巨大功绩是揭示了基督教和通过基督教传播的犹太人起源和一切近代“思想”的没落。他声称：“我们感谢尼采从北方——日耳曼文化领域出发，对威胁生命价值的犹太人的认识”。^④尼采的历史哲学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价值斗争的历史，是“贵族道德”与“奴隶道德”^⑤之间斗争的历史。在这些斗争的背后，必然预示着“历史的伟大戏剧”：“北方种族反对犹太对立种族的世界斗争”。^⑥

①② 阿尔弗莱德·鲍伊姆勒：《尼采—哲学家和政治家》，第182页、173页。

③ 海因茨·马洛尼：《弗里德里希·尼采与德国法西斯主义》(Heinz Malorny, Friedrich Nietzsche und der deutsche Faschismus)，见D. 艾希霍尔茨、K. 戈斯魏勒主编：《法西斯主义研究》，第293页。

④ 亨利希·海尔特勒：《尼采与民族社会主义》(Heinrich Hartle, Nietzsche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慕尼黑1944年版，第42页。

⑤ 尼采认为，“贵族道德”是日耳曼即德意志人的道德，“奴隶道德”是基督教的道德。

⑥ 亨利希·海尔特勒：《尼采与民族社会主义》，第54页。

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在宣扬和称颂尼采精神的同时，并非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尼采的思想，他们也提出了尼采同德国纳粹主义在国家、民众、民族等观点方面存在的差异。但是，他们认为，二者内在的相近性大于二者之间的相异性。1933年罗森贝格把尼采正式列为德国纳粹主义先祖之列。同年12月8日他在《人民观察家报》发表文章写道：“如果纳粹主义列举发挥作用、与之相关的人物”，那么，能够提出“尼采和瓦格纳、伟大的宣告者鲍尔·德·拉加德和预言家霍士顿·施特瓦尔特·张伯伦。”^①

希特勒对尼采非常崇拜。1933年前后，希特勒多次参观尼采档案馆，表达对尼采的敬仰。他在这位哲学家大理石半身像前照像，捐赠巨额资金修复魏玛尼采档案馆。在一次参观时，他得到了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赠送的一个尼采使用过的骑士手杖。同希特勒一起参观的还有纳粹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罗森贝格、戈培尔、鲁特斯、弗立克等人。大批外国法西斯主义领导人也前往参观。以大区长索克尔为首的图林根的纳粹党的社会名流，频繁出入于档案馆之门。1934年在尼采档案馆举行了法西斯主义法学哲学家会议。与会者除罗森贝格和弗立克之外，还有海德格尔、罗特哈克、弗莱耶尔和宾德教授等人。^② 1943年墨索里尼60寿辰时，希特勒赠送他一套装璜精美的《尼采全集》(24卷)，并题词留念。^③

纳粹思想家们宣称，尼采的思想在法西斯德国得到了实现。1935年瓦尔特·施佩特曼明确指出：“尼采的遗产播下了种子……德意志民族的塑造符合尼采的目标……一个民族应该对自己说：我要凌驾于各民族之上。我们的国务活动家们通晓战争、恫吓、

① 汉斯·拉克雷德：《第三帝国时期同尼采的论战。论尼采的作用》(Hans Lar-greder,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Nietzsche im Dritten Reich·Ein Beitrag zur Wirkungsgeschichte Nietzsches, Phil. Diss), 基尔1970年版, 第62页。

② 海因茨·马洛尼：《弗里德里希·尼采与德国法西斯主义》，第295页。

③ 培·约·拉希施米尔：《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第78页。

巨大的痛苦、紧张与纪律。他们完全清楚，德国人民的政治使命，并不受表面国界的限制。”^①

所谓尼采的非纳粹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联邦德国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忽视或否认纳粹主义同尼采思想的关系。1986年联邦德国史学家戈奥尔格·奔索在发表的《论尼采非纳粹化问题》一文中指出：“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尼采与民族社会主义的关系重新研究……那么，则关系到在何种程度上澄清尼采的‘非纳粹化’问题。”^②这种观点在西方颇具代表性。自6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明显地加强了对尼采思想的研究，出版了《尼采全集新校勘本》^③、《尼采研究·尼采研究国际年鉴》^④和许多有关尼采或注释尼采思想的书刊，出现了一股尼采复兴的迹象。概括起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否认尼采与纳粹主义关系的理由有三点：（1）尼采的妹妹对尼采的文章和书信进行了篡改；（2）尼采哲学中存在着与法西斯主义对立的東西；（3）强调以本体论来理解尼采的哲学。

关于第一点理由，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嫁给了一个纳粹党人，曾对尼采的一些文章和书信进行了篡改。自50年代以来，已由里夏特·罗斯、卡尔·施莱希塔和玛齐诺·蒙梯纳里等人考证查明。这为纳粹分子利用尼采哲学思想提供了便利。由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领导的魏玛尼采档案馆当时从法西斯主义需要出发，做了许多宣扬尼采思想的工作。它称墨索里

① 瓦尔特·施佩特曼：《尼采关于上等人的概念》，柏林1935年版，第300、135页。

② 戈奥尔格·奔索：“论尼采与非纳粹化问题”，第43页。

③ 古奥尔戈·曹里和玛齐诺·蒙梯纳里主编，西柏林和纽约1967年版。

④ 西柏林和纽约1972年版。

尼和希特勒是尼采梦想中的伟人。1933年7月29日，档案馆电贺尼采信徒——墨索里尼50寿辰：“谨致最崇高、衷心赞美的敬意，最热烈地祝愿以尼采精神、天才地复兴贵族价值者——尼采梦想中最伟大而又年轻的查拉图斯特拉斯”。^①1934年6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威尼斯会见时，该档案馆拍去一份贺电：“弗·尼采的幽灵，在欧洲两位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对话的上空徘徊”。^②总之，应该承认尼采的妹妹在篡改尼采的书信、文章和宣扬尼采思想中所起的作用。但是，这只是尼采思想被希特勒纳粹分子利用的原因之一，绝不是决定性因素，绝不能对其妹的作用夸张到无限大的地步。

关于第二点理由，尼采哲学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与纳粹主义对立的因素。尽管奔索所说尼采的思想是一把双刃宝剑，有利有弊，带着两付面孔，^③但是这些对立的因素并不危害纳粹主义与法西斯政体。二者之间的相近性，大于二者的相异性。纳粹分子在排斥了尼采哲学中与之不同的成份之后，能够更好地、广泛地利用尼采的思想，为纳粹主义和侵略战争进行辩护。

关于第三点理由，尼采的哲学充满着矛盾，包含宇宙哲学、政治哲学、生命哲学、存在主义、本体论等因素。这反映了尼采所处时代^④的矛盾性。这是当时帝国主义形成阶段，垄断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思想与道德观念矛盾的反映。人们不能只是片面地强调其中对己有利的因素^④，而忽视其他因素。不能像奔索所说，如果人们把尼采理解为思想家，“只能首先强调他哲学的本体论因素”，^⑤而忽视其中带明显时代和阶级烙印的政治哲学、

①② 魏玛尼采档案馆，第2号日记，日常记录，1922年9月21日至1935年底，第227、236页。查拉图斯特拉斯(Zarathustra)是古波斯之预言家及宗教家，公元前第六世纪人。

③⑤ 戈奥尔格·奔索：《论尼采与非纳粹化问题》，第114、116、118页。

④ 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抹杀尼采所处时代的阶级特征，仅从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出发，认为尼采所处的时代是大工业发展的时代。

宇宙哲学和预测哲学因素，抹杀尼采与纳粹主义的关系。尼采哲学中存在的各种因素，经常被人们各取所需，片面地引用。除去尼采作品华美的文风、扣人心弦的格言和诗一般的词句之外，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当前，西方学术界极力抹杀纳粹主义与尼采思想关系的背后，隐藏着两个密切相关的政治意图：

第一，试图把纳粹主义从其社会经济基础，从德国历史上一切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其中也包括同尼采的哲学分割开来，以便给纳粹主义加上“无历史根基的反常现象”和“脱离德国历史正常轨道”等说法为之开脱。

第二，西方新保守派已经抬头，试图为尼采恢复名誉，是为了能够毫无阻力地采用他的思想武器，对抗马克思主义。君特·罗尔莫瑟在《尼采与解放的终结》一书中明确地说出了这一真实意图：“由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行动而取消异化的一切企图明显地失败了，尼采便赢得了现实意义。”^①

在以往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中，一般人认为，尼采是法西斯主义的先驱。这种观点从本质上揭示了二者之间存在的思想上的一致性和渊源关系，指明了二者同为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本和权势集团内外政策辩护的实质。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应该肯定。但是，这种观点过份强调了二者的等同性，而忽略了二者的差异，也忽视了纳粹主义具有多方面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尼采说成是法西斯分子，尼采思想即为法西斯思想。原因是尼采不仅生活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产生的前一世纪，而且也不是尼采的思想造就了纳粹主义。准确地说，尼采的某些政治观点给予纳粹领导层以相当的影响；纳粹党又需要利用尼采的某些政治观点作为自己言行的依据，并进而扩大纳粹的影响。但是，历史的实

^① 君特·罗尔莫瑟，《尼采与解放的终结》，弗莱堡1971年版，第7页。

实践证明，反动的哲学思想与血腥的恐怖统治和滔天罪行之间毕竟存在着重要区别。

尼采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与纳粹主义对立的因素：

(1) 尼采不是一个本意上的种族主义分子。他并不反犹，还拒绝其妹向他散布的反犹思想。尼采的种族概念，并未受到当时流行的反犹太主义的影响，只是强调重现真正的德意志文化中的贵族特征。而希特勒宣扬的种族主义，既鼓吹日耳曼种族是主宰种族，又视犹太人和斯拉夫人为劣等种族。

(2) 除开始阶段外，尼采不是一个狭隘的普鲁士—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尼采否认民族性原则，称它是野蛮的未开化状态，反对当时盛行的民族主义。他出生在德国，而定居于瑞士，与国家脱离了关系，并着眼于整个欧洲。在他发疯之前，甚至怀有建立欧洲联邦和世界政府的思想。

(3) 与纳粹分子称第三帝国是俾斯麦帝国之继续的观点相反，尼采对其时代的统治阶级，对德意志帝国及其创建者俾斯麦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称俾斯麦帝国是一个无教养的国家，俾斯麦时代是一个愚化、调和的时代。他以尖刻的语言，批评俾斯麦推行的“大陆政策”过份狭窄。他指责统治者过份自由，过份宽容，过份民主，过少独裁。尼采的表面的“激进主义”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尼采敢于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敢于同旧的传统决裂，崇尚个性自由、解放，反对权威束缚。甚至某些进步的、真正反对反动旧传统的思想家，如德国的托马斯·曼和爱尔兰的萧伯纳等人^①，在没有把握住尼采哲学实质的情况下，有时也受到迷惑。尼采出于愈憎愈爱的情感，反对当时德意志的一切东西，同时又寄希望于德国。他明确地表示：“我根据我的一切本能，向德国宣战了！”^②“好的德意志就是对它实行非德意志化”。^③由此可见，尼

^① 参见斯·费·奥杜也夫著：《尼采学说的反动本质》，第27—28页。

^{②③} 戈奥尔格·奔索：《论尼采与非纳粹化问题》，第108页。

采对德意志人及其文化进行的激烈批判，是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思想、观念的批判，是“来自右面的攻击”，^①是从逆反意义上进行的批判。从实质来看，尼采同纳粹分子对当时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批判一样，是一种来自右的方面的批判，旨在维护和完善资本主义制度。

(4) 与法西斯主义提倡的民众的真实性在纳粹主义中处于显著的地位不同，尼采本人并不重视民众的真实性与存在。^②尼采谩骂民众是“奴隶”、“贱民”、“畜群”和“乌合之众”。与法西斯主义领导人多数出身于中下层的实际情况比较，尼采自称是波兰贵族的后裔，具有波兰贵族的特征与神态。^③尼采眼中的“超人”实属贵族阶层，“地球上新的主人”，实指出身于贵族阶层的新的主人。

尽管纳粹主义与尼采的思想之间存在的差异是非本质的东西，但是，实事求是地承认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将有利于全面而确切地评价尼采的思想，客观评价二者之间的关系。

总之，在如何评价纳粹主义与尼采关系的问题上，应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尼采的思想是纳粹主义的渊源之一，它对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同时，也应该避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简单化或教条主义的倾向。

① 齐世荣执笔：《西方的没落——德国法西斯哲学的先声》，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页。

② 戈奥尔格·奔索：《论尼采与非纳粹化问题》，第109页。

③ 乔治·勃兰克斯：《尼采》，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页。

第七章

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化

关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不论宏观的还是微观的，理论的还是实证的，到目前已有很大进展。同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二次大战前日本是否存在法西斯主义，日本是否成为与德、意相类似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对此一再发生肯定论与否定论之争，至今仍未结束。

争论的发生当然有种种原因。日本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强烈的历史连续性，使得人们不易分辨原有反动势力、体制同法西斯主义的区别，这是导致争论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有关的问题有三：民间传统右翼与法西斯主义能否区分和怎样加以区分；军部是否已经实现和怎样实现法西斯化；近代天皇制是否已经演变和怎样演变为法西斯主义体制。这些都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中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其中有长期被议论的老问题，需要和可以作出新的探讨，也有尚未真正加以探讨的新问题。本章将围绕这些问题，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发展和形成，从几个主要侧面进行历史的考察。

第一节 民间法西斯运动

1919年8月，日本出现了第一个民间法西斯主义团体“犹存社”，首先从民间拉开了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帷幕。日本民间法西斯运动不仅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重要部分，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和运动之一。它是怎样产生的？具有何种形态呢？

日本帝国的危机

1912年7月，身患重病的明治天皇离开了人世。他在去世以前经常念叨着：“我如果死了，世上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已经想死了。”^①他的“厌世之念”看来不仅是由于病痛，而是他已预感到帝国会面临越来越难应付的困扰。在他去世前后的1910—1914年，大逆事件、^②中国的辛亥革命和东京电车职工大罢工、^③第一次护宪运动^④和大正政变^⑤、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一连串的冲击接

①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页。

② 1910年(明治43年)5月，日本政府捏造所谓“阴谋暗杀天皇”的“大逆罪”，逮捕幸德秋水等数百名社会主义者。次年1月18日，判处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19日改判12人死刑、12人无期徒刑)，另2人徒刑。24日，幸德秋水等就义。这一事件被称为“大逆事件”或“幸德事件”。

③ 1911年(明治44年)东京电车公司由市府接管。其前身之一东京铁路公司为发放解散津贴发生争议。支援这次斗争的片山潜等与63名工人一起遭到逮捕。

④ 以反对藩阀为中心的官僚政治和确立政党政治为目标的政治运动。1912年(大正元年)12月，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因陆军强要增建两个师团而垮台。藩阀巨头内大臣兼侍从长桂太郎组成第三次内阁。政党成员、新闻记者、律师、交询社系统的资产阶级等倡议召开拥护宪政大会。这个以政友会和国民党为核心的运动迅即扩展各地。1913年2月10日，数万群众包围议会。群情激昂的民众袭击了政府系统的报社、警察署和派出所。

⑤ 1913年(大正2年)第一次拥护宪政运动推翻第三次桂内阁的政变。桂太郎组成继任内阁后，面对蓬勃高涨的拥护宪政运动，在1913年提出自己组织立宪同志会的方针，屡次迫使议会休会，并企图以解散议会相对抗。2月10日群众包围议会，桂内阁被迫总辞职。

踵而来，预示着日本帝国即将从向上发展转为走下坡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同德、意等国一样，陷入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全面危机。日本是一个后起的、保留着浓厚封建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一次大战期间才最终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垄断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端与封建残余的落后性交织在一起，加上财政经济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脆弱性，以及对国外市场、资源、财政、技术的严重依赖性，加剧了日本的全面危机的深刻性和尖锐性。

日本的全面危机包括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等各方面。在国内，最主要的是社会动荡不安的加剧。其原因首先在于社会矛盾的激化，集中地表现为贫富悬殊和对立的急剧扩大。在这方面，突出的现象是从20世纪初开始逐步形成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一批财阀。它们的家族封闭性和排他性，使得少数几个家族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情景变得极为触目。还在一次大战之前，史论家山路爱山就在《现代金权史》中写道：“世间不知何时又回复到旧时景象！过去，人们看到封建社会那种诸侯们领着持枪的侍卫挤满大道而横行阔步的情景便觉得可笑，可是如今在他们的眼中，又映现出以黄金为城郭的新诸侯。现在，金钱的多少几乎是分别社会地位高低的唯一标准”。“财主的女婿在政界趾高气扬，财主的掌柜在政界威风十足，说现今世界不是财主的天下，谁能相信。”^①一次大战之后，“黄金大名”^②的权势越发变本加厉了。

日本财阀是通过一次大战期间的战时景气而真正确立了他们的支配地位的。以三井为例，1919年三井合名公司的资本从6千

^① 紫垣和夫：《三井和三菱》，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77—78页。

^② 日本古代平安末期耕种大片名田（以本名登记的私有土地）者为大名主。镰仓时代指有势力的武士，称守护大名。战国时代推翻守护而崛起的新兴豪族称战国大名。单称大名指江户时代（1603—1867）的大名，即领有年贡1万石以上领地，有义务直接对将军效劳的藩主。明治维新后，大名权力被剥夺，几乎都成为华族（皇族以外的贵族）。黄金大名借指财阀而言。

万日元跃增为2亿日元。20年代没有正式增资，实际拥有的资本约达3亿日元。^①据日本经济学家高桥龟吉统计，一次大战前，三井支配的直系、旁系公司不过12个，名义资本1.6亿余日元。20年代，三井形成并扩大了金字塔形的支配系统。到30年代初，受其支配的直系、旁系、子公司、孙子公司共达97个，名义资本12.3亿日元。在不足20年的时间里，受其支配的公司和资本各增加了8倍和7倍。^②在1928年，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支配的资本占全国公司总资本的43.9%。^③国计民生完全操纵在极少数财阀手中，国家政治当然也唯财阀之马首是瞻。这种状况必然要加剧对中下层的压榨和排挤。

同社会不安加剧有关的另一情况，是频繁发生经济动荡和危机。一次大战给日本经济带来的“黄金时期”，随着战争的结束而一去不复返。战时的连年出超到1919年上半年变为入超2亿多日元。这时，日本财界仍对前景充满信心，他们心想：“过去4年不是积蓄了28亿元财力吗？有这个财力什么都能做到。依靠外国的那种景气消失了，但是凭借过去积蓄的日本财力而形成的景气还是能够相当充分地予以维持的。”^④然而，实际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要糟得多。1921—1929年，日本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其增长之缓慢为日本近代历史上所未见，低于同期的法、德、美，仅高于老朽的英国。^⑤日本半封建的农业陷于慢性危机。日本经济的脆弱体质几乎依然如故，每年都有近2亿到7亿日元之间的入

^① 《昭和恐慌》(法西斯时期的国家与社会1)，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版，第4、6页。

^② 转引自玉城肇：《日本财阀史》，社会思想社1976年版，第85页。

^③ 大桥隆宪：《日本的阶级构成》，岩波书店1972年版，第54页。

^④ 见当时日本银行总裁井上准之助的《战后的我国经济及金融》转引自今村武雄：《高桥是清》，时事通信社1958年版，第97页。

^⑤ 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3)，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页。1921—1929年，法、德、美、日、英的年平均工业生产增长率，分别为9.4%、7.1%、4.3%、3%、1.7%。

超。1923年后日本重又成为债务国。20—30年代，日本经济的不稳定性特别引人注目。战后危机、震灾危机^①、金融危机^②、经济大危机，每隔二、三年就袭扰一次。1930年的大危机使日本经济坠入深渊，社会再也不能保持战前那种稳定性了。

社会不安加剧的一个表现，是工农的贫困化和以米骚动为开端的工农斗争的新发展。“以暴控富”的米骚动是对大战后期急剧扩大的贫富悬殊的不满和反抗。吉野作造指出，民众掀起米骚动是由于“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彼等对其所处劣等地位之认识”。^③在20年代，受剥削的下层劳动群众成为经济滞缓和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官方调查承认，绝大多数工人、佃农甚至不能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水平。经常有100万失业半失业的大军，^④在农村拥挤着更大数量的变相失业人口。这种社会现实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工农斗争的新发展提供了土壤。如果说早期工农运动曾在“大逆事件”后处于“严冬时期”，那么米骚动之后，有一定广度的有组织的工农运动已经不可遏制地持续开展起来。

社会不安的另一表现是中间阶层的处境大为恶化。一般地说，中间阶层的地位总是不稳定的，经常发生分化。但是，他们的处境从来没有像一次大战之后那样难以忍受。就自耕农来看，据农林省的抽样调查，1921年平均收支尚盈余124日元，但有1/3

① 1923年(大正12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以东京、横滨为中心的地区最为严重。东京市内的银行受害最大，138家银行总行烧毁131家，310家支行烧毁222家，引起金融混乱，波及生产和商品交易，造成财政危机。

② 1927年春，震灾票据的清理将要到期，金融界对能否支付惶惶不安。3月14日若槻内阁藏相片冈直温在第52届议会上谈及“整顿震区票据”，不慎说出“渡边银行或将停止付款”。以此为导火线，东京、横滨一带发生银行挤兑现象。3月挤兑扩大到全国，开始出现金融危机。第十五银行等许多第一流的银行和公司陆续倒闭。若槻内阁为此总辞职。

③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第122页。

④ 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181页；梶而光速等，《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87页；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65—167页。

的自耕农入不敷出；到了1926年，平均收入变为亏欠7日元余。不少自耕农入不敷出的情况已十分严重。①1922—1929年，自耕农每户平均负债从258日元增加到901日元，增加将近3倍。②这些数字说明，相当一部分自耕农是十分困难的。即使是中小地主，不少人的境况也并不怎么好。当年米价下跌，凡是五町以下土地的地主，仅仅依靠佃租收入难以维持生活。中小工商业者在1920—1925年从64万多户增加到110余万户。③这是因为垄断资本在流通、生产的某些方面利用中小工商业者比他们亲自经营更有利。大企业把部分生产交给中小企业的承包制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然而由于经济滞缓，危机频繁，中小工商业者并不能获得多大好处。1925年，在102万余户中小商人中，月平均收入80日元左右的占80%。④这部分人只能勉强维持生活，稍有不测灾祸就难以自保。

新中间阶层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壮大的。资本主义曾为他们提供了安身立命之地。但在一次大战之后，由于经济状况不佳，他们许多人都今不如昔了。在靠薪水为生的新中间阶层中，据1926年调查，80%的家庭入不敷出，月收入从不满60日元到不满140日元。⑤

这时候，中间阶层还遇到一个从未有过的新问题。他们之中经常有数以万计、十万计的人沦入失业半失业的大军。据1925年的统计，工人的失业率为2.92%，领薪水者失业率为3.18%。同年，大专毕业生就业率为66.6%，以后几年均低于此数。1929年9月，新中间阶层的失业者估计近6万人。⑥在这种情况下，一

① 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3)第181页，辑而光速等：《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87页；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65—167页。

② 辑而光速等《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93页。

③ 大桥隆宪《日本的阶级构成》，第26—27页。

④ 大桥隆宪《日本的阶级构成》第60页。

⑤ 《日本法西斯主义I——形成期的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9年版，第277页。

⑥ 同上，第282—248页。

一旦失业、破产或刚走出校门，就有可能成为无业游民。平时都会遭到失业的威胁，成为被社会遗弃的人。这给广大中间阶层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恐惧感。当年就有人写道，新中间阶层被迫去钻“就职难、竞争、失业”这三座“地狱之门”，这是“工薪生活者的恐怖时代”。^①由于毕业就可能失业，1929年还放映了以《大学虽然毕了业》为片名的电影，“毫不掩饰地描写出知识分子阶层从历来的特权地位趋于没落的动摇与不安”。^②“大学虽然毕了业”这句话也就成了当时的流行语。新中间阶层竟然如此，其余中间阶层以及下层的恐慌与烦闷是可以想象的。比如当年还有另一流行语“流浪者”（日文外来语，意为“衣衫褴褛的人”，原词为德语“Lumpen proletariat”（流氓无产阶级）到处流行着《漂泊之歌》、《流浪之旅》之类的歌曲。^③

在一次大战结束以后，日本与德、意不同，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政治动荡和革命危机。即使席卷全国的“米骚动”，主要还是自发的经济斗争。以后有组织的工农运动也不足以构成对统治体制的直接威胁。但是，由于贫富悬殊的扩大、经济滞缓和频繁的危机以及中下层处境恶化所导致的社会不安、社会危机却是深刻的。这种不安、危机，反映在人们的心理上、意识上会显得更为强烈。因为日本在传统上十分重视“群体观念”，强调“协同一致”，宣扬“一国一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传统观念从来没有受到一次大战以来那样严重的动摇和破坏，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强烈的危机意识。^④

① 《日本法西斯主义——形成期的研究》，早稻田学出版部1979年版，第280页。

② 安藤良雄等編集，《昭和経済史》上，日本经济新闻社1980年版，第72页。

③ 同上第71页；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第176页。

④ 参见石田雄，《“法西斯主义时期”日本的传统与“革新”》，日本《思想》杂志1976年1月号。

中下层如此，上层统治集团也一样。1918年12月，日本军部和保守势力的总后台山县有朋，在私邸邀集一些人讨论“民本主义”、“社会问题”和“国民思想倾向”，要求对这些问题“找出具体可行的方法”。^①在“大逆事件”之后，甚至连“社会”二字都忌讳，《昆虫社会》这本书都不许出版。统治集团这时不得不承认并研究如何对付“社会问题”。他们的口中还出现了“思想问题”这个新词语。仅从这个变化就可以看出统治集团内心的强烈危机意识。

与此同时，日本的国际处境也变得十分不利。近代日本的富强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推行大陆政策的进展。列宁指出：在日本，“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对极广大领土或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极便利地位的垄断权，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权。”^②曾为日本近代的侵略扩张提供方便这两种垄断权，在一次大战后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管用了。过去，这两种垄断权能够起作用，一是由于邻国落后和民族解放力量不够强大，二是由于日本利用了列强在远东的矛盾。一次大战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逐步壮大起来，也不能容忍列强随意欺凌和宰割了。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也出现了新的高涨。同时，美英从原来支持日本对付沙俄的帮手变成了同日本争夺远东的对手。日本在远东国际舞台上陷于空前孤立。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一次大战期间，日本对华侵略形成了以中国东北、南部的福建和中部的山东三路相呼应，进而独霸中国的咄咄逼人之势。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③真是恨不得顷刻之间把中国攫为它的囊中之物。一次大战之后，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和美英的压力，日本不得不接受以列强共管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体系，被迫把它的所谓

①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第160页，译文略有更动。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93页。

“特殊权益”地区限于中国东北。日本的侵略野心遭到极大的挫败。

“外交失败”、“殖民危机”与内部危机一起表明，以一次大战结束为转折点，日本帝国开始陷入了危机四伏、到处碰壁的困境。对此，日本各阶层、集团、政治力量作出了自己的反应与抉择。除了当权集团、包括军部当局的对策，还有大正民主运动^①重趋活跃，工农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中间阶层的特点

同德、意法西斯运动相类似，日本法西斯主义是一次大战后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产物，而且它的兴起和发展是以中间阶层为其社会基础。中间阶层具有两重性和动摇性。他们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然而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又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中起着或大或小、甚至举足轻重的作用。除了这种各国相同的情况外，日本的中间阶层还有自己的特点。

在日本的经济结构方面，一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与半封建的、落后的小规模农业经营并存，二是大企业的垄断化和中小企业的分散化同时发展与并存，这就决定了日本中间阶层的广泛存在。他们包括中小工商业者、中小地主、以自耕农为主的中农和神官、僧侣等旧中间阶层，以及职员、教师、自由职业者、学生和下级官吏等新中间阶层。从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在有职业的人口中，中间阶层人数在820万——900万左右。所占比重1920年

^① 1913年(大正2年)第一次拥护宪政运动为大正民主运动的出发点。运动主要目标是缩小元老、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特权阶层的权力，使议会、政党成为政治中心，实现普选和妇女参政权，扩大人民参政的范围。理论支柱有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和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主要的实践要求是政党领导普选运动、裁减军备和改革贵族院，没有超出天皇制、日本帝国宪法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高涨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也构成大正民主运动的一部分。随后各种运动内部发生分裂。1925年同时制定《普通选举法》和《治安维持法》，象征民主运动的结束。

为39%，1925年为35.6%，1930年为34.3%，1935年为33.8%。^①日本中间阶层除了自身广泛存在之外，在传统的父权家长制的日本社会中，中小工厂主、店主、地主和町村公所官吏以及神官、僧侣等还在各自所能支配的范围内，在厂店、村镇对下属的工人、店员、佃农等等发挥着家长式的权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具有影响力，在社会上、政治上拥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②

近代天皇制历来十分重视取得中间阶层的**支持**。还在一次大战前夕，板垣退助就写过《**保护中等阶级**》一文，他指出：“中等阶级为社会之脊梁骨，社会纲常唯有依靠中等阶级方能维持”，中等阶级的消灭“将危及国家之基础，此不可不谓现时我邦最大之忧患”。^③在一次大战后的全面危机之下，中间阶层的处境恶化及其动向自然成为更加引人注目的社会、政治问题。各种反动势力要争取中间阶层，中间阶层自身也要寻找出路。

日本中间阶层受日本具体的经济结构和历史传统的制约、影响，在其政治思想倾向上也有某些特点。

就他们同财阀的关系来看，日本财阀的经营长期以金融、流通领域为主，经营工业则以轻工业为主。到30年代中，这种状况才开始有所变化。这就使得日本中间阶层更加直接地受到财阀的支配和排挤。如三井最重要的直系企业三井物产，通过散布全国的“事业网”，把它的势力伸向各地城乡；通过提供原料、贷款，包揽其他企业产品的“一手贩卖权”。它从经销工农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机械、器具、肥料到贩卖生活用品以至鸡蛋、鸡饲料和耘田袜等等物品，想尽办法剥削城乡居民，到处同中小工商业者争

^① 据大桥隆宪，《日本的阶级构成》，第26—27页，但作了一些更动，把该书作为“被统治阶级”的“自营业户”和“下级公务员”并入中间阶层；该书统计单位“人”、“户”并用，现改为一户为2人来计算。

^② 参见李玉，《三十年代日本急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中间阶层》《世界历史》1987年第3期。

^③ 《日本法西斯主义I》第292页。

利。^①因而，日本中间阶层对财阀既有密切的依赖又有强烈的不满。

就中间阶层与下层的关系来看，两者都受上层的压迫；但是中间阶层的企业主、地主又是剥削者，战后发展起来的工农斗争有很大一部分是指向他们的。20年代的劳资纠纷大多发生在中等企业。1926年劳资纠纷495次，每次平均参加人数为136人。这是因为这类企业更需要把困难转嫁给工人，劳动条件更差。在农村，中小地主因米价下跌（20年代的米价一直低于1919年，一般要低20—25%），收入发生困难。小地主仅靠佃租米收入甚至不能维持生活，他们要求收回佃租地自耕或提高地租，因而相当部分租佃纠纷是针对他们的。1925年成立了中小地主的团体大日本地主协会，在它的《会报》创刊号中写道：“现今成为我国农村中心问题的租佃争议实在值得忧虑，不论是否面临争议，我们地主正濒临极严重的危急之秋”。^②由于这种处境，日本中间阶层、尤其是旧中间阶层，对财阀强烈不满的同时，又十分害怕工农运动、革命运动的发展。

日本中间阶层受到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熏陶，许多人都是虔诚的忠君爱国分子。日本中间阶层中，旧中间阶层占80%左右，这部分人极其闭塞散漫，他们在自己的一家一厂一村中，尽力保持父权家长制的一统小天地，个个都是“小天皇”。因此，尽管中间阶层中同情、参加革命运动，投身民主运动的大有人在，但是中间阶层，尤其是旧中间阶层的大多数，不仅对革命运动，就是对民主主义也格格不入。当然，政党政治的腐败，使得中间阶层对民主主义更加厌恶。

^① 玉城肇：《日本财阀史》，第120—121，125—126页；《日本的企业家（3）昭和篇》，有斐阁1978年版，第150页。

^② 栗原百寿：《1920、30年代的地主与农政》，日本《历史学研究》1980年第6月号第4页。

日本传统的以家族主义为基础而形成的集团观念、国家观念，使日本中间阶层具有更强烈的排外倾向和狂热的沙文主义情绪。日本的集团观念中，对内凝聚力同时并存着对外排他性。“这种‘外人’与‘我们’之别的观念甚而可以发展到极端，把同一社会中的‘非我’者不以人相待”，表现为极度的冷酷、轻蔑、有意识的敌意。^①在同一社会中尚且如此，对于别的国家、民族当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而言之，日本中间阶层既对现状不满，特别是对财阀怀有一股强烈而莫明的愤恨，又具有极其保守、反动的倾向。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日本最反动的势力为了在全面危机的局势下寻找新的对策。日本法西斯主义理所当然地得到上层统治集团的支持。同时，日本法西斯主义打出“革新”、“反财阀”的旗号，贩卖一整套极端反动的思想和主张，正是迎合并反映了中间阶层的思想情绪。日本民间法西斯主义同中间阶层的联系更为直接而密切。

从传统右翼到法西斯主义

日本民间法西斯运动的兴起，同明治以来的右翼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但传统右翼的性质与作用又同后来的法西斯主义截然不同。这需从明治以来右翼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从事的实际活动来加以判明。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在“除旧布新”，推进资本主义化的同时，逐步走上了近代军国主义道路，实行侵略近邻中国和朝鲜的大陆政策。继1874年出兵台湾，1875、1876年侵略朝鲜之后，1878年成立参谋本部。它最初进行的工作就是调查中国的军备和

^① 中根千枝：《日本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地志。1880年11月，山县有朋提出了《进邻邦兵备略表》，强调“论兵之多寡，急于论国之贫富”，^①把“富国强兵”改为“强兵富国”，标志着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确立。在准备和实行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民间别动队，即右翼团体应运而生。

最早的右翼团体和右翼运动，始于1881年(明治14年)建立的玄洋社。它的前身是为普及自由民权思想，由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箱崎六辅等在九州福冈建立的向阳义塾及向阳社。1881年2月，头山满乘整顿向阳社内部纠纷之机，更名玄洋社，首任社长平冈浩太郎。它的三条“宪则”是：“敬戴皇室、爱重本国、固守人民权利”。其主要宗旨是扩张国权，实行“大陆扩张”论。它的命名就是越过玄海滩(福冈的外海)，进入亚洲大陆之意。自1886年起，玄洋社同自由民权运动^②断绝关系，开始转变为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团体。它标榜大亚细亚主义并积极付之于行动。它的创始人之一头山满，成为日本右翼势力最崇拜的领袖人物。

玄洋社后来衍生出别的右翼团体，其中最重要的嫡系骨干组织是：黑龙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竞相在中国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日本和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关系极为紧张。1901年1月内田良平纠集一些不满于中日甲午战争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右翼分子，建立了黑龙

①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9页。

② 19世纪70、80年代日本全国展开的反对藩阀政府专权政治、要求成立国会、制定宪法等各项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运动。1874年(明治7年)1月，前参议板垣退助等提出《成立民选议院建议书》，并组成爱国公党，主张天赋人权论，是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开端。4月，板垣等在高知组成立志社。1875年，各组织代表汇集大阪，成立全国性的组织爱国社。1877年以后，运动扩展到全国。1880年，爱国社改称国会期成同盟，发动20余万人请愿签名。民权派相继组成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政府采取严厉镇压和分裂政策，政党之间对立随之加深。自由党地方组织的党员，联合农民，于1884年掀起群馬事件和秩父事件，展开武装反抗斗争。自由党首脑无力控制局势，于同年解散自由党。改进党内主张解散党的也纷纷退党。运动转入低潮。1890年《明治宪法》实施，政党逐渐转化为议会政党。自由民权运动结束。

会。内田良平是头山满的弟子，是玄洋社社长平冈浩太郎的侄子，其父内田良五郎也是玄洋社的元老。头山满任该会顾问。黑龙会以中国的黑龙江命名。这是为了表示，日本已经渡过了“玄洋”即玄海滩，控制了朝鲜，今后应该把俄国势力赶到“黑龙”即黑龙江的对岸去。

黑龙会提出了集当时右翼思想之大成的该会宗旨和五条纲领。其宗旨是：“尊奉天皇主义，基于建国守正之遗训，恢弘兼六合掩八纒之皇猷，以发扬国体之精华”。纲领中的头一条就是使日本“充当亚细亚民族兴隆的领导者。”^①这个宗旨和纲领露骨地鼓吹天皇主义、国粹主义、军国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和称霸全世界。黑龙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有实力的右翼团体。

米骚动和一次大战之后，为了对抗工农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右翼的视线从国外问题转向国内问题，冒出了一批右翼团体。诸如大正赤心团(1918年)、大日本国粹会(1919年)、关东国粹会(1919年)、纵横俱乐部(1919年)、大和民劳会(1921年)和大日本正义团(1925年)等。

从玄洋社、黑龙会到战后初年的暴力团体，都属于旧的右翼团体，亦可称之为传统右翼，以区别于法西斯运动。它们大体有以下特征：

首先，玄洋社、黑龙会这两个主要右翼组织在一次大战前的活动，几乎完全从属于日本天皇制军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需要。它们配合政府、军部的对外侵略计划和军事行动、组织、派遣成员收集情报、制造事端、扰乱敌军的后方和军事行动，干涉邻国的内政，如玄洋社为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制造借口而组织的“天佑侠”，黑龙会在日俄战争前和战时的谍报活动、对俄军战线及后方的扰乱破坏，以及大批大陆浪人在中国的种种阴谋活动，都是众所

^① 大野达三：《“昭和维新”与右翼恐怖》，新日本出版社1983年版，第45—46页。

周知的事实。玄洋社、黑龙会还大力宣扬大亚细亚主义，对俄强硬论，为对外侵略制造舆论。

其次，玄洋社、黑龙会和各种暴力团体都是现存体制的维护者。玄洋社早已同自由民权运动绝缘，它在一次大战前也未提出社会改革要求。黑龙会曾在它的纲领中标榜反对“偏重法治主义形式，束缚人民自由”的藩阀、官僚统治的弊病，实际上它是藩阀政府的支持者。当年的组阁和重大问题的处置都征得头山满的赞同与支持。黑龙会的纲领还提出，“改革内政，增进人民福利，确立社会政策，解决劳工问题”，在右翼团体中最早注意到社会问题。但是，它在这方面有所行动是在一次大战之后，如开办劳工宿舍和自由食堂，这些举动并未超出维护旧体制的劳资协调的范围。至于各种暴力团体，它们从资本家和政党领袖那里领取活动经费，除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反工农运动，充当反动的政治打手之外，几乎没有明确的纲领。

再次，在意识形态方面，除了宣扬军国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原封不动地播弄封建思想、国粹主义。玄洋社、黑龙会、和各暴力团体都以尊奉天皇主义、皇室中心主义，维护国体、忠君爱国作为根本准则。黑龙会在它的纲领中提出，“根本改革模仿欧美的现代教育，建立以国体为渊源的国民教育的基础理论”，用国粹主义来抵制欧美近代思想的传播。在暴力团体的纲领中，甚至强调“以豪爽而立，以仁侠为本”（关东国粹会），“恪守信义”、“尊神崇祖”（大日本国粹会）、“以忠君爱国、孝行信义为专念”，“勿忘慈悲仁侠之道”，“盟主如父，团员如子，团员兄弟乃一家兄弟”（大日本正义团）^①之类的封建帮会思想。人们把它们也称之为“仁侠右翼。”

此外，玄洋社、黑龙会的骨干和成员中，一些人是不平士族

^① 木下半治：《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上，福村出版社1971年版，第7、15—29页。

或出身于士族家庭。它们所依靠的是为数不多的“忧国志士”，并未去建立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其余暴力团体的骨干和成员，大都是职业政治打手(所谓“侠客”、“壮士”)、赌徒、结成封建帮派的土木建筑业者、搬运工人以及无业游民。

上述特征表明，旧的右翼团体完全是一批军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反动团体。到30年代经济大危机和军部法西斯势力崛起、激进法西斯运动活跃的时候，它们才汇合于法西斯主义的潮流之中。

那么，传统右翼团体和一次大战后兴起的法西斯主义新的右翼团体、即民间法西斯运动有何关系呢？新右翼在思想上、政治上继承和发挥了明治以来的天皇中心主义、国粹主义、军国主义、大亚细亚主义等思潮和主张，同旧右翼有共同之处；绝大多数民间法西斯运动的头目、骨干原来同旧右翼有共同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有的则是旧右翼团体的成员。北一辉曾是黑龙会的大陆浪人。满川龟太郎原为大日本国防议会的成员。但是，法西斯主义的新右翼团体同旧右翼团体有着重大区别，民间法西斯运动也并非从旧右翼运动、团体直接演变而来。应该说它是在日本陷入全面危机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在米骚动的风暴刚刚过去还不到一个月，由满川龟太郎发起，与大川周明等人在1918年10月9日成立了老壮会。参加者不仅有年长者，也有青壮年，包括从右翼到左翼不同思想体系的人。其中有后来日共创始人之一堺利彦^①等少数社会主义者，也有后来

^① 堺利彦(1870—1933)，1903年与幸德秋水共同创办《平民新闻》，反对日俄战争，主张非战论。1906年领导创建日本社会党。1908年因赤旗事件入狱，服刑两年。1915年(大正4年)创办月刊《新社会》。1918年参加老壮会。1920年组织社会主义同盟。1922年参与创建日本共产党。翌年因第一次共产党事件株连被捕。1926年再次入狱。出狱后主张解散党组织，转向社会民主主义。1927年(昭和2年)任日本大众党中央委员，1929年当选为东京市议员。1931年反对九·一八事变，任全国劳农大众党反战委员会委员长，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

成为日本民间法西斯运动主要领导成员的右翼人士，诸如北一辉、大川周明、权藤成卿、满川龟太郎、岩田富美夫等。

老壮会的宗旨是从事时事问题的研究，对时局的发展交换意见。每月集会一次，举行讨论、讲演会等。所研究和关心的问题相当广泛，如“应怎样对待目前风靡世界的、对我皇室中心主义及媾和有着重大关系的所谓民主主义大趋势？”；“我国政治组织改革的根本方针是什么？”；“随着德国战败而来的英美势力增大问题”；“选举制度问题(普选是否可行?)”以及劳工问题、社会主义问题等等。^①

满川龟太郎在首次集会上的致词，对于内外新形势之下的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如今我国内外全面陷于困境，正遇上稍有不慎即将导致国家灭亡的非常重大时刻。国际上，德国的败局越来越明显，英美在东洋的势力将更加增大，中国问题、西伯利亚问题将成为最大难题。在思想上，民主倾向成为世界上的汹涌潮流，会如何冲击我国，将如何对待之，这可以说是三千年以来从未遇到的大事情。社会上，贫富悬殊越来越厉害，阶级斗争的大浪潮正在滚滚而来，因此，对于贵族选举权、富豪、工人、食物、土地这些问题，不能不求得根本的解决”。^② 满川这一席话实际上反映了与会者的一般心情。

当时，面对内外种种问题的困扰，如何寻找对策和出路，如何设法适应新的局势，如何确定日本国家改造的路线，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由于参加者思想上的纷杂，老壮会没能取得什么一致的路线和方针。然而，可以看到，不论左翼或右翼，都已感到“国家改造”已经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紧迫课题摆在他们面前。在右翼阵营中，一个完备的法西斯主义的纲领已在呼之欲出了。

^① (日)《现代史资料4·国家主义运动(一)》，水濑书房1963年，第23页。

^② 伊藤隆，《大正期‘革新’派的形成》，稿书房1978年版，第114—115页。

老社会对此是有所促进的。在老社会中，右翼占主流，以后日本民间法西斯运动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几乎都来自老社会的右翼。因此，老社会可说是日本民间法西斯主义团体的“母体”。它自身延续到1921年即自行消失。

在老社会成立之后，由满川龟太郎提议，满川和大川周明等人于1919年8月1日在东京成立了犹存社。大川周明受满川龟太郎之托，专程到上海请北一辉回国。北一辉正在闭门赶写《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他于1920年1月回到日本，并加入犹存社，与大川、满川一道成为该社的台柱。犹存社的纲领是：“一、建设革命的日本”；二、充实日本国民的思想；三、合理地组织日本国家；四、开展民族解放运动；五、执行道义的对外政策；六、联络改造运动；七、锻炼战斗同志的精神”。^①

犹存社在其纲领和宣言中，罗列一些“解放人类”、“解放亚洲”、“解放日本”、“世界革命”和“创造性革命”等等词句，实质上是为了对抗当时风靡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潮流与和平、民主主义的潮流。它主张通过完成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来建立一个称霸亚洲的大日本帝国。^②

犹存社的名称取自中国晋代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虽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表示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和平、民主浪潮的冲击之下，“日本民族之魂”将仍然屹立。在它发行的《犹存社小册》的序文中，更是毫不掩饰地说出了它的真实意图：“我们握着双刃之剑。这把剑，对于弥漫亚洲的不义行为将严惩不贷，同时对待损害日本的邪恶势力更有如秋霜烈日”。^③ 它以北一辉的

① 《现代史资料》第24页。据说犹存社的纲领有两种，大同小异，请参见(日)田中想五郎：《日本法西斯主义史》，河出书房新社，1960年，第35页。

② (日)《东亚中的日本历史》10，万峰：《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亡》，大兴出版株式会社1989年版，第58页。

③ 《二二六事件秘录》小学馆1971年版，第76页。

《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为其核心经典，秘密印发，致力于法西斯的“国家改造”思想的普及工作。自1920年开始，它创办并发行了机关刊物《雄叫》(呐喊之意)，广泛地征召社员。可以说，犹存社是以“解放亚洲”、“改造日本”为己任，在日本第一个提出完整的政治纲领的民间法西斯主义团体。

在犹存社的鼓动下，北一辉的思想在一部分军人和学生中得到热烈共鸣。东京帝国大学的“日之会”、北海道帝国大学的“烽之会”、早稻田大学的“潮之会”、拓殖大学的“魂之会”，以及第五高等学校的“东光会”，佐贺高等学校的“太阳会”、京都帝国大学“犹兴学会”等法西斯主义团体纷纷出笼。

后来，由于大川周明与北一辉发生某些意见分歧，大川另立组织，在1923年2月退出犹存社。3月，又有社员鹿子木员信出国。至此，犹存社宣告解散。

在犹存社成立之后，还出现了其他法西斯团体、派别。后来犹存社发生分化。这样，民间法西斯运动就有属于不同派别的各种团体和势力。如果按不同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来划分，民间法西斯的主要派别有四个，其中最为激进的是以北一辉为代表的《改造法案》派。

北一辉的法西斯纲领

北一辉(1883—1937)，原名北辉次郎，从小就受到“忠孝一致”、“忠君爱国”的教育。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国外的扩张，对于从少年至青年时代的北一辉人生观的形成，给予了重大的影响。二十岁时，他的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北一辉中学尚未毕业，于1904年到东京，曾阅读各种不同倾向学者的著作。他对《平民新闻》提倡的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抱有好感，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

1906年，北一辉自费出版近千页的《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一书。这部著作受到当时有影响的左翼评论家福田德三、^①河上肇^②和片山潜^③等人的较高评价；同时被《东京日日新闻》指责为“过激言论”，不久即被查禁。他的这段经历，同墨索里尼的信仰社会主义有着颇为相似之处。后来他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又通过内田良平同黑龙会发生关系。1910年夏，曾因“大逆事件”一度被捕。1911年秋，他受黑龙会的派遣，到中国“支援”宋教仁等人的革命活动，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政治投机生涯。

1916年6月，北一辉只身重来中国。1919年中国爆发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中国人民反对屈辱的“二十一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浪潮面前，北一辉产生了一种极端的恐惧感，

① 福田德三(1874—1900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商业专科学校(一桥大学)。1898年赴德国留学。1900年发表《日本经济史论》，取得博士学位。1906年任庆应义塾教授，后重返一桥大学。1918年(大正7年)同吉野作造等人组成黎明会，编辑《解放》杂志，成为民本主义运动的领袖。他在经济理论、经济史、社会政策、工人问题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很高评价。他主张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国家实行逐步改良的社会政策，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矛盾。著有六卷《福田德三经济学全集》。

② 河上肇(1879—1946年)，东京大学毕业。1905年(明治38年)以千山万水楼主人笔名在《读卖新闻》上连续发表《社会主义评论》。1908年任京都大学讲师，1913年(大正二年)赴欧留学，1915年任教授。1916年9月起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续发表《贫乏物语》(贫穷的故事)，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贫穷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逐步从人道主义走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19年创办《社会问题研究》，翻译马克思著作，大量著述，开始参加无产阶级运动。1928年(昭和3年)被迫离开京都大学。1929年与大山郁夫等组成新劳农党，负责编辑机关报《劳动农民新闻》。1930年10月解散该党。1932年加入日本共产党，曾翻译《三二年纲领》。翌年被捕，判处五年徒刑。1937年出狱。1946年1月病逝。著作还有《第二贫乏物语》、《经济学大纲》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

③ 片山潜(1859—1933年)，1884(明治17年)赴美，就学于耶鲁大学。1896年回国。翌年在贫民救济社从事基督教社会事业，进行工人教育。参加创建“工会期成会”，担任机关刊物《劳动世界》主编，领导和组织铁路工会等许多工会。1901年与幸德秋水等建立社会民主党，立遭禁止。作为日本代表出席1904年8月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参加1906年成立的日本社会党，采取改良主义立场，与幸德秋水等人的直接行动论相对立。“大逆事件”后，领导东京“市电争议”等斗争。1914年(大正3年)赴美。在俄国革命影响下，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1921年去莫斯科，积极参加1922年召开的远东民族大会的筹备工作，对日本共产党的成立起了很大作用。后任共产国际常务委员，在莫斯科病逝。著有《日本工人运动》等。

感到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体制的“危机”，萌生了所谓“国家改造”的意念。他后来写道：当着日本天皇的照片蒙受了中国人的“口头污辱”而且被抛露在世界各国注视下的中国街头之时，他本人产生了一种“唯我一人能为救护”的思想。“决心抛弃参与十余年的中国革命生活，回到日本”。他认为，在这十几年里，日本已经加速地腐败与堕落，日本的世界政策以及对华政策等都已失败，需要回国“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① 经过“烦闷懊恼了一个月、执笔一个月”，北一辉于1919年8月写出《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出版时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在此期间，北一辉还热衷于诵读《法华经》，使他的法西斯主义生涯蒙罩上浓厚的宗教的神秘色彩。北一辉的思想发展和经历足以说明，日本的民间法西斯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既是渊源和脱壳于日本的传统右翼，也是日本国内外形势大变动之下的现代历史产物。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②（以下简称《法案》），以纲要加注的形式，简要而明确地阐述了北一辉的主张。

在《法案》的序言中，北一辉写道：“现在，大日本帝国面临内忧外患同时袭来的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国难”。如何摆脱这一“国难”呢？

第一、由天皇发动政变，依靠在乡军人实行“国家改造”。

在《法案》的第一卷，北一辉解释了“天皇的原义”，认为“天皇是国民的总代表，是国家的根本”。改造日本的途径，是“天皇与全日本国民一起共同确定国家改造的根基，为此，依靠天皇大权之发动，三年内停止实行宪法，解散两院，在全国颁布戒严令”。

实行政变之后，由顾问院代替枢密院。顾问院议员由天皇任

^①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第三次出版告读者》，《现代史资料5，国家主义运动2》，水蔦书房1964年版，第4—5页。

^② 见《现代史资料5》第3—39页。

命，不对内阁及议会负责。同时，由审议院取代贵族院，其议员“通过各种有功勋者之间的互选及敕选产生”，对众议院的议决事项有一次否决权。凡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拥有众议院议员的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由众议院和审议院组成“国家改造议会”。但是，“国家改造议会，不得讨论天皇宣布的国家改造的根本方针。”另外，组成国家改造内阁，其成员应“排除以前的军阀、吏阀、财阀、党阀，从全国广选伟器，充当此任。”各地方国家改造知事的选任方针同上。《法案》没有写明“国家改造内阁”的组成程序，看来显然是由天皇任命，并对天皇负责的。

从上述主张可以看到，北一辉主张的“国家改造”的主体首先是天皇。北一辉虽然把传统的观念“天皇的国民”改为“国民的天皇”（“天皇是国民总代表”），但是一切大权仍在天皇手中。他所说的“以国民为本队，而天皇则为号令者”，就是要国民绝对地听从天皇的旨意。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国民唯有对天皇陛下才抱有期待，这种期待是对神的信任。”

北一辉在《法案》中还写道：“天皇在施行戒严令时，以在乡军人团作为改造内阁的直属机构。在乡军人团，维持国家改造的秩序，负责调查各地超过私有财产限额者并征集其超额财产。在乡军人按平等普选而召开的在乡军人团会议，充当这种调查和征集的常设机关。”北一辉为什么这样器重于在乡军人呢？他在注释中作了说明：“在乡军人曾经服过兵役，不仅已经完成了最大的国民义务；而且服役中具备的爱国常识，使他们能够成为国民中最优秀的中坚力量。而且，他们大多数是农民和工人，因而也是国家的健全的劳动阶级。由于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丝不紊的严格组织，所以在坚决实行国家改造时，不会出现俄国和德国那样的骚乱，此真乃日本独有的天赐组织。”

北一辉之所以如此重视在乡军人，是同他既标榜“以国民为本队”，又重视军人的作用相关的。他在《支那革命外史》（1916）

中，就根据中国辛亥革命的经验，十分重视军人的政治作用。在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造成了不仅现役军人，即使是在乡军人也有着特殊的地位。在乡军人会有着自上而下直至工厂、町村的组织系统，20年代其成员就达200多万人，无疑是一个能够影响国内动向的实力组织，北一辉当然不会不知道，在乡军人会是由退役将领、军官领导，是受军部支配的。北一辉在《法案》中并不怎么看重现役军人，但不久就有了改变，力图通过西田税等一批现役青年军官实现他的国家改造纲领。末松太平在《我所见的昭和史》中写道，西田税一再对伙伴说：“北正对日本革命不再抱希望，由于诸君的出现而改变了看法。”^①

综上所述，尽管《法案》中不乏民主词句，实际上通过政变所要建立的政权，不外乎是以天皇为首的军事独裁政权。

第二，限制私有财产、土地和资本。

这种限制，其一，是规定“皇室财产交给国家”。《法案》指出，“天皇亲自示范，将皇室国有之土地、山林、股票等交给国家。皇室费年额三千万日元，由国库支出；但根据时势的需要，经议会的协赞得进行增额。”其二，规定了私有财产土地和资本的限度。日本国民一家所有财产的限度，为一百万日元。超过私有财产限额的部分，应无偿地缴纳给国家。违反这一规定者，“在戒严令施行当中，将以危害天皇罪及反对国家的叛乱罪，处之以死刑。”私人生产企业的限度，为资本一千万日元。超过限度的生产企业，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经营。日本国民一家拥有的私有土地限度，为时价十万日元。对上述“私人生产企业”和“私有土地”的超过限额部分，国家均以三分利公债为代价实行征收，但所付公债不超过私有财产的限额。违反这些规定的惩罚办法，与前者相同。

^① 转引自今西英造：《昭和陆军派阀抗争史》，传统与现代社1975年版，第92页。

《法案》规定，天皇交出的土地和国家征收来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后者需分年交付一定的偿金。关于工人，“工资以自由契约为原则”，一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节假日工资照付。“受雇于私人生产的工人，应按纯利的二分之一分红。”受雇于国家生产的工人每半年进行一次额外分配。内阁设立劳工省，劳资纠纷由劳工省按法律裁决，“私人生产者和工人必须一律服从”。此外，还规定了各种国民权利，如国民从小一律享受十年教育，孤儿和孤老残疾者由国家抚养等。

应当如何看待这些主张呢？北一辉关于限制私有财产之类的规定，由于限额过宽，并无什么实际意义。时价10万日元的土地，折合水田16町（1町约15市亩）或水旱田各10町步。^①由此可以想见，100万日元私有财产和1000万日元资本是很大的数额。如1919年住友合资会社的资本是1500万元，安田保善社的资本为1000万日元。按照北一辉的限额，大财阀、特大企业、巨大地主会受到损害，但一批小财阀、许多大企业、大地主并不会受到触动。

北一辉提出的社会经济要求，主要是迎合、反映了中间阶层的心情。《法案》一再强调，必须保留私有财产制度和剥削，指责“不尊重私有财产的社会主义，不管怎样长篇大论，都只是对原始共产时代的留恋”。《法案》认为，“个人自由活动和享乐必须依靠他的私有财产”，剥削也是天经地义之事，甚至认为“小地主和佃农的存在乃是神意”。对于为什么要规定最高限额，北一辉在注释中解释说：这是为了“除上流阶级外，不对中产以下的全体国民带来丝毫的触动”。既要反对、限制大资本、大财主，又要保留私有财产和剥削制度，可以让自己发财致富，这不正是中间阶层特

^① 按宫本盛太郎提供的数字推算，见他所著《北一辉研究》，有斐阁1975年版，第208页。

有的心态吗？

北一辉的主张带有很大的蛊惑性。他在“二·二六”事件后向宪兵队承认：他写《改造法案》的目的，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俄国革命，是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勃兴的时代，为了对抗这些左翼革命，必须进行右翼的国家主义的国家改造，”这就要对青年进行启蒙。“写它是当作启发青年思想的启蒙指导书，而不是提出实行的理论”。^①由此可见，北一辉的“限制”、“权利”云云，同墨索里尼的《国家法西斯党纲领》及纳粹的《二十五点纲领》的有关规定是一路货色。

北一辉以反对财阀、限制大资本相标榜，如果真的还有一点出于本意的话，那也是他自己不得志而一时发泄的怨恨。北一辉长期没有固定收入，刚回国的一段时间，有时以蘸蘸咸鱼度日，连房租也付不出。以后采用种种手段，包括敲诈威胁，从政界、财界获得大把金钱，变得阔绰起来。^②1932年“五·一五”事件^③后，他每年从三井拿到2万日元情报费，代价是事先提供有关恐怖暗杀的消息。他住着宽敞讲究的宅邸，有妻子3人，女仆3人和汽车司机一人。^④发动“二·二六”事件^⑤的青年军官，原来把三井的池田成彬列入了杀害名单。经北一辉提议划去了他的名字。北一辉的这些行事，同他的言论相对照，真是莫大的讽刺。

① 《二·二六事件秘录》(一)，第282页。

② 泷泽诚：《近代日本右派思想研究》，论创社1980年版，第321—338页。

③ 日本法西斯军人的武装政变事件。由法西斯青年海军军官纠集少数陆军士官候补生和农民敢死队，在大川周明等支持下，于1932年5月15日傍晚，杀死首相犬养毅，袭击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和变电所等处，企图制造混乱，促使成立军政府。暴乱很快平息。

④ 《现代史资料5》第733页，北一辉的“证词笔录”。

⑤ 日本法西斯军人的武装政变事件。1936年2月26日凌晨，在东京的20余名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1400余名士兵，袭击首相官邸等处，杀害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占领陆军省、警视厅等处。当天上午向陆相提出加强国防等7项希望。29日被包围的叛军束手归顺。主谋者被处死，北一辉、西田税也被判处死刑。

第三，日本有“对外开战之积极权力”。

《法案》提出，“国家在防卫自己之外，为了受横暴强力压迫的其他国家或民族，有开始战争的权利（作为当前的现实问题，比如为了印度独立以及保全中国，国家有开战的权力）。国家为了求得自身的发达，有对别的非法独占广大领土无视人类共存之天道者，开始战争的权力。（作为当前现实问题，国家为了取得澳洲或远东西伯利亚，有向这些地区的占有者开战的权力。）”

为了使这种论调更有煽动性，北一辉竟然炮制出日本是“国际无产者”的荒唐说法。

《法案》的注释写道：“英国是横跨全世界的大富豪，俄国是地球北半部的大地主。给日本的是散在的小岛屿，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的地位，难道它没有以正义的名义，为从英、俄的独占下夺取领土而开战的权力吗？在国内可以允许无产阶级的斗争，却偏偏把国际无产者的战争看成是侵略主义、军国主义，这是欧美社会主义在根本思想上的自相矛盾。”

北一辉在这里所披露的思想，可以不加任何注释地拿来同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中的扩张主义狂言相比拟。

北一辉“国家改造”的根本目的，是使日本“垂范于东西”，“高举亚细亚联盟之义旗，握定会来到的世界联邦之牛耳”。他后来并不讳言，一次大战期间和战争末年，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因发生内部崩溃，使三千年的光荣独立归于一空，有鉴于此，“日本在进行对外战争之前，首先应完成合理的国内改造”。^①

北一辉打出“国家改造”的旗号，对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民主主义，主张实行天皇为首的军事独裁统治；对外煽动扩张主义，重分世界，其法西斯主义性质是显而易见的。《改造法案》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最激进的纲领，它有浓厚的日本“土著”气味，又

^① 《现代史资料5》第740—741页。

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新鲜提法和时髦言词，其反动性、狂热性和欺骗性之强烈，是日本历史上少有的。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在青年军官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们从20年代初就在开展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运动^①，30年代制造了“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犹存社解散后，北一辉的门徒以他为中心，在民间恢复和建立了一批法西斯主义团体，如“大化会”、“大行社”、“白狼会”、“东海联盟”、“国民战线社”等。

其他民间法西斯派别

在北一辉为代表的《改造法案》派之外，第二个就是以大川周明为代表的所谓“纯日本主义”派。

1921年，宫内省的小尾晴敏与安冈正笃等人共同设立社会教育研究所，把地方上募集来的青年训练为“社会教育者”。大川周明从1922年春起在研究所讲授日本主义。犹存社解散后，大川周明成了该所事实上的主宰。不久，改名大学寮，成为狂热鼓吹所谓日本主义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的最早的学校。经常有军人出入大学寮。1925年初，宫内省因设图书寮要求交还占有的建筑物，大学寮被迫关闭。

在此之前，在1924年4月（一说为1925年2月），大川周明创立了“行地社”。它的名称，取自古人的“则天行地”一语。所谓则天，是要“明确地认识理想，坚定地掌握这一理想”；所谓行地，“是将这一理想实现于现实生活之中。”^②行地社由大川周明任总务委员长，满川龟太郎任主事，还网罗了其他一些著名的法西斯分子任各专门部长。

^① 参见孙仁宗：《日本青年将校的“国家改造”运动》，《世界历史》1986年第9期。

^②：（日）《现代史资料4·国家主义运动（一）》，水蔦书房，1963年版，第26页。

1925年4月，行地社创办《日本》月刊。至1932年4月，共发行85号。通过这个刊物，把“行地网”伸张到了日本各地。它以全国的所谓中坚人物、小学教员、学生等为主要对象。最为重视的则是同以陆军参谋本部为中心的中坚将校实力派建立联系。经过大川周明的活动，《日本》杂志联系的人最多一年达到3500名左右。

1925年8月，在大阪建立大阪行地社。接着在京都也建立了行地社。不久，在全国的主要城市都分别建起了行地社支部。在东京帝大、京都帝大和其他大学也出现了行地社系统的学生团体。通过大川与陆军的关系，“行地网”同时得以在各地的在乡军人及现役军人中有所推进。这样，自犹存社成立以来，民间法西斯主义运动呈现了空前的局面。行地社成为与犹存社齐名的最有影响的民间法西斯主义团体。1932年2月，随着“神武会”的建立，行地社宣告“发展式”地解散。

大川周明自称是“彻底的日本主义者”，追求“纯而又纯的日本理想”。^①大川有着浓厚的传统思想，对于如何“改造国家”并没有像北一辉那样提出一个明确的纲领。大川主张实行“新的三权分立”，这就是行地社纲领中的三句话：“实现精神生活的自由”“实现政治生活的平等”、“实现经济生活的友爱”。^②至于它们的内容和如何加以实施，是空泛含糊的。但是，大川和行地社的主张中所包含的法西斯主义性质却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以反财阀相标榜，鼓吹实行第二次“维新”。大川认为，明治维新面临“勤王”和“兴民”两大任务，但只是“确立了‘君’的神圣尊严的地位”，以后“‘民’却呻吟在黄金（指财阀）的压迫之下”，因此，“如果说第一次维新的口号是‘勤王讨幕’，那么第二次维新

① 《现代史资料5》第683、《现代史资料4》第297页。

② 《现代史资料5》第286、288页。

口号无疑应当是‘兴民讨阔’”。排除“黄金大名”的压迫^①。《日本》杂志的一篇文章提出，“国体绝对不可改易，私有财产则可相对变更”，并蛊惑性地写道：“尊重资产阶级，蔑视无产阶级，如此偏颇不公正之事，与皇国日本的国体不相容”，要求对私有财产加以限制，^② 实行统制经济。

其次，反对民主主义，要求建立绝对忠于天皇的专制极权统治。大川认为，来源于欧美的民主主义、个人主义与日本精神、国家主义“完全不相容”，日本的“国体精华”在于“君民一体”“忠孝合一”。“所谓忠孝，就是把君父看作自己生命的来源，更详细地说，孝即一家兄弟子女各自超脱小我，一律归从一家一门的生命来源，忠即国民人人去私，一律归从国家的生命来源”。^③ 这种论调的实质，是借助天皇权威以建立专制极权统治。

再次，鼓吹使日本成为称霸亚洲和世界的超级大国。大川认为，大国时代将要过去，代之而来的是超大国时代。只有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国家才能在将来的国际舞台上继续保持独立国家的地位。为了使日本成为超级大国，首先要把“满蒙”置于日本的政治支配之下。^④ 同时，“第二维新”也在于实现这一国际目标。大川强调说：“考虑到日本的国际地位，我相信必需刻不容缓地实行这样的维新。”^⑤

大川周明的法西斯思想虽然不像北一辉那样激进，但是“超级大国”论却是他的独创。他关于日本主义的不遗余力的说教，在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中有很大的代表性和影响。如果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极力把墨索里尼、希特勒吹捧、神化为国

① 荒川几男：《1930年代——昭和思想史》（现代日本思想史5），青木书店1971年版，第151页。

② 《现代史资料4》第298页。

③ 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0》，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90页。

④ 《现代史资料5》第691—692页。

⑤ 同上书，687页。

家、民族的救星，那么日本法西斯主义却没有必要去重新树立一个偶像，他们有一个现成的“现人神”天皇。依靠天皇的权威，实现“兴民讨阔”的二次维新，这对于中间阶层，特别是在其中占多数的闭塞、散慢的旧中间阶层，以及对不觉悟的下层，具有极大的蛊惑作用。

大川周明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时，就为参谋本部翻译德文资料。毕业后任职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后又获法学博士学位、兼任拓殖大学教授。1929年任东亚经济调查局理事长，月薪750日元，每年再给6个月薪水的赏金，并且掌管着调查局每年12万日元的经费。他同军部上、中层军官建立了密切联系，参与了1931年的“三月事件”、“十月事件”两次流产政变。后来又转而同青年军官一起，发动“五·一五”事件。

日本民间法西斯运动的第三个派别，是权藤成卿、桔孝三郎等人的农本自治主义。权藤成卿于1919年11月撰写了《皇民自治本义》（1926年增补后改名《自治民范》），1920年6月创设自治学会，开始提倡农本自治主义。他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乡里自治是国家的基础。他一再重申，“对于国家的统治，古来方针大体有二。其一，任生民自治，王者唯示仪范，善于感化之，别无他求。其二，王者裁决一切，总理万机。前者称自治主义，后者称官治主义。我国肇国之主旨，全据前一主义，东洋古代圣贤的理想亦全在于此。”^①他希望从新回到这种古代“理想”境界中去。他的农本自治主义反对都市、反对商工主义，实际上是反对垄断资本对农村的剥削，但同时又反对中央集权和国家主义，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受到一些右翼思想家的批评。

把权藤成卿的思想说成是法西斯主义当然不恰当。但是，后来桔孝三郎、长野朗等人把他的思想作了重大修正、发展，带有

^① 权藤成卿：《农村自救论》，学艺社1938年版，第27页。

了不同的色彩和性质。桔孝三郎力图把地方协同自治与中央集权、以农为本与商工主义折衷调和起来。他宣称：“日本必须以无比尊严的皇室为中心”，地方协同自治不排斥巩固的中央政府，主张“国民在它（中央政府）的指导、统率下，妥善地在协同体制中实行自治。”实行他们经济目标的手段则是统制经济。^①这种农本自治主义并不从根本上排斥国家主义。他们在政治实践上，主张“先搞大扫除”、“扫荡障碍物”，认为“惟有一批为救国济民的真理而誓死献身的志士，才能出色地率领国民奋起从事革新的伟大行动”，而首先“能在军人中发现这样的志士”。^②这就是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部独裁。后来桔孝三郎及其农民敢死队在“五·一五事件”中就是这样做的。

另外，他们还把农本自治主义同对外扩张结合起来。打着“各地居民均有自治权，不受他人支配”的幌子，宣称必须彻底改变领土主权观念，它“不外乎是国家利己主义的表现”。一个民族、一国国民，为了生存有权向周围地区发展，并在居住地实行自治，别国不得拿主权加以阻止^③。这同希特勒的“生存空间”论差不多。“五·一五”事件后，农本自治主义者发动的农村请愿运动就把资助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作为主要要求之一。

农本自治主义的理论是折衷的，理论与实践又有矛盾，这实际上是农村中间阶层的两重性及其矛盾心理的反映。农本自治主义强调自治，这似乎同法西斯主义相去甚远，然而经过修正、折衷和发展，已同当时的法西斯主义潮流呼应而汇合起来，成为带有日本特色的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部份。

① 桔孝三郎：《爱国革新本义》，《现代史资料5》第87—89页。关于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长野朗主张，“农业同时包含农产物的生产、加工和配给，以此同工业、商业相独立。于是，农工相互不剥削，工业成为纯粹的工业。”（《现代史资料23，国家主义运动3》，水蔦书房1974年版，第53页。

② 《现代史资料5》第83页。

③ 《现代史资料4》第311页。

橘孝三郎于1929年在茨城县建立爱乡会，开办爱乡塾。1932年3月爱乡会有支部28个，成员560余人。^①爱乡塾农民敢死队参加“五·一五”事件，使橘及其组织出了名。“五·一五”事件后，权藤成卿，长野朗等发动农村请愿运动，轰动一时。

日本民间法西斯运动的第四个派别是以高畠素之、赤松克麿为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派。其中一些人曾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1919年4月，高畠素之创办《国家社会主义》杂志。1921年5月，高畠建立“大众社”，这是第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团体。1932年5月，赤松克麿和下中弥三郎，在同一天分别建立日本国家社会党和新日本国民同盟，它们是30年代主要的国家社会主义组织。

国家社会主义者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机关的论断，认为“国家的本质在于维持社会的必要秩序，在于统制”，国家是“统制组织”^②。国家社会主义就是以高度发展、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通过国家权力的介入和统制，实现“分配的公平”。^③

在国家社会主义者看来，日本存在“君民一体”的国体，天皇是超级的。只要“彻底实现天皇政治”，就能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他们中的安部矶雄干脆把国家社会主义称为“一君万民型社会主义”^④。

国家社会主义不仅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也与民主主义不同。进入30年代后，这一派公然支持军部的国家法西斯化和对外侵略的政策。受这一派影响的主要是改良主义劳工团体，它们在30年

① 《现代史资料4》第110—111页。

② 桥川示三等编辑：《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I)，有斐阁1970年版，第274页；《现代史资料4》第334页。

③ 有马学：《高畠素之与国家社会主义派的动向》，日本《史学杂志》83编10月号，第23页。

④ 筒井清忠：《昭和期日本的构造》，有斐阁1984年版，第62页。

代演变为法西斯主义劳工团体。^①

日本法西斯主义团体的情况十分复杂。除了显然属于上述四派的团体、组织以外，有的团体接受不同派别的思想、主张，有的团体则由不同派别的人组成。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半法西斯主义团体，如经论学盟(1925年建立)、国本社(1923)、原理日本社(1925)、建国会(1926)、金鸡学院(1926)等等。法西斯主义团体在组织上的聚合分离更是异常纷繁。30年代初作过建立全国性统一组织的尝试。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931年6月底，由日本国民党、黑龙会、大日本青年党等19个团体联合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大日本生产党。但是，几次尝试均未成功。据日本司法省调查，到1933年底，法西斯主义、半法西斯主义团体共有501个，其中半数以上是1932—1933年出现的。^②

总之，从犹存社开始，日本民间兴起了种种法西斯主义思潮和五花八门的法西斯组织。他们同旧右翼团体的“浪人型”的对外侵略别动队和纯粹的“暴力团”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鼓吹对外扩张，使日本成为称霸亚洲和世界的“超级大国”，它们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但是，它们同时要求对现存体制进行“维新”、“革新”，提出了“国家改造”的政治、经济纲领，有很大的政治欺骗和社会蛊惑作用。

为了更好地适应日本的某些传统特点，迎合群众的旧思想，它们宣扬了传统思想，搬弄着陈旧的词句，但是它们的纲领、思想不是简单地重复国粹主义，而是把传统的和现代的反动思想揉在一起，是一种极端反动的思想体系。它们把自己事业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军部，而且没有放弃“志士”意识。它们开展了一定程度

^① 参见俞辛焞：《日本法西斯劳工团体初探》，《日本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② (日)内务省警保局编：《社会运动状况(昭和8年)》，三一书房1872年重印本，第698页。

的民众运动。1933年底,501个法西斯半法西斯团体共有成员28万余人。

这些团体成员的阶级构成难以统计,但其骨干多属中间阶层。如1930—1936年17次法西斯恐怖事件中,被起诉者共154人,其中有职业者89人,而中间阶层占有职业者的58.4%。^①由此可以推断,中间阶层是日本民间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如上所述,在日本存在着与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同一类型的组织和运动,只是因为日本的特殊情况,具有日本式的特点,未能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大党而已。

第二节 军队法西斯运动

在20年代,比民间法西斯运动的产生稍晚一些时候,日本军队中也兴起了法西斯主义运动。一批中下级军官订立盟约,制订纲领,提出“革新军制”、“改造国家”,结成横向的联系和组织,成为军部法西斯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巴登巴登密约为起点

1921年10月27日,任日本驻欧洲国家武官或出差欧洲的三位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少佐,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商讨日本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他们根据一次大战的经验和总体战思想,约定回国后将致力于“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这就是所谓“巴登巴登密约”,又叫做“三头密约”^②。第二天,东条英机亦从

^① 转引自李玉,《三十年代日本急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中间阶层》。

^② 高桥正卫,《昭和的军阀》,中央公论社1969年版,第54页。

柏林赶到，继续商讨，并加入密约。“巴登巴登密约”的结成，是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的起点。

永田等人回国后，邀集年龄相近、志同道合的陆军中央幕僚军官，于1923年建立了二叶会（双叶会，或称同人会），讨论如何改革陆军等问题。^①因为他们经常在东京一家法国式餐厅“双叶亭”聚会，以此得名。它的成员共20人，除前述4人外，还有河本大作、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山冈重厚、山下奉文等人。

在二叶会的影响下，参谋本部课员铃木贞一和土桥勇逸、石原莞尔、武藤章等更为年轻的军部中央佐、尉级军官，于1928年组织了“研究国策”的木曜会。^②在它的讨论会上，时常有二叶会的永田等人参加。这两个会在思想上、行动上很快合流。

1929年5月19日，正式统一二叶会、木曜会而建立一夕会，约40人。在成立会上作出三项决议：

1. 刷新陆军人事，强力推进诸项政策。2. 重点解决满蒙问题。3. 拥立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铁十郎）三将军，建设纯正的陆军。^③

以巴登巴登密约为起点，形成了以佐级军官为主的陆军中央幕僚军官的横向联合。他们是一批具有政治野心的军人，密切注视各种国策问题，以共同的主张为纽带而联合起来，不同于原先陆军中按同乡关系、个人亲疏而结成的派阀。他们的主张主要有三点：

一是反对派阀人事。明治以来就有“长阀陆军，萨阀海军”之说，即由原来长州藩和萨摩藩出身的人分别控制陆海军。陆军长州阀的霸道比海军萨摩阀厉害得多。有的人颇有才干或立有战功，

^① 永田铁山刊行会编，《秘录永田铁山》，芙蓉书房1972年版，第433—438页；

^② 筒井清忠，《陆军中坚幕僚的思想》，载日本《历史人物》1984年第2期。

^③ 高桥正卫，《昭和的军阀》，第60、68页。

只因为不是长州人而得不到晋升或重用。派阀人事造成了军内对立，形成反对长州阀的萨摩阀、佐贺阀、石川阀、大分阀、土佐阀，破坏了军队的统一。反对派阀人事，不仅出于一夕会成员的本人利益，更同重用人才、统一全军、确立总体战体制有关。

二是准备和确立总体战体制。永田铁山等人都是在军部中央出谋划策，担当实际工作的。他们都毕业于陆军大学，一些人还曾出国研究、学习，因此，他们敏锐地觉察到军事思想的转变，并成为准备总体战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以永田为例，他于1915年任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委员，1920年提出《关于国家总动员的意见》长篇报告。这是综合了该委员会数年调查研究成果而初步设想的总体战体制蓝图。1926年，永田任设置国家总动员机关准备委员会的干事，实际上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不久，他又担任陆军省整備局动员课首任课长。实行良民良兵主义所采取的新措施，即实行学校军训和设立青年训练所，就同他的推动分不开。^①

三是所谓“重点解决满洲问题”。对此，二叶会、木曜会早有讨论，一夕会成立时作了决定。铃木贞一后来谈了他们作出决定时的思路：“国策问题不解决，如何改革军队就不能决定；研究国策问题就发展到满蒙问题”。^②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通过讨论认识到，未来战争是消耗战、持久战，也即以全部国力相较量的总体战，主要对手是美、英、苏，最终是日美决战。因此，他们主张，日本当前的国策就是要准备这种总体战。

准备总体战和“国家改造”运动

经过一次大战，对未来战争有了新的看法，这对军部，对法西

^① 藤泽厚，《总体战体制研究》，第134—135页。

^② 《铃木贞一氏谈话速记记录》（上）（1971年），转引自近代日本研究会编，《昭和期的军部》，山川出版社1979年第41页。

斯军人，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次大战前，人们讲到战争，通常都把它仅仅或主要看作军队之间的较量。在日本，军队又特别注重精神主义，推崇所谓“肉弹战术”^①。一次大战中，由于战争物质手段的发展，欧美各参战国除了投入军队外，还展开了其他人力、物力等多方面的动员。根据这一经验，欧美各国军界普遍认识到，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更加残酷、持久的“总体战争”。

在德国，一次大战后形成了他们的总体战思想。其首倡者是希特勒的好友、陆军元帅鲁登道夫。后经纳粹军事界的论证、发挥，形成一套法西斯主义的军事理论。他们把总体战概括为“各阶层居民参加战争的总体性，包罗人民一切生活领域的总体性以及利用一切斗争手段的总体性”。^②同其他欧美国家现代军事理论相比，纳粹的这种军事理论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它同时要求在国家生活中绝对排斥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要求把一切都置于国家的极权统制之下。

在一次大战和德国总体战思想的影响下，日本的军事思想也发生了变化。1917年10月陆军元老山县有朋写道：今后为了在战争中获胜，“务需动员国民，国尽其力，依靠上下一心、举国一致的力量”。^③战时，日本陆军就设立了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调查研究欧洲各国战时总动员的经验教训。在军部的推动下，1918年颁布军需工业动员法，设立了内阁军需局。1926年，内阁成立了设置国家总动员机关准备委员会，陆军新设了掌管总动员的整备局。1927年又设立了内阁资源局。

① 如日俄战争时，为攻取旅顺要塞，乃木希典驱使大批士兵反复冲锋，以“肉弹战术”出名，并因功被授爵位。

② Г. А. 格列奇科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中译本，第608页注①。

③ 纘纘厚：《总体战体制研究》前揭书第9页。

这一时期,在日本逐步形成了与德国类似的总体战思想。日本在军事上总是以德国为师,较多地接受德国的影响不足为怪。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日本的国力同美英有着难以克服的差距;日本要以一国的力量同多国对抗,重分世界,不能不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这些情况同德国多少也有些相似。为了缩小差距,就只有借助总体战体制,把全部国力尽可能地动员、统制起来。总体战体制还意味着全面强化国内控制,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1927年12月,整備局的永田铁山作了《论国家总动员》的报告,明确地提出了必须把“各种有形无形的资源”(精神的与物质的,人力与物力)全部加以统制,建立总体战体制的思想。^①

日本法西斯军人在讨论总体战的问题时,有人提出未来战争将以工业为根本。石原莞尔回答说:“(日本)工业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同欧美竞争。只有尽力在满蒙建设工业。”^②也就是说,为了推进上述国策,必须首先占领“满蒙”,以此作为建立日本自足自给经济,增强国力,准备总体战的第一步。然后,进一步占领全中国。石原说:“如以全中国作为根据地,加以充分有效的利用,就能持续进行二十年、三十年战争”。^③“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也是为了借助战争的压力,加快国内准备总体战的进程。

准备和建立总体战体制,是这批幕僚军官全部主张的核心。有论著认为,日本军队内的法西斯运动是在民间法西斯的影响下兴起的,^④这一看法并不恰当。如果说民间法西斯运动是从国内外全面危机的困境出发,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反映了中间阶层的

① 额须厚:《总体战体制研究》第151页。

②、③ 筒井清忠:《昭和时期日本的构造》,第147—149页。

④ 秦郁彦:《军队法西斯主义运动史》第9页写道:“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主角是军部,但是它的意识形态属于自家生产的很少,多数场合都是由外部供给的。”“外部”是指民间。

情绪。那么永田铁山等幕僚军官是从重新瓜分世界的总体战出发，是由于军事思想的转变，而主张建立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体制的。他们只是为了建立总体战体制，才注意有关中下层处境的社会问题。又如日本民间法西斯运动带有强烈的空想、复古倾向，而法西斯幕僚军官虽然不乏骗人的言词，但是他们所考虑的是如何建立一个符合总体战需要的具体的、现实的体制。因此，与民间法西斯相比，法西斯幕僚军官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按不同的思路而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当然，这并不排斥双方的共同之处和一定的相互联系。

在民间法西斯运动影响下兴起的军内法西斯运动是有的，那是一批陆海军青年军官的“国家改造”运动。大约从1922年起，以西田税为中心的一批陆军青年军官和士官学校学生，特别热衷于传阅、讲读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经常讨论“国家改造”问题，有时则登门求教北一辉。1927年7月，西田税企图建立全国性的法西斯军人组织天剑党，但未成功。他们主要采取秘密聚会、相互串连、来往书信、散发印刷品等方式；进行宣传联络，发展队伍，扩大影响。他们中的骨干大概有40多人，同伙人数有的说“百名内外”，有的说曾达460多人，^①但从未有过统一组织和行动。

1928年3月，海军中尉藤井齐等纠集海军军官40余人，组成“王师会”。藤井齐等人特别倾心于农本自治主义，也受北一辉思想的影响。

1930年9月，以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为中心建立了樱会。其纲领规定为“本会以国家改造为终极目的，为此将不惜使用武力”。^②但并未提出改造国家的方案。它的成员限于陆军中佐以下军官参加。桥本曾在土耳其担任过武官，对凯末尔十分

^① 大谷敬二郎：《二二六事件之谜》，榊书房1967年版，第96—97页，《护国一日记》上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第574页。

^② 《现代史资料4》，第58页。

崇敬。一夕会的土桥勇逸、根本博等人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其成员约100人，有说150人。

法西斯青年军官和樱会后来都曾策划或发动法西斯军事政变，加速了国家法西斯化。但是，对于军部法西斯化来说，起着决定性推动作用的是一夕会的法西斯幕僚军官；对于国家法西斯化来说，也是如此。

一夕会的作用

过去对日本军部法西斯化的研究，有忽略军部上层、忽视一夕会作用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把一夕会和樱会混同的事例。”^①有的日本学者说：日本对“军部的研究非常落后”，“关于昭和十年代的军部几乎等于没有研究”。^②这种情况很自然会造成只注意中下级青年将校的作用，只强调樱会的作用。近年来日本史学界在这方面已有新的进展。实际上，一夕会运动，从1921年的“三头密约”到1931年底，其思想一直延续发展，成员组织亦相当稳固，活动时间在军内各法西斯组织中也是最早、最长的。它的纲领、目的和行动方式为后来的统制派所完全承袭。所以，对一夕会的研究，是明瞭20年代和30年代初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的主要方面，是弄清军部法西斯化的主要有关内容。因此，再回到一夕会问题上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一夕会能在军部法西斯化中起主要作用。其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一次大战后，日本政界、军界都正面临着领导层的新旧交替。一方面，由于自然淘汰，执掌军政大权的明治元勋们相继去世。1924年后，只留下西园寺公望一位元老。西园寺同军队关系不深，对军队缺乏制约、控制能力。另一方面，长州阀的专

①、② 筒井清忠，《陆军中坚幕僚的思想》。

横激起军内的抵制、反抗，而用人唯亲的同乡封闭式人事，必然导致本派人才的枯竭。因此，长州阀势力急剧衰落，几乎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在山县之后，田中义一是长州阀和陆军首脑，但田中已经难以物色到长州出身的得力接班人，不得不起用冈山人宇垣一成。宇垣对于维护长州阀并不感兴趣，形成了不再拘泥于同乡观念的宇垣派。宇垣任陆相期间，长州阀从衰落进而失势。

与此同时，在军队里有了一大批毕业于陆军大学的军官，人们称之为“天保钱派”。他们佩带的陆大徽章很像天保年间的一种钱币。从1882年创办陆军大学，到1931年，它先后培养了1700多军官。^①在20年代，这批不属于旧派阀的来自各地的陆大毕业的军官，正在成为陆军的实际支配力量，并且将要接替陆军的权力中枢。如永田铁山等人，已经进入了宇垣派的外围圈子。

其次，一夕会成员已处于实权派的地位。日本军队中论资排辈十分严格，这使一些平庸者进入军部上层。但是，按照日本的传统，课一级在决策中几乎又有决定性的作用，凡是课一级共同商议决定了的问题，上面是不能轻易反对的。因此，上层如果又是平庸之辈，往往要受课局级实权派的摆布。铃木贞一写道：“当今的上司凡事都得部下推着干”。他不无夸张地把陆军上层比作“留声机”，一刻也离不开幕僚军官这个“发条”^②。

一夕会成员大都是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如永田铁山，当年军官中就有“永田之前无永田，永田之后无永田”的说法。^③进入20年代后，一夕会不少成员先后担任了课长、高级课员的职务。有的日本史学家把包括二叶会、一夕会在内的产生发展概括为“一夕会运动”。严格说来，一夕会并没有形成真正

^① 《现代史资料23》第346页。

^② 《铃木贞一日记》，载日本《史学杂志》第87编第4号；《军务局长武藤章回忆录》，芙蓉书房1981年版，第59页。

^③ 秦郁彦，《军队法西斯主义运动史》，河出书房新社1962年版，第89页。

的政治运动，也没有像樱会等组织那样掀起喧赫的事件。他们奉行的是一条上层路线，以和平手段互相提携走上实权职位，以推行其内外政策。有资料表明，到“九·一八”事变前后，一夕会成员已经控制了军部中央各部门大权(见下表)：

“九·一八”事变时一夕会部分会员的分布^①：

陆军省

军事课： 课长 永田铁山 高级课员 村上启作
支那班长 铃木贞一 外交班长 土桥勇逸
课员 山下琢磨 铃木宗作

补任课 课长 冈村宁次 高级课员 七田一郎
课员 北野宪造

征集课 课长 松村正员

马政课 课长 饭田贞固

动员课 课长 沼田多稼藏

整備局局长 本乡义夫

参谋本部

动员课 课长 东条英机

庶务课 庶务班长 牟田口廉也

作战课 兵站班长 武藤章

欧美课 课长 渡久雄

支那课 支那班长 根本博

运输课 课长 草场辰巳

参谋本部部员 冈田资 清水规矩 石井正美 澄田昧四郎

教育总监部

第二课 课长 矶谷廉介

炮兵监部部员 冈部直三郎

^① 筒井清忠，《昭和时期日本的构造》，第169页。

教育总监部部员 田中新一

航空本部

第一课 课长 小笠原数夫

内阁资源局

企画第二课 课长 横山勇

关东军

高级参谋 板垣征四郎

作战主任参谋 石原莞尔

奉天特务机关长 土肥原贤二

这就是说，一夕会在“九一八”事变前已经打下了在军内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

再次，一夕会的主张反映了军内的一般趋向，受到大多数中、上层军官的支持。前述一夕会的三项主张无不如此。尤其是它的中心主张——准备总体战代表着战后军事思想的新变化，同20年代陆军的发展趋向相一致。在宇垣一成担任陆相期间，实现军备现代化和推进总体战的准备工作已经提上日程。一夕会的主张得到追随宇垣的大批军官的赞同。

一夕会的成立及其三项决议，表明永田等实权派决心加快建立总体战体制的步伐。为此，必须打破政党政治，确立军部的政治支配地位，这也就是说军部的全面政治化和法西斯化迟早必将被提上实践日程。

皇道派和统制派的对立

通过“九·一八”事变和“五·一五”事件，日本走上了战争和法西斯化道路。军部从此把国家拖入长达15年的侵略战争；以军部为主导，煽起遍及城乡的排外狂热；军部扼杀政党政治，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不仅革命力量，连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也遭到压

制，这些都是国家趋向法西斯化的迹象，并且表明了军部法西斯化的发展。按照一夕会的原来设想，通过挑起侵略战争可以加快国内建立总体战体制的进程。然而事出意外，“九·一八”事变后由荒木贞夫等皇道派把持的陆军中央没有接受他们的主张。在军部法西斯化的进程中发生了一点曲折。

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和林铁十郎是陆军中反对长州阀的将领，在少壮军官中颇得好感。1931年12月，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组阁时，永田铁山给政友会领导人小川平吉写信说：目前陆军内部的统率，尤其是对年轻军官的统率，非常棘手，陆相人选“如果是荒木中将、林中将这样的人，可以不负众望”。^①他的意见被犬养接受了。但是，荒木任陆相后并没有像一夕会原先希望的那样行动。同时一夕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小畑敏四郎等人同荒木站在一起。于是形成了以荒木、真崎为首的皇道派。他们宣扬“皇道精神”，提倡国体明征，天皇亲政，因而被称为皇道派。它包括少数将佐级军官，并受到法西斯青年军官的支持，后者通常称为皇道派青年军官。

皇道派上层大搞派阀人事，排斥异己，甚至动用宪兵来跟踪监视别的军官。他们认为，日本的军备和国力反正好不过美英苏，因而不太重视军备的现代化和总体战思想。他们所热衷的是皇道精神，喋喋不休地鼓吹精神主义。荒木贞夫讲话写文章，通篇尽是什么皇道、皇军、皇谟、皇威、皇猷之类冠以“皇”字的字眼。他甚至对人说：“国力不足，我们并不介意。何必要为物质之类的东西多费心机呢？”^②1934年1月，荒木在辞职前给斋藤实首相提出一份《紧急施策基础方案》，它是片面强调精神主义的标本。除了“民生安康”“振兴农村”等个别词句外，讲的都是关于

① 《昭和期的军部》，第59页。

② 三宅正树等编，《昭和史的军部与政治》(1)第33页。第一法规社出版(株)1983年版。

“人心一新”、“精神的复兴”、“言论统制”、“思想纯化”之类的内容。^①荒木等人虽然也讲“匡救时局”、“树立国策”，但是对于具体可行的办法束手无策。“荒木是饶舌之徒”、“荒木只会讨好人”，^②一时成了流行语。

皇道派上层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卖力地拉拢青年军官。他们同情、纵容法西斯青年军官策动军事政变。

凡此种种均与一夕会的主张背道而驰，令永田铁山等人大失所望。1932年，原一夕会的一些成员同其他一些军官形成了以永田为中心的统制派。他们主张保持军部中央机构的统制，依靠合法手段自上而下建立军部独裁，因而被称作统制派。据其中起干事作用的池田纯久说：“严格地讲，统制派是指永田铁山少将、东条英机少将、今村均大佐、武藤章、富永恭次、下山琢磨、影佐祯昭中佐，地田纯久、田中清、四方谅二(宪兵)少佐”这些人。林銑十郎、渡边锭太郎、南次郎大将、梅津美治郎中将、石原莞尔大佐等，“带有统制派色彩，但并非成员”。^③在永田等的影响下，1933年11月，以片仓衷为中心的14名大尉级省、部幕僚军官成立非常时期对策研究会。他们也属于统制派。原属皇道派的铃木贞一后来也转入统制派。

皇道派和统制派形成后，由于意见分歧，出现尖锐的对立。两派的分歧，起初突出表现为：第一，关于国家改造的手段，统制派主张自上而下地以合法手段进行；而皇道派，特别是其中下级军官，坚持自下而上地一再搞非法的政变。第二是改造的次序，尽管两派都要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但统制派主张先外后内，

① 秦郁彦，《军队法西斯运动史》附录，第241—244页。

② 失次一夫，《昭和动乱秘史》上，经济往来社1971年版，第109页。

③ 秦郁彦，《军队法西斯运动史》，第86页，池田所说10人中，永田、东条、今村、武藤等5人曾去欧美学习、工作；影佐、池田、田中、四方曾被派往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经济、政治专业。

如板垣征四郎所说是“满洲第一主义，国内革新第二主义”。^① 皇道派的中下级军官则强调“国内第一主义”。^②

统制派形成后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同荒木等人分手。双方的完全决裂是在1933年夏秋。这年6—8月，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联合讨论战略问题。会上，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围绕“南进”还是“北进”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小畑主张立即对苏开战。这同皇道派的精神主义心理有关。小畑认为，日本军备虽不及苏联，但“强调以无形战斗力、即精神力量来弥补这一劣势”，可以用“短期决战”获胜。^③ 永田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应该扶植“满洲国”，首先解决“中国问题”；并实施总动员计划，以增强国力，作好长期战斗的准备。永田显然以南进同美英争夺中国作为战略目标，认为应暂时与苏联妥协。^④

统制派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中上层军官的支持。1934年1月，荒木辞职，林銑十郎接任陆相。同年3月，林陆相任命永田铁山任军务局长，这是仅次于陆相、陆军次官的最有实权的职务。于是，统制派取代皇道派，确立了对陆军的支配。日本军部向来以陆军为主，支配了陆军，也就掌握了对军部的主导权。

第三节 军部法西斯化和政权法西斯化

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没有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样的首魁，也没有德、意法西斯主义那样的政党。它是在军部的控制下，通过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借助天皇权威确立起来的。这是日本法西

① 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下卷，有斐阁1956年版，第342页。

② 福地重孝，《军国日本的形成》，春秋社1959年版，第64页。

③④ 矢次一夫，《昭和动乱秘史》(上)，第118页；清家基良，《皇道派的精神构造》，载日本《军事史学》19卷4号。

斯主义的独特之处，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疑难所在。日本军部是近代天皇制的核心，近代军国主义的集中体现者。日本法西斯主义同以前历史的连续性与差异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军部向法西斯化的演变。许多著述都重视军部的主导作用，却常常忽略军部的政治化和法西斯化，并将军部与法西斯党、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不同实体简单地归结为一体，从而在研究中发生歧异。

在日本现代史上，军部与政党的争斗，是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斗争表现，是一个极重要的社会矛盾。军部凭借其在明治宪政中所处的优越地位，突破差别主义的束缚，走向政治化与法西斯化。这是日本军部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亦是导致日本法西斯主义确立的重要依据。

军部政治发展的基本前提

日本军部作为国家机器的构成实体，是在明治维新之后伴随军事改革组建起来的。它包括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教育总监部以及陆军省、海军省、侍从武官府等部门。据井上清考证，“军部”这一名称出现较晚，本世纪10年代起才逐渐被广泛使用。^①最初军方自称军部，其字面上的含义在于区别政府行政部门与军事部门。实质上军部是表示与政府分庭抗礼的军方势力的独特概念，是军阀的别称。

由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而形成的日本立宪君主制，其政治结构是一部多头分权、互有牵制，但又权力偏重、制约失衡的国家机器。正如中江兆民所说，是“一身多头怪物”^②。其中最大的两

^①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3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中译本，第12页。

^② 转引自辻明清：《日本官僚制的研究》，弘文堂1954年版，第212页。

个头便是军部和内阁。

明治初期，近代天皇制初创，国家军制尚未定型，兵权和政权的关系时有变动。在1878年陆军参谋部建立之前，基本沿袭大村益次郎的设计，采用法国式兵权从政主义，兵部省归属于太政官（明治初期的最高官厅，相当于后来的内阁，但权限较大），兵权归属于政府。在实际用兵时，往往派出讨伐总督负责军事指挥，出现“独立于太政大臣和陆军卿的军事机关，造成了政治和军事一元化组织的破坏”，^①从而显露出背离兵权从政主义的端倪。后来在山县有朋等人主持下，摹仿普鲁士，建立直属于天皇而分管军令大权的陆军参谋部，海军也分立出相应的军令机关。这使军令大权和军政大权分立，废弃了兵权从政主义之下的军事一元制。

所谓军令大权与军政大权，两者的权限难以截然相分。军令大权，又称统帅权、兵马大权，包括平时的战略计划、临战动员及作战指挥等事项；军政大权包括编制、训练、后勤供给等内容。军令大权被分立出来，只将军政大权归属于内阁，在军制学上称为军事二元制。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以法律形式肯定这种变化了的新的政军关系。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帅权。根据这项原则，1878年成立参谋本部时确立的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继续有效，即凡有关军令事项，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断。这就是统帅权独立原则。按照西方宪法学的解释，这一原则就是政军关系中的兵权独立主义。

日本的统帅权独立，既是学习普鲁士进行改革的舶来品，又是自身军国主义传统的再现。古代的武家政治是幕府的军事专制，明治初期新组建的国家军队的雏形“御亲兵”也直属于天皇。日本学者指出，统帅权独立原则的成因在于日本的“传统”和“实

^① 森松俊夫，《日本大本营》，军事科学出版社中译本，第15页。

际习惯”。^①所以，统帅权独立原则的确立，既是明治维新学习西方建立近代军制的资产阶级改革的产物，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不彻底的结果。

政军关系是战前日本国家政体中的关键，人们甚至称为“明治宪政之眼”，^②正是在这个要害上，军部孜孜以求，以逞其雄。从军事一元制的兵权从政主义到军事二元制的兵权独立主义，反映了第二次大战前日本政军关系的变化。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要求，兵权不能脱离代表民意的议会的约束，应归属于对议会负责的行政机关——内阁。统帅权独立原则使军部独立于内阁之外，内阁失去兵权，无法执行控制军队的职能。

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虽然也是内阁成员，但他们作为军部的派出代表，在内阁中享有特殊地位。他们这种具有特殊地位的依据是所谓军部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自1872年陆海军省分设后，长官资格没有完全确定，初期还有非武官的胜安芳任海军大辅（相当于海军次官）的情况。随着军部势力的增长，军部逐渐强化其政治地位。1900年第二次山县内阁改订官制，以敕令形式规定，陆海军大臣须由军方推荐。由现役上、中将担任，次官由现役中、少将担任。这一制度背离议会制原则，直接危害内阁的存在。因为第一，在组阁之前，假如军部不满意该届内阁，便不推荐陆、海军大臣人选，内阁只好流产；第二，军部若与现任内阁意见相左，则让陆、海军大臣辞职，并且不再推荐继任人选，迫使内阁辞职；第三，当内阁辞职后，陆、海军大臣可以不与其它阁员共进退，继续留任。所以陆海军大臣并不介意内阁的更迭，而仅仅依据军部的利益办事，执行军部的政见。

统帅权独立原则与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是军部势力的

① 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下，有斐阁1956年版，第297页。

② 《内阁制度史》上卷，大藏省印刷局1985年版，第65页。

两大支柱，前者已经使“参谋本部部长的地位优于陆军大臣而与太政大臣并立”^①，后者则进一步掌握了内阁的存亡。

从法律角度来说，只有天皇能够管辖军部。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军部应对天皇负责。但近代天皇制的特点是“廷政分离”，天皇不亲政，不行使实际权力，即使在御前会议上裁决争端也是只听不答。故而名义上直辖于天皇的陆海军，实际上无所约束，自成中心。在天皇权威的神圣光环中，军部成了日本学者所说的明治宪政的“权力核”，^②居于特殊的政治地位。战前日本的历史表明，军部这一“权力核”不断膨胀，逐步地摆脱政府的控制，成为与内阁并立的“双重政府”，^③最后在天皇大权的名义下实行独裁，把日本引向战争。

统帅权独立原则与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的实行，是由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维新派元老所制定的，其初衷是保证军事力量的独立发展，防止各种社会力量和政府官僚对军事的干扰。特别是19世纪70、8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更加强了伊藤博文等人的这种认识和决定。但是，仅有上述措施，仍不足以限制军中将士卷入各种社会政治运动或防止自由民权政治对军队的冲击。为此目的，明治宪政的缔造者们又为军部设置了一道从法理上说不准逾越的藩篱，这就是根据西方政治原理而确定的差别主义原则。

所谓差别主义，就是在履行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责任方面，军人与普通公民有所差别，要求军人不得干预政治，军人在政治上应采取中立主义。明治宪法第32条规定，在履行日本公民的权利方面，作为军人不能与“陆海军法令或纪律相抵触”。

① 《明治军制史论》上，第15页。

② 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序说》，未来社1975年版，第151页。

③ 吉野作造：《双重政府与帷幄上奏》，转引自三宅正树等编集：《昭和史的军部与政治》(1)，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3年版，第75页。

1881年改订的陆军刑法规定：“军人上书建议或者谈论有关政治事项，或者用文书将其广为传播者，处以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禁锢”。^① 海军刑法也有相同规定。1900年实施的治安警察法规定：现役和征集中的预备，后备役陆海军人限制其结社自由。在选举法方面，1883年规定，陆海军现役军人不能作为府县等地方官员的选举人。1880年制定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陆、海军人现役期间不得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②

差别主义并不仅仅限制普通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也限制高级将领以及各层军事机构。明治维新功臣之一、陆军中将谷干城就曾因“干政”而被转入预备役。差别主义一再被反对军部干政的人加以强调。1931年陆军大臣南次郎在一次会议上对军、师头目作有关满蒙问题的“训示”被报界披露之后，引起一场风波。有人认为陆军当局干预政治，触犯陆军刑法。1934年陆军省新闻班发布有名的“陆军小册子”，被政党方面斥为“军人干政”。可见，军部受到明治宪政所规定的差别主义的约束是不能忽略的，不论这种约束的程度是大是小。

差别主义是对统帅权独立原则与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的补充。如果说后两者决定了军部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优越地位，那么差别主义是对其活动范围的限制。它们原来都是为着同一个目的，即武装力量的独立和充分发展而设置的。但在实际运行之中，它们之间却发生若干逆反摩擦。差别主义不可能削减军部的优越地位，而其优越地位却总能保证军部不断积累优势，攫夺越来越多的权利。限制与反限制的结果，是差别主义原则的形同虚设。

按西方政治学原理，差别主义是兵权从政主义的必备条件，

① 《明治军制史论》，上，第525页。

② 《明治军制史论》下，第342页。

民主政治总是以差别主义来保证政府对兵权的统属。但在日本明治宪政的条件下，内阁不但因统帅权独立而失去了兵权，还被放进了特洛伊木马——两名听命于军部的现役大臣。因此，由各种法律条文确定的军人不参政的差别主义原则，缺乏文官控制等相关条件，可行性基础十分薄弱，似乎“命中注定”，终久是要破裂的。

日本军部所处的优越地位及其所受的差别主义限制，是制约日本军制与军政关系发展的左右两轮。特别是在本世纪20年代的政党政治时期和30年代向法西斯政治转变时期，这两方面的摩擦与冲突，是导致日本政体变型的主要线索。然而，人们往往注意到了由统帅权独立和现役武官制所带来的优越地位，而忽略其差别主义的政治限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后果。军部势力不断发展，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急剧膨胀，不再担忧内阁和官僚的干预，而且要求扩张它的政治权益。对军部来说，差别主义乃是无益的羁绊，不拔掉这道藩篱，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操纵政治。因此，军部必然要努力突破差别主义的束缚。随着局势的变动，军部依仗统帅权独立和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达到了恣意干预政治的目的。如果不发生军部对政治的干预，不产生军部的政治性演变，就不会带来30年代那样的国家政体结构的变化。日本军部在政治上不断介入的历程，就是军部突破差别主义走向政治化、法西斯化的历程，就是其由单纯的军事机构演变为政治军事集团从而改变国家政体的历程。

军部政治化的历程

所谓军部政治化，就是指军部突破差别主义，干预国家政治，由单纯的军事机构演变为政治军事集团。明治维新伊始，军阀头目便是社会政治的基本操纵力量之一。他们中的某些人侧身

于明治元勋的行列，作为军队的代言人积极参与国政。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近代政治史的发展就是军人干预政治的历史”。^①

日本军部的政治化有一个渐变的历程。起初，军部仅仅作为近代军事体制的指挥机构，它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发言权。一方面，在明治时代，执掌政权的多是长州、萨摩、土佐等倒幕雄藩出身的维新功臣，他们往往是一身而兼有军阀、官僚等多重性质。正是他们一手组建了军部这样的军事机构。在这个时期，军部依附于藩阀元老等明治元勋，还不是完全独立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在差别主义原则的制约下，只是存在着“军部政党化的危险”，^②而不是政治化的展开。

明治后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情况开始有所变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以议会为地盘的资产阶级政党日益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任何内阁都不能没有政党的支持。1898年出现了第一个由政党领袖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组织的内阁。伊藤博文深感要有自己的政党，他不无感慨地说：“雇佣兵不足恃，一定要有(自己的)亲兵”。^③1900年，他在财阀和部分官僚的支持下建立了政友会。此后，出现了西园寺公望与桂太郎轮流组阁约十年的桂园时代。西园寺虽然是以侯爵、贵族院议员身分出任首相，但同时又是政友会总裁(1903—1914)。他每次组阁都吸收政友会成员入阁，以政友会作为政府与党，政党的地位进一步有所加强。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一部分藩阀势力，主要是军队中的藩阀势力，对伊藤博文的做法与政党的崛起极为不满和忧虑。为了防止政党势力侵犯军部，1900年山县有朋在他任首相时正式实行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的分歧表明了藩阀的分化，从此军部开始成

① 福地重孝：《军国日本的形成》，春秋社1959年版，第64页。

② 《明治军制史论》下第505页

③ 石田雄：《近代日本政治构造的研究》，未来社1980年版，第157页。

为一种独立的力量。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又大为加强了军部的地位。军部在内阁、议会、政党面前显得有恃无恐。

日俄战争后，日俄在远东的对抗依然存在，日美之间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导致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面对这种局势，军部一如既往地坚持强硬政策，要求扩大军备；在中国辛亥革命后提出增设两个师团。但是，日俄战争的庞大军费开支给日本的财政经济带来沉重负担。财阀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暂时不想进行新的较大规模的扩军。西园寺内阁和政党反映了财阀的这一想法，同军部发生了对抗。

在上述情况下，突破差别主义，干预国家政务，对于军部来说，不仅有必要，也有了可能。第一个行动是军部于1907年撇开内阁、议会，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这个《方针》和有关文件，规定了日本“以俄、美、法之顺序作为假想敌国”，确定了平时战时军备规模。这种决策属于国家的大政方针，远远超越了“军令”权限。事前，参谋本部有关方面就明确提出，“军备必与国是一致，战略必与政略相伴”，国是及与其相关的军备规模，“乃立国之方针，虽非仅由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商议所能确定，然我国对如此根本问题至今尚未作出解答，宜乘此机会，从军事之见地出发，加以确定并上奏”。^①军部擅自决定假想敌国这样的国家大事，是露骨地干预国家政务。

1912年12月，因为西园寺内阁不赞同增设两个师团，陆相上原勇作辞职。陆军拒绝推荐后继人选，第一次利用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搞垮了一个内阁。山县有朋支持桂太郎组阁。对于军部、“阀族”的胡作非为，群众极为愤懑。次年2月数万人包围议会，推翻了桂太郎内阁。1913年，山本内阁在这次护宪运动的影响下，修订了陆海军大臣官制，把现役扩大为预备役。同时颁布新

^①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第34页。

的文官任用令，扩大政党成员猎官的门路。陆海军对于削弱军部特权地位的任何举动都极为反感，忌恨山本内阁的变革，便利用西门子公司事件迫使内阁辞职。“这次倒阁运动的费用由陆军参谋本部支出，总务部长山梨半造是策划的中心人物。”^①

此外，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日本在中国京津一带驻军，日俄战争后，又在中国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沿线驻军，这为军部擅自对外推行扩张政策提供了方便。1912年和1916年，军部通过驻中国的日军，两次策划了“满蒙独立”运动。

可见从20世纪初到10年代，军部已经突破差别主义，开始政治化，并凌驾于内阁、议会之上，造成了“双重内阁”、“双重外交”的局面。军部已由军事领导机构变为军阀。当然，这时军部虽然已经干预“国是”、组阁等国家大事，但是还没有全面支配国家政治。一次大战后，军部的政治化有了进一步的、不同质的发展。

一次大战结束前后，和平、民主思潮在世界各地空前高涨，日本的大正民主运动重趋活跃。1918年，以“米骚动”为契机，原敬内阁上台。原敬作为无爵位的政友会总裁组阁，被称为“平民宰相”。原内阁可称为“名实俱备的真正的政党内阁”。^②在思想和理论界，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③和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广为传播。特别是民本主义，强调“政治要依据民意而实施”，“政治的目的在为民众”。在1924年兴起的第二次护宪运动中，建立了护宪三派内阁，^④从而使战前日本式的民主政治——即资产

① 福地重孝，《军国日本的形成》第79页。“西门子事件”是海军高级军官接受西门子公司等贿赂，激起倒阁、反军阀事件。

② 《内阁制度百年史》上，第263页。

③ 美浓部达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有《宪法讲话》等，是天皇机关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天皇机关说在19世纪末为宪法思想家提出。主要内容是，国家统治权属于作为法人的国家，天皇作为国家行政的最高机关而行使统治权。天皇机关说与天皇主权说相对立，是大正民主运动与政党内阁的理论根据。

④ 成立于1924年6月，由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等护宪派三党联合组成内阁。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任首相。

阶级的政党政治达到顶峰，长期的藩阀统治宣告结束。1925年还实现了普选法(男子)。在此同时，工农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获得显著发展。资产阶级政党企图通过扩大一定的民主，把工农运动纳入它们的政治轨道，脱离“过激思想”的影响。

政党与军部同是日本统治阶级的工具，他们的利害基础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各自主张以不同的政治方式来巩固统治。政党要求采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方式，军部主张采用专制主义的方式，实行高压统治。

对于军部来说，不论社会主义还是民主主义，都是“恶思想”。1919年夏天，陆军次官山梨半造在在乡军人刊物上发表连载文章《思想问题之是非》，宣称“过激派”(共产主义)、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都是与“军人精神”完全不相容的。^①军部与政党之间本来就存在权力之争，加上这种政见分歧，必然产生更大的摩擦和冲突。在和平、民主思潮的冲击下，一向受人欣羡的军人却一下子变得被人看不起了。在公共汽车上，军官的靴子偶而碰了别人就会听到骂声，一些军官上下班都不敢穿军装。军部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状况。这样，就形成了军部与政党之间，实质上则是反映了议会民主政治与专制主义之间的严重对抗。

一次大战之后，令军部更为关注和烦心的是日本国际处境的恶化。对外扩张的成败，不仅与日本帝国生死攸关，也直接关系到军部的地位和利益。在大战烽火尚未熄灭的时候，军部就在考虑如何准备下一次战争。1923年修改了《帝国国防方针》，把美国作为头号假想敌国，认为日美之战“势在必至”，同时决定要对苏联、中国“经常保持威压的实力”。^②

① 纈厚，《总体战体制研究》，三一书房1981年版，第129页。

② 三宅正树等编集，《昭和史的军部与政治》(1)、第65、131页。

如果说过去军部还只是在某些问题、事件上突破差别主义，凌驾于内阁、议会之上，那末随着军事思想的转变，就要求全面突破差别主义，广泛干预国家的政治、经济以至国民思想。自从准备总体战提上日程后，如何使统帅与国务、战略与政略一致，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在明治宪法体制之下，很难从体制上去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军部来说，他们能够做的就是使国务从属于统帅，政略从属于战略。当年，东条英机就在陆军大学宣扬这种思想。^①1931年1月，陆军大臣宇垣一成竟然通告全军：“军人不惑于舆论，不干预政治，但军人又担负着国防。国防不全则国危。那么，就不能把议论国防问题说成是直接干涉政治。可以说国防优先于政治。”^②他所说的“国防”自然是指对外侵略的扩军备战，他要求政治服从于这种军事。

不过，20年代正当政党得势之时，也还无力对外挑起新的大规模战争，尚需日本作好战争准备。因此，在处理军政关系上，军部并没有把他们的想法完全付诸行动。1921年军队曾出动镇压东京市电业工人大罢工，1928年6月4日，关东军在沈阳附近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奉系军阀首脑张作霖，并妄图进而侵占中国东北。除此之外，军部并未对政务横加干涉，没有公然反对政党政治。这并不是说军部放弃了政治化，而是把重点放在积蓄军部的政治力量上。比如在军内外进行准备总体战的舆论宣传，推动内阁建立准备总体战的机构，以及大力在国民中渗透、扩张军部的影响力、操纵力。尤以后者是重点之重点。

关于军民关系，原来军部提倡良兵良民主义，即通过军队培养良兵，然后带动国民成为良民；20年代改为良民良兵主义，认

^① 永田铁山：《论国家总动员》，《现代史资料23，国家主义运动3》，水蔦书房1974年版，第240页。

^② 藤野厚：《总体战体制研究》第127页。

为先要有良民，才能有良兵。这个变化既是针对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广为传播，也是出于总体战的需要。为此，军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早在1910年建立的在乡军人会，原来是为保持后备役军人战斗力的军人组织，后来实际上在各地起着保守的政治作用。一次大战后，军部反复强调在乡军人应该致力于引导国民思想，维持公共秩序。1925年正式把这些内容写入在乡军人会章程。1927年，在乡军人会在道府县、市町村和工厂共设有支部、联合会、分会14200多个(日本本土13700多个)，1931年有成员263万多人。^①军部通过在乡军人会，可以把它的影响扩展到全国各地和几乎所有的基层单位。此外，为了把各地青年置于军部影响之下，1925年建立了大日本联合青年团，并把军训明确规定为它的主要活动之一。青年团的对象是十二、三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少年。1924年决定大、中学校开设军训课程，向各校派出1千多名军官。1926年在全国各地设立青年训练所，对小学毕业还未到服兵役的青年进行业余教育，在4年800个课时中，军训占了一半。军部通过军训把全国青少年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除了上述组织，一旦有需要，军部还可通过驻各地的师团，在各自管地区直接对居民进行宣传、煽动和其他组织活动。

当年的陆相宇垣一成在他的日记中沾沾自喜地夸耀说：“军部和社会的接触面比历来显著扩大了”，依靠军部掌握或影响下的二十余万现役军人，二、三百万在乡军人，五、六十万大中学生，千余万青少年，“无论平时战时，实现真正的举国一致，可使七千万同胞驱驰于至尊之下，听从指挥。”宇垣断言：“在非常时期，统帅大权不仅是指挥军队，而且是一种支配国民的权力。”^②军部要支配全体国民的欲望跃然于纸上。

^① 藤泽厚，《总体战体制研究》，131—132页。

^② 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序说》第193页。

这种军民关系格局，是军部政治化的实质性进展。如果说过去军部干预政治是凭借其军事力量和体制上的特权地位，那么现在军部可以有组织地操纵国民和民众舆论，对国家政务施加压力，使军部真正成为内阁之外，比内阁更强有力的“内阁”。这为以后军部扩大、确立自己的政治支配地位，攻击、摧垮政党政治奠定了基础。同时，20年代军部政治化的发展是同总体战思想相联系的，其最终目的是要对全部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生活建立高度集中统制，也即建立法西斯极权主义统制。因此，这时的军部政治化实质上具有军部法西斯化的趋向。

在军部扎扎实实扩大自己力量的时候，政党政治虽盛极一时，实际上却是很虚弱的。政党本身同官僚、军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伊藤博文1908年组织政友会，就企图使政党从属于藩阀、官僚。所以，政党政治发展之中就包含有“藩阀的政党化”^①。它使政党质量严重不纯，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政党的虚弱性，以政党内阁的范本之一原敬内阁来说，有人根据它反对普选运动等方面的表现而称原敬为“绝对主义者”。^②1924年第二次护宪运动开展以后，民主势力进一步发展，天皇制危机加深。加藤内阁却于1925年制定《治安维持法》，加强了对民众的镇压，对民本主义是很大打击。《维持法》还使“国体”一词首次在法律上出现，为正在兴起的法西斯主义的以天皇中心论为主的国体思想张目。各政党争夺权位，保护本党利益，经常互相攻击，为政党政治自掘坟墓，让军部坐收渔人之利。正如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所指出的，这些都暴露了日本政党那种“御用商人的本性”。^③

从自由民权运动之后，政党的腐败成了积习，一朝大权在握，

① 石田雄，《近代日本政治构造的研究》第134页。

② 前岛省三，《日本政党政治的历史分析》，法律文化社1960年版，第305页。
日本学术界将欧洲17、18世纪的封建专制王权称为绝对主义王权。

③ 石田雄，《近代日本政治构造的研究》第208页。

越发变本加厉。选举中的收买舞弊越演越烈。重大贪污案接二连三，有的内阁大臣也被牵扯进去。甚至天皇颁发的勋章也被主管官员私下出卖，闹得舆论哗然，政党政治威信扫地。

政党政治虽然给军部专制势力造成威胁，但并没有取得胜利。原内阁的高桥藏相曾要求废止参谋本部，将军令大权收归内阁。原敬首相认为时机不成熟，让高桥撤回提议。从此再未触动过“明治宪政之眼”。在现役武官专任制方面，虽然扩大到预备役、后备役，实际上从未出现过预备役、后备役大臣，更不用说文官了。政党政治的兴盛及其对专制政治的压力只不过徒有声势，并没能改变多元政治的局势。直到1936年“二·二六”事件之前，亦如左尔格的一份评论所说“日本社会实际上不存在一个政治中心”^①。以政党和军部为主，加上官僚、贵族等多种社会势力的均衡和僵持仍在继续。在这种多元政治下面，随时都潜伏有逆转的危机。

扼杀政党政治

政党的兴盛和军部势力的膨胀，都是在天皇制的框架内完成的。天皇、元老、贵族、军部和政党均为近代天皇制的组成部件，是日本统治阶级不同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统治阶级可以调节它们的关系和位置，以维持其根本利益。当政党政治经历了20年代的鼎盛期仍无法解决日本的内外危机的时候，统治阶级就不得不进行新的政治抉择，再次引发了各个政治集团新的角逐。军部为反击政党，摆脱多元政治的僵局，不能不加速其政治化进程，步入法西斯化阶

^① 转引自栗屋宪太郎，《满洲事变·二·二六》平凡社1983年版，第309页。左尔格为共产国际派驻日本记者，后被日本以间谍罪名逮捕枪决。

段。

1930年春，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动荡不安笼罩全国。这为军部同政党公开较量，扼杀政党政治，提供了等待已久的机会。军部上层，一夕会和其他军内法西斯势力同民间法西斯势力相呼应，向政党政治接连发起冲击。

1930年1—4月，民政党内阁派代表团出席伦敦裁军会议，达成对英美方案的妥协案，^①没有完全满足军部的要求。军部在民间法西斯分子北一辉等人的支持下，攻击内阁“干犯统帅权”，要求内阁辞职。这是军部与政党内阁大规模的公开对抗。日本学者对此评论说：“像这次伦敦会议期间国务和统帅分裂之剧的事例，迄今为止未曾见过”^②以这次事件为开端，长期处于酝酿、准备阶段的日本法西斯运动急剧活跃起来，在其中打头阵或在背后操纵利用的是军内法西斯势力。

1931年3月，以桥本欣五郎为首的樱会陆军军官同大川周明策划发动武装政变。他们在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等首脑人物指使和支持下，预定于3月20日调动军队包围议会，迫使代理首相币原喜重郎及全体阁员辞职，建立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为首相的军部独裁政府，推行所谓“国家改造”计划。后因内部意见不一，冈村宁次、永田铁山等人另有主张，以及宇垣本人认为通过合法手段也能当上首相而对政变持消极态度，这次政变计划未能实现。

接着，军部法西斯分子主要是一夕会成员直接策划和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一夕会确定“重点解决满蒙问题”之后，就通过任军事课长的永田，把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成员安插到关东

^① 伦敦会议决定各国主力舰数目仍为英美各15艘，日本9艘；装备八吋口径的巡洋舰和辅助舰艇，日本为美国的70%。

^② 判泽弘，《昭和时期自由主义的抵抗与主张》，日本《思想》1976年第6期，第67页。

军中去，在军部中央也作了相应的人事安排。^①在1931年4月，由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等人制定的《昭和六年(1931)度形势判断》，其核心就是强调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6月，以建川为首的陆军省参谋本部解决“满蒙问题”五课长秘密会议，制定了《满洲问题解决方策大纲》，明白规定有必要时“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参加这次会议的永田、冈村宁次、渡久雄三人为一夕会成员。后来，由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负责具体策划，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这次事变，对于日本国内军政关系来说，是为了加强军部的政治地位，迫使内阁接受战争和法西斯化的政策。石原莞尔洋洋自得地称道“满洲事变实质上是昭和维新之前驱”。^②

1931年10月，樱会陆军军官和大川周明等法西斯分子再次策划发动武装政变，以策应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建立军事独裁政权。政变计划预定于10月21日动员陆海军少壮军官和民间法西斯势力，袭击首相官邸和警视厅，杀死首相若槻礼次郎和外相币原喜重郎，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相、建川美次为外相的军部法西斯政府。后因内部有人告密，桥本欣五郎等十二名主谋者被捕，政变阴谋失败。但是，陆相南次郎有意把这一事件告知内阁，使政界、财界大为震惊。民政党若槻内阁发生分裂。内相安达谦藏与政友会的久原房之助等呼应，要求组织亲军部的“协力内阁”以取代政党内阁。若槻内阁被迫辞职。

面对军部和法西斯势力的压力，政党也不甘心屈服。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在组阁时，就试图“要压一压军部”。^③在不久后举行的大选中，政友会获得303席，赢得大胜，增强了政党反击军部的信心和力量。1932年5月1日，犬养毅首相发表广播演说强

① 有末精三：《政治、军事与人事》，芙蓉书房1982年版，第56—57页。

② 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91页。

③ 枫元夫：《震撼昭和政治50年》，日新报导出版部1975年版，第65页。

调：“近来，在某些阶级中存在着否认议会的论调……吾辈与此相反，确认这是能够改善的。”^① 5月10日，民政党若槻总裁发表演说猛烈抨击军部：“最近有一部分人欲否定立宪政治而推行专制政治，……推行专制政治的人都要背叛其最初诺言而实行恶政”。^②

然而，在政党企图“振兴议会政治”的时候，法西斯分子再度使用恐怖手段，在5月15日杀死犬养毅首相，推翻政友会内阁。掀起这次暴动的海军青年军官等法西斯分子并没有具体纲领。只是企图“对政党及其财阀伙伴予以袭击，促进国家改造（按即法西斯改造）的气氛”，^③ 并希望在制造混乱之后，由荒木陆相为首的军部来收拾局面。果然，在暴动后的第三天，陆相就向元老西园寺施加压力说，“陆军是反对政党内阁出现的”。^④ 永田铁山向西园寺的秘书原田熊雄表示：“如果由政党单独组织内阁，恐怕无人就任陆军大臣，组阁将会陷入困难”。^⑤ 结果，组成了海军大将斋藤实的“举国一致内阁”。它是一种“中间内阁”，“既不是政党内阁，也不是军部内阁，而是军部、政党加上官僚的联合政体”。^⑥ 或者说“是军部和政党僵持着共同维持政权”。^⑦ 总的来说，军部的政治发言权比以前大为加强，由斋藤内阁开始召开的五相（首、陆、海、藏、外）会议就是一个证明。此后，单独的政党内阁再也没有出现。日本的“政党政治”维持不了10年，就寿终正寝了。

① 《日本内阁史录》卷三，第一法规出版社1971年版，第279页。

② 同上，第71—72页。

③ 前岛省三：《昭和军阀的时代—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过程》，“密纳尔伏”书房1974年版，第161页。

④ 秦郁彦：《军队法西斯运动史》，第56页。

⑤ 《木户幸一日记》上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第165页。

⑥ 户川猪佐武：《近卫文麿与重臣们》，讲读社1972年版，第16页。

⑦ 枫元夫：《震撼的昭和政治五十年》，第80页。

军部法西斯化的完成

统制派掌权后，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首先是如何贯彻巴登巴登密约以来的一贯思想，把建立总体战体制提上实践日程。为此，就需要一个全面、明确的政策纲要。

早在1933年春天，军事课政策班的池田纯久(后为班长)就同矢次一夫(时局问题研究会和国策研究会的组织者)商谈了起草国策方案问题。矢次也认为这是当务之急。他邀集几个人草拟了《综合国策大纲》。陆军省有关军官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参谋本部也予以协助。后由池田等人加以整理，交永田军务局长审阅，并得到林陆相的批准。这是一本题为《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小册子，1934年10月用陆军省新闻班的名义公开出版发行，通称陆军小册子。^①

打开小册子，头一句就是“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这种“战争万能”的论调，宣称“国防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小册子以“国防”问题(实际上是对外侵略战争问题)为中心，阐述了军部的战争观、国防观，以及社会、经济、思想、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设想，要求确立一切服从战争的“国防国策”，重新“组织、经营国家和社会”。

小册子提出的“国防国策”主要有五项：

一是实行“积极军备”，建立“足以支持国家积极发展的武力”。

二是消除自由竞争，建立统制经济，把“全部经济”包括“国民经济生活”置于国家统制之下，但是“只要不违反国家的要求，可满足个人的创造性和办企业的欲望，更好地激发勤劳精神”。

^① 矢次一夫前引书第93—94页；生田惇，《陆军小册子问题》，载日本《军事史学》第14卷第4号。陆军小册子全文见《现代史资料5》。

三是安定后方，尤其要救济农村，“使士兵无后顾之忧”，为此，要求树立“国民共存共荣”的“全体经济观”。

四是实行精神统制，“对于建国理想和皇国使命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彻底发扬尽忠报国精神”，“培养舍己献身的崇高牺牲精神”，铲除国际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五是“创建以国防为本位的各种新机构”，促进各项国策的实施。

贯穿各项“国防国策”的基本思想，在小册子中概括为这样一段话：“必须重新检讨国家全部结构，必须对财政、经济、外交、政略以及国民教化坚决实行根本改组。为了国防的目的，努力对皇国伟大的精神、物质潜力进行组织统制，加以一元化的运用，使之成为最大限度的实力。”对此，小册子还有更简要的表述：“对国家全部活力实行综合统制”。按照这种“一元化综合统制”建立起来的体制，当年称之为“高度国防国家体制”，它实质上是按照法西斯总体战思想而建立的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

陆军小册子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发表的第二天，东京的股票立即下跌。持股者看到了军部强大的政治势力的存在，惧怕军部实行有损于财界的统制经济。政党方面评论道：“作为陆军而就有关社会改革或经济改革向国民发表指导意见，令人遗憾万千之至，唯有哑然而已，在有秩序的国家之中，岂有此等事情发生。”^①在野党中政友会反对最为强烈。参与政权的民政党则认为，小册子“内容当否另当别论，像如此全面涉及国家政策的文书，理应是属于政府的职责。”斥责军部在政治上的专横，是“军人干涉政治”^②。

社会右翼和军部法西斯分子对此坚决支持。法西斯右翼刊物

① 《右翼思想犯罪事件的综合研究》，东洋文化社1973年版，第264页。

② 生田惇，《陆军小册子问题》。

《皇道》发表长篇连载文章《军部论》，大加称颂，并进一步阐述和宣传法西斯理论。《军部论》解释军部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和介入政治的原因，说军部本来不介入政治，只因为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调的民主主义”在各方面都出现了“动脉硬化症。”^①“政界又腐败堕落致使皇国出现危机”，^②军部不得已而介入，取得“政治的人格。”^③它认为，欲拯救皇国，必须按陆军小册子所强调的办法去“匡正富之偏在，实行统制经济”；要发挥日本的皇国主义，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去解决日本的社会政治问题。《军部论》要求日本国民“首先要信赖军部”，“军部是万民扶助皇猷的核心”。^④它强调说：“统制的强化，无论理念上还是事实上都是最迫切的问题。”^⑤这些论述与德、意法西斯的理论如出一辙。《军部论》的序言还强调：“皇道的第一要义在于实行”，这更使人联想到法西斯的行动哲学。

矢次一夫回顾了起草“国策”意见时的社会思想状况。他写道：“国家革新的主张可以说在各界澎湃高涨，但所谓革新究竟意味着什么，似乎明白，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这就是当时的实际状况。”^⑥陆军小册子起到了统一法西斯“革新”思想和社会舆论的作用。小册子出版的当月就发行二次，共21万册；次年2月又第三次发行，数量更多；而各报大加转载、报导，等于发行了1千万册以上^⑦。其散布之广，影响之大，在日本史无前例。对于一些疑虑想法，军部作了解释、说明。反对言论遭到法西斯分子的围攻，各种不同意见很快趋于沉寂。因此可以说，“陆军小册子给当时的国民舆论带来重大转机，这就是从个人主义转变为极权主义”。^⑧

陆军小册子是一次大战后军队法西斯运动和军部趋向法西斯

①—⑤ 永井三部，《军部论》，先忧社1934年版第103，129，130，76，129页。

⑥ 矢次一夫，《昭和动乱秘史》（上）第93页。

⑦ 生田惇，《陆军小册子问题》。

⑧ 生田惇，《陆军小册子问题》。

化的“结晶”，它是统制派的政治纲领，也是整个军部确定建立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的纲领。陆军小册子表明，军部法西斯完全突破了明治宪政所规定的差别主义原则，它已不再是简单地介入政治，参与政治，而是推行一整套明确的、系统的法西斯主义政治。陆军小册子在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史上所具有的意义，正如一位日本史学家指出的，只有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法案大纲》能够与之类比。^①两者是日本法西斯运动发展史上的界标，北一辉的《大纲》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开端，而陆军小册子则是军部法西斯化完成的标志。小册子对于国家法西斯化的实践指导意义则远非《国家改造法案大纲》所能比拟。

法西斯化是军部政治化的发展和结局，它既是政治化的继续，也是政治化的恶性发展。它并不只是通常所说的“披上法西斯铠甲”或“拿起法西斯武器”，而是在思想、理论和行动中彻底地推行法西斯主义。其中心目标是在国家政治体制上否定议会民主主义，实行极权主义和独裁专制。

军部法西斯化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天皇的精神权威可以代替法西斯政党的领袖权威。军队所特有的严密纪律，军部在国家政权中的权力核地位，使军部能够发挥德、意法西斯政党那样的组织作用，况且它已经建立了动员、操纵国民的一套组织系统。所以，“在法西斯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法西斯政党和团体换言之是一个非正式的军队，反之，军队可以说就是非正式的法西斯主义的政党”。^②日本政治化的军部，就能以一个武装的政治集团而代替政党，并释放出政党组织所无法比拟的巨大政治能量。

① 秦郁彦：《军队法西斯运动史》第95页。

② 凡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未来社1981年版，第258页。

法西斯政权的确立

军部自身完成了政治化，实现了法西斯转变，意味着明治宪政的权力核已经发生“癌变”。继军部挑起“九·一八”事变之后，先有军部的法西斯化，进而由法西斯军部控制国家政权，成为法西斯政权，然后逐步建立全面的法西斯主义体制，这是在日本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推进国家法西斯化的基本顺序。

军部控制国家政权，是以“二·二六”事件为契机的。统制派掌握陆军大权后，他们极力压制皇道派青年军官的擅自行动，要求全军在军部中央“一丝不乱”的统制下，自上而下地推进法西斯化。他们还于1935年免去真崎甚三郎的教育总监一职。皇道派对于这种压制、排挤极为不满。1935年8月，皇道派的相泽三郎中佐光天化日之下闯进军务局长办公室，用军刀劈死了永田铁山。两派原来的明争暗斗趋于白热化。统制派决定把皇道派军官较多的陆军第一师团从东京调往中国东北。以此为导火线，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军官安藤辉三、村中孝次、栗原安秀等人率领士兵1400余人在东京发动叛乱。他们袭击政府首脑官邸，杀死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和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占领首相、陆相官邸和陆军省、警视厅及附近地区。这一暴乱迅被军部统制派镇压，接着广田内阁上台。这届内阁是军部与政党对抗中法西斯运动的产物，是日本国家政权的性质发生变化、法西斯统治初步确立的标志。

首先，广田内阁在军部的安排下，于1936年5月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广田内阁对这一制度的恢复，为军部控制政权提供了合法手段。军部可以肆无忌惮地干涉内阁的组成，操纵内阁，使之沦为军部的傀儡。大正民主运动所获得的成果付诸东流。

第二，按军部的意志确定施政方针，并改组国家机构。军部在广田组阁之初，向其提出了四条施政大纲：明确国体、充实国防、刷新外交、安定民生。广田内阁以这些要求为基准，在1936年7月正式颁布“充实国防”等七项国策。在内政方面的最大变化，是按军部意愿出任藏相的马场瑛一开始实行准战时财政，抛弃了高桥财政的经济与军事兼顾的方针，实行财政首先服从国防需要的方针。马场的准战时财政的基本方针为以后历届内阁所继承，马场财政是战时财政的前奏。

在内阁组成方面，军部在组阁时就横加干涉，对阁僚人选中的吉田茂等人不满意，逼迫广田更换。同时插手机构调整，合并外务与拓务二省、农务和商工二省；改组内务省，新设管理朝鲜、台湾及南洋等殖民地的机构。还要求统一铁道、航空、通信等部门。其目的是在现存政权中全面建立法西斯的统治秩序。

第三，确立了扩大对外侵略的方针。1936年8月首、陆、海、外、藏等五相会议，制定《国策基准》，其主要目标是：“鉴于帝国内外形势、帝国应确立的根本国策是依靠外交和国防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上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扩张发展”。^① 这是在法律上确认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同年11月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与德、意一起结成国际法西斯侵略集团。

过去军部对政治的干预，或是就某项政策进行干预，或是就某些内阁人选发表意见。像广田内阁时期这样军部提出全面的施政纲领，全面地改组并控制政府，为前所未有的。这只能说明，日本的国家权力和内外政策均已从属于军部法西斯。这是一个转折性的历史变化。

军部控制了政府，其后果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即使军部不直接出面组阁，军部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推行法西斯主义，差别

^① 《日本内阁史录》卷三，第405页。

主义对于军部已经完全失去了约束力。第二，内阁的附庸化与法西斯军部的膨胀相结合，初步结束了分裂已久的“二重政府”局面，使相互分离的国务和统帅在服从军部的条件下重新结合，实现新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统一。正因如此，广田内阁上台意味着日本军部政治支配体制的形成，同时也是日本法西斯政权的初步确立，日本国家法西斯政治体制的开始形成。

对于军部的法西斯统治，立宪政治派曾试图反击，但无法阻挡军部法西斯对其统治地位的强化和巩固。例如广田内阁下台后，经元老西园寺推荐，敕令宇垣一成组阁。宇垣为预备役大将，在20年代的政党内阁中曾任陆相，配合政党实行裁军，改进陆军的新式装备，颇得政党和财界好评。宇垣不任陆相后，同政党接近，企图借以登上政治舞台。在倾向于立宪政治的元老西园寺公麿等人眼中，宇垣是对抗法西斯军部的最后一个据点。他自然也是军部所不欢迎的人。在天皇所谓“大命”颁布之初，军部法西斯就直接派人劝说宇垣不要受命。宇垣受命之后，军部不合作，不推荐陆、海军大臣。宇垣企图再度依靠天皇权威压军部合作。宫内府表示无能为力。对这一事件，宇垣自己评论道：“现在正处于是要法西斯还是要日本固有宪政的分歧点之上。”^①法西斯军人则得意地说：扼杀了宇垣内阁，这是“第二次合法的二·二六事件”。^②它进一步巩固了军部的法西斯统治。

继军部法西斯化之后，军部政治支配地位和法西斯政权的确立，结束了日本国家法西斯化的第一个阶段。此后，主要是在1937年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到1940年建立大政翼赞会，在军部的推动和统治集团的支持下，加速了自上而下的全面法西斯化，近代天皇制完成了向法西斯体制的演变。

① ② 秦郁彦：《军队法西斯运动史》，第189页。

第四节 近代天皇制向法西斯体制的演变

日本近代天皇制是根据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而确立的，也称明治宪法体制。明治宪法颁布后，直到1946年修改宪法之前，未作任何改动。然而，近代天皇制却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动，其中以1931——1945年期间的变动最为显著。

近代天皇制包括阶级性质和结构功能两方面。前者与国体是一回事，近代天皇制实行的是资产阶级地主专政。从一次大战前后起，操纵、影响这个政权的主要阶级势力是财阀。对于近代天皇制的结构功能，通常只注重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或统治机构，其实还应当重视统治方式和统治机能。一般而言，政治体制的结构功能基本上取决于政体，然而有时同样的政权组织、统治机构却可以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起着不同的统治机能作用。近代天皇制统治从藩阀专制到政党政治，再到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演变，既有结构、机构的变动，也有统治方式和统治机能的变动。

对于近代天皇制在1931——1945年期间是否演变为法西斯主义体制的争论，不在体制的阶级性质方面，这方面在1931年以前和以后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争论是在体制的结构功能方面，对于这方面是否有变化和什么性质的变化存在分歧。

否定论中比较有影响的想法，是把1931~1945年的日本仍称为军国主义国家，或者把当年日本的国家体制称为战时体制。要辨明肯定论与否定论的孰是孰非，须涉及“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战时体制”这些概念，但也不一定非从概念入手不可。一个事物的特性决定于它的内在结构，而且是在同其他事物的对比中显现出来的。要弄清日本近代天皇制是否演变为法西斯主义体制，

一个有效的办法是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分析，明瞭原来的近代天皇制到1931年后发生了什么结构性功能性变异，明瞭二次大战期间日本的统治体制与同一时期德意的统治体制，与美英的战时体制，有何共同性或差异性。

近代天皇制的两重性

先从纵向对比入手，大体以1931年为界，考察近代天皇制在此以前和以后的差异。在此之前，近代天皇制统治由藩阀专制进到政党政治，但是它的基本结构不变，在统治机构、统治方式和统治机能方面，始终保持着它的主要特征：两重性。其表现如下：

第一，专制统治与一定程度的立宪政治同时并存。

一方面是天皇以及天皇通过文武官僚总揽统治大权。宪法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权，有权裁可法律，召集帝国议会，解散众议院，发布代替法律的紧急敕令，制定官制并任免文武官员，统率陆海军，实行宣战、媾和、缔约以及宣布戒严等。^①几乎所有大权均归天皇总揽，天皇则通过身边的文武官僚行使统治大权。这种专制性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赘述。另一方面是议会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力。人们往往强调当年日本议会作用的有限性，甚至认为议会仅仅是一种“立宪伪装”。是的，日本议会的权力不大，但并非纯属“立宪伪装”，它还是有着不可忽视的一定的地位和作用。

其一是有一定的立法权。明治宪法规定，“天皇以帝国议会之协赞行使立法权”，“凡法律须经议会之协赞”，天皇则有权“裁可法律”。伊藤博文在《宪法义解》中对此解释说：“议会为参与立法者，而非分有主权者，有议法之权而无定法之权，^②最后决定法

^①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译文全文见金长佑《日本政府》附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② 转引自金长佑同上书，第227页。

律的大权归天皇所有。从宪法条文看，议会审议的法律主要是有关国民权利与义务的事项；有的事项不由法律规定，而属天皇大权事项。议会权力确实受到很大限制，但法律不经议会的“议”和通过，天皇是无权“定”的。即使天皇可颁布有法律效力的紧急敕令，事后也必须取得议会的赞同才能继续有效。可见议会有一定立法权，天皇权力并非毫无限制。这使文武官僚不能利用天皇大权任意侵犯、改变国民应有的权利与义务。

议会的主要权力之二，是预算的审议权。宪法规定，议会无权任意削减政府符合规定的正当开支，但增加预算支出非经议会同意不可。在增加预算这点上，天皇在一般情况下绝无作出决定的权力。除非“有紧急需用”而又不能召集议会时，可用紧急敕令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以后再求得议会的同意。实际上，并未发生这种特殊例外情况。宪法还规定，政府的预算案（实指增加预算的方案）未得议会通过时，可执行前一年度的预算。政府除了少数财政紧缩年份外，不增加财政支出是办不到的。因此，预算审议权是使内阁有求于议会、受制于议会的主要手段。从日本议会最初召开之时起，以众议院为地盘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党就在预算问题上同内阁对抗，使得藩阀政府排斥政党的“超然主义”^①很快破产。

起码在上述两件大事上，天皇离开了议会的赞同是无权擅自作出决定的。此外，议会还有对内阁的质询监督权。天皇和官僚的权力受到议会的一定的制约，这是无可置疑的。当然，不可忽视天皇拥有的权威，可以用来左右议会的意向。如1893年，议会削减政府预算中的军舰建造费等开支。天皇就让枢密院进行审议，并从皇室财产中拨出巨额造舰款项，迫使议会放弃自己的企图。又如1925年议会通过了内阁根据枢密院的要求而制定的《治安维

^① 指政府“超然于政党之外”，对政党“不偏不倚”。

持法》；1928年内阁又利用紧急敕令修改了这一法令，加重了刑罚。后来议会在既成事实面前加以承诺。这类事例虽有，但也并不多见。

一定程度的立宪政治，还表现在实行一定的地方自治。19世纪70、80年代，召开了选举产生的府县会、市会和町村会，它们的共同主要权限是审议地方的预算、经费。府县会的权力很小，府知事、县令由中央政府委派，拥有发布府县令、行政管理、任免府县官吏等权力。到1929年，府县会才有地方自治立法权。市、町、村的地方自治范围略大一些。市会有权推选3名市长候选人，由内务大臣从中确定一人为市长。1926年市长改由市会选举。1888年修改町村制后，町长、村长由町会、村会选出。^①

这样的双重结构符合上层统治集团和资产阶级地主的需求。天皇制的专制权力可用来加强内部统治，尤其是可用来压制革命力量、进步力量的发展，当然也有利于对外侵略扩张。赋予议会一定的权力，主要是有利于维护资产阶级地主的权益，有利于调节统治阶级中当权集团与非当权集团的关系。实行一定程度的宪政，包括实行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也有助于把小资产阶级，首先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吸引过来，成为天皇制的社会基础。

第二，天皇总揽大权与多头分权并存。

天皇总揽统治权，不仅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统帅权，还有文权，并在实际上拥有财权。所谓文权，是指天皇既是君又是师，有权为国民规定思想道德准则，如发布《军人敕谕》、《教育敕语》。所谓财权，是指天皇拥有数额极大的财产，可以运用这种经济权势来干预、左右政局。这在明治年代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在实际政务中又不是天皇一人大权独揽。宪法规定，天皇行使大权要由各种机构进行“辅佐”、“协赞”。就是天皇发布诏书、

^① 大藏会编：《内务省史》第二卷，原书房1980年版，第339页。

敕令时，也要总理大臣和有关国务大臣副署。因而，存在着多头分权，诸如内阁、议会、军部、枢密院以及元老、重臣等宫内集团。就连内阁中的各国务大臣、军部中的陆海军各首脑机关、议会中的贵族院、众议院，都是各自平等独立的。

集权与分权并存，反映了统治阶级各个集团的共同利益与相互矛盾。同时，这种状况也是天皇制本身结构性矛盾的产物。一方面要强调、依靠天皇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另一方面又不可能集大权于一身。天皇经常亲躬政务是不允许的。百事多管难免出差错，会有损天皇这个“现人神”的神圣光辉。天皇也不把大权交给某一个人或某一机构，因为鉴于历史上幕府专权的教训，竭力避免这样做。另外，鉴于欧洲工人运动、社会主义的壮大，天皇制十分重视防止政党掌握大权。今天让地主资产阶级政党掌权，明天社会主义政党就有可能掌权，因而设立种种机构，不仅牵制议会，也要牵制内阁。

近代天皇制的分权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而是多头分权，除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外，统帅权是独立的，还有别的权力。有的权力占有特殊地位，如元老在实际上掌握了组阁大权，内阁更迭时继任首相是由元老推荐的。所以有人认为，日本名义上是天皇政治，实际上是元老政治。枢密院作为天皇的咨询机构，实际上它的表决就等于天皇的意志，可以否决议会的决议案和内阁的决策。军部可以凌驾于内阁、议会之上，恣意干涉政务，造成“双重内阁”、“双重外交”。这种种特殊权力又都是同天皇总揽统治大权联系在一起的。

不过，各种机构、权力之间也有或大或小的相互牵制，尽管这种牵制是很不均等的。就以议会来说，它不仅对天皇、内阁，也可以对军部进行一定的制约。议会自然无权干涉统帅权，然而军部要扩军，采取军事行动，要议会同意拨给必需的经费，因而也多少有求于议会。到20世纪20年代，实行由众议院多数党组阁

的政党政治，进一步加强了议会的地位。

第三，政治上、思想上的高压统治与一定程度的基本人权和一定范围的自由主义同时并存。

在近代天皇制统治之下，国民的政治活动受到严格约束，革命力量受到残酷镇压。1900年颁布的《治安警察法》对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和罢工作了种种限制。按它的规定，政治结社、集会必须向警察局申报。开会时警官临场在讲坛旁边监督，一有他认为“不稳”的言论，就用带鞘的军刀敲响地板，以示警告。如不听从，就有权制止发言或拘留演讲者，甚至解散集会。20年代起，政府又用《治安维持法》镇压革命的、进步的力量。三番两次地进行全国大逮捕。与此同时，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国民享有起码的基本人权；工人、农民和其他国民可以建立工会、农会和民主结社。一次大战后，对于一般工农运动的压制有所缓和。1925年实行了男子普选权。当时日本国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很有限，但与德川幕府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状况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是有明显进步的。

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青少年和国民不遗余力地灌输有关天皇的神话、天皇主权说、忠君爱国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在六年小学义务教育和两年服兵役期间，进行最为严格的灌输，此外还有种种渠道。革命思想被视为大逆不道，受到严厉压制。

同时，在不反对天皇制的前提下，允许某些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允许学术研究的一定自由。大学内部实行以教授为中心的大学自治，政府不直接干涉大学的内部事务。于是，在大正民主运动中，同专制思想对立的民本主义^①得以流传，与天皇主权说不同的天皇机关说得到宪法学界的公认。在学术界，出现了与官

^① 民本主义以吉野作造为主要代表，承认天皇总揽统治权，但认为天皇大权的运用应以民众为本位，施政必须重视民众的意向，要求实行普选、加强议会的地位和作用。

方正统思想不尽合拍的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如津田左右吉的《神代史研究》。^①对于思想和学术领域的政策，天皇裕仁曾表示，不能以思想信念去压抑科学研究，否则世界就不能进步，两者应当并行不悖。^②也就是说，必须对青少年和广大国民灌输官方正统的思想信念，对于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则允许一定的学术自由。

第四，国家握有广泛的权力，但国家权力与社会生活基本上实行二元主义^③。

在经济领域，政府的作用和私人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是很大的。不过，政府对私人企业采取的是经济保护政策，并非直接的干涉和控制。对日常生活，国家通过倡导正统道德规范以及颁布《民法》等手段，确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但对国民的个人生活一般不加干涉和控制。

总之，近代天皇制既有浓厚的专制、集权和军国主义的成分，又有一定的立宪、民主和自由主义的成分。对任何一面有不切实际的夸大或不应有的忽视，都不能正确认识近代天皇制。在说明这种两重性时，对于后一方面写得多一些，这是因为后一方面过去往往被忽视、抹煞，而且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同1931年以后的演变作对比。明确了近代天皇制的两重性，就可以知道它并非封建专制统治体制，当然也不等同于英法美的君主立宪的或共和民主的统治体制。它是天皇总揽统治权，并设置各种机构、包括议会辅佐天皇行使统治权的君主立宪体制，是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军国主义因素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体制，或可称为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

① 津田左右吉根据严密的文献考证，撰写了《神代史研究》(1919)著作，指出《古事记》、《日本书记》记述的古代神话传说有虚构失实之处。他有独到见解的研究，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

② 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岩波书店1982年版，第55页。

③ 参见山口定，《法西斯主义》，有斐阁1979年版，第182~183页。

明确了近代天皇制的两重性，可以进一步从体制本身去揭示近现代日本政治的演变。由于存在两重性，在某种客观情况下，两重性的各自比重可以变动。这样，就可以在近代天皇制的范围内，允许、容纳不同的政治演变。明治、大正年间的总趋势，是立宪、民主、自由的一面得到加强、扩大。1890年实施宪法、召开议会后，仍然实行藩阀专制。可是，藩阀政府很快就知道，要完全排斥议会、政党是办不到的。从20世纪初起，开始了从藩阀专制向政党政治的过渡。由于大正民主运动的推动和一次大战后的新局势，终于在20年代中期实现了政党政治。与此相应，国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也有所扩大。近代天皇制的这一重大演变意味着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向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靠近，这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

当然，这种“靠近”、“进步”受到近代天皇制两重性的制约，是有限度的。政党政治没有改变天皇的地位和军部、枢密院等机构的特权。政党政治也没有从制度上得到有力的保证。由众议院多数党组阁仅仅是一种惯例，这种惯例的实行主要取决于元老西园寺公望个人的意向。西园寺是元老中最有民主倾向的人。1924年后又只有他一个元老，他实行了前述惯例。他也尽力培养、教育裕仁，在实际上成为一名英国式的立宪君主。但是，光凭个人的意向是极不牢靠的。一旦客观情势发生变化，近代天皇制就可以很容易地向着另一个方向演变。

结构性的体制变动

日本军部于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接着在1932年5月扼杀政党政治。近代天皇制开始了新的演变。1936年广田内阁时确立军部的政治支配地位，标志着法西斯体制开始形成。继而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此后，加快了

统治体制的进一步改组，到1940年10月建立大政翼赞会。用了10年时间，完成统治体制的改组与演变进程。

这时的统治体制虽然保留着天皇制机构，但是统治机构间的相互关系已有重大变化，更重要的是统治方式和统治机能已与原来大不相同。这种变动不是局部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立宪的一面有名无实，议会从属于内阁、军部。

自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主要由于临时军事费，国家预算支出猛增。1936年的岁出总额为22亿多日元，1937年跃升为47亿多日元，其中临时军事费超过20亿日元。以后临时军事费越来越大，为一般会计岁出的2~3倍，成为国家财政支出的大头^①。庞大的临时军事费是在议会的秘密会议上通过的，以军事机密为理由，不许进行任何质询。1936—1944年，国家总支出增加36.6倍，其中非军事开支仅增加近8倍，而军事总支出却增加了68.3倍。^②一般会计支出虽交议会审议，只不过是压缩其他开支以尽力满足军费需要而已。议会的预算审议权已完全屈从于军部的意志，并无多大实际意义。

1938年4月和5月，公布并实施《国家总动员法》，规定对于人力、物力的动员、统制，诸如国民的动员、征用，物资、金融、企业、设施、进出口、物价、工资、利润以及出版的统制。内阁有权不经议会而采用敕令、命令加以实施。这就把涉及国民权利与义务的广泛领域的立法权，从议会转到内阁手中。正如有的议员所说，根据这个法案，“国民的自由财产就完全任凭政府处置了”。^③在议会审议时，不少议员纷纷议论，这不等于纳粹

① 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1》，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149页。

② 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的历史分析》，御水之茶书房，1972年版，第170页。

③ 《资料日本现代史11》，大月书店1984年版，第10页。

的授权法吗？如果通过这个法案，议会就不需要了。^①元老西园寺公望听说这个法案后讲：“就实质而论，这个法案归根到底是一个无视宪法的法案，还是不通过为好吧！”^②然而，在军部的压力下，议会未作任何修改即通过了原案。议会仅有的一点立法权大为削弱。

两项主要权力被严重削弱，议会已近乎有名无实。在1940年的近卫新体制运动中，所有既存政党全部解散，并于10月成立大政翼赞会。议员不再从属于政党，而被置于大政翼赞会议会局的领导之下。不久，由于议员的反对，议会局撤消，议员脱离翼赞会，组成翼赞议员同盟等议会的内团体。1942年东条内阁实行官方推荐候选人的翼赞选举，接着成立了翼赞政治会，议员除8人外全部加入，原来的议会内团体全部解散。

翼赞政治会的主要纲领是：“基于国体之本义，结集举国的政治力，向着完成大东亚战争的目标迈进”；“恪遵宪法条款，确立翼赞议会”。所谓“结集举国的政治力”，“确立翼赞议会”，就是把原来各党各派的议员统一组织起来，使议会完全追随、屈从于内阁。受东条委托，负责推动翼政会成立的军务局长佐藤贤了，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战况良好的时光，（翼政会）的确做到了名副其实的举国一致，它充当政府的与党，在议会里掌声大作，不表示反对，也不再放声恶骂。对于政府的施政演说、财政演说、陆军大臣的战况报告、致出征将士的感谢决议以及前方来的答谢电，都报以特别热烈的鼓掌。对于预算案、法律案，议会也有一般的质问，实际上不过是完全从属于政府的翼赞机关。”^③一言以蔽之，议会翼赞化了，不再是对政府进行一定制约的机构，完全变成内阁的附属物。居于内阁之上的则是军部，第三节对此已有

① 中村隆英，《昭和经济学》，岩波书店1936年版，第114—115页。

② 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第6卷，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249—250页。

③ 升味準之辅，《日本政党史论》第七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版，第339页。

所阐述。

地方自治的重要权限也被取消、缩小。经过1943年对地方制度的修改，县会不再享有地方自治立法权；市长不再由市会直接选举，而从市会推荐的三名候选人中经敕裁任命；町村会选出町长、村长后要由府县当局认可。

第二，国民一定的民主自由权利被剥夺，实行全面高压统治。

对于日本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反战力量的镇压变本加厉。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1931—1933年逮捕了38982人，其中被起诉的2238人，为前三年(1928—1930)逮捕总数的269%和被起诉总数的182%。^①以后，大大小小的逮捕一直在进行。1937年12月和1938年2月的两次人民战线事件中，迫害也落到了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头上，共有400余人被捕。^②当时，只要不肯誓做战争合作者的，不论其立场如何，都被打上共产主义烙印而逮捕。^③

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也遭到无端的攻击和制裁。1933年泷川事件、1935年国体明征运动、1939年津田左右吉事件以及其他思想文化压制层出不穷。京都大学法学教授泷川幸辰，只因主张应该看到犯罪的社会原因，判刑时须顾及教育作用，并提出通奸罪只处罚女方是不公平的，就被右翼分子攻击为“赤化思想”。文部省不顾京都大学教授会和一些学校学生的反对，给泷川以停职处分，有关著作被禁。

① 大藏会编，《内务省史》第二卷，原书房1980年版，第674页。

② 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日本共产党人建立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活动很快遭到镇压。在各国人民阵线运动的影响下，日本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有所响应。日本当局以企图建立人民战线的罪名，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2月，逮捕日本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会的干部，以及劳动派理论家、学者，共400多人。劳动派是左翼社会民主主义集团之一，以创办理论杂志《劳农》得名。

③ 藤原彰，《日本近现代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0页。

在国体明征运动中，天皇机关说遭受拥护国体联合会、在乡军人会、贵众两院和军部的联合围剿。这个学说多年来一直在大学讲授，而且是高等文官考试的公认内容之一，连天皇裕仁及其身边的元老、内大臣都是赞同的。当美浓部达吉在贵族院对攻击进行反驳时，曾四处响起掌声，这为以往所罕见。可是，他还是被扣上“紊乱国宪”和“不敬罪”，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其著作被禁。国体明征运动是政治思想上的大反动，在“政党政治”被搞垮后，进一步在思想上扼杀了民主主义。当年的检察官就称这是一次“合法无血政变”。^①

津田左右吉因《神代史研究》等著作的学术性、独创性而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却被指控“冒渎皇室尊严”，受到20多次审讯，并被判刑（因失时效而未执行）。总之，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也被视为大逆不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荡然无存。

高压甚至扩大到宗教信仰领域。1935年和1936年，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和“不敬罪”取缔了大本教^②和人之道教团^③，数千有关者被捕。1937年和1938年，被扣上同样罪名的宗教案件分别为8起和9起。^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厄运也落到基督教徒头上。

为了准备和进行太平洋战争，专制高压越来越厉害。1940年12月，成立了宣传、出版、新闻、广播的统制机构内閣情报局，它向各出版单位通知了“禁止写作”的名单，其中包括自由主义

① 《现代史资料4》，第347页。

② 大本教，1892年建立。采用神道的神话、礼仪，反对物质文明，主张“改建重建”世界，实现理想的“水晶之世”和“地上天国”。它反映、迎合下层群众的不满和期待。1921年曾遭镇压。30年代初又得到大发展。1933年改称“皇道大本”，鼓吹“皇道维新”，与政府内外政策积极呼应。其地方成员却趋向激进，要求立即实现“一大变革”。1935年12月大本教总部成员和大批信徒被捕。战后恢复活动。

③ 人之道教。前身为1924年建立的人道德光教，1931年改称人之道教。以《教育教语》为教典，鼓吹顺从，勤勉、夫妇和睦等道德。参与煽动战争狂热。认为天照大神就是太阳。1936年以“不敬罪”被镇压。战后重建，改称PL教团。

④ 《资料日本现代史10》，大月书店1984年版，第295页。

者。它规定各综合杂志必须按月送审编辑计划和作者名单。

1941年5月，实施再次修改的治安维持法，新增“准备结社”罪，并实行“预防拘留”制度，对于刑期已满但可能重新活动的政治犯、思想犯继续实行无限期拘留。这次新的修改，特别是“准备结社”罪，可以让警方更加任意罗织罪名，扩大镇压范围。

1941年12月颁布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规定原有的结社要重新上报审批。在大政翼赞会成立前后，所有非官方的工会、农会、包括右翼的日本劳动总同盟和日本农民组合，全都已经解散。根据这个法令，凡是不同官方同心协力的政治结社均遭取缔。这个法令还规定，传播“流言蜚语”、“惑乱人心”者将受刑罚。老百姓连吐露不满，发点牢骚的权利也没有了。政府甚至利用宪兵来侦查所谓“流言蜚语”事件。

1942年发生的横滨事件，是如何捕风捉影、滥施镇压的一个典型事例。细川嘉六因“笔祸”被捕，从他家中搜出一张宴请友人的照片。特高警察据此编造了一个密谋重建共产党的案件，严刑逼供，辗转牵连，逮捕30多人，4人死于狱中。《中央公论》、《改造》因受株连而被勒令停刊。

战争期间，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者共约54000人。在全面高压统治下，正常的法制被践踏，起码的人权无保障，这同纳粹德国并无两样。

第三，全部社会生活都处于政府自上而下的严密控制之下。

1937年7月起，特别是同年10月成立企划院和1938年5月实施《国家总动员法》之后，官方直接进行的经济统制逐步、全面展开。1918年制定的《军需工业动员法》第一次付诸实施，还陆续颁布实施《输出入品等临时措施法》、《临时资金调整法》、《电力国家管理法》、《工资物价冻结令》、《总动员物资使用征用令》、《工厂企业使用征用令》、《土地、营造物的管理使用征用令》、《生活

必需物资统制令》等一系列法令。

1940年12月公布《确立经济新体制纲要》。1941年8月公布《重要产业团体令》。随后，在工矿、金融、交通运输部门成立了24个统制会。政府任命财阀、大企业领导人任统制会会长。政府与财阀合为一体，直接操纵着企业的经营活动以至存亡命运。大批中小企业，主要是民用的中小企业被停被并。

在农业方面，通过1932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更生运动，强化了统制系统。普遍建立了村的农业组合和自然村的农事实行组合。政府通过府县和市町村农会，产业组合、农事实行组合，把全部农户的生产经营置于层层控制之下。通过产业组合、农事实行组合，规定作物种类、分配农业生产资料、收购贩卖农产品。

从1938年下半年起，国民统制提上了日程。后来颁布实施了《国民职业能力申报令》、《雇佣人员限制令》、《国民征用令》等法令，并实行《国民劳动手册》。在政府指定的一百多个行业里，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不向雇主交出劳动手册者不得雇用，而雇主却可以拒绝把劳动手册发还给企图不再受雇的工人。政府先后征用了600多万人到指定的企业、部门劳动、工作。

随着1940年新体制运动的推进，对国民的统制全面体制化。国民普遍被置于官方自上而下、交错重叠的控制之下。主要有以下三种组织系统：

一是大政翼赞会。它由首相任总裁，在各地直至町村建立支部，由同一级的行政首脑任支部长。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翼赞会网罗各界人士组成协力会议。翼赞会的宗旨是“实践大政翼赞之臣道”，做到“上意下达，下情上通。”实际上，它不过是便于政府假借民意，把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至于“下情上通”，完全是句空话。东条内阁的国务大臣安藤纪三郎，在贵族院答辩时直言不讳地承认：“大政翼赞会受首相的监督，各省大臣通过大政翼赞会，对于同所管行政有关的国民运动加以指导。作为民间团体的大政翼赞会，

并没有对国民运动提出独自的意见和要求”。^①

二是按职业、年龄或性别组成的官方御用团体，诸如日本农业报国联盟、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商业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人会、日本文学报国会、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等等。它们是各行各业、青少年和妇女的唯一组织，原有的民间团体不复存在。它们把各行业和各方面的国民尽可能地纳入自己的组织之中，大为改变了原来日本社会团体组织率不高的状况。如工会人数最多的1931年，其组织率不过7.9%；而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在1940年11月建立时，其组织率即达66%^②。这些团体都处于官方直接控制之下，如大日本产业报国会，以厚生大臣为会长，在地方上以警察署管区为单位成立支部联合会，由警方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其他团体也受相关省厅领导。

三是按居住地区编组的町内会（街道组织）、部落会（自然村组织）和邻组。这类组织原来就有，但并不普遍，而且主要是城镇居民的社交性、互助性团体或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协作的农村共同体组织。30年代，町内会、部落会逐步普及。在1940年的新体制运动中，内务省发布了整顿加强町内会、部落会、邻组的训令，规定它们的任务是“使国策广泛贯彻到国民中去，为万般国政的顺利推行效力”。^③把它们变为政府的基层行政辅助组织。为了最有效而迅速地把政府意图贯彻下去，实行全国统一指导的町内会、部落会定期例会制度。^④在町内会、部落会之下，每一邻组大约10户居民，实行相互监督，并配给生活必需品。

为了使自上而下的统制更为集中统一，东条内阁于1942年把各界报国会和青少年团、妇人会，以及町内会、部落会、邻组一

① 过明清：《日本官僚制度研究》，弘文堂1954年版，第224页。

② 山口定：《法西斯主义》，有斐阁1979年版，第222页。

③ 《内务省史》第2卷，第194页。

④ 《内务省史》第2卷，第528页。

律置于大政翼赞会的领导之下。通过这一套组织，国民不仅在政治上，甚至连细小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严格的监督与干涉。^① 举凡应召入伍、征用国民、强化储蓄、推销国债、国防献金、厉行节约、反对“奢侈”、废物利用等等大小事务，都强制性地贯彻到每家每户。

与经济统制、国民统制形成三位一体的还有精神统制，即思想文化统制。1935年国体明征运动后，文部省设立教育刷新评议会，讨论“刷新”学校教育和国民教化。1936年内阁成立情报委员会，次年它提出了《国民教化运动方策》，得到内阁批准。1937年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从上到下层层建立有关机关，并以町内会、部落会、邻组作为基层实践网，把全体国民纳入运动。后来，大政翼赞会继承了精神总动员工作。1937年情报委员会升级为内阁情报部，1940年又改组为内阁情报局，作为统一主管思想、文化、舆论统制的官方机构。一切与官方不同的声音全被压制，官方不允许的外来信息完全被阻断。

所谓精神统制，就是以天皇制意识形态统一、控制国民思想。教育刷新评议会提出：“在我国，祭祀、政治、教学在根本上一体不可分”，要求清除与此相反的“多年来输入的西洋思想、文化的弊害”^②。《国民教化运动方案》提出，国民教化的要领在于“培养官民一致、劳资协力、各尽臣节、扶翼皇运、恢弘天业之观念”。^③ 这些主张为国民教化、精神总动员定下了基调。在学校教育中，强调皇道精神，反对“偏重智育”。在思想文化界，提出了“超克近代”、“回归日本”的口号。甚至要求自然科学家去建立什么“日本的”科学、“皇道的”科学。皇道思想、日本主义和各种反民主

① 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岩波书店1982年版，第172页。

② 《日本法西斯主义 I，——形成期研究——》，第79页。

③ 《资料日本现代史10》，第7页。

反科学的反动倒退论调大泛滥。

精神统制的本质是推行现代愚民政策。京都学派的田边元，在他还未完全倒向极端国家主义的时候，曾尖锐地批评当局“层层相戒，要打破偏重智育的弊害”，实际上是“限制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取而代之的是致力于鼓吹情操和信仰”。这种做法的目的，“一言以蔽之，不外乎为了模糊对现实的认识，麻痹对现实的批判，全面抑制伴随这种认识、批判而发生的革新意志，使之满足于维持现状。这就是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能不说是反民众思想的暴露。”^①如果说明治维新提倡“文明开化”，“求知识于世界”，那末战时精神统制完全背道而驰。

这种自上而下、广泛全面、重重交错的控制，当年被称为“一亿总组织化”。战后日本学者称之为“强制的同质化”。前一说法指明了前所未有的现状，但是只停留于事情的现象，后一提法则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使国民强制地、绝对地服从国家权力的意志。这种“强制的同质化”，否认任何的民主、自由、个性以至私生活。如文部省编写的《臣民之道》竟然宣扬说：“我们平日所谓的私生活，归根到底是在实践臣民之道。国民的营业是为了翼赞天业，具有公的意义……虽是游耍、睡眠，也并非与国家无关的私事，一切都与国家联结在一起。我们在私生活中不可忘记尽忠天皇，为国效劳。”^②连睡眠也要尽忠报国，真是荒谬绝伦到了极点。1941年开展生育运动，以提高出生率。女子青年因为政府的计划奔走呼号，“推动女性从个人主义的结婚观转换为国家的结婚观，要让年青的女性醒悟到母性就是国家的命运”。^④有7个子女的东条英机的妻子也亲自出马现身说法。这里的问题不是一个

① 《日本法西斯主义I，——战争与国民——》，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4年版，第58页。

② 日本文部省《臣民之道》，朝日新闻社1941年版，第80—81页。

④ 《日本法西斯主义I》，第190—191页。

国家该不该有生育计划，而在于所谓的“国家的结婚观”。男女婚配就是为国家生儿育女，这同希特勒说的“结婚本身不应该是目的”，其任务在于“保种保族”^①如出一辙。面对这种反常情况，哲学家三木清在1938年写了《个性与幸福》一文，痛心指出“不考虑幸福是今天人们的特征”，近年出版的伦理学著作几乎不涉及幸福问题。这不是因为人们已经幸福，相反“我们这个时代的 不幸已经到了人们甚至丧失考虑幸福的气力的地步。谈幸福似乎变成了什么不道德的事情，这不正是当今世上充满着不幸吗？”^②

战争期间以上三个方面的体制变动比之20年代过渡到政党政治的变动，不仅涉及面更广，而且要深刻得多。20年代的变动是在保留近代天皇制基本结构的前提下，提高了议会的地位，加强了立宪、民主一面的比重，是一种局部性的变动。战争期间的变动虽然没有全部改变近代天皇制的权力关系，但不仅仅是限于两重性比重大小的逆转，而是一种结构性的体制变动。在原有统治机构、方式、机能的两重性中，除了天皇总揽统治权和多头分权还大部保留之外，一定的立宪、民主、自由的一面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军部和内阁权力的恶性膨胀，全面高压统治，以及政府权力对国民和社会几乎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极权统制。这样的体制变动与对外侵略战争紧密相关，是为了对外侵略战争而引起的。扩充军备、战争动员和对外侵略扩张的不断加强、升级，国家生活全面转上战时轨道，是体制变动、体制构成的主要内容之一。这种首先服从于对外侵略扩张，同时对内实行高压极权的统治体制，当年日本称之为“高度国防国家体制。”

如果说原来的近代天皇制具有两重性，属于资产阶级君主立宪体制的范畴，那么高度国防国家体制虽然还保留着君主立宪的

^①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第125页。

^② 石关敬之：《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载东京大学《社会科学 研究》，1973年第3号，第6—7页。

外貌，但与君主立宪体制几乎没有什么基本共同点。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实质是法西斯极权主义统治体制。

高度国防国家即法西斯体制

1934年10月的陆军小册子《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是建立高度国防国家的纲领，前一节已对此作了评述。高度国防国家体制与原来近代天皇制有所不同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国家权力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一元化综合统制。”

陆军小册子主要从“国防”(对外侵略战争)的角度说明了“一元化综合统制”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国防国策”。此后，为了推进一元化综合统制体制的建立，日本官方、御用学者进一步从日本国体的特殊性出发，论述了天皇权力、国家权力的绝对化及其“合理性”。1935年夏天，当国体明征运动尚在进行时，文部省为了明确国体，举办了宪法讲习会。日本的伦理学泰斗西晋一郎作了题为《日本国体》的演讲。西晋说什么“我国有君权而无民权”，天皇出于爱民之德，在宪法中“以君权定民权”。同样，在日本，“国家生活(指国家的活动)遍及生活的所有领域，……一切社会生活都绝无例外地处于国家的一统之中”。^①也就是说，除了君权和“国家生活”之外，全面否定了国民的个人利益和人们的私生活。

1937年春，文部省主持编写出版了《国体之本义》，作为国民教化读物，头一次的发行量就达30万册。它强调日本是“一大家族国家”，天皇与臣民有着特殊关系，与西洋诸国的“根本思想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反，我国国民性的特色是“舍己无私的精神”，“我们生来就是为天皇效劳，替皇国行道的”，我们的职责就是“通过否

^① 《现代史资料5》，第268页。

定小的自我，为大的真的自我作出奉献”。^① 它只承认以天皇为首的国家(大的自我)才是真实的存在，完全否定了国民的个人价值。

1937年起，田边元发表了若干鼓吹极端国家主义的著作，论证了“全体即个体”、“自我牺牲即自我实现”的命题，认为体现这一命题的组织只能是国家。^② 换言之，所有的个体和个体的一切都包含在国家这个全体之中，国家是绝对的。

上述论调带有浓厚的传统天皇制意识形态的色彩，或者受到以往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它们如此强调天皇权力、国家权力的绝对化，完全是有意地建立高度国防国家体制，为实现一元化综合统制这一现实提供理论依据。

明确了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指导方针及其有关理论和具体实践之后，进一步通过横向对比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日本的国防国家体制与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有着基本共同之处，高度国防国家体制是法西斯主义体制。

法西斯主义体制具有区别于其他统治体制的若干特征，它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极权主义统治。法西斯极权主义包括公开恐怖镇压，更重要的还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实行极权主义控制。法西斯主义创始者墨索里尼有一句名言：一切都存在于国家之中，在国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因此，他公开宣布，“法西斯主义是极权主义的”，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坚决反对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主张法西斯国家拥有绝对权力，甚至拥有“毫无阻力地主宰人心的权力”^③。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最高主宰是少数“被挑选出来”的人。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的“总体国家”(或译“整体国家”)就是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的样板。

①② 石关敬三，《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载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1973年第3号。

③ 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政治和社会学说》，译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10期。

希特勒鼓吹建立“大德意志国家”，建立“德意志民众共同体”。至于如何建立，除了以领袖原则取代议会民主制外，他的论述含糊不清，泛泛而谈。纳粹的行动是参照了法西斯意大利的^①。他们全面推行“民族社会主义一体化”，其实质就是全面贯彻极权主义。“第三帝国”的极权主义与意大利的“总体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们往往把“极权主义”加以广义的解释和运用，认为在古代就有了极权主义国家，甚至把30、40年代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等同于极权主义。其实，“极权”一词是墨索里尼的创造^②，极权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所特有的概念和实践。极权主义的主要内涵是，不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且也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实行公开恐怖或全面高压统治；否认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阶级压迫的工具，标榜建立起阶级的全民族的政权，同时又否认国家利益之外还存在着社会集团和个人的利益，认为国家是所有社会集团和个人的全部利益的唯一体现者，从而享有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不仅在政治上实行权力的极端集中，而且对经济、意识形态和一切生活领域，对所有社会集团以至个人，实行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全面统制；鼓吹对外侵略扩张是国家的权利和使命，并借助全面统制，把全部国力动员集中起来，用于对外争霸的侵略战争。法西斯极权主义集历史上反动统治之大成，又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某种特定条件上的极端反动的统治形态，具有自己的特定内容。确定一个体制是否极权主义体制，不能仅仅以个别或局部现象作简单的类比，必须全面把握极权主义的各个主要侧面。

过去，通常都把法西斯体制概括为对内恐怖镇压，对外侵略

^① 参见卡尔·D·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67、379页。

^②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4册第205页“极权主义”条目。

扩张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并未反映出法西斯体制最根本的特征，特别是对内方面的概括很不确切。应该说，法西斯体制最本质的特征是极权主义统治，其理由如下：一、极权主义统治必然伴随着公开恐怖、高压统治，然而更大量、更常见、更普遍的则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实行极端集中、包罗万象的全面统制。

二、极权主义是同扩张主义联结在一起的，极权主义体制是最适合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统治形式。1936年，德国陆军新闻处处长撰写了一本得到陆军部长赞同的小册子《纳粹革命的军事意义》，其中强调指出，战争的总体性要求动员国家的一切智力、人力和物力，而纳粹国家是符合这种战争的要求的^①。

三、极权主义统制是法西斯体制区别于其他反动统治体制的最重要的特征，这种统制的全面广泛、严密苛刻是历史上任何的中央集权、专制独裁所望尘莫及，也是以前的反动统治因种种条件限制，即使想做也做不到的。

与德意法西斯主义体制的理论与实际相对照，不难看出，一元化综合统制不过是极权主义的同义语，高度国防国家体制不过是日本版的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这不仅有前述事实与言论为证，而且，日本当权人士也直言不讳，承认当年他们同德、意一样，以极权主义作为行动准则。当时，日本一批新官僚是军部推进国防国家体制的得力同伙。1938年，著名的递信省新官僚、企划院书记官奥村喜和男(1900—1969)在《日本的政治革新》一书中指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弊端“积累到了极点”，必须进行“变革刷新”，其指导原理和理想的社会体制，就是“用极权主义(日文为全体主义——引者注)取代个人主义”^②。另一著名的外务

^① 参见杜德：《世界战线上的不列颠》，译载《群众》第8卷(1942)第14、15期合刊。

^② 转引自《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I)，有斐阁1970年版，第249页。

省新官僚的代表人物白鸟敏夫(1887—1949。年1938)任日驻意大利大使。曾积极推动缔结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日德意轴心论》中划分了当时两个对立营垒的不同体制与意识形态，指出一方面是“英法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体制”以及“与所谓民主主义意识同样片面的共产主义宇宙观”，另一方面是与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完全不相容的日德意的“极权主义”^①。他明确地肯定了日本在体制与意识形态上与德意极权主义的一致性。据此可以更为无可置疑地断言，日本在战争期间已经确确实实地演变为与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相类似的法西斯主义国家。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论呢？

^① 转引自《讲座日本历史10》，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版，第243页。

第八章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态

在前一章，从民间法西斯运动、军队法西斯运动、军部的法西斯化和国家政权、体制法西斯化等几个方面，具体论证、确认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存在。为了全面把握、深入认识日本法西斯主义，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态，研究它的特征。

肯定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存在，澄清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是进一步探讨日本法西斯主义特征的前提。在前一章，主要是进行具体的论证，还未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作出正面回答。鉴于某些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的出现，是在于不能正确看待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征，它们以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某些特殊性来否定其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因此，在探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之前，需要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作必要的评论。

第一节 评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

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大肆活跃，日益得势，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注。从那时起，就开始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其中包含着某种肯定论与否定论的分歧。不过，日本法西斯主义肯定论与否定论之争，主要是在二次大战之后。

在日本学术界，这种争论在战后大体有三次。第一次是40年代末围绕志贺(义雄)、神山(茂夫)争论而展开的，主要是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论与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论的对立。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双方都在于揭露、谴责战时日本的反动势力和体制。第二次发生在50年代中到60年代。竹山道雄的《昭和精神史》(新潮社,1956年)、中村菊雄的《昭和政治史》(庆应通讯,1958年)和《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论》(原书房,1967年)等著作提出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与此同时出现了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第三次始于60年代末，延续至今，以伊藤隆为主要代表。伊藤隆的否定说首见于《昭和初期政治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9年)，他的论文《昭和初期政治史研究的一个视角》(载《思想》1976年第6号)，更为系统、概括地阐述了他的看法，可以说是他的战前昭和初期政治史史观的代表作。

后两次否定论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特别令人遗憾的是，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否认日本对外侵略罪责的思潮有着联系。竹山道雄、中村菊雄的否定论在当年日本学术界并未产生大的影响，然而，伊藤隆的观点却在日本学术界成为一种持续多年、得到一些学者赞同的思想和见解。伊藤隆及其赞同者在一系列的著作中重申并发挥了他们的历史观。对于这两次否定论，持

日本法西斯主义肯定论的学者进行了多次评论、批判。日本法西斯主义肯定论在日本学术界始终占主流地位。

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也存在于欧美学术界。“欧美的研究者对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大都采取否定态度。”^①从60年代起，欧美盛行“国际法西斯主义”研究、法西斯主义对比研究，但是很少把日本列为研究的对象。欧美一些专门研究日本的学者及其著作，如乔恩·哈利戴的《日本资本主义政治史》，戈登·M·贝格斯的《昭和史研究序说》，乔治·M·威尔逊的《“日本法西斯主义问题”的新见解》^②，都对日本法西斯主义持否定说。美国的日本通赖肖尔在《日本人》^③一书中，对于战时日本是否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也是含糊其辞的。

下面主要从学术争论、探讨的角度，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作一些评述。

“复古——革新”论

这是由伊藤隆提出的。他从根本上否认“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认为“法西斯主义”这个用语已被滥用，除了政治界用来相互攻讦“表示‘极恶之敌’之外，并无别的意思”。况且，对于如何确定识别法西斯主义的标志，议论了几十年尚无结论。因此，“法西斯主义”这一用语“含义暧昧，容易误解”，“作为学术上的用语，

① 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视角》，载日本《历史学研究》1977年12月号。

② 哈利戴是牛津大学毕业的爱尔兰学者，其著作于1975年在纽约出版，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80年出版。贝格斯和威尔逊为美国学者，其论文分别刊于日本《思想》1976年第6号和《政治经济史学》166号（1980年）。

③ 《日本人》197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

太无意义”。^①他主张用“复古——革新”论来取代“法西斯主义”论。

伊藤隆把战前昭和年代的政治力量分为革新派和渐进派。前者的志向“是对原来的政治支配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造’、‘革新’、‘变革’、‘革命’”，后者的宗旨是维持现状。革新派又可加以区分，有“进步——革新”派，其中包括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乃至与之相近的自由主义者等；有“复古——革新”派，也可泛称为“右翼”，他们主张进行更为日本式的改革。“复古——革新”派还可分为“革新”色彩更强的部分和“复古”色彩更强的部分，即“革新右翼”和“精神右翼”。^②根据这样的政治力量划分，伊藤隆主张用“进步(欧化)——复古(反动)、革新(破坏)——渐进(现状维持)”这样两个坐标轴，来测定、说明个人或各政治集团所处的地位及其变动，重新把握昭和政治史。^③伊藤隆还在前述论文中概括地说明了主要政治力量所处的地位的变动。

在这里不可能对伊藤隆的论述进行全面的评价，也不想否定伊藤隆的学术研究成就，只限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战前昭和和政治史研究中，是否可用“复古——革新”论来取代“法西斯主义”论。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伊藤隆拒绝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世界上存在千差万别的不同事物，不同的概念是人们认识、区分不同事物的必要手段。人们掌握概念，特别是复杂事物的概念，总有一个逐步深化、完善的过程。不同社会阶级、社会集团、以至不同学派，对于客观存在的同一事物往往有不同的认识，形成不同的概念，或者对于同一概念在内涵上有不同理解，这是屡见不鲜的。

^{①②} 伊藤隆：《昭和政治史研究的一个视角》。

^③ 伊藤隆：《昭和初期政治史研究》，第9页。

只要一个概念所反映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那就不能因为这个概念的内容尚不完整明确或有不同的理解而抛弃这个概念本身。否则，就会经常抛弃、改换概念，那么人们的认识进程就会经常被打乱、中断，得不到持续发展，学术研究也将陷入困境。法西斯主义无疑是一种客观存在，经过多年研究，人们对它的认识日趋深化，学术界的“法西斯主义”论已获得很大进展，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

至于“革新”这个概念，它含意广泛，极为一般化。古往今来，东西各国，有着种种“革新”，有真有假，有不同的宗旨和内容。伊藤隆表示，研究战前昭和政治史，是为了“揭示政治体制的特征，对它的构造加以更详细的分析”^①。那么，使用“革新”这个笼统概念不可能真正达到这一目的。各种政治力量及其“革新”的区别，首先在于所遵循的“主义”不同。伊藤隆在著作中也一再使用“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概念，却唯独排斥“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然而，伊藤隆又不得不承认，在昭和战前时期，“或多或少成为时代推进力”的“复古——革新”派，他们“具有多样性，但其目标大都在于打破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以准战时体制的强制为后盾，形成以强力政权对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方面实行统制的国家。”^②这种主张难道不正是法西斯主义吗？只有“法西斯主义”这个概念才能揭示当年日本体制的基本特性。

那么，按照伊藤隆的理论能否恰当地测定个人和各政治集团的地位及其变动呢？把不满、反对现存体制的一切政治力量都笼统称为“革新派”，显然是不妥的。就是所谓“复古——革新”派，正像伊藤隆所说“具有多样性”。把所有的“右翼”以及包括军部在内，

① 伊藤隆前引论文。

② 《昭和时期的社会运动》（近代日本研究年刊5）《前言》，山川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都纳入“复古——革新”派也是十分牵强的。有的确有复古倾向，有的也不尽然。如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和陆军小册子《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很难说是有什么“复古”纲领。就以它们对天皇的态度来看，虽然都宣扬天皇权威、忠君爱国，但北一辉却修改了传统的国体论和天皇观，把“天皇的国家”、“天皇的国民”改为“国家的天皇”、“国民的天皇”，把天皇从既存体制的维护者变为“革新”的象征；提出陆军小册子的统制派对于“国体明征”运动并不热心，他们以及整个军部在实践中是按照“天皇机关说”行事的，只是把天皇看作国家元首，借用他的权威，可是并不想让天皇的权威来束缚自己的为所欲为。这两个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代表性纲领，就其实质性的内容来看，它们是一次大战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代极端反动思潮的集中反映。

伊藤隆把军部看作“复古——革新”派中“更具革新色彩”的力量，是“革新”的核心，在这个时期的政权中逐渐占有中心地位。那么，军部为什么能占有这种地位呢？应该看到，除了军部的特权和实力之外，正是由于军部在30年代从一般军国主义势力演变为法西斯主义势力，成为当年推行国家法西斯化的主导力量，适应了日本现代垄断资本的特定需要。用“复古——革新”、“更具有革新色彩”等用语，并不能明确地说明军部自身的演变及其地位。

不可否认，“复古——革新”论在划分、说明各种政治力量时，有一定的方便之处，可以把各种政治力量都纳入这一框架之中。但是，这种方便是由于抛弃了确定性而换来的，而且把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配置变得简单化了。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相互关系及其地位，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各自对于国家法西斯化的不同态度而决定的。即使所谓“观念右翼”、“现状维持”派，他们对于国家法西斯化的态度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矛盾的、变动的。他们的地位、作用及其变动，是由对于国家法西斯化的矛盾、变动态度所决定的。离开了国家法西斯化问题，用“更革新”或“更复古”或

“维持现状”这些词语，很难确切地揭示各种政治力量的复杂关系。

“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和“战时体制”说

战争期间的日本国家体制是否属于法西斯体制，这是一个更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有的著作并不否认日本有法西斯势力，但不承认战时日本是一个法西斯国家。有的著作虽否认战时日本存在法西斯体制，但也没有说明究竟属于什么体制。明确提出不同看法的，主要有：

一、“军国主义”说。中村菊雄提出，战争期间日本的政治体制，“从军人是其推进力量这一意义来说，似乎还是称之为“军国主义”时代更为妥当。”^①赖肖尔在《日本人》一书中，对于战时日本是否是法西斯国家存有疑问，这一章节的标题则是“军国主义的逆流”。看来，他似乎宁肯把战时日本称作“军国主义”国家。

二、“国家主义”说。贝格尔认为，1930年代，“历史趋向的特征之一，是国家权威的增大及其对市民生活的渗透”。他主张用“国家主义”这个概念来说明当年“日本的历史经验”。^②

三、“战时体制”说。竹山道雄提出，“现在一般所说的法西斯主义，大都似乎是与战时体制相混同”。^③

日本的高度国防国家体制自然也是军国主义体制，但是并不等同于一般的军国主义。比之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历史要悠久得多，两者的历史内容也不完全相同。军国主义是从古代到现代都出现过的现象，不只是特定社会经济构成体中才有的历史范畴。^④军国主义崇尚武力和武力扩张，把强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

① 中村菊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原书房1967年版，第15页。

② 贝格尔：《昭和政治史研究序说》，载日本《思想》1976年第6期，第210页。

③ 竹山道雄：《昭和精神史》，新潮社1956年版，第130页。

④ 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序说》，第105页。

为立国之本，把扩军备战和战争政策经常置于国家生活的首位。确切地说，军国主义是一种政策体系的特征概括，它可以产生、依附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和各种政治形态。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斯巴达是古代军国主义的典型，其政体是奴隶制贵族共和制，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是奴隶制民主制的鼎盛期，但也推行军国主义政策、与斯巴达等国争霸。在中世纪，拜占廷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西欧的骑士阶级、日本的武士阶级就曾经是军国主义的鼓吹者、推行者。到了资本帝国主义时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近代军国主义，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是它的两个典型。

近代军国主义除了军事部门在国家生活中占有特权地位之外，还表现为“通过军国主义或半军国主义的组织网而把整个社会包括进去的制度”，以及“以军国主义精神渗透人民整个私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制度”。^①近代军国主义与实行义务兵役制、军事技术的新发展相联系，一方面需要经济、文化的近代化，另一方面又要抑制群众的民主、自由意识，灌输对于权威盲目绝对服从的思想。近代军国主义总是喜好专制主义而与民主主义格格不入，然而它并不绝对排斥某种程度的民主政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是有限度的，而且“精神渗透”更多于直接控制。在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立宪、民主的一面一度有所加强。在德意志帝国也有类似的进程，如191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议会内第一大党。

在非常时期，军国主义在实行专断和集权方面同法西斯主义有些相似之处。一次大战期间的德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实行了军事专制，进行广泛的总动员。然而，国会的一定权

^① 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9页。

力和政党的活动依然存在，①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也并不十分全面而严密。这种军事专制与后来的法西斯极权主义统治不能等量齐观。永田铁山调查研究了一次大战时欧洲各国的总动员情况，他写道：“其实施大都是应急的，是迫于需要而逐步采取了各种措施，多数都流于临时弥补”，因此，“几乎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看到整然一体的总动员措施”。虽然德国的总动员“比较迅速周密，也还不足以成为将来的典范”。②

在现代特定条件下，军国主义传统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床之一，军国主义势力容易法西斯化；法西斯主义则是现代帝国主义陷于全面危机时期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把对外侵略战争同为建立极权主义统治而进行的“国内革新”相结合，是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日本的高度国防国家体制体现了这一特征。历史上一般的军国主义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国家生活从属于黩武政策，但并不与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与“军国主义”这个概念相比，还是“法西斯主义”更能确切全面地反映出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性质与特征。

日本的高度国防国家体制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主义”的表现，是一种“战时体制”。但是：“国家主义”、“战时体制”是十分泛义的概念。用它们来取代“法西斯主义”这一特定概念，只能混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极权制国家与其他反法西斯的民主制国家的原则区别。

① 一次大战初期，德国国会接受了威廉二世要求“一切政党应该停止争吵”的呼吁。后来，社会民主党等四个政党要求帝国国会在处理外交政策时享有更大发言权，于是，1916年10月决定把国会预算委员会变为国会休会期也进行活动的常设的主要委员会。1917年7月国会通过了“和平决议”，8月国会对教皇呼吁和平的照会作了答复，这是德国宪法生活中前所未有的现象。另外，社会民主党主张战后实行议会制内阁，民族自由党的斯特来斯曼要求加强国会的地位。根据后者的提议，1916年10月国会成立了宪法委员会。见卡尔·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上册，第114、134页。

② 赖泽尔：《总体战体制研究》附录资料，第217页。

本世纪30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真正确立，国家积极而经常的调节、投资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转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确实是“国家权威的增大及其对市民生活的渗透”。然而众所周知，在如何对待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问题上，罗斯福新政和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方针是截然相反的。在罗斯福新政中，国家调节与自由竞争同时并存，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得到扩大和巩固。怎么能够用“国家主义”这个词语，把罗斯福新政同日本的高度国防国家混为一谈呢？

在二次大战中，英国和美国也对原来的统治体制作了某些调整，以适应战时需要。国家权力相对集中，政府权力有所扩大，公民享有的权利受到某些限制，公民的义务有所加强，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统治体制，议会民主制仍在发挥作用，公民的基本人权一般仍然得到尊重。

1941年3月，当美国通过了租借法，开始实际参战后，罗斯福宣布：“民主的明灯一定要永照不熄”。他指出，现代专制暴君企图消灭一切民主国家，“他们曾经以为民主不能够适应世界处于战争中这种可怕现实……民主甚至为了保卫自己也动员不起来自己的力量”。他们错了，在民主国家，“民主仍然可以保持其为民主，同时又能发言，得出结论，并且为了保卫自己而充分武装起来。”^①罗斯福所以具有这样的信念和决心，并们确实也是如此行动的，那是因为美国进行的是保卫民主自由、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可以得到各阶层人民自觉自愿的支持，因而战时集权与民主政治可以并行不悖。

就美国战时集权的措施来看，最主要的是议会于1941年12月18日通过的第一战时权力法和1942年3月的第二战时权力法。前者授予总统重组政府机构的权力，罗斯福据此设立战时生产局、

^① 《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0、282页。

战时动员署等机构。后者授予政府分配国防所需物资、设备以及处罚违反者的权力。①这两个法案授予总统的权力以及有关机构的活动，主要限于战时生产和动员的范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

日本进行的是一场法西斯侵略战争，尽管在国民中一度煽起了战争狂热，但军部没有能够获得国民广泛而持久的支持。陆军省的一份《调查汇报》承认，“诽谤军队军人、要求缩减军备、攻击军事预算、诅咒军队、反对军事行动这类政治言论乃至不满情绪，从同年(1933)年底以来都有上升的趋势”。②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1938年下半年到1940、1941年，及1943年以后，反军厌战情绪蔓延，有增无减。这种状况，是军部要建立法西斯极权主义统制的主要原因之一。

显而易见，虽然双方进行的都是一场总体战争，但因战争性质不同，国情不同，战时体制也会不同。“战时体制”这一概念主要是反映了统治体制与战争的关系，不足以表明不同统治体制的各自特性。就日本的高度国防国家体制来说，它是以极权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总体战体制，也就是法西斯主义体制，舍此之外再也找不到更贴切的表述了。

“否定论”的历史比较

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的错误，从方法论上来说，一是用一般的泛义的概念来取代特定的明确的概念，二是不能正确地进行历史比较。在战时日本研究中，否定、排斥“法西斯主义”这一特定概念，除了有的论著从根本上否定这一概念本身之外，往往是

① G. B. J达尔，《美国——描述性历史》第2卷，纽约，1984年，第1136页。

② 《讲座日本历史10》，第222页。

同历史比较方法的错误相关联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大都是从历史比较的角度，强调日本与德意的差异，认为法西斯主义是纯属欧洲的、德意的事物。

竹山道雄以是否存在“一国一党”、“独裁者”为标志，认为日本的“国家体制与整然一元化的法西斯主义相距很远”^①，否认日本战时国家体制的法西斯主义性质。哈利戴与竹山道雄一样，强调日本“没有一个显见的行使国家权力的法西斯党或者类似组织”，没有一个像纳粹元首那样的领袖，不能够说有一个法西斯政权。在他看来，日本存在着“显著分权”，“认为日本政权在30年代更集中和更‘极权’，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还提出，“日本不像欧洲法西斯国家，没有像1922年向罗马进军或希特勒于1933年夺权那样成功的政变或起义”，相反，“在日本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至少在正式制度方面是如此）”，从30年代到战败，“不能说政治体制有变化”。^②西义之则强调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形态，认为只有意大利、德国那种有着“自下而上”群众运动法西斯主义，所谓日本的“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虚构的理论”。^③赖肖尔的一段话更有代表性，把上述看法几乎都包括进去了。他写道：“日本的历史时常被拿来和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相比。在有些地方两者确实异常相似。但是，与意大利和德国不一样的地方是，日本没有独裁者，整个制度不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民众运动的产物，而是含糊不清的情绪上的改变，日本社会上层集团权力均势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政策的改变，所有这一切，都是在1889年成立的立宪制度范围之内发生的。没有发生革命，没

① 竹山道雄：《昭和精神史》，第13页。

② 乔恩·哈利戴：《日本资本主义政治史》，第229、206、220页。

③ 西义之：《谁是法西斯主义者——现代法西斯主义学入门》（护摩书房，1975年），转引自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视角》，载日本《历史学研究》1977年第12号。

有举行过成功的政变，也没有正式改变政治制度。30年代末军部支配的政府，和20年代国会支配的政府，一样都是完全合乎宪法的”。^①

否定论提出的日本与德意的上述差异，除个别不够确切或有所夸大，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进行历史比较，对差异应该怎么看。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法西斯主义仅仅是德意等国的欧洲现象，还是超出欧洲范围的国际现象；在法西斯主义研究中，日本与德意是否存在可比性。哈利戴认为，“法西斯主义这个词的麻烦之处在于它把对日本的任何考虑都纳入欧洲中心论的范畴”，是“欧洲中心论的一种研究方式”。^②“欧洲中心论”当然是不足取的。诚然，法西斯主义这个词产生于欧洲，但是法西斯主义现象，它作为一次大战后资本主义全面危机这一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带有相当广泛的国际性。不能因为“法西斯主义”这个词产生于欧洲，就不许用它去表述其他地方基本相同的现象。

一次大战以后的日本，既有自己的历史传统与具体国情，又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同德意有着重要的基本共同点。它们都陷入了资本主义全面危机，它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中都有滋长法西斯主义的土壤。此外，它们还有便于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封建主义、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传统因素。因此，正是这三个国家在战后头一年（1919年），就不约而同地先后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后来又成为三个主要法西斯国家，这决不是偶然的。把德意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形态，同时承认日本存在法西斯主义的另一种形态，既看到它们的基本共同点，又承认它们的差异，这丝毫没有把日本硬塞入欧洲的模式，说不上是什么“欧洲中心论”。相反，以欧洲德意的法西斯主义形态作为唯一的衡量尺度，凡有

^① 赖肖尔：《日本人》，第104—105页。

^② 乔恩·哈利戴前引书，第228、220页。

某些不符合者就一概排除于法西斯主义之外，这才是一种必须加以抛弃的欧洲中心论的研究方法。

其次，在进行历史比较时，必须正确地把握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共性与个性两个方面。在历史与现实中，有着相同内容、本质的事物却有着不同的形式与个性，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就以资产阶级民主制来说，其形式细分起来有若干种。那么，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就不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具有各自的特点呢？否定论在历史比较中的错误，就在于把一些非本质的形式、现象、特殊性加以不恰当的夸大，甚至当作本质的属性，而对法西斯主义的真正本质却没有加以认真的研究和揭示。这样当然不可能进行正确的历史比较，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否定论历史比较的错误，还在于不了解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共性往往通过特殊性而表现出来的道理，因而不能从共性与个性的联结上去把握日本法西斯主义，不能透过其特殊性去进一步揭示其共性，以至片面夸大了日本的特殊性，导致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

下面将通过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特征的分析，揭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第二节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点

同一切事物一样，不同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有共性、普遍性，又有个性、特殊性。对于任何事物，“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①研究日本法西斯主义当然也不例外。曾经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06页

有过“纯粹法西斯主义”说，强调日本法西斯主义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的共性，忽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个性。今天，这种看法似乎不再有了，主要的倾向却是过份强调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殊性，以其某些特殊性来否定它的法西斯主义共性。因此，在考察日本法西斯主义特点时，需要进一步澄清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的某些看法，着重从共性与个性的联结上，从整体的相互关联上去揭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点。

考察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具体、全面、深入地认识日本法西斯主义。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状况以及它的民族传统和国际处境，都会对日本法西斯主义产生影响，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的特点。在这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诸多特点一一罗列出来。鉴于日本是三个主要法西斯国家之一，因而主要是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相比，揭示日本法西斯主义作为法西斯主义另一种形态的主要特点。

以军部为核心力量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是以军部为核心力量，推进国家的法西斯化。

在日本，首先由民间法西斯势力掀起了法西斯运动。进入30年代后，民间法西斯势力是激进法西斯运动的力量之一。但是，民间法西斯势力未能得到充分发展，未能实现统一。一些民间法西斯团体曾经尝试联合起来，1931年建立了全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协议会和大日本生产党，但一二年后就瓦解了。1933年，日本的法西斯、半法西斯团体多达500多个，共28万人。1936年这类团体仍有335个。^①与德、意不同，日本没有一个强大的法西斯政党，

^① 日本现代史研究会编，《日本法西斯主义》(2)、大月书店1982年版，第22页；田中惣五郎，《日本法西斯主义》、河出书房新社1960年版，第123页。

而是由军部充当法西斯势力的核心力量。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天皇制的高压统治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进步力量、民主力量得不到较大发展，工农和其他群众的组织率很低。1931年工会会员人数达历史最高点，仅占工人总数中的7.9%。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米骚动之后的动荡局势下，不论统治阶级还是法西斯团体，都在尽力设法防止群众的革命化。然而，并不存在它们同革命力量、进步力量争夺群众的激烈斗争。这是日本法西斯团体没有充分发展、没有统一的主要原因。

二是军部在近代天皇制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权力以及军部自身的法西斯化。军部早已凌驾于议会、内阁之上，可以任意干预国家政务。军部的法西斯化主要是指军部中央的法西斯化，这同一次大战后，尤其是1931年后准备和建立法西斯总体战体制相关联。一夕会挑起“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推进国内法西斯总体战体制的建立，是军部法西斯化的重要进展。继此之后，1934年统制派确立对于陆军的支配地位，并发表了建立法西斯总体战体制的纲领《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标志着军部法西斯化的完成。军部从原来的军国主义势力演变为极权主义的法西斯势力。军部充当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力量，当然离不开它的特殊地位和权力，但是更为关键的还是军部自身的法西斯化，从而使军部按照自己的纲领和目标，积极主动地推进国家的法西斯化。日本的各种反动保守势力也就把希望寄托在军部身上，民间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和统一因而变得无足轻重了。

军部是国家法西斯化的主要决策者和推动者。首先，挑起“九·一八”事变。继而，扼杀政党政治，把国家拖上侵略战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接着，在1936年确立了军部的政治支配地位，实现了政权的法西斯化，建立了法西斯统治。从1936年到1941年建立东条内阁之前，共6年8届内阁，其中由于军部的阻挠、反对，发生组阁困难1次（1936年广田内阁）、组阁流产1次（1937年宇垣

组阁)、内阁被迫辞职5次(1937年广田内阁、林内阁、1940年阿部内阁、米内内阁、1941年第三届近卫内阁的辞职)。第二届近卫内阁的成立则是以接受军部的《综合国策基本纲要》为先决条件。总之,内阁的组成和内阁的政策都得听命于军部。

法西斯体制的全面建立也是由军部为主而策划、推进的。军部提出了建立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纲领。与建立这一体制有关的最重要的法令《国家总动员法》是根据军部的要求制定的,陆军早在1937年5月就提出了《对于起草总动员法的意见》。^①1940年7月,为了加快完成法西斯主义新体制,陆相单独辞职搞垮了米内内阁;陆军省军务局起草了《综合国策基本纲要》作为对新内阁的要求。近卫第二次组阁后,决定了《基本国策纲要》,它是陆军方案的翻版,只是略作增删和若干文字修改。陆军的纲要提出,我国内政之急务在于确立国防国家体制之基础。政府的纲要决定“排除万难,完成国防国家体制”。^②不久,近卫内阁就紧锣密鼓地全面建立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经济“新体制”。

军部是国民和舆论的直接操纵者。20年代,军部通过在乡军人会、青年团、青年训练所以及大中学校军训,为操纵国民奠定了基础。战争期间,对国民的操纵进一步加强与扩大。“九·一八”事变后,在各地师团司令部、联队司令部指导下,组成了国防思想普及会、国防研究会、国防会等团体54个。^③1932年7月,在军部指导下建立了全国性的国防妇人会。到1936年末,其分会遍布全国半数町村,一年后普及全国各地;共有分会13,012个,会员685万人。^④。于是,从青少年到壮年,从男子到妇女,国民

① 纘纘厚,《总体战体制研究》,第72页。

② 矢次一夫,《昭和动乱秘史》中,经济往来社1971年版,第29—293页。

③ 《昭和恐慌〈法西斯主义时期的国家与社会1〉》,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第182页。

④ 《日本法西斯主义》(2)、第48,64页。

的主要部分被置于军部的控制之下。

军部对国民的操纵也包括对民间法西斯势力的统制。民间法西斯运动早就把实现自己主张的希望寄托在军部身上。军部依仗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推进法西斯化的主导作用，到1935年，对民间法西斯团体“已有了很大的统制。”^① 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由于对叛乱的严厉镇压和军部政治支配地位的确立，除极少数右翼分子外，民间法西斯势力都采取支持军部的合法活动。^② 军部实现了对法西斯势力的全面统制。

军部通过分驻各地的师团和在乡军人会等团体，在舆论宣传方面拥有极大的能量。“九·一八”事变前夕和事变之后，在陆军省的支持、发动下，在乡军人会从上到下全部行动起来，再加上学校军训的教官和分驻各地的师团、联队，在全国掀起一场“国防思想普及运动”。在乡军人会总部派人去各地举办讲演会，就延续了250天之久。^③ 各地师团纷纷派出军官，举办展览会，讲演会。驻大阪的第4师团散发的印刷品达20万份，驻金泽的第9师团用飞机发传单10万份。^④ “七·七”事变前夕，军部再一次掀起全国性的时局宣传运动。陆军中央向每个师团都派遣了演讲人，提供了宣传资金。如驻仙台的第2师团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本管区就举行讲演会356次，电影放映会20次，参加者共达20万余人。^⑤ 除这两次外，另一次宣传高潮是前面已讲到的1934年陆军小册子的发行与宣传，其规模、影响之大是空前的。这一年共发行陆军小册子10种，除了《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还有《现代国防的本质与经济战略及其他》、《思想战》，突出了建立高度国防

① 陆军省军事课政策班班长池田纯久语。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页。

② 《现代史资料23》，《解说》第29页。

③ 《昭和恐慌》，第176—177页。

④ 《讲座日本史7》，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版，第237、243页。

⑤ 《日本法西斯主义》(2)，第54页。

国家体制的宣传。从1931年到1937年，共发行陆军小册子123种，^①向国民阐明军部的各种法西斯化主张与政策。

军部在推进国家法西斯化的进程中，大体保持着连续性、一贯性。这不仅表现在内外政策方面，也表现在组织人事方面。战争期间，军部首脑经常更换，如陆相换过12人次，军官职务也经常定期调动。内阁的改组一直很频繁。据此，有的论著提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政治领导力量始终不稳定”。^②有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也以日本不存在“共同谋议”和权力的长期独占作为一种理由。^③甚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认为难以确定“共同计划、共同谋议”的证据。^④

其实应该看到，军部中央人事的不稳定之中又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其主要体现者不是站在前台的首脑，而是陆军中一夕会、统制派这些握有实权的法西斯幕僚军官。一夕会和统制派对于如何推进国家法西斯化，进行了长时期的、相当周密共同策划。从挑起“九·一八”事变开始，国家法西斯化的关键时刻和重大决策，无不是他们在其中起主要作用。

与一夕会相比，统制派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派别，而是在思想上、政策上具有一致性，并因上下级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形成的松散的结合。尽管如此，这一派的主要人物却是前后相承的，并长期在陆军、军部中占实际支配地位。在1935年以前是永田铁山，从1940年起是东条英机，在他们两人之间起主要作用的则是武藤章。早在1932年，武藤章就作为永田的直属部下，同永田建立了“极为紧密的关系。”^⑤1935年8月永田铁山被皇道派军官杀死，同

① 江口圭一，《满洲事变时期的陆军小册子》，转引自日本《史学杂志》97编（1988年）5月号，第196页。

② 《讲座日本史7》，第333—334页。

③ 中村菊雄的看法，转引自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序说》，第44页。

④ 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第89—90页。

⑤ 有末精三，《政治、军事与人事》，芙蓉书房1982年版，第117页。

月武藤章出任军务局军事课高级课员。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武藤章是收拾时局的核心人物。在组阁问题上，陆相寺内寿一对以武藤为中心的军事课言听计从。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武藤章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是力主全面侵华的扩大派为首人物。1939年9月到1942年4月，当日本又一次处于全面建立法西斯体制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关键时刻，武藤章任陆军省军务局长，充当了东条英机最得力的帮手。可见日本军部在组织人事上的连续性，虽然不像德、意法西斯政党那样集中稳定，但大体上还是存在的。军部在内外法西斯政策上的连续性与组织人事上的一定连续性是分不开的。

日本与德、意的历史情况不同，法西斯势力的结集形态有所差异。在日本，军部自身的法西斯化以及它有纲领、有组织、持续而广泛的政治行为和政治作用，表明军部在相当程度上代行了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功能。正因如此，极大地淡化了建立强大法西斯政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军部作为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力量，这是日本的特殊之处。日本军部不像德国国防军和意大利军方那样，只是接受或支持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而是自身趋向法西斯主义，并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在相当程度上起着法西斯政党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日本军部与德、意法西斯政党颇有相近之处。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主要是一个政党，同时又是一个半武装组织。日本军部则首先是武装力量，同时又相当类似政党，这也表现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在个性与共性上的相互联结。

先外后内、自上而下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先外后内”、“自上而下”为主要方式，同时“内外结合”、“上下结合”，逐步实现国家法西

斯化。

德国和意大利都是先建立法西斯统治，形成法西斯体制，然后进行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则相反。日本陷入经济大危机后，在法西斯势力之间，主要在陆军内部，发生了“先内后外”还是“先外后内”之争，即为了摆脱危机，是先发动军事政变，建立法西斯统治，再进行武力侵华，还是先挑起侵华战争，驱使国家走上战争和法西斯道路。

陆军中央部分中佐以下军官于1930年夏组织的樱会，以及法西斯青年军官和一些民间法西斯分子，持前一种主张。樱会的头目桥本欣五郎认为：“处理外政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像现在这种以软弱的党人之流为基础的政权，无能处理外部事务。我主张通过内部改造，建立强硬政府，然后再着手外政，非如此就不可能处理外政。”^① 1931年以樱会为主，策划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两次政变阴谋均未得逞，主要原因是陆军中央实权派的反对和陆军上层的动摇。

永田铁山、冈村宁次、石原莞尔这些实权派是政变阴谋的坚决反对者。^② 永田一再强调，陆军的行动不可超越宪法的范围，除非“因乱臣贼子而濒于君国危机”，不可采用“非常手段”。^③ 这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日本，阶级矛盾虽有激化，局势趋向动荡，但因在天皇制高压统治下，革命力量受到摧残，并不存在现实的革命危机，没有进行一场急剧政治变动的迫切性，贸然发动政变不能获得统治阶级的支持。石原莞尔在1931年5月的《满蒙问题之我见》中力言先内后外之不足取，他指出，“发生战争时，我国的现状难望举国一致，令人十分忧虑。因此，以国内改造为首要的意

^① 《桥本手记》，转引自升味准之辅：《日本政党史论》第6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第99页。

^② 参见《田中清手记》，收入秦郁彦《军队法西斯主义运动史》附录。

^③ 永田铁山刊行会：《永田铁山秘录》第402页，秦郁彦同前书附录，第286页。

见，看来似乎极为有理。其实，所谓内部改造亦极难举国一致，反使政治安定需经相当年月，令人不胜惶恐。而且必须看到，即使政治安定完满实现，然而对于经济组织的改革尚无详细适当的计划，我国经济力量将一时大受削弱。”^①此外，他们还担心军事政变会动摇军纪国法，诱发别的暴力事件。^②

军部实权派的方针是先外后内，石原写道：“历史告诉我们，如果确立战争计划，并使资本家确信我能获胜时，迫使现政权执行积极方针，决非不可能。尤其是战争初期的军事成功，可使民心沸腾，团结一致。”因此，石原认为：“根据我国的国情，不如迅速驱使国家向外发展，中途伺机断然实行国内改造，更为适当。”^③实权派的地位和军部的独立性，使“先外后内”占了上风，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先外后内，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的国家法西斯化进程中，主要目标是确立适应总体战的“国防国家体制”。国防国家体制既有法西斯体制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点。它不论在名称上还是内容上，都把适应总体战摆在首位。如果说意大利总体国家和纳粹第三帝国首先着眼于消除国内激烈的阶级对抗和革命危机，同时着手准备对外侵略战争，那么日本的国防国家首先是为了对外武力扩张，同时也在于加强国内统治，防止革命力量的抬头。日本学者称此为“预防性的反革命。”

首先挑起对外侵略战争，然后借此推进国家的法西斯化和国防国家体制的建立，同时又以国家法西斯化为扩大侵略战争作准备。这种先外后内、内外结合的形式，确实如石原莞尔所预计的，显得更为稳妥而有效。

先外后内、内外结合，为国家法西斯化大造了舆论，形成、

① 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0》，第107页；秦郁彦前引书第34页。

② 《田中清手记》，见秦郁彦前引书附录，第230—231，235页。

③ 同注①。

扩大了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利用对外侵略战争，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煽起民族偏见和排外狂热，把群众视线引向国外，是各国反动统治阶级的一贯伎俩。这在日本近现代历史上尤为突出。

当1930年春天日本受到经济大危机袭击之后，所谓“满蒙危机”、“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煽动日趋激烈。由于经济危机的深重，国民的注意中心仍属国内问题。1931年8月中，政友会干事长森恪承认，“我国国民对满蒙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9月11日，政友会干部会也认为，“如何使专注于内政问题而对外交问题冷淡的国民觉醒起来”，是必需解决的问题。^①正是“九·一八”事变使国民的注意力为之一变。由军部领头，在乡军人会、舆论界、政治界和各种法西斯势力通力合作，在全国范围内煽起了战争狂热、排外狂热。大批慰问信、慰问品、慰问金和国防捐款涌向关东军和陆军省。每当侵华日军从国内出发时，欢送的人群把车站、码头挤得水泄不通。

与以往不同，侵略战争和排外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仅把群众的视线转向国外，而且成了国家法西斯化的最初起动力。侵略战争和排外狂热，使军部得到群众，特别是中间阶层的支持，提高了军部的地位和威信，加强了军部的政治发言权。侵略战争和排外狂热，使得“举国一致”的呼声沸腾起来，为军部否定政党政治提供了借口和时机。

1931年11月，新闻界、文化界很有影响的德富苏峰发表了《政党国乎，日本国乎》一文，强调“我们内部的一致比什么都重要”，要求以“举国一致”内阁取代政党内阁^②。政界一些人同军部相呼应，或明或暗的策划成立“举国一致”内阁。即使没有“五·一

^① 《讲座日本史7》，第238—239页。

^② 《讲座日本史7》，第251页。德富苏峰(1863—1957)，1887年创立民友社，创办《国民之友》杂志，1890年创办《国民新闻》。原先提倡平民主义，后转为国家主义。1911年为贵族院改选议员。主要从事新闻工作和著述活动。

五”事件的冲击，政党政治也是迟早要完结的。可以说，政党政治的完结是“九·一八”事变必然引起的结果。

对外侵略战争和“举国一致”的呼声，成为进一步进行“国家改造”的巨大压力。军部利用了这种战争压力，把建立高度国防国家体制提上日程。在军部的有关纲领中，为了确保对外战争的进行，提出了改革以个人主义为基调的经济结构，实现国民“共存共荣”，安定国民大众生活，使士兵无后顾之忧等“革新”主张。这迎合了群众特别是中间阶层要求改变现状的心理，确立了军部是国内“革新”中坚力量的形象，进一步争取了民间法西斯势力对于国家法西斯化的支持。

先外后内，内外结合，逐步加强了军部与各种权势集团的结合。“九·一八”事变之后，统治阶级并不反对军部的侵略行动。依靠重工业化学工业起家的一批新兴财阀，是军部对外侵略的积极支持者，在内政方面也同军部比较接近。如日本产业康余恩的首脑鲇川义介在1932年2月就已热衷于政党解散运动。^①三井、三菱等旧财阀主要投资于商业、金融业和轻工业，在1932、1933年尚能借助日元贬值等手段，利用倾销打开国外市场。他们同军部扩充军备有共同利害，但在一段时间内对军需工业的投资并不积极。

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担心军部过于冒失从事，会很快招致一场日本尚无准备的大规模国际冲突，有时要对关东军、军部作点牵制。如政党内阁就有这种表现。不过这部分人并不反对侵略战争，做得更多的还是跟在军部后面亦步亦趋。尽管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同军部不太协调，总的趋势则是双方日益接近起来。军部主要是通过对外侵略战争和建设国防国家体制，协调、加强了它同各种权势集团的结合。

^① 田尻育三：《昭和的妖怪岸信介》，学阳书房1979年版，第57页。

对于财阀来说，侵略战争和国防国家在对外掠夺市场和原料产地、扩大军需生产、加强政治经济统制和对国民的控制这些方面，都符合他们的利益。特别是从1934年起，对外倾销四处碰壁，起来抵制的国家越来越多，财界需要借助军部的武力“确保东洋市场”。^①旧财阀也开始积极投资重工业、化学工业，改组他们的事业基础。1934年1月，三井直系企业中最大的三井物产决定缩小商业活动，加强对工业、包括重化学工业的投资。^②三井矿山在一次大战后决定增资50万股，但仅实缴新增股金3%，1934年上半年把其余部分全部缴足。^③同年6月，三菱造船与三菱飞机制造两个会社合并为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并把三菱造船过去尚未缴纳的2000万日元资本一次缴清，新社会的资本总额是5500万日元。^④住友等财阀也有类似举措。旧财阀在短期内就赶上和超过了新兴财阀，在重工业化学工业中占有主导地位。^⑤

财界与军部日益接近起来，财界支持军部的扩充军备计划。从1936年2月起，军部把初步拟就的产业发展五年计划送给三井领导人池田成彬、兴业银行总裁结城丰太郎，等财界头面人物征求意见。这个计划完全是为扩充军备服务的，池田、结城等表示支持。^⑥1936年3月，日本经济联盟常任委员会提出建议：“今后二三年间预算的制定应遵从一切服从国防的方针”。^⑦

1937年2月，财界头面人物结城丰太郎和池田成彬分别出任内阁大藏大臣和日本银行总裁，共同料理扩军财政。终于形成了军

①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95页。

②④⑤ 玉城肇，《日本财阀史》，社会思想社1976年版，第98—99页，第256页，第378页。

③ 松元宏，《三井财阀研究》，吉川弘文馆1979年版，第256页。

⑥ 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第五卷，岩波书店1951年版，第253页；《木户幸一日记》，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第542页。

⑦ 凡山真男前引书，第76页。

财紧密联盟、军财联袂。结城在众议院答辩时宣称：“我身为财政当局，要避免与军部当局对立，也要避免追从军部，而是希望相互理解、相互抱合商议今后的国政”。^①

侵略战争和“国防国家”的一元化综合统制意味着扩大与强化官僚的权力，从而密切了天皇制官僚与军部的联合。30年代初出现了一批法西斯新官僚，后来整个天皇制官僚机构逐步法西斯化。

由元老、内大臣等人构成的宫内集团，显得比较稳健，尽可能地维持国内现状，以保持天皇统治的稳定。这是他们的最高职责。他们看到，对外侵略战争并没有带来什么风险，反而有助于扩大日本帝国的统治，国防国家在不损害天皇权力的前提下可以加强帝国的统治，因而容忍或支持军部的所作所为。当1940年自由主义的西园寺公望不再管事，同时木户幸一担任内大臣之后，宫内集团与军部大为接近起来。

在各种权势集团中，政友会、民政党同军部之间有着争权夺利的摩擦。政党历来的政治信条是“外则帝国主义，内则立宪主义”，摆在首位的是举国一致支持对外扩张。政党曾打起“护宪”旗号反对军部跋扈，但是政党没有也不可能反对军部的侵略战争政策。而政党的腐败又使它们的“护宪”旗号失去了号召力，因而政党也不得不追随军部的内外法西斯政策。有时甚至显得十分起劲。

先外后内、内外结合，促进了国家的法西斯化，并为确立军部的政治支配地位，实现法西斯统治创造了种种条件。军部与权势集团的结合，是军部确立法西斯统治的主要保证，军财联袂是国家法西斯化的主要阶级支柱。军财联袂形成于30年代中期，正是以此为背景，并且利用了“二·二六”事件，军部终于在1936年建

^① 林茂、辻明清編集，《日本内閣史録》(3)，第一法規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版，第435页。日文中的“抱合”意为相互拥抱在一起，可译为“紧密联盟”或“联袂”。

立了政治支配地位和法西斯统治。

先外后内，内外结合，不仅存在于国家法西斯化的初期，而且贯穿其全过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国家法西斯化的起点，到1936年确立法西斯军部的政治支配地位，实现国家政权的法西斯化。接着，1937年挑起全面侵华战争，这又加快了全面建立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步伐，到1940—1941年宣告完成。然后就是发动更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同时出现了东条独裁，使日本的法西斯极权主义统治达到极点。

以军部为中心，先外后内、内外结合，决定了日本法西斯化是以自上而下为主，并与自下而上相结合，逐步加以推进的。先外后内、内外结合与自上而下、上下结合，是一个同步交错的过程。

军部与各种权势集团在共同目标下的结合，为自上而下提供了保证。民间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青年军官虽然激进，但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而把希望寄托于以军部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天皇制当权势力的合作与推动之下，自上而下成为日本法西斯化的主导方式，然而，它又非纯粹自上而下，按部就班的过程，同时包含着种种纷争和大的震荡。不论在上层权势集团之间，还是上层权势集团与非当权的下层法西斯势力之间，都存在某些分歧和矛盾。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再发生“下尅上”事件，为其他国家所少见。

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中下层群众度日艰难，一些民间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青年军官对上层当权者十分不满。他们铤而走险，一再策划、发动军事政变，采取暴力恐怖行动，企图借此推动上层，惩戒上层，加快法西斯的“国家改造”。大川周明回顾流产政变三月事件时，总结了两条教训：“其一，清楚地知道不仅青年军官，甚至高级军官也对政党政治不满，有意于改造日本；其二，认识到年老者之中也有进行改造的考虑，但立场动摇，不拉着他

们走，不从下边推一把，终究是不行的。”^①有的激进法西斯分子声称，像给人治病一样，国家改造有时非“挥动手术刀”不可。“五·一五”事件的参与者后藤映范说：对于腐败无道的统治者，“讲尽千言万语，他们依然有恃无恐，如果对他们中的某个人施以天诛，就会使他们全部立刻受到强烈而切实的警告”。^②

下层法西斯的激进行动不过是一种“依存的反抗”，^③仍把最后希望寄托于上层。但是，他们的举动破坏军纪国法，扰乱政局安定，危及上层人物的生命安全，有碍军部同财界、政界上层的联合，遭到军部中央多数人的反对。军部中央的方针，是在军部中央的统制下，采取军部介入政治的合法途径，自上而下地推进“国家改造”。这个方针是统制派提出的，他们坚持把下层法西斯势力纳入自上而下的合法轨道，强调全军“一丝不乱”地服从军部中央的统制。对此，一些民间法西斯势力、尤其是法西斯青年军官不肯听从。1933年11月，统制派与法西斯青年军官进行了谈判，后者拒绝放弃擅自行动的自由。

鉴于下层法西斯的政变阴谋难以避免，亦鉴于军部同其他上层势力之间尚有政见分歧和权力之争，统制派提出了反对政变而又利用政变的方针；既要防止和挫败政变阴谋，又要利用政变阴谋对军部的政治对手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让步。这个方针的正式提出是在1934年1月，见于片仓衷的《处理非常政治事变纲要》。^④其实，“九·一八”事变后军部中央一向如此行动。

当樱会于1931年策划十月事件时，永田铁山就曾提出：“不能让它实现，但用来吓唬一下内阁倒不失为好办法”。^⑤事后，陆相

① 秦郁彦前引书，第32页

② 《现代日本思想大系31》筑摩书房1964年版，第159页。

③ 石田雄：《“法西斯主义时期”日本的传统与革新》，载日本《思想》1976年1月号。

④ 见复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资料选编》。

⑤ 三宅正树等编：《昭和史的军部与政治》（1），第一法規出版株式会社1983年版，第108页。

向内阁会议报告事件始末，并声称：“这是出于忧国愤世之热情，并无他意”。这种辩解也意味着对上层的指责、警告。财界、政界闻讯大惊。此后，内阁对军部、关东军的牵制显著减弱。^①内阁中出现了亲军部的协力内阁运动，搞垮了民政党若槻内阁。

1932年“五·一五”事件时，海军青年军官等叛乱者提出“打倒国民之敌现存政党”的口号，并使内阁首相、政友会总裁犬养毅死于非命，引起极大震动。它表明政党内阁已丧失控制局势的权威，军部趁机大做文章。陆军中央两次声明，反对政党内阁，要求成立举国一致内阁。永田铁山向前来打听陆军关于组阁意向的内大臣秘书官木户幸一表示，如果再由政党组阁，恐怕无人出任陆相。^②陆军省军务局的铃木贞一向近卫文磨、木户幸一和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提出警告：“如果内阁再次归于政党之手，将会反复发生第二、第三次事件”。^③政友会、民政党发起护宪运动。但元老和政界上层还是屈服于军部的压力，成立所谓举国一致内阁。政党政治被扼杀，军部的政治发言权得到加强。

1936年，陆军中央镇压“二·二六”事件后，强硬声明：“采取积极政策以革新国政是陆军的一致要求，妥协退缩非但不能收拾局面，反而会使事态更加紊乱，以致给将来留下严重祸根。”^④“使事态更加紊乱”，“留下严重祸根”云云，无非是以发生新的暴乱相恫吓，达到粗暴干涉组阁的目的。

军部中央反对政变而又利用政变，是“自上而下”为主和“自下而上”为辅相结合，加速法西斯化的主要方式。上下结合的经常大量表现则是军部等上层在思想煽动和控制群众方面利用民间法西斯团体。“二·二六”事件被严厉镇压后，军内青年军官的法西

① 秦郁彦前引书第41页。

② 秦郁彦前引书第57页；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0》第49页。

③ 《木户幸一日记》，第165页。

④ 原田熊雄，《西园寺公望与政局》第5卷，第351—352页。

斯运动被肃清，激进法西斯运动也告结束。军部政治支配地位的确立，减弱了民间法西斯势力开展单独活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此后，民间法西斯团体一般都与军部的内外政策相呼应，对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起配合作用。如要求实施《国家总动员法》第十一条有关限制利润的规定；1938年法西斯暴力团冲击占领政友会、民政党总部，企图迫使两党解散以支持近卫新党运动，等等。

在德、意两国，纳粹党和国家法西斯党首先造成一个以中间阶层为社会基础的群众性法西斯运动，然后同日趋反动的上层权势集团相结合，建立法西斯政权，实现法西斯化。这是一种“自下而上”为主的方式。在日本，同样存在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法西斯运动与反动的上层权势集团的结合，不过采取了“自上而下”为主的方式。如何实现“自上而下”为主呢？主要途径是利用和改组天皇制机构，即由军部这一天皇制核心机构，推动和操纵内阁，加强内阁集权，设立国策机构，并依靠天皇制官僚系统，建立法西斯统治和法西斯体制。具体情况，结合下一个特点再作详述。

先外后内、内外结合和自上而下、上下结合这种方式，既体现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又包含着建立法西斯统治和法西斯体制的共性。法西斯统治和法西斯体制一方面是对内实行极权主义统治，另一方面是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一方面需要中间阶层自下而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又要依靠上层权势集团而树立自上而下的权威。先外后内，以自上而下为主，体现了日本的特殊性，内外结合、上下结合又反映了一般法西斯主义的普遍性。

极权统治与政治权力的一定分散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对整个社会生活和广大国民实行极权主义统治，同时保留政治权力的一定的分散性。

这一特点同通过天皇制机构，自上而下地推进法西斯化有联系。利用原有的天皇制机构，如军部、内阁和各种官僚机构，是实现自上而下法西斯化的主要途径。同时，对原有的天皇制机构也有一些改组。近代天皇制原来具有立宪、民主的一面。在近代天皇制内部，天皇总揽统治权和各机构多头分权同时并存，统帅部门与国务部门不统一，各国务机构也不统一，甚至总理大臣对内阁各省也只起协调作用而无统辖大权。依靠这样的机构显然很难实现一元化综合统制。在军部的推动或压力之下，采取了若干改组措施。

改变军部与内阁、内阁与议会的关系是重要改组之一。其次是在内阁中新设“五相会议”之类的机构，以加强内阁的协调与集权。斋藤内阁首先设立了五相(首、藏、外、陆、海)会议，讨论协商重大决策。广田内阁设有三相(外、陆、海)会议。第一次近卫内阁和平沼内阁有三相会议、五相会议。第一次近卫内阁成立不久，内阁会议正式确认五相会议是商定最高国策的首脑会议。当时，东京朝日新闻的社论指出：“这是为了确保国策的决定、贯彻能够迅敏、统一和强有力，说它是内阁的核心、内阁中的内阁并不过份”。^①

设立新的统制机构，主要是综合国策机构，是另一重大改组。军部早就有人一再提出有关建议。1935年5月，在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的推动下，建立了内阁调查局。它后来改组、扩大为企划厅(1937年5月)、企划院(1937年10月)。企划院的职权是在总理大臣的统辖下，起草和审议有关平时战时的扩充、运用综合国力的方案，以及对各省厅有关制定和实施国家总动员计划的事务加以调整统一。^② 企划院实际上是“政策参谋本部”，加强了总理大臣对各省厅的协调、统辖权力。不久，由企划院起草，经议会通

^① 过明清：《日本官僚制的研究》，弘文堂1954年版，第217页。

^② 近代日本研究会编：《昭和时期的军部》，第171页。

过《国家总动员法》，加强了内阁的集权。

综合国策机构的设立和《国家总动员法》的实施，在机构和立法方面为全面确立极权主义统制铺平了道路，各种统制措施相继出笼。其他新设的统制机构有主持农村经济更生运动的农林省经济更生部(1932年8月设立)，负责思想、文化、教育统制的文部省文教审议会(1937年5月)、文部省教育局(同年7月)和内阁情报部(1937年9月)及其改组扩大的内阁情报局(1940年12月)。

自上而下建立极权主义统制的基本力量是天皇制官僚。官僚与军部一起，是近代天皇制的两大政治、军事支柱。官僚的职责一向是维护现存体制。“九·一八”事变后出现了一批新官僚，他们起劲地鼓吹“革新”，超越省厅界限，形成横向联合，并与军部密切联系、合作。1932年1月，由近卫文磨、吉田茂(内务官僚，与外交官、战后首相吉田茂同名)、松本学、广田弘毅、后藤文夫、荒木贞夫等人发起，成立了国维会，以“广结人材，实现国维之更张”为纲领。它的核心成员是新官僚。在斋藤内阁中，国维会的新官僚担任要职，如后藤文夫任农林大臣，松本学任警保局长。后来，后藤文夫任冈田内阁的组阁参谋，并任新内阁的内务大臣。吉田茂任新内阁的书记官长，后任内阁调查局长官。新官僚越来越显要，他们分布在内务、农林、商工、大藏、递信、外务等各省。他们以内阁调查局、企划厅、企划院为大本营。各省厅的新官僚人数虽不多，但能量很大，是建立极权主义统制的主要策划者。

各种统制的实施，当然离不开其他官僚。斋藤内阁于1932年9月修改了文官身分令。按原先规定，文官不得被任意退职，但可“根据官厅事务的状况”实行停职，高等文官若停职二年就要退职。新规定则改为，文官停职必须取得文官身分委员会的同意，

① 荒川几男，《1930年代——昭和思想史》，青木书店1971年版，第175页。“国维”二字取自管子《牧民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这使文官身分得到进一步保障，避免了政党内阁时期任意大批撤换官员的情况，加强了官僚的地位。

随着局势的发展，天皇制官僚机构也逐步法西斯化。经济官僚是经济统制的主力。内务官僚在国民统制方面起主要作用，大政翼赞会和町内会、邻落会、邻组等基层组织都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在思想、文化、教育统制方面，有情报局和文部省的官僚。如果说军部是国家法西斯化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那么官僚是建立极权主义统制的具体策划者和日常操纵者。

通过利用和改组天皇机构而建立的极权主义统治，带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对整个社会生活和广大国民，实行了严密的极权主义统制，这与德意法西斯主义是共同的。另一方面，对天皇制机构的改组不可能从根本上突破其结构，因而在政治权力的掌握与运用上，除了议会名存实亡外，仍基本保留着近代天皇制原有的分权体制，不存在德、意那种极端的集权。

天皇握有统治大权，通过1935年的国体明征运动，进一步确认了天皇统治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天皇实际上仍然统而不治，统治权力并没有真正集中到天皇手中。在天皇之外，任何个人、机构都不允许拥有过分的权力，任何有幕府政治重演之嫌的事都要杜绝，这是明治年代以来的规矩。1940年，近卫的新体制运动打算学习德国，实现“一国一党”。陆军对此大力支持。后来就因为“幕府政治的再现”之嫌，不得不作罢。天皇制各个机构各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并竭力维护这种权力。以官僚来说，他们充当军部建立极权统制的帮手，但不允许军部侵犯他们的权力。1936年9月，陆军提议改革行政机构，一是合并部分内阁省厅，二是加强首相的统辖权力。各省厅官僚仍担心自己的权力将被削弱，群起抵制，改革只好搁置起来^①。在军部内，一向以陆军为

^① 《昭和时期的军部》，第144页。

主，真正能够操纵政治权力的唯有陆军，但陆军和海军分属两个平行的领导系统，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和权力之争。海军不想让陆军握有过大的权力，如“二·二六”事件中，海军担心树立军事政权最终会导致陆军独裁，他们把舰队集中在东京湾、大阪湾，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警戒海军省等处，以防不测。

为了尽可能地克服权力分散状况，一再有人提出建立军政府。陆海军上层面对上述情况，一直避免这样做。另外，随着排外热的逐渐下降和扩军负担有增无已，民众对于军部的不满有所滋长，这也给军部上层增加了阻力。“二·二六”事件发生后，据内务省的情报，国民对于“叛军将校的残虐不肆抱有反感”，并且认为“军部企图乘机干涉政治”，以致“对于全体陆军有怨嗟之声，反军思想到处发生”。^①当时，陆军省、参谋本部和东京、关东各地驻军的军官却连日集会，强烈要求建立军政府。鉴于种种情况，陆军当局不得不花大力气进行说服，平息了“军政府热”。^②

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又一次煽起排外热，暂时抑制了群众不满情绪的流露。但从1938年下半年起，国民中的反军厌战情绪又有所上升。1939年春，内务省警保局的“政治情报”写道：“最近特别不可忽视的显著事例，是报纸上出现的讽刺军方的言辞相当辛辣，为数不少”。^③1940年2月，民政党议员斋藤隆夫在众议院指责政府、军部对“中国事变”（日本政府对全面侵华战争的称呼）处理不当，责向“中国事变究竟是怎么回事？何时才可了结？要延续到什么时候？”希望“尽可能迅速，尽可能有利有效地处理解决事变”。^④军部给斋藤加上“反军”罪名，迫使众议院予以除名。但是斋藤却收到来自各地的700多份信件、电报，其中近90%都是对他

① 《资料日本现代史》(9)，大月书店1984年版，第247—249页。

② 《军务局长武藤章回忆录》，芙蓉书房1981年版，第19页。

③ 《资料日本现代史》(10)，大月书店1984年版，第281页。

④ 《资料日本现代史》(11)，大月书店1984年版，第508—509页。

表示感谢、激励，赞扬他说出了“国民之声”^①这是群众对军部不满情绪日积月累的一次爆发。面对这种情况，不要说成立军政府，就是由现役军人任首相，军部也深有顾忌。1940年1月，当阿部内阁行将辞职时，陆军中有人提议由前陆相杉山元组阁。杉山元大不以为然，他说：“如由现役大将出任总理大臣，只会火上浇油，使反陆军的空气越来越强烈”。^②

通常说1936年起军部确立了政治支配地位，是指军部可以肆无忌惮地干涉内阁的组成和内阁的政策，并不意味着军部直接执掌政权机构，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在德国，根据《党国统一法》和其他法令，第三帝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都处于纳粹党的直接控制之下。意大利法西斯党也直接操纵“总体国家”的各级政权。日本军部不能与之相比。1941年，在非常情况下，当统治集团中除军部外谁也不敢冒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风险时，出现了东条内阁和东条独裁。东条以现役陆军大将身分，任首相兼陆相，后又兼军需相，一度兼任内相和参谋总长。据1943年的战时行政特例法和战时行政职权特例，首相有权直接干涉，改变省厅的某些决定。但是，东条的独裁权力仍是有限的。以兼任总参谋长，掌握陆军统帅大权来说，只不过5个月。东条的权力与集大权于一身的希特勒远远不能相比，也比墨索里尼大为不如。

那么，能否因为政治权力的一定分散而否认日本法西斯主义呢？应该看到日本同样发生了政权形式的转换，从政党政治改变为军部支配政治。主要的实际权力通过不同方式集中到军部手中。原有的天皇制机构经过改组，已经适应了国家法西斯化的需要。

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政治上极端集权的目的，在于对整个社会生活和广大群众建立起极权主义统制，是否把全部社

① 《资料日本现代史》(11)，第488，510～511页。

② 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第8卷，第157页。

会生活都无所不包、无孔不入地统制起来，是法西斯极权主义区别于封建专制统治和一般中央集权的主要标志。在日本，既然同样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统制，因而政治权力的一定分散不能改变统治体制的法西斯主义本质。

借助天皇制意识形态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第四个特点是以天皇制意识形态作为重要思想武器，具有浓厚的封建、复古、空想的思想特征。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思想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法西斯总体战思想，并非日本的传统思想，而是现代帝国主义极端反动的思想，并深受德、意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影响。同时，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运动和体制，无不打上官方正统的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深刻烙印。

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天皇制意识形态的联系是个大问题，这里不打算详述。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国体论”，它宣扬天皇统治是日本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君民一体是日本国体的精华，天皇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大权神圣不可侵犯。官方一直在宣传，天照大神是日本的国祖，历代天皇是神的后裔，而且是现人神。日本的国体是“万邦无比”独一无二的。因此国体论又是同鼓吹大和民族优越论的神国思想联系在一起。从国体论中又引伸出“家族国家论”，鼓吹日本是以皇室为总本家的一大家族，天皇既是一国之君，又是大家族的家长，国民以孝敬父母之心崇敬天皇，故而忠孝合一。日本法西斯主义充分吸取、利用了这种传统思想，受到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和制约。

法西斯主义主张国家有毫无限制的绝对权力，也可以说是现代极端专制主义。国体论的专制思想与法西斯极权主义有共通之处。国体论和家族国家论宣扬天皇政治的超阶级性，“君民一体”，

“一国一家”，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进行所谓消除阶级对抗的社会蛊惑宣传，两者可以相通。近卫文麿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委员谷口吉彦（当时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写了《新体制的理论》（千仓书房1940年出版），其中指出，“新体制的根本理念，是反对个人主义的综合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统裁主义，以及反对民主原理的领袖原理。”“综合主义”、“统裁主义”^①不过是极权主义的同义语，“领袖原理”则直接贩自希特勒。谷口吉彦接着写道：新体制的原理“同最为符合日本性格的我国从古以来的思想是相近的”，日本自古以来对于家及其扩大的国的看法与新体制的理念，“在其根本观念上完全一致之处极多”。^②因此，日本法西斯主义既有在资本主义全面危机这一现代气候和土壤中产生的反动思想，又大量地吸取、借助了传统的天皇制意识形态。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这种构成方式，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粹相比，有异有同。共同之处在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同样也是各种反动思想的杂烩。

对于法西斯军部及其上层支持者来说，指导他们行动的主要是法西斯极权主义和法西斯总体战思想，然而他们许多人的言论和政府，军部的官方文书中，也充斥着“万民翼赞”、“举国一家”、“共存共荣”等皇道精神。上层人物中自然也不乏国体论、家族国家论的狂热鼓吹者。比较而言，民间法西斯思想带有更强烈的传统思想的色彩。民间法西斯普遍尊奉日本主义，其基本内容也即国体论思想，有的民间法西斯分子称之为天皇中心主义。它鼓吹以天皇为中心改造国家，甚至要求天皇亲政，排除介于君民之间的“疎隔群”，采取恐怖暗杀，“清君侧之奸”。它鼓吹一切以天皇为中心，抛弃一切自我，把一切奉献给天皇。民间法西斯还对国

① 日文中的“统裁”意为，由最高首脑统一全体，裁断是非。

② 石田雄前引论文。

国体论作出新解释，鼓吹天皇平等主义，说什么由于日本特有的国体，应该而且可以实现“一君之下万民平等”。天皇平等主义与天皇中心主义是相互关联的，往往交织在一起。天皇平等主义以天皇中心主义为前提，离开天皇这个政治中心，就无所谓天皇平等主义，而实行天皇平等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扶翼皇运”，维护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帝国。

国体论与日本法西斯统治有何关系呢？军部、官僚对于国体论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既要依靠、利用天皇权威，又不愿让自己的行动过多地受到天皇权威的束缚。因此，他们有时不得不服国体论的限制，如由一国一党改为成立大政翼赞会。他们更不会公开冒犯国体论。然而，他们的实际行动常常是假借天皇权威自行其是，并不真正遵从国体论。从日本法西斯化的过程来看，国体论的主要作用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它是扼杀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棍棒，是煽动、控制群众的思想手段。把国民置于国体论和天皇权威的支配之下，有助于在国内建立极权统治。把国体论和家族国家论引伸到对外事务上，就是所谓“国兼六合，八紘一宇”，以此煽动对外侵略战争。

天皇制意识形态给日本法西斯主义涂上浓厚的封建的、皇道的色彩。另外，在民间法西斯思想中，还有强烈的复古、空想倾向。这在农本自治主义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权藤成卿要求倒退到以农为本，乡里自治的状态。橘孝三郎对此加以修正，主张以皇室为中心，把以农为本与工商主义、地方协同自治与中央集权结合起来。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被看法西斯主义的经典。关于国内改造，它主张依靠天皇大权，实现限制财产、土地、资本三原则，这何尝不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呢？

德国纳粹主义打出了社会主义的旗号，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掺和着工团主义思想，日本法西斯主义则带有浓厚的封建、复古、空想的思想特征。国家社会主义在日本民间法西斯主义中不是主

流，而且它也不过是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天皇中心主义和天皇平等主义。

日本法西斯主义这种思想特征的形成，有历史传统的影响，也归因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中间阶层的状况。在当年日本，自耕农、中小地主、中小工商业者、手工业者占中间阶层的70%以上，其中大多是小生产者，多数又是农民。无数小生产者形成一个个父权家长制的细小、闭塞的单位，散布全国各地。这种散漫、闭塞、落后的小生产者原是近代天皇制的社会基础，近代天皇制一直致力于保持这一社会基础。1936年帝国农会干事冈田温说：“国体、家族制和小农制是不可分的”。日本的国情要求维持小农制，因为“小农制支持家族制度，家族制度是维护国体的支柱”。“农者国之基也，其真正意义实寓于此”。^①从一次大战后到30年代，在经济动荡和危机的冲击下，散漫、闭塞、落后的小生产者既对现状不满，又找不到明确的出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封建、复古、空想的内容，正是迎合和反映了这种小生产者的心理、情绪。许多工人也不能不受到小生产者情绪的影响。

日本法西斯主义还有其他特点，不再赘述，主要是以上四个特点。有的特点表现了日本一国的特殊性，有的只是反映了日本与德、意的差异，在其他法西斯国家中可能也有类似之处。日本法西斯主义最主要的特点，是通过近代天皇制自上而下地逐步实现国家法西斯化。充当法西斯主义核心力量的军部及其与官僚和其他权势集团的结合，从内部自上而下地推进了近代天皇制向法西斯主义体制的演变。先外后内——首先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上下结合——下层激进法西斯运动的压力，以及借助天皇制意识形态，都是为了推动、加速、保证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这种形态的法西斯化使属于君主立宪范畴的近代天皇制转变为法西斯极权

^① 河原宏，《昭和政思想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9年版，第47—48页。

主义体制，但又保留了近代天皇制原有的政治权力一定分散的特征。日本的“自上而下”为主，德、意的“自下而上”为主，是历史上国家法西斯化的两种基本类型。

日本这种法西斯化形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渐进性。在法西斯化初期，一时不容易觉察法西斯威胁正在迫近。“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下，日本革命、进步力量开展了英勇无畏的反战斗争。共产国际讨论通过的日共《三二年纲领》十分强调反战斗争，但是却又认为，“企图用那逼近的法西斯主义幽灵来美化现存的天皇制”，“把反对天皇制的群众斗争，转移到仅仅是反对所谓正在迫近的法西斯政变危险的斗争轨道上去”，是“特别危险”的诡计。^① 导致这种错误看法的原因这里不去详论，把法西斯主义称为“幽灵”足见对法西斯主义的现实危险严重估计不足。1932—1933年，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理论杂志《劳农》、《前进》曾对日本政治法西斯化的危险提出警告，但又断定：青年将校的行动“不是当前大不了的事”，“5月15日这样的事件以后还会发生，但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或者认为，“必须同我们面前的法西斯主义及其倾向作斗争，但是我国的法西斯主义还未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大势力”。^② 这种看法显然是对日本法西斯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特点及其渐进性、隐蔽性缺乏认识。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有形态，也增加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复杂性，给确定斗争策略增添了难度。主要难题是如何对待天皇制，如何认识近代天皇制与法西斯主义的联系与区别。当年曾经有过偏差，一种是强调了天皇制与法西斯主义的联系，认为“革命的中心(战略)斗争目标，在现阶段，仍然是打倒天皇制，而不是打

^① 《共产国际关于日本问题方针、决议案》，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60页。个别文字据日文版作了更动。

^② 《昭和恐慌》，第301—303页。

倒法西斯主义”，因为“离开了天皇制问题来揭露和攻击法西斯主义，不但毫无意义，而且有害”；^①另一种是只讲反法西斯斗争，放弃了反对天皇制的斗争，包括反对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斗争。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曾经提出，“封建的因素，正确地说绝对主义的因素”，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然而它被组合在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或者与之相结合，处于“从属的位置”，因此，既然突出了与现代主要政治势力法西斯主义的斗争，那么封建主义不妨可以暂时不予追究。^②前一种是在共产国际影响下的“左”的偏差，后一种似乎抓住了主要斗争任务，实际上则是削弱反法西斯斗争的右的偏差。

正确的策略既不是推翻天皇制，也不是放弃同天皇制的斗争，而是阻止天皇制向法西斯主义方向的演变，揭露、反对法西斯军部和其他权势集团、法西斯势力利用天皇制机构和天皇制意识形态推进国家法西斯化，维护近代天皇制的立宪、民主一面，维护国民已经享有和争得的民主自由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加强反法西斯斗争。在政治上暂时收回打倒天皇制的口号，丝毫也不意味着要同时停止与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斗争。日本法西斯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特别具有明显的封建主义色彩，为了把群众从法西斯主义的欺骗宣传中解脱出来，必须揭露、批判法西斯主义大加利用的天皇制意识形态。就这个意义上说，反封建主义斗争与反法西斯斗争是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

① 《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篇)，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1页。

② 大森义太郎：《现代我国政治的基本情势》(《中央公论》1936年5月号)，转引自《日本法西斯主义I》，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4年版，第169页注。

第三节 日本法西斯主义基本形态概括

在分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各个具体特点之后，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应该怎样集中概括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形态？使用什么样的提法才能最确切而又简要地体现它的本质及其特性？这也是国内外学者长期存在争论的一个问题。通常见到的提法有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军部法西斯主义、超国家主义，也有军事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提法。在我国史学界，主要是“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还是“军部法西斯主义”的分歧。

军部法西斯主义提法的缺陷

战后初年，在日本学术界关于日本法西斯主义问题的争论中，使用了军法西斯主义、军事法西斯主义和军部法西斯主义之类的用语。日本法西斯主义肯定论者是把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与军部法西斯主义并用的。从1950年起，当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成为通行说法之后，军法西斯主义、军事法西斯主义的用语便消失了。军部法西斯主义则作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同义语，继续在使用。

在我国，有的日本史研究者认为，军部法西斯主义的提法比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更恰当。他们这样主张，主要是强调军部的主导作用，军部是日本法西斯化的主要推动力量。^①军部法西斯主义的提法确实抓住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突出特点，但是概括不很全面。没有着重从体制上表明它的根本特征。

^① 参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第56页；《世界历史》1988年第1期第158页。

首先，军部本身是天皇制的核心组成部分。军部能够在法西斯化中起主导作用，所凭借的特殊地位和权力是天皇制给予的。它的行动也受到天皇制的一定限制，不能超越天皇制所允许的范围。

其次，军部确立政治支配地位，并不等于军部直接掌握了政府权力。国家法西斯化是通过天皇制机构，自上而下地实现的。军部需要天皇制机构的配合、支持，也受到它们的牵制。天皇制官僚并不由军部支配，而是作为军部的同伙，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次，为实现军部提出的建立总体战体制的纲领和目标，在思想煽动和思想统制方面，主要借助于天皇制意识形态。

总之，军部法西斯主义这一提法的一大缺陷，是冲淡了近代天皇制在法西斯化中的作用。相反，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提法则包含了军部的主导作用。

天皇制法西斯主义

有些持军部法西斯主义说的研究者反驳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提法，强调天皇不亲政，无实权，“统而不治”是政治上的权威“机关”而不是现实政治的支配力量。天皇制之下的国家政治体制的结构变化，犹如一框积木，搭出了各种小房子，出现了藩阀元老政治——政党政治——法西斯政治这样的演变和递嬗，这是日本近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如果把日本法西斯规定为天皇制法西斯，就是只见积木的框架，忽略了小房子的屋顶。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史，就是法西斯军部所领导的反对议会民主、否定政党政治的历史，就是法西斯军部控制国家政权的历史。因此，在概括日本法西斯主义基本形态时舍弃军部这个控制日本政治方向的恶魔不提是不合适的。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理解。如同前面已经指出的，军部的存在及其权力都是近代天皇制的组成部分，而它的行动和作用最终也需局限于近代天皇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如果同意前述近代天皇制具有两重性以及它经历了两种倾向的演变这样一些观点，那么，比较而言，还是把日本法西斯主义称之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更为适当。

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提法以承认军部是近代天皇制核心组成部分为前提。这一提法首先意味着近代天皇制向法西斯主义体制的演变，这种演变没有改变政权的基本阶级属性，而是从原来具有两重性的、属于君主立宪范畴的统治体制逐步变为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又意味着近代天皇制及其意识形态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深刻影响和制约，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德、意法西斯主义的种种特点。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还意味着，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着重要阻止近代天皇制向法西斯体制的转化，维护近代天皇制的立宪、民主的一面，抑制军部跋扈，反对侵略战争。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这几层含义，全面明确地概括了实际情况。表明它是一个可用的恰当的概念。

不过，需要作点说明：这里所说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内涵与二次大战后曾在日本学术界通行多年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论有重大区别。在40年代末，围绕志贺、神山争论而展开的日本法西斯主义问题的争论中，支持志贺的守屋典郎最先提出并论述了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后来他的看法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并共同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探讨、阐述。关于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论的基本内容，可见当年的两段论述。

其一：“天皇制的暴力压制和残暴的侵略战争体制的强化，是代替垄断资产阶级完成了露骨的暴力统治和侵略主义。因此，我以为可以称之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是垄断资本的直接暴力统治，但是天皇制在本质上是绝对主义的国家机构，而不

是垄断资本直接掌握的政权。”^①

其二：“绝对主义的天皇制保持不变，作为帝国主义的政权，起到了法西斯主义的作用”。^②

可以看到，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论的核心理论，即绝对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的天皇制机构，起到了代表垄断资本的法西斯主义的作用。这是一种机构、机能分离说，^③即一种性质的统治机构却可起到另一种性质统治机构的作用。这在理论上是难以讲通的。而且，看不到近代天皇制机构的两重性，把它看成从来都是绝对主义性质的，也不符合实际。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论由于有这个主要缺陷和其他的不足，后来不再通行，日本学者一般就干脆使用日本法西斯主义这一用语。

在我们看来，尽管有过这一认识上的曲折，其实只要注意澄清是非，指明内涵，并不妨碍仍然使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这个用语。

其他三种提法

在学术界，关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概括还有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各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足之处亦甚明显。现一并作些简要的评介。

万峰在日文版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亡》中提出，“日本法西斯主义可以确定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但是应与‘军部法西斯主义’并提，以强调天皇制军国主义。因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从根本上

① 井上清，《日本历史讲座现代篇概说》，见《历史科学大系第12卷“日本法西斯主义论”》，校仓书房1977年版，第157页。

② 守屋典郎，《关于战后的天皇制》，转引自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序说》，第36页。

③ 安部博纯同前书，第88页。

来说，是由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法西斯化而形成的，军部法西斯分子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就此而言，所谓日本型法西斯主义的特征可以说是‘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或者‘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①力求突出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联系，这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天皇制^②这个概念就包含了军国主义为其主要内涵，因此，还有没有必要在天皇制之后再加上军国主义呢？而且，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容易同军部法西斯主义的提法相混淆。至于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鉴于法西斯主义就是极端的军国主义，有没有必要把两个概念重叠使用呢？

在学术讨论会上，也曾提出用封建军事法西斯主义概括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形态。这一提法，如果是指具有封建性和军事性，那是任何法西斯主义所共有的；如果是指封建性特别浓厚、军部起主导作用，那么与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是一致的，而且不比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提法有更多的长处。

在日本的有关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超国家主义的提法。对于超国家主义的基本含意，大致有两种主要解释，一为ultranationalism的日本译语，即极端民族主义，一为极端国家主义。极端国家主义，一方面是否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并使国家权力无限膨胀的极权主义，另一方面是极端民族沙文主义，疯狂对外扩张。^③不论哪一种解释，所指的基本上是法西斯主义的共性。超国家主义还指明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同日本历史上、主要是明治以来的国家主义的联系。明治年代就有强烈的国家主义思潮，竭力宣扬国家至上、国权第一，主张为了维护和扩大国权，民权必须服从国家，并实行对外扩张。日本法西斯主义正是

① 万峰，《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亡》，六兴出版(株)1989年版，第26页。

② “天皇制”这个概念由《三二年纲领》提出，当时就是指近代天皇制。

③ 参见安部博纯前引书，第316—317，329—330页；《世界大百科事典》，平凡社1981年版，《超国家主义》条目(神岛二郎撰)。

这种国家主义的恶性发展。超国家主义的提法突出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渊源，从一个方面表示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点，但不能全面概括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的形态。

第九章

法国、西班牙、葡萄牙 和巴西的法西斯运动

第一节 法国法西斯运动的失败

法国法西斯主义问题，是国外史学界在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中争论较大的问题之一，争论的焦点是法国是否存在真正的法西斯主义。50年代以来，很多史学家，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法国史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论点：30年代的法国左翼联盟人民阵线夸大了法国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各种右翼集团并非如人们所说的是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组织，而是传统的法国右派。本节将通过20、30年代法国右翼集团产生的背景，它们的纲领、活动及最后失败的原因来说明这些集团本质上是属于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范畴。

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团体

法西斯主义既是时代的产物，其特点必与时代的特征不可分。在研究欧洲法西斯主义问题时，20世纪20、30年代的西方世界有两个重要特征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虽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诞生，但半个多世纪过去，它并没有成为现实。资产阶级国家想方设法诋毁、抵制这种思潮，尤其善于利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以改良的社会主义来代替马克思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社会主义理想开始变成事实，不仅对当时盛行于欧洲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改良主义是沉重的打击，对各国工人运动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而且给予妄图扼杀社会主义思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各国资产阶级当头一棒。他们把马克思创导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具体地说把布尔什维主义视若洪水猛兽，深怕蔓延到自己国内，动摇资产阶级统治。假如说过去他们的攻击目标是尚未付诸于实践，因而无法用实践来检验的社会主义思想，那么现在所敌视的却是已被革命实践——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证明其科学性的客观真理。因此，资产阶级必然要寻找比以往半个多世纪中所采用的更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

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日益激化。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曾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其中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严重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几乎感到资本主义体系快寿终正寝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是否有能力如同过去那样通过“内部调节”渡过这次危机？为此又当采取哪些措施？这是各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阶层急待寻找答案的问题。

从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体来说，第一次大战后的20年中，各国毫无例外地都需要解决对付共产主义和经济危机的问题。但就具体国家而言，各资本主义国家情况各异，民族特征的差异也很大，因此各国解决危机的手段必然不同。

法西斯主义思潮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在某些国家首先产生的。作为挽救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法西斯主义的矛头自然首先针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但由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在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威胁”面前，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面前一时束手无策，因此法西斯主义作为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极端形式，也必然要摒弃民主和自由原则。这种既反共、又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潮并不必然出现于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被每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所采纳。即使产生，也有时间的先后，而且必定具有自己民族的特点，对各国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影响程度也有很大差异。

法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类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内工人运动高涨，议会中的左派结成联盟，多次在大选中获胜而执政。然而，对于革命运动和经济危机，左派联盟政府也束手无策，显得软弱无能，而且政治、财经丑闻层出不穷。内心仇视议会民主制的右翼党派和右翼势力蠢蠢欲动。

右翼集团第一次涌现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1919年，法国革命罢工运动风起云涌时期。那时出现了一些称之为“公民集团”的组织，它们的口号是保卫祖国、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的侵蚀。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由比内-瓦尔梅于1919年1月创建的排长联盟。1924年左翼党派联盟组成政府以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右翼集团。最主要的有于1926年成立的、以皮埃尔·泰坦热为首的“爱国青年”，于1925年成立的、以乔治·伐洛瓦为首的“束棒”，于1927年成立的、由莫里斯·阿诺·达尔托瓦领导的“火十字团”（1929年拉洛克上校加入后成为其有影响的头头，1936年被取缔后改名法兰

西社会党)。

1932年左派联盟又一次在大选中获胜，右翼集团再次纷纷出笼。1933年，由弗朗索瓦·科蒂资助并创建，让·雷诺领导的“法兰西团结”；以及同样由科蒂资助、并由马赛尔·布卡尔创立“法兰西主义”。^①有一些从当时的左翼党派中分离出来的成员逐渐向右靠拢，直至成为极右分子。如社会党的马塞尔·德阿、蒙塔尼翁、阿德里安·马尔凯，激进党的加斯东·贝尔热里，共产党的雅克·多里奥等分别组织了法兰西社会主义党(1933年)、阵线主义(1934年)、法国人民党(1936年)。^②加入反共产主义、反资产阶级民主大合唱的还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办报刊、杂志，宣扬法西斯主义思想。有罗伯尔·布拉齐亚克、吕西安·勒巴泰、克洛德·让泰、蒂埃里·莫尼埃、阿兰·鲁布卢、卡米尔·费里等办的报纸《我无所不在》(1930年)，贝尔特朗·德鲁弗内尔和德里欧·拉洛谢尔合作创办的周刊《青年人的斗争》(1928年)，蒂埃里·莫尼埃等创办的月刊《战斗》(1936年)等。^③

除上述在两次大战之间成立的右翼集团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特别是在布朗热主义运动^④和德雷福斯事件^⑤中，就已出现过一些右翼组织。如保尔·德鲁莱德的爱国者联盟，茹尔·勒迈特的法兰西祖国联盟，以及1905年建立的极右组织法兰西行动^⑥，它们在20、30年代也猖狂地反共反民主。

① 丁·普吕米埃纳、R·拉西埃拉，《法国法西斯主义，1923—1963》，巴黎1963年版，第17—63页。

② 普吕米埃纳、拉西埃拉，《法国法西斯主义，1923—1963》，第86—91、110页。

③ Ph. 马什费，《集团和法西斯主义在法国》，巴黎1974年版，第19—20页。

④ 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法国出现的以陆军部长乔治·布朗热为首的、主张向德国复仇、反对议会制度的右翼思潮。

⑤ 19世纪90年代后期，民族主义分子、反犹分子、教权主义者借德雷福斯事件结成右翼联盟掀起的运动。

⑥ “法兰西行动”最终目标是复辟王朝统治，因此一般不把它列入法西斯主义性质的组织中。

为什么上述这些集团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呢？首先，我们可以从这些集团的纲领、宣言或文章以及头面人物的讲话中，看出他们成立集团的宗旨和矛头所向是反共产主义和反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这同德、意法西斯的纲领以及他们创始人和理论家的言论和著作中明确体现的目标是一脉相承的。

有些右翼集团就是在共产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工人运动兴起的背景下出现的。如1924年11月，在饶勒斯的骨灰运至伟人公墓那天，共产党人组织了空前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右派报纸立即撰文斥之为共产主义阴谋，爱国者联盟号召反击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在此形势下，“爱国青年”诞生了。他们组织了准军事别动队，任务是“防止国内革命”，“想方设法破坏共产主义行动”。^①

法兰西主义集团1934年3月发表的章程提出反对社会不公平，原因是它导致人们接受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等学说，并要彻底消灭专搞宣传这些学说的人。^②

当时影响最大的集团火十字团在它被取缔前以及后来变成政党——法兰西社会党时期，它的反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极其明显的。在1931年11月11日发表于《火炬报》上的纲领中说：“对于共产党在军队中所作的秘密宣传要进行坚决而顽强的斗争。”^③在谈到对殖民地的政策时说，“对于第三国际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影响下所作的排外宣传要采取有力和有预见性的态度，必要时予以惩罚”。^④1938年1月7日法兰西社会党议员斯塔尼斯拉斯·德伏在《小报》上谈到该党宗旨时明确地声称：“我们将继续作出不懈努力，直到在以后举行议会选举时，在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议会多数派中，法兰西社会党组成的集团将居压倒多数的领先地位，我们思想上认为……这将是‘夺取政权’的主要方法。”^⑤接着又强调

① 普吕米埃纳、拉西埃拉：《法国法西斯主义，1923—1963》，第29页。

② 马什费：《集团和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第45页。

③④⑤ 马什费：《集团和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第56、55、56页。

法兰西社会党要“致力于使绝大多数法国人不要变成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因为一想到上个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及当时的‘工人条件’，我们毫不惊奇法国人民群众会投向某个卡尔·马克思或某个斯大林的怀抱”。^①从所引材料可看出，法国右翼集团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是担忧，甚至是惧怕的，他们要通过“坚决、顽强的斗争”，不仅使法国人民，而且使军队，甚至其殖民地抵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渗透。

为了防止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断高涨和维护他们理想中的资本主义制度，法国右翼集团也企图像德、意法西斯那样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加以克服。为此，在政治方面，“束棒”提出“无能的议会必须放弃权力”，“建立在……一个领袖统治下的超政党、超阶级的全国专政”。^②“法兰西主义”要“摧毁议会制”、“重新制定一个适合我们时代的宪法”，“建立一个不附属于任何力量（不管是什么力量）的政府，它有能力施展权威并从唯一的整体利益出发完全公正地行事”。^③火十字团要求“对议会的工作方法进行深刻而刻不容缓的改革”。^④在经济方面，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自由倾向，在火十字团的纲领中有关经济的部分条文规定，“通过建立大型民族企业发展国内市场，但禁止任何形式的垄断”，“对投机倒把采取严厉的控制政策”，“限制某些大工业企业过分倾向于寻求单纯金融活动中的管理平衡，而不是为改善生产方式和产品质量寻求平衡”等等。^⑤由此可见，右翼集团的另一主要目标是反资本主义自由、民主。

其次，法西斯主义需要有针锋相对的“学说”和“理论”，否则不可能把群众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争取”过去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道：“当某一个政党（马克思主义党）被一种哲学意识——不管它怎样罪恶——的全部武器所武装，向现存秩序发

^{①②③④⑤} 马什费：《集团和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第57、40、45、54—55页。

起进攻时，其他政党如若在当今不采取一种新政治信条形式，不以勇敢的、突然袭击的战争呐喊代替软弱而怯懦的防御性言论，那么它将处于被动抵抗的地位。”^①这种“政治信条”就是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和德国纳粹党纲领中的核心思想：极端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思潮在很多民族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对于资产阶级已经执政的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往往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即打着恢复本民族历史上的伟大业绩、继承本民族祖先的光荣使命的旗号，根据当时本国具体情况而推行扩张主义、复仇主义或种族主义，目的在于巩固和维持当时的统治。两次大战之间法西斯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口号一方面带有各国历史上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痕迹，另一方面也根据时代的需要而赋予了新的内容。

法国民族主义思想是有传统的，例如波拿巴主义、布朗热主义、反德雷福斯运动，在不同时代不是以扩张主义，就是以复仇主义或反犹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而20世纪20、30年代法国右翼集团在继承传统民族主义方面，从形式上说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都有所区别。那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虽然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但它是战胜国，战争的残酷又使法国人民渴望有长久的和平生活，而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也为了确保法国在战后的既得利益而希望维护现状，因此其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不是向外扩张，收复失地，而是竭尽全力以法兰西的伟大、民族的安全为，由巩固既得胜利果实，维护法兰西殖民帝国。这一点几乎在所有20、30年代成立的法国右翼集团的纲领和言论中都有所反映。“束棒”在1926年7月15日《新世纪》上发表的纲领所规定的首要目标之一是“通过中央集权国家的方法协调法国所有力

^① 希特勒：《我的奋斗》，转引自罗歇·布尔德隆：《法西斯主义，思想和实践》，巴黎1979年版，第36页。

量以实现其繁荣和伟大，170万法国人在1914—1918曾为之献出过生命”。^①“法兰西主义”的章程规定的目的之一也是“恢复法兰西的伟大以及建设未来”。^②耐人寻味的是该组织的旗杆顶上置有法兰克战斧。法兰克人是法兰西民族的祖先，以他们的自卫武器作为标志象征着要恢复过去的光荣和伟大。右翼集团排长及战士联盟的主席比内-瓦尔梅提醒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人为文明和祖国战斗过，不要忘了死者作出的牺牲，并且要求所有主张民族主义的集团和爱国者联盟联合，以便使所有想在和平环境中建设家园的法国人制止民族敌人的行动，即使通过武力亦在所不惜。意味深长的是民族敌人已不再是德国帝国主义，而是“莫斯科侵略者”、“苏维埃帝国主义”，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某些曾共同并肩战斗的兄弟已走到了“布尔什维集团”中。^③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战士为主体的火十字团的纲领中虽然没有提到法国过去的伟大，但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取得的利益紧密相关的。在有关殖民地问题上主张“开发海外属地……保证他们互相联系以及和法国本土的联系”，“不断研究各种殖民地土著的问题，同时要考虑到适合法国殖民特点的文明作用和引导作用”，“在法国政府内部，协调各种殖民土著的政策”。^④在对外政策中第一条就提出“至少要在十多年内维持条约所确定的欧洲现状”。^⑤以上这些都充分体现从民族主义出发维护法兰西殖民帝国利益和一战后既得利益的思想。

不论是德、意的扩张殖民地，夺回失去的利益，还是法国的保住殖民地，巩固既得利益，形式上虽恰恰相反，实质上都是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然而这不是当时法西斯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中最具有时代特征的内容。如前所说，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为了改造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原则，法西斯倡导

^{①②} 马什费：《集团和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第41、45页。

^{③④⑤} 马什费：《集团和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第38、55、55页。

的极端民族主义肩负起了新的“任务”。为此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和德国纳粹党都把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推向极端和塞进了一些新的货色，使其更符合他们的政治需要。

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在其纲领中提出要建立“纯粹法西斯主义的、自治的”“职业团体”，这种团体应有“两个基本目标：一作为民族团结的体现，二作为发展生产的手段”，“职团”的建立必须服从“民族高于阶级”这样一种原则。^①

德国纳粹党在25点纲领中直接或间接地表述了日耳曼种族、德意志血统高于一切的思想，任何个人的、个别的利益都必须服从种族利益，企图以种族斗争代替阶级斗争。希特勒曾强调，种族主义思想就是作为“一种组织能力来对付毁灭性的马克思主义的”，^②“纳粹的‘职团’不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组织，而是一种职业的代表组织”，“纳粹党的工人和资本家都是民众共同体中的代表和代理人”。^③

无论是意大利的“职团”，还是德国的“民众共同体”，实质上都是主张给予在社会上和在生产中不同地位、不同经济利益的人以共同的利益：民族或种族的利益，从而把工人、老板、职员、技术人员都汇聚到同一个团体中。法西斯主义把各类人都称作“生产者”，因为他们认为资本家、技术人员、工人各自提供金钱、智力、劳力来完成共同的使命——民族的生产，三者缺一不可，因而这种共同体也可称作生产者共同体。既然民族的使命高于一切，那么工人阶级就应该放弃阶级斗争，如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的纲领中就规定不许进行罢工斗争，而资本家应在无止境地追逐利润的自由竞争中有所收敛。德国纳粹党的纲领第14点中提出劳动者有权享受

^① 转引自罗歇·布尔德隆：《法西斯主义，思想和实践》，第174—176页。

^② 希特勒：《我的奋斗》，转引自罗歇·布尔德隆：《法西斯主义，思想和实践》，第36页。

^③ 希特勒：《我的奋斗》，转引自罗歇·布尔德隆：《法西斯主义，思想和实践》，第208页—209页。

大企业的分红。

“职团”、“民众共同体”调和劳动和资本的实质主要是企图把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意识灌输给无产者，把他们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阶级斗争学说、国际主义原则清除掉，其次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中的流弊。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就在于此。

法国20、30年代的右翼集团和一些右翼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否也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呢？通过引用一些集团的纲领的有关内容和右翼刊物的观点便可见端倪。民族学说的刊物《权威》在1928年3月24日登载的一个号召中表达了希望组织“职业团体代表制”的愿望，认为“生产包括三个因素：智力、资本、劳力。智力进行设想和准备；资本筹集资金和支付企业的工资；劳力执行工作。三方面的代表应该维持完满合作的关系。阶级的概念，尤其是阶级斗争的概念不仅过时，而且主要是有害的。提出这些主张说明我们将同共产主义学说进行最坚决果断的斗争”。^①“束棒”纲领首要目标中的第5条说：“根据公正原则和民族利益，借助把企业主和工人联合起来的职团来合理地组织生产。”^②组织机构方面除了有“战士束棒”、“青年束棒”、“公民束棒”外，还专门有“生产者束棒”，即与意大利法西斯相类似的职团，作用是“保护行业利益”，并准备参加“真正代表民族利益的代表制机构”。^③“法兰西主义”在其要达到的目的中说，要“制止党派和阶级的自相残杀把我们带向深渊”，在谴责马克思主义利用社会不平使人接受其学说的同时，提倡“职团组织的团结精神……个别的利益应服从集体的利益，并应受集体利益所控制”。^④火十字团在其纲领的社会部分中鲜明地要求“发展资本和劳动的合作；劳动者在‘忠诚’的基础上公平地参加企业的分红”，“与分裂社会和民族的分子进

^{①②} 马什费，《集团和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第39—40、40页。

^{③④} 马什费，《集团和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第41、45页。

行顽强的斗争”。^① 它改建为政党后，提出“阻止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②

不论是措辞还是内容，法国右翼集团的纲领和宗旨是受到了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的。特别是受意大利法西斯的影响，因为法国人没有象纳粹那样提出种族主义的口号。从措辞上，他们运用了与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同样的语言，如“职团”，把劳资等都称为“生产者”，“劳动者参加企业分红”。尽管某些措词有出入，但实质却是一样的，如个别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即忘掉阶级利益，服从所谓的“民族”利益。他们向老板和工人发出的号召与希特勒论述的纳粹团体中工人和老板的思想如出一辙。从内容上，虽然劳资合作这种思想在以往民族主义、改良主义的思潮中也存在过，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西斯主义提出的劳资合作更加突出的一点是争取工人群众，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国际主义原则相对立。与德、意法西斯一样，法国右翼集团在提到劳资合作时几乎都有针对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立面。

第三，仅仅企图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从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争夺阵地，而无相应的手段自然是不行的。法西斯运动强调争取群众，交替使用狂热大煽动和恐怖活动的手段，来壮大自己的队伍，对付工人运动。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指出：“纳粹运动……不仅有义务运用精神武器准备战胜它的思想（指马克思主义——引者注），而且也有义务亲自负起责任对陶醉于胜利中的共产国际的恐怖活动组织反击”。^③ 并声称“恐怖活动只能通过恐怖手段予以摧毁”，“不应致力于密谋，而应致力于显示群众的强大威力……我们应该让马克思主义懂得纳粹主义是街道的未来主人，并终将成为国家的主人”。^④

^{①②} 马什费：《集团和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第54、57页。

^{③④} 希特勒：《我的奋斗》，转引自布尔德隆：《法西斯主义，思想和实践》，第123、126页。

为了把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劳动群众汇集到“民族”大家庭中，法西斯所构想的运动是一般资产阶级右翼政党或集团所不可能发起的群众运动。这种群众运动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运用宣传手段争取最广泛的群众，二是组织群众用极端的暴力惩治甚至消灭一切运动内外的反抗力量：个人和组织。两者互相补充，紧密配合，一方面恐怖活动慑服群众，使其拥护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通过宣传使群众对法西斯主义的信仰达到狂热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煽动起群众采用恐怖手段，并确信其合理性。

如德国的冲锋队、党卫军以及意大利的行动队那样的群众性的半军事组织或军事组织为宣传活动和暴力行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这些组织与其说用来自卫、维护公众集会的秩序，不如说用来以强制手段使人接受法西斯主义思想和用恐怖手段对付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工人运动。而这些组织如同法西斯党和其他各群众组织一样都实行独裁、极权的原则，使其行动更为有效。政党和群众组织的各级领导拥有绝对的、不容分享、不受监督的权威，其成员必须习惯于严格的纪律，无条件地执行上面的命令。

法国右翼集团“束棒”和“法兰西主义”虽然并未发展成庞大的群众性组织，但从它们的纲领看，其吸收对象包括任何社会阶层。“束棒”的组织有“战士束棒”，不仅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殖民战争的真正战士，而且因年轻而未能参战的法国人都可加入。农民、工人、商人、技术人员、企业主都可加入“生产者束棒”。不满20岁的和不属以上阶层的可加入“青年束棒”和“公民束棒”，妇女也不例外。其群众性可见一斑。^①

“法兰西主义”运动的成员分为两种：“积极成员和一般成员。凡愿意在宣传、招募、投资等方面为运动提供帮助的法国人”，甚

^① 马什费：《集团和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第41页。

至“凡侨居法国及其殖民地、并对运动抱有好感和同情”的外国人都可成为一般成员。然而要求参加者必须具有纪律观念和等级观念。入退该组织不能随心所欲，对此“法兰西主义”的领袖掌握全权。加入时要作效忠宣誓，只有领袖解除誓约才能退出。^①

火十字团的“群众运动”与希特勒、墨索里尼执政前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有明显的相同之处。1934年2月6日骚乱失败后，绝大部分右翼集团销声匿迹，而火十字团却大大发展起来。1934年2月它仅有3.5万成员，当年夏天发展到10万，1935年越20万，1936年初达到45万。^②这个庞大的群众组织吸收战士、工人、教师、官员、职员等众多阶层的群众，因而能煽动和调动人数可观的群众，举行规模巨大的集会。组织机构是严密的，权力集中，领导人拉洛克上校有绝对权威，直接任命各级领导，上自领导委员会成员，下至地方基层支部的领导。讨论往往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传达决定也万分谨慎小心。^③

火十字团所进行的骚乱即使在右翼联盟政府上台后也未停止过，它和其他集团几乎每星期天举行群众示威，时而在法国的这一地区，时而又在另一地区。1934年2、3月间，火十字团经常在“红色”区域示威，如巴黎东北部、加来海峡、里尔等。他们出没于左派控制的市政府所在地区，占领街道的十字路和公共建筑，进行突然袭击，不断寻衅制造流血事件。其成员有军事装备，甚至有摩托化装备，拉洛克还夸耀说“火十字团”拥有一支航空队。

法国右翼集团在街道上显示自己的威力突出表现在1934年“二·六”事件中。他们不仅向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而且向共产

① 马什费：《集团和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第46—48页。

② 亨利·杜比埃夫：《第三共和国的衰落，1929—1938》(Henri Dubief, Le déclin de la III^e République. 1929—1938), 巴黎1976年版，第160页。

③ 爱德华·博纳福：《第三共和国政治史》(Edouard Bonnefous,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III^e République)第5卷，巴黎1973年版，第352—353页。

党人和其他左派提出严重挑战。拉洛克在给共和国总统的信中说：“意识到我所肩负的重任，我已决定号召无可指责的战士——‘火十字团’团员走上街头示威游行。”^①全国战士联盟号召说，“老战士们……如果你们不愿成为选票商的同谋，你们就于星期三晚上到巴黎市表示你们的愤慨”。^②“爱国青年”在向巴黎人民发出号召时挑拨说：“政府以牺牲雅克·希雅普警察局长^③来迁就共产党人的命令。”^④

1936年2月13日，左派社会党领袖勃鲁姆在街上竟遭右翼集团分子围攻殴打致伤。之后，阿尔贝尔·萨罗政府不得不发布解散各右翼集团的命令。拉洛克在给萨罗的一封信中表示内阁总理竟然“让‘国际歌’压倒‘马赛曲’而深感惊讶”，并发出威胁性的警告：“选举即将开始。这是极端微妙的时刻……您能允许选举在共产国际的标志后面，在骚乱的气氛中进行吗？到那时，您的责任将是悲剧性的。”^⑤

尽管右翼集团运动的斗争手段，甚至所喊的口号与法国传统右派有某些相似之处，^⑥但是特别因为它们的目标不仅是反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反共产主义运动的，因此它们在继承了法国传统右派的同时，又有别于传统右派。这区别正是它们与欧洲其他各国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共同之处。

30年代法国右翼集团运动也存在有别于德、意法西斯主义运动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 J. 普吕米埃纳，R. 拉西埃拉，《法国法西斯主义，1923—1963》，第72页。

②③ 拉西埃拉，《法国法西斯主义，1923—1963》，第73、72页。

④ 左派谴责巴黎警察局长雅克·希雅普和极右分子勾结，政府被迫解除他的职务，使右翼集团大为恼火。

⑤ 博纳福，《第三共和国政治史》第5卷，第377页。

⑥ 19世纪末布朗热主义运动的斗争形式也是在街上进行骚乱，所喊口号“打倒窃贼”被20世纪30年代右翼集团所接受。

首先，很多右翼集团虽然创建于20年代，但是运动的蓬勃发展，并起到政治作用还是在30年代，尤其是30年代上半期。那时，无论是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还是德国纳粹党，在走向政权的道路上和夺得政权后的实践中都对最初制定的纲领有所改变，特别表现在对大资产阶级的让步上，法西斯主义的欺骗性，蛊惑性有所显露。德、意法西斯的极端民族主义越来越暴露出其侵略性、扩张性，法国舆论清楚地看到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是不可分的。法国经过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视德国为宿敌，对其始终抱有警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渴望长期和平的法国人对好战的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德国纳粹没有好感。因此法国右翼集团，除了个别的如“束棒”、“法兰西主义”以及一些具有法西斯主义思想的作家外，并不象德、意法西斯那样公开宣布自己是法西斯，一般都否认信仰法西斯主义。如果说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本国赢得了广大中小资产阶级甚至工人群众的支持和信任，那么法国右翼集团在30年代的法国如公开承认自己是法西斯则将会失去群众。标榜自己是真正法西斯的“束棒”和“法兰西主义”，从纲领到行动对德国、特别是意大利法西斯百般模仿，没有争取到多少群众；而否认自己是法西斯，但在思想和方法上与其相同的火十字团却成为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集团。

其次，德、意法西斯都在20年代创立了一个统一的政党——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这两个党的力量强大，足以与其他各党派相抗衡，消灭异己力量。法国情况不同，右翼集团多如牛毛，相互间矛盾重重，始终未能结成联盟，更谈不上统一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了。极右组织“法兰西行动”虽不是一个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组织，但是从它的阵营中分裂出来的却是地道的具有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束棒”。尽管它们基本目的相同，曾得到同一个人：大资本家弗朗索瓦·科蒂的资助，口号和学说上却有差异。他们在各自的机关报上相互谩骂、攻击，破坏对方的集会，捣毁

对方的报馆，甚至发展到开枪射击。

同样都是以老战士为主要成员的集团“火十字团”、法兰西团结”、“法兰西主义”在观点上却不尽相同。曾资助过“火十字团”的科蒂后与拉洛克决裂，自己创建“法兰西团结”，该组织没有严密的理论学说，仅靠突击队在街上进行骚乱。“火十字团”有自己独特的纲领，始终独立行动。拉洛克坚决不与其他集团联合行动。最典型的表现是在“二·六”事件中，“火十字团”不愿和其他集团一起冲击众议院，以至使骚乱失败。“法兰西主义”的头目马赛尔·布卡尔曾是“束棒”的成员，后来与其决裂，自成党派。他在机关报《法兰西主义者》上以最纯粹的法西斯主义组织自居，对其他集团如“法兰西行动”、“法兰西团结”、“爱国青年”、“火十字团”一概持否定态度。

总之，这些集团都看重各自的自由，不愿受任何束缚，不愿放弃自主立场，融合到一个联合体中。有些集团曾经发出过联合的号召，都以失败告终。1934年5月“法兰西团结”和“爱国青年”试图号召一切民族主义势力联合组织成一个“民族阵线”，未能成功。1937年5月，以雅克·多里奥这个从法国共产党中分离出来转向极右的分子为首的法国人民党亦号召一切反共力量组织成一个“自由阵线”，仅得到寥寥无几的人的响应。

再次，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在资产阶级大革命后80年中，法国人民多次推翻复辟王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到20世纪20、30年代，第三共和国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这一点与德、意很不相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建立共和国。而作为统一的意大利在近现代未出现过共和制。在法国，共和制度深入人心。一般情况下，即使是右派（除了极右派）也不会提出推翻共和。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中有一部分虽然鲜明地打出了反共和、要独裁的旗帜，但相当一部分集团仍在纲领中宣称自己是共和主义者，如“法兰西团结”、“火十字团”等。甚至自己投入到议会斗争中，如

“火十字团”的后身法兰西社会党。这一切似乎使人感到它们和法西斯主义无共同之处，只是一般的右翼集团和政党。但这是表面现象。因为在德国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制仅有很短历史的国家里，希特勒通过啤酒馆暴动的失败都得出结论，必须通过合法手段在议会中争取多数来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更何况在法国呢？而且法兰西社会党明确表示要在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议会中得到压倒多数来夺取政权，这正和希特勒的实践相谋合。

正是法国右翼集团运动与德、意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这些不同之处，或者说它所表现出的“个性”，使一些史学家否认法国存在法西斯主义的现实。确实，二三十年代法国右翼集团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法国历史上的传统右派，但是如前所述，时代的特征赋予二三十年代的右翼集团以新的特点，例如反共产主义的目标、有别于传统民族主义思想的新的极端民族主义内容、由于共和制度的深入人心而不公开打出反共和的旗帜等等。这些都是与传统右派的相异之处，也正说明右翼集团运动与德、意法西斯主义运动存在着本质方面的共性。

“二、六”事件及其后果

30年代初期，法国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1932年在大选中获胜而上台执政的、以激进党人为核心的左派联盟政府，拿不出任何有效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他们继续执行前届右翼联盟政府实施的不得民心的经济政策，短时期内多届政府因财经政策倒台，表明了政治体制的危机。1933年7—8月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毫无成果，也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联合起来抵御经济危机的失败。失业率上升，社会动荡，到处发生罢工和示威游行。右翼集团相当活跃，他们号召失业者和纳税人起来反对无能的政府，并进行反议会的活动，要求把政权交到右派手中。1934年1月披露

的斯塔维斯基财政丑闻激起广泛民愤。右翼集团遂利用时机蛊惑人心，煽起狂热的反对议会民主、反对革命运动的“二·六”反革命骚动。

斯塔维斯基丑闻是“二·六”事件的导火线。这一丑闻与第三共和国其他大丑闻相比算不了什么，受此案直接牵连的激进党议员政治影响不大，只是在自己区内有些名声。然而事件发生的时间正值经济危机的严重时刻，又是激进党为首的左翼当政，因而右翼集团借此寻衅闹事，使一件小丑闻酿成了影响波及全国的大事件。

法籍俄裔犹太人亚历山大·斯塔维斯基屡犯诈骗罪，由于检察院态度暧昧，始终逍遥法外。他生活奢侈，与政界关系密切，甚至与巴黎警察局长希雅普都有来往。1933年12月，他又一次作案，携贝奥纳信贷银行发行的假证券款项2000万法郎潜逃。警察逮捕了同案犯。1934年1月9日，警察追捕至他隐匿的瑞士山区别墅内，发现他已奄奄一息。警察声称此为自杀，这一说法引起了公众的怀疑。曾为建议发行贝奥纳证券而签署了一个通报的殖民部长达利米埃（当时是劳动部长）宣布辞职。此时，政府缄默不语，极力把事件限制在司法范围内。然而，右派认为斯塔维斯基代表了外国佬和犹太人金融，并与议会民主的腐败相关（当时的检察总长普莱夏尔和共和国总理肖当是表兄弟）。右派因而断言是肖当命令枪杀了斯塔维斯基，而非自杀，是普莱夏尔阻止追捕诈骗犯。在此案中与普莱夏尔意见分歧的、在检察院内负责处理财经案件的推事普莱斯的尸体后来在一条铁路上被发现。右派推测是共济会（肖当和普莱夏尔均是共济会的重要人物）所为。^①以上事件真相究竟如何始终是谜，但极右派认为各种迹象都可资利用达到他们反犹、仇外、反议会民主、反共和国的目的。

^① 亨利·杜比埃夫，《第三共和国的衰落，1929—1938》，第75页。

1月7日，在极右组织“法兰西行动”的鼓动下，一些巴黎人在众议院所在地波旁宫前示威，高喊“打倒窃贼”口号；因为1月9日是议会复会的日子。从1月10日开始，巴黎街头，如圣-日耳曼街、协和广场以及所有大马路上天天都有示威活动。议会内外遥相呼应，众议院中的右派议员菲力普·昂里奥和伊巴内加勒发起了对政府的进攻。虽然议会的大多数进行了回击，但肖当却经不住新闻界的指控和巴黎街上的骚乱。而且另一桩丑闻（与前案无关）迫使掌玺部长辞了职。在种种压力下，肖当于1月27日宣布辞职。

1月29日，勒勃伦总统授命激进党内的左派、青年激进党人达拉第组阁。达拉第上台后撤掉了极右派势力的同谋、但又与斯塔维斯基私交甚深并受案件牵连的巴黎警察局长希雅普。后者拒绝接受出任摩洛哥总督的任命。这件事促使右派阁员提出辞呈。与右翼集团有联系的巴黎市议员号召2月6日举行大示威。那天正是新内阁要在众议院内通过投票认可以获取信任。当晚20时，达拉第内阁以多数票取得信任。但是波旁宫却已危在旦夕。各右翼集团在周围的不同地点集结，“法兰西团结”在巴黎歌剧院前、“法兰西行动”在协和广场、“爱国青年”在市政厅前和拉丁区、“火十字团”在圣-日耳曼大道和圣-多米尼克街。一些示威者把剃须刀绑在棍棒一端，割破警卫队士兵的马腿，使他们从马上落下。有的人把弹子扔在马走的路上，使它们滑倒。所有示威者的共同目标是奔向协和广场桥，从那里可以冲击波旁宫。机动保安警察守卫着协和广场桥，少量警察部队在塞纳河左岸保卫着波旁宫，多次险些被冲垮。警察们开了枪，双方都有死伤，死者17人，其中16个示威者；伤者2329人，其中1664个警察。^①很多骚乱者头目

^① 乔治·勒弗朗，《人民阵线》，巴黎1972年版，第10页。

被逮捕。尽管达拉第政府在议会获得了信任票，但他不得不于次日(7日)中午宣布辞职。因为法官和高级官员拒绝执行政府的镇压命令，激进党的老资格领袖赫里欧不支持达拉第，大部分部长力主辞职。这是第三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内阁第一次在街道骚乱面前退却。

骚乱者并未冲击成波旁宫。虽然各右翼组织的头目并不掩饰他们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好感，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组织繁多而分散，没有统一的领导，互相间激烈竞争，谁也不愿为他人火中取栗。拉洛克上校没有向“火十字团”发出攻打波旁宫的命令，恐怕原因就在于此。

2月7日晚，以杜迈格为首组成右翼政府，这是“二·六”事件的直接结果。政府成员中掌握实权的国务部长塔迪埃曾在1932年前担任总理时以大量秘密款项支持过右翼集团。塔迪埃后来承认从1929年到1932年他本人和其他右翼政府向“火十字团”领袖拉洛克提供过大量资金。他本人曾每月提供2万，后达15万法郎。赖伐尔每月提供过1万法郎。^①右翼政府组成后，右翼集团的游行示威基本上平息下来。

在左翼党派和左翼势力看来，“二·六”事件就如同德国和意大利发生的法西斯骚乱。因此，这次事件的另一重要结果是左派意识到了法西斯势力的严重威胁。2月8日，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的大标题是：《枪杀者的政府辞职，杜迈格向法西斯主义迈进》。^②2月9日，共产党在共和国广场组织了反法西斯和反资产阶级政府的示威游行，遭到镇压，致使9人死亡，成百人受伤。^③

在这次斗争中，与共产党人站在一起的有不少年轻的社会党

① 亨利·杜比埃夫：《第三共和国的衰落，1929—1938》，第160页。

② 乔治·勒弗朗：《人民阵线》，第13页。

③ 亨利·杜比埃夫：《第三共和国的衰落，1929—1938》，第163页。

人，有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总工会”发出2月12日全国总罢工的号召，社会党届时准备在凡塞纳门到民族广场之间组织游行示威，这一号召也得到了“统一总工会”的响应。共产党也决定参加这一行动。多少年来，共产党和社会党互相指责，视为仇敌，此时却未经任何协商，采取统一行动。这一天的总罢工获得了空前胜利：在巴黎，凡塞纳广场的示威者达10万人，两个党的两支队伍由不同方向汇拢，在民族广场会师。从1920年都尔大会分裂以来，两党成员第一次又站到同一战线上。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外省的情况也如此：图卢兹、波尔多、格勒诺布尔、马赛、穆卢兹、利摩日以及一些中等城市成千上万的游行示威者走上街头反对法西斯，拯救共和国。2月12日的共同行动表明了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基层群众渴望联合的心愿，对上层领导没有立即产生影响。但是，以“火十字团”为代表的右翼集团在“二·六”事件后继续发展和更加猖獗。右翼政府不仅未拿出良策解决法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而且还企图改组政体，直接威胁共和政体和议会民主制度。在这种形势下，左派的联合逐渐形成。

法西斯运动的失败和人民阵线的建立

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没有像德国、意大利那样发展到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地步。其未能得逞的原因可通过30年代阶级力量对比和各派政治力量对比的现象来分析，因为法西斯主义势力在力量对比中处于劣势，而与其针锋相对的人民阵线的建立及其在大选中获胜，表明法国反法西斯力量不仅是强大的，而且是团结的。

1934年2月9日至12日的那些日子，左派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事后，由3位知名教授发起，创建了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员会。他们是倾向激进党的阿兰、社会党人保尔·里凡、靠拢共产

党的保尔·朗日万。这仅仅是左派联合反法西斯的一个萌芽组织，要达到左翼各党派真正联合行动还存在很多障碍。

法国共产党直到1934年初仍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同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甚至指向社会党的领导。1934年2月7日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以粗体字母醒目地写道：“巴黎工人起来反击法西斯分子，反击法西斯化了的民主制度……而社会党却对政府表示信任。”^①1934年2月15日，共产党议员拉迈特在众议院宣称：“我们不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要推翻它，摧毁它，因为这个共和国是大金融家、大企业家……的共和国。”^②1934年3月4日，《人道报》上发表了法国共产党的一个声明，谴责社会党及其总工会组织，说“法国社会党对……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的发 展负有责任”，“法国社会党及其总工会背叛了，并继续背叛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正在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后尘”，“不把社会党工人群众争取到阶级斗争的行列中来，不使他们摆脱他们党的麻痹性的影响，就不可能战胜法西斯主义”等等。^③法国共产党曾经把社会党视作社会法西斯主义，是主要敌人。但是不久，共产国际和法共中央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进一步认识和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而转变了策略。

特别是季米特洛夫，注意到了法西斯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区别和矛盾。他说：“法西斯之上台执政，这并不是普普通通地由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取代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是由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国家形式替代另一种国家形式，即由资产阶级公开的恐怖专政替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④因此，法西斯不仅威胁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工人运动，也威胁一切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工人党和组织，也威胁资产阶级民主本身。季米特洛夫认为，资产

^{①②③} 乔治·勒弗朗，《人民阵线》，第13、23、24页。

^④ 维·哈吉尼科洛夫等，《季米特洛夫传》，人民出版社1932年版，第134页。134—136页。

阶级民主比法西斯的恐怖专政“总要好些”。^①据此，他指出，属于不同政治派别的工人还不能团结一致地反对资本主义，但他们能够团结一致地反对法西斯。在法西斯进攻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面临的问题不是选择“无产阶级专政或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民主制或法西斯主义”。工人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营垒内部必然发生的冲突来破坏和推翻法西斯专政。”^②

法共态度的转变显然对团结具有不同信仰的其他工人党和某些资产阶级政党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是有利的。1934年5月，法共中央根据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决心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社会党和共产党自1920年以来一直互相指责，特别是领导人之间互相仇视，裂痕很深。直至1934年4月，社会党的一个群众大会还被共产党斥为社会法西斯主义大会而不得不取消。因而，社会党的领袖勃鲁姆、富尔、勒巴等对法共表现出的联合诚意抱保留和迟疑的态度。但是党内要求联合的呼声，尤其是社会党内的左派马尔索、皮凡尔和让·齐隆斯基所在的塞纳支部施加的压力，迫使社会党的领导与共产党谈判。首先是两党塞纳组织的代表于7月14日进行了会晤，接着是两党领袖于7月27日签订了共同行动协定书。协定书上的第一句话就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社会党常务行政委员会强烈表示打倒法西斯主义的愿望。”^③并鉴于法西斯的威胁……要结束互相攻击、谩骂和批判。”^④

从1934年10月开始，法共又把联合的目标转向激进党中的左派成员。11月13日，多列士又在众议院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向中产阶级发出了联合的号召。

直到1934年10月底南特代表大会上，激进党内赞成同共产党、

^{①②} 维·哈吉尼科洛夫等：《季米特洛夫传》，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139、134—136页。

^{③④} 杜比埃夫：《第三共和国的衰落，1929—1938》，第166页。

社会党联合的尚属少数。促使它后来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首先是法共的态度，1935年5月2日法苏协定签订，当时的法国外长访苏，斯大林表示理解和赞同“法国为自身安全而维持其武装力量所采取的国防政策。”^①这促使法共不再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措施，不再对军事预算和投资投反对票。激进党领袖之一皮埃尔·科特对共产党放弃“孤立”立场表示欢迎。他在1935年7月5日的《事业报》上撰文说：“共产党的策略改变了；我们的共产党朋友担心遭到他们德国同志同样的命运。他们放弃了糟糕的政策，愿意在自由的战壕中同所有共和党人并肩作战了。”^②

其次是右翼集团和右派的“民族联盟”政府的所作所为，把激进党推向了左派阵营。“二·六”事件以后，尽管以激进党为首的“左翼联盟”政府下台，但是右翼集团没有停止他们对共和党派的领袖，特别是激进党领袖的攻击，甚至人身侮辱。肖当、达拉第、赫里欧都成为他们攻击的靶子。极右派试图把共和党派领袖的名声搞坏，来达到他们否定共和制的目的。结果使激进党人渐渐疏远右派，而投入了左派的怀抱。此外，右派政府为摆脱经济危机而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特别是1935年下半年赖伐尔政府的一道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命令，把危机转嫁到底层人民，包括中、小资产阶级的身上。他们和共产党、社会党的基本群众——工人一样，都是经济危机和右派财政紧缩政策的受害者，共同的经济利益也使激进党向左派靠拢。

1935年5月12日巴黎5区市政选举的结果，是以上述三党为主的左派在选举中团结一致击败右派的第一次胜利。自第一次大战结束以来，该区的左、右派一直在争夺一个席位。1929年，这个席位被一个叫做勒伯克的法西斯分子，“二·六”事件的组织者之

① 杜比埃夫，《第三共和国的衰落，1929—1938》，第167页。

② 勒弗朗，《人民阵线》，第39—40页。

一夺得。而且在本次第一轮选举中，他的票数也遥遥领先。但是在第二轮选举时，所有左翼力量(从共产党到激进党)联合起来仅推出一个竞选人保尔·里凡，其他各派的竞选者一律退出，终于压倒了勒伯克。这次胜利证明联合的巨大威力以及反法西斯思想的深入人心。

不久，在阿姆斯特丹-普莱伊埃尔委员会^①的发起下，由包括共产党、社会党、法国各社会主义党的跨党派集团、法兰西社会党人和社会主义共和党人、激进党塞纳组织、人权联盟、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员会、总工会、统一总工会等各左翼党派和团体联合发出号召，决定在7月14日举行巴黎和外省大规模示威游行。最初，激进党是否参加游行的问题尚未解决，党内分化成两派。一派以赫里欧和当时内阁中的其他激进党成员为首，不赞同与左派联合行动。他们认为整顿法国财政才是当务之急。一派以达拉第和左派激进党人为首，他们反驳说，法西斯的威胁正是空前经济危机的产物。^②较量的结果，后者在党内占据上风，激进党执行委员会决定参加游行。这些党派团体组成了人民联盟组织委员会，由巴黎大学教授、人权联盟主席维克多·巴什任委员会主席。

1935年7月14日上午，巴黎的游行集会 是空前的。在蒙卢日的布法洛广场举行了群众大会，从巴士底到民族广场的游行队伍集中了50万因左派大联合而欢欣鼓舞的人们。左派激进党人达拉第、让·塞、皮埃尔·科特与共产党、社会党的领袖肩并肩地前进。无论从游行的规模、群众的热情以及各左派党，特别是一向以中派自居的激进党的参加，都足以说明反法西斯力量在法国

^① 由法国进步作家罗曼·罗兰和亨利·巴比塞发起，于1932年和1933年分别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普莱伊埃尔大厅举行了反对法西斯的保卫和平大会，会后成立了该委员会，企图联合所有反法西斯的力量进行斗争。

^② 勒弗朗，《人民阵线》，第39页。

将压倒法西斯势力。人民联盟组织委员会并未因游行结束而解散，成了一个常设机构。人民阵线就这样正式诞生了，并于1936年1月制订出纲领。政治纲领的核心是反法西斯主义。

1936年4—5月的议会选举结果，再一次证明法国反法西斯联合力量的强大。第一轮选举中被视为法西斯分子的候选人得到极为有限的票数，因此法国再也不必害怕出现1933年在德国出现的纳粹党上台的危险。但右派的票数损失不大，与1932年相比，只是从37.35%降到35.88%。^①左派的票数有所增加，但各党派的力量是分散的。共产党增加了票数，是因为激进党票数减少了。因此左派各大党以及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立即向其候选人和选民发出号召，要求人民阵线的所有选票都要集中到最有希望获胜的那位左派候选人身上。5月3日的第二轮选举，人民阵线各党终于大获全胜。在议会中，左派获376个席位，而右派仅222个席位。^②

反法西斯力量联合的基础

是什么因素促使所有反法西斯的政党、团体、个人联合起来，从而在力量对比上占据了优势呢？笔者认为很有必要从具有悠久传统的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政体、民主制度、自由原则中来寻找法西斯主义不可能在法国通行无阻的原因。

议会制共和政体在法国的确立和巩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自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之后，专制和共和始终进行着殊死的较量。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前的80多年中，政体几度变迁，时而君主立宪，时而共和体制，时而王

① 勒弗朗：《人民阵线》，第57页。

② 杜比埃夫：《第三共和国的衰落，1929—1938》，第178页。

朝复辟，甚至还有名义上保留共和的专制政体。体现在权力分配上的是集权制和分权制的交替。而在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中，从法国最后一次专制政体——第二帝国于1870年覆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主张专制政体、集权主义的保皇派仍没有罢休。共和政体、议会制度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1871年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法国对政体的选择；1873年波旁王朝后裔尚博尔伯爵的复辟危险；1877年保皇派总统麦克马洪对共和派的发难；19世纪末的丑闻（出卖荣誉军团勋章和巴拿马运河公司事业中集体贪污受贿）中共和派的声名狼藉；德雷福斯事件中专制和共和、保守和民主的两军对垒，以及新旧保皇分子乘机对议会制共和国的颠覆等等。在反复较量中，共和民主制度越来越巩固。

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改变法国的政体。尽管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法国为赢得胜利，不得不把政府权力交给一个强有力的、专断的政治家——克雷孟梭。但是克雷孟梭作为共和党人，仍然尽力通过议会手段达到使政府具有绝对权威的目的。因此有人说：“20世纪法国自由民主制度最大的成功在于法国经过1914~1918年战争还保存和战争初期同样的民主制度。”^①“我们在和平时期创建了共和国，在战争时期捍卫了共和国，而共和国在战时拯救了我们。”^②这是克雷孟梭在战争即将结束时（1918年11月6日）在众议院讲话时说的。当时除了极少数人，谁也不会对法国的共和民主制度提出疑义。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党派和团体多如牛毛。它们确实具有不同的思想和纲领，代表不同的利益。然而，并不矛盾的是无论在哪一阶段，这些政党和团体尽管各自千差万别，必然分属两大政治派别：右派和左派。由于法国选举

^{①②} 德马拉福斯，《自大革命至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史》，巴黎1975年版，第77、255页。

制度的关系。^①在选民头脑中反映出来的政党局面也是这两大派别。右和左本身的概念是抽象的，一般说右派指维护既定的或旧有的秩序和制度的人或党派，左派则指主张变革的人或党派。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既定或旧有秩序”内容的变化，各派主张的具体内容也会变化，构成各派的成分也会变化。看一看第三共和国政治生活中右派和左派的演变过程，便能了解法国政党和选民对法国政治体制选择的发展情况以及各阶段共和制度稳定的程度。

这个演变过程可分两大阶段，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战前，法国议会中始终存在主张恢复君主专制政体的保皇派；战后，保皇派基本上销声匿迹。第一大阶段中又可分为两个时期。从第三共和国建立到1893年议会选举前，保皇派和共和派营垒分明。两派中都存在很多不同观点的政党，倾向保皇或共和的程度不同。凡是保皇的都属议会中的右派。凡是主张共和的都属议会中的左派。这一时期的历次众议院选举(1874、1881、1885、1889)尽管往往不能形成议会多数派，但总的趋势是保皇派的席位下降，共和派的席位上升。1893年选举后议会中的派别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前所说，由于巴拿马丑闻，社会主义者崭露头角，开始在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左派中出现了新的成份。而在保皇派复辟的美梦一个个接连破灭，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时刻，保皇派中的一部分——教会势力便变换策略，向执政的共和派，即共和温和派靠拢。共和温和派也希望与他们联合，共同对付共和激进派和社会主义势力。天主教派这种归顺共和制度的运动，使清一色保皇的右派中出现了拥护共和的人，而共和温和派在左派中

^① 第三共和国时期，几乎大多数情况下实行的是两轮单名投票制。第一轮时，由于地区狭窄，不存在某些政党联合起来的现象，因而候选人数量很多，很分散。第二轮时，有的政党退出竞选，与其他政党联合，因此选民有可能表现出自己属于两种倾向中的一种。

的地位相对地说就显得比过去保守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左、右派内部结构出现质的变化。以往的保皇派议员仍是共和国的陌路人，他们已不再可能进入议会和政府。但议会中有他们的后裔，这些人也许内心仍忠于家族的传统，但已自称共和党人。战前左派中的温和派在战后全都属于右派阵营，他们与左派的区别就在于他们虽接受共和，但并不接受法国大革命的所有原则。激进派始终不愿把他们视为共和派，而称他们为保守派。但他们毕竟是保守的共和党人。左派中除了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外，共产党人登上了法国政治舞台，自1924年开始，力量日益强大，成为议会中的极左派。20世纪20、30年代基本上是右翼的联盟民族集团和左翼联盟轮流执政，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参加政府。

综上所述，第三共和国政治派别的演变可概括为：拥护专制政体的保皇派的地盘越来越缩小，直至完全丧失；主张民主政体的共和派逐渐分裂，直至以温和和激进分属右、左两派；具有更先进思想和纲领的党派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先后以更加激进的派别身分出现在议会的左派中。如果说第三共和国诞生初期旧有秩序指的是君主专制政体，变革派要追随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话，那么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君主专制已成历史的垃圾，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便是既定的秩序了。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经过与专制势力反复较量后建立起来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德国、意大利比较，应该说是较为稳定和巩固的。

正因如此，在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一旦表现出独断、专制，哪怕并不违宪的行为，必然会受到来自拥有立法权和组织、监督政府权力的议会的抨击和不信任，甚至将其推翻。这在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中不是没有发生过。1917年11月，克雷孟梭受权组阁后，采取了一些非同以往的主持政府工作的做法。他在当年11月19日对众议院议员的讲话中宣称：“日复一日，问题将接踵而至……我

们接受你们的监督。对我们的信任问题将永远提在日程上。”^① 克雷孟梭确实在战时提出过无数次信任案，然而这种“持续监督”消除了以事先不可能得知日期和目的的咨询方法进行监督的突然袭击因素，使议员失去监督的主动性。此外，克雷孟梭主张在战争时期议会辩论公开。这样，由于他的威望和形势需要，他可在议会讲坛上直接向公众说话。他说：议员是憎恨我的，“因为表面上我在向议会说话，可实际总是面对全国。我的演讲总是越过众议员、参议员的头顶。我总是使他们明白，胜或负，归根到底由全国人民来评判我和评判他们。”^② 这种直接与全国对话的方法使议会处于消极被动的境地，突出了执政者的权威。这种并不超出议会制原则的行为，在议员看来有“专断”的嫌疑。他们终于当战争一结束就在1919年以使克雷孟梭在竞选共和国总统时名落孙山，作为给他的回敬。

到了20世纪20、30年代，正当空前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意大利和德国先后以极权的法西斯主义专政来寻找出路时，法国将向何处去？20年代中期，某些模仿意大利法西斯建立起来的右翼组织的反议会制运动并没有形成浩大的声势。显然是因为当时法国的民主制度尚能应付所面临的问题，政府总理彭加勒复兴政策的成功增强了法国人对共和民主政体的信心。进入30年代，在1932年以后就不同了，在内外困难面前，各种倾向的反议会民主制的政治思潮、政治运动或应运而生，或死灰复燃。

议会内右派中某些极右的政治家当议会民主制这架机器运转正常时，他们似乎赞成现存制度，遵守民主原则，甚至积极参加竞选。一旦民主制度遇到危机，他们便会同社会上的右翼集团相

^① 德马拉福斯，《自大革命至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史》，第247页。

^② 爱德华·博纳福，《第三共和国政治史》第3卷，巴黎1968年版，第93页。

配合，要求摧毁议会制，建立独裁政权。30年代的状况便是如此，曾任政府首脑的安德烈·塔迪埃在1936年向他的选民这样说：“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对全国人民来说是不可容忍的，用议会手段是改善不了的，因为四年内我试图用这种手段来修正我们的制度，我发现这不可能……为了对此进行纠正或补救，现在这样的议会毫无办法，必须求助于全国人民。如果要让全国人民听到你的声音，首要条件即不再是议员……我要离开议会……我离开是为了在某个困难的时刻为公众利益增强行动能力……对我来说，如同对很多其他人一样，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我要用另一种我希望有效的行动方式来代替我明知徒劳的方式。”^①塔迪埃的另一种行动方式显然指的是专制独裁的手段。议会和政府中的这种观点和社会上某些右翼集团的法西斯主义思潮是遥相呼应的。尽管他们声势很大，但是终究未能成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仍然是议会民主制在舆论和政界的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1934年上台执政的杜迈格主张对宪法进行改革以加强政府的权力。为此他比克雷孟梭更进一步，即抛开议会直接从电台向公众致词。无论是改革本身，还是他使用的方法，都引起了具有正统共和观念的政治家们的不安和疑虑。皮埃尔·德普莱塞克在《政治和议会杂志》中撰文说：“杜迈格先生一旦通过广播向全国讲话，即意味着他要请求舆论的帮助来解决问题。这类问题就不再进入议会的日程。这样，得到舆论支持的杜迈格先生就和公众直接相通了，在作出最后决定时就不再需要抵御来自议会方面的阻力了。”^②《事业报》指出：“杜迈格先生不是永存的。谁会是他的继承者？有可能是彻底的共和党人，他们将会考虑谨慎地运用给予他们的权力；也可能是不择手段的人，他们会滥用改革了的或“修正”了的宪法所赋予他们的新的特权。”^③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

^① 马什费：《集团和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第35—36页。

^{②③} 博纳福：《第三共和国政史》第5卷，第279页注(1)、293—294页。

在《人民报》上提醒说：“杜迈格先生策划的是一次合法的政变！……在杜迈格和塔迪埃先生‘改革了的国家’里，‘5月16日’式的打击行为^①会成为一种政府日常使用的正常手段。政府不会再是议会制政府，国家不会再是共和国。”^②

激进党在议会中和政府中的力量举足轻重，他们对改革宪法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激进党主席爱德华·赫里欧在杜迈格政府中任国务部长要职，他“感到政府总理似乎有实行个人专权政策的倾向。杜迈格每月都要在电台致词一次，这种公众舆论和政府首脑之间的直接对话，赫里欧并不赏识。这位一丝不苟地忠于议会制的老共和党人担心上下直接相通的民主与民主制度是背道而驰的”。^③对于杜迈格在修改宪法方案中提出的总理拥有在必要时可以撇开议会的权力，政府在财政开支方面拥有不通过议会批准的主动权等，他都在内阁会议上予以抵制。由于杜迈格坚持其主张，以赫里欧为首的激进党在内阁的成员终于集体提出辞呈而使杜迈格政府倒台。

由此可见，在30年代的法国，对于有可能导致“专制”、“独裁”的任何尝试，议会中的多数人（主要是拥有较大势力的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极为敏感，并竭力将其挫败，更不必说某些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妄图彻底取消议会制，代之以独裁制度的主张了。法西斯在政治上的极权统治在当时的法国是没有出路的。

极权主义、专制独裁也体现在法西斯专政国家的经济领域中。为摆脱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困境，为服务于夺取生存空间的政治、军事目的，德国实施了强有力的高度统制的经济政策。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法国的经济一贯遵循的是自由主义、

^{①②} 博纳福，《第三共和国政治史》第5卷，第279页注(1)、293—294、294、298页。

^③ 指1877年麦克马洪总统解散众议院事件。

放任主义原则。法国是否可采用法西斯国家类似的经济政策来渡过经济危机呢？摆在法国共和党人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像希特勒德国那样搞高度统制经济、自给经济、超保护贸易，一是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英、美协调步伐，贬低本国货币价值，以在世界市场上增强竞争能力。法国将采取何种经济政策，在当时有几种因素起决定性作用。

首先，是法国传统遵循的经济理论。30年代在法国财政机关任高级官员的经济理论家们的倾向是温和的自由主义经济原则，虽然不绝对排除国家干预，但不允许任何统制措施。

其次，国际政治气候的需要。一个国家的政治、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必然是统一的。30年代法西斯德国加紧扩军备战对法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法国外交政策的基点是联合民主国家，特别是英、美这样的民主大国，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同情，以共同抗德，因此在经济上加入英、美的体系是必不可少的。

再次，最重要的执政党派所代表的经济利益。由于两次大战之间，特别是30年代，激进党几乎始终是参加政府的政党，也始终是议会中占有相对多数席位的政党，它的主张在这一时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任何一个在政府和议会任职的激进党领导在参与经济政策的抉择时都毫无例外地要考虑党员和选民的经济利益。构成对党的政策具有重大影响的党内集团是激进党的积极分子，即党在全国各地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是议员和广大党员的中介，代表党的主要舆论。1922~1938年间，对8000名积极分子调查表明，他们的社会成分是这样的：33%是企业家（没有大资本家和大实业家）、公用事业家、另售和批发商，31.5%自由职业者，22%私营或国营部门的领取工资者，13%从事农业者（没有大农场主）。^①这是一个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从

^① 塞尔日·伯恩斯坦：《激进党关于对外经济政策的思想》，载法国《国际关系》杂志，1978年第13期，第73页。

中、小厂主、商人和广大城市消费者的利益出发，激进党主张经济自由发展，因为通过竞争和自由贸易，可使原料和商品价格下降。激进党的议员和阁员作为政策的抉择者有时虽不得不屈服于社会上某些“压力集团”^①的力量，但最终还得从它所代表的中、小资产阶级利益出发。

在20、30年代的议会中，社会党占有的席位往往仅次于激进党，尽管它基本上不参加政府，但应该说在法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一定影响。从其政治信条讲，社会党应该是反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但是20多年来，它的选民阶层已大大扩充，不仅是工人，而且有相当多的公务员、手工业者、商人，甚至农民都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这种变化使社会党的主张变得不是那样正统、严格了。因为它的议员关心的是要满足除了广大工人以外的、社会成分复杂得多的选民阶层的利益。这种要照顾属于非无产者的党的同情者的考虑使社会党不可能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资本主义。

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正是以上几个因素决定了法国不可能用法西斯专政的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在历届政府的传统经济政策：确保财政平衡和法郎地位一次次遭到失败时，一些大党内出现了具有法西斯色彩的倾向。1933年10月激进党的党代表大会上有人提出了建立独裁制度，“果断而坚决地实行专断，不仅对付利益集团或个人集团……而且要以国家名义，对付强大的金融寡头”。^②然而这种思想没有在党内引起反响，是比较孤立的。1933年4月社会党的阿维尼翁代表大会上，马尔凯、德阿等提出了类似德国纳粹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主义”主张，口号是“秩序、权威、民族”，^③要求实行国家干预的经济纲领，然而遭

① 在资本主义国家对政策和舆论是以产生相当影响的社会群体，如大金融财团等。

② 罗杰·布洛克，《激进社会党史》，巴黎出版，第77页。

③ 布洛克，《激进社会党史》，第78页。

到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抗议。有人高喊：“这是法西斯主义啊！”党的领袖勃鲁姆惊呼：“我向你们承认，我惊恐万分！”^①主张新社会主义的人最后不得不脱离社会党。可见，法西斯主义的经济主张是被这两个当时的主要大党拒之门外的。

广大公众对古典的自由资本主义政策失去了信任，但他们没有把注意力转向极右的、法西斯式的解决办法，而是转向了左翼联盟——人民阵线的纲领。1936年大选中人民阵线获胜，社会党领袖勃鲁姆组阁的政府所执行的经济政策说明法国最终还是选择了同资产阶级民主大国协调步伐的做法。

以人民阵线政府采取的货币政策为例，正如当时在法国驻英使馆任经济专员的经济学家埃马尼埃尔·莫尼克所分析的，勃鲁姆面前有两条路：“要么，他（指勃鲁姆——引者）保持法郎当时的比价，这样，不管他愿意与否，展开在他眼前的唯一出路是德国道路，自给经济的道路。他就不得不采取越来越严厉的限制外汇交易的体制，实行越来越接近纳粹的经济政策，进行越来越受法国本国资源限制的重整军备。在同德国的竞赛中，他一开始就要被击败，因为我们国家拥有的人力和财力远远不如我们莱茵河那边的邻邦。要么，他下定决心同两大西方民主国家：英国和美国协调关系，并争取他们的支持。这样，就应该使法国经济和自由世界紧密相连。法国将因此而能获得它从事经济活动和重整军备所需的一切国际资源。然而必要的条件是调整法郎和美元、英镑的兑换率。”^②社会党的经济专家、勃鲁姆政府的财政部长凡桑·奥里奥尔在1936年6月曾说：“我没有权利使法国这样一个由小人物组成的大国接受……某种与他们的习惯不相适应的货币政策。”^③因为在广

^① 爱德华·博纳福，《第三共和国政治史》第5卷，第165页。

^② 勒内·吉罗，《莱昂·勃鲁姆，1936年的货币贬值和法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载《国际关系》杂志1978年第13期，第98页。

^③ 让·布维埃，《外汇管制和1936年社会党的对外经济政策》，载《国际关系》杂志1978年第13期，第113页。

大舆论，包括中、右派的眼里，外汇管制是一种独裁的、专制的政策，是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原则风马牛不相及的。他们认为货币贬值倒可避免“德国式的、意大利式的强制体系”。^①

起初勃鲁姆举棋不定，而后一些财政高级官员和经济专家作为他的经济参谋把他一步步引向与“西方”协调的道路。这也得到了害怕德国式和意大利式自给经济政策的企业界的欢迎，以及政府内另一大党激进党的支持。经英美法三国秘密讨论，终于于1936年9月发表三国货币声明。为渡过经济危机，法国排除了德国式的法西斯专政方式，而选择了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大家庭的道路。

从参加人民阵线的主要党派如何转向联合的过程和人民阵线提出的口号、实施的部分措施可以看出他们联合的基础正是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

多烈士在1934年6月说，“共产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即使它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形式。但是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形式漠不关心……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捍卫由广大群众争得的民主自由权利。”^②法共中央采取的新策略使它停止了对社会党、激进党，特别是两党上层人物的进攻，也停止了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共和国的进攻。它甚至在集会游行时可以接受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标志：三色旗和马赛曲。它还主张必须在选举中和议会中把所有共和力量团结起来。

社会党的宗旨并不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是企图在不触动现存的共和体制的情况下执政，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劳动群众的利益进行一些改良。因此从斗争一开始，社会党就提出了保卫共

^① 让·布维埃：《外汇管制和1936年社会党的对外经济政策》，载《国际关系》杂志1978年第13期，第114页。

^② 克洛德·维亚尔等：《人民阵线，1934—1939年的法国》，巴黎1972年版，第30页。

和的口号。例如，1934年，右翼集团“二·六”骚动后，社会党的总工会组织了总罢工，在号召书中对农民说，“你们是拥护共和自由的，你们将要同我们一起去捍卫它。”对知识分子说，“法西斯主义将要制服你们。你们的个性只可能在允许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下得到充分表露。”^①勃鲁姆更加明确地肯定大家参加示威就是为保卫最好的政体：共和国。^②激进党更是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始终如一的捍卫者。

人民阵线在宣誓中这样写道：“我们宣誓团结一致保卫民主制度，解除骚乱集团的武装并解散他们，使我们的自由原则不受法西斯主义的侵害。在共和国第一次宣布诞生的这个日子，我们发誓保卫法国人民争得的民主自由制度，给劳动者以面包，给青年以工作，给世界以伟大的人类和平。”^③

1936年1月公布的人民阵线纲领中有关政治的部分，目标比较明确：保卫自由，保卫和平，反对法西斯主义。具体措施有解散右翼集团，捍卫和扩大自由，军事工业国有化，惩治军火商等。而在经济方面，组成人民阵线的政党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很难统一。例如激进党不同意对体制进行任何改革，拒绝社会党在这方面提出的种种建议，主张一切都需在自由经济的范围内解决。因此，纲领有关经济的部分比较含糊，唯一明确的一点是都赞同废除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法令（即紧缩政策），要求致力于恢复购买力。几个主要政党在经济领域的目标中存在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把他们连结在一起的是捍卫共和政体和民主自由权利，假如没有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人民阵线将不可能存在。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和人民阵线之间的对抗归根结蒂仍然是独裁政体和共和政体、极权思想和民主思想之间的对抗。

①、③ 勒弗朗，《人民阵线》，第18、41页。

② 杜比埃夫，《第三共和国的衰落，1929—1938》，第164页。

法国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传统具有100多年的历史,在同专制势力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巩固。这种精神遗产不仅被现代的法国人继承了下来,而且久而久之形成为法兰西民族的一种特性,这正是具有法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右翼集团运动在30年代虽曾猖獗一时,但终究未能形成气候的内在原因之一。

第二节 西班牙法西斯运动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波及到波旁王朝阿方索十三世统治下的西班牙。经济危机更加重了西班牙的政治危机。西班牙人民为争取生存和反对波旁王朝的统治;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斗争,在1931年4月建立第二共和国。1936年2月,以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同年7月,佛朗哥发动推翻共和政府的叛乱。在德国、意大利军队的直接武装干涉下,经过三年内战,西班牙终于在1939年4月建立了法西斯政权。佛朗哥在1947年7月宣布西班牙为君主国,自任终身国家元首。他的法西斯极权独裁统治达36年之久。

模仿墨索里尼的德里维拉独裁

20世纪初叶,西班牙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半封建国家。资本主义生产虽有一定发展,并不占主导地位。现代工业仅集中在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和北部的巴斯克地区。全国7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农民仍使用着他们祖先使用的农具。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居于欧洲最末几个国家之列。全国可耕土地的30%处于闲置状态。

1931年，西班牙有200万农业劳动者没有土地。5万名大土地所有者却占有全国可耕地的1/2。150万小土地所有者每人占有的可耕地不足1公顷，而1000个大土地所有者每人占有100公顷以上。在南部的塞维利亚省，5%的大土地所有者占有该省农业产值的72%。在巴达霍斯省，2.75%的土地所有者占有全省耕地的60%。仅梅迪纳塞里(Medinaceli)公爵就有土地近8万公顷。^①

就全国状况来看，西班牙农村中100公顷以上的大土地所有者占有耕地总面积的43.72%，即980多万公顷；10—100公顷的中等土地所有者，占有总耕地的20.36%，即461万公顷；10公顷以下的小土地所有者占有总耕地的35.72%，即801万公顷。一小部分大、中土地所有者占有大量的耕地，而几百万小块土地所有者只占有很少的土地。^②

天主教作为西班牙的国教，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班牙有4万个教堂，5000所修道院。教会拥有巨大数额的不动产。在工业、商业、银行等部门都有教会的股份，甚至在电影院、戏院、酒吧都有教会的投资。据当时的统计，教会财产总值达2亿英镑，相当于西班牙全国财产总额的1/3。^③

天主教可称是一大政治势力。为教会服务的人员，其总人数超过了国家职员、警察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总和。神职人员中有25474位神甫，81250个僧侣和修女。也就是说，每900个西班牙人中就有1个神甫；每200个西班牙人中就有1个神职人员。教会依靠居民中的文盲，得以在西班牙保持其势力和影响。特别是在农村，70—85%的农民是文盲。无怪1938年2月12日出版的《西班牙战争》一书中写道：“西班牙教会是国家中的强大国家”。^④

① 皮埃莱·布罗乌、埃米莱·德米梅：《西班牙革命与战争》，墨西哥经济文化出版社1962年版，第27—29页。

② 阿尔图·G·隆顿：《西班牙，西班牙……》布拉格阿尔弟亚出版社，1965年版，第80页。

③④ 隆顿：《西班牙，西班牙……》第89页。

决定西班牙局势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军队。西班牙的军队是一支寄生的军队，许多军官都企图干预政治。30年代初，在总共13万人的军队中，各级司令官和军官就有2.1万人；平均150个士兵中就有1名将军，总共有866名将军，其中仅有120名将军是现役军人。军队的预算占西班牙全国预算的1/3。武器装备十分落后。炮兵只有75毫米口径的老式炮。步兵使用的毛瑟枪还是1909年制造的。军队中的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都是拥护君主制、拥护大资本家，而反对革命。

对西班牙社会状况有一个粗略的了解，便容易理解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在西班牙滋生。

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和法西斯政党的建立，受到国际上法西斯思潮的影响，受到西班牙进入本世纪以后的动乱和20年代末、30年代初经济政治形势的影响。研究西班牙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渊源，要追溯到本世纪20年代，即1923年9月的(老)德里维拉军事政变。

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Miguel primo de rivera 1870年生于西班牙南部的加迪斯市。他有世袭的侯爵爵位，1884年成为军校的士官生，参加过西班牙封建王朝为维护其最后几块殖民地而进行的镇压摩洛哥、菲律宾和古巴人民起义的战争。他在1919年成为少将。1923年被任命为巴塞罗那军区司令。

1923年9月13日，德里维拉在巴塞罗那发动军事政变。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将一切大权拱手交与德里维拉。德里维拉宣布全国处于戒严状态，派军人替代文官省长，使国家的管理权、决定权都转到军人手中，并把反对他的人都流放国外。

德里维拉取消君主议会制，取缔国内的所有政党。他按照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模式，建立了全国唯一的政治组织——爱国同盟(Uninpatiótica)，把富农、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吸收进这个同盟中。德里维拉按照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模式搞起劳资协

议，禁止工人罢工。凡参加罢工者都以刑事犯罪论处。工人必须参加官办的工会，工人集会也遭禁止。

德里维拉政变后建立的军政府，就其政权性质来看，是地主贵族、金融寡头和反革命力量的独裁政权。^①

1923年，当德里维拉陪同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去意大利访问时，阿方索十三世向意大利国王维克托·曼努埃尔介绍德里维拉说，“他是我的墨索里尼”。^②同年10月，德里维拉同墨索里尼一起制定了在地中海地区联合行动的纲领。^③1926年，又与墨索里尼签订秘密同盟，允许意、法一旦进入战争，墨索里尼有权在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建立军事基地，并使用西班牙沿地中海港口。

德里维拉独裁统治不得人心。以西班牙共产党为首的进步力量和各阶层不断进行斗争。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反对德里维拉运动，团结了知识分子、民族地区的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形成了一个反德里维拉浪潮。统治阶级内部也害怕这一形势演变成革命危机，于1930年1月28日换下了德里维拉。德里维拉流亡巴黎，同年3月死于巴黎。

法西斯长枪党的纲领

在德里维拉执政时期，埃尔内斯托·希门尼斯·卡瓦列罗开始鼓吹法西斯主义。这位西班牙的邓南遮（一译达农丘，D'AN-UCIO），像意大利、德国的有些法西斯分子一样，最初也是一名社会主义者。1928年，希门尼斯在意大利结识库尔丘·马拉帕太。受马拉帕太影响，希门尼斯成为墨索里尼的崇拜者。从意大利返回西班牙后，希门尼斯鼓吹拉丁语系（南欧）军事化的理论（即搞

^① 《西班牙共产党史》，华沙波兰出版社1960年版，第39页。

^② 乌戈·托马斯：《西班牙内战》格里哈尔博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③ 隆顿《西班牙，西班牙……》第66页。

军国主义——作者注),^① 反对使得地中海国家发生颓废的所有东西, 仇视德国所发生的一切。令人感到惊奇的是, 希门尼斯有一段时间认为苏联是地中海国家的同盟者。但希门尼斯头脑里的中心是宗教及法西斯的首都——罗马。当然, 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执政之后, 希门尼斯对德国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30年代初, 在西班牙崇拜法西斯主义者不乏其人。马德里大学的一个穷学生拉米罗·莱德斯马·拉莫斯(Ramiro ledema ramos)于1931年创办了一本名叫《夺取国家政权》(《Lacongulsta del estado》)的杂志, 宣扬纳粹思想。莱德斯马处处模仿希特勒, 连发型也像希特勒一样, 故意把一小撮头发梳在额头上。在《夺取国家政权》杂志上, 莱德斯马宣称他本人不是要争选票, 而是争取“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有军人气质的、有责任心的、能斗争的”。这个运动的干部应是“青年人、在枪口面前毫无惧色、服从纪律的人”。^②

另一个法西斯主义崇拜者是奥内西莫·雷东多。他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 在萨拉曼卡大学学法律, 毕业后到德国曼海姆任西班牙语教师。在德国期间, 他对纳粹党徒的阅兵式十分钦佩, 认为这些纳粹党徒是新德意志的前途。1931年, 雷东多从德国返回西班牙故乡巴利阿多里德市, 组织了一个甜菜种植者工会, 并出版《自由》周刊。

1931年10月, 雷东多同莱德斯马一起组建了国家——工团主义进击委员会(Jntas de ofensiva nacional—si ndicalista), 简称“洪丝”(JONS)。洪丝的纲领亦称1931年巴利阿多里德16点纲领。其主要内容有谴责分裂主义者、阶级斗争; 赞成西班牙对直布罗陀、法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丹吉尔的扩张; 彻底根除外

^① 乌戈·托马斯:《西班牙内战》,第134页。

^② 乌戈·托马斯《西班牙内战》第134页。

国对西班牙的影响；严惩那些靠人民的贫困和无知而投机倒把的人；要求对资源进行控制。后来，16点纲领全部写入长枪党的纲领之中。1931年至1932年间，洪丝成员约五百人，^①但没有活动资金，没有多少活动。

历史给人以无情的讽刺，又是那么戏剧性的巧合。前面说到1923年德里维拉军事独裁及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的起源，恰好在10年之后——1933年，德里维拉之子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在西班牙建立了法西斯主义政党——西班牙的长枪党（La falange española）。

小德里维拉1903年生于马德里，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在马德里做律师。1930年继承其父老德里维拉的侯爵爵位，开始从政。小德里维拉有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谁批评他的父亲他就同谁斗。1933年10月29日，小德里维拉在马德里一家戏院主持集会，建立法西斯主义政党——长枪党。

1934年2月11日，长枪党与洪丝合并，称西班牙的长枪党和洪丝（La falange española y de las jons）。希门尼斯让小德里维拉任党魁。党徽是原洪丝的枷锁和箭，座右铭是：“起来！”、“建设一个伟大而自由的西班牙”、“为祖国、面包、正义而战”。

小德里维拉为西班牙的长枪党和洪丝制定了《长枪党纲领规则》，该纲领规则分六节，共26条。其主要内容是：

（一）国家、团结及权威

“1. 我们信仰西班牙至高无上的真理。加强、提高和使其变得崇高伟大是全体西班牙人的迫切任务。西班牙个人、集体和阶级的利益都应坚决服从于实现这一任务”。

“2. 西班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有反对这一团结的图谋都

^① 乌戈·托马斯，《西班牙内战》第137页。

应受到谴责。一切分裂活动都是我们不能饶恕的罪行。现行宪法中煽动分裂的条款旨在破坏西班牙的统一的前途。因此，我们要求立即予以废除。”

“3. 我们要建立权威。主张建立西班牙全盛时期的权威。我们呼吁西班牙在欧洲应占有其特殊的地位。……”

“西班牙维护其在西班牙美洲的精神主轴的作用。”

“4. 我们的武装力量应有足够的能力和数量以确保西班牙领土、领空和领海的完全独立及西班牙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

“5. 西班牙将再次通过海道寻找其光荣和财富。西班牙应成为海上强国，以防止危险和开展贸易。”

(二) 国家，个人及自由

“6. 我们的国家应是为祖国完整而服务的极权工具。所有的西班牙人通过家庭、市政和工会投身到这一事业中。”“要毫不留情地取缔政党以及因政党存在而产生的无组织的选举、在斗争中产生的派系代表和目前的议会。”

“7. 人的尊严、纯洁以及人的自由有永恒的、不可触犯的价值。……”

“8. 一个国家工团主义的国体将能发挥与集体利益一致的个人的积极性并保护和鼓动有益的个人的积极性。”

(三) 经济，劳动和阶级斗争

“9. 我们认为，在经济方面西班牙应是生产者的大辛迪加。我们将组织各行业的垂直工会，以合作社形式为国家经济整体服务。我们摒弃资本主义制度，它不顾及人民的需要，残酷剥夺私人财产，使劳动者处于低下阶层，使其贫困和绝望。从精神和国家方面来说，我们也摒弃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把被马克思主义引入歧途的劳动阶级直接导向参与国家的重大任务。”

“10. 国家工团主义的政体将不参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斗争，也不会参与一个强大阶级对弱小阶级的统治。我们的制度将使阶

级斗争变成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在生产中合作，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11. ……不允许广大群众过着贫苦生活而少数的几个人却享受着所有的豪华。”

“12. 国家承认私人财产是履行个人、家庭和社会目的合法手段，并保护其反对大金融资本、投机者和放债人的胡作非为。”

“13. 我们主张通过公司方式把银行、大的公共服务部门国有化。……”

“14. 所有西班牙人，只要不是瘫痪的人，都有劳动的义务。国家工团主义的体制不会重视那些不履行任何义务而又想靠别人努力而生活的人。”

(四) 土地

“15. 应尽一切力量提高西班牙赖以生存的农村的生活水平。为此，我们要毫不客气地进行经济改革和农业的社会改革。”

“16. 通过下列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经济改革)：

我们要求把城市吸收的智力及商业服务的收益大部分返回到农村，以使农村有足够的拨款。

组织一个真正的全国农业信贷，借钱或低息给农民，以保证其利益和收成，使其摆脱高利贷和地头蛇的统治。……”

“17. 按下列手段组织农业：

重新分配可耕种土地，以确立家庭所有制，大力鼓励农民参加工会。……”

“18. 国家可以无偿地剥夺非法占有或享有的土地。”

(五) 全民族的教育和宗教

“19. 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通过教育的严格纪律建立一种统一的、强大的民族精神……所有的男人都应接受准军事教育。……”

“20. 我们的运动要把天主教——西班牙的占主导地位的光

荣传统——同国家的重建结合起来。”

(六) 全民族的革命

“21. 西班牙的长枪党和洪丝要建立一种新秩序……为建立这一新秩序，要同现存的阻力进行斗争，要进行一场全民族的革命。”^①

很显然，这个纲领规则的基调同样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它对内强调国家至上，作为极权工具，以反对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实行统制经济；对外鼓吹侵略扩张，宣扬恢复昔日海上强国的迷梦。至此，在西班牙，法西斯运动已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形成。它有几千成员。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兴起对以后西班牙的发展发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推翻共和国的法西斯叛乱

1936年7月18日，佛朗哥一伙在西班牙发动旨在推翻共和国政府的法西斯叛乱。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巴蒙德1892年生于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地区的埃尔费罗尔海军基地内，其父是基地的行政管理人员。1907年，佛朗哥考入托莱多军事学院，1912年毕业，被分配到西属摩洛哥服役。在摩洛哥期间，佛朗哥仕途畅通，成为西班牙在摩洛哥驻军中最年轻的上尉、少校、中校，直至获得少将军衔。1916年因患胃病返回西班牙。佛朗哥在北部城市奥维埃多4年，成为当地外籍师团第二长官，率部镇压1917年西班牙工人总罢工。1934年10月，北部阿斯图利亚斯工人发动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又是佛朗哥率军镇压，使西班牙的这个工农政权仅存在10天便告夭折。佛朗哥镇压起义有功，被右派政府任命为总

^① M·贝萨—J·巴尔加斯，《西方政治词典》马德里。里布莱罗出版社1978年版，第137页。

参谋长。1936年被任命为加那利群岛军事长官。其后右翼的国民运动任命佛朗哥为驻非洲兵团司令。

1936年1月，西班牙共产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共和左派、共和联盟等党派组成人民阵线，联合参加大选。在2月16日的大选中，人民阵线在全国取得胜利，共获268个议席。其中共和派158席，西班牙工人社会党88席，共产党17席。右派和中间政党共获205个议席。

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后组织人民阵线政府，由共和派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任总理。阿萨尼亚曾在《公正报》、《太阳报》和《笔》及《西班牙》杂志社工作。1936年5月，阿萨尼亚被迫将总理职务让与自由党的阿尔卡拉·萨莫拉。1939年，阿萨尼亚逃往法国，1940年死于法国的蒙托邦。

人民阵线政府实行一系列进步政策。以前被禁止的工人、农民组织都恢复了活动。因参加1934年工人起义而被捕和遭受迫害的劳动者重返工作岗位。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建立起民族自治政府。4月16日，人民阵线政府颁布了没收庄园主土地的法令。仅两个月时间，人民阵线政府即将没收的土地共755,888公顷分给无地农民。政府还将私立学校改为公立学校。虽然人民阵线政府的政策比较温和，仍招致了反动势力的强烈不满，他们密谋推翻经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

西班牙的法西斯分子和德意法西斯分子对西班牙人民的胜利是不甘心的。他们相互勾结，蓄谋扼杀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1936年2月16日大选后不久，西班牙长枪党党魁小德里维拉经过鲁道夫·赫斯的引荐，受到希特勒接见。希特勒告诫小德里维拉必须把长枪党的活动同军人的活动协调起来。^①

同年3月，另一名法西斯将军桑呼尔霍，(1872—1936)前往

^①隆顿《西班牙，西班牙……》第119页。

柏林，签订从德国购买军火及飞机的合同，以及完成意大利、德国及西班牙三国军事条约的方案。^① 6月，桑呼尔霍再次去柏林，受到希特勒接见。当时，德国纳粹党在巴塞罗那已有支部。^② 当叛乱发生后，共和国政府在巴塞罗那搜查德国纳粹党支部时，搜到40000份文件，其中有很多信件、传单和指示。一份文件有32个德国盖世太保的名字，以及西班牙军队作战部长希尔·罗布莱斯、总参谋长佛朗哥为希特勒在伊比利亚半岛发展间谍的记录。

西班牙的法西斯分子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纵恿和支持下，于1936年7月18日凌晨发动武装叛乱。西班牙的进步力量和人民群众奋起同法西斯浴血战斗。7月19日，叛军总指挥桑呼尔霍从葡萄牙返回西班牙时，他乘坐的飞机神秘地坠毁，桑呼尔霍身亡。佛朗哥接任叛军总指挥。同一天，佛朗哥乘坐由英国空军上尉比勃驾驶的“快风”式飞机从加那利群岛飞抵西属摩洛哥的特图安指挥叛军向共和国进攻。

事态的发展并未像徒乱军官原先想象的那样。他们并没有在几天之内摧毁共和国，占领全西班牙，而是受到武装起来的人民英勇抵抗。军队内也有高级将领忠于共和国，反对武装叛乱。如巴特特、萨尔塞多、皮塔卡里达德、罗梅拉莱斯努涅斯·德尔普拉多和莫雷罗等将军^③，他们都被叛军处死。大部分海军和空军也表示忠于共和国。在西班牙共产党和其他拥护共和力量的抗击下，从一开始，佛朗哥叛军就受到挫折。叛军主力未能从摩洛哥顺利地到达西班牙本土。

西班牙法西斯依恃意大利、德国法西斯的支持，才敢于发动叛乱。当着叛军受挫之时，意、德法西斯即由秘密支持转为公开干涉。

① 见阿尔图·隆顿、《西班牙，西班牙……》第119页。

② 隆顿：《西班牙，西班牙……》，第120页。

③ 隆顿：《西班牙，西班牙……》，第130页。

在佛朗哥发动武装叛乱至上台执政的整整986天战斗中，意大利法西斯对佛朗哥的支持及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是十分露骨的。叛乱发生前三天，1936年7月15日，意大利的一些空军军官已接到命令，要他们作好准备，到西班牙去。7月30日，5架意大利军用飞机从撒丁岛飞往西班牙。8月8日，18架S-81轰炸机从意大利派往西班牙。同月31日，又有20架意大利飞机在西班牙西北部的维戈被卸下船。9月6日，3架意大利轰炸机飞抵西班牙在地中海的帕尔马·德马约尔卡岛。7日，从热那亚起航的意大利内雷德号船在帕尔马·德马约尔卡岛卸下360吨军事物资。

意大利法西斯派往西班牙进行干涉的部队都是成建制被派去的。指挥官开始是罗阿塔，后来有巴斯蒂柯、贝尔蒂加姆巴拉。^①1936年12月，3000名意大利黑衫队开赴西班牙，紧接着又派1500名专家赴西班牙。1937年1月，4000意大利援军到西班牙，帮助佛朗哥叛军向人民阵线政府的防线发动进攻。1937年2月，在西班牙法西斯叛军中作战的意大利军人已达50000人，组成4个师。这些部队先后参加佛朗哥叛军对马德里、马拉加、埃斯特波那、瓜达拉哈拉的进攻。

1937年底，墨索里尼在同戈林会谈中承认，为资助佛朗哥，已花掉40多亿里拉。^②在整个西班牙战争中，意大利耗费140亿里拉。赴西参战的意大利部队超过70000人，而佛朗哥所有的军队加在一起也不过25万人。墨索里尼派飞机和舰只将佛朗哥的部队从摩洛哥运到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西班牙在地中海的巴利阿里群岛成了意大利的海、空军基地。从那里起飞的意大利飞机轮番轰炸由共和国控制的马德里、巴塞罗那、瓦伦西亚等大城市。意军有6000人战死在西班牙。据意大利半官方的斯台法尼通讯社报道，墨索里尼共向佛朗哥派出763架飞机，提供141个

^①、^②见皮埃莱·布罗乌、埃米莱·德米梅《西班牙革命与战争》第27—29及46页。

飞机发动机、1672吨炸弹、925万发子弹、1930门大炮、10135支自动枪、240747支步枪、7514537颗手榴弹、7663辆运输车。①

据1939年意大利报刊披露，在整个西班牙战争期间，意大利空军飞行员共飞行135265个小时，参加5318次轰炸，击中西班牙共和国方面224艘船只，击落903架飞机。有91艘意大利军舰和潜艇参加了对西班牙作战。

纳粹德国也大力支持佛朗哥叛乱。据希特勒的将军施佩尔勒提供的数字，1936年11月，到达西班牙佛朗哥一方的德国军事人员已有6500人。②在佛朗哥法西斯军队内，最多时有10000名希特勒军人。德军中校瓦利蒙特在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维利亚的玛丽娅·克丽斯蒂娜旅馆设立了指挥部。在塞维利亚省，德军驻有轰炸机、战斗机和侦察机中队各一个，3个防空团，几支通讯部队，还有陆军和海军部队，4个坦克连，1个侦察连。这些部队都在施佩尔勒指挥下。后来，冯·里希特封接替了施佩尔勒。

征集德军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希特勒在柏林建立了代号为W的参谋部。其头目是空军将领维尔伯格。在西班牙组成秃鹰师团，飞行员领高薪。一个飞行员说，他和他的同伴突然“失踪”6个月后，他们到W参谋部报到。由W参谋部负责组织“志愿军”去西班牙，发给他们便装、足够的路费和身份证。他们以“旅游者”身份前往西班牙，而他们使用的仍是柏林的信箱号。到西班牙后，这些“旅游者”再换上军装，成了秃鹰师团的正式成员。佛朗哥高度评价秃鹰师团在反对西班牙共和国战争中的作用。著名画家毕加索的不朽名画《戈尔尼卡》就再现了秃鹰师团在西班牙犯下的滔天罪行。

佛朗哥叛军从希特勒德国得到大量武器。叛乱初期，希特勒

① 见1941年2月28日《纽约时报》。

② 布罗乌、德米梅，《西班牙革命与战争》，第48页。

的武器用船运至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或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当国际上实行对西班牙武器禁运后，希特勒经荷兰转运武器。据施佩尔勒提供的细节说，至1936年11月，纳粹德国已向佛朗哥提供了一个中队的容克—52轰炸机、一个亨克尔—51战斗机中队、一个亨克尔水上飞机中队，还有一个82毫米高炮中队。1937年5月初，希特勒向佛朗哥提供了亨克尔—111轰炸机、道尼尔—17轰炸机。

除了作战人员、武器和装备外，希特勒还向西班牙叛军运送大批战略物资。希特勒亲自领导了这些行动并作出重要决定，任命海军上将卡那里斯直接负责此项任务。卡那里斯是情报部门的头目。希特勒情报部门的一名伪装商人在摩洛哥建立了西班牙—摩洛哥运输股份公司。通过这家公司，希特勒将大量战略物资运到西班牙。自佛朗哥发动叛乱至篡权上台止，希特勒对佛朗哥的援助达50亿马克。^①共提供了200多辆坦克、600多架飞机。

上述事实说明，佛朗哥法西斯政权得以确立是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的极力扶植和大量援助分不开的。可以说，意、德法西斯给了佛朗哥以决定性的支持。1939年3月27日，德国、意大利、日本等三国驻佛朗哥西班牙的大使同独裁政权的外交部长霍尔那达在西班牙北部城市布尔戈斯签署议定书，决定西班牙正式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佛朗哥法西斯政权正式加入了德、意、日法西斯联盟。

1939年3月28日上午，佛朗哥叛军进入西班牙共和国首都马德里。下午，意大利师团从西南方向的托莱多门进入马德里。3月30日，西班牙全境被佛朗哥占领。4月1日，佛朗哥宣布战争结束。

5月19日，佛朗哥在马德里举行阅兵式。5月22日，纳粹德

^① 见乌戈·托马斯《西班牙内战》第525页。

国的秃鹰师团在西班牙北部莱昂市举行告别阅兵。四天后，德军官兵从西北部的维戈登船返回汉堡。5月31日，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士兵20000余人从西班牙南部加迪斯登船返回意大利。德、意军队返回各自的国家后，受到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检阅。6月6日，希特勒在柏林检阅秃鹰师团，受阅成员有14000多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外长齐亚诺陪同国王维克托·曼努埃尔到那不勒斯港欢迎意大利远征军。这些军人还在罗马受到墨索里尼的检阅。

当1941年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后，佛朗哥一共派出47000名长枪党成员，组成蓝色师团与德军一起同苏军作战。佛朗哥还向纳粹德国提供了潜艇基地、窃听服务、战略物资，直至空军基地。^①

佛朗哥叛乱所造成的灾难

佛朗哥在西班牙执政，使西班牙人民处于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奴役之下，陷入苦难的深渊。

1939年2月，佛朗哥在取得全国政权前夕颁布《政治责任法》，对反佛朗哥法西斯叛乱的人进行迫害。1939年4月1日，佛朗哥宣布除长枪党以外的所有政党为非法组织。他还宣布废除1931年第二共和国建立时通过的宪法及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剥夺少数民族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民族自治权，不许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法西斯政权废除了共和国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将分给农民的土地重新还给地主。佛朗哥三年叛乱战争中死亡和战后被佛朗哥枪杀的高达50万人。战后有30余万西班牙人背井离乡，被迫流亡国外。

三年西班牙战争造成极大的物质损失。据1940年8月4日佛

^① 见乌戈·托马斯《西班牙内战》第1017页。

朗哥法西斯政权的《国家公报》公布的数字说，战争期间消耗了300亿比塞塔。^①不动产的损失达42亿比塞塔。150座教堂被完全毁掉，4850座教堂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63个市、镇遭到战争破坏，25万户住房被摧毁，还有25万户住房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战争给铁路运输造成了巨大损失，有1309辆火车机车报废，相当于1936年机车总数的42%；30000节货车车皮被毁，相当于1936年拥有车皮总数的40%；3700节客车车厢被毁，相当于1936年拥有数的70%。1/3的运输船只被毁，共70艘货船，总计22万吨。

农业生产也遭到很大破坏。佛朗哥执政后，西班牙经历了三年“饥饿年”，农业生产下降21%。1939年同1935年相比，马匹的头数下降40%，驴的头数下降28%，牛的头数下降27%，小麦产量下降30%，大麦、烟草、橄榄的产量下降35%，甜菜产量下降65%。粮食种植面积由828.8万公顷下降到652.6万公顷。以1929年的产值为100，1939年农业产值为1929年的76.7%，工业产值为72.3%。国民总产值仅相当于1929年的18.8%，人均收入仅有740比塞塔。工人的工资低于1936年佛朗哥叛乱前的水平，但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价格却上涨3—4倍。

佛朗哥在西班牙统治了36年。直至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死去，西班牙才在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领导下，开始民主化的进程。

第三节 葡萄牙的法西斯总体国家

葡萄牙的萨拉查法西斯政权，以标榜总体国家为其特征。这

^① 见乌戈·托马斯《西班牙内战》第994页。

个法西斯总体国家，脱胎于本世纪20年代在葡萄牙建立的军人独裁的政权。它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推行的总体国家^①为蓝本，成为独裁者萨拉查长期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统治形式。

脱胎于军人独裁政权

1910年10月4日，由布拉加和阿里亚加领导，葡萄牙进行了推翻君主制的资产阶级革命，废黜国王唐·曼努埃尔二世，宣布成立共和国。共和国政府采取自由主义纲领，试图进行某些改革。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国内的社会动乱，改革的尝试很快被迫中止。^①

在1910—1926年的第一共和时期，^②葡萄牙政局长期不稳。十六年内举行了6次议会选举，8次共和国总统选举。共有45届内阁执政，平均每隔4个月左右更换一次内阁。叛乱与政变的频繁也不亚于此。^③主要政党共和党、民主党都不能在议会中取得稳定多数。有大约20届内阁因议会投不信任票而辞职，5届内阁和4任总统在政变或危机中被推翻。

1926年5月28日，葡萄牙军人运动在戈麦士·德·科斯塔将军率领下于布拉卡发动政变，向里斯本进军。门德斯·卡贝萨达斯司令一度组阁，在共和派与右翼军人之间从中调和，但遭失败。在新政权中先后担任外交部长和战争部长的右翼军人奥斯卡·卡尔莫纳将军在君主派西纳尔·考德斯将军支持下，于同年

^① (美)e·E·布莱克、E·C·赫尔姆赖克：《20世纪欧洲史》(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② 据奥里维拉·马克斯：《葡萄牙史》，里斯本帕拉斯出版社1978年版。

^③ (美)威廉·兰格：《世界史编年手册》(现代部分)，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95页。

11月建立军人独裁政权。卡尔莫纳任总理和临时总统。考德斯任财政部长，他试图重整陷于困境的国家财政，平衡收支，以刺激经济。结果未能如愿，赤字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1928年3月25日，卡尔莫纳作为唯一候选人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维森特·德·弗雷德斯上尉组阁。新政权并未提出很具体的纲领。事实表明它同前几届政府没有多大区别，只是高官厚禄主要落到军人集团手中，不再由议会支配。^①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1889—1970)出任财政部长。由于要求授权控制国家财政全部收支未果，萨拉查一度离职。维森特在1929年因右派反对而辞职。继任者亦未成功。1931年1月，卡尔莫纳接受与右派人物有密切个人关系的多明戈·奥利维拉将军出任总理，这是萨拉查的胜利。

萨拉查1889年4月28日出生于葡萄牙第四大城市科英布拉附近维曼罗的一个小客栈主家庭。早年曾在神学院念书，在家乡做过神甫，后在科英布拉大学法律系毕业，在该校任经济学教授。他很早就被视为天主教极右派利益的理想代表，君主制的同情者。1912年，他与平·贡萨尔维斯·塞莱热拉在科英布拉的教师和学生中建立了一个反对共和制、倾向君主制的政治组织天主教民主学院中心(简称CADC)，主张建立以教皇莱昂八世教谕为基础的社会——天主教社会。他自任总书记。1917年，CADC主要成员又成立范围扩大至全国的葡萄牙天主教中心。萨拉查作为天主教政治组织的候选人参加1921、1925年的议员竞选。他因在财政经济方面的著述和在教育界的声望而为人们所注目，1921年以天主教中心代表身份当选为参议员。

1928年5月，萨拉查以“能审查各部的财政，有权对其增加的开支予以拒绝”为条件，接受维森特的邀请，重新出任财长。他推

^① 兰格：《世界史编年手册》(现代部分)，第95、96页。

行严厉的经济措施，大幅度削减支出，达27万孔多。^①通过提高税收，增加收入20.7万孔多，并加强货币管理，在其任职的第一个财政年度(1928—1929年)，葡萄牙财政15年来第一次出现顺差。当年收入217.5万孔多，支出190万孔多，顺差27.5万孔多。萨拉查由此声誉鹊起，成为葡萄牙的显要人物。他在其财政部长任内，一直设法保持财政收支平衡，解决了葡政府一个长期棘手的问题，提高了威望，被人们视为认真工作的政治家。

1929年，萨拉查将其视线移向政治领域，大事赞扬极右的民族主义，扮演一个民族复兴倡导者的角色。他在这年秋季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一个后来广为流传的口号：“绝不反对国家，一切为了国家。”^②他强调未来的制宪国家应建立在“牢固、谨慎、协商的民族主义”基础之上，宣扬所谓家庭、福利团体、经济实体、教区、市政机构所应承担的责任。

1930年7月30日，萨拉查建立法西斯组织国民同盟，自任领袖。同盟的口号是“同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议会制作斗争”。1931年5月，萨拉查明白表示，要以极端民族主义作为将要建立的独裁政权的思想武器。他说：“独裁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由强盛国家无可争议的主权所制约，并为人们所充分理解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民族主义。”

建立总体国家

1930年—1931年间开始出现“新国家”的提法。1932年7月5日，萨拉查就任政府总理，组成一个文人政府。他宣布解散国民同盟之外的其他一切政党。1933年2月22日，公布实行独裁统治

^① 孔多，葡萄牙早先通用的货币。与其他几种同时通用货币的兑换率是：1孔多 = 1000埃斯库多，1埃斯库多 = 1000列依斯，1列依斯 = 100分。

^② 《葡萄牙史》第2册，里斯本1978年版。以下萨拉查讲话引文均出自此书。

的总体宪法^①，以取代1911年的旧宪法。在新的宪法中宣布成立“总体国家”^②，又称“新国家”。它规定葡萄牙为国民同盟统治的一党制国家。内阁由总统任命，只对总统个人负责。

1933年3月19日，葡萄牙对新宪法实行公民投票。据官方公布材料，80万人投赞成票，近50万人弃权，6190人投反对票。按政府此前宣布的规定，竟将弃权票视为赞成票。1934年12月16日举行大选，选民只能在国民同盟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选择，不允许投票选举名单以外的人。选民人数仅占居民人数的6.7%。1935年1月10日，新选举的国民大会开幕。90名议员全部来自全国唯一政治组织国民同盟。

1936年是萨拉查宣布的“团结统一新时代”开始的一年，也是他集大权于一身，他的所谓总体国家牢固建立起来的一年。此时，萨拉查除任政府总理外，还兼任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等要职。^③财政部长一直兼任到1940年，国防部长兼到1944年，外长兼到1947年。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在1935年9月的一份官方照会中，他宣称：“不幸的是，有些事情只有我能做”。

萨拉查能在葡萄牙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首先是他利用了当时的混乱局面。1926年建立军人政权后的几年里，葡萄牙无论在政治、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生活方面都明显地动荡不安。政府机构重叠，贪污盛行，政府效率极低。1930年5月，萨拉查在里斯本里斯科大厅演讲时，形容当时的社会状况说，总括“葡萄牙的形势，只需用一个字眼：‘混乱’，就足够了”。两个月后，他又说：“谁都知道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来自经济、财政、政治、公共管理等处于一派无组织状况的葡萄牙”。1932年5月他强调：“可以

① 《世界史编年手册》(现代部分)，第96页。

② 葡萄牙《实用字典》，1986年版，第298页。

③ 葡萄牙《实用字典》1986年版，第1924页。

说，葡萄牙生活中已没有严肃和法律，无组织现象到处都有，混乱随时可见”。“只有严厉执法，只有取缔政党、工会，只有新闻检查，重建武装力量和警察，才能诞生出强国”。

正是由于长时间的混乱不安，各阶层人们都渴望安定，要求出现一种能够控制局势的力量和“铁腕人物”。萨拉查利用他因财政政策成功而获得的声望，依靠支持他的政治势力和法西斯组织，鼓吹建立强大的“总体国家”，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他的独裁统治。

萨拉查的支持者，主要来自统治阶级中的右翼。分别说来，有财团和赌场主，他们要求得到保护，“以对付罢工和持续不断的社会骚乱”；宗教势力，萨拉查的上台是他们对主张自由民主共和的无神派及共济会^①的胜利；军方权势集团；右翼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科英布拉大学的教授；君主派，他们中的大多数相信萨拉查将为他们请回国王唐·曼努埃尔二世，国王本人也对萨拉查颇为赞赏。

萨拉查借以建立和维护其独裁统治的重要支柱是整体派。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鲁济塔诺^②整体主义自1914年开始发展起来。它全盘否定19世纪所取得的进步和自由，反对一切共和思想，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一切理论，严厉谴责民主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派别的领袖人物有：安东尼奥·萨迪纳，一个散文家，诗人，整体派的哲学指导人和派别奠基人^③；若瑟·佩吉多·雷伯洛，该派经济学理论指导。1917—1918年共和国总统西多尼奥·帕依斯虽然从未以整体主义分子面目出现过，但在他周围聚集了许多整体主义者，并部分地执行了该派的理

① 葡萄牙的共济会在第一共和时期有很大势力和影响，三任总统以及大部分政府首脑都是共济会的成员。

② 鲁济塔诺是葡萄牙民族的别称。

③ 葡萄牙《实用字典》1986年版，第1936页。

论。

1926年前后，法西斯主义开始在葡萄牙时髦起来。整体主义者推崇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可以解决葡萄牙的问题。他们在20年代初形成一股政治势力，称为整体派。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其后德国的纳粹主义，以及意、德、奥地利、西班牙先后建立的极权制度，对整体派很有吸引力。他们以法西斯的观点、组织、制度和行动为榜样，极力仿效，吸引了众多的年青人。这个派别的成员，来自贵族、地主、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从来没有社会底层的人。一些与法西斯主义有联系的右翼团体，如1932—1934年间非常活跃、在西欧小有名气的以罗朗·布莱托为首的法西斯组织——全国辛迪加主义派也投靠整体派，后来加入了国民同盟。

总体国家的结构及其统治手段

萨拉查的总体国家从1936年起明显具有法西斯极权制度的特色。据萨拉查1934年5月26日的讲演中所说：总体国家的福音书由1933年宪法、殖民法、帝国组织宪章、全国劳动章程和国民同盟纲领所组成。后来还增加了1940年与梵蒂冈签订的协议。

这个总体国家究竟实际上干了些什么呢？

首先，按三个层次将各个家庭的成员全部组织起来。

萨拉查设计的总体国家，核心基础在家庭，其基本成员按照仿效意大利拉文洛法典于1933年制定的《全国劳动章程》及其他法令的规定，被分别组织到各种团体中去。

总体国家由三种成员按三个层次组成：

1. 基本成员：包括由职员、工人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国家工会；企业、私人或集体公司组成的同业工会；农村的主、雇联合会组织人民之家，农业劳动者组成的农业之家或农业工会；海

上从业人员及企业家的社团——渔民之家。

2. 二级成员(或称“中间成员”):位于前者之上的全国联合会和地区联合会,目的是在全国或地区范围内分别代表各有关行业的全体利益。

3. 团体:慈善团体——包括医院、收容所、养老院、幼儿园、慈善院等。

文化团体——大学,科学院,文化、艺术、体育等团体。

除上述三级组织、成员之外,还有下列组织:

1. 经济协调组织:准社团团体,旨在联络国家与各团体之间的关系;

2. 调节委员会:为进口创造条件;

3. 国家联合会:管理出口事宜;

4. 研究所:正式审查并保证出口产品的质量和等级;

5. 其他指导专业和社团活动的机构。

组织上述团体,曾遇到反对和抵制。有许多组织是被迫成立的。由于政府的压力,这些组织很快就成为实行政府政策的工具。

1932—1933年间,萨拉查完成了极权独裁的总体国家的最后变动。国王唐·曼努埃尔1932年在英国逝世,萨拉查明确宣布君主制问题已告结束。他同时建议解散天主教中心,并拒绝与任何反对派达成相互理解的协议,号召全国都团结在国民同盟周围。

萨拉查的主张毫不掩饰地否定个人基本权利和结社自由。他在1930年5月的里斯科大厅讲话时即提出,政党应由协会所代替才“符合现实”。1934年5月26日的讲演中,萨拉查强调五月运动^①“就是要永远废止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党派、社会斗争”。

1935年,禁止国民同盟以外的所有政党和秘密协会。1930年

^① 指1926年5月28日政变所开始的运动。

以后，由那些反对独裁政府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统治阶级中的不同政见者通过合法途径成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共和联盟被强行解散。从1933年宪法生效后，政府仅批准过一个名义上非党派的组织：全体葡萄牙人联合会——国民同盟。萨拉查企图把全体葡萄牙人都集合在他的目标之下，一再警告自由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想要自己组成同盟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们只有一个理论，我们大家是一股力量，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商量、妥协通融可能的”。

其次，成立准军事性的法西斯组织。

1936年，仿效德意法西斯的做法，成立了葡萄牙团和葡萄牙青年。前者是民兵，开始是自愿参加，宗旨为加入“反布尔什维克十字军”、“保卫总体国家和国家的精神财富”。到40年代初，葡萄牙团发展到20余万人，包括一部分公职人员在内。葡萄牙青年在学生中组织，起初政府要求从小学到大学所有在校学生都必须参加，后限制为11—14岁学生。

这两个组织完全按照德意法西斯组织的式样着装、敬礼，组织结构和习惯用语都是法西斯式的。他们常常被委以各种任务。如葡萄牙团被授予保卫领土的责任。葡萄牙青年负责组织全体学生。尽管社会各界纷纷谴责，这些组织一直存在到1974年。

第三，限制和剥夺居民的选举权利。

葡萄牙总体宪法规定：年满21岁，有文化，每年至少纳税100埃斯库多的男性公民，以及受过中等教育，每年纳税200埃斯库多的女性公民，才有选举权。许多人被剥夺了选举权利。

30年代初，葡萄牙全国约有685万人(1930年)。1933年参加公民投票和1934年国民大会选举的选民仅130万人，60年代也仅150万人。截至70年代，40年间，葡萄牙人口增加近300万人。(1970年为963万人)。选举的规模却没有很大变化。1934、1938、1942年的三次议会选举，全部由国民同盟候选人当选。投其他候

选人票的都遭到迫害，或被开除公职，或被关进监狱。

第四，对新闻出版和一切文化活动进行严厉的检查。

1926年5.28运动后即已建立新闻检查制度，不久扩展到戏剧、电影、广播和各个出版部门。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事先没有经过检查官的批准，任何语句或形象都不能发表、公布、通告和演播。

检查的内容不仅针对政治和军事问题，而且涉及整个社会生活，包括宗教问题，行为准则以及所有被认为是危险的、影响民众的消息。连国外发来有关社会骚乱的消息、甚至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一概都在受检查之列。许多书籍被取缔，作者和出版商被处罚。国外出版的书籍报刊同样会被没收或禁止进口。检查制度还要将作家、记者、经理和其他所有向群众进行传播有关的人们不时集中到一起，迫使他们经常进行自我检查。

第五，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行严格管制，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

在30年代改组政治警察，起名国家巡逻保卫警察（简称PV-DE），聘请德国和意大利军官进行培训。1945年改名卫国国际警察（PIDE）。这些政治警察渗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和公民的日常生活，有时连当局负责人员自身，包括武装部队的人也遭到怀疑。

PVDE和PIDE逐渐变成国中之国。他们任意侵占、搜捕私人住宅，没收书籍、文件，拆阅居民私人信件。他们将成千上万的人关押监狱，有的达数十载之久。1936—1956年间，佛得角的圣地亚哥岛上的塔拉弗集中营，由于关押众多的犯人，采用残酷的拷打手段，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而闻名。“塔拉弗”成为政治迫害的代名词。

1956年颁布一项安全措施法令，授权司法部对那些被政治警察视为“威胁社会”的分子施以永久监禁。秘密警察杀害了成百的人，成千的人遭囚禁。主要受迫害对象是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

超过其他任何反对党。

受虐待者下层社会的远远多于上层社会的。那些敌视或被怀疑敌视政府的公职人员、教师、军官动辄被逐出岗位。许多人被迫移居国外。各个阶级、各个社会团体，包括天主教、整体派，都有人受到迫害。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如前共和国主席贝尔纳蒂诺·马查多于1927—1940年被流放；前总理阿方索·科斯塔被流放，1937年病逝于巴黎；前总理多明戈·桑托斯1927—1954年被流放；作家安东尼奥·塞古奥和扎伊梅·科斯特萨分别被流放九年（1927—1936）和二十九年（1927—1956）。葡萄牙唯一的1949年生物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埃戈斯·莫尼斯也在国内遭到迫害。

此外，在农村有共和国国民卫队；在城市，有专门对付集会、示威的公安警察以至纠察队。

葡萄牙大部分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最优秀的分子，坚持与独裁政权相对立，走向充满荆棘的艰难道路。起初，许多知识分子曾对独裁表现出某些同情，如菲尔南多·佩索阿在5.28运动开始几年曾公开表示赞赏。过了几年，他们就转而谴责这种极权独裁制度，反对禁止共济会的决定。许多人宁愿选择自愿流放遭受迫害，也不接受这种制度，或与它同流合污。

第六，牢固控制内阁，频繁撤换官员。

部长委员会会议次数被减少到最低限度，通常是召开由委员会主席和有关部长（大致有两、三个成员）参加的工作会议作出决定。内阁的全部改组工作在1932年完成。在其后的36年时间内，萨拉查分别在1936, 1944, 1947, 1958, 1968年一次撤换50%或者更多的部长。每次内阁改组一般涉及1/3人员。1936年前是每年变动一次，以后除少数例外，都是每3年或4年变动一次。萨拉查使用这种手段，是为了便于总理独揽大权，完全控制内阁。

1932—1968年间，政府部长们的任职时间平均是4年半。若

萨拉查认为需要，有些人任职很长时间，多达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海军部长阿梅里科·托马斯自1944年一直任职到1958年。其继任弗尔南多·门多萨自1958—1968年任此要职。政法部长若昂·安东内斯于1954—1967年任职；其前任曼努埃尔·弗雷拉自1944—1954任职。财政部长，公共工程部长，交通部长中，也有人任职十年或十年以上。

在宗教问题上，萨拉查在1940年与梵蒂冈签署协议时，他既承认了天主教的法律地位，又不承诺听从其教义，未使天主教成为国教。萨拉查不接受宗教对国家的任何影响，毫不让步地反对宗教介入政治，以避免危及他的独裁统治。他控制教会的能力远比受制于它要强得多。到了50年代，宪法才规定天主教作为葡萄牙的国教。

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及对外关系

葡萄牙早就是一个殖民帝国。它在非洲有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等殖民地；在亚洲，也侵占了中国的澳门和印度的果阿等地。萨拉查的总体国家继承了对殖民地的统治，变本加厉地压迫和掠夺殖民地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

萨拉查一上台，就进一步剥夺殖民地人民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主权。在官方文件中开始出现“葡萄牙殖民帝国”的提法。曾担任过几个月殖民部长的萨拉查在1930年《殖民法》的起草中起了重要作用。这部殖民法后来作为附录纳入1933年宪法。它声称：“占领并使海外领土殖民化，使在这些地方生活的土著人文明化的历史责任，是葡萄牙国家的组织纲领的一部分”。“葡萄牙殖民帝国与其宗主国之间是牢不可破的”。“国家有责任强迫土著人为了公共社会总利益的公共工程而工作，执行行政、法律的决定，履行稽查的义务”。1933年颁布《殖民帝国组织章程》和《海外管理条

例》。

二次大战后，非洲大陆开始觉醒，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在葡萄牙，出现了许多秘密的非洲团体。1950年，里斯本大学的一些黑人和混血人学生聚会，制定了一份精密的非洲独立计划。他们受到警方的追捕，不得不逃离葡萄牙。不久，他们就返回非洲，领导那里的独立运动。这些人中，有的人后来成了莫桑比克、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如埃都阿多·蒙德莱成为莫桑比克民运领导人，马里奥·安德拉德成为安哥拉民运领导人。

1961年2月，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战士们在安德拉德的领导下，在罗安达发动了对监狱、军营、电台的军事进攻，开始了葡萄牙殖民地人民的武装斗争。殖民当局据事前掌握的情报，采取预防措施，逮捕了許多人，并从宗主国调来部队，很快控制了局势，镇压了起义。

同年3月，北部地区的人民在邻国刚果人民的支持下，杀死上百个殖民者及其家属。葡殖民当局对此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对农村实行“清乡”，成百上千的黑人失踪、死亡，或逃往刚果。尽管葡殖民当局的残暴镇压受到世界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萨拉查还是一意孤行，将大批装备精良的部队从里斯本派往安哥拉等各个地方。PIDE加强在非洲的力量，甚至超过了本土的力量。

葡属殖民地人民的游击战分别于1963年和1964年扩展到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在葡属几内亚，游击队员们在以阿密尔卡·卡布拉尔为首的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领导下，到60年代末已占领了1/3—1/2的领土。在莫桑比克，以蒙德莱为首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战士们活跃在葡军力量薄弱的北方，不断袭击葡殖民者。1969年蒙德莱遭暗杀，给独立运动造成重大损失。萨拉查政府为扑灭上述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到1968年派往镇压的殖民军已达十万余人。

在对外关系方面，萨拉查政权与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关系最为密切。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刚刚爆发，萨拉查政权就大力支持佛朗哥叛乱，反对西班牙共和政府。葡萄牙是纳粹德国和其他势力向佛朗哥叛军供应物资的主要通道之一，直到1937年4月才被迫同意由英国管制西葡边界。1936年10月，葡萄牙与西班牙共和政府断交。1938年5月，正式承认佛朗哥政权。1939年3月18日，葡西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940年5月，两国联合公报宣布，条约已经获得批准。1942年2月，萨拉查与佛朗哥在塞维利亚会晤，组织“伊比利亚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倾向于轴心国一方。但仍保持同英国的传统关系，允许同盟国使用亚速尔群岛的海空基地。

二次大战后，萨拉查的法西斯政权乔装打扮，表面上允许反对党存在及参加大选，在外交上追随美国，得以苟延残喘。1945—1949年，1958—1962年，葡萄牙政局出现两次危机，军事政变和社会骚乱相继发生，都被萨拉查所镇压。

萨拉查一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使得西方文明的真正价值被抛弃的邪恶势力。自1936年开始至二次大战结束，他越来越频繁地指责共产主义运动。除古巴外，葡萄牙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拒不承认。50、60年代面对国际上对葡海外政策的批判，萨拉查及其政府仍顽固地坚持反共立场，认为反西方的阴谋继续存在。

1968年9月，萨拉查重病辞职。由马塞罗·卡埃塔诺(Marcelo Caetano)接任政府总理和国民同盟主席。1974年4月25日，由一批中下级军官组成的武装部队运动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国民同盟的法西斯政权。此后，葡萄牙确立了议会民主制度，开始了第二共和时期。

第四节 巴西的整体主义 行动与瓦加斯政权

与欧洲远隔重洋的巴西，在20世纪20、30年代，也出现了法西斯运动。尤其在30年代，巴西的法西斯运动十分猖獗。

巴西的法西斯运动是当时国际法西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受欧洲法西斯的影响，又有自己的特点。就法西斯运动本身而言，传播和宣传法西斯思想的，与积极参与法西斯运动的并不是同一批人。就国家而言，政府纵容和支持法西斯运动，但不参与法西斯运动。尤其是政府首脑瓦加斯与法西斯分子一度关系密切，却不是法西斯的运动的参与者。他利用法西斯，又镇压法西斯运动。巴西政府最终还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创造了现代世界上一页富有戏剧性的历史。

整体主义行动党及其渊源

巴西法西斯的渊源主要是纳粹德国，传播的媒介是德国移民。

巴西自沦为葡萄牙殖民地后一直是个民族大熔炉。虽然占统治地位的是葡萄牙人，但国内有操各种各样语言的民族。如荷兰人、不列颠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他们经过长期融合之后形成了巴西人。唯独日耳曼人，尤其是巴西独立后大量涌入的德国人很不合群。他们自恃高贵，常常聚族而居，形成自具一格的海外日耳曼社会。这种在他乡异域的侨乡侨村严格地保留了日耳曼文化，而且继续与国内联系，传播德国社会最新的经济文化思潮。

19世纪70年代德国统一以后，由于向外扩张及劳动人民贫困化等原因，往巴西移民的数量很大。在1889年前，平均每年移民约2000人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济凋蔽，向巴西的移民大增。1921年为7915人，1924年增至28,168人。^①到30年代中期，在巴西的德国移民及其后裔已接近100万人。德国在近现代的发展比巴西快，德裔移民的文化普遍较高，常常能利用德国在巴西的经济势力进入巴西的上层社会，控制巴西的政治和经济。

希特勒和纳粹党人执政后，狂热地宣传日耳曼人至上的种族优越论，使已入了巴西籍的德意志人和从德国来的移民更加高傲自大了。他们居住的村镇城市里，只用德语，保留着德国人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甚至建筑风格，风行法西斯文化。他们似乎忘了身处巴西，把移民区建成一个个“小德国”。这些小德国主要分布在南里约格朗德、圣卡塔琳纳、巴拉那及圣保罗等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的州。

德国的纳粹政府积极利用海外的德国人，扩张其法西斯势力。纳粹党人一上台执政就指示其驻外机构以巴西的“小德国”为基地，在巴西进行声势浩大的法西斯主义宣传运动和组织的活动。随着频繁进行的各种活动，在德意志移民中广泛建立了法西斯组织。到1937年，在巴西出版的德文日报就有10种，德文期刊40余种。30年代初，在巴西相继出现日耳曼人之家、德国海外妇女战线和希特勒青年会之类法西斯团体。在德国移民比较集中的南部各州，有320个德国巴西俱乐部^②。德国纳粹政府的移民组织和团体是巴西法西斯的传播者和组织者。

然而，巴西真正的法西斯运动还不是以这些名目繁多的德国

^① 林恩·史密斯：《巴西，人民与制度》，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35页。

^② 贝利·迪菲：《当代巴西政策中的一些外国影响》，《西属美洲历史评论》第22卷，1940年8月第3期，第415页。

法西斯媒介为主体。巴西主要的法西斯组织叫整体主义党，或称整体主义行动，简称整体主义。

巴西整体主义的创始人和首领叫普利尼奥·萨尔加多。他原是圣保罗的一名新闻记者，深受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他在1932年发表了一篇《告巴西国民书》，倡导在巴西进行真正的法西斯运动。他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压迫”，又反对“共产主义”在巴西蔓延。他主张“巴西的许多民族实体……应联合成统一的整体(整体主义)的国家”，所以人们把他的主张叫做整体主义。整体主义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翻版。它反对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空洞地反对国际垄断资本，把国家的落后和人民的贫穷归咎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体主义认为，要振兴巴西必须效法德国，实行民族社会主义，用暴力及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办法来实现其法西斯的专政。^①

整体主义刚提出时甚合执政的瓦加斯政府的胃口，得到了政府的默许和许多受经济大危机影响的中下层人民的拥护。瓦加斯政府认为这是抵消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因素。中下层人民以为这是摆脱困境的一条出路。整体主义党受德国垄断资本明里暗里的支持而迅速发展起来。初建时只有4万左右党徒，到1933年已增到186000人。^②1934年3月3日，整体主义在埃斯皮里托州首府维多利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年之后，在圣保罗州的皮特罗普利市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到1937年，整体主义党已发展到一百万人。^③

整体主义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组织。它有训练党徒的干部学校，有秘密的领导核心，有3000个基层组织分布在全国各地。它

① 《萨尔加多全集》第9卷，《这就是整体主义》，圣保罗1955年版，第133、134、158页。

② 1934年8月9日《纽约先驱论坛报》。

③ [苏联]《巴西史纲》下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2页。

们有自己的印刷所，出版5种日报，130种周报和周刊。它们还拥有武器，建立了准军事组织，常常派出它的打手明目张胆地杀害群众，镇压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运动。

巴西的法西斯分子主要是巴西下层人民中的极端分子、铤而走险者和一大批被裹胁的穷人。巴西下层人民中许多人来自葡萄牙和法西斯笼罩下的欧洲。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葡萄牙的萨拉查是有名的法西斯魁首，他们都曾打着反帝、反垄断、反压迫的旗帜，对深受垄断资本所害的下层人民很有迷惑力。因此，法西斯在巴西的葡、意移民中也很有市场。

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给了巴西以极大的打击。当时占巴西出口总值达71.5%的咖啡找不到出路，几乎占世界年平均消费量一倍的咖啡积压在仓库里。为了解救咖啡危机，只好销毁积压货物，砍去无数咖啡树。危机的结果最终落到劳动人民身上。农业工人的工资降低了2/3到3/4，生活费用却增长了一倍半。^①农业的危机影响到了工业。工业生产显著下降，开工率严重不足。工矿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30年代巴西工人总数约50多万人，^②仅中央联邦区一地就有6万人失业。巴西社会出现了一支人数庞大的失业队伍。而失业者的直感是帝国主义把危机转嫁给了他们。因此当法西斯鼓吹反帝、反垄断时，他们中的许多人相信法西斯的口号。

1930年瓦加斯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这次政变是巴西资产阶级为了渡过危机、加强统治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手段。政变后加强了对劳动人民的镇压。在国际法西斯力量增强和国内资产阶级强化统治面前，巴西共产党未能采取正确的政治路线，联合中小资产阶级反对法西斯，而是以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为号召，发动工人罢

① 《拉丁美洲劳工》，1931年第42—43期。

② 《巴西统计年鉴》，里约1937年版，第552页。

工，举行起义。^①瓦加斯政府把经济困难和社会不稳归咎于共产主义的威胁。政府的宣传和法西斯的诱惑，使许多失业者和破产者纷纷倒向法西斯，成了法西斯的支持者。

统治集团的法西斯倾向

巴西法西斯主义不单纯在下层人民中蔓延，政府和国家领导人中也有反应。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经济大危机期间，由于美英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卷土重来，巴西在一战中发展起来的、还很弱小的民族工业及其占有的一部分国际市场受到严重打击。国民经济情况一直不好。经济衰退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巴西政局动荡不安。巴西的政界领导人面临国内国际的严峻局势，苦心寻找克服危机的办法。走什么道路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呢？当时世界上有两种办法：一是欧洲德意法西斯的道路；二是美国罗斯福新政的道路。美国是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实行新政缓解危机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巴西是个不发达国家，缺乏实行新政的物质条件。而德、意在困难的条件下用法西斯的办法强化统治，咄咄逼人的气焰，对巴西统治者很有诱惑力。1930年靠政变上台的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就是个主张独裁，十分欣赏法西斯主义的人。他在南里约格朗德州当州长时就直言不讳地说：“……我在南里约格朗德州州政府内执行的政策……是同法西斯倡导的阶级合作法律或阶级合作组织相似的……”^②他当总统后公开宣称：“巴西是个大病院……巴西人民是虚弱有病的人民。国家需要一个医生，那就是

^① 《普列斯特斯文献》，布宜诺斯艾利斯1947年版，第75页。

^② 《拉丁美洲历史评论》第63卷第2期，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第264页。

独裁。”^①

瓦加斯的思想代表了巴西统治阶级的思想。当时左右巴西政治的主要是军人。瓦加斯赖以上台执政的军人势力是自由主义同盟和尉官派。自由主义同盟代表工业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大地主、大畜牧场主。尉官派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多数受过良好的资产阶级教育，有政治头脑。他们从巴西统治者的利益出发，既反对美英帝国主义的掠夺，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危及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十分欣赏法西斯主义，主张军事独裁。

巴西新兴的资产阶级希望发展工业，使国家强大起来。发展工业需要资金、设备和高水平的技术，这些恰恰是巴西缺乏的，需要得到国外的援助。军人们希望加强军事建设，也想得到某个大国的支持。他们亲德，因为30年代的国际形势是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势力已从拉丁美洲衰落，德国的势力企图取代英国而努力打入拉丁美洲。

希特勒执政后有计划地向巴西进行扩张。巴西地处非洲到美洲的最近点。德国世界战略的一个重要计划是占领非洲西海岸后从达喀尔跨越大西洋入侵巴西，由巴西北上切断巴拿马运河，进而威胁美国本土，以达到夺取世界霸权的目的。^②希特勒曾公开宣称：要“把巴西变成一个新的德国”。德国利用巴西急需援助的心理积极打入巴西。1934年德国同巴西订立双边贸易协定。协定是不平等的。尽管德国人给了巴西一些援助，但这些援助只能用于购买德国货，而不能从德国银行中提出钱来或兑换成黄金到德国以外使用。人们称这种援助为“不兑换马克”的援助。双边协定

^① 亨利·艾伯特·菲利普斯，《巴西，美洲各国之间关系的堡垒》，纽约1945年版，第129页。

^② 汉弗莱斯，《拉丁美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伦敦阿斯顿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139页。哈洛尔德尤金·大卫等著，《拉丁美洲外交史》，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1977年版，第226页。

大大加强了德国在巴西进口贸易中的地位。到1938年，德国商品在巴西进口中的比率达到25%，超过美国而跃居第一位。^①

在危机的年代里，德国资本帮助巴西政府渡过了难关。德国势力也渗透到巴西国民经济各部门。巴西的工矿、交通和金融等部门都渗入了德国资本。许多德国公司在巴西比较大的一些城市里建立了分支机构。德国财团的南美银行在巴西大约设立了300个分行或办事处。德国航空公司控制了巴西绝大多数国内外航线。这些航线上的工作人员从飞行员、地勤人员到一般职员几乎全都是德国人。其中多数是纳粹侦察机关派出的密探。

巴西统治者的法西斯思想，加上德国法西斯的拉拢，使巴西政府从亲德进而效法法西斯。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瓦加斯政府开门揖盗，把巴西警察系统的大门打开，让盖世太保来监督巴西人民。1936年末，德国和巴西警察当局的代表进行了有关两国警察机关合作反共的秘密谈判。1937年春，巴西警察局的一个代表团应德国纳粹党党卫队和盖世太保首领希姆来的邀请访问德国，“研究了德国秘密警察的反共方法”。巴西驻德大使曾与希特勒面谈：“对于我们巴西人来说，的的确确必须加强与您的合作，尤其是在维持秩序方面。”^②

瓦加斯政府的法西斯倾向，为巴西法西斯组织的猖獗提供了政治气候。

政府与整体主义党的勾结

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瓦加斯政府有法西斯倾向。它与整体主义党一起镇压巴西的无产阶级运动。

① 《巴西史纲》，第610页，附表

② 《国际新闻通讯》1937年第7期，第182页。转引自《巴西史纲》第585页。

瓦加斯1930年政变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劳动人民的支持。但瓦加斯建立的不是民主政府而是独裁政府。这个政权的首要目标不在于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而是取消1891年宪法在形式上规定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以便更有效地镇压革命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政府一站稳脚跟，就颁布了一系列社会立法，不准工人维护自己的权益。但立法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1930年后工人运动高涨。巴西共产党积极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取得了多次斗争的胜利。党的队伍扩大了。1929年党员只有500—600人，到1934年已发展到5000人。党领导的工会和劳动人民的罢工规模在1934—1935年间多达100到150万人，打破了历史的记录。^① 政府屡派军队干涉，收效甚微。

1932年整体主义成立后，巴西共产党接受第三国际的指示于1934年建立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号召劳动人民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共产党与整体主义面对面的冲突，给了政府以机会。亲德独裁的政府自然求助于整体主义党来镇压无产阶级运动，迫害无产者。1934年8月，反法西斯的反战代表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遭到警察的镇压。三万多群众游行，抗议警察的暴行。结果警察伙同整体主义者镇压群众，打死数人，重伤45人。1934年9月22日，整体主义者又伙同警察冲击里约的反法西斯大会，打死4人，打伤25人。在贝洛奥里藏特市，反法西斯主义者同整体主义者发生武装冲突。双方相持不下。警察赶来支持整体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不得不撤出战斗。公众普遍要求政府处理整体主义者的暴力行为。政府不但不制止，反而公开支持整体主义者反对人民。

瓦加斯政府伙同整体主义者镇压巴西人民，最重要的事件是对付1935年11月的人民起义。

^① 1936年6月5日《晨邮报》。

1935年3月，巴西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召开大会，成立民族解放联盟。联盟的工作很出色。从1935年3月到6月，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就在全国建立了1500个联盟支部，拥有成员150多万人。在工人、士兵、海员、国家公务员、大学生和农民等阶层中建立了支部。连德国军事教官都说：“共产主义（指民族解放联盟）通过某种渠道甚至渗透到军队的指挥人员中间来了。”^①政府惧怕人民力量的壮大，于1935年7月11日宣布取缔联盟。根据瓦加斯的命令，警察伙同整体主义者闯进联盟办公处所，破坏联盟的基层组织。整体主义者尤其猖狂，任意杀害联盟成员，烧掉或捣毁他们的房屋。

为了还击白色恐怖，共产党领导联盟成员在一些地方举行起义。1935年11月，大规模的起义首先从北里约格朗德州开始，很快发展到伯南布哥州、圣保罗州、南里约格朗德州、巴拉那州及马腊尼昂州等地。政府赶紧调集军队镇压，但士兵常常拒绝开枪。有的部队干脆参加了起义。起义的面很广，军队的力量不足，瓦加斯只好求助于整体主义者。法西斯的整体主义者是巴西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在瓦加斯的授意和纵容下到处疯狂镇压人民起义。他们屠杀人民最凶残，常常在进攻中打冲锋，为反动军队开道。他们用德国法西斯提供的武器残酷杀害巴西的优秀儿女。这次起义由于时机并不成熟，行动仓促，力量分散，终于在法西斯分子和军队的共同镇压下失败。

镇压了1935年11月的人民起义之后，瓦加斯腾出手来加强其独裁统治。1937年11月，他搞了一次自我政变，放逐了政治反对派领袖达·库尼亚，解散议会，将一切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独裁者。然而，帮助瓦加斯镇压人民的整体主义行动党的队伍也发展了，号称百万之众。在共产党遭到镇压之

^① 见1935年4月21日《劳动报》。

后，除政府外，国内已无其他政治势力可以同整体主义党的力量相比拟或抗衡。

粉碎整体主义党的叛乱

整体主义党不但是个政治团体，而且是个自成系统的小社会。他们不受其他人约束，不接受政府的管辖。他们有自己的领袖，自己的旗帜，自己的标记和礼仪方式，自己的经济实体，自己培养干部的学校，自己训练武装人员的基地。德国垄断组织提供他们武器和经费。整体主义集团俨然是巴西国内的一个独立王国。巴西国家的领导人、实行独裁的瓦加斯却不是整体主义的成员，他想要办点大事还要与整体主义者商量。根据萨尔加多后来的证词，瓦加斯在1937年政变前曾要求他支持正在酝酿中的政变，也向他征求过对新宪法的意见。由于萨尔加多表示不干涉政变和不反对新宪法，瓦加斯才下了政变的决心。政变后，瓦加斯对整体主义者日益扩大的势力感到非常担心。

瓦加斯与整体主义的想法不同。瓦加斯和巴西的统治集团关心的是如何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权力，而整体主义者则想使巴西成为德国的附属国。与整体主义者比较起来，瓦加斯及巴西的统治集团还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他们不想当德国的儿皇帝。所以，巴西的统治集团在1937年自我政变后不到两个月，就在1937年12月2日针对整体主义者的尾大不掉，下令解散一切政党。整体主义者还以为这是政府故作姿态，便改头换面把整体主义的名字改为巴西文化协会。然而，政府又宣布文化协会非法。整体主义者终于明白过来，便转入地下，从事反政府的准备活动。

1938年5月11日，整体主义者在里约热内卢对总统府发动突然袭击，试图搞垮瓦加斯政权。当天夜间整体主义者占领了两个电台。他们用广播宣布瓦加斯政府的统治已被推翻。瓦加斯和他

的少数卫队被包围在总统府瓜纳巴拉宫内，情况危急。瓦加斯率领家人坚决抵抗。双方僵持了5个小时。最后政府军赶到，打垮了整体主义暴徒的叛乱，挽救了瓦加斯政权。总统府解围后，整体主义被政府军彻底打败。他们的首领萨尔加多乘德国船逃往葡萄牙。整体主义在巴西彻底垮台。

瓦加斯政府对待整体主义党的态度是由巴西资产阶级中的民族主义者的利益所决定的。他们希望同所有的外国资本合作，而不愿受制于德国一家。从1936年开始，巴西的经济形势日益好转，进入发展时期。资本家为了扩大生产，需要足够的劳动力来为他们服务，已不需要整体主义者帮助他们把工人赶出工厂。然而，整体主义者仍在到处破坏秩序，影响正常生产，有背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感到有必要遏制整体主义的气焰。

巴西的劳动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在危机时期曾经希望法西斯运动摆脱他们的困境。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工农业的发展，倒使他们觉得秩序和繁荣带来了生机。法西斯的混乱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所以纷纷离开法西斯或反对法西斯。当政府取缔法西斯时，法西斯的整体主义就像冰雪融化那样顷刻瓦解了。

另一方面，美国在巴西与德国资本的竞争中占了上风。巴西政府此时已注意到德国资本远隔重洋，而美国资本近在咫尺，美国资本终将取代德国资本。所以他们不想把自己绑在希特勒的战车上，在世界资本主义的角逐中充当德国垄断资本的牺牲品。美国的影响也使巴西政府下决心与整体主义彻底决裂。

整体主义的叛乱被粉碎之后，巴西与德国的关系一度恶化。1938年9月，巴西政府宣布德国驻巴西大使里特尔是“不受欢迎的人”。作为报复，德国也赶走了巴西大使。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德国人被迫离开巴西回国。为了防止德国移民的动乱，政府特地派了一个步兵团进驻德国移民聚居最密集的正卡塔林纳州。

转而向法西斯轴心国宣战

世界反法西斯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页是亲法西斯的巴西政府成了反法西斯联盟的一员。它是在政府领导人和统治集团原封不动的情况下,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的。瓦加斯政权转而采取反法西斯的态度,是由各种条件决定的,而首要的条件却是法西斯对巴西的危害。希特勒对巴西的伤害把巴西政府推向了反法西斯的一边。

瓦加斯政府走上反对国际法西斯的道路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它解决整体主义组织后,并没有最后确定对国际法西斯的态度。德国纳粹政府不想放弃它染指巴西、入侵美洲的计划;而巴西政府像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向来对美洲的北方大国——美国抱有戒心,总希望有一种外来的力量能抵消美国在拉美的作用。德国,是当时唯一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力量。在德国主动拉拢下,巴西和德国的关系很快好转。不久,双方恢复了大使级关系,签订了新的贸易合同。德国的工业品和军火又源源不断地流进巴西。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巴西宣布中立。然而,对希特勒在大战初期的胜利,巴西政府还是暗暗称赞的。1940年6月德军攻入法国,瓦加斯发表了一通抨击“自由主义”的讲话,嘲笑欧美的反法西斯国家是“毫无远见的自由主义”、“毫无用处的个人主义”。他模仿法西斯主义的口气说:有必要建立世界强权机构的新秩序。^①

瓦加斯政府之所以在二战初期与德国维持较好的关系,一方面是巴西统治集团的许多人在思想上与法西斯主义息息相通;另一方面是维护巴西政府统治的军队还需要德国军火的支持。没有

^① J. E. 法格:《拉美通史》,美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760页。

德国的军火供应，巴西军队就难以持续其战斗力。巴西政府中以陆军部长杜特拉和总参谋长蒙特罗为首的将军们代表着与德国垄断资本有密切联系的一部分巴西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在政治上还有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是亲德的，为德国的每一个胜利叫好。巴西政府不能不考虑这些人的利益。

对于巴西的将军们来说，亲德是为了武器。他们常说：“我们既不亲英美，也不亲德，我们只亲武器。”战争断绝了德国武器的来源。英国人控制了大西洋的航运。1940年，巴西货轮西凯罗·坎波斯号运载了大量德国武器，就被英国人扣留在直布罗陀，差一点被没收。1941年后断了德国武器来源，将军们当然要为这事着急了。唯一的出路是转向美国！

美国的态度如何呢？二次大战的爆发，英国的封锁，欧洲大国无暇顾及巴西的贸易，美国就毫不客气地取而代之。战争不断扩大，美国在巴西市场上的势力也不断扩大。美国垄断资本把德、日、意完全挤出巴西市场。

美国不但控制了巴西的外贸，而且加速了对巴西的投资，主动向瓦加斯政府提供巴西工业急需的资金和技术。美国进出口银行向巴西贷款2000万美元建设沃尔塔——里东达钢铁厂。1940年11月，美国签署泛美咖啡协定，允许巴西咖啡在美国充分销售，解决了德国势力退出后维持巴西经济的需要。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莫斯科保卫战首次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给巴西政府和它的将军们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继续亲德，一旦德国失败，巴西将怎么办？会不会遭到盟国的报复？在同盟国和轴心国力量消长面前，以前一直首鼠两端的巴西政府不能再维持有倾向性的中立了。

将军们担心的武器来源，也得到美国的许诺。1942年1月，瓦加斯对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说：“巴西有权被美国看成是一个盟友，有资格根据租借法案得到足够的飞机、坦克和海岸大炮

……”。^①美国总统罗斯福一获悉这条消息立即回电威尔斯：“转告瓦加斯总统，我完全理解并十分重视巴西所需要的一切。我可以向他保证，大量的物资即将源源运到。”^②美国的武器许诺给巴西的将军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美国原已准备在拉拢不成时用武力逼迫巴西就范。欧战爆发后，美国以安全为理由，在财政上对巴西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巴西将国家的黄金储备从伦敦迁往纽约。从1939年年末起，不再使用英镑结算，而改用美元结算巴美之间的全部贸易款项。把外贸主要依靠美国的巴西赶到了美元的金融圈里。

美国针对瓦加斯1940年6月11日的亲德讲话，毫不客气地提醒他：“如果巴西采取亲德立场的话，那么美国就要重新考虑它对巴西的全部经济政策。”^③这无疑是一种严厉的警告。

美国并不是虚声恫吓，它已有了出兵巴西的具体计划。在1940年5月，美国已制订出一个计划，拟在政治和经济拉拢不能迫使巴西政府就范之时，派遣10万远征军占领巴西里约热内卢到贝伦一线的沿海战略据点，把巴西置于美军的控制之下。

1940年秋，瓦加斯和巴西政府反复权衡利弊得失之后，终于答应美国在巴西东北部的纳塔尔地区建立海空军基地的要求。巴西政府和将军们明白，与美国是无法抗衡的。在美国的威胁利诱和认真考虑巴西资产阶级的利益之后，瓦加斯的巴西政府终于决定倒向美国，与德意日法西斯集团断绝关系。1942年1月瓦加斯召集内阁会议，宣布了“与美国共存亡”的决定。^④

巴西的转舵主要出自经济利益的考虑。它原打算只中断与轴

① 菲茨波恩，《1488—1973年的巴西年表与事实》，美国奥辛那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114页。

② 菲茨波恩，《1488—1973年的巴西年表与事实》，第116页。

③ 鲁特，《大战秘史》纽约1945年版，第152页。转引自《巴西史纲》第618页。

④ 菲茨波恩，《1488—1973年的巴西年表与事实》，第114页。

心国的外交关系，用没收他们财产的办法，像在一次大战中所做的那样，捞点好处而已。巴西的初衷并没有参战的意思。但巴西参战了，违背了转舵的本意。逼迫巴西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是美国或其他同盟国，而是希特勒，是纳粹德国自己。

由于巴西政府接管德国和意大利航空公司在巴西的所有机构、机场和物资设备；没收这些国家在巴西的工厂、企业、商船和其他财产，封闭受轴心国控制的组织和报刊，激怒了希特勒。德国潜艇无限制地袭击巴西船只。1942年8月中旬达到最高峰，三天之内击沉5艘巴西船，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法西斯的野蛮行径激起了巴西人民的极大愤慨。在人民的压力下，巴西政府在1942年8月22日向德意法西斯正式宣战，最后又向日本宣战^①。

巴西政府在二战后期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第一，配合美国开辟了巴西至非洲的通道，保证了北非和西西里战役的胜利。第二，为同盟国提供大量战争急需的物资。第三，参加南大西洋护航，击沉了8艘德国潜艇。第四，派遣了5万远征军参加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作战。他们在意大利战场屡立战功，俘虏敌军两万多人，攻克了设防坚固的卡辛诺山阵地，突破轴心国在亚平宁山区的最后防线。还在意法边境接受了德军第146榴弹炮师和3个残存的意大利师的投降。

^① 巴西于1945年6月6日对日本宣战。

早期纳粹党和纳粹运动的性质

希特勒和它领导的纳粹党早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灭亡。今天之所以有必要就纳粹党和纳粹运动的性质进行再探讨，是由于：第一，作为历史上曾经给人类带来深重祸害的纳粹党本身虽不复存在，但是幽灵未散，遗毒犹存。第二，国内外史学界虽然就此问题讨论了几十年，但迄今未有定论。我国近年有的学者也提出“性质转变说”，即早期的纳粹党是小资产阶级政党，而中间，在1925年纳粹党重建之后到20年代末，有个“性质转变阶段”，最终才形成为大资产阶级的政党。^①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早期纳粹党和纳粹运动性质的认识。这不单纯具有学术上的意义，对于总结历史教训，防止纳粹主义某种形式的复活，也有现实意义。纳粹运动的早期阶段，一般是指从纳粹党成立到“啤酒馆暴动”失败，即1920年2月24日到1923年11月9日。为便于说明问题，本节论述的时间范围延长些，涉及纳粹党重建后的整个20年代。

从纳粹主义看纳粹运动

评价一个政治运动的性质，不能只是分析参加者的社会成

^① 参阅《法西斯问题学术讨论会侧记》，《世界历史》1988年第1期。

份，主要决定于运动的指导思想以及它所追求的政治目的。这已经是众所公认的一条原则。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历史上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其参加者的主体往往是工农群众，却没有因此而影响其阶级性质的判定。

西方史学界持“中产阶层说”者，往往过分重视纳粹运动参加者或其领导层的社会成份，把它当作立论的主要根据。西方一些史书，对此作过相当详尽的分析研究，试举一例，列表如下：①

(百分比)

阶 级	职 业	1920— 1921.8 (慕尼黑)	1923.9— 11 (啤酒 店 暴动 前)	1925 (纳 粹 党重建 后)	1929 (经济危 机前)	1930— 1932 (取得政 权前)
工人阶级	非熟练工人	20.6	11.9	12.7	18.7	15.4
	熟练手工业工人	6.0	14.3	19.5	20.0	18.1
	其他熟练工人	1.9	9.7	—	—	2.4
	以上小结	28.6	35.9	32.2	38.7	35.9
中下层阶级	手工业主	3.4	8.3	11.3	11.6	10.5
	教师	5.6	—	—	—	4.2
	下级职员	11.8	11.8	21.4	14.6	11.1
	低级官吏	9.9	6.6	11.4	5.5	4.6
	商人	19.2	14.4	11.3	11.1	11.9
	农民	1.1	11.0	3.6	12.0	12.6
	以上小结	51.0	52.1	59.0	54.8	54.9
上层阶级	经理	1.2	1.9	—	—	0.9
	高级官吏	1.7	0.4	1.7	0.7	1.2
	大学教授	6.5	2.5	4.7	2.1	2.5
	大学生	10.4	4.4	2.0	2.5	3.2
	企业主	0.5	2.7	0.4	1.2	1.4
	以上小结	20.4	11.9	8.8	6.5	9.2

尽管有些书在分类及统计数字上与此稍有不同，但都足以说明：第一，中下层阶级的群众确实是纳粹运动的主体；第二、这种情况，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始终变化不大。但却不能以此推断这

① 迈克尔·卡特，《纳粹党，其领导人和党员的社会面目(1919—1945)》所附第2、3、6等表格，英国牛津1983年版。

个运动的阶级性。问题在于：如此广泛的各阶层群众被吸引进纳粹党，是受哪些思想指引，追求什么政治目的？是否符合他们本身的阶级利益，抑或是追随了其他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主义)是一堆不同思想的大杂烩。顾名思义，它把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股根本不同的时代思潮硬糅合在一起，并且赋予它强烈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反共主义、反民主主义等等特征。但是，不管这些思想体系是如何矛盾和杂乱，它的最基本的思想，它的核心是极端民族主义。希特勒本人是这样说的，他明确宣称：“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是民族主义，而同样地，民族主义思想也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如果民族社会主义希望获胜，就必须无条件地专心信奉这个真理”。他又说：“对于我个人和一切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来说，只有一个信条，那就是：民族和祖国”。^①

在希特勒思想体系中，民族主义占有如此重要的核心地位，它既是所追求的目的，也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发动群众的主要手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成为主要战败国，被迫接受凡尔赛和约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感情激荡着每个德国人的心灵。希特勒深深感到这股巨大潜力之可资利用，要争取广泛的群众支持，必须首先高举民族主义这面旗帜。他说：“(凡尔赛和约)的每一点，都在我们民族心灵和感情中燃起了烈火，其结果是使共同的耻辱和共同的仇恨，在六千万男女的心坎中，汇成一片熊熊的火海，从这烈焰中将锻炼出钢铁般的意志，迸发出怒吼：让我们重新武装！”^②为此，他蛊惑人心地喊出“反对凡尔赛压迫”，建立“民族国家”的口号。

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分裂和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表面上似乎是反映了全民族的要求和利益，无可非议。而且，这种

^① 希特勒：《我的奋斗》，波士顿1943年版，第461、214页。

^②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632页。

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然而，希特勒所继承和发扬的却是另一种性质的民族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存在于压迫民族中的反动的极端民族主义，也就是以掠夺和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来满足本民族贪欲的民族扩张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早已存在于帝国时代的德国，成为推动它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的精神力量。它也总是建立在种族优越论的基础上。德国哲学家鲁道夫·欧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宣称过：“德意志民族是人类的灵魂”，把战争解释为“德意志内在本质的世界性考验”。^①希特勒所继承和宣扬的正是这种思想。他宣称，雅利安人种优越，有权成为“地球的主人”。“只有最高贵的种族成为主宰民族之后，以全球的力量和资源支持，才能克服人类未来所面临的问题”。^②他不同于其前人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他的民族主义披上了反对民族压迫的冠冕堂皇的外衣，更具有迷惑和欺骗性。

在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哲学中，种族主义是基础，也就是说，他的疯狂的种族论完全服务于民族主义的目的。他的残暴的、狂热的反犹行为曾使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西方的某些人试图从希特勒的个人爱憎上去寻求答案。希特勒确实说过：他早年在维也纳街头漫步时，曾遇到过一个身穿黑色长袍、两鬓留着黑色胡子的犹太人，感到厌恶。以后，“一闻到这种穿长袍的人的气味，就感到心中作呕”，从此，开始憎恨犹太人，而成为一个反犹主义者。^③这些话，即使出自希特勒本人之口，也令人难以置信。其实，希特勒的反犹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

在希特勒的辞汇中，“犹太”既是一个种族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一方面，犹太劣种论是作为雅利安优种论的对立面，是制造日耳曼民族能成为世界主宰民族的根据，民族扩张主

① 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上册，第93页。

②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384页。

③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56—57，63、64页。

义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利用早已存在于欧洲人中的反犹思想，煽动民族仇恨，不但可以动员群众，还可以为建立纯日耳曼族的“民族国家”制造根据。

对希特勒说来，更重要的是，反犹在政治上的妙用，在于它就像一根神奇的魔线，把他所宣扬的一大堆杂乱的思想体系联串在一起。根据他的逻辑：马克思是犹太人，犹太“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目的在于“建立国际犹太财阀对全世界的专制统治”。于是，在德国国内，凡属马克思主义的党派，不管是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还是共产党，统统是“犹太”。正是他们发动革命，对德国刺上了“背后一刀”，使德国不败于前线而败于这些“可诅咒的内部敌人”，他们是“十一月罪人”。又是他们，在德国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变德帝国为共和国。什么是西方的民主制呢？他说：“今天的西方民主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前驱”，议会制度是“它的最极端的形式”“只有犹太人才赞美这个制度”。因此，“现在，犹太——民主的国家，已经成为德国民族真正的祸根”。在德国国外，凡属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不管是俄国革命或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也统统“是犹太人干的”，布尔什维克是“国际犹太财阀的奸细”。由于他们“占有了俄国”，这样，“仿佛命运之神就给予我们以启示”，“假如德国今天谈论欧洲的新领土，首先想到的只能是俄国及其毗邻的附属国”，于是，“德国必须在东方进行扩张，主要靠牺牲俄国”。^①

这些表面上互不关联的呓语，希特勒用反犹这根魔线把它们串在一起。于是乎，不但反犹成为其对内政策：反共，反民主制度，反共和国政府，建立纯日耳曼族的“民族国家”的根据；也成为其对外政策：向东方夺取“生存空间”，实行民族扩张主义的理

^① 在《我的奋斗》和希特勒在《人民观察家报》上早期的言论，到处充斥这类论调。参看《我的奋斗》第78、91、319、382、453、574等页；并参阅路易斯·斯尼德《希特勒第三帝国文献史》，芝加哥，1981年版，第26—30页。

由。这样，内、外政策就找到其一致性。希特勒公然宣称：“和犹太人是沒有条件可讲的，只能是誓不两立！”“和犹太人作战，我是在代上帝行事！”^①如此切齿深仇，盖因反犹是其实现政治目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至于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部分，表面上似乎同其死硬的反共立场有矛盾，实际上这反映了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的巨大威力和影响。为了同马克思主义争夺工人群众，即使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也要借助于“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它在民族社会主义中只具策略性的辅助地位。何况，希特勒早就对其所谓“社会主义”给予随心所欲的解释，赋予它以民族主义的内容，早在1922年7月28日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解释说：“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于民族利益以上的理想，任何人只要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高于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②1927年，他又明确地解释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和一致性。他说：“最高的民族主义实质上等于最高的民族福利，最高的社会主义等于对民族、祖国最深沉的爱，因此，两者都意味着认真地履行共同的种族义务。”^③

经他这样一解释，民族社会主义三个主要构成因素：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社会主义就归结为民族主义了。这种建立在奴役其他种族基础上的反动民族主义，这种追求世界霸权，妄想成为“地球的主人”的民族扩张主义，这种猖狂的反共主义，所反映的只能是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政治要求。

①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206、65页。

② 转引自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60页。

③ 希特勒：《重新崛起之路》，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编《德国史文献与资料译丛（现代部分）》，第41页。

从纳粹党的纲领看其阶级性

德意志工人党的《二十五点纲领》公布于1920年2月24日该党正式改名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第一次群众性集会上。这时希特勒还没有取得该党的领导权力。他是《纲领》的起草人之一，但不是主要的。仔细研究一下《纲领》的条文，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它已经相当完整地体现了民族社会主义的全部思想和要求：建立大德意志的民族国家（第1条），取得“生存空间”（第3条），反犹（第4、5、6、7、8、24条），反议会民主制，建立专制极权国家（第25条）。这些纳粹的教义，不论早期或以后，都没有什么质的变化。

应该承认，《纲领》虽然是匆匆草就，但在起草过程中对其内容的理解和意图是有分歧的。一般说来，对纲领的民族主义内容意见比较一致，对反犹条款有分歧，^①对社会改革要求的内容则有点各取所需，各有各的解释和意图。暂且不管德雷克斯勒和弗德尔的原意如何，至少希特勒是把它作为争夺工人群众支持的一种策略手段，他“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它，并按自己的理解加以利用。

希特勒自己说得很清楚，他在《我的奋斗》第1卷第12章，题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发展的初期阶段》的章节中，详细地论述了纳粹运动的政治目标及其所应采取的各种策略。他说：“在1919年，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新运动〔纳粹运动〕的最高目标，首先必须是实现人民群众的民族主义化”。接着，他列举了十四项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必须采取的策略要求，其中第1、6点着重谈到争取工人阶级支持的问题。认为“新运动〔纳粹运动〕的力量源泉首先必须从我们的工人群众中取得支持”。为此，强调

^① 德意志工人党第一任主席哈勒于1920年辞职，其中原因之一是反对希特勒在宣传上信口开河，不顾事实；另一原因是反对反犹，尤其是《纲领》的第4条。参阅《我的奋斗》，第365页原注。

纳粹党应做好工人的工作；思想上“使他们脱离国际主义〔按：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经济上“使他们从社会贫困上解放出来”；文化上得到提高，最后使他们“具有民族感情和要求，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团结的因素进入民族大家庭之中”。并且着重指出：“为民族的复兴而赢得群众，任何社会牺牲都不为太过”。要反对某些雇主“眼光短浅”的偏见，他们“没有认识到，从长远来说，没有经济的起飞，也就没有经济的利益，而这全赖于民族内部的团结和民族的复兴……因此，一个运动，如果希望使德国工人支持德国民族，就必须清楚认识到，经济作出牺牲是不关重要的”。^①

从以上引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希特勒之所以接受《纲领》的“社会主义”内容而毫无异议，并不出于他对工人阶级的偏爱，或代表了他们的要求和利益，而只是为了达到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他认识到：第一，工人阶级在德国社会中的地位。德国的工人阶级占全国人口总数一半以上(53.6%)，如果加上小资产阶级，那就约占90%了。没有他们的支持，还谈得上群众运动吗？还能实现其政治目标吗？无怪希特勒将之视为“力量的源泉”，从策略高度去认识这个问题。

第二，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阶级中的影响。社会主义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资产阶级的魏玛共和国以及公开打出反共和国旗号的纳粹党都要挂出“社会主义”的招牌。不如此，就不能吸引工人群众，取得他们的拥护。这完全是同马克思主义争夺工人群众的需要。

第三，希特勒所宣扬的未来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中，“不知道有‘阶级’”，“只有权利和义务绝对平等的公民”^②这就需要，至少在宣传上如此，既反对雇主“以非人道的剥削的手段去虐待劳工”；又反对工人对雇主的“过分要求”，因为它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及

^①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336—353页。

^②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600、357页。

“未来的冲突”，损害民族的利益。

由此可见，《纲领》的社会改革要求，不但不背离纳粹主义的教义，而且是符合希特勒的意图和要求。他还曾解释过，他之所以看中德意志工人党这个名称，而且在改称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时仍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就是为了在同马克思主义争夺工人群众中，这个名称对他们会有“号召作用”。^①《纲领》的“社会主义”内容的作用，当然也就类同于此。

《纲领》的两部分主要内容：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不是两者皆“突出”，更不能从条文多寡去衡量其重要性。民族主义是战略目标，是纳粹运动所追求的政治目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是以实现民族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为其活动目标”^②而“社会主义”则是为达到这个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手段，在《纲领》中只处于辅助的地位。显然，决定《纲领》性质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更何况，《纲领》公布不久，希特勒就完全掌握了纳粹党和运动的领导权，在实施上，《纲领》是按照他的意图而不是按照其他人的意图去做。

从纳粹运动本身看其性质

思潮和运动的关系是所要研讨的另一个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思潮和运动应分开看。意思是说，纳粹主义的思潮可以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可是，纳粹运动，作为一种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运动，可以是另一种性质的，因为各阶层的参加者都怀着自己本阶级的要求和愿望。鉴于纳粹运动参加者的主体是中间阶层（或小资产阶级），所以，按性质说，是“中间阶层运动”。这种意见，

^①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600、357页。

^②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598页。

笔者不敢苟同。

纳粹运动能够由小到大，由一个思想混杂的民族主义者的小团体发展到有相当广泛群众参加的运动，除了有赖于希特勒的领导才能和蛊惑性宣传等主观因素之外，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俄国十月革命巨大影响而引发的德国革命和危机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以及德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和军国主义传统，是纳粹主义和纳粹运动滋生发展的温床。

一战后的德国是一片混乱。一方面，因战败而背负凡尔赛和约的重压所引起的耻辱和怨怒，由此而产生的沸腾的民族感情；以及在相当一部分人心中的对昔日帝国光荣日子的怀恋，对现政权的不满；受某些战胜国支持和鼓励而猖狂一时的民族分离主义；赔款的重负和社会贫困所加深的失业和社会危机；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余波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和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对共和的敌视和复辟势力的猖獗等交织在一起。使一战后的德国成为各种左、右派政治势力角逐之所，就像一只沸腾的火锅，各种社会势力都乘机泛起。民族主义者，保皇的复辟主义者，民族分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各种反共和主义者，他们都拥有自己的组织和武装。从前线回来的复员军人为骨干的各地“自由团”，成为右翼团体反对政府和对抗无产阶级武装的武装力量。希特勒的纳粹党正是这种政治团体中的一个。但是，希特勒善于利用这种危机所造成的混乱时势，把遍布于各阶层群众中的不安定和不满的情绪收集起来，加以利用，把乱世视为是他发展政治势力，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良机。

民族主义的团体和政党，当然不只纳粹党一个，甚至民族社会主义的党派也不是始于希特勒。^①但是，是希特勒把民族社会

^① 1918年奥地利已有日耳曼民族工人党的组织，而且民族社会主义者建立过“国际局”。参阅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50页。

主义发展为有理论、有特点的完整的思想体系。纳粹之成为政党，形成群众运动，可以说也都始自希特勒。他自己说过，他在1919年秋参加德意志工人党的时候，这个小小的政治团体还不能称之为“政党”，通常只有六、七个人在一起讨论问题，几乎不为人所知，当然也谈不上“运动”。是在他战胜了原任主席哈勒等人的把组织局限在小圈子内的关门主义思想之后，坚持定期开会，面向群众，扩大影响，才使参加集会的听众从十数人到二十几人、三十几人、一百多人。第一次称得上有点规模的群众性集会是在1920年2月24日，到会听众约达二千人，在这次会上正式改称纳粹党并公布了《二十五点纲领》。^①这可以说是纳粹成为政党的开始，但是离群众运动的要求尚远。参加1920年第一次群众集会的听众虽达二千，并非都是支持者。据希特勒在1932年一次讲话中所说：他在参加德意志工人党一年之后，几经努力，才“为运动争取到六十四名成员”。^②因此，纳粹运动的形成是希特勒在纳粹党掌权以后。1922年开头时，正式登记的党员已有六千人。^③

纳粹运动的形成与希特勒的个人因素是分不开的。第一，他给运动确定了奋斗目标是建立“民族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第二，他提出，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他说：“一个政治改革运动的目标，绝不可能靠启发劝导或感化统治当局的方法去达到，唯一的途径是夺取政权”。第三，他主张，必须发起群众运动。“假如夺取政权是实现改革目标的前提条件，那么，以改革为目的的运动就必须从其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是一种群众运动，而绝非文人的茶话俱乐部或商人的宴酬社会”。第四，他强调，要取得各阶层群众的广泛支持，而首先要着眼于占全国人口半数以上的工人群众，因为这

①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353—370页。

② 希特勒1932年1月27日在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的演讲。见贝恩斯编，《阿道夫·希特勒演讲集》第1卷，第824页。转引自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62页。

③ I. C. 费斯特，《希特勒》，纽约1975年版，第153页。

是“新运动的力量源泉”。^①

为此，他，第一，抓组织。1921年7月，改组了纳粹党和党的领导机关，通过“领袖原则”使他自己成为拥有独裁权力的党的主席。这样就完全控制党和运动。第二，抓武装。在希特勒取得党的绝对权力之后，立即就着手于1921年8月成立“冲锋队(S·A)，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它的任务是用恐怖手段对付左派群众和政治敌手，为纳粹党争夺街头阵地。此外，对争取国防军的支持和合作，希特勒也做了不少工作。第三，抓宣传，抓群众。希特勒本人是宣传煽动家。他指出：“宣传的作用就在于吸引支持者，而组织的作用则在于吸收党员”，“宣传就是力图使全体民族接受一种主义”，“宣传的第一任务在于为组织而赢得群众，而组织的第一任务就是任用人才以促进宣传；宣传的第二个任务就是用新主义去打破当前国家的现状，而组织的第二个任务就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希望达到主义的最后胜利”。^②

应该说，纳粹运动之由小到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希特勒的宣传煽动是起了作用的。在早期的一些集会中，他常常既是组织者，又是主要演讲人。从1919年11月至1920年11月，纳粹党召开的四十六次集会中，希特勒出席并作为主要演讲人的就有三十一一次。^③他善于利用时势，抓住人们的心灵，以最有力的宣传武器民族主义感情去煽动群众，反对“凡尔赛压迫”。这个内容看来是最为重要的，并且几乎在每次公开讲话中都被提到。”^④

希特勒宣传始终是将矛头对准共和国的现政权，为夺权作舆论准备。煽动了群众的民族主义感情以后，他就会把“造成德国

①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340，343页。

②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581—583页。

③ 马丁·伯罗斯札特：《希特勒的国家，第三帝国内部结构的建立和发展》，纽约，1982年版，第25页。

④ P. A. 施泰尼格尔编：《纽伦堡审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3页，《判决书》。

民族灾难的祸根”归诸“犹太——民主的国家”，切齿痛骂“十一月罪人”。

希特勒宣传中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反犹。这是煽动种族主义狂热，为建立纯日耳曼族的民族国家准备条件，同时，反犹也作为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攻击现政权的手段。

最后，用空头的许愿去争夺工人阶级和其他下层阶级的群众。这在使他们“脱离国际主义的欺骗”是不可少的。

社会的动荡和危机，使希特勒的宣传更具效果。各阶层群众之投奔纳粹党，当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图和动机，有些人是出诸爱国心理，把德意志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希特勒，把他当作民族的“救星”；一些人由于失业和贫困，认为只有社会变革才会给他们以出路；一些人出于对革命的恐惧，认为只有纳粹才能制止共产主义的危险；过惯行伍生活的复员兵在纳粹的队伍中找到安身之所；追求刺激和幻想的青年学生在纳粹主义的狂热中得到满足……但是，不管他们动机如何不同，阶级出身如何差异，文化修养如何悬殊，一旦成为纳粹党员，参加了纳粹运动，就只能在一个思想——希特勒思想(或纳粹主义)的指导下，按一个方向运转起来，为追求同一政治目标而奋斗。纳粹党的入党誓词是“我宣誓永远忠于阿道夫·希特勒，绝对服从他和领导们对我的调遣安排”。^①

对于这样高度集权、组织严密的政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其性质难道不是从这个领导的政党及其指导思想去寻求，而能从参加者的社会成份去得到答案吗？按照一个思想(或主义)去运动群众，思潮又如何和运动能“分开”。

从纳粹运动的发展本身来说，它始终坚持它的既定目标——建立民族国家，夺取政权。为此而动员群众，组织力量。1923年的“鲁尔危机”中，纳粹党内也有人主张参加政府所领导的各党派

^①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1卷，美国政府出版局，华盛顿1946年版，第122—123页。

“反法联合阵线”。希特勒对他们提出严重警告，说如果不听劝告，就把他们开除出党。他始终坚持说：“不是打倒法国，而是打倒卖国贼，打倒十一月罪人，这就是我们的口号！”^①为了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整个1923年，他都在努力扩大组织，寻求盟友和支持。从1923年2月至11月，一共吸收了三万五千名新党员，冲锋队也发展到一万五千人。^②终于在1923年11月8日晚间发动了早熟的“啤酒馆暴动”。这是早期纳粹运动发展的现实和经过，除了坚持民族主义，坚持反政府反犹和反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反资本主义”的实际措施和表现，其资产阶级右翼的性质仍然是明显的，只不过是掩盖于“民族主义”的烟雾之中。

纳粹主义以它的狂热和偏激吸引了很多热情无知的青年，使他们服务于希特勒的政治目的。从参加者年龄来说，纳粹运动算得上是一个“青年运动”。1923年党员平均年龄二十八岁，几乎50%的党员年龄在二十三岁以下。1930年—1933年间全部新参加党的七十三万名党员中，十八至三十岁的占43%以上，三十至四十岁之间的占27%^③。后来，巴伐利亚邦社会民主党议员威廉·赫格纳回忆在30年代初的一次冲锋队和钢盔团上街示威的情景，他说：“青年，全是一些年轻无知的青年。一张朝气蓬勃的孩儿脸，来去匆匆，神情激动……”。^④难道能够从这些受人支配的无知的青年人身上去分析运动的性质，而不是从支配他们的指导思想及其所追求的政治目的去寻求答案？我想是一件清楚不过的事。

纳粹党重建后只是加强，而不是改变它的性质“啤酒馆暴动”的失败标志着纳粹运动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表面上是早期纳粹党和运动遭受挫折，实际上成为它的新的起点。

① J. C. 费斯特：《希特勒》，第164页。

② 同上书，第162页。

③ 伯罗斯札特：《希特勒的国家，第三帝国内部结构的建立和发展》，第30页。

④ 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第5—6页。

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琅琅入狱，希特勒本人被判了五年徒刑(实际上只服刑九个月)。一俟他出狱，立即就于1925年2月在组织上重建纳粹党。2月26日，他为《人民观察家报》复刊而作的社论，题目就叫做《新的开端》。

这的确也是纳粹运动的新起点。

首先是加强了纳粹党的组织建设，严格按照“领袖原则”，完善党的组织机构，清除一些不服从希特勒绝对领导的党员，尤其是在1926年2月，解决了党内不同思想派别的施特拉瑟派，巩固了希特勒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改组冲锋队(S. A)，建立党卫队(S. S)，并建立“党内法庭”，以维护其统治和权威，实施对整个党组织的严密控制，这样，重建起来的纳粹党就更符合希特勒的要求和模式，更能成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工具。

其次，在实际上以《我的奋斗》取代党的《二十五点纲领》，成为纳粹党和运动的指导思想。虽然希特勒宣称过《二十五点纲领》是“不可变更的”，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尤其是越来越需要得到大资产阶级的理解和支持，早年为争取中、下层群众支持而列入党纲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内容已逐渐被抛弃，不再提起。到1927年，原先“要求将托拉斯国有化”的主张已变为公开承认私有财产权，说：“纳粹主义原则上承认财产权并将其置于国家保护之下”。1928年，在一篇声明中解释了“要求无偿没收土地”的含义，说成“主要是针对犹太地产投机公司的”。事实上，《二十五点纲领》中“不可变更”的部分，只限于那些和《我的奋斗》这位纳粹圣经相一致的内容。

再次是，重新调整斗争的策略方针。因为自啤酒馆暴动失败以后，整个德国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上，发行了新马克，稳定了货币，制止了通货膨胀，并且接受了道威斯计划，在外国贷款的滋润下，经济开始复兴；在政治上，镇压了左、右派的武装暴动，稳固了统治，法军开始撤出鲁尔，以后，又通过洛加

诺公约，在英国支持下恢复国联理事国的大国地位，而且和法国暂时取得和解。所有这一切的稳定，对纳粹运动的发展是不利的。希特勒需要利用的是人民愤慨的民族感情和对现政权的不满。在这转折关头，希特勒及时改变了斗争的策略方针。因为在政治和社会渐趋稳定的条件下，再继续坚持暴动夺权的方针不但不可能，而且会失去群众的支持。

尽管从组织到策略上有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但是没有改变而只是加强了纳粹党和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

第一，即使在纳粹党重建前后党内存在不同的思想体系和派别的斗争，尤其是1925—1926年，以施特拉瑟兄弟和戈培尔为首的一派，曾经控制了北德的党组织，在组织上企图和希特勒的党中央分庭抗礼，不承认希特勒的绝对权威，并且强行通过自己的新党纲去代替原有的《二十五点纲领》。暂且不去讨论这一派的思想倾向如何，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不同派别从来也没有在纳粹党内占过统治地位，从来也没有动摇过希特勒对纳粹党的绝对领导，而且它们的存在为时短暂，并不能影响、更不能决定纳粹党和纳粹运动的性质，这在早期和以后都如此。因此，并不存在纳粹党的性质改变问题。

第二，对于希特勒来说，任何纲领都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根本目的不变，而策略手段则是可变的。对于《二十五点纲领》也是如此。《纲领》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条文，在早期和马克思主义争夺工人群众，使纳粹运动能形成一个群众运动是起了作用的，不可或缺的。而这些条文和内容，只是一些美丽的辞藻，一些空头的承诺，它的兑现都得留待取得政权之后。这是一个“望梅止渴”的远景，并不需要付出什么实际报酬和代价，也从来不准备兑现（政权一取得，就撕下面纱，对工农专政了）。在整个斗争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党以合法手段代替武装夺取政权的策略，就比过去更需要得到资产阶级的理解，得到他们在政治上和财力上

的支持。与此相适应的是，在《纲领》上悄悄地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容，作出不刺激资产阶级的“新解释”。但是，也不能公开抛弃，因为还必须借助于中、下层阶级广泛的群众力量。与此同时，更加突出迎合资产阶级要求的内容：反犹，反共，“消灭马克思主义”，发展民族经济，夺取“生存空间”等。1927年8月，希特勒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基尔道夫的一席谈话，是这个阶段纳粹党新策略运用的一个典型。他说：“当今世界经济战的最后胜负并不取决于各竞争商能力的大小”，个人的努力不能解决经济所面临的难题，只有靠“剑的威力”；德意志民族重新崛起之路在于“普遍认识到民族存在的必要性和由此产生的团结一致”，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于取得“生存空间”。“只有强大的民族主义国家才能保护民族经济并赋予它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而且，要消灭马克思主义这种“精神瘟疫”，否则，一个民族“也就谈不上重新崛起”。^①

1926—1928年，希特勒为取得大资产阶级的理解和支持而四处奔走游说，取得显著效果。纳粹党和纳粹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也就更加明显。

按照上面的分析，从总体上重新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纳粹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在世界历史进程上产生巨大影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于封建的和军国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中的一种资产阶级右翼思潮。它把反动的民族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起来，以反犹、反共、反对民主制度、建立专制独裁的政体，鼓吹民族扩张主义为其主要特征。但是由于时代的印记，它不得不以“社会主义”作为其争取群众支持的策略手段，名之为“民族社会主义”，实是以“社会主义”掩盖其反动民族主义的本质。它的狂妄的以奴役其他种族为基础的“种族优越论”，以及

^① 希特勒：《重新崛起之路》。

与此相联系的民族扩张主义，妄图有朝一日成为“地球的主人”的野心，它的猖狂的反马克思主义，说明它始终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及其阶级本质。

纳粹党和纳粹运动是以纳粹主义为其指导思想，为实现这个主义所提出的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和群众运动，它们之间的性质当然是一致的，不可能“分开”。

是希特勒本人完善了纳粹主义的思想体系，并按照这个要求改组了纳粹党，取得对该党和运动的绝对领导权力，由小到大，逐步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和群众运动。换句话说，纳粹党和纳粹运动始终是在希特勒的控制下发展的，即使在早期也如此。

尽管在民族感情或其他各种对现实不满的因素驱使下，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甚至工人投奔到纳粹的旗帜下，但是不管参加者的出身成份如何，也不管他们个人的主观意图和动机，在希特勒的纳粹党这样一个极权主义政党的组织和控制下，所谓“群众运动”就只能是围绕一个主义，朝着一个方向、追求着共同的政治目标——反动民族主义的目标而运转，而绝不能代表了他们各自的阶级利益和愿望。因而，也就不会影响到纳粹党和运动的根本性质。

尽管纳粹党内曾经短暂地存在某些不同的思想体系和派别，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占过统治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希特勒的绝对领导，因而也就不足以影响整个党和运动的阶级性质。也不管早期和后期，纳粹党在组织和策略方针上有重大变化。可是其政治目标、政治纲领、依靠力量基础不变，其阶级性质也就不可能有根本的变化。

然而，由于纳粹的阶级本质始终掩盖在“民族利益”和“社会主义”的面纱之中，如果说前后有些区别的话，那就是，随着形势变化的需要，随着希特勒在党内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对运动控制的加强，其阶级性有个由比较隐晦到逐步明朗的过程。

战后各国的新法西斯主义

1945年，世界人民同仇敌忾，先后摧毁了德、日法西斯政权的统治，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然而，时至今日，法西斯主义并未从世界上彻底根除。战后，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新法西斯主义。据不完全统计，在联邦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奥地利和荷兰等60多个国家，^①存在着新法西斯主义及其组织的活动。在意大利，1987年全国国会选举中，新法西斯组织获7%的选票。在法国，1988年总统选举中，以勒庞为首的民族阵线获15%的选票。^②在联邦德国，1989年1月各邦议会选举中，新法西斯党——共和党同德意志民族民主党一起进入西柏林和法兰克福(莱因河畔)议会，并开始向联邦议会和欧洲议会进军。与此同时，在欧洲议会中，已有法国民族阵线、希腊民族政治同盟和意大利社会运动/民族右翼等欧洲极右翼党团和新法西斯党派的17名代表。^③当前，在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了新法西斯主义重趋活跃和重登政治舞台的危险，引起了人们的不安和忧虑。

① 曼弗莱德·魏斯伯克：《当前的法西斯主义》，见D·艾希霍尔茨和K·戈斯魏勒主编：《法西斯主义研究》，柏林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27页。

② 莱因哈德·库恩尔：《法西斯主义。原因、统治结构、现实性》，联邦德国迪斯特尔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③ 《右翼出版商格哈德·弗莱的政策和经营》，见联邦德国杂志《明镜》，1989年第22期，第43页。

新法西斯主义及其活动

战后，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极右翼组织与新法西斯主义党团，其形式广泛多样。

在西方国家，往往把极右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等同视之，二者没有明确界限。如果严格区分，可以看出，新法西斯主义具有极右主义的一切特征，一切新法西斯主义都是极右主义；但是，并非一切极右主义都是新法西斯主义，后者是前者恶性膨胀的表现。一般来说，极右组织只是有计划、持续性地反对国家现存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宣传，强调现存民主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旨在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中动摇民主制的价值。同时，极右组织极力为法西斯主义体制及其罪行进行辩护。如果敌视民主制，主张使用暴力恐怖手段反对民主制，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基础上追逐领袖专制，那么，这就是一种新法西斯主义。事实上，极右主义为新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和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新法西斯主义组织又为极右主义势力所奉行的保守的——权威主义政策服务。

战后出现的新法西斯主义主要表现为三个特点：

(1) 由于国际和国内政治气候对新法西斯主义并不十分有利，因此，各类新法西斯组织和政党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组织规模很小，尚未在任何国家上台执政。

(2)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当局对新法西斯主义组织及其活动进行监视，并惩治和禁止进行恐怖破坏活动的新法西斯组织，各类新法西斯组织经常处于分散、集聚或调整的过程。战后初期，一般处于潜伏或秘密活动状态。近些年来，新法西斯主义有所抬头，特别是主张通过议会合法夺权的新法西斯党派呈现出发展的趋

势。

(3) 除去少数骨干分子为老法西斯分子之外，新法西斯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是1945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据调查，30岁以下者占68%，31—50岁之间占23%，50岁以上者只占9%。^①

现将西欧几个国家新法西斯主义组织的状况分述如下。

联邦德国

1981年联邦德国一家研究所通过广泛调查后发现，全国有150多个极右或新法西斯组织和集团。^②所有这些组织像蜘蛛网一样联结在一起。其中15个规模较大，极为活跃。归纳起来，新法西斯组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开或隐蔽地从事暴力活动，一类是采取合法策略参加竞选。

第一类组织，其中包括1968年成立的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者同盟(BDNS)，1972年4月成立的大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战斗集团(NSKG)，1973年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DVG)，1974年建立的霍夫曼国防体育集团等组织。这类组织中的一些新法西斯分子，经常袭击银行，炸毁火车，焚烧、破坏犹太教堂和公墓，进行各种恐怖和凶杀活动。自70年代以来，其破坏活动呈上升趋势。1979年违法越轨破坏事件约1500起，1980年达1600多起，1981年达1800多起，1982年超过2000起。^③仅1980年9月慕尼黑十月节一次爆炸事件中，就有13人死亡，211人受伤。^④鉴于当局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出发，对破坏宪法的暴力活动进行法律制裁，因此，这类组织呈现出时隐时现的特点。

在第二类组织中，出现了三个参加竞选的党派，引起公众的

①、② 诺贝尔特·马德洛赫：《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新纳粹主义》，见民主德国《统一》杂志，1989年第5期第462、460页。

③ 沃尔夫冈·本茨主编：《联邦德国的极右主义》，联邦德国费舍尔手册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④ 君特·伯恩德·根策尔：《希特勒的重孙们——新纳粹分子，他们的思想与活动》，杜塞尔多夫德洛斯特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关注：

德意志民族民主党(NPO)，1964年由老纳粹分子成立。弗力茨·梯楞任首届主席，阿道夫·冯·塔登任副主席。该党并不讳言其新法西斯主义性质，声称现有10000多名党员。该党在60年代一度进入6个州议会。自80年代初期以来，它极力披上一层民主外衣。1987年之后，它同德意志人民联盟在大选中结为同盟，采取协调行动，选票有所上升。

德意志人民联盟(DVU)，1971年由新法西斯《德意志民族报》出版人格哈德·弗莱建立。它是各种新法西斯组织和极右组织汇合的党，约有20000多名党员。1983年3月，弗莱把德意志人民联盟变成一个参加竞选的党。同年首次在民族民主党支持下，参加了不莱梅市议会选举。弗莱1933年出生于一个极右翼巴伐利亚家庭。几十年来，他通过出版新法西斯报纸、杂志和书刊，成了联邦德国新闻界的褐色沙皇，亿万富翁。

共和党(Republikaner)，1983年从基督教社会联盟右翼保守集团分裂出来的极右势力。由埃卡哈德·弗伊克特、弗兰茨·汉德罗斯和弗兰茨·舍恩胡贝尔创立，自称是联邦德国第7大党。1985年，在舍恩胡贝尔领导下，实施了把共和党改造为新法西斯党的方案，成为“一个敌视宪法的党。”^①该党特别着眼于年轻人，目前约有14000多名党员。其中50%以上是警察、国防军官兵、边防军军人和国家机关官员。多数党员在30岁以下。^②舍恩胡贝尔生于1923年，巴伐利亚广播电台记者，从前曾是希特勒党卫队贴身警卫队队员，其“理想始终是建立一个党卫队国家。”^③他领导该党积极参加欧洲共同体议会选举，致力于建立保守派和新法西

① 《明镜杂志记者同党主席弗兰茨·舍恩胡贝尔谈关于共和党人党的前途问题》，见《明镜杂志》1989年第6期，第28页。

② 《舍恩胡贝尔的新民族主义》，见《明镜》杂志1989年第22期，第29页。

③ 马德洛赫：《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新纳粹主义》，第462页。

斯主义结盟的黑——褐色联盟。

自80年代中期以来，联邦德国参加竞选的新法西斯政党的势力出现了扩大的趋势。1986年10月，在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中，约340000选民将选票投向首次参加竞选的共和党。几个月后，即1987年1月，民族民主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227000张选票。与1983年相比，所获选票增加1倍多。1988年州选举中，巴登——符滕堡5%的选民脱离基督教民主联盟转向新法西斯党。^①

新法西斯组织和集团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宣传，显示它们的存在，扩大其影响。

新法西斯分子经常聚集一地，偷放、复制纳粹党和第三帝国时期的影片，对于有关纽伦堡党代会、冲锋队列队进行、希特勒演讲和战争场面的影片百看不厌。他们自拍电影，相互传看，灌制唱片，制作录像，宣传暴力，美化战争。

新法西斯组织还定期出版《德意志之声》、《民族欧洲》、《战友》、《勇气》、《褐色营》、《民族观察家报》、《纳粹战斗呼唤》等130多种报刊和杂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联邦德国庞大的新闻媒介之一。其中格哈德·弗莱经营的《德意志民族报》、《德意志周报》和《德意志指南报》，每周发行量达170000份。^②此外，每月还印刷小报、文献、书籍和小册子，发行量达50—60万份。在联邦德国各地，凡是建立新法西斯据点的地方都有地下出版物，大部分免费和不署名投递。据调查，约有 $\frac{1}{4}$ 的人在阅读这些报刊。^③

意大利

在意大利，意大利社会运动(MSI)是最大的新法西斯主义组织，与250个极右恐怖集团保持联系。该组织是在1946年12月萨

① 马德洛赫：《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新纳粹主义》，第460页。

② 《舍恩胡贝尔的新民族主义》，第30页。

③ 根策尔：《希特勒的重孙们——新纳粹分子，他们的思想与活动》，第24页。

洛共和国前国务秘书乔治·阿尔米兰特创建的法西斯总汇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在南意大利地区设立据点。最初，它的多数成员是墨索里尼的追随者。它极力美化法西斯制度，表现出明显的法西斯主义特征。为了避免取缔，它转而从事议会活动。1972年在国会选举中获8.9%的选票，56个议席。但在1976年选举中，其选票比例下降到6.1%，剩下35个议席，^①因此导致了该组织的分裂，出现一个地下法西斯恐怖组织“新秩序”。它实行“紧张战略”，大肆进行暗杀、爆炸和恐怖活动，制造不安定的气氛。1977年初，7名新法西斯分子因在米兰冯塔纳广场制造爆炸事件，受到法庭审判。新法西斯主义的目标是夺取政权。阿尔米兰特声称，意大利的“民族右派”准备“取代这个国家”。其夺权步骤首先是争取组成一个右翼大联合政府，以最大可能性争取多数选票，以便与天主教民主党人共同执政。它还同制造国家暴乱和在国家机构中的某些反动势力秘密勾结。此外，在意大利还有秘密反共武装力量、墨索里尼战斗协会、民族先锋队、民族解放阵线、民族社会主义同盟、意大利复仇者协会等新法西斯组织。

法国

1953年布热德建立了手工业者与商人保卫同盟。该组织除了提出符合中等阶层利益的要求之外，也提出了民族主义、反议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要求。布热德主义的核心具有一种恐怖的特征，明显地表现在其下层组织秘密军人组织(OAS)进行恐怖活动方面。1968年5月以来，在《费加罗报》报商罗伯特·埃尔桑的资助下，该组织又以“学术研究团体”新法西斯集团名义出现，经常举办各种讲座和培训班，试图以一种新的“哗众取宠的科学”方式，对法西斯主义的种族思想进行阐述。此外，法国还

^① 沃尔夫冈·韦伯曼，《1922—1982年欧洲法西斯主义比较研究》，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苏尔卡姆普出版社1983年版，第196页。

有法兰西行动，法国民族社会主义党等新法西斯组织。

英国

由莫利斯代表的宣扬战争和种族主义的新法西斯主义观点得到传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新法西斯主义小派别。1967年，它们联合组成民族阵线，集中宣传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该组织明确要求制止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黑人等有色人种迁入英国，强调必须维护白种人的英国文化。在1969年国会选举中，民族阵线获19万张选票，占0.6%。在几个工业地区，尤其是在伦敦东部，其选票比例达到20%。自1979年以来，民族阵线重新分化，出现了不同的小派别。最近几年，民族阵线以最大、最活跃的新法西斯组织的面貌出现，在地方选举中获19%的选票。^①此外，还有英国运动、大英国民族党、英国军事志愿者协会、英国好斗集团“克鲁姆88号”、青年民族联盟等新法西斯组织。

除了上述国家，在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也存在着新法西斯主义组织。其中有：日本的保卫国家青年部队、蓝色冲锋队、夏季冲锋队协会同盟、大日本爱国党和太阳旗社等；美国的反共产主义阵线、民族社会主义党、德籍美国人乔治·P·迪茨领导的国际自由运动等；阿根廷的反共产主义联盟和民族社会主义阵线；比利时的佛兰德人民党；巴西的反共产主义联盟、骑兵敢死中队和维持传统、家庭和财产协会；智利的自由党；芬兰的爱国人民阵线；希腊的民族政治同盟、民族人民党、新秩序等；哥伦比亚的祖国与秩序党；黎巴嫩的雪松护卫者同盟和精锐骑兵队党；挪威的诺尔斯阵线；奥地利的新权利运动、欧洲自由集团、人民觉悟工人党和人民社会主义运动；葡萄牙的蓝色解放阵线、解放民主运动和保卫西方文明行动司令部；南非的地狱天使协会；瑞典的民族协会；瑞士的民族运动，等等。

^① 韦伯曼，《1922—1982年欧洲法西斯主义比较研究》，第196页。

新法西斯主义组织还进行了某些国际性的活动。1951年，瑞士的法西斯分子、前党卫队队员圭伊·卡斯登·阿曼德鲁茨创建了国际新法西斯组织——欧洲新秩序，企图协调各国新法西斯组织的活动。总部设在瑞士洛桑，他本人担任总书记。该组织在意大利影响较大，依靠设立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等国的秘密支部组织活动。它曾多次举行新法西斯组织国际集会。1972年9月在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由联邦德国新法西斯杂志《勇气》和《民族欧洲》出面组织，9月16日—17日在慕尼黑举行了国际新法西斯组织集会。来自世界各国新法西斯组织的600—1000多名代表参加。仅意大利就有40多个组织派出了代表。这是战后新法西斯组织最大的国际性集会。

新法西斯黑色国际于50年代成立。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是英国的老法西斯分子科林·约尔丹。此人在1945年之前已略有名气。1962年，他创建了民族社会主义者世界同盟(WUNS)，在法国、比利时、联邦德国、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智利等国设有基地。1976年7月，黑色国际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了一次法西斯组织国际集会，有来自15个国家的法西斯组织的代表参加。这清楚地表明，黑色国际致力于使世界各国的新法西斯组织在政治和物质方面相互支持，加强联系，协调彼此之间的活动，在欧洲范围内重新掀起一股右翼恐怖浪潮。

新法西斯主义组织的政治主张

战后各国出现的新法西斯主义组织，承袭了老法西斯主义反动思想实质，并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表现出新的适应性。尽管各国新法西斯组织，因各国政治、历史和社会条件不同，各自侧重面不同，在斗争策略和人事关系方面存在分歧，但是，它们都基本具有新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观点——反共产主义、反民主主义、种

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宣传领袖原则和建立法西斯独裁恐怖统治。这在联邦德国的新法西斯主义组织中表现得相当典型。

第一，美化希特勒，要求建立“第四帝国”。

新法西斯分子对希特勒的崇拜达到了宗教狂热的程度。他们鼓吹“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榜样和神话，将在千年之内鼓励我们的人民”。“希特勒的精神不朽，超越了一切时间和空间界限……希特勒代表未来”。因此，新法西斯分子对现社会进行激烈的抨击，寄希望于出现一种奇迹，有一个希特勒式的领袖重新诞生。^①

关于新法西斯主义追逐的政治目标，1974年纳粹党国外支部(Die NSDAP—AO)在其纲领中写道：“一种历史的延续性，一种不能摆脱的迫切任务，要求我们自豪地继承第三帝国领袖的事业”。^②黑森——纳骚地区的纳粹党宣传：“我们的斗争是建立第四帝国！”……“我们拒绝以民主方式对之掩饰！让我们共同进入第四帝国吧！”^③他们做的“第四帝国”的白日梦，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他们梦想“出现一个新的希特勒，一种新的纳粹党政权，将一切德意志人联合起来”，“不仅要重建1939年疆界的大德意志帝国，而且要求重建1914年疆界的德意志帝国”，将从前一切德意志地区，包括当时德国海外殖民地，以及奥地利、瑞士和荷兰等国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联合成为一个新的大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和世界实现“德意志霸权。”^④

第二，宣扬反动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这同样是新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在当今的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突出地表现为排外主义。

① 根策尔：《希特勒的重孙们——新纳粹分子：他们的思想与活动》，第95页。

②④ 根策尔：《希特勒的重孙们——新纳粹分子：他们的思想与活动》，第64、50页。

③ 见1976年《法西斯阵线》和《褐色营杂志》，定期在法兰克福散发。

1945年后，德国处于分裂状态。新法西斯分子利用人们心目中普遍存在的民族统一和振兴情绪，广泛进行民族复仇主义宣传。1974年，纳粹党国外支部在其纲领中写道：“在我们面前站着德国人民，它的自决权被剥夺了，受到国际民族害虫的奴役与压迫，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正在准备内耗。在我们的种族和我们的文化领域中，一种由国际民族敌人掌握的退化过程正在加速德意志民族的没落。”^①他们叫嚣：“我们要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要求重现自我理解的民族意识”。他们对战后欧洲的格局极为不满，要求粉碎欧洲边界，“寻找一种新的政治祖国”，在欧洲，建立德意志霸权”。^②

新法西斯分子继承了希特勒法西斯的种族理论。他们的全部种族思想，针对一切非白种人和被他们列为“非雅利安人”等级的人。首先，新法西斯分子重弹反犹老调，强调“犹太人是敌人”，叫嚣“毒死犹太人”，“让犹太人见鬼去吧！”^③寄给犹太人的恐吓信像潮水般地涌向犹太人机构和公民家庭。几乎每周都有一处犹太人公墓遭到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生活的犹太人只剩下3万人。^④新法西斯分子由此从反犹转向“反对外国人”，反对在德国从事最繁重、肮脏体力劳动的外籍工人——土耳其人、南斯拉夫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和叙利亚人。他们提出，“反对外国人与德国人融合”，“维持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保持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要求遣返“外国人”！^⑤许多新法

① 根策尔：《希特勒的重孙们——新纳粹分子：他们的思想与活动》，第47—50页。

② 《右翼出版商格哈德·弗莱的政策和经营》，见联邦德国《明镜》1989年第22期，第37页。

③ 根策尔：《希特勒的重孙们——新纳粹分子：他们的思想与活动》，第5、8、79页。

④ 乌尔如拉·奥曼：《德国的犹太人——如同疑云中的嘲弄》，见《新社会杂志》，1989年第8期。

⑤ 本茨主编：《联邦德国的极右主义》，第288页。

西斯分子经常袭击外国人和土耳其商店，对外国人施以暴行，杀伤杀死多人。仇恨外国人，对于新法西斯分子来说，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一种基本原则，即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争取选票。

第三，极端仇视资产阶级民主制，推行领袖独裁原则。

在新法西斯分子看来，1945年之后开始了一个不自由、遭迫害的、进行“地下斗争”的时代。他们公开攻击联邦德国是“肮脏的共和国”，推行“可恶的制度”，是“失业、淫荡、腐败”的国家，是同盟国的临时机构”^①他们叫嚣必须“结束堕落的享有特权的政党”，废除“假德意志的波恩政权，反对德国的死敌——议会制——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反对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②新法西斯组织的头目罗德德尔声称，为了反对议会民主制和联邦德国，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

新法西斯主义主张推行领袖原则的极权制。所有的新法西斯组织均反对民主制与自由讨论的形式，主张“一人命令，全体服从”，按照领袖原则进行组建和活动。各级“领袖”不由选举产生，而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参加新法西斯组织的青年人确信，“党与领袖共存亡”，“命令就是命令”，“领袖命令，我们服从”。^③

第四，推崇暴力，主张扩军备战。

新法西斯分子为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辩护。他们宣扬不是“德意志各部族的统一者”希特勒侵犯了邻国，而是德国面对“一个反对它的敌人世界”，被迫起来进行“防卫”，并几乎取得“最后胜利”，征服欧洲。由于将军们的背叛而使战争遭到惨败（指1944年7·20事件）。他们反复强调，不是“天才的领袖”，不

^① ^②根策尔：《希特勒的重孙们——新纳粹分子：他们的思想与活动》，第19、47、50、52页。

^③ 根策尔：《希特勒的重孙们——新纳粹分子：他们的思想与活动》，第139页。

是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不是纳粹党的政策，而是“非德意志的军官们”应该对战败负责。他们把战争的结束视为充满忌妒之心的大国和“国际犹太人复仇大资本”制定的一种霸占和粉碎德国的计划”。因此，他们强烈反对认为德国法西斯主义负有“战争罪责”的言论，要求“全部释放纳粹战犯”。^①他们宣扬，“世界属于强者——我们必须保持强大”，提出“重新恢复防卫能力”，“建立一支能够应战的纳粹战斗组织，在决战时刻必须善战”，应该“系统地准备战争”，准备“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②

尽管战后出现了新法西斯主义及其组织的活动，当前又有重趋活跃的趋势，但是，从总的方面看，还没有达到群众大规模地涌向新法西斯组织的地步，新法西斯主义尚未构成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和世界和平的直接威胁。问题是要清醒地注视它的状况，对它可能造成的危害不应低估。

当前法西斯斗争的一些情况

各国民主进步力量近年来对新法西斯主义重新抬头的趋势感到忧虑不安，以各种形式逐步加强了反法西斯斗争。1973年春天在联邦德国埃森城举行的2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国际学术会议指出：“必须加强反对法西斯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及其反动派的斗争，这是我们时代的使命！”^③1977年5月在华沙举行的缔造和平国际会议号召世界人民提高警惕，反对和揭露新法西斯主义派别及其恐怖破坏活动。^④在欧洲许多国家，工人、学生、职员等各阶层民众，纷纷行动起来，举行集会和游行，抗议新法西斯主

^① 《右翼出版商格哈德·弗莱的政策与经营》，第37页。

^② ^④ 见《当前的法西斯主义与其危险的现实性》，载《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73年第4期，第471页；第5期，第619页。

^③ 曼弗莱德·魏斯伯克：《当前的法西斯主义》，第212页。

义及其活动。

在联邦德国，1978年德国工会同盟做出反对新法西斯主义活动的决议：一、充分利用一切法律手段和可能性，战胜新法西斯组织及其行动。二、禁止新法西斯组织散发各种宣传资料(图书、唱片、电影)。三、要特别注意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新法西斯主义在政府、议会、新闻及出版界所起的作用。四、在各类学校的历史和政治教学中，讲解法西斯主义问题。^①1989年1月28—29日，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倡导下，在不莱梅举行了联邦德国反对新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行动会议。会上成立了一个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工会和基督教势力代表的政治上广泛的工作委员会，号召继续开展反法西斯主义统一行动。正如许多行动和声明中所表明的那样，具有不同社会出身、政治观点和世界观的人们，从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会会员、绿党党员、自由民主党人、宗教集团、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直到基民盟/基社盟党员，正在反法西斯运动中团结起来。

联邦德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反法西斯公民倡导协会，自发地修建了各种反法西斯中心和历史现场。各类青年协会组织了多种反法西斯活动。新法西斯分子的每一次集会几乎都遭到反法西斯抗议活动的明显反击。在左派人士组织的反法西斯群众集会上，群众高呼口号“永远不要发生战争！永远不要法西斯主义复活！”“外籍工人留下来——驱逐新法西斯分子！”他们要求彻底贯彻联邦德国基本法和各州宪法中提出的反法西斯主义任务。他们以实际行动表明，绝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绝不允许德、日、意法西斯主义给人类造成的史无前例的战争灾难重演！

^① 库恩尔，《法西斯主义。原因、统治结构、现实性》，第197页。

德、意、日法西斯运动 重要人物简况

(一)德国 (共15人)

希特勒，阿道夫 (Adolf Hitler, 1889—1945) 德国纳粹党党魁，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兼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头号法西斯战犯。1889年4月20日出生于奥地利布劳恩诺镇一位海关官员家庭。1906—1913年流浪于维也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慕尼黑自愿参战，1918年11月德国战败后回到慕尼黑。1919年9月加入德意志工人党，次年2月该党改名纳粹党。1921年7月排斥原领导人德雷克斯勒，当选为纳粹党主席，被称为“领袖”。1923年11月8—9日发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失败，11月11日被捕入狱。1924年12月获释，1925年2月27日重建纳粹党。此后，有计划、有步骤地排斥纳粹党内以施特拉瑟兄弟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势力，争取垄断资本和容克军国主义势力等权势集团的支持。1933年1月30日，出任德国政府总理。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逝世后，自任元首兼总理。大力重整军备，实行统制和战争经济，建立法西斯极权独裁统治，疯狂推行侵略扩张政策。1936年3月7日出兵占领莱茵非军事区。1937年11月6日结成法西斯德、意、日三国“柏林——罗马——东京反共轴心”。1938年3月12日吞并奥地利。1939年3月16日，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9月1日，下令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9月1日，

派兵侵入挪威和丹麦，5月10日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1940年8月7日，对英国宣布实行全面封锁。1941年3月2日，德军开进保加利亚，随后入侵南斯拉夫、希腊并出兵北非。1941年6月22日，全面发动侵苏战争。1945年4月27日苏军包围柏林后，于4月30日在总理府地下室开枪自杀。著有《我的奋斗》（第一卷，1925年；第二卷，1926年），《希特勒的第二本书》（1961年出版），《重新崛起之路》（1927年）。

德雷克斯勒·安东（Anton Drexler, 1884—1942） 德国纳粹党创始人之一。1884年6月13日出生于慕尼黑。慕尼黑铁路机床厂钳工。1918年3月7日，创立争取良好和平自由工人委员会慕尼黑地方支部。1919年1月5日，同体育记者哈勒和退役海员、火车司机米夏埃尔·洛特尔共同创建德意志工人党。1920年2月，改名纳粹党，任该党全国副主席兼慕尼黑地方支部主席。1920年1月5日—1921年7月28日，任该党主席。1921年7月29日，希特勒攫取纳粹党主席职务，特任名誉主席。1923年11月希特勒啤酒馆暴动失败后，曾被短期拘捕。1925年2月27日，拒绝参加希特勒重建纳粹党大会。此后即在纳粹党内失去影响。1942年2月24日在慕尼黑去世。著有：《我的政治觉醒——一位德意志社会主义工人的日记》（1919年），《德意志工人政党方针》（1919年）。

哈勒，卡尔（Karl Harrer, 1890—1926） 纳粹党前身德意志工人党创始人之一。体育记者，图勒协会会员。1918年10月2日，参加德雷克斯勒创建的争取良好和平自由工人委员会慕尼黑地方支部会议。1919年1月5日，参与创建德意志工人党，任主席，主张进行秘密活动。希特勒入党后极力扩大影响，抬高自己，引起哈勒等人不满，试图限制希特勒的活动。1919年12月之

后，被希特勒排斥。1920年1月5日，哈勒表示引退，被排挤出党。此后主要从事图勒协会的活动。

弗德尔，戈特弗里德 (Gottfried Feder, 1883—1941) 纳粹党早期理论家。1883年1月27日出生于维尔茨堡一个官员家庭。曾在慕尼黑大学、柏林技术学院和苏黎士大学学习，获工程师学位。1908年创办一家私人设计公司，在保加利亚、德国设计和完成许多重要建筑。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期间，萌发了对法学和金融政治学的兴趣。1917年后进行反对“利息奴役制”的研究，区分所谓“再生资本与掠夺资本”，为反犹太主义提供理论依据。1919年提出“粉碎利息奴役制”口号，建立战斗同盟，要求对银行实行国有化，取消利息。1920年加入德意志工人党，成为该党经济专家和纲领起草人之一。1924—1936年任德国国会议员。1931年任纳粹党经济委员会主任。1933年7月—1934年任帝国经济部国务秘书，后被沙赫特解除职务。1934年任帝国殖民局委员和德国技术学会主席，逐渐丧失影响。1936年后在柏林技术学院主持经济讲座。1941年9月24日于姆尔诺去世。主要著作：《粉碎金钱利息奴役制宣传》(1919年)，《民族与社会基础之上的德意志国家》(1923年)，《纳粹党的纲领及其世界观基本思想》(1927年)，《反对金融寡头的斗争》(1923年)等。

罗森贝格，阿尔弗雷德 (Alfred Rosenberg, 1893—1946)

纳粹党理论家，法西斯战犯。1893年1月12日出生于俄国雷瓦尔(塔林)一巨商家庭。其父为立陶宛人，母为爱沙尼亚人。1910年在里加技术学院学习，1915—1918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建筑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18年11月移居德国，在慕尼黑从事反犹写作和政治活动。1919年由埃卡特介绍参加德意志工人党。1920年结识希特勒。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1924年建立纳粹党的替代

组织大德意志工作协会。1925年任纳粹党《人民观察家报》主编。1927年建立维护德意志文化民族社会主义战斗联盟。1930年创建纳粹党外交政策新闻处。1933年4月任纳粹党外交政策局局长。1934年1月，任纳粹党整个思想和世界观培训和教育管理元首代表，自称是纳粹党世界观和外交政策首席理论家。其主要著作《二十世纪的神话》(1930年)，宣扬真理和法律应服从于“日耳曼种族”思想，要求树立一种新的符合种族思想的世界观。1937年该书获德意志民族奖金，被评论为“科学地和直观地论述和巩固了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为保持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纯洁性做出了特殊贡献！”1930—1945年任德国国会议员。1941年7月任东部占领区首脑，加紧掠夺东欧和苏联，推进日耳曼化政策。1946年10月19日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施特拉瑟，格雷戈尔(Gregor Strasser, 1892—1934)

纳粹党内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1892年5月31日生于盖森菲尔德，出身于一个天主教官员家庭。曾在埃尔朗根大学学习药理学，后在兰茨胡德当药剂师。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任中尉。复员后组建民族武装协会。1920年初加入纳粹党，建立纳粹党第一个大区组织——下巴伐利亚大区，任大区区长。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被判处一年半监禁。1924年5月提前获释。后当选巴伐利亚邦议员。同年当选德国国会议员，至1932年。1925年纳粹党重建后任北德纳粹党领导人。与其弟奥托·施特拉瑟接管战斗出版社，建立柏林冲锋队。在1925年底、1926年初举行的北德和西德大区区长两次工作会议上，企图摆脱纳粹党中央的领导。1925—1932年担任纳粹党全国组织部长，是仅次于希特勒的人物。1932年春季以后，施莱歇尔将军与他保持秘密接触，试图分裂纳粹党，委任他担任副总理，遭到希特勒坚决反对。1932年12月8日，放弃纳粹党内一切职务。后被希特勒开除出党，实际退出政治

舞台。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清洗冲锋队事件中同被杀害。著有《自由与面包》(1928年),《争取德国的斗争》(1932年)。

施特拉瑟, 奥托 (Otto Strasser, 1897—1974) 纳粹党内激进派领导人。1897年9月10日生于温德海姆。1914年中学毕业, 志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法律和经济学。1919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 不久退党。1923年之前曾任一大企业法律顾问。1924年后在《人民观察家报》工作。1925年参加纳粹党, 与其兄共同接管战斗出版社。同年起草纳粹党内激进派革新民族社会主义的纲领草案, 在9月10—11日哈根召开的西、北德纳粹党大会上公布。1925年11月20日, 在汉诺威召开的西、北德纳粹党大区领导人会议上, 提出以该纲领取代二十五点纲领, 遭到希特勒的否决。1927年任《民族社会主义信札》杂志主编, 主张推行亲俄和符合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路线, 与希特勒主流派相对抗。1925年后, 特别是在1930年, 坚决反对希特勒的合法夺权路线, 并同希特勒公开决裂, 被开除出党。1930年8月组织革命民族主义者战斗同盟(也称黑色阵线), 成为反对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力量之一。1933年流亡维也纳。1934年被剥夺德国国籍。先后流亡布拉格和中欧、北美、南美, 最后在加拿大政治避难。1955年成为联邦德国公民。同年创建德意志社会联盟。1974年8月27日于慕尼黑去世。主要著作《部长职位或者革命?》(1930年), 《德国社会主义建设》(1931年), 《德国的革新》(1945年), 《希特勒与我》(1948年), 《流亡》(1958年)。

赫斯, 鲁道夫 (Rudolf Heß, 1894—1987) 纳粹党副领袖, 法西斯战犯。1894年4月26日生于埃及亚力山大。1914年自愿参军, 在巴伐利亚第一步兵团服役。战后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国民经济、历史和地缘政治学, 受到K·豪斯霍费尔地缘政治论的影响。1920

年加入纳粹党。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同希特勒一起坐牢，参与了《我的奋斗》一书的写作。1925年出狱。同年成为希特勒的私人秘书。1932年，继格·施特拉瑟之后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1933年4月21日任元首代表。同年12月1日任无任所部长。1938年2日任秘密内阁委员会成员。1939年任国防委员会成员。继戈林被任命为希特勒的继任人之后，1939年9月1日被任命为希特勒的第二继任人。对宣扬希特勒和在国外德国人中进行纳粹宣传起了重要作用。1941年5月10日，自奥格斯堡驾驶飞机前往苏格兰，在格拉斯哥跳伞降落，被俘并拘留，直至战争结束。1946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他终身监禁。1987年于柏林施潘道监狱病故。

戈林，赫尔曼(Hermann Göring, 1893—1946) 德国纳粹党和政府要人，第二次世界大战首要战犯。1893年1月12日出生于上巴伐利亚罗森海曼一位外交官家庭。中学毕业后进入卡尔斯鲁厄士官学校，19岁任步兵中尉，后加入空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升任空军上尉。1918年任德国著名空军里希特霍夫狙击队队长。战后初期，任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顾问，在丹麦、瑞典当运输机驾驶员。1921年进慕尼黑大学学习，并与希特勒相识。1922年加入纳粹党。1923年11月参加啤酒馆暴动，逃亡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典。1926年返回柏林，与纳粹党恢复联系。1928年当选德国国会议员。1930年任纳粹党常驻柏林代表。1932年任德国国会议长。1931—1933年初，多次参加希特勒与德国垄断资本人物的秘密会谈。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执政后，戈林出任帝国部长、普鲁士邦内务部长，创建普鲁士邦秘密警察。1933年2月27日制造国会纵火案，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1933年4月1日出任普鲁士邦总理，至1934年5月1日。1933年5月5日主持建立帝国航空部，任航空部长。1935年3月1日

任空军司令。1936年10月18日任四年计划全权代表，负责动员经济力量，重整军备。1939年8月30日任帝国国防委员会主席。1939年9月1日，希特勒正式指定他为全权继承人。1940年7月19日，被授予大德意志帝国元帅称号，获铁十字大勋章。在战争年代，因法西斯领导集团内部倾轧，其影响逐渐下降。1945年4月20日夜，戈林由柏林逃往慕尼黑。次日电促希特勒，准许他“接管帝国领导权”。4月24日，希特勒罢黜他一切职务，指控他犯有“叛国罪”，将其逮捕。1945年5月8日，戈林被美军俘获。1946年10月，经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被判处绞刑。在行刑前服毒自杀。

戈培尔，保尔·约瑟夫(Paul yosepb. Goebbels, 1897—1945)

纳粹党和第三帝国宣传部长，法西斯首要战犯之一。1897年10月29日出生于莱茵区雷特镇一个职员家庭。曾在波恩大学和弗莱堡、维尔茨堡、慕尼黑、海德堡大学学习日耳曼学、哲学和艺术史。1922年在爱尔朗恩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加入纳粹党，追随格·施特拉瑟。1924—1927年主编《民族社会主义信札》。1926年班堡会议之后投靠希特勒，由纳粹党莱茵兰—北德地区大区干事长升任柏林—勃兰登堡大区区长。1927年创办《进攻报》(原为周报，1930年改为日报)，任该报主编，至1934年。以其花言巧语，蛊惑人心，获“狡猾人”称号。1928年当选国会议员。1929年任纳粹党全国宣传部长。1933年3月13日任政府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长，全面控制第三帝国宣传机构，是希特勒元首神话的重要编造者和宣传者。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其煽动骗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1944年7月25日，被任命为德国总体战部长。1945年1月30日，被任命为柏林城防司令。4月19日，希特勒立下遗嘱，任命邓尼茨为总统，戈培尔为总理。5月1日，他首先毒死6个孩子，然后同其妻子在总理府花园中自杀。主要著作：

《争取柏林的斗争》(1932年),《德国人的革命》(1933年),《法西斯主义及其实际结果》(1934年),《种族问题与世界宣传》(1934年),《从皇帝宫廷至帝国首相府》(1934年),等。

莱伊, 罗伯特 (Robert Ley, 1890—1945) 纳粹党组织部门和劳动阵线负责人。1890年2月15日生于下布莱登巴赫。在耶拿、波恩、明斯特大学学习化学, 获哲学博士学位。1914年自愿参加一次大战, 在施特拉斯堡第10步兵团当兵, 1920年退役。1921年在IG—法本化学公司工作。1924年加入纳粹党。1925年任莱因兰大区区长。1928年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30年当选任德国国会议员。1932年任纳粹党政治组织部领导人, 只对希特勒一人负责。1933年5月2日纳粹党对工会实行一体化之后, 成为德国劳动阵线领袖, 建立“通过欢乐获得力量”和“劳动美化行动”等社会福利机构。1934年任帝国组织部长, 德国法律科学院院士。1945年10月25日, 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主要战犯宣判开庭之前, 在纽伦堡狱中自缢。

希姆莱, 海因里希 (Heinrich Himmler, 1900—1945) 纳粹德国警察头目, 德国法西斯首要战犯之一。1900年10月7日生于慕尼黑。农业专科学校毕业, 1917年自愿参加一次大战。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1925年8月参加纳粹党, 任下巴伐利亚大区副区长。1926—1930年任纳粹党宣传部副部长。1929年1月6日任党卫队全国领袖。1933年纳粹党执政后, 任慕尼黑警察总监, 在全国各邦组建政治警察。1934年4月20日, 任普鲁士国家秘密警察副首脑。曾参与1934年6月30日清洗冲锋队事件, 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 全面控制全国警察武装和党卫队。1936年6月17日, 任内务部国务秘书, 德国警察首脑。竭力宣扬党卫队应成为纳粹德国精英代表人物的典型, 成为一种教团, 他还建立了史前研究机

构(祖先继承人研究所)、生命源泉协会,“培育”纳粹种族后代。同时,建立了看守集中营的党卫队一骷髅团。大战爆发后,建立独立武装—武装党卫队,其地位仅次于国防军。1939年10月7日,负责在东、南欧推行殖民—日耳曼化强制政策。大力在占领区扩建集中营和灭绝营,建立盖世太保秘密警察全面监视制度。根据希特勒灭绝犹太人计划,成为屠杀并最后“解决”犹太人的组织者。1943年8月25日,任帝国内政部长和帝国行政管理机构全权总代表。1944年7月21日,任占领军司令和军备部部长。1945年春,组织民族突击队和武装沃尔夫部队,企图阻止军事失败。同时,与国际犹太人组织一名代表谈判关于释放在德国权力管辖范围内的犹太人问题。曾与英、美代表单独谈判,允诺投降,旨在同西方合作在东部战场继续进行对苏战争。后谈判失败。1945年4月,希特勒解除他的一切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德国投降后被英军俘获。1945年5月23日,在吕纳堡英国拘留所自杀。

(二) 意大利 (共13人)

墨索里尼, 贝(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 意大利独裁者, 法西斯主义首创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犯。1883年7月29日生于普雷达皮奥的多维亚。其父是铁匠, 母亲是小学教师。自幼生活在北部意大利农村, 受布朗基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影响很大。1901年加入社会党, 由于进行无政府主义和反对教权的宣传而闻名。1912年出任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主编。因其办报颇有成效, 能文善辩, 好用权谋, 1913年跻身于社会党领导人之列。1914年10月, 墨索里尼力主意大利站到协约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被社会党开除。同年11月依靠本国大资产阶级支持和法国资助, 创办《意大利人民报》, 鼓吹意大利参战。战时服过兵役, 负伤后回报社。战后年代意大利革命运动高涨, 墨索里尼利用资产

阶级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和人们对凡尔赛和约条款的不满，于1919年3月纠集一批退伍军人在米兰组织半军事性组织——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1921年11月改名国家法西斯党，墨索里尼任领袖。1922年10月，法西斯党徒向罗马进军。国王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组织新政府，在意大利开始了法西斯统治。1925年1月，公开宣布实行法西斯极权统治，将内阁中其他党派成员一概逐出政府，集大权于一身。在他统治的二十一年间，大力扩军备战，推行扩张政策，连年发动侵略战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935—1936年出兵侵占埃塞俄比亚；1936—1939年武装干涉西班牙；1939年吞并阿尔巴尼亚。1940年6月10日对英、法宣战。随着军事冒险连连失利，特别是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惨败，法西斯统治的危机日益加剧。1943年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国内人民反法西斯运动高涨。意大利统治集团由国王出面，于1943年7月25日将墨索里尼解职，并予软禁。同年9月12日，希特勒派伞兵将其救往德国。9月17日在米兰附近的萨洛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1945年4月27日，化装成德国士兵潜逃时被游击队俘虏，28日晨在梅泽格拉的朱利诺被处决，尸体吊在米兰洛莱托广场示众。

齐亚诺，加 (Galeazzo Ciano, 1903—1944) 1903年3月18日出生于里窝那。父亲科斯坦佐·齐亚诺。1925年，齐亚诺从罗马大学法律系毕业，先后担任意大利驻里约热内卢副领事、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北平领事等职。1930年4月与墨索里尼长女爱达结婚，出任驻上海总领事。1932年任驻华公使。1933年任墨索里尼新闻办公室主任，次年任新闻与宣传副大臣，进入法西斯大委员会。1935年6月，接任新闻大臣，1936年6月改任外交大臣。齐亚诺立志把地中海、亚得里亚海变成意大利的内湖，把巴尔干作为意大利的势力范围，最终建立大意大利帝国。意大利签订

“罗马—柏林轴心”的意德协议、反共产国际协定和钢铁条约等都由他与墨索里尼一同决定。这使他一度成为欧洲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在国内，他插手党务、军务和政务，是只在墨索里尼一人之下的权势显赫人物。1939年秋，齐亚诺对德国背着意大利同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极为不满。二次大战全面爆发时，劝说墨索里尼采取“非交战立场”。1940年，在意大利参战问题上翁婿反目，齐亚诺开始失去墨索里尼的信任。1943年2月被解除外交大臣职务。他参加了1943年7月撤换墨索里尼的活动。同年8月被德军软禁，押到慕尼黑。1944年1月11日，墨索里尼以齐亚诺背叛法西斯主义和背叛领袖罪将其枪决。

齐亚诺，科(Costanzo Ciano, 1876—1939) 加莱阿佐·齐亚诺之父。1876年8月30日出生于里窝那。1896年进入里窝那海军学院，毕业后在意大利海军服役，任艇长。参加过入侵利比亚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对奥地利作战时获得数枚勋章，受封伯爵，受到邓南遮的赏识。1919年阜姆事件时，成为其得力助手。邓南遮的阜姆政府被解散后，老齐亚诺转而投靠墨索里尼，参加向罗马进军。1922年10月30日，在第一届墨索里尼内阁中任商船部副大臣。1924—1934年任交通大臣。马泰奥蒂危机时期，这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运用他在王室和民族主义势力中的影响，帮助墨索里尼渡过难关。墨索里尼于1926年11月写信给老齐亚诺，指定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并说明一旦自己突然去世时应采取的紧急措施。墨索里尼还将其子加·齐亚诺作为亲信，委以重任。1934年4月28日，老齐亚诺任众议院议长。1938年众议院改组为法西斯和职团院，他继续担任议长。1939年6月26日在蓬特莫里亚诺病逝。

巴尔博，伊(Italo Balbo, 1896—1940) 意大利法西斯党极

端派核心人物。1896年6月5日出生于夸尔特萨纳。父母均为教员。15岁加入意大利马志尼党。1914年结识墨索里尼。1918年就读于佛罗伦萨大学政治系，1920年毕业，加入法西斯组织。1921年2月13日任费拉拉区法西斯政治书记，是该地区独霸一方的法西斯首领。他同格兰迪等人创建农村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武装行动队，成为法西斯暴力主义极端派领导人之一。指挥行动队对帕达纳地区社会党领导的工会和行政机构进行暴力恐怖活动，所到之处，尸体遍地，瓦砾成堆。1922年1月，奉墨索里尼之命组建法西斯民兵，任司令。同年5月率领63000名武装法西斯分子夺取费拉拉市政领导权。10月参与制订向罗马进军的计划，被墨索里尼指定为向罗马进军的四人领导小组成员。法西斯政权建立后，出任警察总监，自恃有实权而与墨索里尼相抗衡。1924年马泰奥蒂危机期间，墨索里尼趁机以巴尔博对谋杀马泰奥蒂负有道义责任为名，将其免职。巴尔博回到费拉拉，重新整顿行动队，联合法里纳奇，准备再次向罗马进军。被人们称之为法西斯“第二次浪潮”的幕后操纵者。因墨索里尼要利用极端派向阿文廷反对派进行反击，关系有所缓和，1925年被墨索里尼委任为经济部副大臣。1926—1929年任航空部副大臣。1929至1933年任航空大臣。1934—1940年任利比亚总督，制订了全套殖民化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将在1938—1940年间把14万意大利人移居当时仅有80万人口的利比亚。1940年6月28日因飞机失事身亡。

法里纳奇，罗(Roberto Farinacci, 1892—1945) 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总书记。1892年10月16日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伊塞尔尼亚。父亲是警官。17岁辍学当铁路工人，加入社会党。1919年1月脱离社会党。同年3月与墨索里尼共同建立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任政治书记。1920年在克雷莫纳发动以反对社会党和布尔什维主义为目标的农村法西斯运动。1922年夏季，建立法西斯行

动队，任司令。10月初，率领7000名法西斯行动队员以捍卫南蒂罗尔意大利化为名，占领特兰托和博尔扎诺，对墨索里尼下决心夺取政权具有重要影响。向罗马进军时，法里纳奇在克雷莫纳举行暴乱，全面控制这一地区。法西斯政权建立后，他依靠自己控制的克雷莫纳同墨索里尼分庭抗礼，在暴力主义极端派中威信很高。墨索里尼担心其篡位，将他排除在中央政权之外。法里纳奇扬言要发动“第二次浪潮”，“把中央政府中的那些背叛法西斯主义的人赶下台”。马泰奥蒂危机期间，他于1924年12月鼓动50余名法西斯民兵高级官员向墨索里尼发出最后通牒：“放弃摇摆政策，否则将被抛弃”。墨索里尼于1925年1月3日在议会发表了法西斯党要在全国实行一党专政的讲话。2月12日，墨索里尼在法西斯大委员会宣布，“今后法西斯党应放在总书记的控制之下”。3月30日，被任命为法西斯党总书记。从此被人们称之为“大书记”、“副领袖”。1926年3月30日，墨索里尼在本人地位得到巩固后，免去法里纳奇总书记职务。1926—1933年，他利用《新克雷莫纳》和《法西斯极权制度》宣传“正统”法西斯主义。1933年，墨索里尼拟发动侵埃战争，亟需极端派支持，委任法里纳奇为大委员会委员和权力高于其他大臣的国务大臣。1936年10月，法里纳奇与纳粹要人戈培尔、希姆莱建立秘密关系，多次代表法西斯党出访德国，会见希特勒。1943年7月24日，法西斯大委员会通过要墨索里尼下台的决议时，法里纳奇坚决支持墨索里尼。7月27日，他到希特勒的总部。9月2日同希特勒策划并宣布建立意大利法西斯社会共和国，任内政部长和新法西斯党总书记。1945年4月28日被游击队抓获，予以枪决。

博塔伊，朱(Giuseppe Bottai, 1895—1959) 法西斯主义职团制的主要鼓吹者。1895年9月3日出生于罗马。1915年志愿入伍去前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加未来主义运动和敢死队

员协会。1919年参与建立罗马的法西斯组织。1920年在拉齐奥大区建立第一批法西斯行动队。1921年当选众议员。1923年以后，先后创办《法西斯批判》、《劳动权利》、《职团研究汇编》等刊物，鼓吹职团制和实行法西斯教育改革。1926年建立职团部，墨索里尼自任大臣，博塔伊为副大臣。1929年任该部大臣，并被指定为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参与起草《劳动宪章》和建立各行业的职团机构。1932年改任全国社会救济协会主席。1935—1936年任罗马总督，1936—1943年任国民教育大臣。制订《教育改革法》和《教育章程》。在其控制的刊物上宣扬反动的优等民族论，参与制订1938年的民族歧视法。1943年7月24日，格兰迪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撤掉墨索里尼的动议，博塔伊投赞成票。1944年1月，墨索里尼指示维罗纳法庭对其缺席判处死刑。意大利共和国建立后，被最高法院判处终身监禁。1947年意大利大赦，他于1948年回国。1959年1月9日病死于罗马。

费德尔佐尼，路(Luigi Federzoni, 1878—1967) 法西斯党民族法西斯主义派首领。1878年9月27日出生于波洛尼亚。父亲是文学教授。自幼崇拜邓南遮，深受其民族沙文主义思想影响。1904年任《卡利诺雷斯托报》主编，多次以记者身份到达尔马提亚、伊斯特里亚和阜姆采访，声称这些地区都是意大利的领土。1909年通过报纸掀起捍卫意大利领土的宣传运动。1911年组织民族主义者大游行，推动意大利政府发动侵略利比亚战争。1913年当选为民族主义协会总书记。1921年由国王指定为众议院副议长。1922年10月27日，说服国王同意授权墨索里尼组阁。在墨索里尼内阁中任殖民大臣。1923年2月，批准民族主义协会并入国家法西斯党，担任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在法西斯党内斗争中，是民族法西斯主义派首领，代表旧统治阶级中的保守派。主张“先国后党，(法西斯)党应当从属国家”，与法里纳奇为首的极端法西

斯主义派“(法西斯)党应凌驾于国家组织之上，党应当控制国家”的观点针锋相对。1924年马泰奥蒂危机初期，民族法西斯主义派在党内占优势，费德尔佐尼在国王和教皇支持下于1924年6月出任内政大臣。1926—1928年再任殖民大臣。法西斯极权独裁统治确立后，实权被夺，1929—1939年任参议院议长。1938—1943年任意大利皇家学院院长。1943年7月25日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投票赞成把墨索里尼赶下台。1944年10月逃亡国外，1951年返国。1967年1月24日病死。

罗西，切(Cesare Rossi, 1887—1967) 法西斯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887年9月21日出生于皮斯托亚的佩西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作为米兰工团主义领导人于1914年10月5日参与发起建立国际行动革命法西斯。同年11月帮助墨索里尼创办《意大利人民报》。1919年3月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建立，当选中央委员，米兰法西斯组织政治书记。1920年5月，在法西斯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书记。因与其他法西斯领导人关系紧张，于1921年8月辞职。1922年10月法西斯政权建立，应邀担任墨索里尼的政治秘书和新闻办公室主任，兼米兰市长。深得墨索里尼信赖，委任他担任法西斯最高领导小组成员、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意大利市镇联盟副主席和国家法西斯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地位显要，权势很大。从向罗马进军到1924年夏季，法西斯的一切重大暴力恐怖行动都是在他的指挥下进行的。1924年6月10日，罗西与墨索里尼密谋，杀害统一社会党总书记马泰奥蒂，此事在全国遭到强烈反对。墨索里尼拟将罗西作为替罪羊下令予以逮捕。罗西闻讯逃往国外。临行前公布备忘录，披露马泰奥蒂事件真相和几起引起轰动的恐怖事件内幕。1967年8月9日在罗马病逝。

罗科，阿(Alfreolo Rocco, 1875—1935)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理论家。1875年9月9日出生于那不勒斯。1910年参与发起建立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鼓吹意大利“有权向外扩张”，“有权在国外寻求生存空间”。国家法西斯党夺取政权阶段，罗科无保留地支持法西斯主义。在第一届法西斯内阁中担任国库部副大臣。同年12月任财政大臣。与费德尔佐尼等人推动民族主义协会于1923年2月并入国家法西斯党，成为该党民族法西斯主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24年5月，当选众议院议长。1925年1月被任命为司法大臣。1925—1932年，主持制订包括《特别法》、《政府首脑及阁员职责与特别法》、《劳动宪章》和《法西斯大委员会权力法》等全套法西斯法律，被墨索里尼称之为“法西斯革命的立法者”。1934年，罗科被指定为参议员。1935年8月28日病逝于罗马。主要代表作有三卷本《阿尔弗雷多·罗科政治演说及论文集》，由墨索里尼作序。

德·博诺，埃(Emilio De Bono, 1866—1944) 侵埃意军总司令。1866年3月19日出生于米兰省的卡萨诺迪阿达。12岁进米兰预备军校，毕业后入军事学校。1884年获少尉衔，1909年任师参谋长，1916年擢升少将，1920年任军团司令。1920年1月20日，在日记中写了警句，“战争万岁！”认为战争是唯一的和永恒的真理。1922年向罗马进军前夕加入国家法西斯党，被墨索里尼指定为四人领导小组成员。是法西斯党军衔最高的军官，同达奥斯塔公爵是至交，有助于法西斯党争取军队和王室的支持。法西斯政权建立后，担任警察总监和第一任国家安全志愿民兵司令，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在马泰奥蒂危机初期，墨索里尼借口他在制止暴力活动方面犯有渎职罪将其免职。1925—1928年任利比亚总督，1925—1935年任殖民大臣。多次上书墨索里尼力劝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2年12月起草《在埃塞俄比亚采取行动的计划》，

深得墨索里尼赞赏，授权全面负责发动侵埃战争的各项准备。1935年1月，就任东非高级专员兼东非意军总司令。同年10月3日，指挥20多万意军侵略埃塞俄比亚。因指挥不力，于同年11月30日被免职。晋升元帅衔。1939年底，被任命为意大利海外驻军监督。1940年6月意大利参战，德·博诺担任南方军团司令。1943年7月25日参与推翻墨索里尼。同年10月4日被墨索里尼抓获，1944年1月11日在维罗纳被处决。

比昂基，米(Michele Bianchi, 1883—1933) 国家法西斯党总书记。记者出身，是意大利社会党工团主义领导人，追随墨索里尼。1914年支持墨索里尼创办《意大利人民报》。1919年参与发起建立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1921年10月当选为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第一任总书记。1922年10月同德·博诺、德·韦基和巴尔博组成向罗马进军的四人领导小组。法西斯政权建立后，担任国务委员和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1924年担任内政部秘书长（墨索里尼兼任大臣）。1925—1927年任公共工程副大臣。1927—1929年任内政副大臣。1929年后担任公共工程大臣。1933年2月3日在罗马病逝。

德·韦基，切(Cesare Maria De Vecchi, 1884—1959) 法西斯民兵总司令。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在皮埃蒙特大区发起创建法西斯组织。次年组建法西斯行动队，参与军警镇压工农革命运动。1921年，当选众议员。1922年10月任向罗马进军的四人领导小组成员。法西斯政权建立后，韦基是法西斯党内著名的亲君主倾向的人物。1923年任财政副大臣和法西斯民兵总司令。同年，墨索里尼剥夺其军权，派他担任索马里总督。1924年国王曼努埃莱三世指定他为参议员。1928年任国务大臣。1929年出任驻梵蒂冈大使。1933年受封瓦尔·齐斯蒙伯爵。1935—1936

年担任教育大臣。此后至1940年12月担任意大利爱琴群岛总督。1943年7月24日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投票支持格兰迪提出的要墨索里尼下台的动议。1944年1月10日被墨索里尼的维罗纳法庭缺席判处死刑。1947年因犯法西斯罪被判刑，即被赦免。1959年1月23日在罗马去世。

格兰迪，迪(Dino Grandi, 1895—1972) 法西斯党内民族法西斯主义派负责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埃米利亚大区法西斯运动和民族主义工会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当选众议员，因不到年龄被取消议员资格。随后重新当选。他是民族法西斯主义领导集团的成员，温和法西斯主义的代表，其目标是尽可能保持与萨伏依王朝的连续性。曾任众议院副议长，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1924年任内政副大臣。1929年9月至1932年7月任外交大臣。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结束后，力主与英国重修旧好。1939年被任命为法西斯与职团议会议长，同年改任司法大臣。在1943年7月24日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率先提出对墨索里尼不信任案。1943年8月逃往国外。1944年1月9日被墨索里尼的维罗纳法庭缺席判处死刑。先后侨居巴西、西班牙等国。1950年返回意大利。1972年病死。

(三) 日本(共17人)

近卫文麿(Konoe Fumimaro, 1891—1945) 宫内集团首要人物，甲级战犯。藤原家后裔，近卫笃麿长子，世袭公爵。近卫家创建于镰仓初期，名列享有摄政、关白等最高官职特权之五摄家首位(另四家为鹰司、九条、二条、一条)。江户初期，后阳成天皇之子信寻成为近卫信尹养子，此后近卫家有日本皇室血统。近卫文麿1916年任贵族院议员，1917年京都帝国大学毕业。1918年在

《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发表题为《排斥英美本位之和平主义》的文章。1919年，作为西园寺公望的随员与松冈洋右一同出席巴黎和会。1931年任贵族院副议长，1933年任议长。“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接近陆军及右翼人物，与皇道派产生共鸣，同荒木贞夫等人来往密切。1933年发表文章，要求“改造世界之现状”。1937年6月初受命组阁。7月，日本军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近卫于1938年4月制定国家总动员法，推进法西斯体制的建立。1939年1月，在是否将德意日三国防共协定升级为三国军事同盟问题上，陆军与外务省意见分歧，近卫内阁总辞职。近卫改任枢密院议长。

1940年，近卫推荐前内大臣秘书官木户幸一为内大臣。同年西园寺公望引退后，内大臣享有推荐后任首相的特权。木户出任内大臣意味着宫廷势力新老交替，元老政治的结束，近卫、木户控制宫内集团时代的开始。1940年6月，近卫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在木户协助下开展新体制运动，策划建立法西斯政党。同年7月，军部推翻米内内阁，近卫再次组阁，制定《基本国策纲要》，主张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同时成立新体制筹备会。10月，成立法西斯组织大政翼赞会，但未建成法西斯政党。1941年7月，近卫内阁改组，排除力主北进的外相松冈洋右，组成第三次近卫内阁。9月，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对美英开战。10月，因在日美谈判问题上与军部发生矛盾，近卫内阁于同月16日总辞职。1945年初，日本法西斯投降前夕，近卫曾向昭和天皇提出奏折，主张通过苏联向盟国求和，未成。日本投降后，任东久迩内阁国务大臣，内大臣府御用挂，负责修改宪法。1945年12月被指名为甲级战犯，于拘捕前服毒身亡。

东条英机(Tōjō Hideki, 1884—1948) 军部法西斯首要人物，甲级战犯。岩手县人，陆军中将东条英教长子。1905年陆军士官学校(17期)毕业。1915年陆军大学毕业，任陆军省副官。1919

年被派驻瑞士、德国。1921年参与永田铁山等陆军三少佐的巴登巴登会晤。同年回国，任陆军大学教官，并在参谋本部任职，与永田等组织一夕会。1926年后，历任陆军省军务局课员，整備局动员课长，联队长，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长，军事调查委员长，旅团长。1935年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1936年晋升陆军中将。1937年任关东军参谋长。“七七事变”后，力主扩大侵华战争，指挥临时兵团入侵内蒙古。1938年任近卫内阁陆军次官。同年任航空统监兼航空本部长。1940年在统制派推荐下任第二次近卫内阁陆军大臣。在日美谈判期间反对从中国撤军，主张对美国开战，导致近卫内阁倒台。1941年10月受命组阁，晋升陆军大将，兼任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推行翼赞选举，组织翼赞政治会，强化法西斯体制。1943年兼任新设的军需大臣。1944年初兼任参谋总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实行法西斯军事独裁。1944年7月，盟军攻克塞班岛。日本法西斯节节败退，东条内阁引起日本统治阶层的不满，在宫内集团、海军、财阀策动下，东条内阁垮台。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指名为甲级战犯，拘捕时自杀未遂。1948年11月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2月执行绞刑。

广田弘毅(Hirota Kōki, 1878—1948) 法西斯外交官，内阁总理大臣。福冈县人，出生于石匠家庭，幼名丈太郎。少年时代曾加入玄洋社，接受忠君勤王思想。1905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06年通过外交官考试，到驻华公使馆任职。历任外务省通商第一课长、情报部次长、驻美国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欧美局长、驻荷兰公使、驻苏联大使。1933年至1936年连任斋藤内阁和冈田内阁外务大臣。1935年与陆海军大臣协议，确定“对华外交三原则”，并于1936年初在议会上公开提出“广田三原则”，露骨地要求中国“彻底取缔排日活动”、“默认满洲国”、“排除赤化威胁”。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受命组阁，开始日本政权的法西斯化接。受军部

统制派寺内寿一、武藤章提出的条件，排除具有所谓自由主义色彩的人入阁，并以明征国体、安定民生、加强国防、刷新外交为内阁使命。同时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为军部控制政权，全面建立法西斯体制奠定基础。同年8月，在五相会议上制定《国策基准》，决定南北并进。11月，同德国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在政党与军部的冲突中，广田内阁被迫总辞职。继而担任第一次近卫内阁外务大臣，因参与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于1938年被撤职。1942年任泰国大使。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曾会晤苏联驻日本大使马立克，希望苏联出面斡旋和平，未获成功。日本投降后，被指名为甲级战犯。1948年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同年12月执行绞刑。

松冈洋右(Matsuoka Yōsuke, 1880—1946) 法西斯外交官，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总裁。山口县人。1892年小学毕业，赴美国半工半读。1900年毕业于美国俄勒冈大学。1902年返回日本，就读于明治大学。1904年通过外交官考试，被派驻上海任领事官补。1906年赴大连任关东都督府外事课长。在中国任职期间知遇三井物产公司上海支店长山本条太郎和“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同时结识田中义一，与长州阀搭上关系。1921年辞去外交官职务，任“满铁”理事，1927年任副总裁。1930年辞职，加入政友会，当选众议员。1931年春，在《动乱之满蒙》小册子中首次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1933年作为日本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赴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大会，宣布日本退出国联。同年，退出政友会，辞退众议员，四处奔走呼号，主张解散政党，实行“昭和维新”，建设“世界新秩序”。1935年重返“满铁”，出任总裁。1940年7月，任第二次近卫内阁外务大臣，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同年9月，日德意缔结三国条约，建立军事同盟。1941年4月在莫斯科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回国后因对日美谈判表示不满，并因

6月德国进攻苏联而主张北进，暂缓南进，与近卫发生冲突。近卫改组内阁，松冈不再入阁。此后患肺结核疗养，直至日本投降。1945年11月，被指名为甲级战犯，关进监狱。因病住进美军医院，1946年6月27日死去。

永田铁山(Nagata Tezzan, 1884—1935) 法西斯统制派核心人物。长野县人。1903年陆军士官学校(16期)毕业。1911年陆军大学毕业。1913—1920年，多次被派往驻欧洲各国使馆任职。1921年任驻瑞士武官，同年10月在巴登巴登与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举行三少佐会晤，谈论鲁登道夫《总体战论》，密约致力于“解散派阀、革新人事、改革军制和建立总体战体制”。回国后历任教育总监部课员，陆军大学教官，陆军省军务局高级课员、整备局动员课长。1927年6月，以永田、小畑、冈村三人为核心成立二叶会，主要成员为陆军士官学校15期至18期毕业生。1929年5月，扩大到20期至25期毕业生，组成一夕会。1930年任陆军省军事课长。1932年晋升少将，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此时，小畑敏四郎任第三部长，二人发生意见分歧，逐渐分道扬镳。永田成为统制派核心人物，小畑加入皇道派。1934年，永田任陆军省军务局长，晋升陆军中将。1935年8月12日，因罢免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等问题，被皇道派相泽三郎中佐砍死在军务局长办公室。此后，梅津美治郎、东条英机、武藤章等成为统制派核心人物。

石原莞尔(Isihara Kanji, 1889—1949) 军部法西斯思想家，“九·一八事变”直接策划者和指挥者。山形县人。1909年陆军士官学校(21期)毕业。1918年陆军大学毕业，供职于教育总监部。1920年被派往华中派遣队司令部任职，在汉口结识板垣征四郎。1921年任陆军大学教官。1922年赴德国留学，研究战史。1925年回国，重任陆大教官。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被任命为关东军

参谋，接替河本大作。1931年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策划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九·一八事变”，参与制造“满洲国”。曾发表《战争史大观》、《满蒙问题之我见》等论著。1932年随松冈洋右赴日内瓦出席国联会议。1933年任联队长。1935—1936年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战争指导课长，致力于修订“国防方针”，拟订“产业五年计划”，以推进“国防国家”法西斯体制的建立。“二、二六事件”期间积极主张镇压叛乱，并兼任戒严司令部参谋。1937年策划阻挠宇垣一成组阁，并参与林銑十郎的组阁活动。同年，晋升陆军少将，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七七事变”后，从其建立国内总体战体制及世界战争总设想的立场出发，反对扩大侵华战争。同年9月被调离陆军中央，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与参谋长东条英机发生冲突，开始失势。1938年任舞鹤要塞司令官。1939年晋升陆军中将，任师团长，发表《世界最终战争论》。1941年被编入预备役。1942年任立命馆大学教授，组织右翼团体东亚联盟。日本投降后曾向麦克阿瑟递交《新日本之进路》建议书。1949年8月病死。

桥本欣五郎 (Hashimoto Kingorō, 1890—1957) 法西斯军人，甲级战犯。福冈县人。陆军士官学校(23期)毕业。1920年陆军大学毕业。1921年在参谋本部俄国班任职。1922年在关东军司令部任职，驻哈尔滨。1923年任关东军司令部驻满洲里特务机关长。1926年任炮兵少佐。1927年任驻土耳其武官，崇拜凯末尔，倾心于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政权。1930年回国，任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晋升炮兵中佐。同年，组织以陆军少佐为主要成员的法西斯团体樱会，推进“国家改造”运动。1931年，先后策划未遂政变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受到行政处分。1934年晋升炮兵大佐，任联队长。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被编入预备役。同年，组织法西斯团体大日本青年党，自任统领。1937年“七七事变”后再次应

征入伍，任联队长。1940年改组大日本青年党为大日本赤诚会。1942年当选为众议员，任翼赞政治会议员会副会长。日本投降后被指名为甲级战犯，1948年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荒木贞夫(Araki Sadao, 1877—1966) 法西斯皇道派核心人物。东京人。1897年陆军士官学校(9期)毕业。1907年陆军大学毕业，在参谋本部供职。1909年至1915年，三次被派驻俄国。1918年以后历任联队长，参谋本部欧美课长，旅团长。1923年赞同大川周明的日本主义，提倡“国家革新”。1924年后历任宪兵司令官，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师团长，教育总监本部部长。1931年至1933年连任犬养内阁和斋藤内阁陆军大臣，晋升陆军大将。1931年“十月事件”时被拟议为总理大臣，受到皇道派青年军官的拥戴。1934年任军事参议官。1935年被授予男爵爵位。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被编入预备役。历任近卫、平沼、阿部、米内各届内阁参议。1938年任近卫内阁文部大臣，极力推行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教育。日本投降后被指名为甲级战犯，判处无期徒刑。1955年因病获假释。

真崎甚三郎(Masaki Jinsaburo, 1876—1956) 法西斯皇道派核心人物。佐贺县人。1897年陆军士官学校(9期)毕业。1907年陆军大学毕业。历任大队长，教育总监部课长，陆军省军事课长，联队长，旅团长。1922年晋升陆军少将，1926年任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27年晋升陆军中将，任师团长。1929年加入一夕会，开始与青年军官保持联系。1931年任台湾军司令官。同年，荒木贞夫任犬养内阁陆军大臣，真崎任参谋次长兼军事参议官，皇道派开始得势。1933年晋升陆军大将。1934年任教育总监兼军事参议官。1935年在统制派永田铁山等人策划下被免除教育总监职务，任军事参议官。1936年“二、二六事件”时因涉嫌编入预备役，并被拘

捕审讯，宣判无罪。1941年任佐贺县教育会长。日本投降后，被指名为甲级战犯，收监二年，未被起诉。1947年获释。

武藤章(Mutō Akira, 1892—1948) 法西斯，统制派核心人物之一。甲级战犯。熊本县人。陆军士官学校(25期)毕业。1920年陆军大学毕业。先后供职于教育总监部、参谋本部、陆军省军务局。1935年任军务局军事课高级课员，“二、二六事件”后代表统制派干预广田组阁，迫使日本政府接受军部法西斯政策，成为统制派核心人物之一。1936年出任关东军第二课长，晋升陆军大佐。1937年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七七事变”时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同年，任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1938年任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1939年晋升陆军少将，任陆军省军务局长。1940年参与推翻米内内阁。1941年晋升陆军中将。1942年任近卫师团长。1943年任近卫第二师团长。1944年任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驻菲律宾。日本投降后被指名为甲级战犯，判处死刑。1948年执行绞刑。

大川周明(Okawa Shūmei, 1886—1957) 法西斯主义思想家，甲级战犯。山形县人。1911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曾任《道》杂志编辑，受参谋本部委托从事过翻译。1918年入“满铁”任职，历任东京经济调查局编辑课长、调查课长、调查局长。1929年调查局独立后任理事长。同年，任法政大学大陆部部长。1939年任东亚经济调查局最高顾问。早年研究印度哲学，由崇拜西欧转向信奉日本主义。1918年开始加入右翼运动，与满川龟太郎等组成老壮会。1919年成立法西斯团体犹存社，赴上海接回北一辉，共同推进法西斯运动。1924年与北一辉分道扬镳，组成行地社，开始接近军部上层。1925年在皇宫内成立大学寮，宣扬日本主义。1931年参与策划“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1932年成立神武会，自任会长。同年，因参与“五、一五事件”被判处9年徒刑。1937

年获恩赦出狱。日本投降后被指名为甲级战犯，受审期间精神病发作，免于起诉，获释。

北一辉(Kita Ikki, 1883—1936) 法西斯主义思想家。新潟县佐渡人。本名辉次郎。1905年中学退学，到东京早稻田大学旁听，学习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思想。1906年出版《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即被查禁。曾与幸德秋水等结交，同时加入中国同盟会，结识宋教仁、张继等人。1911年赴上海。宋教仁遇刺后，明显转向反革命立场。1915年著《支那革命外史》。1918年加入老壮会。1919年在上海撰写《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后改称《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同年回国，与大川周明等人组成犹存社，后因意见分歧而退出。1920年后，利用各种事件，散发耸人听闻材料，揭露宫廷、政界、经济界丑闻。1931年参与“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与陆军法西斯青年军官关系密切。预备役军人西田税(陆军士官学校34期毕业后因病退役)尤其为之倾倒，替他印刷散发《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扩大影响，为法西斯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提供思想理论基础。1936年“二、二六事件”中，北一辉与西田税共同协助指导暴乱，被军法会议判处死刑。1937年8月19日，二人同时被处决。

井上日召(Inoue Nissyō, 1886—1967) 法西斯主义活动家，右翼恐怖分子。群馬县人。原名井上昭。中学毕业后当过轮船见习侍者、造船厂临时工、陆军工兵补充兵。1907—1909年，在早稻田大学学英语，在东洋协会专门学校学汉语。1910年到中国东北，入“满铁”从业员养成所。毕业后任车站货运员，实际从事陆军特务活动，搜集情报。1913年潜入北京，1914年潜入青岛，继续进行特务活动。1921年返回日本，皈依佛教日莲宗，将“昭”一拆为二，改名井上日召。1925年成立护国圣社，并加入赤尾敏的建国

会。1928年在茨城县建立护国堂，以农村青年为对象鼓吹国家主义、国家改造，训练法西斯分子，并与海军青年军官藤井齐等人密切联系。1931年“十月事件”败露后，于1932年组织血盟团，制定“一人一杀”计划，并指挥血盟团分子杀害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三井合名会社理事长团琢磨。193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38年减为二十年徒刑，1940年在大赦令下获释。1941年与三上卓等人组织法西斯团体神篱塾。日本投降后继续在农村青年中进行活动，1954年成立右翼团体护国团。

橘孝三郎 (Tachibana Kōsaburō, 1893—1974) 农本主义者，茨城县人，出生于地主兼营染坊家庭。1912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文科，通读文学、哲学著作，深受托尔斯泰、尼采、克鲁泡特金等人思想影响。1915年退学回乡，开垦土地，与家属亲友建立“兄弟村”农场，宣传以大地主义、兄弟主义、勤劳主义为准则的农本主义。随着农村经济危机的加深，思想趋向激进，1929年在权藤成卿等人协助下成立爱乡会。1931年改组为爱乡塾，训练青少年。同时结识井上日召，与海军青年军官汇合。后与长野朗、权藤成卿、下中弥三郎等人成立日本村治派同盟。1932年“五、一五事件”时组织农民敢死队，派塾生参加破坏变电站行动。193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40年减刑出狱。日本投降后，在家乡经营农业，成立茨城县农民党。

安冈正笃 (Yasuoka Masahiro, 1898—1983) 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大阪人。1922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学生时代熟读《论语》，并在社会教育研究所(大学寮的前身)讲授日本精神、日本主义。毕业后曾在文部省从事精神运动。1924年与大川周明等人组织行地会(后改称行地社)，1925年退出。1927年创办金鸡学院，自任学监。1928年设金鸡教育青年会馆，1931年设埼玉县农士学校，

扩大金鸡学院的规模和活动范围，以地方教育者和青年为教化对象。“九一八事变”后，勾结军部，提倡革新，对法西斯主义新官僚影响很大。1932年与近卫文麿、后藤文夫等人组织国维会，发起“国家改革”运动，向内阁输送新官僚。1938年，在陆军省、外务省的支援下到中国进行活动，鼓吹“新东亚建设”，后任大东亚省顾问。日本投降后，参与创建右翼团体全国师友协会(1949年)、新日本协议会(1968年)，是反共“理论”支柱，在政治、经济界和官僚上层中仍有影响。曾与岸信介、佐藤荣作组织长荣会。

后藤文夫(Goto Fumio, 1884—1980) 法西斯主义官僚。大分县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到内务省及东京府供职。1917年赴欧美考察。1920年任内务大臣秘书官，1922年任内务省警保局长，1923年任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1930年被敕选为贵族院议员，与近卫等人组织新日本同盟，任日本青年馆理事长。1932年参加国维会，任理事。同年，就任斋藤内阁农林大臣，标志法西斯主义官僚开始进入权力核心，后藤从此在新官僚中居领导地位。1934年任冈田内阁内务大臣，与永田铁山等倡议设置内阁调查局，开辟陆海军武官及新官僚参与制定政策的途径。1936年“二、二六事件”发生后临时代理总理大臣。1940年以后，历任大政翼赞会副总裁、东亚振兴会副总裁、翼赞政治会常任总务、大日本防空协会理事长。1943年任东条内阁国务大臣。日本投降后被指名为甲级战犯，开除公职。整肃解除后返回政界。1953年当选为参议员。1956年重任日本青年馆理事长。

吉田茂(Yosida Sigeru, 1885—1954) 法西斯主义官僚。东京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早年师事于安冈正笃，曾任金鸡学院顾问。1932年参加国维会，任理事。1935年任冈田内阁书记官长。内阁调查局设置后，转任第一任局长，与陆海军武官共同参与制

定政策。1937年被敕选为贵族院议员。1940年任米内内阁厚生大臣。1943年任大日本劳务报国会会长、福冈县知事。1944年任小矶内阁军需大臣。（此人非曾任日本总理大臣之吉田茂）

关于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参考书目

关于德国法西斯主义

德文书目:

① 迪特里希·艾希霍尔茨、库尔特·戈斯魏勒主编:《法西斯主义研究》(Herausgegeben von Dietrich Eichholtz und Kurt Gossweiler, Faschismus-Forschung), 柏林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② 戈斯魏勒:《法西斯主义论文集》(Kurt Gossweiler, Aufsätze zum Faschismus), 柏林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③ 布拉赫、冯克、雅考普森主编:《1933—1945年民族社会主义专政》(Bracher, Karl Dietrich/Funke, Manfred/Jacobson, Hans-Acolf(Hrsg.),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iktatur 1933—1945. Eine Bilanz), 联邦德国联邦教育中心1987年版。

④ 马丁·布洛沙特、诺尔贝特·弗莱主编:《第三帝国》(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Broszat und Norbert Frei, Das Dritte Reich), 弗莱堡·维尔茨堡普劳埃茨出版社1983年版。

⑤ 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攫取政权的阶段》(Karl Dietrich Bracher, Stufen der Machtergreifung),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乌尔施泰因出版社1962年版。

⑥ 布拉赫:《德国的专政。民族社会主义的产生、结构与结果》(Karl Dietrich Bracher, Die deutsche Diktatur. Entsteh-

ehung, Struktur, Folg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科隆克彭豪厄尔和魏池出版社1969年版。

⑦ 莱因哈德·库恩尔:《德国法西斯资料与文献》(Reinhard Kühnl, Der deutsche Faschismus in Quellen und Dokumenten), 帕尔鲁根施泰因出版社1979年版。

⑧ 库恩尔:《法西斯主义。原因、统治结构、现实性》(Reinhard Kühnl, Der Faschismus. Ursachen, Herrschaftsstruktur, Aktualität), 迪斯特尔出版社1988年版。

⑨ 汉斯·莫姆森:《在历史的关联中研究民族社会主义》(Zur Behandl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istorischem Zusammenhang), 见《民族社会主义与教学法问题》, 波恩联邦政治教育中心1980年版。

⑩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主编:《通往灾难的道路。1930—1933年魏玛共和国时期工人与工人运动》(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0—1933), 柏林—波恩迪茨—纳赫夫出版社1987年版。

⑪ 德特莱弗·J·K·鲍伊克尔特:《魏玛共和国》(Detlev·J·K·Peukert, Die Weimarer Republik),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苏尔卡姆普1987年版。

⑫ 沃尔夫冈·鲁格:《魏玛的终结》(Wolfgang Ruge, Das Ende von Weimar), 柏林迪茨出版社1983年版。

⑬ 赫尔穆特·鲍克主编:《坠入第三帝国》(Herausgegeben von Helmut Bock, Sturz ins Dritte Reich), 莱比锡—耶拿—柏林马兰尼亚出版社1985年版。

⑭ 库尔特·佩措尔德/曼弗雷德·魏斯帕克:《卐与骷髅头。罪恶政党》(Kurt Patzold/Manfred Weißbecker, Hakenkreuz und Totenkopf. Die Partei des Verbrechens), 柏林科学出

版社1981年版。

⑮ 恩斯特·诺尔特：《法西斯主义及其时代》(Ernst Nolte, *Der Faschismus in seiner Epoche*)，慕尼黑—苏黎士皮帕尔出版社1984年版。

⑯ H·A·图尔纳尔：《德国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H·A·Turner, *Faschismus und Kapitalismus in Deutschland*) 哥廷根1972年版。

⑰ 布洛沙特：《希特勒国家》(Martin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德国》第1卷，德意志安施塔特·斯图加特出版社1971年版。

⑱ 莫姆森：《由运动向体制过渡阶段德国传统与法西斯领导集团的交织》(Hans Mommsen, *Zur Verschränkung traditioneller und faschistischer Führungsgruppen in Deutschland bei Übergang von der Bewegung-zur Systemphase*)，见沃尔夫冈·施德尔主编：《法西斯主义作为社会运动》，汉堡霍夫曼和卡姆平出版社1976年版。

⑲ 佩措尔德：《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Joachim Petzold, *Die Demagogie des Hitlerfaschismus*)，柏林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⑳ W·霍尔恩：《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元首思想意识与党组织》(W·Horm, *Führerideologie und Parteiorganisation in der NSDAP*)，1972年版。

㉑ 佩措尔德：《德国法西斯保守派理论家》(Joachim Petzold, *Konservative Theoretiker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德国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㉒ 克劳斯·黑尔德布兰德：《第三帝国》(Klaus Hildebrand, *Das Dritte Reich*)，慕尼黑·维也纳奥尔登堡出版社1979年版。

②③ 沃尔夫冈·韦伯曼：《1922—1982年欧洲法西斯主义比较》(Wolfgang Wippermann, *Europäischer Faschismus im Vergleich 1922—1982*)，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苏尔卡姆普出版社1983年版。

②④ 帕·莫雷诺：《左派民族社会主义》(Patrick Moreau, *Nationalsozialismus Vom links*)，德意志安施塔特出版社1984年版。

②⑤ 佩·约·拉希施米尔：《法西斯主义起源》(P. J. Ratschmir, *Der Ursprung des Faschismus*)，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1年版。

②⑥ 雷奥·鲍里阿克夫-约瑟夫·乌尔夫：《第三帝国与它的思想家》(Leon Poliakov—yosef Wulf, *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Diener*)，柏林—格伦纳瓦尔特出版社1959年版。

②⑦ 奥·黑尔施菲尔德主编：《在通往第三帝国的道路上。力量—倾向—潮流》(Oswald Hirschfeld(Hrsg.), *Aufdem Weg ins Dritte Reich. Kräfte—Tendenzen—Strömungen*)，波恩联邦政治教育中心1981年版。

②⑧ 魏纳·马瑟尔：《向共和国的猛攻—纳粹党早期史》(Werner Masser, *Der Sturm auf die Republik. Frühgeschichte der NSDAP*)，乌尔施泰因专业书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②⑨ 伏尔克尔·里特伯尔格主编：《1933年。共和国如何屈从于专制》(Volker Rittberger(Hrsg.), *1933. Wie die Republik der Diktatur erlag*)，斯图加特·柏林·科隆·美因茨W·考尔哈莫出版社1983年版。

③⑩ 因戈·冯·敏希/乌维·布罗德森：《民社党国家法令》(Ingo von Münch/Uwe Brodersen, *Gesetze des Ns—stoates. Dokumende eines Unrechdssystems*)，帕德波恩·慕尼黑·维也纳·苏黎士菲迪南·舒宁出版社1982年版。

英文书目:

① 约翰彼得·霍斯特·格里尔:《巴登纳粹运动,1920—1945年》(yohnpeter Horst Grill, The Nazi Moment in Baden 1920—1945), 北卡罗里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 诺曼·理希:《希特勒的战争目标》(Norman Rich, Hitler's War Aims), 第1卷, 伦敦1973年版。

③ 迈克尔·凯特尔:《纳粹党,1919—1945年党员和领导人的社会概况》(Michael JKater, The Nazi Party, A Social Profile of Members and Leaders, 1919—1945), 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④ 路易斯·L·斯尼德:《第三帝国百科全书》(Zonis L, Snyder, 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 纽约1976年版。

⑤ 奥蒂斯·米切尔:《1918—1934年希特勒征服德国:纳粹独裁制度的建立》(Otis C. Mitchell, Hiler Over German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zi Lictatorshi 1918—1934), 费城1985年版。

⑥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第1卷, 美国政府出版社, 华盛顿1946年版。

中文书目

①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康纳德·海登:《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史》, 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③ 希特勒·《我的奋斗》, 国立编译馆译, 1943年版。

④ 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 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

⑤ 约翰·托兰:《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的一生》, 北京日

报出版社1989年版。

⑥ 卡尔·迪特里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世界大战时期》，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⑦ 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

⑧ 瓦·巴特尔：《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德国，1933—194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⑨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三联书店1974年版。

⑩ 彼得·波罗夫斯基：《阿道夫·希特勒》，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⑪ 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⑫ 陈进源：《希特勒的一生》，台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1986年版。

⑬ 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集》现代部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⑭ 《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二)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① 伦佐·德·费利切：《墨索里尼传》(Renzo De Felice, Mussolini)

第1卷 Mussolini il Revolucionario, 都灵埃纳乌迪(Einaudi)出版社1965年版)

第2卷 Mussolini il Fascista, 埃纳乌迪出版社1966年版。

第3卷 Mussolini il Fascista, 埃纳乌迪出版社1968年版。

第4卷 Mussolini il Duce, 埃纳乌迪出版社1974年版。

第5卷 Mussolini il Duce, 埃纳乌迪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法比奥·莱维、翁贝托·莱夫拉、尼古拉·特兰法利亚主

编：《意大利史》(Fabio Levi, Umberto Levra, Nicola Tranfaglia, storia d'Italia), 佛罗伦萨新意大利(La Nuova Italia)出版社1978年版, 第1—3卷。

③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葛兰西》(Palmiro Togliatti, Gramsci), 佛罗伦萨帕伦蒂(Parenti)出版社1955年版。

④ 陶里亚蒂：《法西斯主义的教训》(Palmiro Togliatti, Lezioni sul Fascismo), 罗马里乌尼蒂(Riuniti)出版社1974年版。

⑤ 恩佐·桑塔莱利：《法西斯主义史》(Enzo Santarelli, storia del Fascismo), 罗马里乌尼蒂出版社1973年版, 第1—3卷。

⑥ 焦尔焦·阿门多拉：《法西斯主义与工人运动》(Giorgio Amendola, Fascismo e Movimento Operaio), 罗马里乌尼蒂出版社1975年版。

⑦ 安杰洛·塔斯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夺取政权》(Angelo Tasca, Nascita e Avvento del Fascismo), 佛罗伦萨拉特尔扎(Laterza)出版社1950年版, 第1—2卷。

⑧ 安东尼奥·葛兰西：《青年时代(1914—1918)文集》(Antonio Gramsci, Scritti Giovanili<1914—1918>), 都灵埃纳乌迪出版社1958年版。

⑨ 保罗·阿拉特里：《法西斯主义的起源》(Paolo Alatri, Le Origini del Fascismo), 罗马里乌尼蒂出版社1962年版。

⑩ 阿拉特里：《意大利的反法西斯主义》(Paolo Alatri, L'antifascismo italiano), 罗马里乌尼蒂出版社1973年版, 第1—3卷。

⑪ 丹尼斯·麦克·史密斯：《墨索里尼》(Denis Mack Smith, Mussolini), 米兰里佐利(Rizzoli)出版社1983年版。

⑫ 贝尼托·墨索里尼：《我的生平》(Benito Mussolini,

La Mia Vita), 米兰里佐利出版社1983年版。

⑬ 维尼乔·阿拉尔迪:《黑衫队走进蒙特齐托里奥—法西斯夺取政权的议会史》(Vinicio Araldi, Camicie Nere a Montecitorio—Storia Parlamentare dell'avvento del Fascismo), 米兰穆尔西亚(Mursia)出版社1974年版。

⑭ 乔瓦尼·格里利:《大资本与天主教右派》(Giovanni Grilli, Grande Capitale e Destra Cattolica), 佛罗伦萨帕伦蒂出版社1959年版。

⑮ 费尔迪南多·科尔多瓦:《法西斯名人传》(Ferdinando Cordova, Uomini e Volti del Fascismo), 罗马布尔佐尼(Bulzoni)出版社1980年版。

⑯ 乔治·坎代洛罗:《现代意大利史》(Giorgio Candeloro,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米兰费特里奈里(Feltrinelli)出版社1986年版, 第8和第9卷。

⑰ 阿尔贝托·焦万尼尼:《阿文廷拒绝》(Alberto Giovannini, il Rifiuto dell'Aventino), 波洛尼亚穆里诺(Mulino)出版社1966年版。

⑱ 维科·法基:《山德罗·佩尔蒂尼—六次判刑两次越狱》(Vico Faggi, Sandro Pertini—Sei Condanne due Evasioni), 米兰蒙达多里(Mondadori)出版社1982年版。

⑲ 圭多·夸扎:《历史编纂学与法西斯主义》(Guido Quazza, Storiografia e Fascismo), 米兰弗兰科·安杰利(Franco Angeli)出版社1985年版。

⑳ 阿尔弗雷多·罗科:《阿尔弗雷多·罗科政治论文及演说集》(Alfredo Rocco, Scritti e Discorsi Politici di Alfredo Rocco), 米兰朱弗莱(Giuffrè)出版社1938年版, 第1—3卷。

(三)关于日本法西斯主义

①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法西斯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共8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

② 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日本法西斯主义》(共3卷)，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4年。

③ 日本现代史研究会编：《日本法西斯主义》(1)(2)，大月书店，1982年。

④ 岩波讲座：《日本史》(18—21卷)，岩波书店，1977年。

⑤ 《现代史资料》(共45卷)，水篳书房，1963—1980年。

⑥ 藤原彰等编：《资料日本现代史》(1—13卷)，大月书店，1980年。

⑦ 金原左门等编：《昭和的历史》(1—7卷)，小学馆，1982—1984年。

⑧ 江口圭一等编：《体系日本现代史》(1—4卷)，日本评论社，1978年。

⑨ 木户日记研究会：《木户日记》(上、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

⑩ 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岩波书店，1950—1952年。

⑪ 安部博纯：《法西斯主义研究序说》，未来社，1975年。

⑫ 江口圭一编：《“日本法西斯主义”论》(日本历史科学大系12)，校仓书房，1977年。

⑬ 山口定：《法西斯主义》，有斐阁，1979年。

⑭ 田中惣五郎：《日本法西斯主义》，河出书房，1960年。

⑮ 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未来社，1964年。

⑯ 国际政治学会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共8卷)，朝

日新闻社，1963年。

⑰ 木下半治：《日本右翼研究》，现代评论社，1977年。

⑱ 大野达三：《“昭和维新”与右翼恐怖》，新日本新报社，1981年。

⑲ 三宅正树等编：《昭和史的政治与军部》（1—4卷），第一法規出版社，1983年。

⑳ 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共2卷），原书房，1971年。

㉑ 秦郁彦：《军法西斯主义运动史》，河出书房，1962年。

㉒ 《北一辉著作集》（共3卷），水笃书房，1976—1979年。

㉓ 永田铁山刊行会：《秘录永田铁山》，芙蓉书房，1972年。

㉔ 矢部贞治：《近卫文麿》，读卖新闻社，1976年。

㉕ 桥川文三等编《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Ⅰ，有斐阁，1970年。

㉖ 古田光等编：《近代日本社会思想史》Ⅰ，有斐阁，1970年。

㉗ 长幸男等编：《近代日本经济思想史》Ⅰ，有斐阁，1970年。

㉘ 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下，有斐阁，1956年。

㉙ 桥川文三编：《大川周明集》，筑摩书房，1975年。

㉚ 小林英夫：《昭和法西斯主义者群像》，校仓书房，1985年。

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第一批书目

- | | |
|--------------|-------------|
| 蝉螭学 | 李隆术 李云瑞著 |
| 变形体非协调理论 | 郭仲衡 梁浩云 编著 |
| 胶东金矿成因矿物学与找矿 | 陈光远 邵伟 孙岱生著 |
| 中国天牛幼虫 | 蒋书楠著 |
| 中国近代工业史 | 祝慈寿著 |
| 自动化系统设计系统学 | 王永初 任秀珍著 |
| 宏观控制论 | 牟以石著 |
| 法学变革论 | 文正邦等著 |

第二批书目

- | | |
|--------------|----------------------------|
| 中国自然科学的现状与未来 | 全国基础性研究状况调研组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局 |
| 中国水生杂草 | 刁正俗著 |
| 中国细颚姬蜂属志 | 汤玉清著 |
| 同伦方法引论 | 王则柯 高堂安著 |
| 宇宙线环境研究 | 虞震东著 |
| 头位难产 | 凌萝达 顾美礼主编 |
| 中国现代工业史 | 祝慈寿著 |
| 中国古代经济史 | 余也非著 |
| 劳动价值的动态定量研究 | 吴鸿城著 |
|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 吴光辉等著 |
| 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 | 尹韵公著 |

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 方法与事实	陈 平 著
艺术教育学	魏传义主编
儿童文艺心理学	姚全兴著
从方法论看教育学的发展	毛祖桓著

第三批书目

奇异摄动数值方法引论	苏煜成 吴启光著
结构振动分析的矩阵摄动理论	陈塑寰著
中国古代气象史稿	谢世俊著
临床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	江正辉主编
历代蜀词全辑	李 谊辑校
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理论——变革	杜海燕著
二元经济的选择	
中国企业运行的法律机制	顾培东著
法西斯新论	朱庭光主编
《易》与人类思维	张祥平著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